在天使手中

Dans la main de l'ange

[法]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 著
Dominique Fernandez
余中先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8-179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天使手中／（法）费尔南德兹著；余中先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
(左岸译丛)
书名原文:Dans la main de I'ange
ISBN 978-7-80762-998-6

I.在… Ⅱ.①费…②余… Ⅲ.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Ⅳ.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6806 号

书　　名：在天使手中
著　　者：[法]费尔南德兹
译　　者：余中先
出 品 人：周殿富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胥　弋
责任编辑：顾学云
装帧设计：郑迪蔚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 号(130021)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31.375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栋底商 A222 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80762-998-6
定　　价：42.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无视荣耀

——代译序

2001年春，七十一岁的法国老作家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终于来到了北京。早在上一年的年底，就听说他要来北京。但是，后来他在临上飞机的那一刻不幸病倒，旅行因此拖延，让我们这些期待着与他在北京见面的法国文学爱好者空等一场。

我渴望见这位作家一面，还有另一个原因。早在数年前，我应柳鸣九先生之约，为他编选的《法国新寓言派作品选》写导论，那本书选译了当时被一些法国评论家认为在文坛上风头最健的几位所谓"新寓言派"作家的作品，作家中有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米歇尔·图尔尼埃、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让-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等，全是在20世纪的法国文坛上，尤其是在20世纪下半期的法国文坛上屈指可数的大作家。记得为写导论，当时还读了一些批评家的文字，在那些评论家的文章中，"新寓言派"的队伍还要略微壮大一些，有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和于连·格拉克的名字。主要是因为这后二位的作品都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所以在《法国新寓言派作品选》中，没有收入他们的什么东西。

在那本书的导论里，我只能借助辞书，简单介绍了一下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不过，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他的作品，除了北京大学桂裕

芳教授翻译的一本薄薄的《黎明》之外，还都没有被介绍给中国读者。

终于，我们在北京见面了，在三次见面和交谈中，我渐渐地对费尔南德兹有了熟悉和了解，我们谈论了文学，包括文坛上的现象和一些文学作品，谈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相同。我答应他，一定把他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我决心翻译一部（或两部）他的小说。而今天，我正在写的这篇小文章，是实践对他的承诺的第一步，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想让我们的读者对他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自成一派的文学大家

其实，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Dominique Fernandez)在法国还是享有很大的声誉的。

他1929年生于巴黎，父亲拉蒙·费尔南德兹是小有名气的批评家。多米尼克曾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长期从事文学教学工作，有意大利语教师资格。二十八岁时，他在那不勒斯的法兰西学士院任教，因为在一次关于左派作家罗歇·瓦扬的讲座中语出惊人，被法国当局认为与“官方”口吻相左，而被勒令停止教学。他从1958年开始文学写作，并在《文学半月刊》和《快报》上撰写书评。他已发表的小说作品有《石头皮》(1959)、《黎明》(1962)、《给朵拉的信》(1969)、《果戈理的孩子们》(1971)、《波波利诺，或那不勒斯的秘密》(1974)、《玫瑰星》(1978)、《耳插一朵茉莉花》(1980)、《乔万尼先生》(1981)、《在天使手中》(1982)、《爱》(1986)、《贱民的荣誉》(1987)、《南方学校》(1991)、《波菲里奥和康丝坦丝》(1992)、《美第契家族的最后者》(1994)、《名誉法庭》(1996)等。他的评论作品则有《意大利小说和现代小说的危机》、《帕韦泽的失败》(博士论文)、《树连根》、《爱森斯坦》、《加尼梅德的劫持》等。

此外，作为音乐爱好者，他还写过歌剧，作为喜爱旅游的人，写过十多部游记。

费尔南德兹的文学作品一直得到专业人士的好评，摘取过不少文学奖。《果戈理的孩子们》获了尼斯狂欢节文学大奖，《波波利诺，或那不勒斯的秘密》获了美第契奖，《在天使手中》获了龚古尔奖，《爱》获了摩纳哥大公奖。至今，他还担任美第契奖的评委，同时还是格拉塞出版社

的审读委员。近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成为了四十名“不朽者”中的一员。

当我就“新寓言派”的说法问他时,他微笑地否定了。他的看法很明确:“新寓言派”的归纳,其实是批评家们为了方便起见,对他和跟他具有类似创作倾向的作家的一种主观归类,一种贴标签行为。费尔南德兹认为,他的创作跟尤瑟纳尔和图尔尼埃更为相像,而跟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虽然写作上有一定的共性,但毕竟无法归于“同一派”。

说到他与尤瑟纳尔和图尔尼埃的相同,主要还在于三人的作品都以与命运抗争的英雄为主人公,而且,他们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历史上、传说中、经典作品中已经存在了的人物,尤瑟纳尔最著名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哈德良皇帝(《哈德良回忆录》)是古罗马的皇帝,而芝诺(《熔炼》)则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图尔尼埃小说中最著名的形象桤木王(《桤木王》)和鲁滨逊(《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无缥缈境》)分别是日耳曼传说中家喻户晓的人物和笛福名著中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们对这些人物进行改写,为他们赋予新的理念、新的寓意、新的象征符号。也正是因为这样,批评家们才称他们为“新寓言派”。费尔南德兹也是如此,他的《名誉法庭》中主人公是俄国音乐家柴科夫斯基,《在天使手中》的主人公是意大利电影诗人帕索里尼。在这些人物身上,有着最最古老的希腊悲剧的影子,就像一生下来便注定要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一样,像命定要去杀母报父仇的俄瑞斯忒斯一样,他们也都不屈地在与无情的命运相抗争。这些人物总是果断决然,行动到底,走向极端,甚至到最后去杀人。费尔南德兹曾这样说到他笔下的人物:“他们是为了我们而去杀人的英雄”,“他们为作者而死,他们代替作者去死”。这样的论断,反映出主人公的历史寓意和悲剧色彩,无怪乎他和尤瑟纳尔和图尔尼埃一样,那么容易被贴上“新寓言派”的标签。

巴罗克艺术的小说典范

但是,跟尤瑟纳尔和图尔尼埃的小说一样,费尔南德兹的小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尽管它们往往借历史人物来做小说的主人公。因为,说到底,费尔南德兹写小说,只是借助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做躯

体,而把自己对历史文化和传统文明的见解投入到他们的语言中、心灵中。写这样的小说,不是通过史料的翔实和事件的考证取胜,而是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自由的虚构取胜,用一些批评家的评语来说,他的小说是巴罗克艺术的典范。

大约在70年代到80年代,法国文坛上曾经有过相当程度的"历史小说"热,与"历史小说"热联系在一起的,有"人物传记"热和"回忆录"热。笔者以前专门写过文章,论及这些"热点"的社会学和文艺学原因。顺便提一笔,中国目前似乎也沉浸在了这三种"热"之中。历史小说、人物传记和回忆录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热了几年之后,热到了中国,而且带有了中国特色,即历史小说多以帝王将相为主人公,人物传记以名人为传主,回忆录当然要由名人来写,或者是名人让人来写。离题了,打住。

我们来看看,费尔南德兹的几部主要小说都写了一些什么吧。

《果戈理的孩子们》的主题是无父的孩子。艾蒂安十二岁起就成了孤儿,酷爱果戈理(也是一个无父的孤儿)的作品,后来他当了一个父母离异的孩子斯蒂芬的家庭教师。他试图理解斯蒂芬孤独的心灵,理解他怪异的行动的动机。在充满心理学分析的语言中,故事展开着。读者发现,一个个人物似乎全都是"果戈理的孩子",生长中缺少一个男性榜样的引导。

《波波利诺,或那不勒斯的秘密》以阉人歌手为主题,整篇小说几乎都以阉人歌手之间的对话形式写出。在小说中,那些权威人物为了欣赏永远美妙的歌喉,对一些少年歌手进行阉割,不让他们在青春期里变嗓子。波波利诺正是这样不幸的人。作者在写阉人歌手的生活时,没有资料可以借鉴。因为很久以来,这种野蛮的阉割已被废除,阉人歌手在世界上也几乎绝迹了。到底阉人歌手在唱歌时,身体和心灵中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无法得知。但作者凭着丰富的想象力,还有敏感细腻的心境,硬是写出了这样一部巴罗克艺术的典型作品。以我的猜想,这跟作者对同性恋心态的熟悉很有关系。当然,后来,费尔南德兹对我谈起过中国的京剧中男演旦角的现象,他认为,这一现象很有意思,假如他早早地就听了男演员唱的旦角戏,他的《波波利诺》也许会是另一种写法。

《在天使手中》以意大利当代电影诗人帕索里尼的生活为题材。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1922—1975)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不仅写诗,还写小说,写评论,导演电影,从事新闻活动和社会活动。费尔南德兹笔下的帕索里尼,是一个一生下来就命定要斗争一辈子的人物,他的父亲是一个法西斯的军官,而母亲是弗留利地区一个农民,他自己则是共产党人,一个左派。他生来就喜欢闹事,一生经历过三十三次诉讼。他在学生运动中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能体现他与众不同的斗争精神。当警察奉命镇压学生运动时,帕索里尼说的话却令运动的积极分子大跌眼镜:"我支持雷子,反对大学生,因为,大学生是资产阶级的后代,而雷子是人民的儿子。"在这样的逻辑思维支配下,他一生都要忙于"与人奋斗"了。在小说中,作者着重写了帕索里尼的童年、爱情与死亡。费尔南德兹后来说到,一个名人,传记中有的,是他成功后众人所关注的东西,而他在成为名人之前,是一个更纯真的人,他跟一般的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而我,我就要写的,恰恰是这时候的更真实更自然的"他"。写童年,因为这段时期是决定人一生性格、前途的培养时期,写爱情,因为这毕竟不那么公开,是私人性的,而死亡,则永远充满着神秘。自然、隐秘、神秘,恰恰是巴罗克小说的要素,是费尔南德兹渴望在小说中表现的。

《南方学校》和《波菲里奥和康丝坦丝》讲述的都是波菲里奥和康丝坦丝这一对性格、脾气、人生观、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的夫妻的生活。波菲里奥代表了南方,地中海边的意大利,无序,放纵,心血来潮,而康丝坦丝则是北方的象征,严肃,勤奋,谨慎,多才。这对不和谐的夫妻的日常生活,被作者故意放在了法西斯兴起的不和谐的大环境中。波菲里奥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走上了邪路,最后遭到正义的惩罚。当六十年后,波菲里奥最后回顾这一段双重混乱的往昔时,他写出了自己的忏悔和总结,这两部小说是作者为纪念自己的父母而写的,小说中明显留有父母生活的影子。

《美第契家族的最后者》的主人公加斯东是统治佛罗伦萨数世纪的名门望族美第契家族的最后一个君主。他讨厌统治,仇视政权,性格十分矛盾,小说通过一个宫廷医生的目光,来揭示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内幕。

《名誉法庭》以柴科夫斯基的死为主题。1893年,事业达到巅峰的柴

科夫斯基死在彼得堡,据众多的传记作品说,他是死于霍乱。小说从另一种猜测入手,引导读者见识了柴科夫斯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名誉法庭》中,柴科夫斯基因为诱惑了一个美少年,被一个神秘的"名誉法庭"判定有罪,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批准下,被判死刑,赐毒药自饮。柴科夫斯基始终怀着一种对"美好"情感的留恋,欣然服毒自尽。有关的档案被毁,法官们的身份也无法证实,只有一个小说家可以重构这一模糊的故事……在费尔南德兹博学和充满灵感的文笔下,沙皇治下的一个没落中的都市重现出来,一个个法官,无论是检察官、主教、剧院经理,还是国家参议,都在这个可怕的集体谋杀中,暴露出了他们在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中的面貌,每个人都展示出他们各自的利益、欲望、秘密的冲动、虚伪的嘴脸,等等。书评认为,由于作者的才华,使得读者往往不得不相信,柴科夫斯基就是这样被那些人处死了。小说是一幅风俗壁画,充满着"喧哗与骚动"、"敏感与细微"。

费尔南德兹的小说,充分体现了寓情感、哲理于吸引人的故事、人物、文字的巴罗克艺术的特色。其形式,主要指故事的叙述、氛围的营造、文字的雕琢,十分注重感性化的影响力。我们在柴科夫斯基之死与阉人歌手的体验,可见出特别神秘的氛围:气势磅礴,气氛紧张,生气勃勃;而在诗人帕索里尼和君主加斯东身上,又可见出稀奇古怪的性格和离经叛道的精神,波菲里奥和康丝坦丝给人们提供的,则是不合常规的、各自又都有自己特有色彩的一对矛盾性格,各自在自身的强烈度上几乎达到无限。

文坛现象的冷静观察者

由于费尔南德兹作为大作家的特殊地位,我们这些在中国从事法国文学研究工作的人特别想听一听他对文学的看法。正好,费尔南德兹在北京大学和王府井饭店举行了两次讲座,谈及了"巴罗克艺术"和"当今的法国小说"。

费尔南德兹认为,当今的法国文坛,尤其在小说界,早就没有了流派,最后的一个文学流派,是四五十年前的"新小说",当然新小说仍然在起着影响,主要是它对小说创作的探索精神。而二三十年以来,已经

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了。没有了大师,没有了旗帜,没有了标签,只有了小说。每一个作家几乎都是独立的写作者,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即他们的作品。他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大的自由,都无法归类和排队。

在这一点上,费尔南德兹的观点与另一位作家弗萝朗丝·德莱的看法不同。几个月前同样在北京作了文学讲座的德莱女士认为,在"新小说"之后,还有一个流派存在着,即"潜在文学工场"。而费尔南德兹则认为,"潜在文学工场"不是一个流派,只是一个团体,在该团体的主要创始人雷蒙·格诺和乔治·佩雷克逝世之后,虽坚持着文学实验和交流,但他们一是没有理论宣言,二是没有自己的刊物,三是没有影响到文学界,故而不能算做是真正的流派。我曾与德莱讨论过,我也认为"潜在文学工场"是一个文学"社团",不算文学"流派"。无奈德莱女士自身投入于工场的活动,不免有些过于抬高工场的作用,依然坚持认为它是一个流派。我赞同费尔南德兹的看法,它实际上也是大多数批评家的看法。"潜在文学工场"的主要实践,是从"文字游戏"出发的对文学潜在可能性的探索,颇有些钻牛角尖的意味。

说到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社会功能,费尔南德兹认为它在逐渐地减弱,而且减弱到了可怜的地步。在18世纪,伏尔泰、卢梭的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是巨大的,没有他们,就没有启蒙;19世纪,雨果、左拉等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到20世纪前期,还有萨特、加缪,他们的小说作品依然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而现在,法国社会完全成了一个消费社会,文化成了工业化的文化,文学作品和其他的书也都成了工业产品,成了商品,作家的社会作用变得很小。尽管从表面来看,今天的文学作品的出版很是繁荣,例如,到每年的出版季节,即八月底九月初,会有大量的新书出版,其中2000年8月25日那一天,就有三百五十多部小说出版,数量可谓惊人,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它们到底写了些什么,更没有一个人去把它们读一遍了。

费尔南德兹认为,文学已经被大众和大众媒体操纵了,新书往往选在八九月份的出版季节来出版,一旦出版后,各大报刊,包括电视中的"读书节目",都一窝蜂地进行商业炒作,评论几乎就是宣传,就是公关,就是广告,很少有真正严肃的批评。于是,两三个月里头,报纸、杂志、广

播、电视中都在谈着那些被人认为最好的书。而与此同时,各大文学奖的评委们也在审读这些作品,一直到十一月,从它们中评选出获奖作品来,而那些获奖作品便会一下子畅销起来。到此,炒作告一段落,于是,这些作品就慢慢地被人遗忘,当然真正有价值的作品除外。费尔南德兹把这样的文学出版和批评机制用一句话概括成“大众专政”或者“大众传媒专政”。以前,作家会走在大众前面,以自己的创作影响着大众,而现在,许多作家走的道路正相反,是作品跟在大众后面,以迎合大多数读者的消费习惯。用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的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媚俗”。

费尔南德兹谈到的这些现象,使我想起了中国目前的出版状况。我们的图书出版机制似乎也是如此,或曰正在向这方面靠拢、接轨。其中的利弊,应该引起我们深层次上的注意。对出版商而言,卖出书就是胜利,而对作家来说,他的作品需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然,他也要挣稿费,但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费尔南德兹认为,真正的小说是慢慢地赢得读者的,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但今天的许多法国小说,尽管会在两三个月中深深地刺激着人们的脑细胞,但却往往是短命的,从传媒——市场——读者那里很快绕了一个圈,然后慢慢消亡。原因很简单,它们所写的都是人们已经说过的,而不能说出别人说不出来的东西。

费尔南德兹对文坛上的炒作很看不惯,他甚至讽刺罗伯-格里耶的某些做派。由于费尔南德兹和罗伯-格里耶同为美第契文学奖的评委,他们常常在一起工作、讨论,所以费尔南德兹常常直言不讳地当面批评罗伯-格里耶,说他的许多作品本身并无多大的价值,而往往靠做“广告”、“作秀”来引起公众的注意。其实,作为当年新小说的主将,罗伯-格里耶还是一个很严肃的作家,如果说他要做“广告”,那也是出于他“陌生的文学名人”的矛盾心态,他就曾说过:“在我们今天,有钱不赚是愚蠢的,但有时候,见钱就赚则是野蛮的。”他甚至批评新一代的新小说家们,如让·埃什诺兹、让-菲利普·图森、克洛德·加缪等人“总在想怎么把作品卖出去”,而那可不是作家的“目的”。费尔南德兹连这样严肃的罗伯-格里耶都要讽刺一下,可见他对功名利禄的淡漠了。

当我对费尔南德兹说,他的这些看法很有意思,我打算写一篇文章

介绍一下，放在《世界文学》的“世界文坛热点”栏目中，他欣然同意，但却不怎么明白何谓“热点”。我说“热点”就是大家关注的东西。费尔南德兹没有说话。我想，他的心中是不是在说，我才不在乎什么“热点”不“热点”呢。或者在说，现在的文坛哪里还有什么“热点”呢，全是人的炒作罢了。我作如此的猜测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曾问起过我：“l'indifférence de gloire（无视荣耀）中文怎么说？”他的下一部小说中，有一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就叫“无视荣耀”，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荣耀和名誉，对诸如此类的东西嗤之以鼻。我静等“无视荣耀”的诞生，同时却在“文坛热点”的栏目中，写了一个无视热点的法国作家。

至于当代法国小说中的两大创作倾向，或按照费尔南德兹的话来说，两大“家族”，他认为两者都由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族长”领衔。其一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其二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杜拉斯那一族的小说大都写个人的内心，写主体的情感，写个体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平时抓不住的一些十分微妙的东西。这方面的作家作品很多，其中最近的可数罗朗·莫维尼埃的小说《学会完蛋》和《远离他们》。

我2000年短访巴黎，曾留意过《学会完蛋》。这部小说是一个爱情生活失意的女子的内心独白。丈夫有了婚外恋，她无法忍受自己感情的受骗，便天天与他争吵。一次车祸使丈夫伤残住院，妻子有时间反思自己对夫妻关系的认识，从一种痛苦走向另一种痛苦，即忍受另一种生活，学会怀疑、拒绝、抛弃还不够，还要学会完蛋，学会结束，学会在失败中呆着。《远离他们》则讲一个小男孩不愿意直面复杂的家庭危机，毅然决然地离开家，从零开始重新生活，建立未来。而父亲则到处寻找他。书评一般认为，罗朗·莫维尼埃的文笔细缓，精确，非常得体地描述出了女性的潜意识。我想，这种风格，当是杜拉斯一族的特色。

尤瑟纳尔那一族的小说则相反，尤瑟纳尔不写私人、隐私、内心，而是写英雄，比一般人高的英雄。费尔南德兹自认为属于这一族，因为他的小说很古典，有人物，有社会，有神话，有心理学，是社会的一种反映。这一点，从某些批评家的“新寓言派”的标签中，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在这一类作家中，费尔南德兹比较喜欢的还有皮埃尔·孔贝斯科。他也如同费尔南德兹一样，不为中国读者熟悉，他的代表作是《受难地

的女人》,这部写于90年代初期的小说(获龚古尔奖)以繁华铺陈的巴罗克风格,用一种螺旋发展的结构,从历史和现实相融交错的角度,刻画了巴黎底层市民的众生相。小说以一个叫拉结又称莫德太太的犹太老女人为中心,把一帮子作奸犯科的小人物集中到现代巴黎的一个低级咖啡馆中。人物的话语和故事叙述的风格多种多样,可以说是一幅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的壁画。

皮埃尔·孔贝斯科的《受难地的女人》已由王晓峰教授翻译成汉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尤瑟纳尔和图尔尼埃也已经为中国读者熟悉,并受到欢迎。现在,我们中国的法语文学翻译界应继续努力,把费尔南德兹这样有思想,有风格的作家也介绍过来,至少,也应该填补一下空白。

余中先

写于2001年3月

修改于2008年10月

第一部

1

1922年3月5日，我出生在博洛尼亚。亲爱的杰那里埃罗，有多少事情包含在这几个单词中！我是多么欣喜你有如此简朴、如此纯洁的心灵，有如此新鲜而又向着世界景象开放的思想！我将不需要人为地打乱我叙述的秩序，也不怕从头开始。你是我的收信人，我唯一的收信人，我不需要别的人了。始终做那个我喜欢的那不勒斯男孩吧，活泼，直爽，灵魂与躯体皆强壮，带着第一次跨入校门的穷小子的那股严肃劲儿，时刻准备进入任何一本新书中，但是，假如作者用一种复杂而艰涩的文笔惹你厌烦，你也会哈哈大笑着将书本扔掉。

如若我选择了无聊的文学大众作为听众，而他们博学多才的良师让他们为信奉时间编年顺序感到羞愧，那么，我会觉得自己还能那么自由地讲述我的生平，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就像它们发生的过程那样吗？为取悦那些先生，恐怕应该打破事件的自然连贯，蔑视日期，回溯地讲述，自命不凡地绞尽脑汁，把往昔、现今与将来混淆在一起。恐怕还应该使话语不再成为思想的简单外衣，恰到好处地体现出想要表达的概念的所有品质、所有优雅，而是成为一种无动机的词语游戏，即他们所

谓的“言语”,独立于需表达的事物之外。

你,坐在一把小小的铁椅子上,待在卡普亚那门你们家公寓的半空小院子里,铁椅子白色的搪瓷皮在经历了冬天的恶劣天气后,像鱼鳞似的剥裂得更厉害了,高高的紫藤架给你挡住了五月份已经有些炙人的阳光,两步远处,你父亲正在他的帆布躺椅上瞌睡,你愿词语与事实相符,愿开头的几页就对你说起一开始即发生的事。我把我出生的那年、那个城市矗在你跟前,就像《诺尔玛》[1]的大幕拉开后德洛伊教祭司的森林那样。你立即发现了博洛尼亚的街道、房屋和天空,这时,你母亲刚刚把午饭后的盘盏洗完擦干,把剩下的莫扎雷拉[2]放到一块湿布里保鲜后,拿起她的洒水壶,想给罗勒[3]和薄荷浇一遍水。

你将听说博洛尼亚的柱廊:市中心所有街道的两边全是连拱廊,在两条开放的长廊之间,只剩下一条细细的街面之带。购物,散步,闲逛,上午出门,下班回家,市民生活每时每刻都充盈着柱廊。在那儿,人们交谈当日新闻,人们诅咒政府决定的涨价,但首先该骂的是博洛尼亚队的守门员,是他的失误导致了球队在米兰城输给了国际米兰队,或者在都灵输给了尤文图斯队。你会发现,那排成一溜的柱子精彩绝伦:但是,就像真正美丽的、值得装点一个城市的任何东西一样,要知道,在这里,艺术上的关注是次要的,实际功能远远领先于装饰效果。当年,大学——这是欧洲的第一个大学,甚至建在巴黎的索尔邦学院之前——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一下子涌入中古城市的围墙之中,人们便千方百计地增加住宅,而又不损害市内交通。在那些年代,还没有城郊:城墙严格地确定了居住区的周边。柱廊便这样发明了。它作为突出物位于街面前,又相当结实,足以在整整一条街的长度上支撑起好几层增盖的住房,一开始就成功地吸收了居民人口的涨潮。市政法令规定了柱廊的最低高度:七博洛尼亚尺,即2.66米,这可以让一个骑马的人通过。

连拱廊不仅仅是为了遮风雨挡太阳,你不要停留在这样的想法上。

---

① 《诺尔玛》是意大利歌剧家贝利尼的歌剧(1831)。

② 莫扎雷拉是一种带很多水分的鲜奶酪,形状式样类似于中国的豆腐。

③ 罗勒是一种植物,属唇形花科。

同样，你也别以为它有另一个优越性，即行走在那里能免除街上的冒犯，尽管这一王牌在当时变得千百倍地珍贵，因为那些头发老长的年轻白痴骑着隆隆作响的摩托车，会蹭到你身上，而在早先，博学的阿库尔修[1]在这里可以面对文文静静的青年，从容不迫地谈论教皇国和帝国的各种问题。

你还是来欣赏平民精神的伟大教益吧。每一栋房屋都以一个毫无隔断的门厅与它的邻屋相连，这样，富人的府第与穷人的陋室从外面根本看不出什么区别。所有房屋的柱子全都一样，粉红的颜色，又圆又结实，在生肉熟肉店的玻璃橱窗前，就跟守护着贵胄庭院的两扇大门前一样，一个个圆拱(很少有用尖拱的)升向拱顶石。假如这是一个幻觉，必须揭穿它的骗局，你得承认，再没有什么幻象，比缓和了财富间不平等的这三十五公里长的开放性走廊更辉煌的了。

柱廊的另一个好处：它把住宅的私有空间跟散步道的公共空间结合在了一起。不仅是平等化的手段，还是社会交流的手段，它构成了某种向所有人开放的房间，某种不属于任何人的长廊，一个通过、邂逅和交结友谊的地方。公民们在这里相聚更容易，在这里结识更自然，他们用不着彼此跑到对方家中，摁人家的门铃，跨越大门的关隘。当你需要拜访一个朋友时，他已经不再完全是一个朋友了，他是你觉得要打扰的"另一个人"，尽管他并没有让你等，而是立即向你伸开了双臂。在柱廊底下，"这些人"和"那些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每个人都准备着迎接所有人。每个人都把成为自身的焦虑扔到了相处一起的快乐中。私人生活的围墙倒了，个人主义的基础坍了。人们失掉了各自的特殊身份，成全了一种甜美的、热烈的伙伴感和团结感。

这种柱廊文明在博洛尼亚赢得了优势，从中世纪起便如此，而且只是在博洛尼亚，至于其他地方，私人房屋，从资产阶级的住宅，到贵族的宫殿，到处表现出阶级的对立，财富的歧视，自我炫耀的意愿，家族秘密的趣味，保险柜和密室的崇拜。比如在佛罗伦萨，每一座宫殿都构成孤零零的一堆。人们得以从四方来欣赏的建筑的辉煌，激起了主人

---

① 阿库尔修(约 1185—约 1263)，意大利法学家，曾是博洛尼亚大学的教授。

家的威严感和富有感。在博洛尼亚,就丝毫没有这种东西,这里的公共建筑盖过了孤立的房屋,大众理想粉碎了占有、卖弄、家族的精神。从我的中学出来,这是一个中小布尔乔亚子弟就读的国立中学,从学校出来,我看到的并列的建筑有斯帕达宫(有一天,我发现了它平时被遮掩的豪华面目,便躲过了警察的监视,一直闯入它的内院,从一扇打开的窗户中,我看到一间客厅的天花板,装饰有仿大理石和壁画,一个穿玫瑰色衣裙的天使置身于布料的旋涡之中),酒吧杂货铺,我们经常在那里匆匆喝上一杯咖啡(亨里科用微量的烧酒[1]来"修正"它),由一个来自亚平宁山脉的农妇开的乳品店(这是我最喜爱的地方),补鞋匠的棚摊,书店,卖木柴和煤炭的破屋。在这些如此不同、如此不平等的地方之间,从一根柱子到另一根柱子,拱廊连续伸展开它们相同模样的花彩。

当然,我不会弄错。我知道得很清楚,在巴罗克宫殿的拱顶下,玫瑰色的天堂信使是不会在就餐者的盘子中,在一片圆圆的摩德纳熟红肠旁边,加上一块玉米饼的,至多,我们自己的天使,更为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天使——我父亲的月薪——可以使我们每月尝一回鲜,聊充盛宴。富人和穷人,这在博洛尼亚总是有的:但是,至少在好几个世纪中,他们把使他们接近的因素,看得比使他们分开的因素更重要。他们不是生活在柱廊的集体中吗?从这一传说中,我得到了哺育,而对这一人类博爱在城市中的体现,我给予了信仰。我相信,这是跟家庭以及封闭生活的小市民理想相对立的,不仅是我的故乡之城,而且,出于年轻的热情,整个的意大利都被保护在那种理想之外;就这样,我积攒了许多失望,假如,走廊和柱子的这一装饰对我毫无坏心眼的敏感性的影响不那么强烈的话,我本来是能够避免那些失望的。

我常在夜里出门,比起白天五光十色的喧闹来,我更喜欢那些长廊在夜色中的荒凉景象,在神秘的黑暗中,它们一字儿排开,一模一样。比幽灵还更轻巧的猫,从一根柱子跳到另一根柱子,消失在远处的拱顶中;月亮在屋顶上滑行;一个晚归的行人拉起了大衣领子,从一个酒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吧中出来，酒吧的铁帘门在他身后嘎啦啦地落下。一切复归于寂静中；从一扇高开的窗户中，悬下一根绳子，绳头上吊着一只桶，第二天一大早，乳品店的小伙计就会往桶里放一瓶鲜奶。我庆幸自己生在这样一个城市中，在这里，为人矜持、私密身份、个人幸福、家庭自我主义似乎都是陌生的概念；在这里，对邻人的提防，对他私生活的窥视，向他责问——在别处被认定是合法的——的习惯，不能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我，我这个最“各色”的人，害群之马，不入册的贱民，在这里，这一无隔碍社会的乌托邦使我激动。在那个时代，我是不是已经猜测到，孤独、驱逐、迫害将是我的命运？我是不是在寻求，以这一无疆界团结的神话强化自己，而不怕人们扭过背去不睬我，不怕找不到任何人来帮我？

我不那么轻信，不那么冲动，我不会被一种威严建筑的幻影迷惑。我从心底里渴望我们全都相同，我们全都是柱廊的居民，而丝毫没猜想到，对我自己未来的担忧，会吸引我去注意一个现实中遥远的梦。在博洛尼亚，还留有什么中世纪精神？一丝微不足道的痕迹，一段平淡无奇的回忆，说穿了，一道做好了的菜。博洛尼亚小牛肉片，对，它周游了世界，作为我们古老业绩的皱巴巴的旗帜。那是薄薄的一片牛犊肉，盖着一小层火腿肉，浸在融化了的奶酪汁中。我的同胞们继承了这一由平民与贵族同住一个走廊下所表达的古老社会文化的美德，至今继续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烹调，一口吃下去，而在别的地方，它们是分属于三道菜的：火腿是冷盘，肉片是大份足量的正菜，奶酪则是甜食。

我每次经过那里，从来都不会忘了把我的同学和好友亨里科带到康腾森餐馆去。他保留了盯姑娘的习惯，利用我们享受美食的空闲，写几首新的情诗。我选了凉廊下的一张桌子，点了著名的小牛肉片：既为了一边在心中重温柱廊的社会想象，一边任自己的目光游荡在一长溜的连拱廊上，更是为了嘲讽我们的堕落，我们这些人，把古老的融融之梦耗费在了滑稽的祖传烹调术中了。

2

这个婴儿是谁，他父母替他取名为皮埃尔·保罗？彼得[①]和保罗！一个人竟可以在两个如此对立的圣人保护下合一地生活！彼得：他使罗马成为大祭司之城，并把耶稣的福音变为官方的宗教。一个顽固、狭隘的头脑，十二使徒之一，基督的私密朋友和信念传播者，专门记录他的教诲，担当建立教会的使命，遵守礼仪和等级，中庸之道的信徒，行为举止决不冒失，反对革新。而保罗，恰恰相反：焦虑，神秘，走极端，曾经不认基督并由此摆脱了任何字面上的忠诚，四方行走，恰好跟深居简出的彼得相反，周游世界说服人们皈依，暴躁，不合群，性格乖戾，甚至跟朋友也合不来，越来越孤立，尽管得到一小撮门徒的爱戴，执意殉道，越接近目的就越加倍努力。一旦死后，人民便忘记了他。在中世纪期，他几乎不为人知；从来没有一座教堂以他的名义而建；没有一炷香为他而燃。既没有雕塑也没有肖像再现他的形象。16 世纪之前，几乎无人取他的名为名。是宗教改革为他打开了一个辉煌和权威的时代。在以其激情和精力鼓舞世界的路德面前，彼得的精神，保守的谨慎，祭祀的排场，就再也不够了。必须召回保罗精神投入斗争，召唤起他那跟那个德国僧侣[②]的热情和疯狂一样的热情和疯狂。每当一种异端，即一种过度的信仰，威胁到教会的常规时，人们就想起了保罗，他高举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来往于陆地和海洋。风平浪静时是令人腻烦的幻觉者，狂风暴雨中却能知晓天命。而风浪平息后，彼得便重又登上他的宝座。他把三重冕戴在自己头上，在重新找回的权力的威严中，为向他欢呼的众人祝福。

---

① 在小说原作中，“皮埃尔”和“彼得”分别为“Pier”和“Pierre”，实际上是同一个词。

② 指马丁·路德。

保罗的鲁莽、孤独和悲惨。彼得的保障、辉煌和成功。我的自然趣味如此强烈，使我趋向于探索和游荡之人，而另一个则用他的效率和光辉来影响我。人民的欢呼声传向教会的创立者，传向手持铲头牧棒的牧者；真正的荣耀复归于乌托邦的流浪者，复归于衣衫褴褛的诗人。放学后，我急匆匆地赶回家，继续阅读他们的生平故事。

基督死去了，没来得及就某一点说出他的话，而这一点立即激起了门徒们的尖锐论战。未来的基督徒们是不是应该遵守恭敬的犹太人的各种实践，换句话说，耶稣的宗教是不是要摆脱犹太教？最初的皈依者全部是犹太人，全都严格遵守旧约的戒律：行割礼，严守规定地区分食用肉和禁用肉，不接触动物血。在古代城邦中，人们花费许多时间在公共浴池沐浴，在运动场锻炼。在那里，男人们赤裸裸地展露身体。割礼使犹太人当众现丑；由此，他们生出一种倾向，躲避公众生活，去营造一个孤立的小集团。他们担心碰上不洁的畜生，甚至避免去集市上采购。

最初的十二使徒，彼得也位列其中，想象不到人们可以成为基督徒而又不服从世俗的法律。保罗很快明白到，某些僧人的顾忌会影响基督教的未来。在他遥远的旅行途中，他开始布道，面对非犹太人、异教徒、外人；吁请他们进入上帝的王国，但一开始并不要求他们加入亚伯拉罕的家族。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他遇到了一个叫提多的年轻人，跟他结下了友谊，使他皈依，并收他为门徒。①

这些新鲜事震惊了耶路撒冷的使徒集团。保罗嗅出了危险的气息，急忙返回耶路撒冷。他发现基督的亲属和朋友沉浸在一种过于沉重的虔诚气氛中，有些像是他们的主曾那么激烈地反对过的气氛。彼得、雅各和约翰都拒绝接受提多，指责他始终是个无信仰的人。他们认识的世界，只限于构成巴勒斯坦的荒漠与果园的那些土地。保罗安排了一下，把使徒中最不顽固的、最不刺头的那一位找到一旁：他正是彼得。他为他展现了他刚刚走过的小亚细亚的广阔天地，还有他准备访问的众多国家：马其顿、希腊、西西里、意大利、西班牙。为什么要给刚刚皈依的教徒，给那不是以色列族的人强加上一副无法忍受的桎梏？他向他总结

① 事见《新约》中《使徒行传》、《加拉太书》、《提多书》等各书。

道："我们可以彼此理解：对你，有割礼的福音，对我，有包皮的福音。"使徒们转而赞成这一折中。外乡人皈依的合法性得到了承认；作为交换，彼得从保罗那里得到保证，带提多去行割礼。

那时候，我还不太清楚"包皮"和"割礼"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是，彼得和保罗争论的事，属于身体的哪个部位，不用任何人说，我就已经自个儿明白了。想到教会的命运居然取决于那么可怜的一小块皮，我并没有笑，只是看了看我的性器官——那时候我有十一二岁了——惊叹之余不免有些恐慌，我竟然拥有能决定人类命运的某种东西。

提摩太[①]的故事终于使我迷惑了。保罗是在第一次去加拉太传道的旅程中遇到他的：这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都听从保罗皈依了。几年后他返回路司得时，发现了一个成熟的年轻人，他满怀柔情地爱上了他，把他当做儿子。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如此称心如意的门徒来到过他身边。然而，有一个未行割礼的助手在身旁，他担心会有很大麻烦。刚刚由耶路撒冷的会晤缓和下来的争论，还会重新爆发。保罗想平息对手们的怀疑，消除他们的指责：他便亲自为提摩太行了割礼。当我读到这个如此残酷同时又如此神秘的故事时，我这个天主教徒小男孩的心中总也摆脱不了某种不安。假如说，保罗以他的行为成功地防止了一段丑闻，避免了对他的惩罚，那么我认为，他的敌人让他用自己的手毁损了他的朋友，是给他设下了一个更危险的陷阱。《使徒行传》中这个显得如此简单的句子"他自己为提摩太行了割礼"[②]，把我掷入惊奇的深渊中。这场景发生在哪里？在一个房间里？在一棵橄榄树下？如何？两腿之间有没有流血？保罗是不是独自一人跟提摩太待在一起？他把年轻人的性器官握在手中时，感到了什么？这些问题老在我的脑子中翻腾，我感到自己提出这些问题来就是有罪。割礼是一件纯粹的原则性大事，一个有关教会正统的问题，这一点，似乎已经被所有涉及到它的作者认定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唯有我，我眼前却浮动着一个形象：一个男人凑近一个少年郎，脱掉他的衣裤，为他动一个手术，手术的因

---

① 提摩太是使徒保罗的门徒，曾随保罗出游传道。《圣经·新约》有《提摩太书》上下两卷。

② 见《使徒行传》16,3。

素有阴茎、龟头、小刀。一个充满了魔法和恐怖的行为：或许，只应该从中看出一个外交行为，保罗对彼得的一个让步！

人们说起，人们写道，保罗是我唯一的主人。确实，我最初的梦把我带到了他的踪迹上，我童年的热忱贴合了他三次西游远行的种种磨难，他三次回归耶路撒冷的种种苦涩。满怀着热情和期望，我和他一起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上船，我沿着小亚细亚的海岸航行，我穿越加拉太的一座座城市。在皮西迪亚的安提阿，我在犹太会堂中传道，远不如在公共广场上那么成功，广场上，异教徒们还自愿听我讲呢。犹太人愤怒起来，把我驱逐出他们的领土。我的脚步在城市上空腾起滚滚尘烟。在以哥念，我的讲道掀起了一次骚乱：我不得不逃走，离开利考尼亚的京城。在路司得，我被狂热的人们抓住，拉出城外，挨了一通石头砸，被当做死人抛尸野外。当我在刑事法庭前说话时，雅典人聚集到我身边。哥林多犹太会堂的长老缚住我的双手，传我到阿哈伊亚行省的罗马人总督跟前。在耶路撒冷，第三次，犹太人把我从庙堂上拉下来，折磨我。我的获救还要靠统帅着罗马卫队的行政官，他把我关在了奴隶监狱中。我在塞萨雷戴了两年的镣铐，然后被转移到罗马，在那里，直到死为止，我从来没有再见过天日，伴随着脚镣手铐，关在漆黑的地牢。在我讲道期间，有五次，犹太人给了我三十九下绳子，有三次，我挨了棍子；一次被石头砸；有三次，我在海岛之间遇海难；我抱定一块破船板，在海浪中漂荡了一整天又一整夜；有八次，我差点儿在过河时丧命。

疲倦、劳作、反复的熬夜、饥饿、干渴、长时间地饿饭、寒冷、赤裸、牢狱，我无意识地为我自己确定的典范生活就是如此，夜晚，当我躺在床上，我怀着比读儒勒·凡尔纳、大仲马、萨尔加里[①]或斯蒂文森的小说时还要多的激情，生吞活剥地读着他的历险故事。是的，我最喜爱的英雄就是他，这个面容懦弱的光脚男人，不知疲倦的行走者，不断地被那些他打算拯救的人追逐和仇视，这个成了嘲笑和迫害对象的魔幻的梦游人，到处被揭露成一个挑衅者，被迫在黑夜出逃，在荒野星空下露宿，没有名分，没有委托，没有权力，除了在朦胧的月光下倚在一块石头上写

① 萨尔加里(1862—1911)，意大利作家。而儒勒·凡尔纳、大仲马均为法国著名小说家，斯蒂文森是英国小说家。

下书信之外，也没有任何别的允准。

刚刚走出童年，我就求援于彼得。假如我听从吹捧我自然性情的声音，对我本能的倾向让步，那么我也许就完了。彼得给了我需要构筑的作品的意义，必要的卑躬屈节和耐心，以求把已着手的工作进行到底。我被人指责为行为仓促，爱变卦，无条理，没有人知道我是如何竭力控制着我的本性。我若是没有从彼得这一派学到的合理和谦虚，我还能成功地写出我的书来吗？若是不考虑到就合我的读者，我还能有公众吗？一部小说，一部电影，那就像一座教堂：必须小心翼翼地把各部分聚集到一起。诋毁任何持续努力所必不可少的种种美德，是多么诱人的事啊！秩序、规则、不屈不挠，那么快就显得一文不值！彼得把我拴在了我的书桌前：每天上午四个钟头面对着纸和笔。保罗把我推向外面，把我的聚精会神称为吝啬，把这不可动摇的时刻表称为自私自利：出门到街上去吧，他在我耳边喃喃道；去冒险吧，如果你想拯救生命，就把它丢失吧。我将最终成为一个书写者，还是成为一个教授呢？

这一斗争久久地撕裂着我。彼得在我床上铺开一件白衬衣，一件深色上装，在我的脖子上系上一条领带，把我打发到威尼斯或戛纳，在电影节评委面前为我的电影辩护。保罗匆匆脱下我的衣服，只给我留下一条背心，一条足球短裤，命令我乘有轨电车到终点，在大众化住宅脚下的空地上，加入到小子们[1]的队伍中去。欧弗拉特街的公寓，以它罗马式的豪华让你震惊了吧？我在彼得的指令下把它买下了。保罗则总是拒绝从金黄色铜栏杆的大理石楼梯上楼。他等着黄昏来临，好从仆人门那里溜出来，毫不耽搁地把我带往火车站，追踪那些暧昧的诱惑[2]。我该听谁的，才能忠实于我自己呢？这一位希望我有责任心，关注我从事的事业。出于同样理由，另一位更盼望我把整个尊严扔到荨麻丛中。为服从彼得，我出版了我的书，我构建了我的作品，我寻求成功。而出于对保罗的爱，我遭到报刊的诽谤，被带上法庭，三十三次被传唤听审。然而，有一天，两人中有一个赢了。我会告诉你，是什么样奇特的情景，使胜利留在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ragazzi”。

② 火车站附近为罗马著名的男子同性恋“渔场”。

了西利西亚人[1]那一边。

画家们常常描绘这两位使徒,每一个都在其生命的一段特定时刻。总是同一时刻。就仿佛保罗的种种历险可以简化为一次从马上坠落,而彼得只是因为在十字架上断了魂才值得称颂。把两位圣人做平行比较,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规矩,但是,场面则有些相对立,因为彼得的酷刑标志着他传教的结束,而同样确切的是,保罗的灵启则标志着他传道的开始。人们把一个放在他传说的开端,而另一个则在结尾。卡拉瓦乔[2]就是这样做的,他画了彼得和保罗的两幅画,就在罗马的人民广场小小的圣母马利亚教堂的墙上,面对着面。在左边,你看到保罗刚刚从他的马上摔下来;在右边是彼得,脑袋朝下地钉在十字架上。他恳求刽子手给予他这一恩惠,因为他实在太卑贱了,不敢奢求与耶稣一般。

至于我,保罗之死实在令我惊讶万分。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让画家们感过兴趣?为什么他殉道的故事没有广为流传呢?他是被砍头的,好像是的,跟彼得死在同一年,跟他在同一时刻,一大批在尼禄的命令下惨遭酷刑的牺牲者之中。但是,这一位所蒙受的折磨激起了大众想象熊熊的火焰,而另一位的受难地则根本掀不起任何好奇与怜悯的风波。

最初所有的圣徒,都以他们的死留下了一段光荣的回忆。司提反遭石块击毙,施洗者约翰被斩首,巴多罗买被剥皮,这些事再现在成百上千的壁画和油画中。对所有这些人,酷刑被看成是一种神化。雅努阿留斯,你的主保圣人,有火焰和利剑,洛朗有火刑架,布兰丁有狮子,乌尔苏拉和塞巴斯蒂安[3]有箭矢。所有人都有,除了塔尔苏斯的传教士[4]。我不理解这一例外。我似乎觉得,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还缺一件什么东西。在经受了那么多的欺凌和屈辱之后,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力,

---

① 指保罗,他的家乡西利西亚在小亚细亚半岛。

② 卡拉瓦乔(1573—1610),意大利早期巴罗克画家。一般认为,他是同性恋者。

③ 司提反、施洗者约翰、巴多罗买均为圣徒,其事迹在《圣经·新约》中有记载。雅努阿留斯(生平不详):主教,殉道者,那不勒斯的主保圣人。洛朗(?—258):西班牙人,罗马教士。布兰丁(?—177):里昂殉道者。乌尔苏拉,基督教传说中的女圣徒。塞巴斯蒂安(死于公元3世纪),罗马殉道者。

④ 指保罗,据说,他诞生于西利西亚地区的塔尔苏斯(又译大数,今属土耳其)。

得到一个精彩绝伦的结局。对他的生平,人们只会想起迷醉、神迹、传道、胜利;但是,最后的失败、弥留、嘲讽和斩刑木砧的侮辱呢?他在大地上充满丑闻的途径,值得留下另一种回忆,而不仅仅是一个幻觉者和一个狂热者的形象。既没有血滴,也没有尸体的痕迹。救世主温和地召他回天上,没有准许他以一个鲜明的污点来打击世界。

在这一点上,我感到一种真正的不公平:渐渐地,我终于对自己说,为之做补救,是我的责任,保罗被悬而不白的故事,该由我来为它做必要的补充。上帝剥夺他生命的屈辱之死,我要替他来忍受。我不知道将在何时,又将如何。长期以来,我所冒的唯一危险,是法庭的传唤,是我的书和电影的查封。等到那一天,等到我不再满足于那些烦恼事,等到我开始不再拿我的工作冒险,而是拿我的血肉冒险时,我称为保罗之胜利的日子就来到了。他可以放心地寄希望于我:我已经准备好去忍受闻所未闻的残暴,为他的光环重镀金彩。我梦见,快活的刽子手把我杀死在一条公路边上,并糟蹋我的遗体,然后把它遗弃在灰尘蓬蓬的路坡上。

3

苏珊娜·科鲁西,我的母亲,苏珊娜是她曾外祖母的名字,一个波兰犹太女人,我的曾外祖父,一个拿破仑的士兵,在被占领的华沙遇识了她,征服了她,并把她带回他的家乡弗留利[1],就像带回了一件战利品。在我们老家,男人们总是粗暴地抢来他们的女人,叫她们屈从于他们掠夺性的意愿:成婚更多的是出于武器的威力,而非爱情的诱惑。军事行动,武装犯罪。在维斯瓦河[2]河畔的历史性抢劫发生之后一个世纪,同样

① 弗留利在意大利的北部,包括四个省份。通称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

② 维斯瓦河在波兰。

的命数落到了我父母的头上。

我父亲卡尔罗·阿尔贝多是阿尔戈巴斯多·P. 达隆答伯爵的儿子，出身于拉文纳的一家名门望族。他很为自己的称号骄傲，年轻时喜欢面对着大海让人拍照，拳头叉在腰上，目光直视地平线，下巴挑战似的高扬起，短短的却很粗壮的小腿稳稳地踏在沙土上。他喜欢自吹自擂，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他必须掩饰一种尴尬的、无法满足一个年轻贵族野心的经济现实：一个宫殿破败不堪，最漂亮的一层已经租给了一个颜料商，而此人是靠做潜水艇漆的生意发财的；一个母亲和几个姐妹总是为某个当年移居到遥远城市的亲戚戴着孝，邻居们看到她们穿一身黑衣黑裙，就知道这一家有丧在身，她们一大早便赶往教堂，一副谦逊的举止，配上一种高傲的轻蔑，分明是瞧不起时尚的轻佻多变；最后，还有菲薄的饭餐，既不易消化，又单调，天天都是肉酱，多亏隔壁耶稣教修会好心的总管，还是低价买来的。他们在自己家里做西红柿酱，九月份的整整三十天期间，客厅变成了瓶装工厂。珍贵的大理石方砖地，往日贵胄府邸仅存的威严之一，每年都要沾满血红的果汁。

午餐和晚餐老是那么单薄，使父亲染上了打纸牌的习惯：既是出于一种合法欲望，顶住肚腹中始终如一的饥饿，也是为了不失地位和身份。一个P.达隆答家的人是不会随手大把扔钱的！你讥笑我小气。我则不喜欢疯狂而又无谓的支出，仅仅只为炫耀一番。在我父亲的挥霍中，我更多地辨识出虚张声势的显摆，而非真正的慷慨。瞧瞧他的眼睛，在我寄给你的肖像画中：顽强，不安，总在窥伺着。两洞枪眼。他遗传给了我他皱纹紧密的面容，他凹陷的腮帮，他紧巴巴的颌骨，他高高的颧骨，他薄薄的嘴唇。或是时运不济，或是缺乏经验，他把他父亲的小小遗产全都在赌场中挥霍一空。对这个贵族之家的儿子，一个不可能干某种手艺活儿，却把名誉和身体看得很重的少爷，只有一条出路：入伍。于是他成了职业军人。一开始在利比亚，随后，1915 年，当意大利参与战争时，在弗留利，离奥地利边境不远。身为少尉，他被分派到卡萨尔萨的军营，那个村子即是科鲁西家的故乡。

我母亲是一户富裕农民的第二个女儿。她父亲开了一家小小的烧

酒[1]作坊，战后破了产。家中的女人全都工作：有的当小学教师，例如我母亲和她的一个姐妹，有的当女店主，就像我的另一个姨妈，她在自己家附近开了一家文具店。我父亲一开始表达爱慕之情时，遭到了回绝。他们是在舞会中相遇的，就在村里教堂前的广场上。我母亲，身段苗条，性情活跃，又带有讽意，喜欢读小说，热爱她的职业，因为当教师可以保持独立，她写一些寓言和歌词，自己给它们配上当地的传统老调子。一个军官的吹牛和肩章，只能让一个这种素质的年轻姑娘嗤笑。遭到拒绝后，他又全副武装地返回：战争冲突结束后的不几天，人们看到他闯进了卡萨尔萨村。他几乎是强迫地娶了我母亲：说是强迫，不仅在于他行为方式的突然，更在于村里人、亲戚和朋友的压力。我母亲那时候三十岁。她屈从于不得不结婚的习惯，更屈从于那个人凶残的执意，他带着胜利的荣耀从维托里奥威尼托[2]凯旋，把她绑在战车上，像是一份额外的战利品。

我父母从来就没有和睦相处过。从第一夜起，妈妈就对这军官的攻击感到恶心。

"加里波第[3]不在乎这个！"他一边扣上他的腰带，一边叫嚷道。这句我觉得十分神秘的话话音未落，他就带上了门，离开了房子，他男子汉的尊严受了伤害，他要以种种很容易收买的安慰，为自己的尊严挣回一些颜面，而在军营周围，那样的慰藉并不缺少。然后，他重新回到自己家，宣称要履行他当丈夫按期应尽的责任，就像那个牛头怪人[4]要求享用他一年一度的新鲜血液。责骂与诅咒伴随着他的归家。玻璃窗在他的嗓门下震颤，嗓音中越来越透出傲慢和倔强，而且，在士兵的狂妄自大中，已经混杂了法西斯分子的优越感。我出生不到一年，他就已经是党内的人了，在走廊中厉声叫嚷墨索里尼将为他复仇。我赶紧逃到房子的另一头。我母亲在壁橱中存放了一件兔皮旧大衣。有多少次，我把我自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② 维托里奥威尼托在意大利北部，1918 年 10 月，意大利军队在此战胜奥地利军。

③ 加里波第(1807—1882)是意大利爱国者，终生献身于意大利的统一事业。

④ 指希腊神话中的弥诺陶洛斯，每年要吃雅典供奉给他的七对童男童女，他后来被忒修斯杀死。

已关在这灰尘蓬蓬的小房间中,用那脏兮兮的兔毛磨蹭我的脸,忍不住直想打喷嚏,一心只愿就这样死去才好。

我们经常搬家,东奔西颠,任凭军方打发。在我的想象中,总是我母亲抢先下手,一跑了事,以躲避家庭生活的捉弄。她叫我到她身边去,我就从我的房间跑出去,哭着扑到她怀里。我们匆匆地往硬纸箱里装一些衣服和属于我们的物件,因为搬家次数太多,纸箱子都有些糟了。我母亲不得不阻止我往里面放美丽家乡奶酪[①]和食品柜里的蔬菜,而我则把这些东西当做紧急情况下的急救物资,因为我总是担忧,怕漂流到一个鲁滨逊的荒岛上,或者会像爱德蒙·邓蒂斯那样,落到伊夫堡的监牢中[②]。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我根本不知道我父亲已经先于我们到达了他的新驻地,还战战兢兢地怕他会发现我们的逃跑呢。他会追踪而来,在火车进站之前追上我们吗?火车怎么还迟迟不到呢!我注意着来自乡野方向的任何声响(火车站常常只是田野当中的一个站台),只有当高高的横杆放下来拦住了来往的汽车时,我才放心地喘了口气。发明了蒸汽机的德尼·帕潘[③]第一次看到热气从锅炉中喷出来时,恐怕也不会比我看到一缕缕白色的气团从机车头中冒出,宣告列车开动时,感到更多的快乐。获救了,我们获救了!

帕尔马,贝鲁诺,科内利阿诺,萨奇雷,克雷莫纳,斯冈迪亚诺,重又是博洛尼亚:假如这个或那个城市,相对于别的城市,有时特别令人想起一束浓香紫罗兰,有时又是滑雪场方向的一个终点站,有时是一个把圣母画得惟妙惟肖的画家,有时又是著名的弦乐器商家族,那么说到我,我对它们的印象却只有突然的开拔,堆放在门厅中的箱子和包裹,寻找一截绳子把破裂的柳条筐再紧一紧,害怕在成功开溜之前被发现,火车站窗口前令人不耐烦的排队,车厢内轻松的喘息,然后,在旅行即将结束时,新的担心又来了,那么可怕,担心父亲揭穿我们的计划,准备报复我们的胆大妄为。每一次,确实,我们都发现他早已经等在他的位置上了:带着他的军官旅行箱,稳居在客厅中央,这是为他男子汉的荣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bel paese",原产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省。

② 影射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

③ 德尼·帕潘(1647—1712),法国学者、发明家,他阐述了活塞蒸汽机的原理。

誉而竖立的纪念碑,也是我们羸弱幻想的坟墓。

恰如你看到的那样,对我来说,他成为了:父亲。我在我心里不再把他称为别的。不再是:我的父亲,因为在他的威力和暴力面前,我母亲显得跟我一样易受伤害,孤立无援,无能为力,就仿佛我们平等地处在童年中,处在卑微中。但也不再是:我们的父亲,他对我们行使的权威完全丧失了情感。他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父亲,只有这一称谓,才能在其严厉的简明中,使他命令式的举止行为在我们心中引起恐惧,例如,当他倒在扶手椅中,伸过腿来叫我们脱靴子的时候。他是不是意识到,说到底,他只是一个碌碌无为者?也许:但在别的人身上会让性格温和下来,使人趋向于宽容的东西,在他身上却只会叫脾气更加暴躁,直至疯狂。他染上了一个怪癖,老是去磨蹭袖子上那缺少的第四根饰带的地方。

至于我母亲,她对我从来只是妈妈。这个自身蜷缩起来的词,带着它那在唇端重复的辅音螺旋似的温柔,向我展开着一个茧子、一个避难所、一个鸟巢的形象;在它可以被看做主有代词的阴性形式[①]的第一个音节中,我投射了彻底归属我自己的欲望,那个完全属于我的人只能归我一个人。一开始很容易的使命,但随后,在我来到世上三年后,随着一个小弟弟的诞生,就时时要求我使用一种外交手段和一种取巧诀窍了。基多,这个名字在我看来跟任何一个有名的圣人都不搭界,只是跟基多·雷尼[②]画的圣塞巴斯蒂安稍稍有些关系,我一看到博洛尼亚博物馆中的这幅绘画,就喜欢上了它。油画表现了一个几乎全身赤裸的年轻人,双手缚在背后,被绑在一棵大树上,上身前倾,脸朝天抬起。身体的美,模特儿的青春,背景的音乐,灰色的微妙,从此启迪起我种种很不相同的情感。一开始,是画家名字和我弟弟名字的一致,只是它使我难堪,把我捕获:就仿佛,通过把这一光荣殉道者的形象跟那个作为敌手进入到我生活中的人结合起来,我就可以用利箭反过来穿透他,用他强加给我的折磨来惩罚他。在我们搬家时,在我们兴奋地打包收拾时,每当妈妈要帮他收拾床底下散了一地的玩具,我就大声宣称我们已经晚了,来

① 法语中,妈妈为"maman",这个词的第一个音节"ma"是主有形容词第一人称单数的阴性形式。

② 基多·雷尼(1575—1654),意大利博洛尼亚画派画家。

不及了。假如,到达目的地时,我们已经看到父亲那可怕的身影挺立在我们新家的门槛上,紧皱眉头,轻蔑地脚踢着我们混杂的行李,那到底是谁的错?

甚至在他诞生之前,基多就让我受苦了。当他们要给我治眼睛时,妈妈还怀着身孕呢。马兰戈大夫穿了一件海狸皮领子的大衣。他的山羊胡子亮亮的,齐齐的,就像是用自己的皮毛装饰了他衣服的那同一个畜生的一撮毛。一个带有复杂笔画的巨大的花押字母,占满了半张药方纸。他把一个小瓶子留在我父亲手中,拧了拧我的脸蛋,出了门。我躲到我的房间里,担心父亲会打开我的门,尽管我用床头柜和两把椅子反着放,像筑街垒一样顶在门上。我听到走廊上传来的脚步声。他摇晃了几次门把手,随后,一记巨大的声响宣告了我的溃败。

我们现在来到了厨房中:我躺在饭桌上,拼命地舞动手脚,并非出于重获自由的欲望,而是逼迫他使劲;他俯身朝着我的脸,嘴唇翻起,露出牙齿,用一只手阻止我乱动。另一只手摸索着给我点眼药水。我的肌肉突然松弛下来,我停止了挣扎,一种安逸的情感钻进了我的心田。

一天两回,小小的戏剧重演一遍:房子里的追逐,走廊中的逃跑,我被逮,我被捕,我搏斗,我反抗,我投降。他嘴里有一粒金子的闪亮。他君王一般的权势的标志,外加上美和神秘,赋予了每一处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的场景:他在背后关上厨房的门,他把我从地上提起来,摊开在桌子上,用漆布把我束住,用他的手指头翻开我的眼睛,往里头滴眼药。

为什么会发炎,为什么是眼睛?嫉妒,害怕失去独一份的母爱?我问自己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那些场景,我演牺牲者,他演刽子手,比起夜晚的任何一次亲吻,比起彼此的爱抚,都使我跟妈妈更亲近了。跟她一样,我忍受着父亲的暴政;跟她一样,他折磨着我的肉体。他们在夫妇房间的寂静中的夜间活动,我为自己想象出它的双重面貌,一种血淋淋的仪式,一种天堂般的升腾。受刑和祝福:治疗眼病中的两个阶段也是如此。翻开我眼皮的手指头粗暴无度,我感到一种剧烈的疼痛,就像闪电般的撕裂。然而,第一滴药水刚刚落到角膜上,荡漾开来,我就发出一丝幸福的叹息。轻松的惬意随着撕心的伤痛而来,屈辱的羞惭迎来了解脱的战栗。

但是,为什么总是厨房呢?真的是父亲把我逼到那里的吗?只要马兰戈大夫那带黄色标签的深蓝色小药瓶从客厅的架子上一落到他手中,我就该逃走了。牺牲应该在别处。在房屋尽头,在妈妈行祭礼的那一间,父亲决不进入的那一间,除非借这一机会。女人才待的场所,专门留给家务之用,扫帚、粗麻布拖把、洗碗布、锅、漏勺;这洞穴与神庙,使我完成了向女性的变形,父亲会赏赐给我跟给妈妈一样的神秘献祭,要知道,他在两次吵架之间往往会赏给妈妈一个脸。

每当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时,我会惊奇地看到,在他们那道天鹅状门把手关紧的门后的房间里,有一整套从伦巴第人商廊买来的家具:里头没有一件我所期望的珍稀家具,我想象,即便一个大理石地面的祭坛本身,像教堂里的那些祭坛一样,也不该是一个配不上我父母见面的布景。

巨大的婚床,那种黑暗礼仪的舞台,还以另一个理由刺激着我:它那四个反映出松木大衣柜形象的铜球,在从帕尔马到克雷莫纳的路上丢失了一个。

自我认同为女人,出于对遭父亲暴力侮辱的女性的同情而渴望扮演一个女性角色,拒绝在我自身性别的粗鲁、粗野、优越感中认识自己:换言之,我在成年时表现出的某些爱好,可以在我童年时受启迪的氛围中寻得。但是,要我同意,从我成长的家庭环境,从我的教育,从我对我母亲的“固恋”来“解释”我的肉体趣味(由此,你,杰那里埃罗,如果你那么令我喜欢,那是因为另一条道路,“正常的”道路,始终对我禁止!哦,对你的那不勒斯之美的可恨的无知啊!),要我同意,从我的家庭史来“讨论”我的恋男倾向(同时,让我看到,所谓“治愈”的援助之手,是一根有毒的稻草),那是我从精神病医生那里接受的所有善意中,最令我恶心的一种。

一幅欧洲地图让他们学到的东西,要比他们的医疗教科书远远多得多。他们会看到卡萨尔萨处于何地,这个已有一半被奥地利和南斯拉夫争夺着的弗留利,那么一个边境之地,已经不再完全属于意大利了;他们会再把目光转投到拉文纳,这个中部城市,尽管它已经从中世纪时意大利首都的行列中退出,却仍然保留着往日强盛的斑斑痕迹;他们会说,一个见证了一个弗留利母亲被一个拉文纳父亲侵犯的孩子,是不是

不会倾向于偷偷地结盟边缘来攻击中心，随后，把这一直觉的同谋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父亲并不仅仅占据着一个地理上的中心位置(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均衡、秩序、标准、习惯)，针对处在“外围”的我母亲(权利被取消，靠边)，另外，靠着他那一身由战争部供给的军装，带装饰的肩章，威风凛凛的军帽，三色的证件，随时准备喊出的口令，他还是罗马、权势和法令的化身。这两个理由，让我拒绝服从规定，而向着一切不同的、例外的、在阴影中的、边界上的东西自动开放。不可抹却的默契，朝着我的每一个活动地盘延伸。我用方言写下我的第一批诗歌：并非出于对民间文艺的任何眷恋，也不是对田园天堂的任何幻想促使我做了这一尝试，我仅仅是选择了跟官方语言作对的“反中心”的母系土语。在政治上，我是自由射手；在爱情上，我是非法的；在旅行中，我更被也门人烟稀少的孤独景色吸引，更愿意前往文明世界的边缘，而不向往伦敦或巴黎那样的大都市。在我对郊区的兴趣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显出我特别厌恶城市，我只是觉得在郊区的空间中，就像在我自己家中一样。有多少次，我不等晚餐结束，会突然离开我的朋友们，乘上一辆有轨电车，一直来到终点站。乡野中的一个环岛，就像往昔罗马众多圆形空地中的一个：一点点发黄了的草，两条长靠椅上涂满了淫秽的字画，一个水泥的挑棚虽已破残，却还能挡风避雨。再远处，天幕中，衬映出几幢造了一半的民房的架子。我什么都不寻找，我什么都不等待，我脚踢着一只罐头盒，沿着铁轨走。电车司机向我发出信号：我跳上空荡荡的车子，重新朝光明的方向进发，心平如镜，静如止水。

4

由于无休止地颠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始终感受着生活的一种暂时性：我唯一的固定点是卡萨尔萨，是弗留利，是我母亲老家

的房子,我们,妈妈、基多和我,每年一到夏初都要回那里去。一个邻居驾着一辆马车在火车站等我们。壮实的骡子不停地用尾巴甩打着两肋,驱赶苍蝇。我们穿越连接乌迪内和波代诺内的国道。村庄从公路另一侧开始,沿着唯一的一条街建造,小街一直通向教堂,然后分岔为两支,就像一柄叉子。我们家的房子位于左边的低处,几乎就在村庄的入口:一共三层楼,大门是单扇的,正面墙上开了五个窗洞,绿色的护窗板,正中央的窗户上摆着天竺葵。朋友酒吧就开在街对面。正在柜台后洗酒杯的年轻小伙计,一时间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过来帮我们卸行李。他叫罗贝托,是我的远房表兄。再说了,在卡萨尔萨,谁还不是跟其他所有人都沾一点儿亲呢?半打姓氏足够五十来家人用了。仅仅科鲁西家、莫拉苏蒂家、波托兰家、葛雷戈里家、康佩西斯家就已经填满了教区的登记册和墓地的墓碑。

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姓的也不是意大利人的姓,就如村庄的面貌,蒂罗尔人[①]的影响仿佛给房屋正面粗粗地涂了一层厚灰泥,在护窗板上撒满了粗大的钉子,在小院子里雕琢玫瑰,把谷仓的屋顶拉长,给阳台上的木栏杆饰上花彩,在厨房的墙上挂上能咕咕叫的钟,用鸭绒被代替毯子。长期以来成了我们主子的奥地利,把它的高山风貌带给了这个四周为一望无际的平原的小镇。即便从教堂钟楼上望出去,目光所及也不会很远,无法辨认阿尔卑斯山脉最初的层峦。从果园后马上伸展开的田野,以它一片秀丽的林地,叫人怎么也联想不起一种意大利或地中海的景色:除了出产卡萨尔萨特有的灰葡萄的葡萄园,你就找不到任何你喜爱的植物。你只能把你的面包浸在外地进口的油里。这里没有你母亲在她平台的花坛里种植的罗勒和牛至,你只有可怜兮兮的欧芹汁来拌你的西红柿,而古人却是拿它来做殡葬徽号的:在你家乡,肉店主只用它来做点缀,插在店铺前宰杀好的小牝牛的鼻孔中。一条条运河的岸畔,播种的都是玉米,却见不到一块小麦田。在一片总是绿茵茵的草木丛中,笔直地划出一条条道路,路两旁则是一排排橡树和金合欢树。你遇到一些叫做英格丽德或特卢德蕾丝的姑娘们,名为古纳尔、迪特尔、弗

① 蒂罗尔是奥地利西部的一个州。

兰茨的小伙子,都是日耳曼族的名字。

外乡人经过这里时，停下来只为在村头那家餐馆匆匆吞吃几片圣丹尼尔火腿,一对鹌鹑,外加一方玉米饼。在他们眼里,教堂的外表笨重而无趣;内部则穷乏而平庸。威尼斯的天才,在哥特式的宫殿、尖形拱肋的柱廊、并不遥远的乌迪内粉红色石头的住宅中闪耀出了光芒,而到了我们这里却栽在了实用的常理底下,撞上了农民们粗俗的土里土气,他们更愿意给他们的犁加一个铧片,而不愿意为公共水池增添一个槽口。他们的首府不是精致和优雅的乌迪内,而是位于另一边的、距离同样远的、有又矮又粗的城堡的波代诺内,它的财源主要来自棉织品生产,还有牲畜交易市场,靠着居民的数量和收入而变得相当兴旺,战后短短几年中,就跻身于省会的行列,那一次隆重仪式可以作为唯一值得纪念的日子,永远留在一个缺乏新闻的城市的年鉴中。“他们找了一个人做省长,可算是有了一个历史人物,”妈妈笑着说,她还记得那个时代,她在她姐妹的催促下,去了一趟波代诺内,好给她带回信封、铅笔和其他种种的文具。

嘲讽中透露出一种深刻的藐视，在拉特朗协定[①]签订二十年之后,天主教和教皇的弗留利始终在继续哺育着人们对意大利国家的这种藐视。在我童年时,卡萨尔萨的神甫堂·保罗是村民们承认的唯一头头,既是宗教头领,又是行政头领。而在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②]身上,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曾从庇护九世手中抢夺了首都的人[③]的孙子。堂·保罗为年轻的新婚夫妇主婚,因为对新郎新娘,法律并不强求他们去政府登记;这样,他们就避免了受篡权者的连累。新生儿的名字和死者的名字,都登记在教区的录事簿中,而不是在市政府的公文册中。我就是在这种

① 1929年2月11日，罗马教廷和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政府签订了拉特朗协定,规定教皇对梵蒂冈国拥有全权,并规定天主教为意大利的国教。拉特朗是罗马的一个古老宫殿,中世纪时曾是天主教教廷的驻地。

② 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1869—1947),意大利末代国王,1900年即位,法西斯党上台后,他成为了傀儡,1943年,他逮捕了墨索里尼,1946年逊位,流亡国外。

③ 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是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1820—1878)的孙子。后者是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个国王,他于1861年直接掌权,1870年占领罗马,并定罗马为首都。庇护九世(1792—1878)是当时的罗马教皇(1846—1878)。

论战的氛围中长大的，这其中，宗教信仰并不意味与权势勾结，也不算为特权辩护，反倒意味着向中央集权主义国家政府的抵抗，以及对受威胁的少数派的保护。比如说，弗留利的教职人员总是尽可能地到处使用方言，那是一种偶然吗？办公机构的人员和一部分小学教师使用意大利语；而教士们，则应该有勇气和义务，反对一种在我们看来流露出外来意志的语言的传播，这有点像今天的情形，谁要获得一种职业，谁就得掌握英语。当我一开始投入到共产党人的活动中时，这个语言的问题引起了我很大忧虑，把我扔到了不可解决的矛盾中。我，一个左派人士，我怎能向我的朋友们证明一种民族方言的重要性，证明它可以作为民主进步与民主文化的工具呢？他们对我说，在穿教袍的人中寻找你语文学的同盟军，这是多么怪的想法！

我年轻时，真是带着唯一的爱和唯一的冲动，相信教会和福音书；无疑，假如有一种伪善和虔信的气氛笼罩着家庭，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在我身边只看到活跃的和漂亮的女人，首先是妈妈，她的批评精神恰恰跟唉声叹气的恭敬背道而驰，而正是那种恭敬，使你的童年天性在圣葛雷高里小学受到压抑。妈妈心中有一种自然宗教：她在棚屋里揪下的玉米穗穗，她在厨房窗下压得吱扭吱扭直响的水泵，牛群踏在街上沉重的脚步，照在蜡亮蜡亮的屋顶上的太阳光，打在石板地上噼里啪啦直响的骤雨，这一切，都在对她说着老天的言语。星期天，她带我们去望弥撒，听堂·保罗用弗留利语布道：村里人没有一个会缺席这一聚会，它的政治意义跟宗教目的同样显然。竖立在钟楼顶上的风信鸡宣告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自由，并不比牧者用他羔羊们的方言宣讲的福音更崇高。

在天主教教义中，只有一点让我们，让妈妈和我气馁：对上帝的膜拜。我们怎么能接受，在永恒的王国中，有一个按照家庭中横行霸道的专制者形象制造出来的主？任何的君主在我们看来都是暴君，我们日常所见的例子太多了。因此，妈妈反复向我灌输一种修订和改正过了的宗教，任何的王权都不能把它的辉煌，任何的父都不能把他的统治强加给我们。

新婚后，她去拉文纳旅行了一趟。她的大姑子小姑子，一成不变地穿着又僵硬又暗淡的孝服，带她参观了早先东方帝国大都会的大教堂

和陵墓。她走进了神秘的中殿底下,阳光经过大理石方砖的过滤,在带云母片的花岗岩柱子之间,在小小的方形马赛克上点燃了一束五颜六色的焰火。她站在狄奥多拉[①]面前,沉默无言,女皇华丽的服饰令她惊愕万分。她跪在加拉·普拉西蒂亚[②]蓝色陵墓中的石棺前,在曾被马克西米连[③]高高举起的金圣盘前做了一个致谢的动作,跟好多鸽子一起喝了生命之泉飞溅的泉水——但是,始终,在祭坛上方拱顶的深处,她感到有一道目光在盯着她,一个施展圣事威严之豪华的万能之主基督那开放的、不动的、令人畏惧的目光。她不寒而栗,逃了出来,重新来到自由的空气中。阿里乌教徒[④]圣洗堂把她吓坏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和喷嚏,使她在教堂广场前的一把长椅上直不起腰来,把陪她而来的两位女眷惊呆了,她们不能像她那样,把一个已经有些讨厌的独裁丈夫的形象,跟在教堂后殿墙上隐约闪光的上帝联系在一起。

她新婚旅行后带回来的基督,不是在一群开屏的孔雀中坐在宝座上的无情审判官,也不是头戴金银珠宝的光环、手持雷电的救世主,而是拿撒勒[⑤]人耶稣,在他死的那一天,穷困潦倒,被所有人遗弃,跟他出生在厩栏的干草上时一样默默无闻。她并没有意识到,拜占庭神学之所以惹她讨厌,只是因为拉文纳是卡尔罗·阿尔贝多的城市,她早已从她内心的宗教中,把可能让她联想起一个宣告拥有丈夫头衔、军官官衔的男人的一切都排除出去了;她从她接受的天主教教育中,只保留了哺育她母性直觉的东西,她忘了摩西的耶和华,仿佛他是一件无用的道具,消失在云山雾海中,她把自己的崇拜对象限制在伯利恒[⑥]毫无保护的新生儿,在埃及的逃亡者,在荒漠中的孤旅者,在客西马尼园[⑦]的被遗弃

① 狄奥多拉(500—548)是拜占庭女皇。拉文纳的圣维塔尔大教堂中,有表现狄奥多拉形象的马赛克镶嵌画,是艺术珍品。

② 加拉·普拉西蒂亚(392? —450),罗马公主。其陵墓在拉文纳,以马赛克镶嵌画著名。

③ 这里的马克西米连指当时拉文纳的大主教马克西米连(公元6世纪时人)。

④ 阿里乌教派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其教义最初在公元6世纪时由阿里乌长老提出。

⑤ 拿撒勒是耶稣的家乡。

⑥ 伯利恒是耶稣的出生地。

⑦ 客西马尼园在耶路撒冷东的橄榄山上,耶稣被捕的当夜曾在此祈祷。

者,在犹太人的囚徒,在各各他[1]的钉上十字架者,在濒死时忍受着恐惧和干渴的人。直到不久来临的那一天,她自己有了一个儿子,可以把她的孤独之宝专门留给一个无刺无棘的造物:确实,就像所有的意大利母亲那样,但是,在她身上,带有更多的热情和眷恋,那都是先知的禀性赋予给她的。我就是这个儿子,她在无意识中把他跟基督同化了,自己扮演了圣母马利亚的角色。

谁将说到福音典范对我世俗命运的影响?我根本用不着巴望罗马的那些重大审判,也不需要期待法利赛人[2]溅在我头上的污言秽语,也不必等待卑贱地死在一个比骷髅地更惨的地方,就能成为本世纪第一个承担起这一神圣牺牲使命的人。从我最早的幼年期起,妈妈就把它给我留了起来。她相信她颇有预言性的直觉,在我幸福的青春期中也不剥夺这一点。直到冒出来最初的那些丑闻,证实了她的担心,我们之间有的,只是同谋般的低语,深深压抑的叹息,舒服的彼此抚摩,秘密的备考。从来没有一个儿子投身到世界上后,得到过更多的疼爱,更多的慰藉。当没有人指责我时,她在我无毛的脸上擦去未来迫害看不见的汗水。

要知道我的长子权对谁最珍贵,就该去问基多。可怜的人,他很快就感到,他得到的爱远不如我多,他受到的照顾和关心明显少多了。"我的二儿子,一个壮小子!"这种赞叹,家常便饭似的在女邻居面前重复,迫使他以男子汉的游戏锻炼自己,并当真习惯于此,其实,他并不比我更壮实。我母亲赏赐给他这种赞扬,只是为了把她的怜悯专门留给我这个被任意判定为更懦弱的人。

我弟弟看到我的额头上缭绕着神赐的瑞气,想把它吸一点点过去。有一天,我在干涸的河滩上跟村里的小孩子争吵,他在一旁那么起劲地为我辩护,以至于到后来,他们所有的侵犯全转向了我的保卫者身上。他们捡起卵石就朝他劈面扔去:他差点儿就被击毙了。他鼻梁上裂了一条口子,脸上满是瘀斑,衣服撕成了破条,狼狈逃窜。我母亲赶紧照料

---

① 各各他(一译骷髅地),耶稣在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② 在《新约》中,法利赛人指不信上帝、贪钱的人。

他，派人去叫医生，给他洗伤口，缝补衣服。但是，这段插曲并没有给他的脑袋戴上任何一轮殉道者的光环；母爱之心的圣幕并没有在他面前打开。我们对基督的兄弟们都知道些什么呢？然而，他们肯定也在受苦，见识弥留，忍受死亡：历史不屑于揭穿他们的隐姓埋名。差点儿遭受圣司提反[1]命运的我弟弟，就像耶路撒冷正直的使徒[2]一样，一直是天堂卫士中的一个哑角。他成了一个运动员，一个猎手，总是快快乐乐的，一副好脾气；出于谨慎，委屈地扮演着我的垄断留给他的属臣角色；向我母亲隐瞒他那低级的担忧和创伤，因为，性格上的一种不同，迫使他在嘴唇上凝固了注定默默无闻的"好小伙子"的永恒微笑。

他短暂的生命结束于一次英勇的行动，早我三十年拥抱了死神。他是如何迎着牺牲，明明白白地走向生命的终结，甚至可能还是不耐烦地自寻结果的，我到时候会告诉你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不让我这样想，为祖国献身的愿望在他心中并非主要动机；他默默无闻地寻求牺牲，是为了向他母亲证明，在他胸中跳跃的是怎样的一颗心，一颗谁也猜不透的心。但是，羔羊的位置被占据了。他赢得了恸哭声，被洗干净，裹入尸布，装殓入棺，像一个简单的凡人。他的鬼魂到今天应该还在地下游荡，寻找着一个熟人，却被永远拒绝。

而我，我只要流下一滴鲜血，就足以让全家激动得底朝天。那是哪一年的事了？一个雨蒙蒙的下午，我窘迫万分地回到家中，骑自行车时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我的姨妈们都被动员起来了。一个匆匆跑到药店去，一个忙着烧开水，而第三个从大衣柜里找出干净的布来擦脸盆。我一动不动地横躺在床上。妈妈坐在我床前的一把凳子上，用温热的湿毛巾敷我的脑门。我开始迷迷糊糊地睡去，不是由于痛苦的重压，而是由于衣裙的簌簌声和女性的叹息声，我的一个姨妈，就是曾经从波代诺内带回了一系列为祈祷书而配的宗教画的开文具店的那一个，从箱子里掏出一张基督上十字架的彩色石印画，看着我们全都彼此紧握着手，大声念叨着："这是痛苦的圣母！"讥讽的欢呼，描绘出了我们家女人的

---

① 据《新约·使徒行传》第6—7章记载，司提反是被不信教的人用石头打死的。

② 指圣徒司提反。

性格。昂丽切塔,我母亲三个姐妹中唯一一个结了婚的,自己举起了她的小孩,我的表弟。妈妈的脸色红润起来。她松开了我的手,站起身,打发走了姨妈们,自己来包扎我的膝盖,动作干脆利落,像是护士。

她姐妹的恶作剧刚刚把她拉回到了大地。幸亏,幽默妨碍了我们,对我母亲是一点点,对我却是彻头彻尾,把事情看得太认真,即便情况比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伤了髌骨还更严重、更悲观时,我们变成了圣母哀痛[1]的真正人物时,都不会太认真。我的姨妈们本来已经离开了我的房间,出门时还拿手当扇子扇着风,这会儿又重新出现了,一个个变形成了圣女,成了我的十字架之路的忠诚随从。三十三站苦路[2]:三十三恰恰是我将要接受法庭审判的数目。跟基督的年纪相同。从我不安分的童年起,耶稣受难剧的演员们就在我身边站好了位置。我的生活可以写成是一种对耶稣生平的模仿。但是,我弗留利祖辈遗传的农民常理将保护我免除神秘的自命不凡。在我被人杀害之后跑在罗马街上,用红色的字母把猪猡猪猡猪猡[3]的咒骂涂溅在墙壁上的耶稣会修士,大声地叫骂骗子或疯子可能会觉得过分幸福。我开始哈哈大笑起来,重又想起了我姨妈的彩色石印画,还有她略显做作的讥讽。

5

离我弟弟遭石雨袭击处不远的河流,垂直地划破了弗留利:它的名字塔里亚门托兴许就来源于此[4]。1797 年 3 月 16 日,波拿巴在这里赢得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尤其指表现"圣母哀痛耶稣之死"主题的绘画作品。

② 所谓苦路,指耶稣背着十字架受难过程中的停留之地,一般认为有十四处。相应的有十四幅表现耶稣受难的画。

③ 原文为英语。字母中有三个 P,影射小说的主人公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因为他的简称恰恰就是"P. P. P."。

④ "塔里亚门托"(tagliamento)在意大利语中有"割"、"切"、"剪"、"裁"的意思。

了一次战役,打败了奥地利人,库斯托扎和卡波雷托[1]的世代仇敌。我父亲把那次胜利记在3月5日,好跟我的生日吻合。他把波拿巴认做一个意大利将军,就如他把尼斯、科西嘉、一部分的尤利安山,以及卡林西亚[2]的某些山峰,都归于维克托·伊曼纽尔的王权一样。

卡萨尔萨位于波代诺内侧旁,陆路只相距一两公里远。人们已经把房子建得很靠河边,无法再往河边靠了。你想象一下一段宽得出奇的河床,满是鹅卵石和灰色的沙土,一年里倒有十一个月干涸露底;中央的一条水流,又窄又深;无数支流被砾石滩、荆棘丛和绿色的橡树林一一分开。既没有陡坡,也没有堤坝标志出河的边界。你走过满地碎石的坑坑洼洼的道路,来到这里。从来没有汽车光临,也很少有散步者。透过树林的枝叶,我们远远地看见横架在河上的大桥的铁墩子和铁桥面。我跟我的表兄弟们,跟罗贝托,跟村里的其他男孩,整下午整下午地勘探着我们的王国。在被大水冲来的树干底下匍匐,跳入冰冷的水中,接着,使劲舞动胳膊,狗刨似的游动,在被太阳晒得暖乎乎的沙土上打滚,在柳荫底下睡觉,登上一个陌生的小岛;寻衅打架,不过那是一种乱糟糟的混战风格,丝毫不能跟拿破仑的战略天才相比,尽管父亲关于他的说法有些歪曲史实:那些消遣,甚至包括我要提到的那一件,在我的心中,没有一样比得上对夜晚最初一抹阴影的等待,从教堂钟楼传来的晚祷钟的音符,在我头顶上悠扬飘忽,最终消失在昏暗的空中。

那时光,我感到了什么?两种宗教分享了我的心。一种,我已经留在了我身后的卡萨尔萨;它通过晚祷之钟悠扬的叮当声波,回响在我的记忆中;它对我说着基督教美德和义务的旋律话语。(假如你能原谅我这些陈旧的概念和说法,跟我在我的课本中学到的那些一样,尤其是在为课堂而写的一部最著名小说的选段中,题为《心》,建设性格言集[3]。)

---

① 库斯托扎战役是意大利人为推翻奥地利对北意大利的统治而进行的战斗,有两次,分别发生在意大利独立战争期间的1848年和1866年。卡波雷托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军对奥地利军的一次战役,发生在1917年,意军大败。

② 尼斯、科西嘉属法国;尤利安山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上;卡林西亚,即克恩滕,是奥地利南部的一个州。

③《心》(1886)是意大利作家爱德蒙多·德·阿米契斯(1846—1908)的一本儿童故事集,带有感伤色彩,中译本名为《爱的教育》。

女人的宗教(我把堂·保罗神甫归在女人一类里),保留给女人,局限在女性化的地点中:房子、教堂、水泉。那水泉,我从心灵深处把它读作"水泉",而从不读成"洗衣池"[1],而且,在我看来,洗衣女们嗡嗡作响的活动,是无法跟一个阳性名词兼容的。对我来说,另一个家族风俗的中心是牲口栏,小姑娘们每天晚上到了挤奶时分都要去那里。我跟奥蕾丽娅很谈得来,她梳着黑黑的辫子,辫梢上扎着红头绳,身子一动,辫子就在肩膀上跳舞。她来我的窗前(我房间的窗朝向玉米地和甜菜地)叫我,然后带我一起去农庄。我拿上一只空桶,我们沿着村里的那条街,一边走一边踢着一粒小石子:就像跳房子游戏那样。家庭主妇们待在自家门口,用围裙擦着手。白葡萄酒烩兔肉煨在烧木柴的炉子上,面炸茄盒在油锅里翻滚,越橘酱在大盆中热腾腾地冒着汽,淡紫色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诱人的香味。我把这缕家常的熏香深深吸入鼻中,它跟弥撒时的乳香一样,令我肃然起敬。

每个星期天,一长队来忏悔的女人走到教堂圣器室,堂·保罗坐在黑暗的听忏间里,竖起耳朵,听取她们列数的罪孽。妈妈走在我的姨妈们前面;她们的嘀嘀咕咕,紧接在她的窃窃私语之后。当地的所有教堂,在同一时刻,全都沉浸在同一片喃喃的嘈杂之声中,从一个钟楼到另一个钟楼,整个威尼托区[2]在信仰中团结一体。特伦托会议[3]没有白白地在波代诺内一百公里之内召开:反宗教改革运动继续贯彻在我们的乡村。我母亲和她姐妹们的虔诚是诙谐的、带微笑的:但毕竟还是虔诚。她们做日课时穿黑色衣裙,不露胳膊,每餐饭前做祷告,星期五守斋。神甫们在玛丽-泰蕾莎[4]的这些旧属地中,保留了他们的全部控制:尤其因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把神甫们看做它的支持者,他们才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服从。这样的一种气氛本来会令我窒息。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个神权的和虔敬的弗留利,并没有成功地代取一个世俗的弗留利,比野蛮的大侵略本身还更偏僻的弗留利,威尼托人的弗留利,异端,

---

① "房子"、"教堂"、"水泉"都是阴性名词,而"洗衣池"是阳性名词。

② 威尼托区是意大利北部一个大区,包括七个省。

③ 特伦托会议指天主教会的第十九次普世会议,于1545年到1563年举行。

④ 玛丽-泰蕾莎(1717—1780),奥地利女皇。

放纵，赤裸，感性，肆无忌惮，不知羞耻。还没有倒塌之前的乡野天堂，而我们，塔里亚门托河畔的男孩子，让它阳光下的伤风败俗消散在我们江河般的大胆中。

我保留着那一时期的一张照片：我们中，有十来个笨手笨脚的瘦杆杆，只有我一人又矮又壮，大伙儿全都懒洋洋的，待在河滩上，穿着游泳短裤(有些人只是裆间系着一块布)。每个人都嫉妒地保卫着初生男子气的秘密，唯一的羞耻(更不如说是厌烦和狂躁，而不是羞耻)，坚信自己跟年长的伙伴相比还是童男子。我是在多大的时候第一次做爱的？是在什么情况下？跟谁？所有启蒙小说中的例行问题，启迪了作者整页整页的文字。对我而言，这是荒唐的问题。假如人们问我记不记得我第一眼见到的蓝天，第一口吃到的苹果馅饼，我能够回答吗？我做爱，而毫不意识到是在"做爱"：当然更不用说，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爱的边缘者，是在一座充满着障碍和危险的黑森林中冒险。我出于兴趣和饥渴做爱，就跟我肚子饿了要吃饭一样自然。对我来说，没有第一次的忧虑和辉煌，没有震惊，也没有要在床前刻下一个十字那样的纪念意义。只有压迫着摩西后代的罪孽，把跟一个朋友一起对快感的发现，变成了可纪念的事件。我靠着储存的健康又强壮的快乐(著名的"印欧基质")而得以免除的罪孽，在天主教的外衣下，毫不受损地留在卡萨尔萨。我的根生长在这土壤中，在这异教的腐殖质中，我精力旺盛地从中飞出，像一支茎杆那样天真而又正直。

当一个伙伴回应了我的微笑时，我便跟他一起消失在了一个树丛后，或是钻进了一团密密麻麻的荆棘丛。担心遭到过于笨拙者和无经验者的审判。确实，我们对这不完全占有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我们手段的暂时薄弱只能让我们局限于此。我们最好还是在一旁自己穷对付吧。但是，要放弃我们的行动，把我们"隐藏"起来，在我们之间是决然做不到的。晚上，当我坐在家中的餐桌前时，我并没有"说谎"的感觉，因为在晚餐期间，对我们的某些下午开花的游戏，我始终就缄口不言；同样，我可以在我的床上，十分平静地接受妈妈的晚安吻别，而没有丝毫在河边柳树丛中犯下"错误"的感觉迫使我躲避她的目光。

我白天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是在回村前的片刻。

我美美地躺在温暖的沙滩上，心满意足，一直等到晚祷的钟声给我一个出发的信号。浑身的慵懒，加上傍晚的幽思，多么惬意啊，这时，我还没有品味出我那两个世界之间的和谐吗！远处，各家各户集中在教堂周围，炊烟袅袅，祷告声喃喃(在此借用爱德蒙多·德·阿米契斯的话)；这里，生硬的动作，赤裸的皮肤，身上发出的盐和麝香的气味，幸福的物质感受。从钟楼上落下的透明音符，为我们的丛林之队带来了卡萨尔萨的祝福：当天上晶莹的信息，随着微明的黄昏，降落到我沉重的四肢上时，谁还能够怀疑，世上的一切并非全都是美的和善的？

这种天真的折中主义，是我少年时代的财宝。兴许，我很快就不得不做出决定的隐约感觉，也增加了我的至福。再过几个季节，我就不可能有选择了：或者屈服于我母系的宗教，但要丢失我的天性；或者显示出我行我素的勇气，但要怀着一种背教者的糟糕意识。在天主教信仰中成长，从自己青春幻觉中摆脱出来的人，有谁能逃避这一两难抉择呢？把教会的道德和我个人的需要调和在一起的梦想，随着童年的其他幻想一起轰然倒塌。我毫不犹豫地选定了我的道路，但是，我渴望成为的，那么多傻瓜夸耀我已经成为了的那种自由人，总是带着基督教教育的羁绊。当一个人直到二十岁还坚持星期天去望弥撒，他就不可能穿着希腊人轻飘飘的长袍，游历世界。在我的诗歌中，我编织了跟一个乔托[1]的同时代人同样多的对基督的赞美：假如一个葛兰西[2]的弟子如此地关心耶稣，那么，当你看到你母亲，几乎一个字也不认识的人，在她的炉灶上方并排挂着一张斯大林的画像和一幅圣母的肖像，你还会觉得惊奇吗？没有一部电影能比关于福音的电影更紧地揪住我的心。在我的私生活中，我再怎么扔掉假面具，再怎么显出英勇顽强的样子都没用，我感到，在我的胸膛中跳跃着一颗犹大的心。

在我居留罗马的大约三十年期间，我是不是有一天忘记了为失去的弗留利叹息？神妙的伊甸园，它在天堂的鲜花丛中迎接了维吉尔的山毛榉。摊开手脚睡在河滩上，我是大地的儿子，却又没停止过属于亚当

---

① 乔托(约1266—1337)，意大利画家。历来被尊为意大利的第一位艺术大师。

②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曾任总书记。

的世系。一种纯粹的悔恨之乐,从此后就再也没被允许品尝;我无谓地寻找,却找不到我最初激动中的那份天真。传到我耳畔的音乐,再也不是提提尔[1]的芦笛,也不再是天使们的竖琴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巨钟紧接着我们村的排钟敲响;它把我驱逐出基督教和国家;它曲解我所有的行为。想必我带着背叛者的傲慢违反了宗教戒律,怀着变节者的狂热听从了我血肉的冲动,本着活跃分子的宗派性保卫着我的事业,而我,我生来却是为了温柔,为了平和的。

(你看一看今天发生的事吧。基督教教育不再压在年轻人的头上了。弗洛伊德代替了耶稣。“胜利!”白痴们高呼,却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什么都没改变。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会对我说:“跟你的小伙伴好好玩吧,在你这年纪,没什么可说的。直到十六岁,十七岁,你所能做的一切不会导致什么后果的。尽情地利用赐予你的准许吧。因为,随后,当然……”随后,必须成为一个男人。超越这一少年阶段,去发展你自己,去走向成年。一个阶段就是一个阶段!任何人在此逗留得比法定时间更长久,就是犯了未成熟的罪;就将被分配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的法庭判定为未成熟。我在问自己,杰那里埃罗,你那一代人赢得的是什么,你们从维也纳[2]得到教益,而不是朝着拿撒勒跪拜。有罪,总是有罪!就像我们在三十年前那样,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尽管这错误不叫罪孽,而叫偏差,退化,固滞于一个过渡阶段。快快停止解释你那可怕的结婚计划,不要向我争辩什么你是独立于神甫行动的。你没有受到堂·米歇尔的影响吗?好吧。对别的压力,你让步了,更阴险更狡诈一千倍,因为,“阶段”的理论只是空中楼阁而已,你可以轻轻松松地吞并它,当你看着电视中紧急救援女士[3]向你炫耀她的夫妇广告公司时,当你在理发店翻阅杂志中的医药卫生栏目时,当你在酒吧台上喝空最后一滴带泡沫的奶油咖啡[4],瞟一眼《晨报》

① 提提尔是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的《牧歌》和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田园诗》中牧羊人的名字。

② 喻指弗洛伊德。

③ 原文为意大利语“signora Prontosoccorso”。紧急救援女士是一个在电视节目中给人以私生活(如婚姻等)建议的女人。

④ 原文为意大利语。

关于年轻人“问题”的社论时。还不算你那个共产党员的兄弟的演说，在阿尔法·罗梅欧公司当工头的那一个。)

姑娘们不跟我们一起去塔里亚门托河。心照不宣的习惯，在悲剧差点儿发生后，它已经成为一条绝对的规矩。小奥蕾丽娅想陪我们一起去。“你会游泳吗？”罗贝托问她。她耸了耸肩作为回答，我捏紧拳头，走向罗贝托。他逃出了我的打击范围，捡起几块碎石。争吵突然停止，我们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来到了河边。奥蕾丽娅穿一条带花的布裙子，她脱下来，小心叠好，放在一块鹅卵石上面。单件式游泳衣，用纽襻在肩上扣住，紧巴巴地包住她那两个刚刚有些隆起的幼小乳房，但她的胸几乎跟男孩子一样平。她举起胳膊，想整一整发髻。我记得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我看到她腋窝里长满了密密的黑毛，比她的头发还黑，是漆黑的，被汗水沾成一绺一绺的。

罗贝托和其他孩子已经下到齐腰深的水中，招呼我们下水。奥蕾丽娅在那里晒大腿，闭着眼睛，脸冲着太阳。“也许她真的不会游泳，”我心想，懊恼自己没能跟小伙伴们在一起，白白浪费了白天里最好的时光。假如我现在站起来，我就成了人们一心想摆脱掉打发去玩的孩子了。我的自豪感命令我留下来，坐在奥蕾丽娅的身边。“你没有告诉过我，这里有那么多苍蝇！”她大呼小叫起来，突然站起身来。我抓起她的手，又往上游走了百十来步，来到一个更陡峭的地方。“我们来比赛吧，”我对奥蕾丽娅说。在河边涉水的罗贝托看到我们跳入深深的水中一定会惊骇万分。

她猜想到了她的能力吗？她是不是成了某种不舒服的牺牲品？游到一半时，我回头望去，想看看我到底领先她多远。她在一个漩涡中挣扎，沉下去，又艰难地浮出水面，几乎窒息。水流把她卷走了。当我到达对岸时，她已经消失在一个旋涡中了。她一条辫子上的红布带像一个瓶塞那样漂浮着，随后也不见了。我的同伴们已经一边沿着河奔跑，一边呼叫我的名字。我跃入河流中，抓住奥蕾丽娅的头发，把她拖到岸上。幸亏还算及时：她昏迷过去了，眼睛紧闭，浑身冰冷，在我的怀里一动不动，说是还活着，还不如说已经死了一半。

我们把她放倒在沙滩上。一些人掰开她的嘴，另一些人摇着她的胳

膊和腿。而我,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坐在她身后那块她脑袋枕靠着的石头上,只是一个劲儿地抚摩她的头发。她显得多美啊！他们为什么不让她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呢？苍白而又魔幻,像是一朵荷花,我更喜欢她这个样子。有一阵子,我还以为她死了。我开始神经质地战栗起来,不是因为悲伤(尽管在我所有的女伴中,奥蕾丽娅是最合我口味的一个),而是出于某种莫名的亢奋,如果翻译成文字(假如我可以把我的内心思想归纳起来的话),它就是这样一段荒诞的惊呼:“你死了,我爱你！你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令我愉悦！你就这样死去吧,好让我永远地爱你！”

她吐了很多水,只受到一点惊吓。但是我,我已经不再是我了。塔里亚门托河的溺水女,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夜晚,我打开我的窗户,朝着沉睡的田野呼喊她的名字。只有遍洒在果园和甜菜地上的月光,以它的寂静回答着我。或者,远处传来一声狗吠,作为我叹息的回声。我恋爱了,疯狂地恋爱了,像人们能在十四岁时能爱的那样,爱上了一个人,而在此前,我跟她的接触仅仅局限在好伙伴的关系上。但是,这种爱跟我在小说中读到的情景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不仅没去接近奥蕾丽娅,反而总想着躲开她。早先,我毫不别扭地陪她去农庄,让街上的人看到我们在一起走,尽管那只是去挤牛奶,帮她拿一下奶桶,而现在,当她来到我窗前,发出约定的信号时,我却尽量避免答应她。她远远没有掉价,像她兴许认为的那样,反而,她简直升上了天。自从我发现了她毫无生气的重影后,这个长辫子飞舞不停的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就再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我觉得她太活跃了,太多血质了,太生气勃勃了:太女人味了。只有另一个奥蕾丽娅,苍白而死沉沉的,躺在那里就像一个陵墓中女王的奥蕾丽娅,才能激活我的想象力。躺卧着,她却征服了我;躺卧着,我却愿意继续亲近她:她变了面容,完全由别的物质而不是由血肉所构成。

就算她真的死了,警告也不会因此而更为清晰。对我来说,她如果不是使我第一次隐约看到命运的机会,那又是什么呢？“拒绝女人,却欣赏女性雕像！”当我拧着她水淋淋的发辫时,这就是停留在她紧闭的嘴唇上的秘密。只要这个夏天持续着,晚上我就在我房间中哭泣。为什么流下这些只有月亮才能作证的眼泪？没有一次我不在想,我再也不要在

窗前发疯，把我的怨诉跟夜风混在一起，而应该冲出屋子，到村庄中去找奥蕾丽娅。这可怜的姑娘，不知不觉中，她教会了我分辨出我的真正目标。我只能爱她坟墓中的面容，她大理石的躯体。再后来，我还能喜欢的女人，就只剩下一些著名的演员，还有以其显贵的荣耀令我无法企及的歌剧女明星。意识到妨碍我接触她们的障碍，就是我与她们最牢固的联系。奥蕾丽娅那死人般的永恒之美，把我跟她拴在了一起。我会时时闭上眼睛，以求重见溺水女孩的形象，河边的场景，在我丧葬性的幻觉中，变成了一种葬礼仪式。"别了！"我冲她喊道，仿佛我在为她守灵，她不是昏迷在河岸上，而是躺在了棺材里。"永别了！"我嚎啕得更凶了，丝毫没有猜想到，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一部分，代替奥蕾丽娅送进了坟墓。

6

1936年：回到博洛尼亚，一直到1943年。从十四岁到二十一岁：决定性的时代。在加尔瓦尼中学的学业结束：学校名称来自博洛尼亚一个著名的医生和物理学家[1]，他的护佑使我的父亲欣喜若狂。他不拿好眼看他儿子，因为这小子着迷于文学，而老子，本来一心指望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发展趣味。对他来说，文化应该是"积极的"。而且，在职业军官看来，到一所校门上镌写着镀金字母"路易吉·加尔瓦尼"的学校里上学，就是对"精力"的一种恒常邀请。他听说过著名的青蛙实验：有一天，这位学者的解剖刀刚刚碰到一只新杀死的雨蛙的内股神经，可怜的动物立即剧烈地抽搐起来。"你激动吧，你激动吧！"上尉对他的两个男孩子重复道。这场文字游戏[2]简述了他的政治信念，还有他喜爱的那一类教

---

① 路易吉·加尔瓦尼(1737—1798)，意大利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

② 在原文中，"激动"(se galvaniser)一词跟"加尔瓦尼"(Galvani)这一姓氏是同一词根。

学方法。作为坚定的法西斯分子,他并不把脑力劳动跟某一种肌肉活动截然分开。文化不应该仅仅只是“积极的”,还应该是“刺激性的”、“有伸缩性的”、“令人振奋的”。某些晚上,当他看到我还在读教科书时,他甚至还管我叫——这是他给我疼爱的唯一证明——“青蛙”,“小青蛙”,对这个外号,他期望产生一种刺激性效果,就仿佛每当我钻研一门功课时,博洛尼亚的历史性两栖类动物就将把它几伏特的动物电能,送入我蜷伏在印刷体文字前的身体中。

为把我的文学趣味引入正道,他突发奇想,替我报名参加了由米兰一个大出版商举办的一次竞赛。瓦伦蒂诺·蓬皮亚尼不久后就出版了一些作家,如莫拉维亚和维托利尼[1]的作品。当时——你将会明白,比方说,在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何等程度上玷污了最不驯顺的心灵——他组织了名为“钢铁之书”的竞赛,征求一本“为小男孩而写,而且由一个十到十三岁的小男孩来写”的小说。“你们肯定知道那精美的《钢铁之书》文丛:为少年人而出版的现代的、诱人的、金属般的书籍。”(这“金属般的”,我猜想,应该是对加尔瓦尼的青蛙的回忆,不过可能不太合适。)随后(我给你再复制一个刊登在一本也是由蓬皮亚尼印制的文学年历上的原广告)就是那十二部不是并非纸做的而是金属的(令人失望的是,这种著名的不易磨损的材料,竟没有拯救一本书于遗忘)作品的书单。“我们打算在这一系列中再加上第十三本,是由一个小男孩自己写的。请你们想一想,看到你们的作品放在所有书店的橱窗中,在你们这小小年纪就能像大人一样赢得某种百分比的作者版税,这对你们将是一种何等的满足啊!”

这一金融诱饵看来很不合上尉的趣味,他考虑到自家的经济拮据,平时也总想巩固一下原本靠军装和武器还难以保障的不太稳固的财源。但是,他在下一页读到的内容,却叫他心花怒放。出版商发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致家长的号召”。“今天的青少年,讲究实际,追求实惠,跟三十年前为十分知名的作家所写的历险小说带来成功的青少年大为不同了。甚至那些长期来被认为是此类题材中的杰作,具备丰富的传奇性

① 莫拉维亚(1907—1990)和维托利尼(1908—1966)都是意大利著名作家。

和科学预见性的书,现在也只能归类于简单的历史性猎奇之列,因为在我们今天,潜水艇穿梭于各大海洋,飞机嗡嗡地翱翔在各大洲的天空。我们难道还要停留在那样一个时代, 一部小说就足以刺激你们的儿子离家出走,把拉合尔土邦主的女儿从火刑堆上救走吗? ”

当然,我开始摆脱儒勒·凡尔纳和欧杰尼奥·萨尔加里(然而,同时又觉得卢齐奥·堂布拉[①]的做法有些过分,他是“金属”小说的十二位作者之一,在他那部极为现代的、对青少年来说极具活力的、名叫《我的三个火枪手》的作品中,他竟然把阿多斯、波尔多斯、阿拉米斯和达尔大尼央替换为……四条狗[②]:无疑,始终为了纪念“动物之电”);而且,在真的把我在卡萨尔萨的小女伴从水中救起之后, 我没有丝毫欲望在想象中飞越蓝天,去拯救一个印度公主。但是,蓬皮亚尼年历上的奇妙允诺,已经不怎么能诱惑我这样的一个人了,我通过在旧书商那里的搜索,刚刚独自发现了《麦克白》、狄更斯、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书跟潜水艇水手和飞行员的理想, 跟召唤着我们青春抱负的基础活力论离得是那么遥远,更何况,我是在一个带有神魔名称的走廊下买到它们的,那条长廊先是围绕着博洛尼亚的马焦雷广场, 然后又沿着圣佩特罗尼奥大教堂的左侧延伸。

人们把那些带柱子的走廊叫做“死神柱廊”,因为它所支撑的建筑,今天改做了博物馆和办公室,以前却是医院。我不知道这一来历;我照着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一地名学上的任性。在我看来,待在它们摊架后面的商人,便是世外的鬼魂使者,尽管他们肥胖的身子使博洛尼亚的烹调出了大名。我不对我自己说:“让我们去买一本书,”而是说:“塔纳托斯[③]有什么新书能提供给我吗?”阅读,把自己同化为小说和戏剧中的人物,对我来说,就是向法西斯分子大肆鼓吹的这一“生活”转过背去,而进入到一种死去的神话中,面对着死神的炫耀,我那几乎日常的受难之路在邀请我进入其中。

---

① 卢齐奥·堂布拉(1880—1939),意大利作家,高产,其作品文辞优美而思想肤浅。

② 阿多斯、波尔多斯、阿拉米斯和达尔大尼央是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的主要人物。

③ 塔纳托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死神。

当巴多里奥将军[1]把意大利国旗插到埃尔阿兹拉河和朱巴河的岸上时，我在其弯弯的河曲中锻炼体魄的河流却叫做科基特、忘川、弗雷谢通、斯提克斯[2]。当我待在静静的房间中，远离收音机的电波，打开那一本新书时，埃塞俄比亚吵吵嚷嚷的胜利对我又有什么关系？那本书，我是从衣服兜底掏了半天才掏出来一枚奥波尔来，在连拱廊的吝啬鬼卡隆[3]手中买下的。我父亲的雄辩言辞也好，瓦伦蒂诺·蓬皮亚尼的慷慨提供也好，都无法刺激我把我的羽笔浸到书中人物那鲜红的、促人强壮的、真正男子气的血泊中。我不会给"钢铁小说"的卷帙增加第十三本不锈的杰作。就算我试图在狗性的文学中扬名，我也不会让卢齐奥·堂布拉的四个火枪手开口，只会让看守地狱大门的三头犬刻耳柏洛斯[4]说话。随后，轮到由我决定写作和发表的时候，我知道，我会开始下到普路同[5]的昏暗王国中去。

瓦伦蒂诺·蓬皮亚尼年历的插页中，充满了谜语、笑话、文学小游戏、针对名人的滑稽故事。我还记得，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假如你成了隐身人，你会做什么？"一个先锋派作家回答道："我要去邓南遮[6]家里，偷偷地趴在他的耳边说：悔过吧，你。"这是双重意义上的讽刺与挖苦，同时构成一个勇敢的举动：一切取决于人们把这一未完之句补全的方式。当绝大多数读者(尤其是女读者)依然被独眼的行吟诗人[7]的里拉琴征服，会说："悔过你曾诱惑了那么多的女人，在缪斯的祭坛上烧了那么多的牺牲，"(美妙的赞扬跟原则上的诅咒交织在一起，) 少数真正了解

① 巴多里奥(1871—1956)，意大利将军和政治家，1935年指挥了意大利军在埃塞俄比亚的战役，1940年和墨索里尼在战争问题上产生分歧，辞去总参谋长之职。1943年，他跟盟军达成停战协定，曾领导接管政权的政府。

② 科基特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冥河，由不义者的眼泪汇成。忘川是希腊神话中冥府中河流之一，亡灵喝了它的水后就会忘掉过去的一切。斯提克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冥河，弯弯曲曲，水黑难渡。弗雷谢通是传说中一条火焰之河。

③ 卡隆在希腊神话中是冥河的摆渡人，每个亡灵渡河时，都要付给他一枚钱币。奥波尔是古希腊时的一种钱币名。

④ 刻耳柏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看守冥府大门的恶狗，长有三个脑袋。

⑤ 普路同是罗马神话中的冥王，即希腊神话中的哈得斯。

⑥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艺术上有唯美主义倾向，政治上支持法西斯主义。

⑦ 指邓南遮，他因1916年的一次飞机失事，右眼受伤失明。

他的人会明白:"悔过你曾写了那么糟的诗",而政治上最大胆的人说:"曾成了墨索里尼的朋友。"这些就是作为反对派的花招,只为让人们听到一种被警察的纠缠压制住了的声音。

博洛尼亚曾是一个历史事件的舞台,它留在了法西斯主义的年鉴中,而我也因为我父亲所扮演的暧昧角色,被牵涉在里头。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①],意大利艺术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以他那狂躁易怒的性格和飘飘长发的形象,体现着对领袖[②]的反抗。除了某些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和一小部分共产党人之外,整个国家都对领袖俯首称臣。王朝、议会、参议院只是作为点缀门面的傀儡机构保留了下来。法西斯党严密控制了银行、工业和工会。最后的自由堡垒《晚邮报》,在阿尔贝蒂尼[③]离开之后也举手投降了。只有斯卡拉歌剧院[④]还在享受着某种治外法权。只要领导权还在托斯卡尼尼手中,在所有学校和所有公共建筑上都挂满了的独裁者画像,就决然进不了米兰这家大剧院的门。在此期间,皮埃特罗·马斯卡尼[⑤],官方的谄媚者,为了挽回他从《乡村骑士》以来所有作品的彻底失败,写了《行会之歌》和《劳动颂》。奥托里诺·雷斯皮吉[⑥](博洛尼亚的另一光荣!),普契尼死后的意大利第一号作曲家,在一些直接献给暴君的交响诗中,竭力恭维了罗马的山岭、水泉和松林。

五月的一个星期天,托斯卡尼尼来到了博洛尼亚。他下榻于布伦旅馆,玛格丽特王后喜欢的豪华老旅馆,一些没落贵族常住在那里,带着他们自己的家具;后来,这旅馆毁于轰炸。当天晚上,音乐大师就得在市立剧院指挥一场音乐会,以纪念朱塞佩·马尔图奇,这位长期担任音乐

---

① 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1867—1957),意大利指挥家。

② 领袖即指墨索里尼。

③ 路易吉·阿尔贝蒂尼(1871—1941),意大利新闻工作者,很早起就反对法西斯主义。在他的经营下,《晚邮报》成为欧洲销路最广的报纸之一。1925年,因持反政府的立场,被报社辞退。

④ 斯卡拉歌剧院在米兰,是欧洲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托斯卡尼尼曾在此任音乐指导。

⑤ 皮埃特罗·马斯卡尼(1863—1945),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乡村骑士》是他1889年的作品。

⑥ 奥托里诺·雷斯皮吉(1879—1936),意大利作曲家。

学院院长的音乐家。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这个星期天正好是五月集市开幕的日子:这一集市在我们的城市中非常重要,专为猪的产品而设(博洛尼亚的莫塔代尔大香肠[①],摩德纳的粉猪爪,伊莫拉的熟肠)。《卡尔利诺》[②]在它的第一版上,以一帮穿褐色衬衣的少年的形象宣布,出席定于晚上九点半开始的音乐盛会的,将有本地老乡莱昂德罗·阿尔皮纳蒂,国务秘书,还有音乐迷们骄傲的最高主体,墨索里尼的女婿本人,加莱阿佐·齐亚诺[③]。文章的作者并没有暗示,那些政界要人赶到艾米利亚区的首府来,更多地是为了参加在集市帐篷下摆开的丰盛的猪肉之宴,还是来出席谦逊的已故音乐大师的降 B 大调小提琴与乐队协奏曲。作为谨慎的奉承者,记者最后向当地的所有法西斯分子发出一个号召(我父亲会说,"激动吧"):对阁下大人的欢迎应该跟阿尔巴尼、阿尔加迪、比比恩纳家族、卡拉齐家族、多梅尼基诺、塞里奥(他不敢说:莫塔代尔大香肠;姓氏的字母排列顺序证明,他刚刚在粉红纸页的词典中温习了他的知识)[④]的故乡相称。"我们所有的旗帜将迎风飘扬,横幅颤抖着像是四四方方的战旌。"

可惜啊,要使军旗手的这一庆典赢得完全成功,就必须让风儿吹起,带来某种气流;但是,无论是从亚平宁山脉下来的北风,还是生于亚德里亚海、从波河河谷钻进来的西风,都不愿趁此机会抛头露面。一阵沉闷的春暖笼罩了城市。没有一丝风波掀动高挂的旌旗,一排排旗杆全都垂头丧气。唯一的一阵风是我父亲刮起来的,他踩着午祷的钟声,风风火火地赶回家里。只听得房门一阵丁零哐啷,他一句话也不对我们说,就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我们看到他重新露面时,已经是一身军礼

① 莫塔代尔是一种猪肉和牛肉混合制成的大香肠。

② 《卡尔利诺》是博洛尼亚地方的一份报纸。

③ 加莱阿佐·齐亚诺(1903—1944)意大利政治家,法西斯政权中的重要人物,曾任新闻部长和外交部长。

④ 弗·阿尔巴尼(1578—1660),意大利画家。阿·阿尔加迪(1595—1654),意大利画家。多梅尼基诺(1581—1641),意大利画家。塞·塞里奥(1475—1554)意大利建筑家。这四位都出生在博洛尼亚。比比恩纳是意大利 17 到 18 世纪的艺术家家族,家族中有几位画家和建筑家出生在博洛尼亚。卡拉齐家族是意大利 16 到 17 世纪的画家家族,其中三兄弟是博洛尼亚画派的创始人。

服,满脸充血,气急败坏。

"复仇,复仇!"他喃喃道。

他喝了一杯鸡蛋利口酒,对我们解释了这突然激动的原因。利帕里尼教授这位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小学教材的作者,博洛尼亚市长,赶到了布伦旅馆,给大师带去致意,并请他在两位大人物进入剧院的时候,指挥演奏法西斯颂歌《青春》。"您疯了,"托斯卡尼尼反驳道,"即便是国王们,也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派头啊,他们可是常常出席我的音乐会的。我,我只指挥严肃的音乐。"在一次如此巨大的冒犯之后,我父亲补充说,瓜达尼省长召集了警察和军队的所有头头。难道还猜不出会有一次动乱吗?我们只得吃了一顿他不在场的午饭;他的职责把他召唤到了省府;公共秩序乱了。

接下来的那半天,便是紧张的谈判。两位大人阁下将坐专列从罗马来,只能在七点钟时到达。他们将直接去圣路加山岭,先用猪肉大餐填一下肚子,然后再在音乐的庆典中打开他们的听觉之门。好好先生托斯卡尼尼建议求助于市立军乐团,他们可以在剧院门口的台阶上,露天演奏法西斯颂歌。这一妥协的提议,被当做一种补充性的嘲笑(它兴许就是)。联邦秘书基内利恼羞成怒,问他还要等什么,是不是该往这蠢猪的脑袋上揍一棍子。终于,晚宴开始了。当九点钟敲响时,入宴者往手表上瞟一眼(只有齐亚诺除外,他戴的是怀表)后,就赶紧往嘴里送双份的雅科波(这是中世纪时佩波利伯爵家[1]一个厨师的名字)猪头肉冻,谁也不想漏掉一两,必须警告国务秘书和新闻宣传部长,他们将在剧院蒙受一次史无前例的侮辱。

墨索里尼的女婿哈哈大笑起来。"上帝保佑!"他欢呼道,因为痛饮了冒泡的朗布卢斯科酒[2],嗓音略略有些发粗。"我们可要当苦差了!"一个跟已故的马尔图奇同样外省味十足的艺术家的作品,不足以刺激一只不辨音律的耳朵的好奇,对此,你还有什么好吃惊的吗?同时,还必须记住,这位实在没什么名气的作曲家的功绩,以及他今天被人纪念的主

① 佩波利家族是意大利贵族世家,几代都是博洛尼亚的领主。

② 这是摩德纳地方出产的一种葡萄酒。

要原因,是在博洛尼亚指挥了《特里斯坦》[1],这是意大利人对该曲目的首次演奏。尽管大人阁下对欧忒耳珀[2]的魅力充耳不闻,他恐怕应该知道,拜罗伊特小矮子[3]和谐的音符,给他岳丈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伟大朋友和典范[4],带去了多么特殊的乐趣啊。当阿尔皮纳蒂示意省长,让他先行独自下山回城,别再拿一个老疯子的妄想为难他们时,齐亚诺很高兴找到了一个取消决定的借口,给他的皮带又松了一格孔,又给自己上了一份肉冻。坐在他右边的国务秘书,则小心翼翼地抓住木头夹子,朝装酸黄瓜的大口瓶扎进去,然后往他威严的邻座的盘子中,放下一根奇形怪状的、浮肿的葫芦科瓜果。

但是,在山下,闷热的城里,好气氛一下子被糟蹋了。所有那些准备,所有那些忙乱全都化为无用!基内利对部长们的放肆甚为生气,到处找碴儿发泄怒气。被排斥在宴会外的年轻军警们,早就以第四速度匆匆吞下了他们天天都吃的博洛尼亚糟糕口味的夹肉馅饼[5]。在联邦秘书的鼓动下,他们集中到了剧院门口。当年曾经抵抗过罗马军队的父辈留给城市的古老自豪感,最后一次从唾沫四溅的嘴里喊出。他们甘心做任人戏弄的土火鸡吗?我父亲加入到他们当中。他被齐亚诺的回答激怒,他无法宽恕自己竟然饿了一顿午饭匆匆赶来救援法西斯的荣誉,而它天然的重臣却恬不知耻地轻易牺牲了它,只管在那里埋头狼吞虎咽。

托斯卡尼尼坐着他的汽车来到了。一只脚刚落地,他就看到自己被一群虎视眈眈的人团团围住了。

"您是不是准备好了演奏《青春》?"

"不,"大师再一次明确答复。

他们开始推他,搡他;一记拳头落到他的背上;他的毡帽落了地,疯狂的脚把帽子碾了个粉碎。在国际新闻界引起轰动和愤怒的是,他劈面挨了一个巴掌。一个证人发誓说,他看到P上尉扬着手。另一些人,则相

① 指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② 欧忒耳珀是希腊神话和传说中九位文艺缪斯女神之一,司悲剧和音乐。
③ 指瓦格纳,拜罗伊特是德国一城市,瓦格纳于1872年来该城定居。
④ 指希特勒。
⑤ 原文为意大利语。

反,祝贺在场的军人平息了骚动。一个佩戴三条饰带(我得到的唯一细节)的军官为避免事态扩大,帮托斯卡尼尼又上了汽车。大部分示威者,以基内利为首,一直游行到旅馆。联邦秘书向大师提议,请他立即离开博洛尼亚,声称公共当局再也无法保证他的安全。托斯卡尼尼在一队冲锋枪手的护送下,当夜出发去了米兰。不久之后,他就离别了他的戏剧和祖国,移居到了美国。

这一故事毫不损害集市的兴旺,一年一度,它的帐篷都会重新支起在摊位上。托斯卡尼尼,无须多言,在猪猡事件中又增添了他的一份荣誉。至于齐亚诺和阿尔皮纳蒂是不是避免了消化不良,史书并没有记载。艾米利亚精美猪肉制品的唯一确实的牺牲者,是可怜的马尔图奇,他的作品那天晚上没有演奏,此后也没有任何机会做纪念性演出。

7

我们战前的伟大权威和伟大小丑:阿契雷·斯塔拉切[①],国家法西斯党的书记。他要求男人们收紧腹肚,挺起胸膛,而女人,生育的机器,则应该是丰乳肥臀。在战胜埃塞俄比亚之后,我们应该呼喊:“帝国的开创者领袖万岁!”报刊接收到一系列极其繁琐细致的指示。不能写:“他们握手言和”,而要写:“以罗马方式致意”。不能写:“市长放下了第一块基石”,而要写:“狠狠挥下了第一镐”,因为动词“放下”并不表示一个相当有力的动作。要避免说,一个大人物“安坐”到了一个新的职位上:这样说,产生的效果会更糟糕,使人以为一个头头一开始当真坐了下来。“法西斯”[②]盛大节庆的日子,掌旗官从城市各处走向体育场时,严禁把小旗

① 阿契雷·斯塔拉切(1889—1945),意大利政客,曾任国家法西斯党书记,全国奥委会主席。

② 原文为形容词“lictoriale”,指法西斯的标志:束棒。

子卷起来夹在胳膊底下,也不允许裹在报纸中。命令各达官贵人游行时跑步前进,仪式开幕时要有体操表演,比方说,并住双脚在刺刀上跳跃,或者纵身跃过燃烧的火圈。

空军元帅意大洛·巴尔博[1]拥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圆堡,借给那些"大西洋人"(征服海洋的飞行员)二十四小时。这些英雄中的每一个都有权升起吊桥,跟他选中的女人一起,在备有必要食物和烹调用具的城堡中度过一整天又一整夜。

罗贝托·隆基,卓尔不群的历史学家和艺术批评家,也是我上大学时听过课的教授,教导我们要认清法西斯主义,不仅要在闹剧一般的滑稽和可笑中分辨它,而且要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象不到之处认出它来。这一教诲是那么珍贵,而就在同一时期,人们被一条口号所激励:"把你们的金子贡献给祖国",男人们交出领带夹,女人们拿出耳环,夫妇们则奉献他们的戒指。而贝内德托·克罗齐[2]本人,意大利的良知和意识,自由的王子,走出了他的那不勒斯宫殿,交出了他参议院议员的纪念章。

隆基——帽檐搭在眼睛上,鼻子像是鹰钩,丝围巾裹着细细的脖子,激烈和嘲讽的字词令人心寒——在藏波尼街的老房子外边训练我们,根本不拿课程表当一回事。我们从两座高楼,阿西内利楼和加利桑达楼底下走过,沿着从中世纪起就一直没变样的珠宝商小街走(而不选择里佐利街,以前又叫科西嘉人街,满街都是银行和豪华商店的那一条),一直走到马焦雷广场。在那里,做一次教学停留,背着最高行政官的宫殿,面对圣佩特罗尼奥教堂,大教堂那高大而又威严的正面,竖立在广场的另一端。我的朋友亨里科,已经长出了小胡子,跟凉廊里的卖花女郎调情。而我,我则把教授的话一字不落地全部装进耳朵。

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历史的一个老话题,他用干脆利落的句子肯定道。避免把它跟墨索里尼的制度相混淆。博洛尼亚,以它长达数世纪的反对罗马帝国的斗争,早在法西斯主义一词出现之前就在反法西斯主义了。教皇们的野心受到了城市的抵制。城镇嫉妒它的自主,教会贪婪

---

① 意大洛·巴尔博(1896—1840),意大利空军将领,法西斯头目。

② 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学者、批评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

地扩张。那次战争的后果,我们都看在眼里。

"从 12 世纪起，神圣教廷就贪婪地下令建造一座献给圣彼得的大教堂,而公民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建造这一方形教堂的计划:教堂要奉献给我们的主保圣人、艾米利亚的第一任主教佩特罗尼奥。根据规划图,它应该覆盖比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本身还更广的面积。中殿占了极大比例,是全欧洲最高的。但是,在它的其他部分中,你说得对,皮埃尔·保罗,则是未完成的杰作。城市经历了二百年的独立后,到了 16 世纪,教皇特使红衣主教们把城市带回梵蒂冈的治下。为了阻止泥瓦匠们完成教堂的建造,他们让人沿着工地建起了一个宫殿,只有两层楼高,却延长得不成比例:这样一来,教堂的侧翼就不可能再建了。你们自己总结一下吧,然后告诉我,白痴们所吹嘘的这一建筑不能在你们面前更早地竖起来,而且它的中殿不带耳堂,是不是我们失败的见证。"

我们的良师就这样说着。所用的词语对我来说特别有启示性,尤其是因为,对一次如此的失败负有责任的宫殿就建在死神柱廊上。亨里科丝毫没有意识到图书买卖和教皇专制主义之间的这一意外结合在我心中唤醒的骚动,一只手捻着他的小胡子,另一只手在报春花丛中乱拨弄,劝说着年轻姑娘推着她的小车跟在我们这一小队人后面走,沿着连拱廊一直走上圣佩特罗尼奥教堂的圆室。或者还不如说,一直走到圆室尽头,因为,作为他证据的最后一个关键,罗贝托·隆基为我们显示了,半圆形后殿本身是怎么在规划中得到了保留。从我们歇脚的加尔瓦尼广场,从那个无所不在的物理学家的雕像底下望去,可以看见一堵笔直的墙,一下子把这残损的建筑围封起来。玛提亚斯趁着这次歇脚,三步并作两步溜进了最近的卡佩利书店,在书架上小心翼翼地翻寻起来。后来,他居然赢得了这家书店的大伙计,一个叫奥泰罗·马塞蒂的人的同情,后者跑去找圣多明我广场上的一个老书商,让他下决心出版我们最初的几部诗集。

我们一共四个诗人,每天都要聚会,漫无目的地在连拱廊下游逛,有时候一逛就逛到凌晨，能碰上早起送牛奶的小伙子把奶瓶放到系在窗下一根绳子上的木桶里:亨里科,那时迷恋着马焦雷广场上的卖花小姑娘,把兴趣放到植物学的隐喻上,而后来,当他醉心于一个服饰用品女老板的女儿时,就把他的诗歌按照绣花和贴边的式样来剪裁,最后,

在一种更成熟的爱好影响下，他终于成为帕斯科利[1]合格的继承者;玛提亚斯,你看到过他躲在灰尘蓬蓬的书架之间,寻找着珍本图书和宝贵文献,以它们卡尔杜齐式的食粮[2]来哺育他绝对博学的缪斯女神;最后是达尼艾尔和我,唯一打算从事美术工作的人(达尼艾尔甚至还练习绘画),当罗贝托·隆基认为我们这两个人还准备听他最后的即兴讲课时,班里的其他人都已作鸟兽散了。

在漫步中,他为我们指出,他辛辣幽默地称为罗马之鹰的不同胜利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科西嘉人大街上房子的宽阔橱窗,大约在上一世纪末,代替了木头的挡雨披檐和艺匠们可拆卸的摊架。复兴运动时期[3]的资产阶级结束了柱廊共同体。中古时代市中心的开膛,笔直大道的开掘,官方大楼的增生,广场上雕塑的竖立,带悬垂式阳台的笨重墙面(这是一种装饰,它跟那种连拱廊文明根本无法兼容:阳台只是房主们对街道的一种轻蔑让步,他们决定在门锁的保护下闭门不出),挑檐、玫瑰花窗和装饰线脚的滥用,野心勃勃的趣味彻底糟糕透顶:这就是翁贝托时代[4]的遗产和中央集权制度的直接后果,远在墨索里尼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凯旋门、体育场、储蓄银行、邮政局和农业研究所之前[5]。

"你们听到了吗?"隆基突然问我们,他的食指指向一扇打开的窗户,从那里传来一架收音机清脆而平静的声音。我跟达尼艾尔交换了一个惊讶的眼色。在这个宁静的春天下午传到我们耳朵里的,不是威尼斯广场[6]上洪亮雄辩的嗓门:而是一个文化节目播音员的严峻沙哑的声音。在皮兰德娄[7]的逝世纪念日,他简明清晰、毫不夸张地表达着对作家的

---

① 乔·帕斯科利(1855—1912),意大利诗人。

② 乔·卡尔杜齐(1835—1907),意大利诗人、批评家,是帕斯科利的老师。

③ 复兴运动指19世纪以统一意大利为目的的思想文化运动。不是五百年前的文艺复兴运动。

④ 翁贝托时代指19世纪末期。翁贝托(1844—1900)是萨伏依公爵和意大利国王。

⑤ 墨索里尼本人特别喜爱建筑艺术,他当政时期,推动了在罗马和全意大利建造一系列相当宏伟的法西斯风格的建筑。

⑥ 威尼斯广场在罗马市中心,是人们集会的地方。当年,墨索里尼常在这里发表演说。

⑦ 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他的逝世纪念日应该是12月10日。这里有笔误,从下文来看,当时是6月,估计应该说是他的诞生纪念日(6月28日)。

纪念。教授不是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他为什么以愤怒的动作,把他的帽子扣得更紧,就仿佛要堵住耳朵?

"装腔作势!拙劣的伪造!"他好几次叫嚷起来,根本不顾我们惊诧的目光。"真正的瘟疫!"片言只语中,他向我们展现了自己的思想。尽管意大利的裁缝将只有一件事可做,即缝制褐色衬衫[①],但他们不会成功地用一件统一的斗篷覆盖意大利,就像从马里奥山的播音室里播出的这一单调声音,流传到台伯河[②]两岸。但愿博洛尼亚从来没有把生命给予古里尔莫·马尔科尼[③]!他为罗马提供了一种方法,不可抵御地把全民统一的矫揉造作的典范强加给我们。八十年的学校义务教育、兵役制度、立法选举和税收平等,全都在电波中搁了浅,而一次几分钟的节目,关于任何一个主题,却能借助电波一下子来到所有听众耳边,无论他们在哪里听,是在西西里岛帕罗港的悬崖上,或是在多罗米特[④]小木屋的啤酒馆桌子前。一代,或者可说是两代人,他们可能忘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特性,来适应那种官僚主义的、使人愚蠢的话语,那些现成的观点,那些平淡无奇的片段。

"昨天,他们赞扬了托斯卡纳人乔托在帕多瓦圆形剧场的壁画[⑤],"教授补充说。这时候,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他的话语当然不是当地方言的某种杂糅(你记下了他使用的虚拟语态未完成过去时,跟他那有些老化的高音之泵十分相称),而是最精确、最精练的意大利语,是对阿格里琴托的诺贝尔奖得主[⑥]阿谀奉承的无名氏使用的那种意大利语。多年来,隆基致力于重新光大被官方艺术批评所遮掩的14世纪的博洛尼亚绘画("粗野的、冲动的、大众的")。官方批评只注意托斯卡纳画派,不自觉地拜倒在佛罗伦萨(那时候的罗马)牺牲了艾米利

---

① 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党徒们习惯穿偏黑的褐色衬衫,所以,这些人也被称为"黑衫党人"或"褐衫党人"。

② 马里奥山是罗马的一座山岭。台伯河是意大利的一条大河,流经罗马。

③ 古里尔莫·马尔科尼(1874—1937),意大利物理学家,出生在博洛尼亚。在无线电传播方面有所发明,曾获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④ 多罗米特是阿尔卑斯山东部意大利境内的高山区。

⑤ 乔托为帕多瓦城画了不少壁画,其中最著名的在斯克罗维尼小礼拜堂的墙上。

⑥ 指皮兰德娄。阿格里琴托在西西里岛,是皮兰德娄的家乡。

亚诸城市后所获得的政治优势面前。

始终是中央权力对地方表达小中心的斗争。担心只有那些在无线电中被谈到的入选画家才能属于文化领域，这不是证明了一种预言家式的天赋吗？至于我，我这个有个人理由(你可记得，我最初的那些诗是用方言写的)抵抗大都市语言霸权的人，到时候，没有了我的老教授在远方的支持，我还会不会如你所知的那样激动地揭露媒体的摧毁性力量？“奇迹！”意大利民主制度的头头们叫喊道，这时候，从半岛的这一端到那一端，电视台正在平静地实现这种道德上的和智力上的统一，而无论是在复兴运动战役中流洒的鲜血，还是抵抗战士们的英雄主义，从来都没能巩固这种统一。那时候，除了我，没有任何一个人站起来，叱责外省生活的被破坏，精神的迟钝，家庭对工作岗位的依赖，还有小城市和乡镇中夜生活的退化或彻底终止，一到黄昏，街道就变得一片空荡荡。

文化在传播，赢得了直到那时还始终被挡在图书、音乐或美术之外的社会阶层。但是，其结果早就在隆基的预料中了。在邮政日历中，乔托、契马布埃、杜乔[①](他很崇敬这些人，并教我们喜爱他们)代替了瑞士的瀑布和哺乳动物。至于维塔莱·达·博洛尼亚、西蒙娜·代·克罗切费西、利坡·第·达尔马肖[②]，他们将永远停留在阴暗中，成为博洛尼亚历史大扫除的牺牲品。在市立博物馆中，维塔莱的圣乔治猛地把一柄锐利的枪矛刺入倒地的恶龙嘴里：它唯一的辉煌，是从没有参观者的美术馆的墙檐上摘下来，挂到客厅的壁炉上方，用来在小屏幕上播出一刻钟。

达尼艾尔要写一篇关于伟大时代中使用的博洛尼亚建筑材料的论文。这对我们是个机会，可以更深地进入我们城市的灵魂中，因为一开始我们为这工作所困惑。我陪同我的朋友做调查；正是在我们的散步中，我发展了我对柱廊在公共建筑中的优越性的思索。另一个精彩的主题，我们当地的一个现象，珍贵的大理石也好，市民化的方石也好，在我

① 契马布埃(1240?—1302)，意大利画家。杜乔·第·博尼塞纳(1225—1319)，意大利画家。

② 维塔莱·达·博洛尼亚(1309?—1369)，意大利画家，属于博洛尼亚画派。西蒙娜·代·克罗切费西(1330—1399)，意大利画家。利坡·第·达尔马肖(1325—1421)，意大利画家。

们这儿都得不到偏爱。吃香的倒是更卑贱、更简单、更动人的材料。首先,是砖头,它无处不在,甚至包括教堂的正墙。住宅、宫殿、柱廊、围墙、纪念性城门、民事与宗教建筑:到处都使用砖头,贫穷的、熟悉的、友好的砖头。只有雷诺河谷[1]的奇怪特产可以与之竞争。我们一身短衫轻装,以抵挡六月下午的酷热,在附近的山岭上,参观了著名的“小海湾”,出产某种跟黏土一般柔顺的石化凝土的自然采石场。透石膏,呈黄褐色,装饰了加利桑达楼(两座高楼中倾斜的那一座)的底座,黏土坯,多细孔,刚开采出来时柔软如黄油,很容易雕刻,呈珠光色,如鲑鱼肉一般。

也许我的心思全部集中在了这些地质学的精确性上，只注重了它们的细节，而没有发现达尼艾尔正前倾着身子，俯在野草丛中捡着土样,我没有注意到,在他赤裸的胸膛上,太阳光是如何把他初生的、浅黄的体毛照得金亮,一种蜜色,从他西西里人后代的黑头发来看,我根本想象不出会是这样。是什么力量迫使我转过头去不看?我那弗留利之夏的天真烂漫和直截了当逃到哪里去了? 那一天,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我已经变了;我,不然,就是我们周围的世界变了。塔里亚门托河岸已经属于一个消失了的世界。很机械地,我把已准备脱掉的翻领运动衫又塞进了皮带中。担心暴露自己吗?害怕我自己吗?这一突如其来的尴尬是因何产生的?那可是早先从未经历过的,跟我在卡萨尔萨体验到的自然本性竟有那么鲜明的反差！十分巧妙地把我的尴尬隐藏在我对矿物学的热情底下之后,我又开始跟在浑然不觉的达尼艾尔身边,更起劲地清查大地表皮那反复无常的巴罗克风格。另外,他已经习惯了听我跟伙伴们开女人们的玩笑,而这在我们那个年龄也是家常便饭,难道他还会对我有丝毫的猜疑吗?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对颜色作登录。熟黏土、粗陶土、透石膏、黏土坯:整个城市消融在玫瑰色、红色、珠灰色、羊毛色、火红色的色调中。暖色调,平民式的温暖,把博洛尼亚跟一些不那么有乡野气的城市区分开来。肌肉一般的颜色,柔和的质地,几乎不再是矿物。冷色与白色的贵族化诱惑,在这里是陌生的,或几乎陌生的。除了我原先的中学附

---

① 雷诺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条河流。

近的那座教堂，在我看来，人们认为它建得太不理想，因为它是习惯的样式，粗糙的墙面，裸露的砖头，表面涂着石灰。四根强有力的柱子，大理石的，离地面一米处被截断，证明了一种彻底未遂的企图，即用一种罗马式的外套，覆盖这一毫不招摇的砖石砌体。还有更糟的呢：圣佩特罗尼奥教堂，城市自治与自由的象征，墙面最初用了白色和玫瑰色大理石的装饰。也是玫瑰色，是的：假如人们想把那种对罗马亦步亦趋的模仿推向极端，那么，这就算是一种折中，没什么值得夸耀的。这一工程很早就搁置下来，最后还是决定用砖头，用这卑微的红色材料，它在火热的内心中烧熟，在陶瓷匠、手艺人的土窑中烧熟。当我们，达尼艾尔和我，为了人民自由的胜利而痛饮一瓶桑乔威塞酒时，我们至少把这一工程的早早下马，断定是教皇的惨败。

但是后来呢？你会问我。我的命运又如何了？在我叙述的一开头，我完成了对博洛尼亚的怀恋式赞美，夸耀了一种移植到意大利各地的以罗马为典范的生活方式。这一曲哀歌站得住脚吗？与其哀叹柱廊与砖头的双重落败，我不是更应该从悔过开始做起吗？我到底是什么人，有什么权利抱怨，说方石就应该战胜透石膏和黏土坯，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把连拱廊文明打发进了历史的回忆中？我自己成了什么，难道还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甚至是一个大资产阶级，因为我有了钱？我不是最终安居到了罗马吗？

更有甚之，在欧弗拉特街那栋雅致的房子里，有一个在花园保护下的庭园小楼[①]：跟封闭式别墅的文明挂上了钩。我在一首给我赢得了声誉的诗中，抨击了庇护十二世，但给瓦伦蒂诺·蓬皮亚尼（自从他放弃出版“金属”小说以来，他成了一个大出版商）带来的，却是杂志被取缔。但这是一首几乎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阴影下写成的诗，它的大穹顶堵挡了我的视野。你同样还会问我，是什么促使我没有选择一个贫困的郊区，就像我把我的人物安置在其中的那些郊区，而是选择了万国博览会[②]的郊镇豪华住宅区。为了把它建成帝国风格，墨索里尼下令在卡拉拉的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万国博览会，简称E.U.R.，指法西斯统治时期为准备举办万国博览会而特地建设的新小区，在罗马南部。

山区开发新的采石场。甚至连大理石都接受了我的担保。

亲爱的杰那里埃罗,现在还不到我解释的时刻。到时候,你将知道我选择的理由,知道我如何发现了我的误解,我苦涩地悔恨,命运之舟没有把我捎到更远的南方,一直到波佐利或一直到库梅斯,而是把我扔在了奥斯蒂亚[①]。但你已能猜到,我为什么常常不待在家中,在罗马,我为什么忍受不得被关闭在住宅的四壁之内。每天晚上,我都必须出门,必须消失在人群中,时时刻刻在火车站前的广场和花园中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人们太多地指责我这一点!没有明白狩猎的快乐于我只是次要的。在那里,那些失业者、移民、士兵、男妓、无家无业的年轻人,一直等待到黎明,他们跳下把他们从加拉布里亚和西西里一路带来的火车,到首都来寻找一份差事,或者从郊区而来,来追逐一种消遣。背靠着水池边上的树干,离开树荫向过路人讨一支香烟。小子们[②]、兄弟们的团体,它赎买我离开城市和背叛青年时代理想的罪过:我,小有名气的作家,变成富人的电影家,报纸上印着我的照片,以跟一份民事卷宗同样的精确性,描绘我的身体特征。我变成了"某人",拥有一个客厅,可以"接待"我的拜访者,他们通过门口的对讲机大声自报姓名。我剩下的唯一办法:利用黑暗偷偷逃走,以彼得的衬衣,换保罗的T恤,以私人公寓,换公共场所,溜得离家尽可能地远,来到火车站附近,溜达,贴墙,停靠,趁着夜色尽量增加着邂逅的友谊。早早缔结,早早了断。神不知鬼不觉地归去,没有确切的面貌,也无规定的性格,正是在那时候,我开始获得重生。

---

① 波佐利是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库梅斯是意大利古城,在第勒尼安海,现已毁。奥斯蒂亚在罗马西南24公里,靠海,原先有古城,已毁。现在是风景区和旅游区,有地铁直通罗马。小说的主人公P.P.P.最后就死在那里。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8

阿梅代·德·撒瓦，奥斯塔公爵，埃塞俄比亚总督，迎头痛击英军的进攻。双重打击，北面来自厄立特里亚，东面来自索马里。我父亲随增援部队出发。意大利军队被坎宁安将军赶出了亚的斯亚贝巴，固守在安巴阿拉吉高原①。5月21日，公爵投降了，先给墨索里尼发去了以下这份电报："战争并未结束；在这片被意大利人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我们很快就将回来。"几个月后，他作为战俘死在内罗毕。我父亲跟其他俘虏一起，被关押在肯尼亚，一直到停战。带给拉文纳贵族这位落魄后代的，是铁丝网后四年难熬的日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作为胜利者荣归，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只带回了变形虫、疟疾以及一种无法医治的对人类的憎恶。

当他上船前往非洲时，我刚刚十九岁。太晚了。太晚了，他没有在我不知不觉中，把令行禁止的观念灌输到我心中。我一下子停步于到那时为此一直十分熟悉的事情当中，成了神秘制动的牺牲品。例如，我不高兴星期四跟朋友们一起去游泳池游泳，便会找到一些借口取消它。法西斯制度捐赠给博洛尼亚一座奥林匹克馆。露天游泳池，带阶梯看台的圆形运动场，我们把毛巾摊在那里，躺在上面晒太阳。从这一观察所，我追踪跳水队员们的变化。直到一个最近的日子里，我还可以在那里待上整整一下午，看他们嬉戏。我的眼睛游荡在水面上，尝试着通过一段赤裸的肩膀，去补齐游泳者浸在水中的身体。公共淋浴处给了我们机会嘻嘻哈哈地大笑，彼此给对方的脊背上抹肥皂。我最喜欢的消遣，是在盥洗室中，在某个我知道他追女人的伙伴(最好他还宣称，作为一个优秀的

① 安巴阿拉吉是埃塞俄比亚北部的一座山，1941年，意大利军与英军在那里激战，大败，丧失了在埃塞俄比亚的殖民统治。

法西斯分子,他蔑视“同性恋者”)身边选好一个位置,在他身上刺激起一种骚动,这在他紧巴巴的内裤底下看得很清楚,不过,令他有些别扭的这一骚动似乎并不让他难过。这就是当时的我,而现在,反倒是我自己对这些游戏有所怀疑,男女沐浴者的混杂使我觉得很是尴尬。

我一如既往地迷恋足球赛;但现在我有一条新理由。过去,我对这星期天的比赛不求别的,只求奔跑、出汗、跟青年人一起搏斗的幸福,穿着短衣短裤,在阳光明媚的草坪上嬉戏。自从那种内在的变化后,没有人能猜出,我去体育场是为了什么。潜在的欲念是那么强烈,足以把一个球队的小伙子团结在一起,它吸引我去冒险,哪怕被对手铲倒在地,负着伤回家。内疚感越是在我心中增大,我在球场上的动作也就变得越粗野。人们从没见过还有中锋比我更为勇敢地参与防守,也没见过守门员如此敏捷地在对方射门队员腿下扑球。以这些连续的挑战,我到底在寻找什么?难道不是作为惩罚的糟糕一击,不仅惩罚我极端的鲁莽,而且惩罚那种隐晦的、其阴影将笼罩我一辈子的错误?我得不到这种舒缓。比赛一结束,我就把球衣夹在胳膊下,也不洗淋浴,也不回更衣室,便赶紧开溜。

“清教徒加运动员”:这就是我赢得的名声,而且被确实印证。从此,我喜爱的消遣:独自在山上远足。简单的吻合?安巴阿拉基的投降后第十天,我一大早坐火车,去了多罗米特山区卡多雷的皮埃威。暖暖和和地裹在羊毛绒衣中,铁头登山杖握在戴手套的掌心,我开始独自一人攀登大叉峰:三个半小时的攀行,人们是这样对我说的。而我只用了两个小时。我的钉鞋踩在石头上,发出喀喀的响声,一路回响在永久积雪的寂静的沟壑中。纯净的空气,完成一项壮举的情感,冰川上一望无际的碎石和冰碛的壮丽景象,以一种雄壮而又快乐的保障,充满了我的肺腔。一只老鹰展开翅膀在我头顶上翱翔。但是,当我登上顶峰,决定好好休息一下,品味一下我的功绩的回报时,我却不得不一下子跳起来,接着马上跑下山去。顶峰之神用威胁的眼光盯住我的脊背,命令我赶紧滚蛋。“但愿你不洁的存在不要玷污这一始终如初的孤独!”

同样的恐惧,在往日,在我父亲休假回卡萨尔萨的某一天。无人陪伴的我出去到绿波荡漾的塔里亚门托河里洗澡,我平静地游在荒芜的

两岸之间。突然,我觉得,凶恶而又哑默的深渊之神抓住了我的双脚,要把我拖向河底。我因为一桩我自己并不知晓的罪孽,受到了审判和惩罚。

这时候,我又该向谁去抱怨呢,难道不是向这如铅一般沉重地压在山上的、像一只大睁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太阳吗?只要我没有下完坡,它就一直盯着我的后脖子。闪闪发光的山峰在我周围形成了一个圆圈。早上我感觉到其暖人热量的星体,现在朝着万里无云的蓝天投射出它杀人的光芒。在整整一片冰坡上,没有一棵树,无处躲藏。猛禽不停顿地盘旋在头顶。到达村庄后,我必须一连喝上三杯橘子潘趣酒来压惊,尽情地嘲笑一番我的忧虑。

我有一些姑娘做朋友,同时跟不少姑娘。内丽娜,一个打字员,尽管有炭黑色的名字[①],却飘散着一头浓密的金发。我骑自行车带她到处走,我们骑上玛格丽塔公园的小径。战争把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清除一空。栅栏后,只剩下两三只庭院的禽类,可怜兮兮地待在过于宽敞的鸵鸟或瘤牛笼子里。内丽娜求我陪她回家,城市另一端。经常有一个她为他打过论文的大学生认出她来,并招呼她。我下车步行,她跳到人行道上,跟那陌生人一起走上几步,小伙子总是艳羡地看我一眼后,才挥手告别。他并不知道,我要把我的乘客在稍远处放下,在她家门口。她将大步爬上楼梯,生怕误了家中的晚餐。

至于我的大学同学,我更愿意带他们去公园门口人工湖的小岛。我们坐在小木屋的平台上,在来来往往的散步者中间,喝上一杯饮料。这里,根本不可能有单独见面,那些十五六岁的侍女[②],真是手脚麻利,被她们匆匆放在大理石桌面上的玻璃杯,总是叮当叮当地响个不停,更不用说那些拿面包屑喂鸭子的孩子们吵闹得没有个完。绝大部分时间里,我所邀请的玖丽娅、贝皮娜、阿丝特丽德或弗萝拉这不同的几位中,没有一个独自跟我来。亨里科,玛提亚斯,达尼艾尔也分别带着他们当时的女朋友,参加我们的聚会。

---

① 内丽娜这名字在意大利语中跟“黑色”是同一词根。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根本用不着撒谎,我敢说,他们也一样,那些湖边憩息的最舒服时刻,是在他们的女伴走了后,等她们纷纷被各自的家务活召唤走后,那时候,我们就留下来,彼此评头论足地品味她们妩媚的外表,没完没了地讨论她们隐秘的魅力。有多少次,在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中,甚至在亨里科,我们小团体最热心的这位组织者心中,我可以证明,背着女人谈女人的欢乐,代替了征服女人的必要努力!词语上激动,行动上懒惰。他们随口答应,彼此颁发一份唐璜的证书。但是,我难道能得到允许,只因为我准备过一篇关于卡拉瓦乔的文凭论文(中途放弃了),就让人家把我看做一个画家吗?

我们各自回家后,醉意蒙眬地倒在床上,回味着关于我们那些美人儿的牙齿、头发、腰身以及看不见的妙处的放荡话语,不过在回家之前,我们还要就一份将发表我们诗篇的杂志的计划,来一番梦想。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小男孩子骑在自行车上兜售《卡尔利诺》的特刊,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向最后的顾客尖声喊道:"轴心国向莫斯科宣战了!德国和芬兰军队侵入了苏维埃领土!"这则新闻尤其以它对斯堪的那维亚小小共和国的提及令我震惊。头一年的报刊还大大宣扬了一番曼纳林元帅[1]的抵抗,还有他的战士们的英雄主义,他们像精灵一样在雪橇上飞滑。他们把俄国人的坦克翻了一个个儿,让它们被烧得成了焦炭的车架在雪野中冒着浓烟。

在我当时所有的女朋友中,乔瓦娜·B给我留下了最温柔的回忆。她生于一个犹太大出版商家庭,是她使我了解到种族法令,教会了我仇视反犹主义。尽管跟在德国的迫害不是同一措施(意大利的犹太人从来没有受到身体上的威胁,也没有任何一个灭绝营设立在半岛上),墨索里尼的政策还是导致了一系列繁缛的行政手续和令人发指的法律禁令。

我常常冲着乔瓦娜指责她父母的别墅,还有他们豪华的日常生活,而且总是不无恶意,因为她属于一个跟我不同的阶层,而这对我来说,又构成了最好的保障,使我们之间的交往局限于一种无足轻重的伙伴

① 曼纳林元帅(1867—1951),芬兰军事领袖,1939年曾抵抗苏联军队对芬兰的入侵,后同德国一起对苏联宣战。

关系中。有一天，她靠近我，闷闷不乐地皱着眉头。

“你生我的气啦？”

“别说傻话，皮埃尔·保罗！今天早上，在我的网球俱乐部，他们对我宣布，没有任何一个场地可以让我进。”

“就这些？”

“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场地还可以让我进！你明白：我再也不能去打球了。再也不能了！”

“资产阶级的运动，我亲爱的，”我回答说，耸了耸肩膀，“你想一生一世都遵循你那社会等级的习俗吗？”

她任我作茧自缚，随后，静静地说：

“我不能打球了，因为他们把我的卡收回了，他们收了我的卡，因为我是犹太人。”

新法令的实施：体育场、游泳池、剧院、电影院、火车站、博物馆、邮政局，甚至还有医院，全都禁止亚伯拉罕的后代入内。我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朵，赶紧含糊不清地连连致歉。她对我的愚蠢并不记恨，满足于给我上了一堂双重意义的课。我最要好女朋友的父母的财产，成了阻止她出门的漂亮理由！

我们徒步行走，专拣荒凉的小街漫步。禁入公共场所的戒令扩展到了有轨电车。至于我，我可不愿意依然把我的女伴带在自行车上到处溜达，我喜欢跟她聊阿尔图尔·兰波和翁贝尔托·萨巴[1]，但她厚玻璃的眼镜，剪得齐后脖的短发，平坦的胸脯，还有她不屑于涂红的嘴唇，对我诱惑者的名声来说，不会是一种召唤。她问我是不是有一辆自行车，可以缩短一直到玛格丽塔公园的漫长路程。我吝啬地给了她否定的回答，实在不打算让同伴们看到我神气活现地跟一个近视眼姑娘待在一起，怕他们笑话我。

“你难道不知道我实在太穷了吗？”我这样说，想得罪她。

我觉得她不漂亮，甚至有些丑，但我可能是看错了她。如果说，我的真正目的是跟一起出去的姑娘享受愉悦，那么，乔瓦娜的上等智力，足

[1] 翁贝尔托·萨巴（1883—1957），意大利诗人。

以使她比曾跟一起我坐在湖畔平台上的那些长头发娃娃迷人一百倍。

我们一同发现了弗洛伊德、纪德、叔本华、洛特雷阿蒙[1],算是对我们迫不得已的对意大利经典作家烦人的阅读和注解的弥补。在大学里,我感到厌烦,不幸被开除学籍的她也同样,我们讨厌被上级命令简化为了民族遗产的官方文化。我们的作家,从彼特拉克到邓南遮,常常变得浮夸,学究,脱离生活,仿照拉丁模式,我现在还这样想,尽管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必要性使我们不免有些矫枉过正,例如对薄伽丘的指摘,或是对切利尼、对米开朗琪罗的低估。在文学论战中,我们两个人都因个人原因而投入十倍的热情。所谓的个人原因,对她来说,是犹太血统,它把她逐出了意大利社会,所以她更严肃地评价社会的缺点。对我来说,则是与同伴们格格不入的情感。我的批评精神,敏锐地针对任何社会建制,把国家政要和著名作家都打发到同样的怀疑中。这种边缘者的团结一致,巩固了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在乔瓦娜的不知不觉中,因为我总是避免把作为她朋友的我的秘密告诉她。

我们一起聊天, 在一家装饰有奥地利湖光山色风景画的乳品商店后厅,或者在一家咖啡馆的仿皮漆布座上。跟其他的姑娘不同,她喝饮料的时候,从来不在玻璃杯上留下口红印。温馨而又简单的谈话,所有的条件都得到满足——我们两家的社会差异, 乔瓦娜几乎为零的性吸引力——使我感到十分惬意。她没有丝毫的娇气,不想取悦他人,使我免除了调情中种种乏味的花样。然而,必须相信,即便是一个你跟她谈论拉夫卡迪奥的无动机行为[2]和列奥纳多的秃鹫[3]的女大学生,也会对一个普通的女打字员表现出嫉妒,尽管你只是带她到动物园,去看原先关羊驼的笼子中的母鸡。我们那种位于伟大诗人和深沉哲学家的运星照耀下的友谊,从那一天起,就开始走下坡了,因为,那一天,她撞见我耀武扬威地骑着自行车,把金头发的内丽娜带在我的双膝之间。

① 洛特雷阿蒙(1846—1870),法国作家。

② 拉夫卡迪奥是纪德的小说《梵蒂冈的地窖》中的人物,他做出了一些所谓"无动机行为",毫无缘由地在火车上杀死了一个人。

③ 列奥纳多指列奥纳多·达·芬奇。据弗洛伊德说,达·芬奇小时候曾梦见一只秃鹫啄咬他的喉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后来,他的一些画作中,都有秃鹫形象。

9

说到我对女性同伴的渴望，谁能猜出真正的原因，就算谁精明。通过证明我的男性能力而达到自我认可的无意识欲望？欺骗他人的诡计？“正常化”的真诚希望？对暴露真面目后引起后果的害怕？无论如何，应该说，时代令人赞叹地助了我一臂之力。今天，随着社会习俗的改变，我可能就会毫不迟疑地提供其他的证明，而不单单是从心里默默背诵偷偷从巴黎传来的保尔·艾吕雅[①]爱情诗中的这最后几行。

嘴唇分开
词儿出发
去历险

我对乔瓦娜喃喃念道，而她的嘴唇噘得圆圆的，含着一根吸管，好让她四分之一升圣培露矿泉水留上更长的时间。

没花多少钱，同时又不必冒险使自己闯得个晕头转向，我就轻而易举地献上了殷勤。一个姑娘很少在家里接待一个小伙子，而且绝不会在父母能够监视的白天时间之外。一道严厉的障碍把两种性别分隔开。除了握一下手，贴一下脸，禁止交换任何其他表示亲热的符号。乔瓦娜出生的家庭，还把古老的订婚仪式看得非常重要，她根本就不允许我拥抱她。无疑，她已经猜到，跟我在一起，就不会有什么激烈的进攻。那些后来爱上了我，并知道我为什么不能以相同方式报答她们的女人，确实很稀罕我，因为我不会让她们疲倦。最后，一个男人无私的友谊是不会说变就变的，就像荣誉法则对任何年轻或不太年轻的意大利人所要求的，他的追求既恳切，又纠缠不休！

---

① 保尔·艾吕雅(1895—1952)，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

还是回到二十岁时吧,我独自守着我的秘密,总担心我的女朋友之一会对我们的文学交流感到厌倦,转而追求别的献礼。而谈论电影女演员就没有这类危险。从我们家公寓,大众化的诺萨戴拉街 50 号的窗口,我侧身一探,就可以读到街对面雷克斯影院门旁墙上的海报,那家门票便宜的小电影院,每隔三天就上映一部新电影。

在这浮华名字的三个字母[①]后面,还可以隐约辨认出早先那个名称的斜体大写字母,尽管已从灰泥上刮掉,但还没有完全抹却:“红磨坊”这个法语名称倒是跟此地的寒酸更为相称。战前好几年,在阿契雷·斯塔拉切一个新的奇思怪想下,名称的代替就决定了。党的书记亲自列出了需要摈弃的外国名称的单子。报纸上禁止再写“帕诺拉玛”、“开司米”、“弗拉什”、“帕尔顿”、“西弗扑来”等外国词[②]。“斯坦达尔”商店被改成了“斯坦达”[③]。行动还扩展到了地名(库尔梅耶改为科尔梅奥尔,奥斯特河谷的圣文森特成了圣文钦佐)和人名:以其埃及式的魅力给自己的造型带来异国刺激性的大众女演员婉妲·俄塞里斯[④],拉丁化地衰退为芳妲·俄西里德[⑤]。要说我的朋友们把自己称做玛提亚斯(而不是玛提亚)和达尼艾尔(而不是达尼艾勒),那都是有原因的:有一天,当“伦敦”香烟来到烟草局,意大利化成了“翡冷翠”[⑥]时,年轻人终于表达了最后的反抗。

直到 30 年代末,好莱坞明星(报刊上要写成“星星”)像君王一样成了主宰。开始时是莉莉安·基什[⑦],她在观众心中唤醒了性虐待式的乐趣,来看对一个温柔而又无辜的牺牲者的迫害和折磨,随后是玛丽·璧克馥[⑧],有

---

① 雷克斯(三个字母为 REX)在拉丁文中有“国王”、“君主”、“首领”的意思。

② 这些词的意思分别是“全景”(panorama)、“羊毛衫”(cachemir)、“闪光灯”(flash)、“对不起”(pardon)、“请便”(s'il vous plaît)。

③ 意思都为“标准”,后者是意大利语化的拼写。以下的例子都是如此。

④ 婉妲·俄塞里斯(1905—),意大利女演员。

⑤ 俄塞里斯本来是古埃及主神之一的名字。

⑥ “翡冷翠”是“佛罗伦萨”的意大利语读音。

⑦ 莉莉安·基什(1893—1993),美国电影女演员。曾在一些经典影片中扮演一些天真无邪的人物。

⑧ 玛丽·璧克馥(1893—1979),美国电影女演员。

良心的年轻姑娘的既现代(因为它预示了女性主义的解放运动)又古老(人们在其中重新找到小红帽的神话)的典范,斗争到底,战胜对手。我跟亨里科、达尼艾尔和玛提亚斯,我们曾没完没了地讨论,想知道哪种类型的女人最值得我们欢喜。在我们眼中(内心的谨慎建议我,也让人家听听我的观点),这个问题要更为重要,远远更重要于问我们,在但丁和贝阿特丽丝的两次相遇之间,到底过去了多少年,想当年,在加尔瓦尼中学读书时,我们的意大利语教师总是吹毛求疵地拿这一类课堂练习来为难我们。后来,在赞波尼街上,提拉波斯科教授上的关于彼特拉克的大学课程,对我们又有什么重要的?劳拉的美丽,她那如黄金一般的秀发,以及她天使般的微笑[①],对我们又有什么重要的?我们不耐烦地等着时间来到,在雷克斯影院准时降临的黑暗中,在十来个燃烧着的香烟头的微光中,欣赏这个或那个新女明星,玛提亚斯和亨里科差点儿动起手来,为了她们,玛琳·黛德丽和葛丽泰·嘉宝[②]。

截然分明的两大阵营,每一方都大肆攻击和贬低对方的信念,这一对立始终刺激着意大利的外省生活。在中世纪,你不是教皇派,就是皇帝派。在佛罗伦萨,你必须在黑衣党和白衣党之间做出抉择,就如同在维罗纳,你不属于蒙太古家族,便属于凯普莱特家族。在今天,梅尔古提奥家的人[③]为足球、自行车或歌剧而残杀。巴尔塔蒂和科毕[④]之间的对抗在许多家庭中制造了不和。卡拉斯的崇拜者把苔巴尔迪的追星族[⑤]推下威尼斯的一条运河中。菲亚特小型500和600车在大众阶层中赢得的垄断(菲亚特的众多恶行之一),使摩托车这一活泼泼的源泉在乡村枯竭,而当年,这股车流倒是热热闹闹地奔腾在公路上,尽管酷爱朗布

① 贝阿特丽丝是但丁的心中人,劳拉是彼特拉克的心中人。

② 玛琳·黛德丽(1901—1992),德国裔美国电影女演员。葛丽泰·嘉宝(1905—1990),瑞典裔美国电影女演员。

③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梅尔古提奥是蒙太古家族的长子,而凯普莱特家族则跟蒙太古家族有世仇。

④ 基诺·巴尔塔蒂(1914—2000)和福·科毕(1919—1960)都是意大利自行车运动员,多次获环法赛、环意赛、世锦赛的冠军。

⑤ 卡拉斯(1923—1977),著名歌剧女演员。苔巴尔迪(1922—2004),意大利歌剧女演员。

莱塔牌的人拼命鼓吹,他们的引擎比胡蜂牌[1]不平衡的旁侧发动机更加优越,还赌咒说,要叫他们把这机械噪音太大的胡蜂咽下嗓子眼去。

玛提亚斯和达尼艾尔火一般热烈地支持嘉宝，亨里科则支持黛德丽。1938年2月,当嘉宝访问意大利时,争吵爆发了。她是跟乐队指挥列奥坡德·斯托科夫斯基[2]一起来访的。他们没有在那不勒斯逗留（但是,在那时候,有哪一个旅行者会不犯这样的错误呢？),而是在拉韦罗租了钦布罗内别墅，离瓦格纳当年住过的宫殿只有几步之遥，六十年前,瓦格纳就住在附近写下了《帕西发尔》。"《帕西发尔》,希特勒在拜罗伊特时从中获得极大乐趣!"亨里科高声嚷道。为了拉我入伙,他请乔瓦娜作证,证明那个瑞典女人趣味糟糕:她不是对记者们声明,"克林索尔[3]的花园",以它的玫瑰花圃,就像瓦尔哈拉[4]一样芳香四溢,尽管那里没有鲜花仙女?为提防这些记者的鲁莽,三条"德国"牧羊犬和两个冲锋枪手日夜守卫在她住所的门口。

作为交换,玛提亚斯报告了一大堆有趣的新闻。首先是她的行李,本来只有一个凹凸不平的小手提箱,从中却掏出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简直是个百宝箱,据女仆说,有一套睡衣,一件游泳衣,一双蓝色的帆布鞋,好几副墨镜,两打瓶装果酱。另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晚上,在上楼去卧室之前,她要把餐厅中的盐和油扫荡一空。达尼艾尔剪下一张照片,是在帕埃斯图姆[5]用长焦镜头拍的:女明星坐在一条农庄板凳上,给一头母水牛挤奶。这个北欧农家女儿的简单与质朴。她,莱妮·里芬施塔尔[6]的一个模特儿?她,在她的踪迹中留下了纳粹色情主义的臭味?再看看另一位吧,他对我们说(对那位从柏林移民过去的帕拉蒙电影女明星,带着一种明显的不公正):黑色的丝袜,毛皮大衣,烟嘴,一个日耳曼女鬼的全套装备。

---

① 朗布莱塔和胡蜂是意大利的两种小型摩托车。

② 斯托科夫斯基(1882—1977),英国音乐家,指挥大师。

③ 克林索尔是瓦格纳歌剧《帕西发尔》中的主人公,是个妖术士。

④ 在日耳曼神话中,瓦尔哈拉是在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勇士们休息的地方。

⑤ 帕埃斯图姆是意大利一古城。

⑥ 莱妮·里芬施塔尔(1902—2003),德国电影女演员、制片人、摄影师、导演。

这一个的吊袜带,那一个的火枪手帽子:我的选择不取决于她们的行头。我选定了玛莱娜,由于亨里科的关系。不是出于算计,而是出于直觉。我对自己说,当然是悄悄地说,并不像我在这里写得那样干脆:"临摹其经历为大学生们津津乐道的人的趣味,将巩固你试图通过让人看到你跟内丽娜在一起而赢得的声誉。"玛提亚斯从事了古董商职业。达尼艾尔献身于绘画。亨里科,更为资产阶级化地,选择了医学:其中微妙的差别,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焦虑不安的我担心唤醒怀疑。我还猜到,疯狂地摆出蓝天使的步子[1],将为我提供一个男子气的证明,这样做,比起我承认更喜欢沙哑的嗓子,更喜欢线条坚毅的下巴和克丽丝蒂娜王后的男子化动作来[2],要更有说服力。她不是亲吻了她年轻的宫中女伴的嘴了吗?

还有,在这两个对手之间,角色分配的方式并不那么清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斗篷下,在玛丽娅·瓦莱夫斯卡的撑边女帽下,在玛格丽特·戈蒂埃的镶花边软帽下[3],嘉宝找到了她所有的女性魅力。黛德丽则相反,她越来越经常地表现为性反错:欣赏这位雌雄同体的维纳斯,身穿大礼服,头戴大礼帽,栖息在酒吧高凳上,这已经开始变得有些连累他人了。自从路易丝·布罗克斯在帕布斯特的《卢卢》中跟爱丽丝·罗伯兹脸贴脸地跳舞之后[4],无论是阿玛宗女战士,还是女同性恋者,电影都宽容她们了。总是女子同性恋的例子,但是,我却担心,如果我给这样的一些电影一种过于热烈的赞许,或许会暴露我的本性。在《西尔维亚·斯卡莱特》的前半部分中,凯瑟琳·赫伯恩[5]使我狂喜。当她剪去头发,披上一件戴马夹的男人衣服,并用一个蝴蝶领结把衬衣扣得紧紧时,我的微笑就凝固了。

---

① 蓝天使是罗马的一家男子同性恋酒吧,其中的迪斯科舞厅很热闹。

② 葛丽泰·嘉宝演过一部叫《克丽丝蒂娜女王》的电影(1933)。

③ 安娜·卡列尼娜、玛丽娅·瓦莱夫斯卡、玛格丽特·戈蒂埃都是嘉宝扮演的角色。

④ 乔·威·帕布斯特(1885—1967),德国新现实主义电影家。路易丝·布罗克斯(1906—1985),美国舞蹈家、无声电影演员。爱丽丝·罗伯兹(Alice Roberts,生年不详),电影演员。

⑤ 凯瑟琳·赫伯恩(1909—),美国电影和戏剧女演员。

我们就一切、就任何东西胡乱瞎争一气的癖好，并不妨碍我们像中了魔似的忍受形象的诗意。我们的争论停止于雷克斯影院的门口，只是回到了人行道上才继续下去。在电影院里头，我就什么都不再想了，不想政治，不想德国，也不想叫自己变得谨慎。为了增加影片的魔法，我们事先避免去看贴在影院门口的海报。在暖气过热的小厅的阴影中，香烟的烟雾就像礼拜堂中的熏香一样，缭绕在银幕前，而我们，怀着一颗颤抖的心，期待着电影的开始。一直要等到米高梅公司的狮子终于怒吼起来[①]，或者兰克公司的竞技者手中的木槌最后把锣敲响[②]，才能发现，今天晚上成为我们偶像的那位女演员叫什么名字。是嘉宝还是黛德丽，是赫伯恩还是哈维兰，是梅丽安·霍普金斯还是卡罗尔·伦巴德，是多萝西·拉穆尔还是贝姐·戴维斯，是琼·阿瑟还是琼·哈洛，是诺尔玛·希勒还是琼·克劳馥[③]：命定的和不真实的造物，在我看来，她们的诱惑根本就不是凭靠一种化妆与照明的特技，一个在电影拍摄棚中制作的产品，而是神秘与美本身在闪光。一旦她们转变为演员，活动在一个无法抓住的和光荣的世界之中，那些有血有肉的女人在我心中激起的任何陌远感，都变成了狂热的赞赏。我将会整夜整夜地待在扶手椅上，沉湎于那些散发出光芒的容貌，她们令我喜悦的基本王牌，就是她们属于一个神秘的星球，置身于一个我根本无法达及的地方。

因为战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文化自给策略切断了美国之路，我们便不得不满足于欣赏意大利的明星们。《呼啸山庄》中的梅尔·奥勃朗和《蝴蝶梦》中的琼·芳登[④]是出现在雷克斯银幕上最后的外国女人。在根据好莱坞电影复制的一些影片中，伊萨·米兰达、阿丽达·瓦利、玛丽娅·德尼、薇拉·卡尔米替代了她们的地位，努力模仿她们。然而我们觉得，她们总是还差那么一点劲！能对那些临时明星行使我们的批评权，真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机会。当她们摘下宽檐的毡帽，我们就玩着打赌，猜烫发师在她们闪着可疑光泽的鬈发上倒的脱色剂是什么牌子的。一个

---

① 米高梅公司曾经是美国最大的电影公司，它制作的影片一开始有狮子怒吼的形象。

② 兰克公司是一家英国电影公司，竞技者用木槌把锣敲响是该公司影片的开头画面。

③ 她们都是电影演员，在此不一一注明。

④ 梅尔·奥勃朗(1911—1979)，美国电影女演员。琼·芳登(1917—)，美国电影女演员。

机会,但同时也是一种幻灭。对于独立于美学退步之外的我,我再也不带着以往那种十足的幸福感去看这些影片,因为它们的女主人公不再被一片汪洋大海跟博洛尼亚分隔,当我走出电影院时,我很可能在大街上遇到她们。

1942年,随着《沉沦》,晴天响起了一声霹雳。一个叫卢基诺·维斯康蒂[1]的陌生人动摇了我们的思想习惯。一连两天,我们成功地观看了影片,第三天它却被查禁了。一个神甫在市政首领们和家庭保护委员会成员的护卫下,耀武扬威地从堂区驻地出来,来为被玷污的银幕洒圣水。想一想!一个失业者、一个往日的妓女和一个小饭铺老板之间的那种肮脏经历,给但丁和拉斐尔的祖国脸上抹了黑。每一个形象都引起丑闻。再没有任何对悲惨世界的伪装,再没有任何礼节上的面纱,会像那时候那样,为了在摩洛哥的荒漠中跟随外籍军团,让玛莱娜穿着高跟鞋从一辆罗尔斯高级轿车中走下来。在《沉沦》中,波河流域的一个被通奸的情人们弄得彻底垮台的巴丽拉,成了讨厌的丈夫的活棺材。作为对日常平庸生活的颂歌,《沉沦》第一次展现了穷困中的意大利:修车铺、低价小旅舍、木头长椅的三等车厢、加油站、星期六晚上在教室讲台上举办的唱歌比赛。克拉拉·卡拉梅[2],迄今为止还一直主演上流社会的角色,吊在家中白色电话上煲电话粥的多情女子,她在贝弗利希尔斯的别墅[3]为人们提供了范本,而现在却穿着粗布褂子,洗着流浪汉和酒鬼们的玻璃杯,而透过肮脏的方格子窗户,雨水落在三角洲泥泞的河岸上。

意大利帝国的这一迷茫形象,我们只能鼓掌欢迎。但是,要付的代价则很昂贵。维斯康蒂迫使我们有一种积极的、论战的举动。黑暗的咒语和麻痹的醉意结束了。我们中没有一人敢怀恋官方电影中的大理石柱子、豹皮、绣球花丛。社会文献而不是童话故事,手指上的冻疮绝非布切拉蒂[4]戒指,洗涤剂代替了小瓶的光韵牌香水,这些东西给了法西斯主义修辞学狠狠的一击。我们的热情因一种苦涩的失望而减弱:从诺萨

① 卢基诺·维斯康蒂(1906—1976),意大利电影导演。

② 克拉拉·卡拉梅(1909—1998),意大利电影女演员。

③ 喻指好莱坞,贝弗利希尔斯在洛杉矶市,是影视名流居住区。

④ 这是意大利著名的珠宝品牌。

戴拉街的小放映厅里，再也散发不出神秘的气息了。没有了奉献的神庙,雷克斯开始跟隔壁的鞋铺、乳品店有些相像了,我来到乳品店,把一枚里拉放在柜台上,换它一块奶油蛋糕吃。我猜想,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①]之后,第一批听到用意大利语唱弥撒的信徒,遭到了相似的打击:随着无法明白的拉丁语和外国词的消失，吸引他们去教堂的魔力也烟消云散了。理性上赢了,魔法上输了。

不到二十年后,我将拍摄我的第一部电影。谁比我更多地吸收了维斯康蒂的经验?我不是向世界显示了罗马郊区的麻风病了吗?经济飞跃发展的必胜主义的意大利,我不是揭露了它另一面的穷困了吗?饥寒交迫者、被剥削者在我身上看到了他们的电影家。斗争的电影反对逃避的电影,人们知道了我站在什么立场上。所以,我能毫无羞耻地向你承认,我看完《沉沦》后走出电影院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一种深深的不舒服,一想到,我所喜欢的银幕上的女人像是一些遥远而又魔幻的造物,将从她们的奥林匹亚山上下来(因为我明白,维斯康蒂推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运动),跟我一起喝酒,就像克拉拉·卡拉梅跟她的顾客喝酒,我就感到厌恶和忧虑。女演员的这种肉体化过程——照我朋友们的说法,是新电影的政变——在我看来像是一种直接针对我的进攻。看到女主人公在一个乏人的星期日晚上,面对着一盘面条睡着了,可能使我的公民责任感得到满足。在赛西尔·B.德米尔[②]的《克莱奥佩特拉》中,缭绕在克劳黛·考尔白[③]庄严古板的脸上的,是安息香的奇怪气味,而在此后的电影中,继之而来的,则是一种热气腾腾的布依托尼[④]调味汁的卫生气息。这不妨碍我的伙伴们发出的召集的叫声——“要女人,不再要偶像!”引起我一种极大的不悦。

---

①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指天主教会第21次普世会议,1962年举行,1965年结束。

② 赛西尔·B.德米尔(1881—1959),美国电影导演、制片人,善于拍摄大场面的戏。

③ 克劳黛·考尔白(1903—1996),法国裔的美国电影女明星。

④ 布依托尼是一种著名的通心粉品牌。

10

“哦！没什么可说的！假如我的天竺葵长得同样好的话！”当人们问起妈妈她二儿子的情况时，她除了这句话，就再也讲不出别的什么细节来了。她从卡萨尔萨带过来一大盆她最喜欢的花，却怎么也难以保护它们度过严寒的冬天，因为这里的冬天很冷，水管子里的水都会冻住。“基多？那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她以偏爱一个孩子的母亲们的那种盲目，重复着这一口头禅：我就是她偏爱的对象，她把满腔的柔情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我一人。

出于一种始终如一的好脾气，我弟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幼弟的次要角色，总是默然，听从召唤。饭菜中又少了一片火腿肉？他自己的那一片，于是他跑下三楼，到熟肉店去买。我的一个姨妈在博洛尼亚逗留之后要回卡萨尔萨了？他乖乖地扛起她的行李，一直送到火车站。上二年级时，他还在读蒙达多利[1]一个月连载两次的海盗小说，当然他也在开始偷偷地读兰波和洛尔卡的诗歌。我发现了他暗中的好奇心，在他的长枕头底下撞见了《彩图集》[2]，以及我自己的那本《茨冈人的八音节诗》，那是从我的书桌上拿走的。

基多十分健美、强壮，一年四季活跃在体育场上，心甘情愿地让我垄断了全部的母爱。众多的迹象都不足以让我们互相提防。

折磨着他内心的嫉妒，第一次表现为扎在我自行车两个轮胎上的两枚钉子。此前，我曾在饭桌上声明，要跟内丽娜一起去散步。家中楼梯下的小间用做了自行车库。就在我寻找手套——一双带兔毛的人造革连指手套——的当口，我看见基多露骨地从工具箱里抄起一把锤子，打

① 蒙达多利是意大利的一家出版社。

②《彩图集》是兰波的一部诗文集。

开了过道的门。他下楼,又上楼,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默不作声,严阵以待。五分钟后,当我闯进他的房间时,我首先发现了锤子,搁在小柜子上。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冲他喊道,他那固执的表情,比作案的物证更使我确信,我面前待着的,就是那个有罪的人。

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呆立在房间中央,等待着对他的惩罚。直拳击中肩膀,勾拳命中下巴。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上前一冲,一头就撞在他的胸口上。他晃了晃身子,后退一步,我扑到他身上,想掐住他,把他在地上结果了,但是,他的忍耐终于使我泄了劲。我最终推了他一把,把他搡倒在床上,我也跟着坐到了他身旁。

"白痴!你要是看上了我的单车,你尽管随时开口,问我借就是了。这可比把它的车胎弄瘪聪明多了!"

他摇了摇头。我被他的缄默惹恼,就在差点儿又要发作的当儿,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丝怀疑。

"我真蠢!"我大声嚷嚷起来,俯身朝向他,想把他搂在怀中。我全明白了!是……因为内丽娜,不是吗?我早该猜到了!

尽管我答应把我在女打字员身边的位置让给他,尽管我还说,如果她认为他太年轻,不愿意搭理他,我会替他说好话的,种种允诺仍不能把他哄好。他逃避我的目光,一脸漠然地盯着天花板瞧。

"好吧,"我说,有些理屈词穷,"为了证明我不抱怨你,我向你起誓,我什么都不会对妈妈说的,你就收场吧。"

"哦,我才不在乎她知不知道呢,"他结结巴巴地说,撑起了身子。

"她知道什么?"我有些发窘地问道,根本就没有想到,通过声明不向妈妈告他的状,我已经把他的企图化为乌有,他再也无法摆脱一个热心助人却没有个性色彩的好小伙子的俗定形象。

他以一种惊恐的目光看着我,然后,一下子又倒在枕头上,把脸埋在里头,放声大哭起来。

我继续着对他的误解,甚至在后来,离钉子事件有好一段时间了,他向我们宣布, 他的朋友艾尔梅斯·帕里尼幸运地出发去了乌克兰前线。当时,我们刚刚在饭桌上嘬完了带淤泥味的鲤鱼的鱼刺。

“闭嘴，讨厌鬼！”我母亲说，“你还不知道吗，俄罗斯的冬天是那么可怕，你要想不冻死，就得钻到死马肚子里去睡觉？”

“不要听信善良女子们的这些故事，基多乔！（这就是家庭饭桌上的笑话，不带恶意的玩笑。）事实是，一个意大利人，如果选择了跟德国人并肩作战，那他就是在为墨索里尼效劳。”

“艾尔梅斯是我的朋友。我不允许你……”他嘟嘟囔囔地说，更多地出于维护伙伴之情，而非对我评价的抗议。

他的神经似乎已受了刺激。为避免正面冒犯他，我满足于敲打桌上的漆布，好奇地想知道，一个洛尔加的崇拜者会如何评价佛朗哥的朋友们的帝国主义战争。他把我们大家巡视了一遍，然后开口回答我。

“如果你认为他有过错，那么你就错了。你们不知道他决定出发的动机。”

“可能是一种崇高的献身！跳上一节满是叛徒和奸贼的车厢！”我叫嚷起来，不愿再听我弟弟赞扬一个志愿入伍的人，我也好，他的母亲也好，我们可是从来没有给他上过反法西斯主义的课。

“他想以他的死来净化自己的祖国，”基多喃喃道，低下了脑袋。

惊诧万分的我跟妈妈交换了一个眼色，她示意我适可而止。基多眼睛死盯着酸奶瓶，又说了起来，颤抖的嗓音中，光明正大的挑战跟一种童稚的腼腆融为一体：

“艾尔梅斯不会再回来了，永远不会了。他是抱定牺牲精神入伍的。他将死在俄罗斯。他是出发去见死神的。他对我说过。他的死将拯救我们全体。这就像不服从将军的命令，偷偷离开军营，去炸毁敌军堡垒的火眼[①]。”

这种跟萨尔加里小说的比喻，在我们看来实在是太天真了，我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同时也许是为了缓和一下过于紧张的气氛。

“赶紧吃你们的苹果，我们在饭桌上待的时间太久了，”我母亲说，她对饭后还留在脏盘子前的习惯深恶痛绝，这种厌恶已经遗传给了我。

基多平时吃水果时习惯整个儿地啃着咬，这会儿却异常小心地削

① “火眼”应该是萨尔加里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起了苹果皮。果皮连绵不断地从刀口拖下,呈螺旋形。他竭力保持平静,但他的手背叛了他。任何东西都剥夺不了我的内疚,我不该以那种愚蠢的哄笑对待他那颤巍巍的信任。是不是值得每天都跟乔瓦娜讨论在死神柱廊下买下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与其批评我弟弟的政治幼稚,我还不如问自己,一个一直乖巧听话,但突然表现出莽撞性格的十六岁男孩追求的是什么目标(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首先,这是一个家庭叛逆行为,其次,第二症状更明显,是到哈尔科夫平原[2]的冰天雪地中做赎罪远征的梦想,是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献身和牺牲的幻想。

他为打开母爱的心灵之门而尝试的不同钥匙,全都断在了他的手指中。他的求援声,甚至没有一句被人听到。无论是流氓兮兮的小徒弟,还是英雄主义的候选人,人们全不拿他当一回事。他始终停留为"这乖乖宝,这可爱的基多乔",妈妈总觉得,每当她往他衣袋里塞上几个铜钱,让他去杂货铺买几块宝塔糖,她就已经很对得起他了。一种强烈的饥渴,渴望得到爱和对他自身价值的承认,使他在我们眼中被吞噬了:我们从各自的方便起见,坚持把他猜想为具有宁静的心灵和强壮的体魄的童子军。

由于担心他因艾尔梅斯入伍而产生的激动会将他径直引向法西斯主义,也怕他受学校的不良影响,我就尽可能把他带在身边。隆基教授委托我做一项工作,对博洛尼亚的历史性建筑"从罗曼式风格到哥特式风格的过渡"进行研究。在教堂内,基多更感兴趣的事,是细细打量前来祈祷的女中学生,或者觊觎她们头戴圆锥形帽子的小妹妹,而不是跟着我,抬头观察穹顶。我特别喜欢那四个小小的罗曼式教堂,它们一个镶嵌在另一个之中,构成了圣司提反教堂的复合群:全都矮矮的,玫瑰色的,简朴的,寂寞的,围绕着一个带有砖头柱子的修道院。没有别的,只有弯弯的曲线,圆圆的拱门,弓形的柱顶盘。令人心安的氛围,一种宁静涌入我的心田。

---

① 这两本都是弗洛伊德的著作。

② 哈尔科夫平原在乌克兰的东北部。

“瞧,基多。眼前的这个耶稣受难小礼拜堂,本身就建筑在一个圆形的平面上。你现在就站在它的圆心上,你的头顶正上方有一个半圆球形的穹顶,在你周围,到处都伸展出玫瑰色的柱子,它们都由半圆的拱腹相连接。这是博洛尼亚最古老的祭台间,是后来建筑的楷模,无论是民用建筑还是宗教建筑。你到城里去走一走吧:你就将发现,建筑家们是如何小心地避免任何阻挡视线的东西,中断的线条,切断的横梁,尖脊,曲拐。半圆形的连拱廊始终得到他们的偏爱。没有任何直角,至少直到法西斯主义风格出炉为止还没有, 而法西斯主义却愚蠢地模仿了希腊庙宇的方形列柱廊。”

“没错,”他说,很高兴给我带来了他的个人贡献,“体育场是按半圆形连拱廊的式样建筑的。游泳池也是,我现在可算想起来了! ”

但他忍住了一个哈欠,使劲地伸了一个懒腰,把我们为时一刻钟的室内考察的辛苦驱走,然后出门回到了街上。他说,熏香的气味令他恶心。回家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踢着空罐头玩,把妈妈劝他爱惜鞋子的话全然忘在脑后。也许他在艺术史方面表现出了更多的才华,使我在研究中不好再长期地跟他合作:因为我所从事的发现,远远地把我带向了风格研究之外。

在圣司提反教堂,在其他的罗曼式教堂,我感到信心十足。那些低矮的、圆圆的、熟悉的穹顶,就像母亲的一条温柔的胳膊,把她的孩子搂住,保护在自己怀中。它跟我在又高又严峻的哥特式中殿那咄咄逼人的阴暗中感到的,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印象。我很想知道,那么适应人和人的安全需要的半圆拱腹,为什么就让位给了新的建筑形式呢?我不无惊讶地得知了社会斗争在一种风格到另一种风格的过渡中扮演的角色。在当时刚刚创建的托钵僧修会,即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的影响下,哥特式建筑风格于 13 世纪进入了博洛尼亚。他们是一些没有钱,没有行李,脚穿拖鞋,身穿棕色粗呢教袍的僧侣,是农民和手艺匠的儿子。他们跟在俗的神职人员、出身贵族的高级教士和主教作斗争。那些大人物拼命维护自己的特权,同时也维护建筑上的传统,即罗曼式风格。

怎么办?采取什么立场?你将站在哪一方?你不可能同时心里向左转,而趣味上又回到过去。你必须积极支持哥特式。革命就这样造就了

多少的受骗者！为了社会进步这一必然学科，人们牺牲了幻想的神圣秩序。对于我，这是第一次机会，远在我跟共产党人的争执之前，思考历史的讽喻，它一手给予你的，又从另一只手要回去，它从来不会显得足够的慷慨大方，让你的幸福真正圆满。

哥特式风格拉长了教堂中的大柱子，把屋架抬高到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在侧道中增厚了神秘性，创造了那些孕育焦虑感和犯罪感的巨大空间。在半圆的拱腹上，在被称为摇篮——对童年摇篮的隐喻和回忆——的穹顶上，继之以尖拱肋，人们同样很有道理地把它叫做断拱肋。跟母亲的亲密关系中断了，合二为一的幸福被抢劫了。这儿子，被突然从完整的团圆之梦中拉开，脱出了他的窠臼，放逐到了世界上，不得不揉着眼睛离开洞穴。在高端穹顶威严的昏暗中，他依稀看到父亲那隐藏的可怕的脸。尖拱肋到底是什么，难道不是父亲高高扬起的眉毛吗？在圣佩特罗尼奥教堂，你不由自主地颤抖，你没有受到欢迎，却受到了审判。雄伟的中殿以它那黑暗的壮丽把你压垮。在这威武的厅堂底下，你只是一个等待惩罚的无限渺小之人。法则、威胁、畏惧从此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温柔的母性之手把天主教抛弃给了父亲不可阻挠的威力。

"我们的生活，"我刚才这样写道。杰那里埃罗，从基督到耶和华的这一回归，兴许只会给少数人，即我们这样的少数人，带来如此戏剧性的后果。当我说：我们这样的少数人，我并不仅仅在说我和我兄弟们的过去。我同样在说你，我敢把手放在火上说，眼下这一刻，你正惊叫着，准备中断阅读，跑到堂·米切雷那里去定下你结婚的日子。只要你愿意，你尽管否认这一显然性好了，我爱情的力量将成功地从你心中驱走谎言。总有一天，我将带你承认你的真实内心。显而易见，更聪明的办法，还是蒙住你的眼睛，别去看好几百年来镇压的恐怖，然后，向你展现今天已经普遍赢得的宽容。以如此的懦弱，我将永远不会成为同谋，即便是为了解除你令我绝望的抵抗。我需要的是战胜你，而不是骗你上当。你想我会认定你太胆怯，无法承受看到向你逼近的危险吗？跟朱塞皮娜在一起吧，假如你只担心你的安息！只要我心中还燃烧着这样一个希望，你读完我的故事后，还会对我宣布你的投降（却是过于晚的，因而是无谓的投降，杰那里埃罗！），我就恳切地期望，你选择我是因为了解个

中原由，而不是被骗人的诱惑所吸引。

假如要从头说起的话，你一定得知道，在中世纪，贵族阶级被大众力量所击败时，为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眼泪和鲜血的代价。通过在图书馆中寻找我撰写论文所需的资料，我发现了一些文献，它们精确地揭示了，在什么阶段，在什么情景下，我们遭遇了最初的刽子手。你兴许会说，不论是隆基教授，还是我的弟弟基多，全都不太可信，并不比我周围的任何其他人更可信。

尖拱肋和拱扶垛的胜利，就像七个世纪后镰刀和锤子的胜利，签署了我们的受惩。我们曾经拥抱了一项事业，它的胜利者把我们带上了他们的法庭。从 10 到 13 世纪，在罗曼时代，没有任何针对我们的诉讼迹象。圣保罗还没有接替上圣约翰。维罗尼卡的手巾[①]止住了摩西的愤怒。刑事法规？它们早先由第一个基督教皇帝狄奥多西[②]制定，但从未在西方的任何一地实行过。火刑，在查士丁尼的新律中，后来又在查理大帝[③]的法令中重新颁布，却不费正义之神一根火柴。人们讲到，于格·卡佩[④]去教堂的时候，发现门廊下有两个男人更多地屈从于自己的愿望，而不是上帝，便用他的王袍把他们遮盖起来。他跪在祭坛前，祈祷的时间比平日更长，也许是在恳求上帝原谅他们，他显然给他们留足了时间，得以在警察来到之前从容溜走。

迫害开始于 13 世纪末，伴随着多明我会修士的传教，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在何等令人沮丧的征兆下，我发现自己诞生了！你想象一下，博洛尼亚是多明我·德·古斯曼[⑤]最喜欢的城市。这个狂热的西班牙人停留于此，并居留下来，在葡萄园的圣尼古拉教堂召开了修会的前两

---

① 维罗尼卡是基督教传说中的一个犹太女人，她看见耶稣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刑场，便用自己的手帕给耶稣擦脸上的血汗，手帕上从此印有耶稣的面容。

② 狄奥多西一世(约 346—395)，又译为狄奥西亚一世，是罗马帝国皇帝(379—395 年在位)。

③ 查士丁尼(483—565)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皇帝(526—565 年在位)。查理大帝(742—814)是法兰克人的皇帝(768—814 年在位)。

④ 于格·卡佩(941—996)，法兰西公爵，后成为国王，他开创了卡佩王朝。

⑤ 多明我·德·古斯曼，即圣多明我(1170—1221)，布道兄弟会即多明我会的创立者，死于博洛尼亚。

次会议,并为离我从小长大的街道不远的一处修道院奠定了基石。他是在博洛尼亚染上了重感冒死去的。一开始,他被埋葬在圣尼古拉教堂自己的地下,按照他的遗愿,就在一块普通的石板下,可以被他兄弟们的拖鞋踩在上面,后来,因前来瞻仰的人太多,原先的教堂变得太小了,当人们在教堂原址上重建起一座新的大教堂,并且这一次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由教皇本人出面题献给他时,他的遗体被装入一口豪华的棺材里,葬在全是大理石的陵墓中。头颅安放在一个雕镂的银制圣骨盒中,丝毫不比你的圣雅努阿留斯的遗骸盒逊色。对他坟墓和他遗骸的崇拜,日复一日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信徒,从基督教世界的天涯海角,来到这里朝拜。

这僧侣,以他的仁慈和他的贫穷,同时还以他的毫不妥协,给人留下了无法忘怀的回忆。他的弟子们记得,当他在祭坛上度过整整一夜时,他的呻吟声和哭叫声一直穿透围墙,传到他们睡觉的斗室。他们继续着他的业绩,忠诚执行他的命令。他们在全欧洲传播压制和独裁。Domini canes[①]:上帝的狗。上界治安领域中最凶狠的警察。尽管出身卑微,我再提醒你一下。他们的父辈在乡村铁匠铺的砧子上打铁,或者在山腰小径中推车。这些人民的儿子,亲爱的杰那里埃罗,首先把我们告上法庭,首先把我们送上火刑堆。摩西五书[②]的弃绝者,人们还以为他们已经淹没在马利亚-抹大拉[③]的熏香中了,没想到又打击我们,就好像福音书从来没有传播过。我们的差别就像是一种异端,我们的爱,一种罪孽。人们为使火刑变得芳香而扔到火堆中的茴香,都粘在了我的皮肤上:茴香[④]。我那么多次在报刊上或者在我电影的首映仪式上被人咒骂的,正是这一罪名。茴香,把我们拖入泥淖的经典谩骂。今天使用它的那些人,是不是知道,这一瓜果的隐喻可以上溯到那样一个时代,人们选用真正的蔬菜,作为他们喷香的燃料,在我们的脚下点燃刑火?罗曼式母亲在浓烟和火焰中朝我们微笑,但是,哥特式父亲则监护着柴薪的补给。

---

① 拉丁语,意即"上帝的狗"。

② 摩西五书指《圣经·旧约》中的前五卷。

③ 马利亚-抹大拉是《圣经·新约》中的人物,拉撒路和马大的妹妹。

④ 原文为意大利语,以下同。

11

经过了这几番我特意不向他透露的深思熟虑之后，我很高兴地看到，我弟弟在大街上总是回头瞧所有那些姑娘，并非出于拉丁式的虚张声势，而是出于已然十分明显的对异性的倾慕。从这一时代起，我就把我的命运看成一种秘密旅行，在敌人布下的密密麻麻的陷阱之间潜行；因此，当我看到，基多不像我那样头顶上落下一声声诅咒，而是能在最好的条件下开始成功地追逐幸福，我的内心十分欣喜(而全然不知他作为儿子和弟弟的痛苦)。

对我母亲而言，也是同样，我暗自庆幸，基多终于走上了一条跟我如此不同的道路。我跟女性有什么来往，家里人看得一清二楚。妈妈的反应在前后两个阶段中截然不同。开始时，嫉妒。当然，既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眼泪汪汪。她的情感实在过于细腻，看不出什么反对的迹象，她也根本不问我任何问题。但是，比方说，当内丽娜一直送我到家门口时，我只要偷眼瞟一下四层楼上的窗户，就能从玻璃窗的缝隙中，瞥见一张纹丝不动的脸，紧贴在窗框后面。

只要我晚餐后又出家门，妈妈就会等着我归来。时间再晚，她都不会灰心，尽管这跟她在乡村的习惯正好相反，以前，当她洗完最后一把刀叉后，她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而现在，我回家后，见她坐在厨房的桌子前，身子笔挺，神情严肃，一针一线地缝补我的内衣。她一把拉过我，比平日更长久地亲吻我。如果我以为，她就以这一亲吻向我表示了她的宽恕，那我就实在太天真了。她脱口而出的一声欢呼，使我明白了她真正的目的。她试图根据留在我脸上的香水味，辨别出是哪一个敌手在这天晚上偷走了她的儿子。然而，只通过这种嗅闻的直觉(我想象，她正在竭力把这气味跟她在窗户后隐约瞥见的瞬间形象联系在一起)，也认不

出她们来，她只得恶狠狠地把所有讨我喜欢的女人都当做她个人的死敌。玛格丽塔公园引起她一种不可抑制的反感,她知道我的约会就在那里:一个个女人就在那个公园里炮制着阴谋,而其最终目的就是剥夺她。

然而,通过从我嘴里听到的彼此不同的各个名字,通过折磨着她嗅觉的众多猜测,通过她微妙的母性本能,她很快就发现了我所有那些征服的短暂命运。弗萝拉接替了玖丽娅娜，阿丝特丽德又接替了西尔瓦娜:没完没了的一队长列。而把我生出来,喂我奶吃,给我摇摇篮,在我患百日咳时悉心照料我，当我得肺炎后日夜看护我的，却只有她一个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我生命中占有一个固定、神圣的位子,在辉煌宝座上的圣母和女王,对儿子来说,她才真正是不可或缺的,同样不可或缺的还有她为儿子做的汤面,每当她听到儿子的脚步在楼梯中响起来时,她手中的面条就该下到热腾腾的沸水中了。

就这样,她开始把我所有的女同伴当做该烧死的牺牲;她希望没有任何一个博洛尼亚姑娘能逃脱这一献祭,这样想的时候,她的心中远没有感觉什么不快。被我选中并随之抛弃的姑娘人数越多,她自己的王权就越是显得辉煌。假如我的某个姨妈,以她那质朴的弗留利式的大实话告诉她,有人看见我常常跟内丽娜在一起,妈妈就假装皱起眉毛,摆出一副发愁的样子;但是,她会停下手中的缝补浆洗,掩住嘴,偷偷露出一丝满足的微笑:确信(而她也确实没有弄错),那女打字员对我的用处,只是我自行车上的一种补充点缀而已。

当我不再跟乔瓦娜一起出门时,她感到自己最终摆脱了危险。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危险的敌人,就是那一位!小学女教师,尽管很有学问,特别贪读小说,也自认为不是一个米兰大出版商的女儿的对手。她的失宠(这一次,我母亲的感觉实际上错了,她还以为我是主动跟那姑娘决裂的呢)得到了一声解脱般的叹息的致意。更何况,她还自豪地对自己说,B家族的一个姑娘，被她的儿子为她的荣耀而献祭在一个高高的祭坛上,这事情本身就具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性质。

不过,只要在她看来,我的婚姻仍是一种叛逆和一种背弃,她就得艰难地忍受老而无后。她拒绝看到我已经长大,但心中却很清楚,总有

一天我会远远地离开她，总有一天她会失去我，她唯一的希冀就是自己当上祖母，想象自己正在为新生的婴儿裹襁褓，宠爱他。怀中抱上一个小娃娃后，她将重新开始往昔的美妙经历，就像我当年完全属于她时那样。

一方面是嫉妒的欲望，要让我远离其他女人，另一方面，则是迫切的需要，要把她的柔情继续浇注在一个新的后代身上，如何调和这两者？天命早就解决了这个矛盾，给了她两个儿子，其中一个摆脱了女人的狡诈，会永远留在她的跟前，而另一个，作为儿子虽不那么珍贵，但作为家族繁衍者却不可或缺，他将提供孙儿孙女。正因如此，我根本就不打算让基多皈依于我的趣味，相反，却刻意不让他受到任何其他诱惑，以免他脱离走向未来婚姻生活的道路，而对妈妈的幸福来说，这种家庭生活的未来是那么的必要。

然而，我弟弟在一次短暂的佛罗伦萨之游回来后，对我讲了一段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经历，他的天真没有看出其中的恶意。当时，在塞尼奥里小广场上，他靠着雄伟的雕塑《大卫》的基座，吃着一个三明治。一个男人从自行车上下来，接着便也靠着雕塑席地坐在他旁边，从他鬓角上依然长满头发和他微微有些臃肿的身影来看，年龄大约有三十岁，他矮壮，肌肉发达，穿一条工装裤，一件高翻领羊毛衫。“你能给我一根香烟吗？”他开门见山地问我弟弟，我弟弟觉得他的腔调很是没礼貌。“我不抽烟。”讨烟的那一个愤怒地瞪了他一眼，骑上自己的车，朝桥[①]那边而去。

下午晚些时候，当基多在一个小广场的一条长椅上休息时，那男人又出现了。他坐到长椅的另一端，从衣兜里掏出一支很粗的雪茄点燃，然后喷出一股很难闻的浓烟(托斯卡尼可咒的烟味)，根本就不管风正好把烟刮到邻座跟前，我弟弟开始咳嗽起来，用手堵住了口鼻。基多对这放肆行为十分愤慨，尽管一大早起开始的旅行让他很疲劳，他还是立即起身，去寻找另一处避难所，但这时，他听到了一声粗鲁的叫唤。

“哎，小子！你可真不健谈！为什么不凑近来聊一聊？”

---

① 指佛罗伦萨著名的老桥。

基多的叙述停顿了一下,对我承认说,这些词语唤醒了他心中的怀疑,那是一个“唐突士”[①](他是这样说的)在跟他套近乎。但是,对方“男子汉”的外表又立即使他清醒过来。“同性恋者都是女里女气的、温文尔雅的、彬彬有礼的,”他天真地告诉我,而那个陌生人,却穿着污油斑斑的蓝色工作裤,抽几口烟后就朝地上吐痰。我弟弟还对自己说,一个不怀好意的“混蛋”一开始会装成好人。这种想法(比刚才那种更有说服力,尽管还不能为一个不那么幼稚的心灵提供一种更好的保证)终于使他平静下来。他在椅子上朝他靠近了半米。两个年轻姑娘经过了广场。那男人眼看着她们走远,用胳膊肘推推我弟弟,对他说,他从他的神情,从他发“c”音的方式中看出来,他不是在对一个“佛罗伦萨的小伙子”说话。他用下巴指着两个散步女郎的方向,并希望一个“机会”已经展现在了年轻而又可爱的旅游者面前。

心地单纯的基多,只会一个劲地摇脑袋。于是另一个又重新用一开始的粗野方式,对他肯定地说,任何一个配得上作为男人的男人,在他来到佛罗伦萨的第一天晚上,都应该搞上一个女人。

“你一定还没有找到女人吧? 我敢打赌。”

他拿一种无法解释的充满敌意的目光,打量着他旁边的这一位。

“我还很年轻,”我兄弟说,对自己很是愤怒,因为面对着那个继续用雪茄臭气熏染佛罗伦萨透明天空的人,他看来还在请求原谅。

他寻求一种报复,大胆地嘲笑他,确信他将承认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因为只有在爱情方面遭受挫折的人,他以为,才会这样对待在公共场所遇上的第一个人。)

“但是您,毫无疑问,某个美人儿不是正在家里等着您吗?”

“你以为什么呢?”那个抽托斯卡尼雪茄的人一下子跳将起来,叫嚷道,就像被一条蛇咬了一口。“你以为,我需要一个你这样的小毛孩来教训我吗? 再过一个月,我就要结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在你提出那么愚蠢的问题之前,你给我好好记住这一点。我出来恰恰是为了去登记结婚的。”

---

① 原文为“tantouse”,意为“同性恋者”。

说完这话，他迈开步子，狂怒地走远了。“小毛孩”像个木偶似的留在原来的座位上，问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被这混杂着亲切感、粗野劲、高傲气和多动癖的新鲜事惊呆了。

“一个傻瓜，”我对基多说。我根本就不会把真相告诉我弟弟，以他十七岁的青春年华，以他那被运动场的阳光晒得古铜色的漂亮脸蛋，他扰动了那男人的心，使他在手足无措之中，编排出一篇喜剧性的关于结婚计划的炫耀之词。喜剧性，是的，按照此类闹剧所有插曲的样子。永恒的三幕闹剧：你讨我喜欢，我推开你，我恨你因为你讨我喜欢。吸引、排斥和藐视。但是，一出闹剧也会转变为悲剧，假如那个自愿上了你的汽车，心甘情愿地跟着你在依德罗斯卡罗[①]的棚屋之间转悠的人，为了惩罚自己的“弱点”，为了替他的“名誉”复仇，为了找回他给自己创造的形象，用一根从栅栏中抽出的木桩刺穿你的肋骨。

以所有那些被我像揭穿假面具那样揭穿了男人气质的意大利人的名义，一个伸张正义者从人民中间走出来（是佩罗西[②]，或者是另一个，他们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肩负着一个不妨可以称为礼仪性的使命，通过刺杀冒犯者，来重新建立他们的本体感。婚姻的驱魔之咒，在佛罗伦萨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拯救了我弟弟的盯梢者，却没能提供给杀我的人：他不得不，为了这一理由本身，动手杀人。

在1942年，要是有人向我预告，说有朝一日我的人身安全将有危险，我会耸一耸肩膀了事。为了祝愿基多有一种不同于我的生活，我只需强调我的谨慎和我的软弱就成。我甚至亵渎了诗歌本身，在我的第一个集子上发表了一些极其谨小慎微的诗句。7月14日，我们，亨里科，玛提亚斯，达尼艾尔和我，以美美的一顿火腿肉和朗布卢斯科酒，庆祝了我们四本小册子在圣多明我广场5号的“马里奥·兰迪老书店”同时出版。我的小册子题为《诗歌》：十四首诗，薄薄的四十八页，发行了三百册，外加七十五册用于报刊宣传的非卖册。其中的一本非卖品正好落到

---

① 依德罗斯卡罗就在罗马西南的奥斯蒂亚滩岸上。本书主人公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最后就死在那里。这句话影射了主人公的最终命运。

② 皮诺·佩罗西，就是在1975年杀死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少年的名字。

了贾恩弗兰科·孔蒂尼[1]的桌子上。这位意大利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满怀好意地给我寄了一个明信片,答应给我写一个简评。

这一成功使我在同伴中间名声大振，却没有从我心中抹却对我那些小小叛逆的羞愧。我没有真诚地赞扬年轻小伙子的美,却求助于各种各样的婉转说法:大卫和耶稣在我的哀歌中跳舞,对死亡的预感被用做了那喀索斯[2]昏厥的遁词。孤独的乡野,纯洁的钟声,对小村庄中的星期日的哀怨连祷。诗句用弗留利方言写成,这一背景又为我脆弱的诗人之冠增添了几分亮彩，尽管跟官方语言抗争的政治意愿在我对方言的选择中并不起多大作用,如你所知,它甚至还比不上我跟我父亲的争执,以及把我艺术家的命运跟我的母语联系在一起的愿望。在每一页下面,我都用小号斜体字,添上了意大利语的译文;由此来把高傲的罗马流放到印刷和文化的地下,把被打败的安巴·阿拉基的盔甲、领章和其他的武装标志,像扔战利品一样,统统扔到妈妈所坐的宝座脚下。

但是,在我年轻的读者中,有谁能猜到,他们崇拜的是一个何等的怯懦者?怎么能够想象,那时候我已经写了一些犯忌的诗句,却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锁在抽屉里,只是要等到二十年之后,才能把它们拿出来与公众见面?

> 履行并重复生命中最温柔
> 的行动,直到流血。

一篇关于桑德罗·佩纳[3]的文章揭示了我怯懦的实质。桑德罗·佩纳,不知改悔的流浪人,胆怯地爱着穿工装裤的小学徒、获准休假的士兵、看门人的儿子、闲逛的小后生:他在一些短诗中为自己涂脂抹粉,诗中回荡着一颗自由的心那喜悦的声音。

> 我找到了他,我的小天使,
> 在一个可疑的花坛。

---

① 贾恩弗兰科·孔蒂尼(1912—1990),意大利文学批评家。

② 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为爱恋上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憔悴而死。

③ 桑德罗·佩纳(1906—1977),意大利诗人。

公共汽车的线路真长。
一个粗鲁的面包店小伙计一时间里答应,
然后又拒绝给出他一点点温柔的优雅。

我从燃烧的山岭上下到
火车站新的公共小便池。

这些在书报检查官眼皮底下漏网的诗句证明，只要付出一点点勇气,就可以使他们变成睁眼瞎。既没有暗中偷偷的哆嗦,也没有明火执仗的冒犯:自我协调地生活的纯粹享福,不向任何人掩盖自己。方济各修会式的轻松、光明和温柔。正义者平静的胆量。我的心被一段如泣如诉的诠释撕裂。"如果说,被掩盖的人类痛苦的一份重量,还压着这些空气般轻灵的诗句,那么,它那诗意的高贵却是无可争辩的,它的非道德性并不能证明它的不对。我还需要通过一种基督教的负疚情感,来证明那一位使希腊神明阳光般的纯洁复活的人吗？"

杰那里埃罗,我是多么羞愧难言,竟敢以一个有罪之人的种种悲伤特征,来展现那个人,那个对摩西和圣保罗的宗教压根就一点也不了解的人。即便,当我讨厌了把脑袋藏在口袋中生活,在某一天高举起造反的旗帜时,你也不应该过高地估计我的实际价值。谁会造反,除了奴隶还会有谁?当贵族老爷们证明不了自己的出身时,他们也永远不会举旗造反,揭竿起义。作为贵族,只有一个人在我们的世纪中闪耀着光芒:他,桑德罗·佩纳,他在翁布里亚山岭之间的佩鲁贾长大,他在罗马的家门向阿猫阿狗阿飞流氓开放,而就在不久前,死神来到他的梦中拜访了他。七十一岁,拖欠了二十四个月房租,三大纸箱卖不掉的诗歌摞在地毯上,五十个空奶瓶搁在厨房的大木箱中,而在他卧室的墙上,挂着装扮成薛吕班的玛丽布兰[1]的画像。

由于我们,亨里科,玛提亚斯,达尼艾尔和我(我为什么总是最先提到亨里科的名字呢？),没能像在玛格丽塔公园的小岛上设想的那样成功地

---

[1] 玛利亚·玛丽布兰(1808—1836),西班牙裔的法国女中音歌唱演员,因演唱《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而出名。1935年,贝内特根据她的生涯创作了歌剧《玛利亚·玛丽布兰》。薛吕班是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个角色。

创办杂志,我的文章就发表在青年意大利扈从团的文学月刊《塔米斯》上。一份法西斯刊物，我们希望通过在里头谈论一些与现行制度相对立的作家和画家,渗透到它里面去:波德莱尔、乔尔乔·莫兰迪[1],他画的酒瓶子让我们很开心,因为那不仅是在博洛尼亚画的,而且他静物画中这些不起眼的玻璃器皿让官方艺术的宏大结构泄气。在《塔米斯》的筛子上,漏过了我的几首得到神秘启迪的诗歌。比如大天使对隐士的这一声激励:“噢,圣者!没犯过错的人不是纯洁的。从洞穴中出来吧!穿越那阴暗的荒漠!承受住邪恶那温柔的美！”总是关于过错和堕落的这种令人生厌的话语。

1942年11月,我弟弟送我到火车站:我作为意大利代表团成员,去魏玛参加欧洲作家代表大会。我为什么屈从了纳粹的邀请？艾利奥·维托里尼[2],《在西西里的谈话》一书的年轻而又有名的作者,文学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旗手,也一路同行。基多不敢对我说什么。当他挥手向一行人致意时,我看到他目光中有一种谴责意味的忧愁神色。这场景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不到两年后,当我弟弟自己也登上一列火车时,当年的回忆肯定闪现在他的脑海中,当然,他不是去跟受戈培尔[3]委托的柏林知识分子聊天,而是到丛林中去跟弗留利的爱国者会合。他让我留在了车站的月台上,在我们跟妈妈一起避难的卡萨尔萨。

从德国归来后,我在《塔米斯》上发表了一篇赞扬作家代表大会的文章,人们实在过于软弱,没有阻止我在那里丢脸。我写道,尽管大会政治宣传的目的十分明显，欧洲青年依然就西方文学的未来,交换了各种不同的意见,等等。墨索里尼最漂亮的墨水,由民族主义的鹅毛笔堆积成了连篇的谎言。这一次,基多——我在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中把他养大,我向他援引隆基教授的例子,作为一个毫不妥协的榜样——实在是太光明正大了,无法对我隐瞒他的指责。他把文章扔到我床上,在那些有问题的句子底下画了红线,那一条条红线像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让我不得不正视这些句子:“假如人们猜

---

① 乔治·莫兰迪(1890—1964),意大利博洛尼亚画家。

② 艾利奥·维托里尼(1908—1966),意大利小说家、评论家。《在西西里的谈话》(1941)是他的代表作。

③ 戈培尔(1897—1945),德国政客,希特勒手下的宣传部长。

想目前法国的沉默是决定性的，那么，欧洲的文化霸权应该归于谁呢，难道不是我们吗？……乐观主义促使我们认为，意大利文化超过了其他文化……在一个不远的将来，我们有望成为唯一手中掌握着文化的人，就是说，拥有欧洲精神的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也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自命不凡的废话，我根本就不可能真的相信它。德国军队已经围困了莫斯科，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自从我再也不敢去游泳池，不敢瞧达尼艾尔淋浴时的裸体之后，我就对自己极为不满，我必须小瞧自己到极点。是的，如果说我把自己降低到自吹自擂的这一地步，那是出于一种隐隐的欲望，为了使我自己在我的弟弟、我的伙伴以及所有那些其蔑视会让我难堪的人心目中丧失价值。只有一个寻求自我惩罚、惩罚自己在私生活中作为懦弱者的青年，才会犯下（但这不是一个抱歉）一个如此无耻的奴颜婢膝的公开行为。

我感到松弛和幸福的那些瞬间：从我的出版商马里奥·兰迪的书店里出来后，我喜欢绕到广场的另一侧，在大教堂中，我走近圣多明我的坟墓，我发现，在那里的祭坛的左右两侧，在陵墓的甬道上，有两个大理石的天使。他们的姿势（单膝跪地，另一膝上支撑着一个枝形大烛台）、服装（一件宽大多褶的衣袍把他们一直裹到脚面）、翅膀全都完美地对称着。不过，相似处也就到此为止。左边的那个天使吐露——原谅这里的陈词滥调——出一种“天堂的甜美”：柔软光滑的长头发，竖琴手一样细长的指头，半闭的眼皮，女子般的雅致，沉思中的举止。他怀着敬意和神秘举着枝形大烛台。这是古典的天使，带有理想的美，假如维斯康蒂能让他从基座上下来，就可以把这位两性人打发到威尼斯的河岸上，当着沐浴旅馆[①]顾客们的面，扮演诱惑者的角色。

我久久地待着，贪婪地瞧着他，可能也感化了修道院中善良的嬷嬷们，她们纷纷来到祭坛后面，借口来看大蜡烛是不是还在燃着。假如她们能读懂我的心，就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了。圣多明我本人或许会赞

① 这是威尼斯的一家高级旅馆。

同我,我,先于保罗六世[①]的著名通谕三十四年,在一个石头的形象上,转移了我从未经历过的激情。谁知道,我们种族的第一个迫害者有没有故意派遣这位信使到我的道路上,教我保护我的"趋向"不受任何有罪的"实践"影响?对倾向,可以,对活动,不行,就像约翰-保罗二世对美洲的大主教们一再肯定的那样。以对一尊雕像的爱,来回报我在博洛尼亚度过的那些岁月的圣洁,这不会搅乱我的良心。

我跪在这个纯洁的天使面前,就这样把自己献给了精神升华的暧昧的甘美,这时候,修女们白色的衣袍来来往往地蹭到我,同时,她们温柔地向我点头致意。幸亏,要想搞乱我心灵中的天堂战略和拯救计划也不难,在祭坛另一侧,有第二个长了翅膀的来访者落入我的视野。这一位,非但没有激励我进入到超凡入圣的想象的天堂,反而像一帖兴奋剂,为我灌输了他富有战斗精神的、贪婪的活力。

真是奇怪的模特,跟画家们和雕塑家们的整个传统相反,只有米开朗琪罗选择了他!他像是在一个大众街区可以看到的某个小学徒,给马儿钉铁掌时,把马蹄夹在两腿之间,或者,像一个小旅店中的伙计,正在地窖的通风窗前卸下酒桶。短短的鬈发,结实的胸脯,厚实的脊背,运动员一般的脖颈,饱满的脸颊,目光稳稳地正视着前方:更像是一个粗鲁的小工,而不像一个轻灵的天使,他是不是正等待着什么,准备朝前一跳,把他手中只有形状没有实质的枝形大烛台扔到地上?他让我想到的是你,现在我又一次回想起来:是的,在足球场边上的你,你衣服绷得紧紧的,把出界的球掷回场内,准备好投身于混战之中。肌肉发达,猛打猛冲,没有丝毫阴柔的神态。(这并不意味着,杰那里埃罗,命中注定只配去结婚!)

对我而言,从那一时代起,他就成了我的类别,显然是我的类别,远胜于另一类。一种比面对着性别可疑的年轻人更为强烈的诱惑。而它将很快地迫使我改变生存,把自己亮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的直觉这样对我说。对某种体格类型的兴趣,而不是我的勇敢,拯救了我。作为少年郎和

① 保罗六世(1897—1978),罗马教皇(1963—1978在位)。所谓的著名通谕,指1977年4月29日在梵蒂冈签署的《教皇保罗六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科根通谕》,实现了天主教教廷与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之间的和解。

青年郎的爱好者，我或许还一辈子保留了想入非非的倾向，想做出神秘莫测的事情，死死地追求某个柔弱的少年，就像维吉尔笔下的牧羊人追求他的阿莱克西斯①。

相反，当我仔细瞧了一阵右边的天使后，我走出大教堂时比一匹狼还更饥饿。面对这活跃的矫健者，我怎么能不感到柏拉图之爱的可笑呢？我一直跑向加尔瓦尼广场，跳上 11 路公共汽车直奔火车站。等待中的机会到最后总是在瓷器的建筑中找到，这建筑的名称，一般都认为是诗人桑德罗·佩纳给的，对它来说要比带有一个罗马皇帝名字的委婉说法更加合适。

这就是我在博洛尼亚某些历险的起源，历险很少，很短暂，很草率；还小心翼翼地瞒着我的同伴，同时也瞒着我母亲和我弟弟。从中我既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也没有得到极度的自豪；但至少我坚信了一点，即我不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

12

复活节的节庆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回博洛尼亚。妈妈把我们留在了卡萨尔萨，她想，在那里我们兴许能躲避轰炸。漫长的假期，我们，我的表弟里科（我的姨妈昂丽切塔的儿子）、切萨雷·波尔托多（一个博洛尼亚的移民朋友）、我弟弟和我，好好地利用了它，来勘探乡野，走访居住在各自农庄中的农民，在他们炉灶的角落采撷弗留利的口头文化传统，丰富我们有关他们方言的知识，学得一个与罗马的命运很不同的民族的细腻之处。

7 月 25 日晚上，宪兵队长发现我们正在教堂的墙上写标语：自由万

① 阿莱克西斯是维吉尔作品《牧歌》中的一个美少年，牧羊人科里东热烈地追求他，但他无动于衷。

岁。十四岁的里科扔下颜料罐,钻进了庄稼地。波尔托多的脸色刷的就白了,待在那里动弹不了。我手里握着刷子,准备逃跑。基多勇敢地迎着小军官走上去。那军官稍稍地扬了扬眉毛，为自己认出了他而感到惊讶。他只是十分宽厚地揪了一下基多的耳朵。我们只能搞到黑颜色,要是有红颜色的话,就能更痛快地庆贺墨索里尼的倒台了[①]。

除了倾翻在地的颜料罐,1943 年夏天还留给我另一个深刻形象:夜色中沿着铁路线的一片牧场，黑暗之中飞舞着的无数闪烁不定的萤火虫。从 9 月 1 日起,我就来到了比萨,被招去服兵役。停战第二天,德国人冲进了军营,把我们押上一列火车,送往布伦纳[②]。当列车开动时,天色早已经黑了,我们坐的是木结构的旧的三等车厢,卫兵们把包厢门都锁上了。车厢头里站着一个哨兵,看守车门。

列车不时地在荒野上停下来。我的邻座,一个南方人,脖子上挂了一个圆牌，上面有他母亲的照片。他还非要让我看镌刻在另一面的图案,那是一只背上驮着一座方尖碑的卡塔尼亚[③]大象。他是如何成功地拉下了车窗而没有引起卫兵的警觉?“快准备好,”他突然凑到我耳边说。我们的列车暂时停在了一片牧场上，远处有一些形状像阳伞的松树。我的同伴们正在包厢中昏昏的守夜灯光下打瞌睡,像是被带往陌生地的蓝幽幽的幽灵。为了克服睡意,我迫使我自己数着在面前飞舞的流萤: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它们一会儿熄灭,一会儿又亮起来,极不规则,就像天空中的星星。有一只在我看来比其他的要更大。我试图盯住它,把眼睛都看得发疼。

“快,”那西西里人低声冲我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求他带我一起逃跑。我见他把圆牌送到嘴唇上,将一个吻留在了母亲的形象上,伸手画了一个十字，就灵敏地跨过了窗门，身子落在了铁道旁满是积水的沟里。我也学着他的样子飞快地跳下,在他身后的沟里摔了个大马趴。列

① 1943 年 7 月 25 日,由于军事上失利和国内反法西斯运动高涨,墨索里尼被国王撤职,并被监禁在阿布鲁齐山大萨索峰顶。他后来被德军的伞兵救出,又出任“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总理。

② 这是奥地利的一个山口。

③ 卡塔尼亚是意大利一地名。

车已经开始启动。我们赶紧把脑袋扎进水里,生怕被站在车门铁镫子上的哨兵发现。

当我再次抬起脑袋时,我的第一个感觉不是冷,裹在湿透了的衣服中的身体并不觉得冷,也不是逃出虎口的幸福,而是眼前流萤那明灭悠忽的芭蕾的美妙。它们飞舞在透明的夜空中,彼此交换着神秘的符号,就在我的鼻子尖上。一阵阵海风拂过,青草叶在暗红色的背景中柔柔地倒下,又柔柔地挺立。我的伙伴脱下了上衣和裤子,拧干后又穿在身上。而我却依然沉醉在覆盖着牧场的那一场一闪一闪的舞蹈中。

“你没受伤吧?”他问我,蹲到了我身边,系着他的皮鞋带。“我们快走,因为,要是再有一列火车过来的话……”我们一直跑到树林边缘。高大的松树在我们头顶上摇晃着它们茂密的枝叶。

他对我说,我要是再穿着湿衣服就会着凉的。“先脱光了。”他的话简短有力,不太悦耳,跟他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把这个也脱了。”我差点儿问他为什么那么关心我,但是另一个问题,很愚蠢的问题,却从我嘴里冒了出来。

“你说,卡塔尼亚的大象,你戴着它有什么用?”

我停止了拧我的短裤,手指头指着他的圆牌。

“这是一个愿,”他凶巴巴地说。

好像这几个字要费他很大力气,他又叹了一口气补充道:

“我叫塔代奥。”

“好漂亮的名字,”我说。

一丝短暂的微光照亮了他昏暗的脸。然后,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来到我跟前,迅速地在我嘴上亲了一下,随即就掉转身子,迈开他那西西里人的短腿,大踏步朝树林奔去,消失在那里。

我没来得及穿衣服,光着身子就坐在了一棵松树下。我还记得当时我好几次拿手去摸我的嘴唇,然后再看我的手指头,想在上面读出这一举动的意义,我实在不明白怎么界定这个吻的意思。“塔代奥,”我低声重复道,心中一片惘然,“塔代奥。”我试图回想他的面貌:窄窄的脑门,浓浓的眉毛,又尖又长的翘下巴。“唔!”我对自己说,“确实,我从来没有去过比佛罗伦萨更靠南的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南方人的习惯。图里杜会

咬阿尔费奥老兄[1]的耳朵，来告诉他，他们将亮出刀子干一仗[2]。”

纬度的差别是不是也影响到了萤火虫的热情呢？在弗留利，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流萤群飞狂舞，也没见过它们发出那么亮的光。我本来会无休无止地沉醉在这一魅力中，忘记时间的流逝。一列火车，在二百米外朝北驶去，发出哀怨的汽笛声。像是塔代奥救我出来时的口哨声，它唤醒了我的危险意识。没有任何灯光照亮车厢，士兵们正在里面睡觉呢。当初，如若没有萤火虫赶走了我的睡意，塔代奥恐怕就会独自一人逃跑。这是我对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的那个西西里人的最后一个猜想。

假如，按照他偷偷摸摸的、并未彻底完成的行为，我今天猜测的没有错的话，那么，我倒是更希望，在他母亲将为他选择的妻子，与使他回想起他所许之愿的大教堂前的大象之间，他不会忧愁而又负疚地自忖，在他跟年轻陌生人一起逃跑的那个晚上，他最好还是把圆牌从脖子上摘下，扔到草丛中。

我几乎走了一百公里路，才敢坐上另一条线路上的另一列去往佛罗伦萨的火车。卡萨尔萨像欢迎英雄那样欢迎我的归来。只有基多对我说，那一声腔调跟他的用词同样晦涩：“我祝贺你成功逃亡。”我得知，在我不在期间，他曾好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去德国人在卡萨尔萨的军营中偷武器。他的一个朋友勒纳托，甚至还为此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

两个哨兵的死，被游击队杀死的，引来了第一次大搜捕。男人们全都逃到了田野里。里科和我爬上了教堂的钟楼。我们在我们的这一高高的栖架上度过了整整两天两夜。我带上了一个皮制公文包，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手稿和一部文学史的最后一卷。美国飞机袭击了火车站，扫射了军列。塔里亚门托河上的桥遭到了轰炸：钟楼摇晃了好几分钟。里科从枪眼洞里看着德国兵在广场上来来往往。我更喜欢感受危险的陶醉，或者兴冲冲地体味我在伟大的历史震撼中的孤独。我仅有的两个担心是：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图里杜是马斯卡尼的歌剧《乡村骑士》(1890)中的主人公，西西里的村民。阿尔费奥是图里杜以前的恋人萝拉现在的男友。最终图里杜在与阿尔费奥的决斗中败死。

一，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面包，可以一直坚持到德国人撤退，然后安全下撤？二，我所崇敬的皮兰德娄和斯韦沃[①]，只是在五十岁之后才有了声望。而邓南遮，这个江湖骗子，二十岁时就名声不凡。我希望自己能有声望，可是我，我还活得到五十岁吗？

在这四十八小时的围困期间，我兴许错过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在离地面八十英尺高的地方，就像法布利斯在布拉奈斯修道院的钟楼上[②]，我并没有体会到与世隔绝的天堂般的满足。

基多留在家里，跟女人们在一起。穿黑色制服的意大利兵赶来抓住了他。他仅仅来得及跟妈妈交代了几句话。他跳上法西斯分子的卡车那一刻，我们的外祖母跪在他们的头领面前，求他饶过这个年仅十八岁的男孩。他们用手枪顶在她弯拱的背上，把她赶回家中。暴徒们坚持把屋里屋外搜了一个遍，还不知羞耻地对躲在屋里哭的妈妈讲着一些甜言蜜语。直到她最后从抽屉中拿出我父亲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他们才走人了事，照片是在肯尼亚拍的，他身为奥斯塔公爵的军团中的一个军官。基多在被带走之前，给女人们发出了一个新的信号。在他房间的地板底下，她们发现了一些手榴弹，一些枪支和弹药，都是从军营仓库中偷来的。我根本不知道他还藏着这些东西。妈妈和我的姨妈们用了一天时间，把这些武器运出家里，扔到了一个粪水坑里。

三天之后，基多回到家里。他们严刑拷问了他。外祖母倒在床上一病不起。她挨了三个星期就死了。玖丽娅·扎科，科鲁西的寡妇，在她七十八岁时辞别人世。我为她做了一个临终面模。妈妈用绷带绑住她的脸，怕她的颌骨脱落。

美国人继续轰炸着卡萨尔萨的桥梁和铁路枢纽。坐火车去乌迪内已经变得非常危险：大人们也不再送孩子去学校了。我开设了一种私人课堂，给我的表弟表妹们，还有他们的朋友上课。正在一个邻村避难的乔瓦娜·B.来教拉丁语和希腊语。一个年轻的斯洛文尼亚女小提琴手，逃难在弗留利，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我们的学生学着自己写诗歌，

---

① 斯韦沃(1861—1928)，意大利小说家。

② 法布利斯是司汤达小说《巴玛修道院》中的主人公。

然后分小组在田野里唱这些诗歌，而薇玛·卡尔兹，则用小提琴为他们伴奏。编撰一本用弗留利方言写的历书，占据了课堂上的好大一部分时间。印出来的有最好的一些诗歌，还有当地历史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为避免我们在假期中分散难聚，我建立了“同盟会”，这是我们的学校实践的友情延续。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聚会，或是在我家，或者在我的某个学生或前学生的农庄。每个人都要当众朗读自己新写的诗句或散文，薇玛演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西班牙慢三步舞曲，大伙儿静静地听得发呆，都成了她的乡村崇拜者。然后我们讨论诗歌和语言，坚信大众化的伟大传统能在我们的方言创作中重新发扬光大。只有对那些堵起耳朵，不想听到火车站周围炸弹爆炸声的人来说，这个文学小团体的人才显得幼稚得头脑发热。

在我们临时改成课堂的饭厅里，摆着一些胖臌臌的家具，带有鲜花图案，漆成黑颜色，那是我父亲让他以前那个部队中的随军木匠做的。在学校中教课，还有同盟会的聚会，在我心中激荡起的幸福感是那么完美，只有一件事能稍稍扰乱它，那就是每个月从内罗毕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信的内容越来越贫乏，签名的字体越来越大。最初的那些明信片展现了维多利亚女王端坐在宝座上的形象，是她加冕的那一天画的。随后寄来的形象有乔治五世国王、贝尔福爵士、基钦纳，还有伯恩-琼斯画的吉卜林肖像[1]。后来，可能是被英军俘虏的那些官兵手中的名人头像存货告罄，也可能是被俘者想以一种跟他的处境更吻合的象征话语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他把他的“我一切都好”一会儿寄托给一条在罗道尔夫湖[2]的泥塘中打滚的鳄鱼，一会儿又寄托给肯尼亚的另一种猛兽。譬如这只褪尽了羽毛的秃鹫，衰落的父爱的雄辩形象。

“这就是我奴役中的同伴，这就是我每日的口粮！”他似乎在这样宣告。当一个黑人巫师化为一张蹩脚的图片，印得花花绿绿的，来到我们

---

① 这些人都是英国的名人，其中贝尔福爵士(1848—1930)是英国政治家，基钦纳(1850—1916)是英国陆军元帅，约·鲁·吉卜林(1865—1936)是作家。爱德华·伯恩-琼斯(1833—1898)是英国画家，他本人也是吉卜林的姨夫。

② 罗道尔夫湖在肯尼亚。

家时，我们从他那围着他的塔姆塔姆鼓团团乱转的身体上，从那条用鸵鸟羽毛编织而成、围着他乌木般油亮的腰身的缠腰布上，毫不犹豫地认定，这军官突然对土著产生了一种好奇心。不是他，当然不是，投身到了刚刚在由帕韦泽领导的都灵艾诺蒂出版社出的那些紫色封面的书中，而靠着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弗罗伯纽斯[1]，我很快就从这些书中汲取了促使我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非洲的兴趣的营养。我父亲可是满脑子的白种人优越感，他还特别夸耀过自己有一个不太确切的贵族头衔，尤因如此，他给我们寄来塔姆塔姆鼓和鸵鸟羽毛，只能出于一种迷狂。

每个月月初接到他新的信息时，妈妈总要浑身颤抖。战后，她的丈夫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回到她身边？他的签名占据的面积，证明了他原先的威风依然凛凛，但是，选择一只黑猩猩作为使节，表明了达隆答家[2]的这个军人后代的苦闷和自我蔑视到了何等程度。

比其他形象更让我震惊的，是被掀翻在一只老虎爪子底下的一个探险者。他的身体，我们只能看见脸和肩膀。其余部分都消失在了猛兽的肚子里，老虎已经吞下了从胸前撕下来的一条胳膊，正准备用利齿去咬另一条胳膊。那个年轻的冒险家，既没有昏过去，也没有被眼前的事吓倒，尽管他彻底意识到了他的命数已尽，他躺在那里，不像是一个面对死神已经呆僵的人，而是带着一种自愿献身给刽子手的牺牲者那温顺的高雅。老虎扯破了他的衣衫：可以看到，这青年人古铜色的赤裸肌肤充满了青春活力。

像往常一样，妈妈匆匆瞥了一眼草草涂在背后的那几个永恒不变的字后，就把明信片扔进了字纸篓。这一次，我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欲望的驱使，决定把这张明信片从垃圾中救出来。但是，我没有简单地求她把它留下，而是等妈妈走出房间后，像小偷一样把它抢到手，带回我自己的卧室，不让任何人看见。用一枚图钉钉在床头的墙上后，它就成了我的护身符：睡觉前，我向老虎作一番祈祷，让它把我抓在它的爪子

---

① 弗雷泽（1854—1941），英国人种学家，著有《金枝》等著作。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波兰裔的英国人种学家、考古学家。弗罗伯纽斯（1873—1938），德国人种学家、哲学家。

② “达隆答”(Dall'Onda)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是“波浪”的意思。

中,把我的肉体变成它的美餐。睡眠前的迷糊中,我想象自己身处一座热带森林中,在一只猛兽前飞奔逃命。并不是为了躲避它的利爪,更多地是为了通过逃跑来推迟我的投降,从而更加刺激起屈服时的快乐。我像那个探险者一样,最终跌倒在地,彻底放弃。噢!让这浑身有着漂亮斑纹的魔怪用獠牙把我叼住,咬碎在血盆大口中,吞进喉咙深处!

直到我离开卡萨尔萨的那一天,我始终都把这张明信片留在我的卧室中。我设想,我的父亲,这个发信者,在我每晚性幻觉之前的幻想世界中并不扮演任何角色,这样想兴许是一个标志,说明我心中存在着一种重大的邪念。难道不是他,远在千里之外的非洲,遥遥地支配着我夜间的胡思乱想?难道不是他,在我的血液中,灌注了饕餮的贪婪和有罪的屈从这混合而不可区分的两者?最后,在彼此混淆的暴力与幸福的一个唯一形象中,贪欲及其惩罚,在他的征兆下,到底施与了我什么呢?

13

薇玛·卡尔兹教会了我喜爱音乐,还有如何去喜欢它。她让我听收音机里贝多芬的许多交响曲。迄至那时为止,我在乐队的演奏中只欣赏人类情感的描绘或自然景色的浮现。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维瓦尔蒂的《四季》更美的了:用小提琴的拨奏,成功地隐射了冬天里一场淅淅沥沥的雨!用强有力的齐奏来转达春天里一场暴风雨的电闪与雷鸣!薇玛对我的热情莞尔一笑,随后,她用她那柔美而平静的嗓音,带一点点动人的外国口音,告诉了我欣赏这位威尼斯人才华的音乐上的理由,比如说,她教会了我认识到,模仿性和弦的效果是次要的,我必须特别地去关注调性的选择:E 大调,圆润而又嘹亮,给了春天,G 小调,焦虑而又忧郁,给了夏天;F 大调,那么粗犷的味道,适合秋天狩猎的场景;F 小调,如愿以偿地荒芜,是为冬季。或者关注使用乐器的方式:我有没有注意

到，在《春季》这一乐章中，对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取消，是如何使得一个四月的清晨变得如此清澈透明？或者，在《秋季》的柔板中，对弱音器的使用，是如何狡诈，令人联想到，参加葡萄丰收节的人在开怀畅饮之后，已经昏昏欲睡了？

毋庸置疑，这些微妙之处完全没有进到我的心中。我属于那样一种人，当他们在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中辨认出了那些熟悉的段落时，便会带着一种入门者的神态，频频点头，一会儿是小溪的潺潺细语，一会儿是杜鹃和鹌鹑的鸣啭，一会儿是农民们的舞蹈，一会儿又是暴风雨的震荡。把形象放到音符底下，这在刚刚入门的爱好者身上是一种最普通的误会。我特别为这一差错感到脸红，尤其是因为，罗贝托·隆基已经教过我们如何正确地看待绘画。能体现一幅绘画价值的，不是它的题材，而是线条与色彩的构建。同一道理，我的这位女朋友强调说，伟大的音乐只因音的聚合而存在。为什么要在仅仅只体现节奏与和谐的音乐里，一味地寻找心灵状态呢？为什么要让快板相当于一种快乐的爆发，缓慢的乐章相当于忧郁的愁雾呢？人们难道会自动地把某一种颜色跟某一种感情固定地联系到一起，红颜色与一种愤怒的冲动，蓝颜色与一种静心的欲望，绿颜色与一种对乡村的怀恋？

薇玛给我援引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作为脱离任何意义的音质结构的范例。但是，当我求她告诉我，当初，她为什么没有选一件像钢琴这样的乐器，因为在我看来，钢琴更有利于抽象的探索，而是选择了小提琴这样一件乐器，依我看，不管人们愿不愿意，小提琴都会直接拨动人们的心弦，而且倾向于表现一种狂躁的忧愁，听了我的问题，她好一阵子里一直一声不吭，随后，越发起劲地继续着她的解释。音乐，无论人们是用乐队，还是用钢琴或小提琴来演奏，也无论人们把它们改编为夜曲、随想曲、摇篮曲、船歌，都不表达别的，而仅仅表达它本身，姑娘向我这样重复道，带着一种隐隐的固执，这固执当然不一定是由我腼腆的异议——异议之后紧接着乖乖点头——招来的。她皱起眉头，盯着地面，仿佛在聚集全身的力量，准备拿出最后的论据，坚持到底。任何人换到我的位子上都会明白，她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斗争中抗争着。她最喜爱的那些曲目，明显戳穿了她话中的谎言。她为我演奏了

《爱之梦》[1]的小提琴改编曲:太具有甜蜜幻想的浪漫曲,她接着对我说:"糟糕的李斯特";而我,竟表示完全赞同她的意见,而根本就没意识到,她只是出于自豪感,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感情,才坚持这一观点。

奇特的回忆,那些漫长的夏日之夜。在给我们的学生放假之后,我带我的女朋友,来到我在卡萨尔萨附近一个小村庄维苏塔租的阁楼。我在阳台上放上两把秸秆编的椅子。在我们面前,渐渐昏暗的平原铺展开来,一直延伸到塔里亚门托河边上显出影影绰绰轮廓的小树丛。微风中,玉米田波浪一般起伏不停,一条长长的运河辉映着落日的最后一线光芒,在两排细长的杨柳树篱之间,突显出一条银白色的带子。另一边,西面,夕阳的光芒给海上飘来的乱云绣上了一圈紫色的边廓。相邻农庄中的孩子骑着自行车从坑坑洼洼的道路上回家,一筒子牛奶挂在车把子上。我们听到院子中水泵的吱咕吱咕声,母鸡被人掏了蛋,哗哗啦啦地拍打着翅膀,咯咯咯地叫着以示抗议,然后,一切复归于寂静。她从匣子中取出小提琴,为我演奏了她保留曲目中最温柔、最妩媚的段子,在每两段之间,都给我解释那些写在乐谱中的音符的价值。空脚的二分音符,圆圈的全音符,勾脚的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倍升号,三连音,琶音……我匆匆躲进了虚构,生怕不得不回复那一道热辣辣的目光,仗着天黑,她正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与此同时,她的弓在琴弦上上下翻飞。

为了不至于太被动,我连忙肯定地对薇玛说,文学也一样,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对纯粹之美的努力追求,而这种美是独立于道德内容之外的。我带着一种跟她颇有些相似的恶意,对她说,在我看来,没有一部小说比纪德的《背德者》构思得更妙,写得更好了。我刚刚读到这部小说,它真正的主题被巧妙地伪装了,并不是对所有读者都那么明显的,兴许对我也是如此。米歇尔的故事[2]对我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我只把它归于文笔的奇妙,但是,我在我所有的藏书中单单选了这一本借给这姑娘读,而不是另外的一本,这一事实就几乎说明,我以我

---

① 《爱之梦》是李斯特的夜曲,共三首,作于1847年,为钢琴独奏曲。

② 米歇尔是法国作家纪德的小说《背德者》中的主人公,他在旅居北非时,不顾患病的妻子的死活,与一个北非小男孩发生了同性恋。

的举动,在无意识地等待着,希望我们两人一天比一天更难堪的那个处境能有一条出路。无论如何,不管她愿不愿意,这一信息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薇玛明白了,我在借用那个年轻法国人在北非的经历,为自己摆脱一个无法大声转告给她的秘密。

她脸上堆着苦笑地把书还给了我,向我保证说,很长时间以来,她就猜到了我的意图。现在,她补充说,既然我剥夺了她最后的一丝幻想,我就不应该认为我还能指望她什么。相反,她感谢我的率直,这使我在她眼里越发弥足珍贵。所有的话全都低声地、迅速地说开了,丝毫不让我有时间表示赞同或反对。说话时,薇玛带着母爱般的柔情,抚摩着她的小提琴。当她说完后,她又抓起琴把,对着田野上正冉冉升起的月亮,演奏了一曲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缓缓的乐章慢慢地流泻在夜空中。

没有任何别的女朋友表现得如此细腻,如此慷慨,如此情谊浓厚。在我的半告白之后,她还迫使自己付出艰巨的努力,来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当我把学生们带到一个农庄的院子里,或者一个村庄的广场上,面对着惊讶地围观的农人们,在那里背诵诗歌时,她一直随同着我们。我们创作一种叫维罗塔的诗歌,四行短短的诗可以伴着舞蹈来吟唱,跳舞时双拳叉在胯上,轮换着一只脚从另一只脚上跳过去,我至少发明了这一步法, 好显示一下这些学生们的灵巧与优雅。这些快到青春期的少年,动作中充满了本能的和谐,而随着青春期的来到,这种和谐也将消失。我的口袋中总会捎来一些小礼物,以奖赏舞跳得最好的人:糖精做的糖果、弹弓、各种颜色的橡皮。只要他们嘴边还没有长出毛来,我就可以说,这些关注就是彻底公平的,看着他们在场地上舞蹈和扭动,有时候还有农民的孩子在学样子,我最多会问一下自己,这里头的哪一个,有朝一日会以某种超越了教育法上的好奇心,跟我的命运连接在一起。

很快地,他们中的一个以自身的才能吸引了我,即便在最激烈的跳跃中,他也能保持身体笔挺,脑袋不乱晃。他轮廓分明的嘴唇上,开始覆盖了一层金黄色的绒毛。他的姓,我从来没有在这一带听到过,仅它本身就足以把我迷惑住。单单一个音节,又冲又细腻,清亮的音像一株嫩苗儿那样迸射出来:斯温。但是,我克制着自己,猜虑着跟一个十三岁少年的情谊会有什么后果,我加倍小心地对待他,甚至不公正到了几乎冷

待他的地步。结果,他的另一个同伴总是获得比赛优胜者的奖品。斯温从他长长的眼睫毛中朝我投来一道失望的目光，然后轻轻摇晃了一下他金色的鬈发。他把书包的背带往肩上一搭,不等我发出解散的口令,就吹起口哨扭身走远了。等我最得意的学生走了之后,我便情不自禁地无精打采起来,就在这时候,薇玛为重新活跃小小班级的气氛,就抓起她的小提琴,带领大家伙跳起了狂热的圆圈舞。

她在我身边假装很高兴的样子,尽管这对她实际上是一种折磨,对比一下吧,我留给她的是一种漫不经心的礼貌,而对我的学生们却赏赐了无穷无尽的费心。但是,不要以为她是出于某种晦涩的受苦愿望(著名的女性受虐狂现象,你问到的第一位心理学家会急急忙忙地、支支吾吾地这样告诉你),在经历着脱胎换骨的锤炼。在演奏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那一晚之后,她就不再踏上我在维苏塔的小阁楼一步。我们在田野中央分手:她返回她的小村庄,我则走向我的书本。已经不能再求她演奏一次《爱之梦》了。她愿意分享我在学校的工作:但是,像一只夜蛾那样飞来我的灯下旋转并牺牲,这不可能,她不屈尊扮演这一角色。

我认可了薇玛中止我们之间的约会,尽管我很遗憾,她不再为我一个人表演那些个温柔的柔板，那音乐中的叹息已然跟我们心灵中的茫然与激情混成了一体(虽然我们对艺术非个性的观点有些分歧)。为什么她不彻底拒绝见我呢?玛瑟琳以为自己足够强大,可以防止我跟莫克蒂尔来往吗[①]?

当她告诉我她的理由时,我才如梦方醒。

“你已经二十三岁了,却还没有未婚妻。你可要注意那些流言飞语,它们都已传开了。让我们做得使别人相信我就是你的未婚妻。让我成为你的挡箭牌吧。”

就算我还能对一个女人感兴趣,除了薇玛,还有哪一个可以赢得我的爱呢?当她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时,我不得不扭过头去,不让她看到我的眼泪。那是宁静的薄暮时刻,教堂的晚钟响彻清纯的碧空。我们沿着一条夹在两行洋槐树之间的小路漫步而去。从来没有谎言受到这样

① 玛瑟琳是纪德小说的《背德者》中男主人公米歇尔的妻子,她的身体根本不合适在北非的气候中居住,后来病死。莫克蒂尔就是米歇尔所喜欢的那个北非少年。

动人的牺牲精神的启迪。我真想抓住这个姑娘的手,在上面盖满我的吻。薇玛(她常常戏弄我的多愁善感)断然剪除了彼此的柔情。她钻到两棵树之间,跳进甜菜地,冲我喊道,她抄一条近路走了,我们第二天再见。

她的奉献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从她嘴里得到的骇人听闻的消息,过了好一会儿才钻进我的脑子:尽管我时时处处小心谨慎,我的单身状态依然使我显得暧昧。人们在问,是不是应该用另一个名词来指称我的行为。弗留利,噢,我的天堂!诽谤与迫害之风第一次刮到了我的脸上。

几个月之后,战争终于结束,薇玛离开了我们,返回她的祖国。火车站上,她把脸凑给我亲吻,也凑给前来欢送她的十来个孩子。她的脑袋显得更圆了,一种更为成熟的意愿烙刻在她的脸上,现在,她不像在卡萨尔萨逗留的日子里那样,让头发披散在肩上,而是按照斯洛文尼亚的习惯,把它们梳成辫子,盘绕在头脑顶上。她细小而又脆弱的上身被框定在车厢的门窗中。直到这一时刻,我才注意到,她的音乐训练已把她的肩膀毁得是如何地不对称。她撞上了我的目光,便急忙抽身躲回她的包厢中。

从此,每当我听到小提琴的曲子,我就不可能不把这乐器发出的乐声跟我们在乡野中的漂泊联系在一起,尤其跟那个春天的夜晚,我被告知我不再得到庇护,我已经受到别人怀疑的那个春夜。

人们说,小提琴长期以来始终遭人蔑视。直到中世纪末期,人们总认为它太喧闹、太尖利,只配在小酒馆中伴人起舞,是吟游诗人和街头艺人的饭碗。要是没有茨冈女人,没有犹太人,它兴许就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因为很容易校音和携带,流亡异乡的民族接纳了它。外乡客和流浪者的乐器,它以委婉曲折而又悲哀动人的长乐句,鸣唱着逃亡者和流放者的永恒怨苦。

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偶遇,犹太人的这一忠诚同伴引我迈入了音乐的世界?究竟出于什么样的本能,我竟然对音乐一直无动于衷,直至后来听到它那常常破损而非快乐的召唤?钢琴的源泉更为广泛,但它似乎体现了舒适与安稳,管风琴的鸣响似乎从天而降,使教堂震颤,但钢琴也好,管风琴也好,一开始都没有诱惑我。我曾美滋滋地听着妈妈哼着古老的弗留利小调,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另外一种人类之声,一种不属于

她的声音,有朝一日会令我感动。歌剧在我看来是一种粗野的、漫画般的东西。小提琴则相反,一下子就征服了我,我这人,我的命运肯定要凭借那么多的关系,把我跟以色列的子孙的命运联结到一起。

被它的歌唱诱惑,不就是侧耳聆听大屠杀[1]的古老喧闹,听到被咒种族的幸免于难者趁着黑夜出逃,背上只负着从浩劫中抢出的唯一财产吗?小提琴兴许就是他们的资源和慰藉,而在我自己的苦难历程中,它就是我跟薇玛一起度过的那些幸福时刻的强心剂似的回忆。

14

很久以来,基多就决定进山去找游击队。1944 年 5 月的一个早上,他出发了。我本来还打算说服他留下来,跟我一起隐藏在维苏塔的阁楼中。谁若是注意到,他是以怎样的方式,在他的长裤兜里磨蹭着逃过了搜查的那把手枪,并用另一只手挠着他披散在脑门上的黑发绺,就像一个初领圣体的少年那鬈曲的鬓发,谁就会对自己说,对独裁的憎恨,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其他高尚的情感,甚至还有对他这十八岁的学生来说十分自然的夸张推理,都在为他更个性化的动机装点门面。像男人那样行事,抹去由这幼稚的小发鬈引起的小孩子样的迫切愿望,无疑占了很大成分;但它还远远比不上那样一种希望,希望以血的代价,获得一种自他诞生以来就始终求之不得的认可:在妈妈心中占据一个地位,即便不能跟我的地位同等,至少也要比她把他流放在那里的不起眼的边缘更重要。我甚至不排除这样的怀疑,即他已经想到了去死,把死当做帮他赢得那一份合法宠爱的唯一方法。噢!当然,是以混杂和隐晦的措辞,而不是以我使用的突然的形式。基多一次都没有尝试过说服我跟他一

① 这里的“大屠杀”一词是俄语,原指沙皇对犹太人的残暴屠杀,后也泛指种族大屠杀。

起走:这不太像是一种忽略,假如你想一想,对奥贝尔丹和皮萨卡内[1]的敌手来说,任何一个新战士都不会是多余的;相反,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忘却,只要你一想到,嫉妒的小弟弟总需要有一块与兄长对抗的园地,这一次,兄长被他成功地远远甩在了后头,无法跟他争夺战斗的荣耀和牺牲的光环。

我是唯一一个还能看穿真相的人,知道我弟弟是在虚张声势,但我也是最后一个能利用这种认识劝他放弃计划的人。他必须为自己的出发添加的神秘色彩,更加速了我们的分离。他赶到火车站,大声地问卖票的人,声音故意大到让在场的职工和旅客全能听见,他要买一张去博洛尼亚的票。买了票之后,他决定偷偷地登上去斯皮林堡的列车,他把我拉到车站的一幢小房子后面。一片空地,满地都是脏纸和碎瓦砾,用做了我们的告别场所。还有时间留住他吗?突然,他用他那清亮的男高音,唱起了堂卡洛斯和波萨在圣久斯托修道院中高歌的二重唱[2]。

上帝,你想在我们的灵魂中
注入爱情与希望,
敬请你在我们的心中
点燃生为自由人的欲望。

我犹豫了一会儿:上帝也好,歌剧的音乐也好,剧本的蹩脚诗句也好,在我看来,都不是跟一个亲爱者告别的最好办法。但是,有什么办法不回答他热辣辣的召唤?尤其是因为,侯爵的角色很适合我男中音的嗓子。

我们发誓要生在一起
死在一起……

我惊讶我在喃喃而吟。随后,齐唱时,我不再压抑我的嗓音:

① 古里叶尔莫·奥贝尔丹(1858—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主义者,曾试图刺杀奥地利皇帝,行刺未遂而被处决。卡尔罗·皮萨卡内(1818—1857),意大利革命党人。

② 这是意大利音乐家威尔第的歌剧《堂卡洛斯》最后一幕中的一段。

无论在地上还是在天上

你的仁慈都将使我们聚集一堂。

整段二重唱就此唱完,充满了兄弟情谊的山盟海誓,跟压迫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对我们平庸命运的蔑视,诸如此类的话语:我们表达了我们不带丝毫作弊能做到的所有一切,但它们隐藏了另一些东西,对这两个即兴歌唱家的个人未来而言更为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音乐展示戛然而止。去斯皮林堡的慢车,基多一直用眼角监视着的那一列,在铁轨上颠簸着启动了。他跑向车站,绕过小房子,在高高的人行通道旁跑上了道砟,然后跳上了最后一节车厢,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威尔第为两兄弟之间可能出现的最微妙的问题,提供了修辞学上一种优雅的解决法。

在基多离开卡萨尔萨之后,修辞学还在继续追他。它难道没有放松一刻它的遗命吗?假如我准备就他九个月的游击生活,叙说一些可怕的真相,那也该我倒霉。他参加了奥索波的旅,用的名字是艾尔梅斯,你一定记得,那是他的朋友帕里尼用过的名字,可惜这个朋友在俄罗斯的大荒原中失踪了。一个君主主义者,波拉,统帅着这个旅。旅!多大的一个称呼,用来指十四五个人,他们为了欺骗敌人,打出了十倍于实际人数的旗号,但他们不得不频频转移,在卡尔尼山岭中疲惫不堪地行军。

妈妈在 9 月份找到了他。道德至上,身体强壮,游击队员有严格的组织,给德国人以沉重打击。我还保留着一封他 10 月份来的信,署名是"阿玛丽亚",在信中,他用密码般的言语,叙述了他表面女性化的生活:预见不久就将下雪,为了使她能体体面面地参加冬季体育活动,我们应该给她寄去全套的装备,手套、带刺钉的靴子、羊毛内衣、还不算风雪帽和太阳镜。

德国陆军元帅凯塞林, 统帅着德国步兵、法西斯民团和俄罗斯逃兵,在 11 月发动了进攻。我弟弟和他的一个朋友,基诺,对一个哥萨克小分队作了整整一夜的抵抗。奥索波旅,政治上很温和(绝大多数成员加入了行动党,基多也注册在内),在乌迪内以北约二十公里处打响了战斗。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加里巴尔蒂旅,当时驻扎在附近地区。这两支

部队被人数多得多、装备也更精良的敌人缠住，于是签订了一份联合协议，然后就合并为加里巴尔蒂-奥索波师，服从于统一的领导。

铁托派来的一帮人，从边境的另一侧过来，也在上弗留利地区游荡，来散布贝尔格莱德的宣传，企图获取这一边疆省份的领土。元帅[①]向加里巴尔蒂-奥索波师建议，让他们编入斯洛文尼亚军队中。师长萨索，一个共产党人，有些犹豫不决。副师长波拉则竭力反对这一提议。当德国人在年底又发起攻势时，铁托的士兵毫不迟疑地赶来支援意大利爱国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战死或者被俘。在战斗师内部，共产党人对他们的同伴不断地施加压力，让他们从上衣的翻领上摘下三色徽章。压力！这么说其实只是一种委婉的外交辞令，要是你想一想，有一天，一个特派员竟把手枪都顶在了基多的脑门上。他也好，他的朋友们也好，谁都不听从这一要挟。他们高傲地回答，他们是在为意大利的旗帜而战，而不是在为红星而战。波拉的君主主义信仰(他忠诚而又勇敢，从不把这当成什么奥秘)为别人指责他背叛提供了一个借口，其他那些人也拒绝向我们的敌人铁托出卖一块国家领土。

鹅毛大雪飘落在波尔祖斯高原。波拉和他的参谋部设在被一个看林人遗弃的圆木棚屋中。波拉身材高大，瘦削，花白的头发剪成平顶，一皱起眉头来，两个眼睛之间便出现一条深深的竖纹，他不停地抽着一个镶银边的短烟斗。他的一切神经质，全都转移到了这个动作中，这种不带冒犯性的癖好使他平静下来，调整心态，以他始终沉稳的嗓音，下达命令，分配任务，研究形势，解决争端。他的话语不多，只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几句。他严于律己先于严于律人，可以相信手下人的绝对忠诚。爱他并服从他，都只是出于一种冲动。如果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行使他的权威，那就好了：那样的话，基多现在兴许还活在人间。我弟弟无意识地寻找一个“好”长官，想以他代替父亲的形象，结果在这位统帅身上找到了目标，为表示对他的忠诚，放弃了自卫的本能。

那天晚上，装烟斗之前，波拉问了一下，哨兵是不是守在岗位上。他脸上的肌肉突然抽搐起来，很奇怪。当他坐在一张铺满了地图和计划的

---

① 指铁托。

折叠小桌子后面,开始抽起烟来时,他的脸孔恢复了平常的镇静。在棚屋中忙碌的人,没有一个会猜到,他已经预感到了一种不同于他们习以为常的风险的危险。十几个游击队员在大锅前围成一圈,大锅吊在炉灶上,底下熊熊地燃着一堆火,松枝噼里啪啦地烧着。在这个下雪的黑夜,根本不用担心炊烟会被外面的人发现。然而,我弟弟坚持认为,首先必须得到指挥官的准许,才能点火。他的同志们早已等得迫不及待了,准备拿他们在横谷的溪流中捕到的鳟鱼,熬它一锅香喷喷的鱼汤,听了他的话,不免取笑他的胆怯。他赌气地退到一旁,忙着用一块破布擦他的枪,与此同时,其他人在七手八脚地忙着,准备把那些长着彩虹般艳丽鳞片的鱼从水桶里捞出来,活活地扔进沸水中。就在这当儿,他们听到树底下传来一阵口角声,那嗓音分明很陌生,基多第一个跳起脚,将枪口对准了门口。

波拉从地图中抬起脑袋。他嘴里还叼着烟斗,就示意我弟弟过去看看。这时候,大门砰的一下开了。冲进来五六个人,队员们立即认出来,来者是加里巴尔蒂旅的志愿兵,他们还恶狠狠地大声说,这不是欢迎朋友来访的方式。看起来像是头领的那个人递给波拉师长一封信,是他的上级萨索师长写的。其他人不满足于拿冲锋枪对着前面的人,一面把手指头压在扳机上,一面上下左右地打量着棚屋的角角落落。他们把挡在屋子两端的两扇窗户上的木板摘下来,打开窗扇,俯身观察着外边,让人捉摸不透,他们到底是在测量屋后山岭的高度,还是在向可能留在外面树林中的同伙发信号。无拘无束得令人发指,灵活敏捷得无可指责:被他们取下了窗板的窗户,在黑糊糊的树林中投下了一个个四四方方的亮块,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白亮,尽管,实际上,煤油灯和脂油蜡烛连手电筒那么亮的光芒都不能发出。

但是,除了狂怒不已的基多,还有那一天冷静得实在要命的波拉师长,围在炉火前的小伙子们并没有表现出别的什么担忧,他们只担心一点,唯恐新来的那些人跟他们分鱼汤喝,瞧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到时候怕是只会给他们留下一堆鱼刺。

师长读完了信,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基多,又低声地嘱咐了几句。我弟弟选了他的两个朋友,基诺(那个哥萨克)和切萨雷(因为他是博洛尼

亚人),把信叠好装进衣袋,放在烧酒[1]壶和带保险槽的尖刀之间,跟他们一起出门,钻入了黑夜中。

没有人能说清楚,后来,在四面圆木墙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毫无疑问,锅里的水没有时间沸腾了,鳟鱼也来不及离开水桶,因为,三个信使还没有朝山脊走出一公里路,就听到棚屋方向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枪声,几声嚎叫刚刚传出,又立即没了声响。基多和基诺正想返回去,切萨雷却还在犹豫,正在这时,他们看到跑来一个血淋淋的伤员,朝他们喊,让他们赶紧逃命:其他人都已经死了,波拉第一个被杀。基多飞奔回来,身后跟着基诺,心中尚存一丝渺茫的希望,想及时赶到,支援他的上级。切萨雷则留在原地没动,随时期待着新的动静传来。杀人者现在成了那地方的主人,满足于守株待兔,把那两个返回的朋友抓住,将他们的双手绑起来。他们认定没必要埋葬那些牺牲者,便把他们堆在棚屋里,然后放一把火烧了。然后,突击队带着两个俘虏迅速离开,转移了营地。

假如基多和基诺同意加入铁托的队伍,发誓放弃他们原来投身的事业,他们本来有可能保住性命。整整三天中,他们被逼着做出选择,要不,投奔真正的“爱国者”,要不,就去见识留给“叛徒”的下场。我弟弟用他带着铁链的双手,在胸前抚摩着他的前师长的烟斗,那是一个看守出于怜悯心,在他的要求下,从死者的嘴里拿下来后,塞在他上衣里侧衣袋中的。他的政治忠诚眼看就要衰退,或者他的自卫本能马上要唤醒他的妥协,但一接触到这个物件,这个曾是他无限崇敬的上司的心爱之物的烟斗,他就一下子想起了光荣的温泉关勇士。难道他不比莱奥尼达斯[2]更有骨气吗?

他们在高原上转悠,一个谷仓又一个谷仓地寻找着能抵御风雪、寒冷、黑暗和恐惧的庇护所。在这孤零零的山上,只有乌鸦飞过,才打破一阵子孤独,偶尔,还有远处传来的马达声,那是一队德国兵在谷地中穿行。

第四天,那些人决定审判这两个桀骜不驯者。一对搁凳上放一块木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莱奥尼达斯(?—公元前480),斯巴达国王,他率领一小支希腊军队,在温泉关拼死抵抗入侵的波斯大军,在掩护大部分人马撤退之后,最后与三百勇士一起壮烈捐躯。后来,“温泉关战役”一词,就成了永不投降的神话的代名词。

板,算是法庭的审判桌了。这两个朋友五花大绑着,被押到所谓的军事法庭前。他们必须报出自己的姓名和公民身份,当初在波拉身上免除了的这一套把戏,现在却要使人相信——如果以后调查起来的话——这场诉讼的谎言,说明这一审判具备了"跟敌人斗智"的应有的良好形式。跟起诉书同样极不公正的判决书,五分钟之后就宣读了。宣判官丝毫不带外国口音,连一丝轻微的痕迹都没有,但对基多来说,这并不能减缓这样一份判词的欺诈:确确实实,是一帮意大利人把他们的两个兄弟送上了绞刑架。庭长说话时带一点波代诺内人的口音,一个起诉人说的是弗留利圣达尼艾尔地方的方言,另一人的衣领上别着特雷维索足球俱乐部的徽章。

一部分人分散到附近的农庄,去寻找铁锹和铲子,准备挖坑。基多趁着混乱,从看守的眼皮底下偷偷溜走。他成功地潜入到密林中,摆脱了身上的绳索。没等多久,士兵们就顺着他的踪迹快速赶来,但是,因为林深树密,他们无法确定目标,便朝一棵棵树干胡乱开了一通枪。如果不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伤了他的肩胛骨,可怜的逃亡者可能就逃脱了险境。他还有力气奔跑,一直跑到猎场看守人的屋门前,筋疲力尽的他一头倒在一个女人的脚边,昏了过去,那是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年轻而又强壮的农妇。

丽贝拉·皮亚尼——我是从她那里得知这些最后的细节的——扶起了我弟弟,一直搀着他躺到她自己的床上,为他的伤口做热敷,给他喝了一杯热咖啡,里面掺了她丈夫自己酿的六十度的烧酒[1],让他恢复精力。然后,她站在家门口,在用核桃皮染过的松木门柱之间,稳稳当当地等着两个气喘吁吁地从丛林中跑来的追捕者。她的肚子挺在这粗犷的大门中央,显得那么威严,使他们顿时慌了神,在她面前结巴起来,说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受伤的同伴,想送他去医院。她表示这样很好,提出一个条件,他们可以用她自己的自行车,让一个年轻人把基多送到城里,留下另一个在她家里当人质,直到他的同伴回来。这一切,她以一种那么镇静的口吻,一种那么自然的坚定说出来,仿佛无限的权威就在这

[1] 原文为意大利语。

个手无寸铁的女人手中，而不是在两个游击队员的铁掌中，他们像听从命令一样听从她的教诲，乖巧得如绵羊一般。基多已经缓过了劲来，认出了那个正在给自行车打气的小伙子，就是当初答应了他的要求把师长的烟斗留给了他的那一位，便歪歪扭扭地坐到了自行车的架子上。那农妇，站在她家的门槛上，始终目送着年轻人向谷地方向走去，在浓密的松树林中间，只有这么一条小道。

命运总爱捉弄人，他们还是落到了另一支出来寻找逃亡者的小分队手中。宗派主义的仇恨和报复心理，终于压倒了微弱的怜悯心。基多被迫从自行车上下来，迈开双脚自己走路，焦躁而又恐慌的他，又被带回到原先逃走的农庄院子里。人们把他推下挖好了的土坑中，就在基诺的尸体旁，尸体上已经铺盖了刚落下的雪花。我愿意这样想象，他仰面躺着，直瞪瞪地盯着刽子手的眼珠，当子弹从冒着烟的枪口飞出，打在他脑门中央时，他甚至都没有闭上眼睛。

由于切萨雷好几个月后才在卡萨尔萨露面，我们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基多的消息。解放也好，停战也好，都没有把我弟弟归还给我们。渐渐地，妈妈终于明白到，基多在饭桌上的位子已经永远地空了出来，他那个套餐巾的小环也不再有用了。在他卧室中窄小的铁床上，还铺着蜂巢纹花边的压脚被，她很少进来坐一坐，面对着加里·库珀和约翰·韦恩[①]已经发黄的照片。如果说，基多在临终之际，曾期望用他牺牲的恐怖和他命运的悲惨，来争夺一下在母亲心中一直被我占据的位子，他却被剥夺了这最后的一丝希望，因为他根本无法让我们了解他是如何牺牲的，就让时间和习惯的泡沫磨灭了这一事件的惊心动魄。

包裹在一面三色国旗中的灵柩，载在一节敞篷车厢的平台上，进了卡萨尔萨火车站。蒙着绉纱的鼓敲响了一曲葬礼进行曲，妈妈走在社会名流的第一排。人们把棺材抬进了我们家中，当着她的面打开，她认出了她的儿子，按照当地习俗，把尸体缝在一块分娩之日派过用场的床单中。在我们家乡，人们要在死者的床垫子上割一道缝，好让灵魂更自由地一跃飞向天空。妈妈让人在裹尸布上剪开一个角，作为对那个

---

① 加里·库珀(1901—1961)，美国电影演员。约翰·韦恩(1907—1979)，美国电影演员，曾在《关山飞渡》(1939)中扮演灵果这一角色。

没死在床上的人的补偿。在墓地里，妈妈靠在我的胸脯上，紧紧依在我的怀中，当我的姨妈们向坟墓中扔下鲜花时，她哭得热泪滂沱。但是，这一声声嚎哭，依然是献给我的，她利用这一机会，重新向我确认了她的爱，尽管这种爱已经被我的阅读、被我孤独的工作、被我跟薇玛一起的散步、被我在家庭之外的活动减弱了一些。从此，母与子，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彼此理解，彼此疼爱，彼此帮助，就像马利亚和基督，他们这不可摧毁的一对，他们之间的互相崇拜在福音书中广为流传。妈妈当然忘不了她的二儿子，但她把他这个凡人打发到死人中去了。基多不得慰藉的幽灵，依然在地下游荡着。他伸着他那血淋淋的面孔，惊愕于他的英雄主义竟然无用，发现最终还是我有办法，通过躲藏在维苏塔村的那个阁楼上，就保住了他通过一次壮烈的牺牲都没能成功获得的东西。

我能想象，你很希望知道我对我弟弟的死做何反应。在我的回忆中，失去我的童年伙伴和最好朋友给我带来了莫大的苦痛和打击，除此之外，我还感受到一种悔疚，当初我实在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出发。我的良心在指责我的懦弱和自私。尽管没人想到要责备我的行为，事实毕竟摆在那里，弗留利青年的柔弱之花介入到了抵抗运动中，在冬季最严寒、最可怖的几个月里，冒了巨大的风险：对他们中的最优秀者来说，这些风险导致了关押、折磨、牺牲。另外，就基多的命运而言，我也感到我有直接责任，毕竟，他的反法西斯主义思想，不是从别人那里，而是从我身上汲取的。是谁教育了他，为一个在墨索里尼的殖民军队中当军官的父亲感到脸红？谁在他的头脑中灌输了这样的想法，为了替他的朋友，自愿去俄罗斯前线参战的艾尔梅斯·帕里尼赎罪，哪怕付出天大的代价都不过分？

过于轻信的弟子，他现在有权利要求得到我的一个弥补。加倍地疼爱妈妈，照他喜欢的样子写出我的书，更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一句话，让我努力以一种尽职的方式留意于对他的记忆，但是，这些必要的虔诚行为还远远不够。还有某种更珍贵的债务要偿还，迟早有一天，我还必须为他的亡灵还债。

这就是，在我的观念中，我所谓的不抵抗死亡的起源，我强调的不

是我的自杀倾向(我太热爱生命了,不会落入这一被失败者用做骗人玩意的俗套),而是我对死亡的不抵抗态度。我前进,我向前走去,被贪欲推动着,去享受一切。但是,在我背后,有一个始终保持沉默的熟悉幽灵。用不着向我指出他就在那里,这个苍白的幻魂的目光始终就没有离开过我。我知道,假如我转过身去,我就将跟随着他,跟他一起走下他正等着我去的阴暗王国。这一情感始终伴随着我一生的历程。我周围的人可能会觉得,我的许多行为无法解释,我们一些朋友会认为,我的许多习惯和趣味十分荒诞,但是,假如他们觉察到,活在世上这一简单事实,竟能被这样的一个人当做一种罪孽,因为他喜爱的一个弟弟先于他进了坟墓,那么,他们就不会再那样看我了。

对我来说,羞耻感和有罪感还有别的原因:在火车站,然后在墓地,演说者们把基多的死,说成为意大利爱国者反对法西斯和纳粹压迫的起义的一段插曲。随后,人们每一次纪念波尔祖斯高原的牺牲者时,都要猛烈抨击希特勒的暴行,甚至在切萨雷带来了确切的消息,证实了官方说法的谎言后,依然如此。但是,在1945年,就像我马上要告诉你的那样,根本不可能公开揭露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的两面行为:现在,在弗留利大地震荡着的、让雇工和季节工的无产阶级大军跟大财主们作对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党人毕竟站在最前沿,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想通过揭露在铁托的命令下所犯的可耻行为,从而削弱共产党人的威望,其结果只能导致支持农民党的基督教民主派的胜利。我意识到战斗的赌博性质后,就离开了行动党,我当初之所以参加这个党,是出于对基多的忠诚和怀恋。我汇合进了那样的一种力量中,它是唯一能胜利地掀起农村的无政府主义造反、以反对富人专制的力量。然而,有多少次,我不得不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听到在公共广场上,或者在竞选集会上,那些杀害了我兄弟的人依旧恬不知耻地宣扬着他的价值。是不是应该让他们玷污了自己双手的罪行,公开地转变为他们的光荣?生前跟他们作过斗争之后,死后的尸体是不是还要被他们用做旗帜?

葬礼那天晚上,卡萨尔萨的各家各户,我学生们的家长,方圆十公里的人们,都派出了他们家中的幼子,按我们这一带的吊唁习俗,带上

一篮鸡蛋和一袋面粉作为礼物,来看望我的母亲。埃及人在棺材中放上食物和饮料,以方便死者在坟墓中的游历。这一风俗,很可能在地中海绕了一大圈,一直传到了亚德里亚海岸边:从很古的时候起,它就在弗留利地方流行,但是,这里的玉米种植者都很精打细算,不像尼罗河两岸的人们那样富有诗意,他们改变了这一习惯,使它变得索然无味,到现在,殡葬时赠送的食品根本就不会浪费一点一滴。

我很惊讶地看见,斯温也出现了,就是那个农民的儿子,我在做诗歌和舞蹈练习时格外关注过的那位。他的姓在我们这地方独一无二,唯一的单音节就像阳光那样一下子透射而出,我会把他忘记了吗?他依然那么漂亮,那么果敢,像年轻的牧人一样,满脑袋的鬈发,十分潇洒,他坚持要把他家的礼物亲自送到我手上,这使他着实盯了我好一阵子。寂静而又高傲的目光,我在那里头读出了对不公正的谴责,竞赛的奖品每一次从他手中溜走时,我都对他犯下了不公正的罪;除了谴责,还有一种热烈、绝对的眷恋,只要我愿意,他是多么想向我提供这样的证明啊。我不禁战栗了一下,一边低下了眼睛,一边把他这张金灿灿的脸上——春天干燥的凉风为他的脸染上了一种镀金般的光彩——的每一根线条,都带到了我的记忆中。

只有上帝知道我的心有多么沉重, 我忿忿地驱逐了任何的放荡念头。其证明就是,在我挎着斯温的那篮鸡蛋走上楼梯时,一种深深的厌恶,丝毫不是装出来的,突然攫住了我的心,我回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一个我已不太喜欢的法国小说家,他描写过一个亵渎神圣的场景,一个老阿姑仔[①]人物,夏吕斯男爵,就在他妻子的葬礼上,询问了一个唱诗班小男孩的名字和地址。

---

① "阿姑仔"的原文为"tante",意思为男子同性恋者。

15

八月份，我父亲从肯尼亚回来了。我们全都提心吊胆地等待他的归来，我们都相信，他在经历了四年的俘虏生活后，回到我们身边时肯定没什么好心情，法西斯主义倒了台，墨索里尼不光彩地完了蛋，他自己的军事抱负也破灭了，他的未来也成了泡影。但是，也许是他的健康受了损害，也许是他经受了过多的挫折和侮辱，也许是他这个旧军官的最后一丝骄傲理由，他小儿子的体育才能——是他把自己对武器和狩猎的兴趣传给了这小子——也因基多的死而化为乌有，反正，这军官根本就没有像我们事先如此担心的那样再出去抛头露面，而是整天乖乖地坐在厨房的一角，要上一杯红葡萄酒喝着。

我们以为，他一旦振作起精神来，就会以他的哀诉和他的责难让我们遭罪。但我们显然低估了他辛酸的深度，他沮丧的强烈。在家里的最高一层楼上，有一个无法住人的斜顶的小间，平时用做堆放废家具的储藏间。他决定躲进那个灰尘蓬蓬的陋室，在那里度过夜晚，以及白天的绝大部分时间。他衣服也不脱，就倒在一张从旧军营里搬来的行军床上，只是到吃饭时才下楼。他再也不谈论他肩章上还缺的第四条饰带，也没有一次想到继续行使他做丈夫的权力，甚至还彻底放弃了掌管家政大权的愿望。他把自己化为了自身的影子，我们听见他趿拉着旧拖鞋，走在楼上的过道上，嘴里嘟囔着没头没脑的词儿。出于军人的本能，他把自己安置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子上，以便监视我们的来往行动；出于嘲讽，他选择了满是破椅烂凳、无用杂物的废品库，这是他残破生涯和他残废希望的象征。

每天晚上，我在他的门口放上一大瓶皮诺葡萄酒，他一个人就在那些高悬于房梁上的战利品中间把它喝完。每天两升十四度的红葡萄酒。

餐桌上,他用他死里逃生的龋齿,一声不吭地嚼着煮牛肉,几丝肉丝沾在他的小胡子上。你还记得那个时代,他把我摁倒在厨房的桌子上,往我的眼睛里滴眼药水吗?当年把我摁得无法动弹的力量,如今使他的牙翘起在嘴唇上,镶着金牙的牙豁子露了出来,在他的颌骨前闪闪发光。现在,除了那张劫后余生的嘴,他就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向我显摆了。他充血的眼睛,骨碌碌地不停乱转,兴许是酒精产生的效果,兴许老是想着同一件事想得多了。慢慢地,这种寂静而又眼泪汪汪的暴政,在我们看来,反倒比以前的夸口和咆哮更难忍受。但是,一开始,这位一家之主过早的衰老,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牛皮大话和可疑的暴力,而反倒是一种奇妙的恩惠。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沉浸于对弗留利战后生活的庆贺。考虑到种种新的创伤和悲哀,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放松和幸福的阶段,尤其对我来说,它是我生命中最温馨的季节。

尽管有好几个月时间的绝对贞洁,这一点恐怕还是免不了会让你吃惊,你这人,我紧迫地求你给我至少一点点看得见、摸得着的爱的表示,这是你答应过我的。我在卡萨尔萨周围村庄的公共学校给孩子们上课。星期六晚上,伙伴们来找我:伙伴们,是的,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指称那些人,把我跟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一条模糊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的连线,我们一起骑自行车远足,参加大众舞会,夜晚还有饮酒聚会。有一个伙伴叫努托,跟姑娘们在一起时最大胆,头发像非洲人那样短而鬈曲,皮肤黑得像煤炭,在汗水和美发油的作用下闪闪发亮。他在自行车把手上插上一枝英国山楂,嘴上还咬着一截,一边走一边摇晃。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脖子上围一条丝围巾,或者在蓝色牛仔裤的屁股上贴一颗纸星星,是从美国杂志上剪下来的警察佩戴的星星。他若是去参加什么舞会,那些被指派看管自行车的年轻小伙子,都会争先恐后地照料他的那一辆,把它调放到可靠的地方,而他则直奔舞池,以他耀武扬威的入场,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另外有一个,叫曼利奥,栗色头发,波浪型的,随身总带着一个手风琴,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每一次节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大活宝。第三个,艾尔米罗,向他当农夫的叔叔借来一挂拖车,由一匹花斑白马拉着,带着他的女伴们坐马车赶来,一边唱着歌,一边大呼小叫。他的身体很弱,手上总捏着一块手绢,时时准备对付一阵

阵的咳嗽,他仔细地梳出一条头路,把一头漂亮的金发一分为二,还让一绺头发耷拉在脑门上,就在那双尖利如钢的眼睛上面。

跟异性的关系仅仅限于一些和善的调情,没有后果的那类,而且只是做给塔里亚门托河左岸的小伙子们看的,告诉他们,波代诺内那边的小伙子们就用不着费心这些征服了。姑娘们很快站在一旁,等争吵过去后,以千倍的兴奋,扑向美酒和音乐。酒瓶子一个个堆放在棚架下的木头桌子上,曼利奥满头大汗,筋疲力尽,用他的乐器拉出最后一曲狂热的狐步舞。他的对手,来自法艾迪斯或者科德罗伊坡的乐手,更是精疲力竭,手指头僵得痉挛不已,连连求饶,承认吃瘪。随后,我们四个人,全都消失在夜色中,彼此送对方回家。绿廊藤架下的一个小小手势,就表示了我们对静静坐在长椅上的小姐们的从容告别。

于是,节庆中最丰富、最幸福的时刻开始了,尽管我今天已经无法向你细说我们的喜悦。寂静中,我们骑行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伸长耳朵聆听猫头鹰的叫唤,闻着带有瓜果香味的熏风,把被我们车灯的光迷住眼的刺猬从车辙中捡起来,裹在一件衬衣中,捕猎一只在家禽棚周围溜达的狐狸,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了,它足以令我们心花怒放,感到无比幸福。艾尔米罗早已把马车打发给了一个年轻的表弟,让他赶回去了事。我们三个骑车的轮流带他。努托趁此机会露骨地抚摩他,在他的脖子上留下一个个吻,还在他的嘴上重重地响亮地亲了一下。我们全都开心地大笑起来。我们同伴的动作,丝毫不带有任何暧昧的小算计,只是证明这个黑家伙实在过于活跃,无法抵御好奇心,要尝一尝金发少年的白皮肤和苍白嘴唇的滋味。同样,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当我们渴望赤身裸体地在塔里亚门托河里沐浴时,我的朋友们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难堪,而只有彼此显示各自肉体的快乐。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时,我们还在桥中央停下来,一起往河里撒尿,比一比谁的阳具更长。我恶作剧似地玩着这游戏,在我们决定要显示的某种状态中,我每每总是大获全胜,而我们中的唐璜,那位暴躁的努托,则输得一败涂地。

这就是直到 1950 年的意大利。在依然狭窄、两旁依然种着梧桐树的公路上,遇到的自行车要远远多于汽车;在牧场上,没有被杀虫剂灭

绝的萤火虫，为漆黑的夜晚带来了它们亮闪闪的芭蕾；山羊奶酪在潮湿而怪味的地窖中酝酿成熟，而不会像在冰箱的奶酪[①]专柜中变硬。年轻的公畜沉湎于它们并未意识到的彼此吸引中，而这一吸引也并未使它们在集体中孤立。我可以成为“我自己”，而不变得“异样”；甚至不感到需要发作，需要在一种直率的冲动下，粗暴地对待比抚摩还更温柔地包围住我们的弥散的感觉。我知道，我只要伸出手来，就可以为我的幸福多增添一份重量：但这动作因我们彼此间缺乏抑制而变得无用。我对未来毫无畏惧，我对现在毫无苛求。这是我生命中的唯一时刻。我们彼此搂着腰走在街道上。看到两个小伙子被一种表示亲热的身体符号联结在一起，善良的人们在家门口并无恶意地摇起了头。

肺结核同样也是这个已消逝了的意大利的一个组成部分。艾尔米罗出发去了一个疗养院，到了那里后，因为病情太重，就死了，成了牺牲品，当时的人过于相信自然疗法，相信乡村的新鲜空气，相信煎洋槐糖汤喝，相信母亲们、姨妈们、姐妹们、表姐妹们的热心照料能治愈一切病，以至于真的耽误了他的治疗。

每个黄昏都能给卡萨尔萨带来一种家庭生活的一幕幕宁静而又熟悉的场景，根据时辰的节奏，还有季节的变化，田里的活儿该歇歇了，晚饭该去准备了。农夫们坐在装满干草的车上回村，由两头棕色的牛拉着走。孩子们把母牛赶到由一个摇把汲水的小水池中去喝水。一个小姑娘先给自己的发辫系好结带，然后把牛奶给果品店送去。她让我想起来我童年时的女伴奥蕾丽娅，她今天已经嫁到了乌迪内，成了殷实的小市民。教堂对面的广场渐渐热闹起来，各家门前飘逸出玉米粥的香味，门窗上也透出了灯光，这时候，堂·保罗，趿拉着金色的桤木鞋，高高地撩起教袍，从本堂神甫住宅中出来，走到教堂，在祭坛两边点上蜡烛，准备做晚课。

我们常常聚集在曼利奥父母的家中，在康佩西农庄中，这是当地最大的和最富的农庄。我想象，往昔父系社会的秩序恐怕也不会是别的样子。院子里，晒干的芦苇秆紧靠着披檐的壁柱，边上放着冬天用的木柴

① 原文为英语。

和薪禾。一个门厅，女人们在那里把她们的草帽挂在竹子做的衣帽钩上,门厅通向一排房间,都用白灰刷得雪白。最小的小孩们,两个一排地睡在玉米须须的睡垫上,睡着之前数着房梁上溅上的石灰点子。脏衣服泡在一个个大盆中,盆大得像酒桶一样。接着,就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厨房,它用来做餐厅。从炉膛中漏出一丝微光,在鼓突的锅底上映衬出紫色的反光。老爷爷坐在长桌的一头,一边叼着烟斗,一边已经打起了瞌睡。女人们忙忙碌碌地撤走残羹剩菜,没忘了把还能吃的东西挑到一个篮筐里,再装上一些水果和一瓶子牛奶,准备留给孤儿院的嬷嬷,这是一个上古以来的习惯,每天都要给孤儿一点施舍。

厩栏中,守夜还在继续。女人们带去她们的针线活,团团坐成一个圆圈,她们头顶上的灯底下贴了一张油纸,是用来吸蚊子的,与此同时,畜生们有的站在圈栏中反刍,有的往干草上蹭痒痒。与其听那些留在厨房里的男人咒骂共产主义的发展和青年人的无教养，我们更乐意跟女人们待在一起,跟她们讨论意大利的问题。她们体现出一种开放和好奇的精神,尽管在丈夫和兄弟面前,她们的嘴里连半句话都没有,好不容易在这里得到了唯一的交流机会，她们便用来以别人的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

在厩栏中,她们自由自在地闲聊。一天晚上,努托不无苦涩地抱怨他作为农业工人的生活条件,说自己饱受大财主的欺压和盘剥。康佩西家的母亲和姨妈,远没有被针对她们的这一攻击所激怒,反倒对这年轻人的出路表现出一种宽容,从这小子的言行中,她们不无道理地看出了一种对其生命活力的亲切证明,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指责行为。

曼利奥的一个叔叔厌倦了待在厨房里，但又认为跟这帮到母牛棚里来凑热闹的女人一起坐在一条板凳上,实在与他的身份不太相配,便在院子里等着我们,瞒着女人们偷偷地把他的烧酒[1]瓶子递给我们。

但愿热血能在我们的脉管中狂躁地流动,可是,不,受我们的守夜的传染,我们的血仿佛就像哺乳动物温和的奶水,某些事件给了我们机会证明这一点。十月份的一天晚上,尽管外头下着瓢泼大雨,一种异常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的热烈气氛依然笼罩着从艾纳尔到圣乔万尼的各个地方。区里的秘书跟特地从波代诺内赶来的农工联合会[1]一位领导正在讨论。艾尔米罗让我跟他待在一起,他在桌子上赶写了一份宣言,他那些年轻的表兄弟从柜子里找出一面红旗,在一片欢呼声中展开挥舞。小啤酒瓶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受到热烈氛围的刺激,或者想到确定要在第二天举行出征,时不时地,会有某个老游击队员激动起来,不仅哼起了抵抗运动中的一首歌。集会在齐声合唱副歌中结束。同一时刻,同样的场景在各处重复着,在罗沙,曼利奥参加了,在利古尼亚那,努托参加了。

直到午夜,在值班室窗户的挡板后面还透露出灯光;两三个迟来者在门槛上嚷嚷着酒气冲天的醉话;一阵焚风刮来,带来最后几滴雨水,把大门上挂着的画有镰刀和锤子的党旗刮得哗啦啦地响。

第二天,天刚拂晓,长长的大车队和自行车队就从各个村庄出发,一起汇向格卢阿罗镇。教堂前的大广场上,人来得那么多,队伍挤得那么密集,几乎可以说,这是一次圣母朝圣会,只不过不同的是,人们的衣服扣眼上都佩戴着红色的标志,还有,示威者并没有穿他们过节时才穿的漂亮衣服,而是穿得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园丁的工装裤,农夫的罩衫,牧羊人的短褂,游击队员的旧军装,警察的伪装色贝雷帽,美军的橄榄帽,从德国兵那里弄来的军帽。努托格外地引人注目,梅红色的围巾系成大翻领。天空被昨夜的一场雨洗得湛蓝无染,卡尔尼山脉在透明的天边凸现出它的层峦叠嶂。公共汽车的司机们刚刚让从乌迪内、波代诺内或者更远的城市来的乘客在邮局门前下车,就一边在柱廊下匆匆喝着咖啡,一边互相打听,这些喧闹的人群聚集在这里想要干什么。随后,由于既没有警察露面,也没有宪兵出来,他们便耸了耸肩膀,又回到他们的车上去了。

在一长列紫杉树的尽头,矗立着皮尼亚蒂别墅,它周围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前面是一个砾石地的院子。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朝那里走去,想迫使别墅的主人解释一下最近关于招募失业者的那个法令。皮尼亚蒂躲在一个窗户后,端着一杆枪等着我们。面对声势浩大的人群,他同意

---

[1] 农工联合会(Federterra):全称为农业劳动者全国联合会,意大利的一个左派组织,有社会主义倾向,建于1901年。

接待一个代表团。艾尔米罗和三个同伴一起进去了,被带到一个阴暗、潮湿却又庄严的房间里,地上铺着大理石方砖,四壁都是沉重的橡木架子,从地面一直立到天花板。一卷卷烫金封面的书,像一个个哨兵那样在那里站岗。在一张上了蜡闪闪发光的卡弗尔式书桌后,坐着皮尼亚蒂老爹,一个僵硬而又脆弱的老头。他背后站着他的儿子,穿着一双马靴,手里还握着枪。艾尔米罗被这背景和这番迎接吓得有些发懵,不禁低下了眼睛。小皮尼亚蒂以嘲弄的口吻问他,是不是在地上找什么东西,或者,造反者们是不是同样也有什么奢望要撒在他家的砖地上。这时,艾尔米罗被这番讥讽话激怒,开始了一番紧张的争论,尽管争论有可能转向不利的结果,但它持续了很长时间,到后来,终于有一个劳动公会的领导赶来了:他告诉这房子的主人说,假如他们再坚持拒绝大伙儿的要求,那么他将无法保证人们对他们家别墅的尊重,甚至也无法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皮尼亚蒂老爹毫不让步地离开了这个房间,但小皮尼亚蒂代替他坐在了书桌后,签署了一份同意招募一百五十名工人的协议。

在圣乔万尼,在罗沙,在利古尼亚那,在卡萨尔萨,在格卢阿罗附近的所有村庄,喧闹声一直持续到深夜很晚。比平常更慷慨的痛饮延长了胜利的欢快。说实话,甚至在形势显得最为严峻时,人们的好心情也没有过片刻的松弛。当艾尔米罗在一杆枪的威胁下谈判时,欢笑声、玩笑话、唱歌声一直回响在村镇的街道上。这是阶级斗争的插曲,还是更为激烈的一场战役?人们跑到皮尼亚蒂家的别墅去,向那一老一少挑战去了,而不是满足于围绕着酒瓶子跟河对岸的那些小伙子们较劲,众人都带着这样美滋滋的心情回家,同时又怀着一点点遗憾,这样的日子毕竟不像星期六的舞会那样还会再来。

不久,又有传言说,人们要去攻打斯皮塔贝尔戈伯爵的城堡,听到这消息,弗留利的全体青年都想去参加。斯皮塔贝尔戈家族源自奥地利,后来把姓氏意大利化了,并按照1930年时的哥特式风格重建了他们家的城堡:在巴尼亚罗拉的村口,矗立起了闻名遐迩的一座建筑,它那小小的窗户被做成枪眼的形式,八边形的堡塔上装点着雉堞。在伯爵的心中,它应该以它好战的威严外表,令人联想起某种中世纪的要塞。它让我想起了路纳伯爵的硬纸板住宅,那是在乌迪内小歌剧院上演

的一次外省版的《游吟诗人》中的布景建筑,同样的矫揉造作,同样的喜剧化,我曾对它报以嘘声。

努托处在栅栏前的第一排,用一根铁棍开始砸起锁来,他的伙伴们则朝城堡扔起了石头,小石头越过了围墙,落到房子前。一个男人的脑袋从枪眼上露了出来。他大喊着,问我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听到我们的回答(“说话,谈判”)后,他狂怒地关上了窗板,然后,我们看到他打开了尖形拱肋的门,站到了台阶上,手里握着一柄双筒枪。“让我们听一听你们要对我们说什么吧,”他嚷道,“站出一个人来,跟我说话。”这一次,我想到的不再是歌剧中的一幕,而是西部电影中的一场戏,被牛仔们围攻在牧场上的强盗负隅顽抗。那男人头发乱蓬蓬的,没有穿上衣,两腿紧紧地裹着皮绑腿,看来就是城堡的总管,他的主人们已经躲藏在后面,准备从花园中逃跑,他们只是派他出来察看一下情形。

“只许过来一个人,”他再次喊道,“不然我开枪了。”

一个老女仆出现在他的背后,一边拐着腿,一边打开了栅栏。曼利奥趁着努托想扔铁棍的当儿,一步跳上前,代替了他的位子,跟着那男人进了城堡,进去后,那男人又一把关上了门。

半个钟头后,曼利奥又重新露面了,伸出双手表示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并丧气地摇着脑袋。“无能为力,他们拒绝了。”人们决定撞开大门,占领城堡。努托冲在最前面。他的一只脚刚刚踏上草坪,三扇窗户中立刻同时伸出来三支枪筒。努托不管同伴们的劝阻,继续一马当先地冲去。只听一声巨响,一颗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攻击者顿时乱了方阵,纷纷奔向墙后去寻找隐蔽处。他们开始考虑应该采取什么策略,这时候,镇中央传来一声叫喊,如同一声炸雷,撒在了大部分示威者正忙着攻打城堡的开阔的草地上。“警察来了!”三四辆载着警察的卡车,跟在一辆装甲车后面,正朝这里驶来。车队刚开到开阔地的口上就停住了,人马从卡车上跳下来,手指头都扣在斯腾卡宾枪的扳机上,带钉子的鞋底掀起一团团尘土。

每个人都捏紧了拳头,有的握着棍子,有的握着铁锨或镐头。努托从他身旁人的手中夺回铁棍。警察队长站在缓缓前进的装甲车上,命令我们立即散开。车子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了,它还在开着。我们向左右闪

开。它撕开了人群,它开过去后,人群又汇合成一体,挡住了后面警察的道路。警察们挥舞警棍,威胁着我们。我们则高举起拳头、铁叉和锄头,以示回答。但是——怎么说呢?——没有任何通常被我们叫做厌恶的东西隔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彼此对立。在他们那一身制服底下,人们认出了他们农民的本原。我们不能憎恨这些口音很熟的健壮的小伙子,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出生在贫穷家庭,甚至比我们还更不幸,只不过他们脱离了过于贫瘠的土地,投身到那个肮脏的职业中去。

彼此暴躁地动手,可以有别的原因,而不见得非是仇恨。短短几秒钟就足以造成一场混战。我们展开了肉搏,在地上乱滚,每个人都紧紧抱住一个敌手,而这敌手也只能寄希望于他强健的肌肉。叫喊声、咒骂声响成一片。我们互相鼓励,开起了玩笑,尖声地唱起了老歌。流血了:新鲜而又少量的血,从轻微的抓伤处流出,这更刺激了我们搏斗的决心。年纪最大的那些人是最早逃跑的。警察一边跟在他们身后追,一边挥舞着大头棍,有些人没能逃脱;有一个人受了重伤,当天只有这么一个,躺在地上动不了。年轻人不愿意后退半步,一直坚持到军队赶来支援警察的那一刻。士兵们抓住我们的伙伴,把他们押上汽车。顿时,树倒猢狲散。那些看来已经有十五六岁的小孩子逃跑起来,还跟两三年前一样敏捷利索,而一个穿着短裤的葡萄园老板,甚至还看到他们一边逃跑,一边偷葡萄吃。

暮色降临到了空荡荡的开阔地上,卡车已经带走了二十来个倒霉的俘虏。与此同时,玫瑰经的钟声訇然鸣响,敲得那么清脆嘹亮,尤其因为村庄中寂静一片,居民们全都闩上了家门。两遍钟声之间,人们能听到远方传来邻镇的钟声。在利古尼亚那,在圣弗罗雷阿诺,在波尔戈-布拉伊达,平原上,各地高高的钟楼都发出了祈祷的召唤。再更远些,在科德罗伊坡,在圣维托,钟声也敲响了,在我们的耳中更为微弱,我们仿佛听到了往昔一代代人的叹息声从岁月深处逸出。一个个世纪的叮当声飘荡在田野上,如傍晚的雾霭一般忧伤,一般无形。我跟曼利奥、艾尔米罗以及努托一齐躲在一个干草仓中。我们是从清新而又阴暗的街道出去的。几个女人贴着墙壁走着,匆匆忙忙赶往教堂,比她们先到教堂的女人们,已经跪在祭坛前开始做晚祷了。

为我党的宣传工作服务的责任心，迫使我强调了警察胜利和宗教礼拜的同时性：这是政治权势和教会权威之间明显的勾结。只有一个在一所抽象的学校中培养起来的官僚，才会有勇气支持这样的一种观点。农人们凭着自古有之的细心，清楚地知道，对土地上的那些年轻人，那些外表那么平静，守习惯，懂规矩，与季节的交替和谐相处的人，必须给他们一种阶段性的发作，让热血暴烈地沸腾一番：跳舞跳得筋疲力尽，喝酒喝得烂醉如泥，从舞会中出来时打架斗殴，假如这些还不够，那么就该奔赴战场，借口去参加英勇的战斗。巴尼亚罗拉的示威者兴许认为，他们是在为国际共产主义的进展而斗争，因为他们在扣眼上佩戴了一颗红星；同样，他们的敌手——他们同样也是土地的奴隶，而不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奴隶，尽管现在，他们的头盔和制服代替了工作罩衫和短褂——也以为他们是在保卫共和国的制度。实际上，陶里亚蒂也好，德·加斯佩里也好[1]，都不领导着冲突。在两大阵营中，人们不知不觉地服从着两千多年来一直流行的规则。它已经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到了一定年纪，最勇敢的男子汉们就要时不时地动一下武，流一些血，同样，按照这一规矩，女人们则要去教堂，双手合十向圣母祷告，以她的名义大唱赞歌。一方面，是寻衅、斗殴、痛打、受伤；另一方面，是喃喃的祈祷，齐声唱颂歌：这一切，在起义打击地方贵族的这历史性的一天中，显示出了与大地的古老智慧的和谐。

我将说："为了事物的永恒秩序"，而决不是说，我厌恶使用那样的一种套话，它总是用于证明穷人对富人的不抵抗，证明富人对穷人的统治。然而，我可能会使用如下的词语：我难道不是已经积极地投入了，人们难道可以指责我在混战中袖手旁观吗，我这个出于对个人主义、对财主残酷压迫的仇恨而很快去领了党证的人？尽管我借口说，星星在苍穹中占据一个固定不变的位置，宇宙服从着永亘的规律，从而犯了这样那样的过错，我依然坚定地相信，人们根本就不会明白战后的政治大辩论，假如人们不把它们跟其他的乡村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考虑，什么洗

[1] 陶里亚蒂(1893—1964)，意大利政治家，当时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德·加斯佩里(1881—1954)，意大利政治家，曾任人民党主席，战后成为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之一。

礼的庆祝，婚礼的庆祝啦，什么去弗留利的圣达尼埃尔教堂圣殿的朝圣啦，牲畜大集市啦，还有圣约翰之夜啦，狂欢节游行啦。那时的意大利，想象一下她的形象，那是古老的东方人崇拜的多乳房的老奶奶，我们今天在那不勒斯的博物馆中看到的以弗所的黑色阿耳忒弥斯[①]。拥抱她所有的孩子在一个集体中，没有边界，没有歧视，闭上眼睛不去注意他们行为的差错；从词义上带有宗教的意味；温柔，热情，乡土，感性，已经有些戒备，但还不足以抑制年轻人的反抗。反正，年轻人并不把攻打城堡的必然精力看成为来自马克思或者葛兰西。

在康佩西家的厩栏中，人们评论着巴尼亚罗拉的失败。女人们称赞着警察的节制。努托大叫着反驳，举出 X 的例子，他被打破了脑袋。"一点点污泥，"家中最年老的老婆婆说，"只不过是一点点污泥。就像你的老爹给了你一巴掌，让你流了几滴鼻血。公安力量就应该是公安力量。"她这样总结道，说着扶了扶眼镜，数着手中的毛衣织了几针。这句神秘的话语似乎遭到了普遍的不满，因为，接下来，厩栏里变得鸦雀无声，只有畜生低沉的咀嚼声，以及粪堆上乱飞的苍蝇的嗡嗡声。曼利奥的母亲和姨妈们刚才抬起了头，听着老奶奶的话，现在又低下了脑袋，埋头于手中的针线活。努托在他的板凳上折腾了一阵子，然后，为了表示他良好的意愿，把一个线团夹在了膝盖中间，捻起了羊毛，仿佛在这些女人的奴颜婢膝中，认出了跟他的反抗本性截然对立的对应物。

16

维苏塔的小教堂，14 世纪时期罗曼风格的建筑，矗立在一片水草茂盛的牧场中央。认真地凝望耳堂的内墙后，我发现有壁画的痕迹。一个

① 阿耳忒弥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黑色的阿耳忒弥斯雕像是公元 2 世纪时的作品，表现为多乳房，象征母性的哺育，来自小亚细亚(今土耳其)的以弗所，雕像现存那不勒斯的国立考古博物馆。

画家朋友教我用新鲜的洋葱擦去石灰表层,让原先的形象显现出来。经过整整一个下午的工作,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圣徒的头像,附近的第六雷盖那修道院使我们相信,画像的作者,正是为修道院的教堂做装饰的那位乔托的无名弟子。

在那个时代,我画了很多素描,也画了很多油画。风景画,女人肖像,儿童肖像,自画像。我两次画我自己嘴里叼着一朵花。彩色油料也好,水彩胶也好,都不能令我愉悦。我必须承认这一怪事,尽管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绘画材料方面的权威,反正在我看来,在所有艺术中,绘画是跟自然的关系最紧密的一种。因此,我喜欢自然的颜色超过商业产品,我开始尝试,把颜料管里的色团一会儿跟草莓汁混起来,以获得一种更柔软的红色,一会儿又跟某种嫩草液拌在一起,以形成理想的绿色调。在我的画家朋友启发下,我开始收集各种植物,他叫朱塞佩·芝盖纳,我在他位于弗留利的切尔维尼亚诺的家里得到不少植物。(后来我回忆起这个时代和这段友谊,便邀请芝盖纳在我的电影中扮演角色:在米兰拍摄的那部电影中,绘出神秘之画的就是他的手。)

六月的一天下午,大约两三点钟,正是酷热难当之际,田野上空空荡荡,人也好,牲畜也好,全都躲到了阴凉地里睡午觉去了,我跳下自行车来到一家农户门前,想讨一杯水喝。我已经筋疲力尽,因为刚刚骑了不知多少公里路,为我的颜料草寻找新样本。院子中央,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坐在水井旁的一块石头上,几乎赤身裸体,正晒着太阳。他手里拿着一根橡皮管子,管子的另一头用铁丝固定在水龙头上。我只看到他的背,黑油油的,闪闪发亮:肌肤受到了阳光的支配,在深色的皮肤底下,肌肉的游戏清晰可见。

他头戴一顶宽檐的大草帽。身边的地上,扔着一大束新采来的虞美人。那时光,他似乎正沉浸于深深的冥想中,定定地瞧着两腿之间的什么东西。我蹑手蹑脚地走近他。房屋在关得严严实实的窗板后沉睡。狗躺在窝里,只是微微抬了抬嘴,随之又昏昏睡去,都懒得吠叫一声。没有一丝风能驱一驱暑热。满院子晒着一条条白床单,像一块块电影幕布那样僵僵地晾在铁丝上。

我以为是帽子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了帽顶的一圈帽檐,让一团跟

麦秆一样颜色的金发露在外头。小伙子听到了我的脚步，一下子跳了起来，猛地转过身子。我们交换了一记惊讶中透出愉快的喊声。原来是斯温，自从基多的葬礼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去了乌迪内继续读中学。他变得强壮了，漂亮了，但仍还是那个斯温，那么健美，那么匀称，容光焕发，他还没长胡子，胸脯和肚子也没长毛，依然跟小孩子那样，但他穿的短裤是那么窄小，腹股沟上已经有一团浓密的黑毛露了出来。他拦截了我的目光，脸红了，穿上牛仔裤，刷地一下拉上拉链，同样敏捷地扣上了皮带，最后，不顾胸脯依然潮湿，穿上了格子衬衣，还扣上了纽扣，那衬衣，还有裤子和皮带，都是美军的剩余物资。

然后，他发现自己头上还戴着那顶怪帽子，充血的脸一下子变得更红了。他嘴里嘟囔着，说如果“妈妈”午睡醒来发现她珍贵的遮阳帽[①]不见了，他父亲就要骂他了，说着，便匆匆返回屋子里，根本顾不上捡走他的凉鞋。

就这样，我刚刚看见了这种威尼斯女帽最稀罕的样品之一，早先，在韦罗内塞和提香的时代，女人们在阳台上看景时就戴这种帽子，这样，面孔得到了帽檐的保护，而头发却露在外面，她们可以无忧无虑地让秀发被阳光晒成绘画中那种不朽的半透明的金黄色。往日里在都城的贵族中流行的一种习惯，竟在外省最落后的农村地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如果说，看到一个20世纪的农家女还在追求当年总督府或长官家的一个淑女那样的矫揉造作时，我不免大吃一惊的话，那么，这种风雅的证明落实到一个十六岁男孩的身上，就让我有些想入非非了。斯温是不是要把对往昔风尚的模仿再推广一步，要用海绵浸透木瓜汁和女贞树汁，在晒太阳的时辰中一滴一滴地润湿头发呢？

我在水泵底下凉快了一个够，这时，他又出现了，满头金黄色的鬈发披散在古铜色的脸膛上。我比我本来想象的要更难堪，便随手捡起那束虞美人来掩饰一下。这时，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认为还怪不错的。我从我的教学经验中获知，你要是能跟一个孩子玩，你就算征服了这个孩子。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看看我们要来做什么，”我一边对他说，一边把一条正晾晒着的床单从铁丝上取下来，“不要担心你父亲和母亲会说什么，在他们醒来之前，我们会把一切复归原位。来吧，活跃一点。”

他惊慌失措地看着我把洁白的床单铺在地上，就在满是尘土的院子里。我毫不惋惜地把他拉下了水，要知道，这一违反家规的行为，会使一个老实正派的儿子，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变成一桩小小罪行的同谋犯。

虞美人花束在被单上方我的掌心中被揉碎，变成了一种汁液，十秒钟后又干涸了。我让斯温到水泵那里把手指头弄湿，然后蘸上花汁摁到被单上，描画出他所喜欢的形象来。他当即就玩了起来，画出了一些魔幻的星星，那些枝枝杈杈的角就像触手似的。他的手指头经过之处，白布就染上了一种淡淡的红色，几乎是玫瑰色，但鲜亮得很，因为床单刚刚洗过。在图画的边缘，斯温的食指留下了一条鲜红的滚边，真正、唯一的红色，珍贵的朱红。这个结果令他兴奋。他想在床单的另一部分重新开始涂鸦，便自己揉搓起了鲜花，用弄湿了的手指，试图画一峰骆驼。除了高高的驼峰，你实在很难分辨出那是一只猫，还是一头绵羊。这一回，斯温有些沮丧，请我也来试一试。当我认真作画时，他伸出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看到布上渐渐地呈现出某个非洲村落的样子，有帐篷，还有动物，他高兴得要命，突然就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他在我的作品上又补了一两处细节，我们就这样继续画下去，轮流把手指头弄湿，抹出多种不同的色调来，全都介乎于红色和玫瑰色之间，但又有无数细微的差别，而这要取决于我们是浓浓地涂上罂粟粉，还是把它稀释了，还要看食指摁在布上的压力大小。

斯温面对着大功告成的作品，拍起手来。他兴高采烈地嚷道：

“我们成画家啰！”

我以为他还要来亲我，但他的脸上却掠过了一丝阴影。

“可是，”他的情绪顿时变得很忧郁，“这，这可不是绘画！”

“怎么不是，是的，斯温，这就是绘画，而你，你就是一个画家！”

我心里猜，这种对自身才华的极端怀疑，应该直接来自于学校，因为在中学里，带有学院派偏见的老师会教导学生们说，绘画要从画架和

画笔开始,想到这里,我便对他举了一个过去的大画家的例子,他就用植物来制造自己的颜料。(画家就是蓬托莫[1],但我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我坚信,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课堂里,老师都不会提到圣费利奇塔小教堂:为了再看一眼《基督下十字架》,我甚至准备,你想象一下,将我的脚再一次踏入那个肮脏的佛罗伦萨城!)我补充说,自从他死后,就没有人能明白他制造他的玫瑰色和绿色的秘密。

"这一秘密,你不愿意帮我来发现它吗?我们只需采撷各种各样的无数花朵就行了。"

"噢,太愿意了!"他欢呼起来,"假如您带我去的话,我们立即就干!"

"你忘了,"我提醒他,"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我从地上拿起床单,但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在那上面共同完成的作品,他还想再做修改呢。随后,我尽量装出最坚决、最冷峻的神色,带着床单走向水泵,尽管得到他的亲吻后,我的心一直在胸膛中怦怦地乱跳。我听不见他的叫喊,把喝水时摘下的皮管子重新接在水龙头上,将水流对准我们的图画,不一会儿,床单上的画就消失了。我始终平心静气,外表甚至无动于衷的样子,把重又变得跟刚从洗衣池中出来时一样白的床单晾到铁丝上,用两个夹子夹紧,并拿眼角的余光偷偷观察着斯温的失望和忧伤。我做到了两点,第一点,通过这一显然使他感兴趣的活动,让他依附于我,第二点,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向他揭示了,总是乖乖听家长话的不合适。这是一个极好的教训,他将在他记忆的一个阴暗角落中牢记,他获得了一种强烈的快感,不仅没有征求他父亲的同意,而且还冒险做了一次会遭到父亲责备的举动。

接下来的日子,以及剩余的那些夏日里,我们投身于一连串新的体验,把孤零零的谷仓的墙,或者离村庄足够远的教堂的外墙,当做我们壁画的画板。我们俩竞争着寻找珍惜的植物,或者发明新的混合颜料。每天在一棵老苹果树前约会,那棵老树位于卡萨尔萨和斯温家农庄的中途,树干疙疙瘩瘩的,里头都空了。如果我有什么事迟到了,他就在树

[1] 蓬托莫(1494—1557),意大利画家,早期风格主义的代表,为佛罗伦萨的圣费利奇塔教堂而作的《基督下十字架》是他最成熟的作品。

洞中给我留一张字条："明天在此等"，或者"为什么不是狮子和羊羔？"在众多的寓言故事中，斯温最喜欢给我讲一个中世纪的日耳曼故事，哈默尔恩的笛手。一队耗子被悠扬的笛声吸引，走出了城市，这跟我们的情景很相似。但是，被市民们的背叛所激怒的乐手，把孩子们也带在了他的身后，这一队孩子是如何迷失在森林深处的呢？

有一天，我给他带去了一个弹弓，作为他上次遭受的不公平的赔罪礼物。他看透了我的用心，因为，第二天，我在树洞中发现一张条子，用美术字写在一页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您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狠心？"我刚刚读完几个字，正被他的这番真诚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就偷偷地从后面扑到我的背上，两手捂住了我的眼睛。他原来就躲在附近，要给我来一个惊奇。从此后，我们俩就轮番地藏在离苹果树不远的地方，偷偷地观察迟到者的失望，然后扑向对方的脖子。斯温总是想办法把我扑倒在地，他也一起倒地；相拥着在草地上躺一小会儿；然后在我脸颊上亲一下，这已经成了习惯符号，表示我可以起来了。

我们一路穿越田野，把各种各样的叶子和花朵装进我们的挎包。出于对我小偷小摸策略的真诚，我鼓励斯温跳过私人花园的栅栏，趁着主人家正在午睡的当儿，到花圃中去偷栽培的鲜花中最漂亮的样本。这种行为有双重好处，既能补充我们野生植物的给养，又能训练他偷偷犯忌、违法乱纪的胆量。水仙花的洁白，风信子的紫红，银莲花的黄色，大丽花的橘黄，玫瑰花的肉红，石竹花的鲜红，五彩缤纷的花儿令他陶醉，令他出神。而更为世俗的我，则把刺柏的黑浆果或者开心果带树脂的嫩枝在手中捻碎。

几年后将成为一个优秀画家的那个人(只因为他为人太谦卑，拒绝去罗马发展，才没能最终享誉全国)，现在不是带着他的调色板和画笔在画坊中学习，也没有到商店里去买颜料，而是在大自然提供给他的巨大而又神奇的色板中，亲自挑选他的颜色。他对香味无动于衷，几乎意识不到玫瑰还在芬芳散香。春天开花的山梅花，在道路两侧散发出扑鼻的清香，而他却只是一心问着自己，这种白颜色是不是跟蝴蝶花的深紫，还有仙客来的闪色相配。

他成了我的老师。比较我那些世故做作的发明(例如：把酒醋跟适

量的石灰混在一起，得到一种鲜艳的红颜色，又比如，使用尚热的蜡烛油做溶剂），他更喜欢直接从他的鲜花中汲取颜色。面对一堵空墙，他根本不需要铅笔或者钢笔来描出初样。他直截了当地蘸取他最漂亮的色块，抹到他想装饰的表面上，手指头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这绚丽多彩的颜色中，用不着描出线条，打出轮廓，狮子与羊羔，老鼠和孩子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壁画上。

我欣喜于斯温的飞速进步，但是，更让我感到幸福的是，当他发现一个侧身像画得很蹩脚，或者一处背景处理坏了，突然丧失了信心的时候，他会把脑袋靠在我的胸脯上，要我给他一次爱抚，当然，出于谨慎，也考虑到他的年纪，这种爱抚仅仅局限于抚摩一下他的后脖颈。我经历了我生命中的第一次爱情，户外田野中的教学和贞洁的感觉混合在一起。唯独有一回，我把斯温紧紧搂在怀中，并亲吻了他的脸颊，那一次，他用他简单而又动人的手法，在一个小教堂废墟的柱子上，画出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天使脑袋。

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想把他带到我在维苏塔的小阁楼，好让他更进一步了解我的文学创作。他很惊奇地看到，我的书桌不是放在朝向田野的老虎窗前，而是靠着一堵死墙。我对他说，跟画家的职业相比，作家的职业是不讨人喜欢的：作家必须集中心思，与世隔绝（窗户和“全景”对写作而言是格格不入的），跟他亲近的人分离，而大型壁画的创作，在过去需要团队的工作，而且常常要当着一大帮欣赏者的面工作，画家们一边工作，一边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在脚手架上彼此开心地交流着，而大瓶的葡萄酒、大圆面包、圆柱型干奶酪，总是放在他们伸手可及的地方。

他根本不拿耳朵听我的诉苦，只是好奇地打量着我散放在书桌上的各种用具，其中有的他还不认识：大小不等的蘸水笔笔杆，那个时代还挺新颖的圆珠笔，一块两用的三色橡皮，一把改错用的刮字刀，一把裁纸刀，两卷粘胶条，其中一卷还是透明的，一个订书机。而在我看来，这些文具中只有一件当时稍微有些滑稽，却是在多年之后才派上用场的，那已经是在罗马的事了：装在一把柄上的刮脸刀片，它的用途很特殊，我把文学界的同事们寄给我的那些样书的题献页裁下来，然后，再

把它们以一本一百里拉的价格卖给旧货商。

与跟手工劳动每一阶段相伴的那些仪式相比，那个坐在打字机或铺开的纸张前面的人的动作，在我眼中几乎总是贫乏单调的。我并不仅仅是为了取悦斯温，为了鼓励他绘画的志向才展开这一番比较的。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捣鼓材料，像手工艺人那样去克服一种具体的困难，这是埋头在文学中苦干的人所无法体会到的乐趣。我年轻的来访者根本就不听我的推理。我白费口舌地向他解释说，呆坐在椅子上，往纸上填满种种抽象的、等同的、单调的符号，这样的活动给了我一种深深地不满足和厌烦的情绪，他根本听不进我的话，他在一行行落在纸上的潦草的文字中，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美，尤其在听完我朗读我的一首诗歌后，竟几乎有些恼怒，惊异于我玩弄文字时怎么会不更高兴一些。

"我那淤泥与象牙的肉体，"他如痴如醉地重复道。他背诵起了(可是他懂吗？)我写的一首像是连祷文一样的歌颂少年之爱的诗：

急速的火焰

那秀发……残酷的

冷落，那目光……

"喏，"他又说，从我的书桌上拿起一杆笔，塞到我的手中，"我想让您这几天里给我写一首诗，只写给我一个人的！这样的话，您坐在您的椅子上就不会感到那么不幸了，因为，我就在您的思绪之中。"

我做诗人的"志向"，尽管还不太确切，却毫无疑问地在这一时刻诞生了。听到这么亲切地转达出的责备，我几乎快乐和惊奇得要哭出来。它用何等巧妙的表达告诉了我，他意识到了被人爱着！这又是何等巧妙的一个邀请，请我继续追求他！这杆自来水笔，黑色的胶木做成，笔套上有一颗白色的六角星，标着"勃朗峰"牌[①]，德国产品，从此它成了我最喜爱的物件。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它，即便在我最初几次乘飞机旅行的时候，它的墨水漏了出来弄脏了我的衣袋。我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作家的职业，画家的头带之所以只有一次绑在我的脑门上(在我拍摄

① 在中国，这一牌子又译为"万宝龙"。

于那不勒斯的电影中我扮演了乔托这一角色时），那都是因为斯温的那些话，还有这杆“勃朗峰”牌钢笔。我是不是应该遗憾他没有真的拢紧我的头发？作为职业画家，我恐怕应该继续寻找在陡坡那一边的鲜花。我的作品，倘若用易腐烂的材料绘制成，就会随着它们有机生命的意愿而变化，成为难以预料的各种腐蚀的牺牲，最后可能会彻底毁于腐烂。然而，比起我的书的命运来，它要更令人羡慕一千倍，书的内容一旦藏于图书库虽然会毫发不损，但五十年之后只能提供给那些大学中博学的人士做做研究而已。不过，我兴许不该忠实于我青年时代的最温柔、最动人的回忆。

今天，是你，杰那里埃罗，使我坚信了我的工作的价值。是的，当我厌倦了我的同行们虚伪的奉承时，当我证明了，我的成功除了为我招来我的敌手们的恼恨和嫉妒，或者我担任评委的某个文学奖的候选人的吹捧，没有其他任何用处时，当没有朋友以一句真诚的话表达出稍稍不同的看法时，当我问自己，我的书比起我每个月要扔到旧货商大车上的那些书来，是不是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时，我只要想一想站在你父母家的平台上的你就足够了，你就在那里，在栽种着罗勒的花盆和吊在棚架上的蒜瓣之间。假如，我书中的字词对于你也不像晒在你昏昏欲睡的父亲胳膊上的太阳光那样活生生，不像你母亲用大瓶从厨房龙头下接水浇灌的薄荷那样活生生，你就不会继续读我的书了。严酷而又健康的竞争，就像要跟在饭菜上嗡嗡乱飞的苍蝇斗争似的，看不见的知了在树上唧唧嘶叫，鸟儿们也在碧蓝的天空中啁啾鸣唱！

17

大约在八月中旬，暑热难当，我问斯温是不是想去河里游泳。为什么我早没想到这个呢？可是，我真的早没想到这个吗？把我在心中称为

爱人[①]的那一位带去,带到小伙子们之间"做爱"被看成世界上最天经地义行为的那个地方去,我还害怕什么呢?怕由于一种"不洁"的接触,"诋毁"斯温在我心中启迪的情感吗?或者正相反,我是不是应该局限于游游泳,在河滩上晒晒太阳,像个腼腆的笨人似的,毫不采取我会对村庄中任何一个年轻人都采取的自由行动?三十年后,这些问题还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我跟斯温的一切来往,兴许都不是我当时以为的那种希腊式的田园诗,那种天真的牧歌,而是一种小小的冲突,是在基督的宗教代替了异教崇拜之后,在心灵对肉体长达两千多年的战争中,一种外省式的、乡下人的小接触。我是不是以为在爱着阿莱克西斯,而实际只爱塞巴斯蒂安?[②]

斯温以种种借口逃避我的提议。他不敢承认让他为难的理由:那条实在太短,尤其是已经过时的短裤,我曾撞见他穿着它在水泵旁洗淋浴。

我没有告诉他,就一大早出发去了波代诺内,去买一条真正的"三角内裤"[③],就像人们在画报上称呼的那样,反正,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垮台,禁止引入外国词的法令也就作了废。既然对他来说,目的中的目的就是要穿得像个美国人,我便径直去了一家胜利军剩余物资商店。觊觎的对象立即展现在了我的眼前:既不太窄小,不至于惊吓了他的羞耻心,又不太偏高,不会灭了他的爱美之心。鲜红的,料子很亮,在太阳光底下会反射出银闪闪的光。两边的胯间缀饰有绿色的斑纹。有了这样一副装备,在我们贫穷的弗留利还很陌生的豪华打扮,斯温恐怕会以为自己来到了外国,从塔里亚门托河陡峭的卵石河岸,一下子置身于加利福尼亚的某个漂亮海滩。嫉妒心会让他趾高气扬的同伴们一下子气馁。但是,促使我决心买下这一对我小学教员的钱包来说实属高价之物的,是印在前裆部位上的一个米老鼠,黄蓝相间的颜色:这令人无法抵御的小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阿莱克西斯应该是维吉尔《牧歌》中牧羊人科里东追求的美少年(见上文中的前注);而塞巴斯蒂安则是罗马时代一个英俊坚强的基督教殉道士。这两人分别象征了肉体之爱和精神之爱。

③ 原文为英语"slip"。

饰品，完美地完成了从批量生产的产品到好莱坞道具的变形。

我根本没想我的这次购买会产生什么结果，让店员用彩纸把游泳裤包装成礼品盒，用玫瑰色的缎带扎好；然后，我揣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把盒子偷偷放到老苹果树的树洞里。

见面时，斯温抱住了我的脖子。“多么漂亮的颜色！”他一心一意地希望我们当天就去游泳。由他来选择地点：一个避风的湾头，远离卡萨尔萨村的男孩子们习惯去的地方。一棵弯弯的垂柳以它又长又软的枝条庇荫了一片狭长的沙地，在塔里亚门托河的一条支流和漂着水草的一小潭静水之间，形成了某种半岛。浪漫的背景，清净的场所，只是有一点，耳朵里还能听到汽锤和推土机不间断的嘈杂声，那是人们正在附近重修一座桥。但是，对我的安全而言，不可能想象还有更僻静的庇护所了。没有人会看见我们的。斯温盯着我的眼睛，想知道我是不是满意。我一边在沙地上躺下，一边微微一笑，算是回答。

他也在我身边躺下，摊开手脚仰卧着。我用胳膊肘支起身子，随意地凝视着他。美国游泳裤在我们忽明忽暗的阴凉地不断闪烁着光彩。至于沃尔特·迪斯尼的那个老鼠，它很幽默地强调了任何三角裤——哪怕只是由卡西诺山[①]的一个僧侣画出来的——都无法掩盖的东西。髋骨的凹处（解剖学上的这一细节，我对它感受着一种无限的柔情）在他平平的肚腹的两侧都留出了缝隙。一股平和均匀的气息，有规律地掀动着他那跟脸颊一样光滑的胸脯。这个躯体，只有被微风拂动的树叶在它上面转移着阳光的斑点，看到它，没有什么能使人想到，一种特别的激情触动了我的小伙伴。

他闭上了眼睛，这使我壮起胆子俯身朝他的脸凑过去。我是在做梦吧？我似乎觉得他的嘴唇开启了，同时有一丝微光从他的眼皮中间一闪而过。我更凑近了我的嘴。这一次，我确信看到了他也把嘴向我送来，尽管那方式几乎难以察觉。于是，我在他的唇上压下了一个吻，开始很腼腆，随后就使了一点劲。假如他确信，我们的舌头最终碰到了一起，彼此触动了几秒钟，我也不敢发誓是我一个人主动的。当我再支起身子喘一

---

① 卡西诺山在意大利，圣徒本尼狄克于529年在那里建立了本笃会的修道院。

口气时，他趁着这一空当，脱开了身子，从沙地上坐起，不过并不匆忙，丝毫不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要故意如此。只不过，当我装作伸出手来时，他站立起来，抖了抖沾在游泳裤上的沙土，镇定自若地下到河水中。这一切，他做得是那么自然，那么平静，我只能相信，当我凑近他嘴巴的时候，他是睡着了，然而，我确信我并不是吻在一个毫无生气的嘴唇上。

我当然不会抱怨自己停留在我们最初那场戏的唯一一次亲吻上，毕竟，这样的结果在我看来已经成了难以企及的奇妙之梦。我寄希望于此后的几天，打算平静地达到一种更彻底的拥有。我只要把舌头伸到我自己的嘴唇中间，就能重新品尝到他初次赠礼的新鲜无瑕。然而，第二天，他没有来我们阴凉的隐居地，而是走上了去公共浴场的道路，就是我曾救起溺水的奥蕾丽娅的地方，也是比我小一辈的许多男孩一起玩种种水中游戏的地方。卡萨尔萨村的那些新少年，我只是觉得眼熟，因为常常在村子里遇见。我往日的伙伴们已经不来塔里亚门托河了。我不必担心某种对我们往日时光的影射会令我在斯温面前尴尬。然而，这样的一种保证却并不能使我从垂柳下我们秘藏地的丢失的懊恼中释怀。我情不自禁地撇了撇嘴，流露出一种指责，又投给他一道抱怨的目光，对此，他只是报以他那最灿烂的微笑。

“假如我不能把这漂亮的礼物给任何人看，那你送它给我还有什么意思？”那微笑似乎在这样说，但他没有意识到，黄蓝相间的米老鼠马上就要给它过于自豪的拥有者带来一种可怖的侮辱。

男孩子们立即注意到了这新颖的衣着，连声啧啧称赞。有的拿手指头点着波纹闪亮的料子，装腔作势地做出种种羡慕的鬼脸，有的冷笑着或扭转了身子，以掩盖心中的失望，因为他们的腰股上只围着一些不成形的织物，都是母亲动手做的，往往只考虑到实用，而根本无法与海水浴服装设计师的作品媲美。我对自己很满意，对未来充满希望，心中想，如果说，赠送游泳裤值得我赢得一个吻，那么，它现在引起的轰动，不久后就会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那群孩子中有一个借口看看图案，凑近了游泳裤，伸出手，两根手指头捏住斯温的阳物，使劲一夹，而跟我在一起时谨慎而又胆怯的斯温，根本来不及做出自卫或躲开的动作。我若是表现出嫉妒来，则会显

得很无礼，因为我跟这些在塔里亚门托河畔长大的孩子们受着同样的教育，对我们来说，男孩子的自发行为证实着一个世俗的弗留利的神话,它沾染着罪孽与羞耻,但奇迹般地保留至今。尽管如此,我心中仍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冲动,随后,等惊奇与激动的时刻一过,大伙儿各顾各地玩去了,把斯温晾在一旁时,我才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叹息,身心一下子轻松了下来。

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因为我只需很短一段时间就能看出,他们并没有停止偷看他这边,而且互相之间还嘀嘀咕咕的,好像在酝酿着什么阴谋。斯温把弹弓塞在游泳裤中,游到了河对岸,开始在河滩上东走走,西转转,晒着太阳。那帮子小孩假装散开,一些人跳进了水中,另一些人钻到了小树林里。他们很快就全转移到了河对岸,一个接着一个,仿佛很偶然地在那里聚集,有的假装蹲在河边窥察水中的鱼,有的折下一段榛子树枝削细棍,有的在滩地上用卵石和沙子造城堡。这时候,斯温正一只脚踩在一个树墩上,双手拉开弹弓,瞄准一只藏在树丛中尖声叫着的乌鸫。我离他也就只有二十来米,只不过在河的另一边。我无能为力地看着阴谋在他的背后编织成形。高喊一声来警告他吧?然而,他若是看到自己被我监视着,恐怕会耸一耸肩膀了事,会对我做个手势,让我别惊动了鸟儿。于是,我留在对岸没有喊,也没有动,焦虑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又一次后悔起那份给他招来麻烦的礼物。

(这出戏的原因是不是真的在这礼物中，穿上这艳丽的小裤头,会使他在小伙伴们的眼中显得那么狂妄自大吗?作为一种如此凌辱的行为者,你怎么知道他们只是打算向美国游泳裤复仇呢?在他们的眼中,我以二十五岁的年龄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大人,一位“先生”之类的人——此外还是一个老师。兴许,一旦等他们变得“严肃”和“有责任心”了,就是说,一旦他们到了决定要考虑婚姻问题,要抹却青春期羞耻心的所有痕迹时,到那时,现在被他们看成在那个年龄的男孩子之间十分自然的这些行为,就会被他们彻底抛弃;就会被他们看做是“小儿科”:是无伤大雅的小过失,是一到成人期就会自然收敛的胡闹。不然,事情就会变得可耻,遭人诅咒和唾弃:依他们的观点来推测,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事就是如此。假如这种推测有一定道理的话,那就应该承认,他们

所断定的我和斯温的关系,比实际情况还更进一步。我可能尤其应该承认——尽管这对我的弗留利神话来说十分残酷——他们并不属于一片世俗的和异教的土地,对犹太教基督教的病毒有免疫功能,相反,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的是中层意大利人的血,小资产阶级的和天主教徒的血,只有婚姻才能把他们从青春期的荒唐中“赎救”出来。我很担心,斯温要替我为一个想象出来的过错付出代价。对他的惩罚,直接来源于但丁在《地狱篇》中创立的关于轻罪以及酷刑的法典,在他们心中,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以牙还牙。)

当斯温继续在树丛中寻找着,拉开弹弓对着看不见的乌鸫时,他们早已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他的身后。突然,随着一声战斗般的吆喝(拉丁人表示男子汉愤怒的复仇性呐喊),他们一拥而上,抓住了他的肩膀和胳膊,令他一动也不能动,然后扒下他的游泳裤,让他光着屁股。这时候,一场庄严而又滑稽的典仪开始了:他们轮流着,依次俯下身子对着他的屁股,鼓起腮帮子,运足气后,嘴里发出淫秽的响声。斯温大喊大叫地挣扎着,但摆脱不了死死地压住了他脊背的那些冒犯者,他们根本不管他身体的前面,而只是对他的屁股感兴趣,他们一边用手指头指着那里白白的肉,一边讽刺嘲笑着。最后,他们一直趴在了地上,姿势与印第安人崇拜图腾时毫无二致;但是,他们并没有谦卑地亲吻尘土,反而朝地上吐着唾沫,作为嘲弄。就在这个时候,俘虏成功了挣脱了身子;而我,惊讶得像被钉子钉住一样呆在对岸,不过,更令我震惊的还是接下来的情景。

我本来以为,一旦获得了自由,斯温会穿上他的游泳裤,跑着逃走。但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他转过身来,精赤裸裸地对着男孩子们,用两手捂住了屁股,(尽管在他转身之后,这一动作早已没有了用处),而把我认为他最应该遮挡一下的东西,露在了他们的眼皮下。每个人都能欣赏到他的阳物,颜色发褐,肉鼓鼓的,因轻微的勃起而有些往上翘着,周围长着一丛茂盛的黑黑的细毛。很快,骚动结束了,接下来的是好一阵子的寂静。众人连连后退好几步,我以为,他们并不是被对一个少年郎来说已显得很浓密的毛和不小的尺寸唬住,而是被他展示男性器官时那种镇定自若的神态镇住。他们的歇斯底里让位给了一种不无敬畏的腼

腆,仿佛他们在牺牲者的行为中看到了他们自己所犯错误的证明。他们中有一人企图重新挑起新的一轮玩笑，但他的伙伴们干脆地命令他闭嘴,不一会儿,所有人都胡乱地消失在了丛林中。

三十年之后,在奥斯蒂亚滩岸上,我怎么没有回想起塔里亚门托河畔男孩子们象征性的话语!我的凶手根本不需要把我杀死,假如我满足于把他当做男人来看待的话。斯温独自留在岸上,低下腰,穿上了游泳裤;这一切,他做得从容不迫,而在这之前,他先瞟了我一眼,确信我记下了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并知道了我该怎么来对待他。

他捡起弹弓,重又潜伏在树底下。直到他最终错过了鸟儿,我们才又找到了广泛的话题,探讨禽鸟的生活习性、孵蛋季节、筑巢艺术。但是,我若是以为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他在我面前会有丝毫的窘迫,那我就错了:恰恰相反,他的行为举止中表现出更多的率真,更多的果断。晚上,到了跟我招呼告别的时候,他在我的脸颊两边亲了亲,换脸时擦到了我的嘴唇;随后,他蹦蹦跳跳地远去。“再见!”最后一次把他的弹弓挥舞得滴溜溜乱转。我希望这次经历能使他回到垂柳下,回到我们第一次游水,也是第一次(而且永远是唯一一次)亲吻的地方,但是,第二天,他对我宣布说,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在太阳底下闲逛。他更喜欢绘画,为他的调色板寻找新的花朵。而我,如果我始终没有忘记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开始为答应过给他写的诗歌寻找字词和形象了呢?

18

这首诗,我是一气呵成写出来的。在一个灵感来临的夜晚,在一次强烈的诗兴大发期间。在我所有的诗歌创作中,我向你保证,这是最好的一首,尽管我始终没有将它发表,不想让它落入受献人之外的任何人手中。

令斯温如此愉悦的那个日耳曼寓言讲述的是，一个汉萨同盟城市的市民招募了一个擅吹笛子的乐手，让他帮他们摆脱老鼠的侵犯，因为在当时，成千上万的老鼠在地窖和街道上大肆骚扰，进攻房屋，甚至玷污了上帝的神圣教堂。乐手把乐器放到嘴唇上，吹出了那么具有诱惑力的声音，那些传播瘟疫的动物竞相跑去追随他。最大的也最凶猛的一只，当初选择了在救世主的圣体龛中安身，也无法抵御这美妙旋律的召唤，连蹦带跳地加入到入迷的同胞们欢呼雀跃的队伍中。这样的一位俄耳甫斯，连山上的林木都会亦步亦趋地紧跟他，这样一位美妙和谐之音的作者，身后甚至会跟上城市的砖石与屋顶。老鼠们一劳永逸地消失了，它们走向了一座比地下矿道还更黑暗的密林深处。但是，当乐手回到城市索取他的酬报时，市民们却嘲笑他的奢望，只同意付给他预先规定数目中的很小一部分。

"哈哈！哈哈！"他们冷冷地笑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竟然还得为空穴中吹出的风儿付钱？"

他微微一笑，低下脑袋，重新把笛子放到嘴边，演奏了跟先前完全不同的另一段曲子。一眨眼间，在课桌后舔着笔尖，苦思冥想地求证着毕达哥拉斯定理的男孩子们，一下子全都跳了起来，推开椅子，争先恐后地跑出了教室。在厨房中跟着母亲学着做荤杂烩的小姑娘们，也忘了在抹布上擦一擦手，就飞快地跑到了街上。魔笛师在教堂的钟楼下等着他们。他朝城墙走去，穿过城门，吊桥在他经过时自动放下。一会儿后，他就来到了乡野的远处，身后跟着城里的所有孩子。家长们组织了搜寻，大沟小壑地找了一个遍，但什么都没找到，只得空手而归，森林吞噬了他们的后代。

然而，对于我，我总觉得，在这个美丽而又神秘的传说中，某些因素当然属于原始版本，但是，在流传过程中，人们歪曲了寓言，直到把它表现为一个关于报复和惩罚的故事。在字词底下，我明显感觉到一种嬉戏和轻松的氛围，跟故事结论沉重的道德观念十分矛盾。我尤其无法相信，这一支魔笛只是用来惩罚那些成年人的，乐手诱惑孩子们的唯一动机是报复他们父辈的忘恩负义。他们是那么欢呼雀跃地、蹦蹦跳跳地跟着笛子迷幻的声音走了！他们是那么愉快地抛弃了家庭，在乡野中组成

了调皮捣蛋和轻松活泼的队列！而他自己呢，在他含笑的眼睛中闪烁着多么亮的光啊！看到他在欢快队伍的最前面翩翩起舞，人们就会确信，在这位首创者的头脑中，不曾闪现过一丝一毫复仇的情愫，启迪了他智慧的，是要完成一项使命的纯粹的快乐！

于是，我计划彻底重写这个寓言，在我的笔下，它变成了一篇颂词，赞颂一种发现和一种突破，而不是局限于一种报酬上的清算。

我的魔笛师一开始被这不计其数的啮齿类动物吓坏了：与这成千上万龇着牙齿乱啃乱咬的家伙相联系的，是许许多多堆在屋顶下的面粉口袋，许许多多罩在食品橱里的奶酪，许许多多装在柜子中的卷边双层饼干。实际上，一个艺术家的心灵有什么好害怕的，他关心的只是发明出美妙的音，与宇宙的音乐秩序和谐一致，他并不会做数学上的精确计算，却能根据市民们积攒的食品的巨大数量，猜测出他们的性格本质。

他，一个全部家当只有一管笛子的可怜青年，如何能在哈默尔恩重现原始的单纯、生活的朴素、对未来的无忧无虑呢？“瞧瞧天空中的鸟儿：它们既不播种，也不收获，也不储藏。观察一下田野中的百合，看它们是如何生长的：它们既不劳碌，也不操心。”储存积蓄，担心匮乏，劳累终生的父亲克勤克俭以求丰衣足食，小心谨慎的母亲日夜把大衣柜、储藏室的钥匙丁零当啷地挂在裤带上，除了家规之外，还要加上学校的戒尺，这一画面深深地印刻在我们主人公的痛苦心灵中。除了在孩子们的心中，哪里还留有一丝天真？只不过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所有那些打着父爱名义的奴役，什么学校文凭的猎取，什么责任感的修炼，什么成人职责的准备，都还没有消耗完他们最美好的岁月。

如果说他决定要把他们带离城市，那是为了让他们分秒不误地见识真正的生活。

> 吹响吧，哦，笛子，奏出你的舞曲！
> 那旋律的灵敏跳跃
> 永不知道还有规矩的界限！

我的诗向禁锢二十岁以下年轻人的所有桎梏宣了战。我赞颂肉体的历险和青春的礼仪。我邀请少男少女立即享受他们的青春和他们的

美丽。他们应该在露天相聚并结合在一起,而决不是在一张床上,床只是日常的婚姻生活和固定时刻感官体验的象征。愿他们更喜欢播种季节淳朴的酒祭,远胜过深居幽室的囚禁。愿他们跳出家庭监狱的围墙,欢奔在笛师的身后,走向春天里欢乐与激情那无疆的远方!

四月里你们的四肢多么柔软,
娇嫩的鸟儿飞出了巢穴。
你们可曾听见母亲眼泪的滴落?
她们在你们空空的床头哭泣!

某种煽动性的情绪兴许糟蹋了这首春天的抒情诗:那时,我还没有明白,假如不再有什么考试,不再有什么文凭,那么,所有的地位、所有的职业都将落入富人手中。反对城市生活奴役的长篇议论,在我看来有那么一点点华而不实,但它很能取悦斯温。斯温被迫去了乌迪内,继续他的中学学业,因此,对学校生活的厌倦和对城市景色的失望这两种感情,终于在他的心中糅杂到了一起。同样,对自然的赞美,尽管不无夸张和俗套,却切切实实地刺激起了他对植物和花卉的热爱。即便他还要跟他父母在一起生活,他也不会抱怨我诗歌中针对父亲们和母亲们的攻击,因为我所说的那些庸俗不堪的人显然指的是市民,是城镇中的居民。而他,他是在农庄中长大的,抚养他的是一些小小的土地主,他们微薄的收益只够他们自身的温饱。他可能会想,我对一般家庭的暴烈态度并不针对他那个家;他要在孝敬长辈和渴望自由之间求得平衡和谐。他已经有过在别人的私人花园中偷花的违禁行为,他不会犹豫很久,就会跟哈默尔恩镇孩子们的队伍会合,跟我一起冲破禁令之门。

总之,在重读我的作品时,我是那么高兴自己在诱惑计划中不动声色地施展了小聪明,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作出结论,写下了一段更为大胆的诗行:

我会以我的笛声给你们讲述
我生气勃勃的裸体的神奇力量。

算了吧,我对自己说,欲速则不达,过于急迫地邀请,恐怕只会让他

掉转枪口对准我。然而,我又不能无休止地等待另一个机会到来,既然洗澡的诱惑从我身边溜走了。他读了我的诗,又重读了一遍,把它折叠好,塞进了衣袋,脸上显然是一副高兴的样子。但是,想到是他启迪了一篇专为他而作的文学作品的灵感时,他又怎能对我隐瞒,在他的眼中,这一事实给他带来的快乐要远远胜过诗歌的内容, 胜过诗中对传说的努力阐释呢?

任何一个阐释者都会注意到,有了带密封门的凯尔维纳托[1],老鼠是够不到奶酪的。哈默尔恩的市民因此应该降低给魔笛师的报酬,如果按照鼠灾给他们的储藏品带来的损害成比例计算的话。

真是有悖历史年代的荒诞和精确计算之间的怪异糅合, 这一看法令我目瞪口呆。我开始泄气,在心中对我自己说了一句命中注定的话:“算了,还是放弃了吧!”一会儿,我重新抱定了希望,因为斯温就俯在我自行车的车梁上,放开车把,把我抱紧,一会儿,我又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人,因为,当我的脚踏在了一个荒凉而又偏僻的地方时,我看到他跑去寻找新的鲜花,丝毫不曾猜想,那地方的偏僻和清爽本来更适合于做另外的消遣,而不是采集植物。

他想根据我诗歌中的种种描写,修改关于魔笛师的壁画,但是,在小教堂那堵墙上画着的孩子们的游行队列中,他做的唯一重要改动,是把年轻的音乐家变成了老头儿,为他加上一把灰白的胡子。他揉搓了马勃草,得到了一种理想的灰颜色,再用在岩石上接得的雨水把它稀释。这是天真无邪的奇思怪想,还是三思而后的残酷念头? 如果说,在斯温看来,引导和启迪年轻人所需要的必要品质,更多的是年龄、经验和权威,而不是狡黠的开心和肉体上的诱惑的话,那么,我采用日耳曼古老寓言作为表达私人情爱的尝试,无论如何算是失败了。

我沉浸在苦思冥想之中,怀着一种忧愁和灰溜溜的神情,欣赏着他的作品,就在这个时候,他过来将小小的躯体钻到我的怀中,把脑袋靠在了我的胸脯上。

“您会永远爱我吗? ”他喃喃道,没有抬起眼睛。

---

① 凯尔维纳托(又译开尔文)是一家电器公司的名字,该公司以生产同名冰箱而闻名全球。

我坐在一棵山毛榉下的草地上,伸开胳膊搂住他。

"斯温!"我叹了一口气,抚摩着他的后脖颈。

"那么,亲亲我吧!"

他后仰起脑袋,朝我伸过嘴唇来。就在我们的嘴快要碰到时,泪水突然从他的眼眶中流了出来。

"斯温!"我惊叫着,后退了一下,"你怎么哭了?"

他挣开了我的怀抱,跪倒在地上,脸埋到了土中,身体因哭泣而颤抖着。我试图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起来,他的四肢战栗不止,抽抽噎噎的,怎么也控制不住浑身的痉挛。我跪在他身边,在他耳边窃窃私语道:

"不要怕,斯温。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像兄弟姐妹那样相爱好了,行吗?"

他擦干了眼泪。一丝微笑,两个酒窝亮了出来。我们靠在树干上,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我把他放在我的腿上,像哄小孩睡觉那样地拍着他,把他的鬈发理整齐,在他因刚才的激动而肌肉依然一阵阵地抽搐着的脸上,为他擦去泪水的痕迹。

他终于睡着了。没有注视过自己心爱者睡着时样子的人,不会知道自己错过了多么甜美的时刻。我这颗被焦虑和占有折磨着的心,从来没有感到过一种那么平静、那么纯洁的快乐。仅仅是敛住我的气息、不让被蚂蚁爬得痒痒的腿动弹,就足以令我幸福无比。洒落在田野上的金色阳光,破败教堂哀歌般的魅力,在桦树林中飞舞的燕子的呢喃,兴许,危机过后情感上虚弱和宽容的时刻,这一切,在我的胸中激起了一曲赞美隐身藏于大自然的上帝恩赐的颂歌。若是再有一阵教堂的钟声,就可以让我再次沉醉于儿童时代的神秘氛围中,但是,德国人拿走了青铜大钟,把它熔化了。

从这一天起,我们之间有了一种新的默契。如果说,斯温擦掉了壁画上魔笛师的胡子,又还他以年轻的外表,那么,我就能确信,他会到山毛榉树下来找我,让我抚摩他,哄他,宠他。我们嘴唇的一次迅速碰擦给我带来希望,觉得我诗歌中隐含的信息会很快到达它的目的地:就像传说中的小男孩们被乐手引导着那样,斯温也将被我引导着,走向陌生的神秘森林。有时候,一次不那么无意的亲吻,能确保一下午紧张而有效

的工作。

我应该特别小心,不要粗暴地对待他的意愿。假如我的手指头试图解开他衬衫上的一粒纽扣,朝他赤裸的肌肤打开一条通道,他就会一下子站起来,朝向他的壁画,他的第一个念头将会是再给魔笛师添上胡子。他总是把剩余的一点点马勃带在身边,放在一只小桶里。插在特里斯丹和漪瑟睡铺中央的利剑[①],也不会比这灰颜色对斯温和我来说,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灰色的储存,就放在积有雨水的岩石旁的草地上。

19

夏季开始衰竭。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就这样走向了结束,而没有给予我平静的心境吗?九月份变化更微妙的色调和气温更平和的白日,把平静给予了花园中的鲜花,葡萄园中的枝蔓,厩栏中的牲畜,树枝上的鸟儿,田野中的石头,给予了整个大自然,就独独不给我了吗?

海报上说,星期六晚上科德罗伊坡的露天电影场要放映《吉尔达》,一部已经引起轰动的电影。美国人推出了一个新的影后,她的肖像装饰了在比基尼环礁[②]投下的原子弹。人们说,一个探察队已经出发去了长长的安第斯山脉,要把这一杰作的一个复制品埋葬在山里。

斯温求了我两次,我终于答应骑自行车带他去。当然,好莱坞伟大的女演员们早就引起了我的羡慕,早在博洛尼亚,我就跟我中学的同学

---

① 在中世纪克尔特人的传说中,骑士特里斯丹因误服掺了春药的酒,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他舅舅马克国王的妻子漪瑟,所以两人都被国王驱逐。但在森林中度日的特里斯丹和漪瑟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贞洁的,因为在他们睡觉的地方,总是有一把利剑插在两个人之间。利剑为"不可逾越"的象征。

② 比基尼环礁在太平洋中的马绍尔群岛,为美国的核试验基地。

们一起发现了美丽得惊人的玛琳·黛德丽、葛丽泰·嘉宝、诺尔玛·希勒、琼·克劳馥，如今，我寻求认识新的女明星。你还记得吗，我说过的，她们让我喜欢的基本原因，就是跟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女人缺少相像之处。我要求她们活动在一个神秘的星球上，跟我生活的世界毫无接触。正因如此，我不喜欢新现实主义电影中的任何女主角，尽管她们统治了当时的意大利影坛。她们不应该穿卡萨尔萨邮政局女职员的那种灰裙子，不应该梳波代诺内奶酪女商贩的那种螺旋形鬈发。

《战地钟声》中的蕾阿·帕多瓦尼也好，《强盗》中的卡尔拉·代尔·坡乔也好，都无法媚惑我，她们洋溢的感情是平民化的，她们的活力是唧唧喳喳的，反正并不比《粒粒皆辛苦》中的西尔瓦娜·曼加诺[①]裸露的大腿，还有《自行车美人》中西尔瓦娜·旁帕尼尼胀得要爆出来的乳房更吸引我。我去看电影是为了忍受我在现实中急于逃避的女性那活跃的骚扰吗？《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让我受到极大的震撼。我承认罗塞里尼[②]已成为第七艺术的先锋。但是我满怀忧虑地想，从此之后，女演员们是否要将登峰造极的安娜·玛尼亚尼式的生理冲动充斥整个银幕呢？

只有维托里奥·德·西卡[③]的电影，里面没有女人，才让我感到彻底的快乐：《擦鞋童》和《偷自行车的人》，尤其是后一部，主人公尖嘴猴腮，喉结突出，褐色头发，清瘦身材，按努托的说法，跟我的相貌倒有几分相似。我喜欢那个破旧的罗马近郊，他晚上穿过那里，回到他那个还没有造好的水泥楼；这条河流两岸令人伤感的景象，那些肮脏的草坡，那些废弃的高高的瓦砾堆，那些建筑无产者住所的工地；这整个背景，我觉得，比起我艺术书中的纳沃纳广场或者古竞技场[④]来，有着更多真实的诗意，当然，我丝毫没有想到，再过几年，它会成为我自己生活的环境。另外，有谁知道，对这部电影的回忆是不是影响到了我，使我在刚到罗马时选择了在那个街区居住？

---

① 西尔瓦娜·曼加诺(1930—1989)，意大利电影女演员。

② 罗贝托·罗塞里尼(1906—1977)，意大利电影导演，《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是他的作品。

③ 维托里奥·德·西卡(1901—1974)，意大利电影导演，1966年获得法国国籍。

④ 纳沃纳广场和古竞技场都是罗马城中著名的名胜古迹。

还是回到《吉尔达》中来，我很愿意把斯温带到科德罗伊坡去，尤其因为我特别欣赏那巨大橱窗中新明星的肖像，在电影《偷自行车的人》中，那个贴海报的人，就在自己的自行车被偷走前，把这样的肖像贴满罗马大街的墙。肖像中的她袒胸露肩地展现在雾蒙蒙的一派灿烂辉煌中，像战前最伟大的女明星一样虚无缥缈，一样神秘莫测。这是我理想的女人。理想，是因为不可企及。她流亡在一座美与豪华的奥林匹斯山上，让人无法接近。凡人只能默默地崇拜她，不用担心会看见她朝他们走来。

努托，以他惯常的狡黠，把我当做白痴。我难道不懂得这样一张海报的论战价值吗？为什么一个像德·西卡那样的左派导演，会在自己的电影中把她塞进去呢，难道不是为了揭露麻痹人民的新鸦片吗？难道我认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挤住在贫民窟中的那些家庭，会不觉得这个穿着花边丝绸衣服的大娃娃那露着高露洁牙膏刷出洁白牙齿的微笑、抹着口红的嘴唇、涂着眼影的眼皮，是对他们悲惨生活的一种侮辱吗？

"一个世俗版的圣母，"曼利奥强调道，他最近也加入了共产党。

我心想，从严格的政治观点来说，朋友们的话都说得很有道理。配合《吉尔达》的上演而出售的唱片，包含有通过听诊器录下音来的女主人公的心跳；实际上，就物恋与偶像崇拜的意义而言，这是某种类似于圣母之泪的东西，就像修女们和虔诚的女信徒们所声称的那样，在贝内文托的无玷始胎圣母修道院中看到了祭坛上矗立着的圣母雕像上流下来的眼泪；那可是当时在意大利轰动一时、四处流传的奇迹。

然而，我不想满足斯温的犹豫态度还有别的理由。

因为我知道，场地上挤满了我这年龄的观众，他们性情各异，精神状态也跟我完全不同。他们的情爱生活被两性间的严格的清规戒律分隔了，便希冀电影女演员能代替他们无法触摸的未婚妻，能给他们烈焰般燃烧的感官提供一种交换的愉悦。跟我不同，他们相信明星们在银幕上有血有肉的存在，他们需要这样去相信，好想象自己在往她身上贴。幻觉越是大，她就越能迅速变成他们的偶像。此外，用词也跟着变了：人们不再说一位明星，而是说一个贴画女郎。人们贴在自己墙上的，随时伸手可及的女人，代替了消失在苍穹中的星星。一场电影越来越不像是

一次艺术的节庆了。电影演到最大胆的情节时,一把把椅子就开始使劲地摇晃,电影院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那么粗野的自由,以至于母亲们和姐妹们全都心照不宣地留在了家中,把电影院留给了男性公众。

除了要在斯温羞涩的目光下,表示我对这种下流发泄的厌恶,我还担心会遇见努托和那帮子朋友中的其他人,自从我恋爱之后,我几乎把他们丢在一边。他们可能会责备我,村里的最近几次节庆,我一次都没去,而且,见了我的小伙伴后,他们一定会问我一些让我很难堪的问题。我在售票处附近,在不耐烦地跺着脚的人群中,发现的第一张面孔,就是这个黑皮肤充血的脸。他远没有被新的"人民的鸦片"麻痹得昏昏欲睡,反而像一个美丽的魔鬼,起劲地说着一句句下流话,逗得同伴们哈哈大笑。看见我时,他稍稍有些尴尬,因为,那一番针对美国资本主义的高谈阔论并不妨碍他也赶来看电影,他抬了抬帽子,露出涂了发膏的闪亮的头发。

至于曼利奥,他正在褪色的海报前拉着手风琴,演奏一曲无精打采的探戈舞曲,无论在弗留利的土地上,还是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圣母马利亚,会在自己的圣龛中接受如此的献礼。金发的艾尔米罗,尽管神色悲哀而苍白,仍声嘶力竭地说着可疑的粗俗笑话,这引起他一阵阵剧烈的咳嗽。幸亏人群拥挤,我得以避开那帮人,跟斯温一起坐在了最后一排,就在当做围墙的芦苇树栅附近。

演职员表刚放映完,夜空中就掀起了温和的波浪,一阵阵寻衅性的呐喊和淫秽的插科打诨此起彼伏,目标全都针对那些男演员,仿佛他们就是血管中流着鲜血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在好莱坞拍摄的一连串机械的照片,只是装进了盒子,漂洋过海来到大西洋的另一岸,而且永远都不会变动了。

"小心点,你会把裤子扣绷飞的!"第一排中发出一声大叫,立即引来一阵哄堂大笑,这时候,格伦·福特正半眯着眼睛,伸出嘴巴,朝女主人公俯下身子,一副神色是那么贪婪,使人担心他条纹裤子的前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乔治·麦克里迪,那个丈夫,刺激了观众们嘲笑的兴头,一开始是作为丈夫,而丈夫总是比情人要讨厌一千倍(这是他们赋予自己最后的自由,只要他们还没有脱离独身状态,还没有变得在"名

誉"上毫不妥协)，后来，则是由于他不断监视着情敌的一举一动的、忧愁而警惕的目光。

"今晚上你打了多少炮？"

"要不要把我的家伙借给你使使？"

"这可不是搞得精光的时候！"

我偷偷打量了一下斯温，他正严阵以待，这使我克制住不加入起哄。努托大获全胜，他戏弄了银幕上的女演员，因为她一丝微笑就开启了她湿漉漉的嘴唇。

"小心！他要进到你嘴巴里来了！"他嚷道，从他的座位上蹦了起来，成了他所有同伴们的目标，接受了他们无羁的欢呼。

但是，当她身穿一条紧窄的异国花卉图案的裙子，一条开襟短背心使得乳房底下的一片肌肤袒裸，开始唱起了《我亲爱的郎君》，一边唱着这首叙事曲，一边伸展开胳膊翩翩起舞，这时，喧闹声停止了，观众们似乎迷醉了。你今天兴许会觉得，这女人甚至都说不上漂亮，她的目光有些近视，她的瞳人有些散神，她刚刚脱自美发师之手的烫发有些矫揉造作，她的嗓音像糖浆一样发黏，毫无表达力（我们并不知道这是配的音）。然而，恰恰需要这浪漫的清淡，杂乱的风雅，还有神秘与愚蠢的混杂，才能迷惑住满场子粗暴而又鲁莽的男性。在他们的耳中(就如同在美国兵的耳中，他们从前线回来后，一致决定看这部电影)，这首出于一种商业考虑，由一个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专业人士从拉丁美洲民间文化中选出来的歌曲，似乎就是时髦和风尚的最彻底体现。除了这场景，你还要加上温柔夜色和星辰苍穹的想象，这样，你就将明白观众为什么会鸦雀无声，他们很惊奇，以前属于玛格丽塔·坎西诺的假嗓音，经过特技处理就变成了丽塔·海华丝[1]。斯温抓住了我的胳膊，让我搂住他的脖子，就仿佛他想更紧密地跟我一起分享那份令他发呆的神怪的惊奇。

第二首歌，更为著名——开始时是喃喃声，结尾时是欢乐的高唱——把我们带到了圣莫尼卡[2]的一个酒吧间。他在被他形容为

---

① 丽塔·海华丝（1918—），美国电影女演员，40年代的性感明星，在《吉尔达》(1946)中有老练的色情表演。

② 圣莫尼卡在美国。

"select"的闪闪发亮的背景面前狂喜,这个词是从美国舶来的,跟"slip"、"flipper"和"chewing-gum"①等一起被意大利青年采用。顾客的桌子上放着香槟酒,乐手们戴着蝴蝶结"轻松地演奏"②,圆圆的舞池打了蜡,在光束的照射下泛着光。一件黑颜色的塔夫绸紧身衣,束住了吉尔达那纤细而又柔媚的身体,一直盖到乳房刚刚隆起的地方。手套,同样是黑色的,长得从来没见过,一直戴到胳膊肘以上。袒露着的胸脯上部和肩膀白生生的直晃眼。她独自待在舞池中,在追灯的笼罩下,一张张桌子反倒藏在了阴影中。她开始唱起了《这都怪妈妈,孩子们》,立刻,随着她胯部几乎难以察觉的轻微摇晃,观众中掀起了一阵骚动。每个人都猜想,一件异常而又美妙的事情就要发生。实际上,也确实没有人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美国电影那种平庸的脱衣服(极为流行的"脱衣舞"③),她开始小心翼翼地脱下一只手套,动作无精打采,而且慢得让人着急。斯温正是趁着这一时机,把他的脑袋靠了过来,搁在我的肩窝里。手套渐渐地往下脱落,一段藤枝般的胳膊展露在了灯光下。它简直像是在自行动弹着,独立于女歌手一成不变的微笑和单调乏味的嗓音之外。

"电影明天晚上要去波代诺内放,我们再过去看吧,你说好吗?"当我把斯温带回到他家农庄时,他这样问我,而刚才在穿越熟睡中的田野的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我亲爱的郎君"④,我骑在回家路上时轻轻地哼着。随着形象的魔力慢慢地散去,我对刚刚讲述给我们的那个故事的主要轮廓分辨得更清楚了。照批评家的看法,剧本很没劲。一个阔佬接待了一个流浪者,并雇他在自己的酒吧间工作;流浪者的漂亮脸蛋(格伦·福特的脸像个贪吃的娃娃),阔佬妻子惊人的美貌;双方一见钟情:确实,还有什么比这三角恋爱故事更矫饰,更俗套,更愚蠢?只不过,我心里说,弯了一下车把以免压上一只蟾蜍,必须注意到的是,影片一开头,那个丈夫在我们

---

① "select"、"slip"、"flipper"和"chewing-gum"的意思分别为"精选"、"三角裤"、"橡皮蹼掌"和"口香糖"。

② 原文为英语。

③ 原文为英语。

④ 原文为意大利语。

眼中表现得似乎并不那么爱他的妻子（她是以酒吧间女明星的身份嫁给他的），兴许他对所有女人全都没有什么好感；而那两个情人在互相点烟时彼此看着对方的那种眼神，真是古怪极了；他们为争夺吉尔达而彼此产生的敌意，甚至比吉尔达本人还让他们来劲；最后，他们彼此关切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人们能想象的一个雇工和他老板之间的关系。

波代诺内的年轻观众如若听到我的这番思辨，恐怕会大声叫嚷起来，以他们伟大的神明起誓，说他们对电影的热情会毫不含糊地粉碎我含沙射影的批评：凭着他们无知的逻辑，他们根本不会猜到，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从来不会给一项更为大胆的计划投资，而他们自己，已经无意识地认同了一种审查的要求，不肯为一部毫无顾忌地涉及犯禁题材的电影鼓掌。

在放映过程中，斯温表现得是那么温柔！他是何等放松地把他的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明天晚上，在波代诺内，又会怎么样呢？对新的一场电影，能期待什么？能希望什么？后来，在罗马，我在我的朋友弗朗切斯科和塞尔乔这一对的家中，看到整堵墙壁从上到下贴满了美国女演员的照片；一幅玛丽莲·梦露的巨幅画像缀饰了他们床头的墙。在歌剧院里，四分之三为普鲁斯特和让·热内[①]崇拜者的观众，面对着卡拉斯[②]听得如痴如醉。一些小伙子在他们的电唱机中听《高贵的女神》[③]时，发现了他们彼此间的爱，许多得不到任何神甫祝福的结合，就在薇奥莱妲和阿尔弗莱多[④]分别的那一刻确定了。电影女明星和美妙歌曲[⑤]的女歌星，为什么在那些对女人们不感兴趣的男人身上会产生那么强大的诱惑力，而银幕上和舞台上的奇迹却不至于给她们戴上光环？我把自行车放在楼梯下，蹑手蹑脚地上楼，以免惊动妈妈。这时，我远远没有悟到，丽塔·海华丝提供给我的，正是我向绘画和诗歌求而不得的那种媒介，

---

①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让·热内都是同性恋。

② 玛丽娅·卡拉斯（1923—1977），希腊女高音歌唱家。演出的著名歌剧有《诺尔玛》、《托斯卡》、《迷途的女郎》等，她后来在本小说主人公帕索里尼导演的电影《美狄亚》中扮演角色。

③ 《高贵的女神》是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中一段唱腔，一般公认卡拉斯演唱得最佳。

④ 薇奥莱妲和阿尔弗莱多是歌剧《茶花女》中的男女主人公。

⑤ 原文为意大利语。

而斯温,对我那魔笛师的召唤充耳不闻,却抵挡不住戴手套的塞壬[①]的歌声。

在波代诺内,电影是在一家电影院里放的。我们的头顶上没有了星星;没有了风儿吹拂在芦苇丛中发出的沙沙声。有的是烟草和汗水的味道。头几排观众在自我抚摩,想入非非地以为伸手就能碰到那黑色的塔夫绸衣裙。斯温想待在后排,就像头一天在科德罗伊坡那样。听到第一首歌时,他就蜷缩到了我的怀中。也像头一天那样,开始时那些淫秽的玩笑话,到后来让位于心醉神迷的寂静。甜得发腻的嗓音响起,"我亲爱的郎君"[②]。斯温像是一只幼畜那样在我的肩膀上瑟瑟颤抖起来。等到吉尔达让第一只手套掉下来时,他悄悄地对我说:

"就现在吧,我求您了。"

这一声"就现在吧",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回响在我的耳畔,像是一首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美的情歌。我们的动作很简单,不慌不忙,十分和谐。他发出了一声叹息,那也是很轻很轻。第二只手套柔柔地旋落到了地面,白生生的胳膊像一截藤条慵懒地动弹着,仿佛细水的微澜。但是,当我想该轮到我接受我那份幸福时,他却直愣愣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假装认真地看着银幕上情节的进展。

"耐心一些,"我对自己说,"尊重他的意愿。你若匆促行事,会吓了他的。你刚才的样子像是在讨工钱似的!"

我更多的是不满我自己,而不是气恼他的拖延,分手时,我希望他能提出再去看一次电影的建议。农庄里,他家里的人还没有睡;灯光从百叶窗上透出来;看家狗在自己的窝里啃着骨头;从二层楼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嗓音,唱着摇篮曲;一个男人在门前披檐下劈柴,他把斧头扔在木柴堆上,趿拉着木鞋穿过院子。斯温向我伸出手,就在水泵旁边,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地方。

"我必须告诉你……"他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斯温!"我叫了出来,嗓子眼被一阵不安堵住。

---

① 塞壬是希腊神话中人身鸟足的美女,住在地中海的一个岛上,用歌声来诱惑过往的水手。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他回过神来，把鬈发向后一甩，直瞪瞪地盯着我的眼睛，一脸挑战的神气，然后，他一口气宣布说，他明天就要去帕多瓦了，他父亲让他到一个农业学院当寄宿生。

20

我感到一阵窒息，像是被钉子钉在了院子中央，动弹不得，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道门，斯温刚刚消失在了那里头。二楼上的嗓音沉寂了。母与子是不是正在窗缝后津津有味地窥看着我呢？我跨上自行车，飞也似的蹬行在没有月光的夜色中。经过那棵我们常在树底下约会的苹果树时，我腿肚子哆嗦不已，不得不停下车来，一屁股坐在了弯弯扭扭的树枝下。

老树再也不会用它多结多瘤的树洞掩藏我们的秘密了。我在波代诺内订购的十二头折叠刀留在了我的桌子上，在订书机、圆珠笔和镇纸中间慢慢地生锈。

当我苦涩地哭了一通后，我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下定了两个决心，从它们的荒诞性中，你就可以看出我当时的思绪有多乱。

首先是：我再也不跟漂亮小伙子搭界了。远离优雅、美丽、细腻的诱惑。“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你的错吗？”我问自己。“天使般的少年不适合你。你还记得，在博洛尼亚：假如你在尼科洛·代尔·阿尔卡[1]的小天使面前继续升华的话，你就会陷在可怕的羞愧中，无以自拔。那时，是米开朗琪罗救了你。你还不如星期日下午到足球场边上逛逛。你应该是一个运动员，一个硬汉，一个拳击手，而不是一个画家。”一想到，用不了多久，秋天的雨水就会把“我们的”小教堂墙上的魔笛师以及那一队孩子冲刷

---

① 尼科洛·代尔·阿尔卡(约 1460—1494)，意大利雕塑家。

得干干净净,我心中一酸,又是一阵热泪滚滚落下。

“其次,再也不要找金发小伙子了。”这一决心,比第一个还更奇怪,引导我从弗留利走向罗马,从罗马走向那不勒斯,从那不勒斯走向第三世界国家。就在那棵树下,我确定了我的线路:从金发的北方,走向褐发和黑发的南方。

不仅仅是因为被我称为斯温之背叛(我当然说错了)这件事,我那帮朋友摆在我眼前的例子,也促成了我的地理选择。金发碧眼的艾尔米罗,两个眼睛蓝得如同两片钢刃,消费了不知多少数量的纸巾(这也是美国舶来的新玩意),才算止住了他厉害的咳嗽。不久,他就去了多罗米特地方[①]的一个疗养院,从此一去不再复返。黑皮肤的鬈毛儿努托则相反,所有的创新、所有的幸福全都属于他:他摆脱了姑娘们,人们总是看到他冲在土地斗争和反失业示威的最前列,红领巾系在喉结前,尖尖的领巾像旗帜的一角那样被风吹得哗哗响。晚上,在乡村的舞会上,年轻小伙子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接过他那辆奥斯卡-艾格牌的变档四速自行车,把它停靠在安全的地方。

一个奇怪的方程式在我脑子里形成:我把金发跟失败联系在一起,而把黑发与成功结合在一起。“假如他不是金发,你就会付出更多的精力来征服他。”我心里想,确信是斯温的浅色皮肤和金色鬈发,导致了我们交往的突然终结。我从我的失败中感觉到一种挠心的屈辱:我一心想成为征服者一族,而不是被征服的种类。这是不是二十年法西斯主义教育的无意识遗产?失败,这个在新浪潮作家的眼中——在意大利如同在欧洲其他地方——开始变得神奇的词,在我的眼中却没有任何神秘。对我而言,受挫和败北很少有迟暮浪漫主义的色彩。我更喜欢努托这样的人,他恐怕会成为我儿童时代蓬皮亚尼的“钢铁之书”中的英雄,我喜欢他远远超过艾尔米罗,艾尔米罗只是死亡女神苍白的未婚夫。这天晚上,我前所未有地下了决心,永远不被人击垮。按照我巴罗克式的逻辑,我起誓,从此只跟深暗色皮肤的人来往,以满足我对生命活力的渴求。

“再也不要金发了,”但是,这句亵渎性的话刚刚说出,我又一次泪

---

① 多罗米特是阿尔卑斯山的一地名,位于意大利一侧。

流满面。“怎么？”我抽抽搭搭地说，双手紧紧地抱住老苹果树的树干，“你还敢把在他可爱的脸蛋周围飘浮的光晕，跟努托乌黑头发上闪闪发亮的发油作对比吗？”

政治活动把我从神经质的失意中拯救出来。当我明白到，斯温去帕多瓦的事，早在他读我诗歌的那一天就已经确定了时，羞耻的红晕飞上了我的面颊。

“他该怎么想你呢？你那针对家庭和学业的双重讽刺尤其没有好结果。当你让他阅读那些荒谬的玩意时，他父亲正在采取唯一可行的措施，以保证他有一个适合他的未来。他在一个农业学院注册了寄宿生，为了获得他的农艺师文凭。对于他，这是从经济上飞黄腾达的唯一办法，难道不是吗？你的行为完全像是一个阿姑仔：利用金钱上的优越性，来缠住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你或许以为，送他一个弹弓和一条三角裤就足以补偿他命运的不公了吗？为他买一张电影票，电影散场后再买一个冰淇淋，你就对得起他的良心了吗？不是的！你要牢牢地记住，斯温最高兴的是，国家——遭你叱责的国家——能让农民的儿子享受某种学校教育，在你的诗中被形容为孩子之监狱的学校教育，因为它能使他避免你这一路货色假惺惺的仁慈。他对比了两种社会升迁的体系：一种能民主地给予他机会，而且那些机会是由评委们公正不偏的严肃性来保证的，而另一种，正好相反，要把他同化为……为……”

一想到斯温可能误解了我的爱，我的眼泪便流得更加汹涌。这是我第一次把自己当成一个阿姑仔。“真是可咒的同性恋，”我高声嚷起来，“是不是碰到第一回挫折时，我们真的就准备贬低自己，糟践自己呢？我们缺少诚信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吗？说得更严重一些，你是在亵渎一段神圣的回忆，以无端的指责诋毁你自己。你没有这权力。你没有权力给你跟斯温经历的这一切抹黑，无论出了什么事，这段经历将始终是你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然后，我把脸颊贴着我们这棵树的树干，仿佛我抱在怀中的不是粗粝的树皮，而是斯温本人。我低声地叫道：“斯温！斯温！你不是爱我的吗？”

就这样，我动荡于怀疑、悔疚和未来的誓言之间，惭愧我过去的行

为，怜悯我目前的不幸，心中只剩下一点确信：在弗留利跟社会不平等作斗争的义务。斯温父母亲的贫穷生活，从我心中夺走了他们的儿子，因为他们不得不把他定位在帕多瓦。只要在阿尔卑斯山和大海之间，把泥泞的和肥沃的土地重新更公正地分配一下就行了。我在这个家庭的情况中，看出了一道迫切的命令，要超越农民暴动那无政府的浪漫主义，以一种更成熟的介入，投身于革命斗争中去。

星期一，斯温出发去了帕多瓦。星期四，我就去领了我的共产党员党证。我是在哪里注的册？当然不是在卡萨尔萨当地。要知道，村庄的墓地中，朝向瓦尔瓦索纳的出口，两年来一直长眠着基多，我那被斯大林派分子杀死的弟弟。另外，在卡萨尔萨，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着绝大多数人。我当时就在苹果树下下定了决心，决不把自己的命运跟注定要失败的事业相联系，我选择了圣乔万尼的支部，1946 年的选举中，共产党在那里赢得了七百张选票，而带十字架的盾牌[①]只有四百二十张。我的这一举动是瞒着妈妈的。很长时间里，她一直不知道我已经加入了杀害她小儿子的那一伙。你瞧，我政治活动的一开始就带着一些含混的小算盘。这是一个暧昧的政治选择：我以为站在了"理性"和普遍思想的旗帜下，而实际上，我寻找的是一条个人冲突的出路。

至于政治斗争的热情，我一点儿都没有可指责的地方。在两年期间，人们看到我始终冲锋陷阵在前。我还为省里的一些报纸写文章，什么乌迪内的日报《自由报》啦，什么党的地方周刊《斗争与劳动》啦。我组织群众大会，我在选举会上演讲，我召开支部会议，我在工厂里朗读诗歌，我在乌迪内为我的朋友朱塞佩·芝盖纳举办一个新现实主义绘画展览。1948 年，我还作为乌迪内省的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爱好和平者代表大会。（在法兰西的首都，我惊讶地看到，家庭主妇们手中不带任何保护地直接捏着面包，接下来买别的东西时，她们就把面包随便往那里一放，放在肉店多少算不得太干净的肉案子上，放在装蔬菜的柳条筐中，放在钱柜边上，跟肮脏的钞票在一起。而在我们家乡，面包都是要被面包商小心翼翼地包好的。所有的法国人都那么脏吗？在经历了

---

① 指基督教民主党。

一连串遭遇后,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怀疑,因为,曼利奥在地铁中被人偷了钱包,努托被房东敲了竹杠,他明明每天早晨在外面吃饭,房东却在账单上写了早餐费。)在4月18日乱哄哄的选举之后,同志们的情绪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创立了波代诺内省的委员会。庇护十二世[1]把马克思主义者逐出教会,给我们即将在农民群众中取得的胜利以致命打击。农民们跟天主教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屈从于罗马教廷的威望,回到了他们古老的铁锹上,拒绝了镰刀[2]。

两个棘手的问题搅乱了战后的弗留利:自治和方言。基督教民主党支持自治派,期待由此加强他们在教徒市民中的权威。共产党则与自治派作对,理由只有一个,因为它的敌人支持他们。我试图在我的政治活动中独立于党的立场,来正确理解这一问题;我发现,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保卫自治都很有兴趣;我们不得不考虑跟南斯拉夫的兼并问题;其他十来个漂亮的推理,使我在知识分子党员中显示出才华,也使我对省委领导人产生了怀疑。

我对方言问题的意见,似乎更让他们觉得有颠覆性。自从光明派运动和复兴运动以来,意大利左派就一直在宣传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为半岛上所有居民共同使用的一种唯一的交流工具,是社会进步和经济进步的要素,是消灭大众迷信的方法;因为,民众在用方言撰写的教会出版物中,发现了对迷信的支持和鼓励。为了跟这一观点作斗争,我援引了一些著名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的著作,我甚至还到18世纪末的德国浪漫主义那里,寻找一种担保。我声称,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一种自己的语言,才能意识到自身的价值,自己的本体性;尤其是在意大利这样一个中央权威始终显示出掠夺性(其最后的一个例子:便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你要保留贫穷阶级的利益,就得通过保卫他们独特的土话。

既然我的目的是向你揭示隐藏在我论据底下的个人动机,那么,我何苦还要拿我们论战的细节来惹你厌烦呢?

---

① 庇护十二世(1876—1958),意大利籍的教皇(1939—1958年在位)。

② 共产党的党旗上有镰刀的图案。

当我站在铺着红呢布的桌子后，手舞足蹈，吐沫乱飞，试图以那些我以为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想法，说服那些听众时，他们本应对我说出下面这样一番话："眼下，你的父亲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他是不是在他的顶楼上转着圈，看着他搜集的那些战利品，为意大利军队的覆灭而哀叹？这个星期以来，他已经喝了多少瓶法国的皮诺葡萄酒？不要这样跟我们耸肩膀嘛，你用不着反驳说，你父亲灌下的酒精数量，还有他投在回顾自己军营生活上的轻蔑目光，跟我们弗留利的自治没有丝毫关系。假如它们真的没有关系，就像你站在高高的讲坛上，一再顽固地回答我的那样，你就不会待在这里了，因为，那样的话，你就绝不会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是阅读马克思的书促使你做出了这一决定吗？那么好吧！你敢不敢说，你对弗留利劳动者的状况已经开展了一种客观分析？你说的都是无聊的废话，你自己心里清楚。你需要一个父亲，你到党内来寻找的，是一个父亲。一个父亲，就是说，找一种权威，一种纪律，一种法则，找你所缺乏的所有一切，不是别的，就是你缺乏的一切：一开始，被这军官长期束缚时，后来，他归来之后，你发现了他无可救药的衰弱时，你所缺乏的一切。

"承认吧，你更喜欢遭遇一个强有力的、统治人的男人，而不是每天晚上溜到你那个失了势的父亲房间前的过道，给他送去葡萄酒。惊慌失措的你，一开始参加了行动党：那是你弟弟的党，自由左派分子的党，曾作为抵抗运动灵魂的党，它对你很合适，对你，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假如你愿意以一种理性的介入为左派服务的话。但是，由业余政治家组成的行动党，既没有坚固的结构，也没有牢固的组织；由于你实际上是在暗中寻找着，想回归到童年时代那种隶属的、羁绊的条件下，想补偿你青少年时代遭受的挫折，你就转向了一个更强有力、更严肃的党，在这党内，上下级别是铁定的，每一个党员都应该严格服从上级。总之，党为你提供了一种跟一个父亲的权威与戒律最相似的对等物，作为一种迟来的补偿。要知道，你在你的整个生命中，都将需要以一种对党的权威与戒律的服从(哪怕，作为一个不耐烦的儿子，偶尔要造一下反)，来补偿你从根本上所缺少的一个父亲的权威与戒律；既然如此，那么就只有共产党，才能像一个父亲发布命令和纪律那样，颁布

一种命令，一种纪律。”

真理之声应该会这样说。对我的政治转向继续作分析之后，它恐怕还会补充道：“不难预见，你跟党的关系将永远动荡不定。党将是你的父亲，你将被引导着跟它作斗争，就像你跟你父亲作对那样，假如他从内罗毕归来之后，不是把自己关在陋室中，一天只下楼两次，静静地坐在饭桌前跟家人一起进餐，而是野心勃勃地统治全家的话，你一定会跟他狠狠斗一斗的。你越是急切地寻找父亲的代替者，因为你跟所有人一样，需要对自己跟法令的关系作一个定位，你就越是憎恨这一替代者，因为，在他面前，你重新看到了使你父母分隔的战争。现在，瞧一瞧你自己吧，你正在宣扬弗留利的地方自治，宣扬保护方言的必要性。你真的以为，你需要打扰德国浪漫派，还有普林斯顿的语言学家，来证明你的选择吗？请真诚一些，承认弗留利是你母亲的家乡，弗留利方言是你歌唱母亲用的诗歌语言：如果说，你恰恰在它要求你放弃你母系遗产这一点上跟共产党的论点作对，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那军官穿着意大利军队统一的制服，而你则为了方言的多样化而斗争[①]。他用民族的官方语言发布命令，你则揭发它给你在摇篮中就听到的语言带来的损失。他接受来自罗马的指令，你则为一个外省政府、为一个地方议会的利益而奋斗。还要我继续阐释吗？来吧，党对于你不是别的什么，只是父亲的代理者，令人敬而畏之，只要你不把你的家庭冲突弄清楚，只要你把本属于弗洛伊德的东西归于马克思的名下，党就不会是别的什么。”

当这声音向我解释说，我的文学“观念”，恰如我在党报的文化版上阐明的那样，来源于一种无政府的和非理性的基础，它恐怕还是没说错。在那个时代，共产党的领导者要求作家变成宣传工作者，要求他们在作品中塑造工人和农民的形象，就像古图索[②]在绘画中表现硫矿工人和西西里渔民。对资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艺术的诅咒。“海明威和卡

---

① 在原文中，“制服”一词，又有“单一形式”的意思，跟“多样化”恰好相反。

② 古图索(1912—1987)，意大利画家。生于西西里的巴格利亚，曾从事旧画修复工作。1937年定居罗马。次年成为反法西斯艺术团体“潮流”的领导成员，后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夫卡，乔伊斯和福克纳，兰波和洛尔卡[1]，"我们都应该，按照《团结》的一位社论作者的说话，把他们"当做不能满足劳动群众期望的货色"扔掉。我的回答是，任何活的艺术，任何值得这一名称的创作，都走在大众前面；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陈词滥调来麻痹人民，实际上是对人民的不尊重；知识分子在自己的艺术探索领域中，应该保持自由，只要这里头并不存在政治忠诚问题的话。

"当然，"我写道，"我们很遗憾，没有一个海明威，也没有一个卡夫卡站在共产主义阵营中活动。但是，在等待着认可我们对维托里尼、对普拉托里尼、对斯韦沃、对卡尔维诺[2]的希望，对其他受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的意大利和欧洲年轻作家的希望时，我们更喜欢一个资产阶级的卡夫卡，一个资产阶级的海明威，而不喜欢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法捷耶夫，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肖洛霍夫，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阿尔贝·马尔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霍华德·法斯特[3]。由卡尔罗·卡拉[4]真正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在费拉拉玄奥的天空中建立起的荒诞城堡，它们的价值要远远胜过苏联官方画家笔下精雕细刻、忠实再现的克里姆林宫。正是从由天才的幻想勾勒出的这些非现实的雉堞上，将打响能改变世界面貌的炮火。让我们确信吧，从这里，绝不会产生一心想得到日丹诺夫[5]恩宠的马屁精们精心炮制的油画，也不会打出我们罗马先锋艺术作废的榴弹炮，实际上，它们比克路斯卡的词典[6]还要更属于学院派。"

---

① 洛尔卡，指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

② 维托里尼(1908—1966)、普拉托里尼(1913—1991)、斯韦沃(1861—1928)、卡尔维诺(1923—1985)，都是意大利作家。

③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1901—1956)，苏联俄罗斯作家。米哈依尔·肖洛霍夫(1905—1984)，苏联俄罗斯作家。阿尔贝·马尔兹(1908—1985)，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1914—2003)，美国作家。这四位均是著名的左派作家。

④ 卡尔罗·卡拉(1881—1966)，意大利画家。

⑤ 日丹诺夫(1896—1948)，苏联政治家，在领导苏联文化工作中，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

⑥ 克路斯卡学院是意大利最有名的语言学学院，由这一学院的学者们编撰的词典颇具有权威性。

这段充满激情的雄辩言论,令善良正直的省委书记张皇失措,他急忙去询问他在威尼斯的同行。今天,我恐怕会不承认我那过于夸张的隐喻,以及空洞的“天才的幻想”;但是其余的一切,我都会原样保留,丝毫不动;我不是不知道,我不应该认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异端思想,实际上,它远没有表达一种深思熟虑的信念,只不过是兄弟般团结的一种无意识反应。围绕着毕加索、福热隆[①]和古图索的论战给我带来了什么?海明威和福克纳,乔伊斯和卡夫卡,我会挺身而起为他们一辩吗?我可能会把他们抛弃给《团结》的编辑,让他们遭受假正经的谴责。但是,假如要把兰波和洛尔卡押到囚车上,那可就要逼得我起而反抗。兰波和洛尔卡,你还记得吗?他们的作品被我弟弟从我书桌上偷走,夜里偷偷地藏到枕头底下阅读。《吉卜赛谣曲集》和《彩图集》[②]成了他的精神食粮,出发上山打游击之前,他就把它们装进了背包。

他们在肉体上杀死了基多,他们将不能在精神上第二次杀死他。

圣乔万尼的小广场值得自豪之处,是有一个威尼斯风格的漂亮凉廊:前面有两个尖头的拱肋,边上还有一个;哥特式的窗户之上,是带花枝图案的挑檐;内侧过道上,是石头凳子。在这个凉廊下,每一个政党都来张贴自己的传单。1949年被选为圣乔万尼支部的书记后,我突发奇想,要用我自己编的、自己复写的文字来代替党的印刷品。那是冷战时期,北大西洋公约签署的时期,是审判明曾蒂[③]和围剿共产主义的时期。我用方言写了一些短诗和某种类似寓言的文字,向十字架盾牌的吹牛者们提醒某些福音真理。“天主的目光,并不朝着匈牙利的枢机主教,而是直接投向饥寒交迫的、但耶稣广场的报纸[④]却从不提及的千百万人。”

---

① 安德烈·福热隆(1913—1998),法国画家,共产党人。

② 《吉卜赛谣曲集》是加西亚·洛尔卡的一部诗集,《彩图集》是兰波的一部散文诗集(见上文中的前注)。

③ 约瑟夫·明曾蒂(1892—1975),本是奥地利天主教教士,1945年后任匈牙利主教和枢机主教,因反对匈牙利政府对天主教会学校实行世俗化,于1948年被捕,1949年以叛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④ 指基督教民主党所办的报纸。

我自己写的传单,同样也传播经济方面的消息。我报道了由拉·玛尔法[①]的代表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进口价值三千五百亿里拉的生铁、钢材、锰矿和小麦,向苏联出口机械和布匹,这保障了纺织和机械行中成千上万工人的就业。"对于意大利劳动者,这是一个意外收获,比马歇尔计划的美元更实惠!"我最后还宣布,这些俄罗斯小麦中,有六百公担[②]要运到波代诺内省的磨坊来加工。

中世纪的画家们在教堂壁画上再现了吗哪降临于荒漠[③]的场景:我就这样把墙上的信息跟古老传统联系在一起。后来,1968 年的大学生[④]也用涂鸦的字画,覆盖了他们梯形教室的墙壁,本能地发现了即兴的、诗意的、野蛮的交流强于印刷物的优越性,无论它是来自左派,还是右派;只有一点是不同的,他们像宣扬福音那样,鼓吹了种种虚假的承诺,而他们承诺的革命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我呢,我提供了精确的报告,用金灿灿的麦浪来提神,让这小麦的奔浪,从乌克兰大平原一直流到弗留利磨坊的筛子中。

然后,突然之间,失望重又攫住了我。"斯温!斯温!"我喃喃道。支撑着我身心的这些活动,似乎悠然飘散。假如他不阅读的话,这些诗歌又是为谁而写?我写下一行行字词,为的是忘却那个唯一的音节,这音节的魔力,三十年后依然让我的笔尖颤抖不已。我知不知道,我已经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的爱?我们不再见面。成了一个优秀画家后,他曾请我去乌迪内看他。我逃避了他的邀请。不,斯温,有一天,当我在这个大地上始终寻你不得而倦懒了,我们将在那个唯一的世界中见面,它是那么大,可以容纳我们的爱。

---

① 乌戈·拉·玛尔法(1903—1979),一个意大利政治家,意大利共和党的代表人物,战后曾入主意大利政府。

② 一公担合一百公斤。

③ 吗哪是《圣经·旧约》中神赐予在荒漠中旅行的以色列人的食物。

④ 指 1968 年在法国发生的以大学生为主要力量的"五月风暴"运动。

21

瓦尔瓦索纳:卡萨尔萨以北五公里处的一个村庄。我在那里当了两年中学教师:我在弗留利度过的最后两年。我骑自行车去那里,经过玉米田、葡萄园和甜菜地中间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对一个外乡人来说,卡萨尔萨越是缺乏魅力,瓦尔瓦索纳就越有吸引力。中学位于城堡脚下,占据了一幢破破烂烂的罗曼式风格的房子,四周的空地上,按梅花形的排列,种植着一些有百年树龄的栗树。城堡只是一座土里土气的庞大建筑,矗立在小丘上。在已被改为了公共花园的古老林园门口,有一道石砌的大门,上面的家族徽章已然有些风化了。

花园的面积不很大——当地的贵族老爷看来从来不曾很阔绰过——但凭借着一些引人忧伤的遗迹,还是散发出一种无穷的魅力:一片小径纵横的黄杨木林的残迹,两只卧在草丛中的石狮子,一只掉了尾巴,一只成了独眼,黯淡的目光盯着挂在孤独的南洋杉上的饰架。植物长得很茂盛,乱蓬蓬的,浓密的金合欢,野生的玫瑰,随季节而绽放的鲜花。镇政府用财政开支的余额,雇了一个临时工园丁,在我常常去长满了荆棘和狗牙草的小径的那段日子,园丁唯一的职责,似乎就是用一个耙子,拢起栗树和橡树的枯枝败叶,还有从松树上掉落的松果。他把它们推到公园尽头,倒在矮树丛中的一个垃圾堆里。

我教拉丁语、意大利语、历史和地理。意大利语课讲现代作品的阅读,历史和地理课讲报刊的评论。拉丁语是最让我为难的:我的学生们都来自穷苦家庭,不一定每天都能吃饱饭。他们蜷缩在过于单薄的短衣中,团团地围住火炉子,朝手指头哈气。看他们苦苦地跟名词的夺格和动词被动形主动义[1]较着劲,我觉得自己就好比一个红十字会的女士,要给

① 名词的夺格和动词被动形主动义,都是拉丁语中的特殊语法现象。

贫穷潦倒的人分发高顶的礼帽。

只要天气许可,我们就离开我们那破败的教室,去城堡公园上课。Rosa,rosae,他们在两个玫瑰花圃间向我背诵这个词形的变格[①]。看到他们面对语法中多变的后缀时气馁的脸色,我有一天发明了一个叫Userum的怪物,想让他们轻轻松松地记住形容词词尾的us,er,um[②]。我具有被人称为教育学的天赋。学生们跟我都很亲近,考虑到他们家里没有书本,而且他们的家长对书的态度不是漠然就是藐视,他们这样的进步已经是最快的了。意大利的学校教育只是对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才有用,他们回到自己家里,可以接受补充教育,在饭桌上听他们当律师、教授或医生的父亲的谈话。市民阶层的孩子可以利用长长的暑假,安排阅读和旅游,而对我的学生,假期是要命的,经过两个月的游荡,他们的脑子便变得空空如也了。

这一职业,我难道还会自己主动离开它吗?我尽可能做得公正不倚,在一张漂亮的脸蛋面前决不心软,也不故意宠爱嘴唇上开始长出淡淡胡须的少年。假如有几个金发小伙子有时候抱怨受到了不公平待遇,那也是极偶尔的现象。我情不自禁地让他们为我付出代价,他们本不该让我回忆起曾拒绝实现我们的爱的那个小伙子。

课后,我会跟某一个年轻人留下来,去老公园中阴暗的小径,会徜徉在公园尽头那个秘密的地方,按照魔笛师的建议,那个堆满了枯枝败叶的垃圾坑便是大自然为我们提供的天然庇护所,但是,这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爱。根本用不着问,是谁先提出去那荆棘丛里玩的。一种目光和微笑的交流,两人一言不发地分着抽一根香烟:默契就已在其中。我从来不会违背对方的意愿,来吸引我的某个学生,也没有想过要追求一个外表已经成年化的学生,让他下巴上刚刚长出的胡子向我证明,他对他自己的选择负完全的责任。没人能夸口曾两次跟我一起去过那个矮树林。出于对斯温的忠诚,我不想跟任何人黏糊上。我不带任何礼物作诱饵。

---

① Rosa 和 rosae,是拉丁语阴性名词标准例词"玫瑰"(rosa)变格练习中的前两格形式。

② 在拉丁语中,普通形容词的词尾变化的前三种分别为-us,-er,-um。

在园丁的垃圾场里,我们发现一些已经分解了的枯叶,正在腐烂的松果,脏兮兮的废纸,从正修理的围墙上搬来的瓦砾,带着泥土的狗牙草,可口可乐瓶盖,还有来自星期日小酒店的空酒瓶。这个垃圾的温床,在你看来或许很不舒适:对于我,它却引起一种那么特殊的刺激,以至于床垫也好,雪白的被单床单也好,全都无法与之相比。

就像宁静天空中的一场暴风雨,灾难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十七岁的焦尔焦·R.,个儿细细高高,脸蛋胖嘟嘟的,认为跟他的老师在垃圾中间睡上五分钟的觉,实在是一桩罪孽。他急忙跑到了教堂,跪倒在忏悔室里,把一切讲给了瓦尔瓦索纳的本堂神甫听。那神甫嗅觉灵敏,闻出了这是个好机会,现在终于可以让省里一个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信誉扫地了,这个可恶的共产党人贴在墙上的文章,给基督教民主党关于明曾蒂事件的宣传带来了麻烦。他向宪兵队告发了我,宪兵队则传讯我到塔里亚门托河畔圣维托的法庭,尽管少年的家长并没有起诉。

科尔多瓦多宪兵队 1949 年 10 月 22 日的报告如下:

> "本月 10 日,当我们在卡萨尔萨执行公务期间,有人向我们提供情报说,在瓦尔瓦索纳派出所,有一桩丑闻被证实。(实际上,提供情报的人不是别人,就是神甫,他是唯一知道这件事并泄露了秘密的人。)由于没有任何人提出起诉(原因不必说了),我们为了调查清楚,于本月 14 日来到瓦尔瓦索纳派出所,就有关中学生的这一丑闻事件或系列丑闻,向一些公正可靠人士了解更多的情况。未成年当事人的家长并不接受我们的邀请,不愿意来派出所。本月 21 日,我们再次来到上述地点,询问了未成年当事人的家长是不是准备起诉中学教师 P.P.P.。家长犹豫再三之后,终于让我们明白,他们愿意保留起诉的权利。一位母亲在被问讯时向我们宣称,她要听取他丈夫的意见。最后,由于受害方保留了起诉的权利,我们考虑到该丑闻爆发于众目睽睽之下,并引起了民众的公愤,我们特此在此辑录本诉讼报告,一式三份。"

塔里亚门托河畔圣维托的法官控告我,认为我犯了在公共场所腐蚀未成年人和行为淫秽罪。

蔑视你的朋友吧,杰那里埃罗:他不仅没有利用这一机会,大声宣称他的私生活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没有揭露警察和教会共同策划的这一政治阴谋的粗暴,揭露它们违背了那些家庭的意见,他们实际上并不怎么希望让孩子们跟他们的老师分开,他不仅没有这样,反而卑躬屈膝地被粉碎在权势面前。我宣称(起诉书中白纸黑字记载的原话)曾经"受到安德烈·纪德一部同性恋小说的影响,企图经历一种带有文学特性和文学根源的色情经验"。那只高声鸣叫,可以让我把这龌龊之事悉数收回的公鸡在哪里[①]?生平第一次,我那不同于众[②]的生活状况表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我则急于否定它。把瓦尔瓦索纳的事件归结于一种外国的影响,一种智性上插曲式的偏移,那实际上是在申明我天性中来自乡土的善良,是在答应不再离经叛道。

右派报刊迫不及待地将消息散布了出去。"对一名教师的严厉指控",10月26日的《威尼托信使报》用了这样的题目。"追踪中学教师的背德罪",同一天的《新闻故事报》这样大肆渲染,引用了我关于纪德的话。幸好专栏编辑没有转述我援引纪德的所有原话。"安德烈·纪德,他在两年前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对法官这样说过。一想到在我最喜欢作家之一的经典桂冠下,我的罪名可以减轻不少,羞愧之心便让我的脸孔久久地发烫。《团结》等了整整三天,才在它的本省新闻版中刊登了一篇加有边框的短文,提到一个教员犯了"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罪,但没有点我的名。简单的防范,不至于酿成严重的后果:纪德,首先是被苏联诱惑了,后来又公开收回了此前的言论[③]。共产党报刊上对叛徒的任何提及,照例都会导致一种指责。

当天晚上,一个同志来敲我们家的门:命令我次日下午出席支部会。我把他拦在楼梯底下,示意让他低声说话。我母亲从来不读威尼斯的报纸,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像往常那样,我穿着卷领的套头衫和人造革上装,赶往支部驻地。我脑子里早准备了一份小小的发言稿,既然机会来了,我就要宣布我很

① 西方有童话,说是有一只公鸡,它高唱的时候,能让人把已经说出的话收回。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③ 指1936年纪德对苏联的访问,以及回法国后发表的《访苏归来》。

高兴，我终于把一个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如果说，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应该是我们基本的目的，那么，为什么不在我们纲领上补充一条，加上个人的性解放呢？资产阶级的权势不仅建立在对劳动大众的资本主义剥削上，而且，同样也建立在对个人私生活的控制上。家庭的警察式伦理和工厂的牢狱般结构齐头并进。随后的一段，则是关于东方文化中性压迫的犹太教和基督教起源：我们这些代表进步和未来的人，在20世纪的中叶，是不是仍还要屈从于由摩西颁布的戒律？

这一疾呼在我看来似乎具有一种抵挡不住的效果：我仿佛已经看到我被同志们团团围住，被他们抬了起来，掌声四起，小小的会议室欢声雷动，会场乱糟糟的透着可爱，桌椅板凳一片狼藉，就像对门朋友酒吧的后厅。负责饮料的家伙让一个个啤酒瓶在人们手中传递，整个支部的人全都发出友善的大笑，把宪兵、法官、忏悔室中的嘀嘀咕咕者、堂区里的穷文人，还有其他的伪君子和假信徒，统统打发去见了魔鬼。我带着满脑子的乐观情绪，拐过漂亮凉廊的一角，走向大门，确信自己将受到欢迎，以至于我感到需要拉下上衣的拉链，作为信心的标志。我挺着胸膛，揣着心跳，步伐敏捷地跨过了门槛。

然而，我看到的场景却令我热血冷凝。房间里没有丝毫混乱的迹象。他们在屋尽头摆了三张桌子，构成某种审判席的架势，桌子后，坐着波代诺内总支和乌迪内总支派来的人，大多数我只是勉强有些面熟。其他的桌子都推到了墙边，让支部成员们坐。我立即注意到，好多人没有来；在那些人中，有我最亲密的几个朋友，例如努托和曼利奥，因为上班来不了：这使我猛然意识到，这次集会的时间很不正常，平时，支部会议都是在晚上举行，吃完晚饭以后。另一个令人惊奇的原因是：我的同志们都穿着白衬衣，打着领带，外面套着正装，这在平时的工作日是相当异常的装束。他们全都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态，默默无语地抽着烟。我一直走上前，来到了圈子中央，没有人招呼我，只有省委的领导冲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我的同伴们呢？微笑转瞬即逝，当即被一种合乎当时情形的神情压了下去。只有波代诺内的一个女律师，特雷西娜·德冈，在场的唯一一个女性，朝我投来一道鼓励的目光和一丝微笑。我被这一番迎接

冷透了心,机械地拉上了上衣的拉链,眼睛盯住地板的一角,像一个面对着法官的被告那样,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那个似乎是会议主持者的人清了清嗓子,神经质地轻轻敲了敲桌子,开始说话。他回顾了由法官判定的主要罪状,问我是不是承认这些事实,不等我回答,他便宣称我的行为有损于党在大众舆论中的形象,还说,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事业,跟资产阶级的恶习断然是水火不容的。特雷西娜·德冈凑近他,对他耳语了几句。他冷冷地拒退了异议,对我宣布说,党已经决定开除我。他请我当即把我的党证还给他,并从此不再登支部的门一步。

会上,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为我辩护。他们不是瞧着地,就是眼睛朝向天花板,看着香烟的雾圈徐徐上升。女律师咬着嘴唇。至于我,原先准备好的发言,连一句都想不起来了,只是在衣袋里乱掏一阵,终于找对了我一开始就该找的地方,在我的皮夹子里掏出了那个一直夹在里面的党证。我上前一步,把它交给会议主席。他正准备把它撕掉,特雷西娜·德冈手疾眼快,一把抢了过去,把小小的照片从上面揭下,然后把长方形的蓝卡还给她的邻座。省委书记被他女性同伴的干涉闹得有些上火,把证件撕成碎末,而她,则带着充满无限仁慈的一丝微笑,从桌子上把照片递给我,示意我把它放回到皮夹子里去。

不久之后,这一幕场景在家里又重演了一遍。我不知道,《新闻故事报》的花边短文怎么会落到我父亲的手里。过道上传出一阵阵的嚎叫——从非洲归来之后,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他重新发出了往日的怒吼:我辱没了他的姓氏!监狱是干什么吃的?在墨索里尼时代,事情可不是就这样了结了的!这军官重新找回了他的大嗓门,讽刺和挖苦连连不断。

他先是在楼梯上朝他的“狗杂种”扔来各色各样的诅咒和谩骂,然后就把自己关在小阁楼里,吃饭时也拒绝下楼。妈妈只得把他的饭菜端上楼,把托盘放在他门口。对我,她没说什么特别的话,但是,为避免她的沉默显出某种谴责的意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对我施展出种种小小的宠爱,给我做我特别爱吃的菜,还像我小时候那样,来到我的床前坐上一会儿,在她因慈爱和苦难而显得格外大的眼睛里,我看得出来,

无论人们责怪我什么，她心中儿子的形象依然没有分毫的污点。

总是这样，在我的整个生命道路上，当男人们试图撕碎我的形象，准备以象征死亡的方式从肉体上消灭我时，总是有某个仁慈的女人，就像在福音书中那样，给我送来她纯洁无玷的微笑和目光，那好比一面镜子，我得以从中认出我自己的面容，把握我自己的本体，继续信任我自己。我在车轮底下死去，同时我知道，我的脸庞，在我跟凶手搏斗时被打破，被毁形，却永远印刻在我母亲和我姨妈们的心中，就像留在永不毁坏的汗巾中那样[①]。

被开除出党，受诽谤，遭驱逐，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闹得我心烦意乱，睡不着觉：我还能保留住学校中的教职吗？人们还要把我赶出教育岗位吗？万圣节假期给了我三天的缓期[②]。11 月 4 日，作为瓦尔瓦索纳教育委员会的副主席，我本应做一个纪念 1918 年停战日[③]的报告。那无情的战火使弗留利人受了整整三年的战争之苦。在悼念英勇顽强的意大利士兵(我的一些学生的祖父外祖父就死在卡尔索)时，我小心避免让我年轻的听众沉醉于爱国热情的豪言壮语，沉醉于民族主义的极端膨胀。有一句话，我本来没有准备讲，后来即兴添加上了，这句话把矛头对准了市镇重建纪念碑的计划，该计划要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广场上修建一座被德国人炸毁的死难人员纪念碑。

“请注意(这是对警察暴行的明确影射，前不久，他们派增援力量镇压了农业季节工的造反)，政府越是关注于纪念死者，就越是会给活人加上不公正的压迫。”

这几句话，会议主席判定为“走了调”，我的共产党员同事认为“不合时宜”，其他教员，基督教民主派的、共和派的和自由派的，则认为“具有冒犯性”。喃喃声膨胀成了谴责声，尽管不安的情绪只是局限在卡萨

---

① 在基督教传说中，圣女维萝妮克用一块布巾，为扛着十字架走向骷髅地的基督擦脸，布巾上便永远地留下了基督的面容。据说，这块布巾保留在罗马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中。

② 万圣节为西方人重要节日，在 11 月 1 日，次日为亡灵节，类似中国的清明节，其间，人们一般去祭扫亲人的墓，悼念亡灵。

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定正式于 1918 年 11 月 11 日签订。但是，意大利战线于 11 月 4 日已经正式停火。

尔萨和瓦尔瓦索纳之间的地界。这件事,对上级在好几天之前就已经做出的决定,并没有导致任何的直接后果,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11 月 6 日晚上,当事人终于从省检察署的门房手中接到通知,P. P. P. 教师,“鉴于即将面临诉讼”(实际上,诉讼在一年后才结案为不予起诉),被停止教课,停薪解职。

从经济上说,惩罚是灾难性的,而从精神上说,则是残忍的。我唯一的慰藉是,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所看重的那些同事,还有与我关系融洽的普通人(农民、商人、手艺人),他们会认为,我的撤职是出于一个“高贵”的原因(我在爱国纪念活动中表达出的对嚣张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大胆抨击),而不是由于包含有种种淫秽细节的宪兵队的诉状。

看到过去同一支部的不少同志,怀着那么大的热情,穿过马路跑来跟我握手,为我的政治“勇气”向我祝贺,我明白了,他们感觉到了一阵轻松,因为他们想到,他们曾在两年中跟正义事业的一个未来“牺牲者”在一起工作,而不是跟一个被指控为腐蚀青少年的败类共过事。

政治丑闻掩盖并抹却了性丑闻。我明白了一个此后不断得到验证的道理:无论何时何地,性丑闻越是为行为者招致一片谴责,令他蒙受耻辱,政治丑闻就越是给其作者带来一圈光环。努托,自从我被开除出党的那天起就一直躲着我,但省检察署的处分消息刚刚传开,就扑倒在我的怀中。他对我回顾了我们一起攻打皮尼亚蒂别墅以及斯皮塔贝尔戈城堡的经历。他显得多么快活啊!当时,他读到《新闻故事报》的剪报时有多么困惑,那么现在,他与格卢阿罗和巴尼亚罗拉事件的斗士站在一起时,就有多么兴奋。

第一个对这出喜剧做出反应,并厌恶地把它丢弃的人,反倒是我自己。什么!在失去了机会,不能面对法官为自己争取还本来面目的权利之后,我竟又一次否定了自己,我像羞涩的姑娘似的被人粉碎。我软弱地逃避责任,不敢面对世人来承认自己的特质!当我发表演讲时,在关于死者纪念碑的那一个小小的句子背后,隐藏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卑鄙力量?做出某种“可尊敬的事”,以及“能在众人面前高昂着头前进”的想法,使我把丑闻转移到一个保证能赢得同伴敬意的地盘上来。他们为我的勇敢而祝贺我:是出于盲目,还是出于恭维?我本来值得他们百倍的

蔑视，我这人，我忘却了我关于“世俗”和“异端”的弗留利的理想，放弃了我对无辜的爱、“无论什么样的爱”的信仰，像罪人那样行动，在经历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后，就背叛了初衷。

如果说，我想不惜一切代价让瓦尔瓦索纳的诉讼染上政治色彩，他们就该从我的嘴里听到下面的话：“党开除我，恰恰是因为它刚刚经受了一场政治选举的重创，诞生自抵抗运动的幻象崩溃了，基督教民主党赢得了绝大多数民众，1945 年的三党联合政府已经烟消云散，冷战开始变得对美国有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这些巧合中，人们能得出令人深省的意义，让我来问问你们，一个自称为左派，自诩要把全人类从千百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政党，却依然屈从于延续了圣经传统的道德法规，它是不是已经命定地要再一次遭受失败？你们当前的历史性挫折，还有发生在 P. P. P. 同志身上的小事故，这两者的碰撞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但是，我却过于怯懦，没有反击共产党人，也没有逼迫他们陷于自我矛盾之中，我泰然自若地接受了曼利奥和他朋友们的赞扬，他们从罗沙赶来，把他们的支持带给了“新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为了替自己辩护，我会祈求卡萨尔萨的居民改变他们的行为习惯吗？我演讲中胆怯的遁词，并不能瞒过他们局促却又狡黠的头脑。莫亚纳博士[①]，科德罗伊坡的公证人，在我面前走过时，连帽子都不抬一下，他那顶插着公鸡毛的奥地利式绿色毡帽。曼利奥的叔叔，曾不止一次背着女人们，在康佩西家的厩栏前把他的烧酒[②]瓶递给我的那个人，在面包店见到我时，都忘了跟我握手。在大街上，人们都窥视着我的行踪。在窗户后，一根根手指头在戳着我的背。我父亲继续在他的高顶上嚎叫。他拒绝下楼来吃饭。

有一天，一家主妇看到我进了村庄，便赶紧招呼在家门口玩耍的两个男孩子，把他们赶进家里，我明白，我已经不能再在这里长期待下去了。我没有经济收入，完全靠妈妈养活，遭到资产阶级社会的鄙视，受到全村人的白眼，只有不多的几个左派朋友还在冒险跟我交往，我该逃到哪里去？去哪里藏身？我的决心在一个晚上下定，那一天，我发现妈妈在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流泪,因为我的两个同事在街上远远地见到她之后,故意穿过街道,换了另一边的人行道走,以避免跟她打招呼。“我们走吧,”我对她说,“把父亲托付给我的姨妈们,我们离开这里。”既然我被逐出了伊甸园,那就彻底离开它吧,不要让我们的敌人心满意足地数着妈妈脸上因哭泣而生出的皱纹。

大雪覆盖了田野,天气冷得能冻裂石头,一大早,妈妈穿上了那一件兔皮袄,小时候我曾经好多次在它充满樟脑味的褶子里打喷嚏。她还戴上了紫水晶的项链,罗斯合金[①]的耳环,揣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她的全部积蓄,我和她一起登上了去罗马的火车。基诺·科鲁西,我那位在首都的贫民窟做旧货买卖的舅舅,将帮我们在那里找一个住处和一份工作。

兄妹见面的诱惑,再加上一个过得去的环境,兴许足以吸引妈妈了。说到我,促使我最终选定了罗马的原因有很多,充满机遇的繁华大都市的神话,孤独的猎手总可以得到各种无名机会的好处,期盼在佩特罗尼乌斯、尤里乌斯二世、米开朗琪罗和桑德罗·佩纳[②]居住过的一个城市里,再也不需要躲躲藏藏的殷切希望,希冀在我青年时代的最后几年里生活于光明中的渴望,另外还有,那时候已经开始了的南方移民潮,为城市提供了精力充沛、身材结实、行为自由、无所羁绊的小伙子。他们全都脱离了原先的堂区,从此不再像我那瓦尔瓦索纳的告密者那样屈从于神甫的影响。

在我气喘吁吁的南征进军中,我怎么没有表现得更大胆,没有把罗马泰尔米尼火车站也给烧了!我出发寻找一个新的天堂,来代替我少年时代的天堂,代替已永远失去的塔里亚门托河畔的乌托邦;我哪里会想到,我正在犯下我生命中最巨大的一个错,停在了太靠北二百三十公里的地方,竟以为泥浆滚滚的台伯河会浇灌出天上的花园。

---

① 罗斯合金指铜、镍、银的合金,常用来制作首饰。

② 佩特罗尼乌斯(?—公元66),古罗马作家。尤里乌斯二世(1443—1513),罗马教皇,为政教合一而奋斗。桑德罗·佩纳,意大利诗人,见第十一章前文。

第二部

22

罗马,1950年。权势与法令的城市。如同一声号令之后的纷纷响应,到处是著名的纪念性建筑。竞技场,万神殿,圣彼得大教堂,圣天使城堡[①]。在一个移民居住区中,我舅舅把自己公寓中的两间房让给了我母亲,我也在离那栋房子不远的地方有了我的第一个房间。而就在这个陈旧的贫民窟居住区旁边,马尔切鲁斯剧场,米开朗琪罗的卡匹托尔山,维多里奥·伊曼纽尔的陵墓[②]以它们威严的高墙,在我的周围矗立起了三重的警告。三个罗马,古代的罗马,教皇的罗马和统一体的罗马,结成了同盟来凌辱我。

圆的形状占了优势:古竞技场的卵形,纳沃纳广场的椭圆,一个个

---

① 竞技场、万神殿、圣彼得大教堂、圣天使城堡都是罗马城中最负盛名的名胜古迹。后文中的纳沃纳广场、人民广场等,也都是罗马的名胜古迹。

② 马尔切鲁斯剧场在凯撒时期开始修建,奥古斯都时期完工,能容纳两万观众。所谓米开朗琪罗的卡匹托尔山,当指在卡匹托尔山中央由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康皮多里奥广场,它是古罗马的摇篮,也是罗马城市的心脏。维多里奥·伊曼纽尔的陵墓在万神殿中。

教堂穹顶的半球形圆帽,圣彼得广场的环廊,人民广场的圆弧。由于圆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形象,那么,一个弧形的广场或一个圆形的穹顶,便排斥了人的因素。我,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无规无矩者,被抛入了一个规定和约束的宇宙中。我已经离开了弗留利那个自然的世界,那里的每一株植物,每一只昆虫都是一个单独的存在,都不像任何的另一个;我落入了一个不知道各个个体间任何区别的意志的势力中。

提图斯、塞普蒂穆斯·塞维鲁、君士坦丁[①]给我留下了圆拱门;图拉真[②]留下了一个圆柱;马克森尤斯[③]留下了一个长方形会堂的摇篮形拱顶;阿格里帕[④]留下了一个有藻井的圆亭;奥古斯都和哈德良[⑤]留下了圆形的墓冢;尤里乌斯二世留下了基督教教堂的最大圆顶;克雷芒八世[⑥]留下了圆顶上的铜球;贝尔尼尼留下了一个圆形的柱廊[⑦];社会党人焦利蒂[⑧]留下了半圆形广场;法西斯党人墨索里尼留下了意大利圆坛体育场。一代接一代,一朝延一朝,同样的象征符号重复着同样的义务。服从吧!禁止偏离一尺一寸!这里,应该由秩序来统治。要想征服全世界,第三罗马不再像第一罗马那样有带盔甲的军团,也不再像第二罗马那样有传教士,但它一成不变地保留了老办法,要消灭那个不走正

---

① 提图斯(公元39—81)罗马皇帝。塞普蒂穆斯·塞维鲁(146—211),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当指君士坦丁大帝,也称君士坦丁一世(? —337),罗马皇帝。这三个罗马皇帝都在罗马建有凯旋门,分别建于公元81年、203年和315年,其中君士坦丁大帝凯旋门最为壮观,就在古竞技场附近。

② 图拉真(约公元53—117),罗马皇帝,图拉真圆柱建于公元106—113年,高达38米,圆柱表面有螺旋形浮雕,表现图拉真的军功。

③ 马克森尤斯(? —312),罗马皇帝。他开始兴建的长方形会堂后由君士坦丁完成(约公元313年)。

④ 阿格里帕(约公元前63—前12),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的密友和副手。有藻井的圆亭指罗马的万神殿,建于公元前27年。

⑤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他的陵墓在特莱维喷泉附近的里佩塔街。哈德良(76—138),罗马皇帝。他的陵墓后来演变成了圣天使城堡。

⑥ 克雷芒八世(1536—1605),意大利籍教皇。

⑦ 贝尔尼尼(1598—1680),意大利雕塑家和建筑家,巴罗克艺术的大师,贝尔尼尼的柱廊指圣彼得大教堂前广场上的环形柱廊,由贝尔尼尼设计,建造于1656年。

⑧ 焦利蒂(1842—1928),意大利政治家,五次任首相。

道的人。[①]

多么天真啊！你将对我说，还要为这个城市赋予万能的灵丹妙药，自从《萨蒂利孔》[②]以来，人们早就把它描绘成了罪恶的渊薮，藏污纳垢之处！但丁没有等待费里尼，早就揭露了发生在那里的丑陋行径。拉丁人的梯形剧场在倒塌之前，很长时间里，就一直庇护着那些夜游人的恶行在它们的拱顶底下。我还在诉讼的阴影中，在我们逃亡的心病中，在妈妈寂静的痛苦中，就忘记了我因佩特罗尼乌斯和阿雷蒂诺[③]而做出的决定。一开始，我眼中的罗马，只是一个都市[④]，严格意义上的首都，一个在帝国时代就把它的道路和堡垒四面八方地伸展到全欧洲的都市，一个善于征服他人的都市。后来，我把它当做圣彼得统治之下的西方世界的最大部分。迄今为止，它一直保留着对意大利全境的绝对控制：决不容忍任何反抗，哪怕是在半岛的另一头，小小的瓦尔瓦索纳教堂忏悔室中的喃喃声，都会给它以机会，撤掉一个公共教育教师的职，毁了他的前程，逼迫他流亡他乡。

我仇视庇护十二世。他那一再重复在圣年[⑤]铸造的纪念章上的纤弱身影和清瘦面孔，很明显地证明，一个教皇的巨大影响和力量，只能来自这样一种情感，即他是摩西和奥古斯都的双重继承者，他身上聚集了先知们的权势和皇帝们的威严。然而，我却很喜欢一位教皇：乌尔班八世[⑥]，因为他在所有纪念他荣耀的建筑上，加上了蜜蜂的图案。喷泉的承水盘上有蜜蜂的浅雕，教堂的门楣上有蜜蜂的雕塑，华盖的纹章上有被钉住的蜜蜂，他住的套间的天花板上有画的蜜蜂。这辛勤采蜜的膜翅目

---

① 第一罗马指古代的罗马帝国，第二罗马指天主教罗马（以教皇的教廷为代表），而所谓的第三罗马只是一个梦想，法西斯主义曾企图把现代意大利变成第三罗马，即能统治欧洲的强大国家。而历史上，16世纪时，莫斯科公国曾打出“第三罗马”的旗号，声称莫斯科是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

② 《萨蒂利孔》是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的长篇讽刺小说。

③ 阿雷蒂诺（1492—1556），意大利作家，主要成就在讽刺喜剧，也写一些讽刺诗文。

④ “都市”两字为拉丁语“Urbs”。特指罗马城。

⑤ 圣年：按照天主教习惯，每隔二十五年有一个圣年。教皇庇护十二世1939年至1958年在位，1950年是圣年。

⑥ 乌尔班八世（1568—1644），意大利籍教皇。

昆虫,它们的空中芭蕾,是对乡村多么迷人的回顾,孩提时代的他就曾在乡野中奔跑,直到后来教皇的三重冠把他的额头压垮。甚至连他在圣彼得教堂中的坟墓,也缀满了小小的采蜜之虫,它们的样子仿佛是偶尔趴在那里,旺盛的生命力蓬勃于体内,随时准备重新飞起。假如它想暗示他权位的伟大,那可真是奇特的装饰图案。我觉得更怪异的——我希望那种幽默还是故意的——是,这一幻象把这勤劳的昆虫永不停歇的嗡嗡声,跟死亡的永恒寂静结合在了一起。

我的胆子渐渐地大起来,我在台伯河和圣三一山教堂之间游荡时,试图把一个反罗马的种种迹象聚集在一块,我觉得这个反罗马,比起固定在其世界之都[①]角色中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罗马来,更有资格追求一种幸福。比如说,法尔内塞宫[②]的正面,就以其庞大让我讨厌。我总觉得它是一个已完成的、关闭的、确定了的、做好了的作品,老是在向我灌输一种它的恒常、它的稳固的概念。一件"永恒的"作品,面对着它,我只有张口结舌的份,敬而畏之,诚惶诚恐。

相反,当我来到纳沃纳广场,我就明白到,欣赏圣阿格涅丝教堂[③]那水波映照的正面时,最不恰当的方式,就是直挺挺地站在它面前,纹丝不动地凝望它。我应该来来回回地走动,以发现塔楼和小钟楼的细节,发现圆弧的弯曲,壁柱的突兀,挑檐的凹凸,栏杆的连贯,由背景的变化而带来的一千零一个惊喜。随着我自身的移动,建筑也动弹起来,每一步都为我引向一个观察整体的新视角。投出的一瞥永远不可能是全貌的,也不能是唯一的,而是个别的,有所偏倚的;它在无限地更新着。这建筑不仅要求我用眼睛去看,而且要求我的身体去动。我倒很愿意为这一建筑赋予电影艺术的修饰语,因为,抓住一大片如此丰富的形象的唯一方法,不是像拍照一样照下教堂的正面,或者单个的侧面,而是像拍电影那样,拍摄一系列的俯摄镜头、反打镜头,侧推镜头。

在翻腾我舅舅那个堆满了灰尘蓬蓬的旧家具和旧书的店铺后间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法尔内塞宫建于1517—1589年间,原由桑迦洛设计,后由米开朗琪罗接着设计完成,是罗马市内文艺复兴风格的典型建筑。现在是法国大使馆的驻地。

③ 圣阿格涅丝教堂就在纳沃纳广场边上。

时，我懂得了，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迷上了被称为巴罗克艺术的东西（罗贝托·隆基故意没有对我们讲这些），在葡萄牙语中，“barroco”的意思是“不规则的珍珠”。我还可以抱怨什么呢？这一风格诞生于罗马，在17世纪初。如果说，它是从一种外语中借用了名称，那是因为，它是带着过分的傲慢，向罗马城的帝国传统提出了挑战。

面对着教堂对面的四河喷泉[①]，也是同样的惊叹。仅仅经过粗加工的石头，还保留着山中岩洞那种粗粝的自发性，尚未听从于人类的意愿。数量众多的各类生物，植物和动物，恰到好处地添加到了大块的白石之间，模仿着大自然的奇特景象。不是随便什么植物：婆罗洲[②]的棕榈树，马达加斯加的仙人掌。也不是随便什么动物：同样是最有异国情调的，最少接受罗马法则的。荒漠中的狮子，海上的神马，印第安的犰狳。长着两只角的非洲和亚洲的花神和兽神，对众凯撒的权位和基督教的威望同样不服。还有水，从千百个洞中汩汩涌出，流淌在这一大堆一个更比一个蹊跷的怪物身上的水，更加强了我的幻象，想象出一种不测的、无穷尽的、动荡的、未定的、不稳当的、非必需的堆砌，贝尔尼尼完全可以在这些堆砌上，随心所欲地增添或删减同样多的细节。

随着我终于割断了对瓦尔瓦索纳的可怖回忆，我对去中心化的一大堆奇特事物的兴趣越来越浓，同时又惊奇地发现，普世宗教的驻地，有一种远不如博洛尼亚或佛罗伦萨之类的城市的威严面貌。我看到，追求理想之美的努力到处遭到挫折；以一种固定和严格的法律统治世界的梦想到处被拒绝，被排斥。在我看来，很多东西似乎都违背了那样一种对美的抱负，教堂穹顶上画出的浩渺苍天；水池中长着鱼尾巴的骏马；被不间断运动激活的普罗密尼螺旋线[③]，无休止地重新开始着它的上升，就像是一团火焰，被气流托着，一直升向智慧宫中圣伊沃教堂穹顶的高点[④]。还有，对那个栖身在一个很像歌剧院包厢的壁龛深处的圣

① 四河喷泉是纳沃纳广场中央最著名的建筑，由贝尔尼尼设计，建成于1651年，池中有岩石，以及神话人物、动物、植物的种种造型，是巴罗克艺术的杰作。

② 婆罗洲是加里曼丹的旧称，在印度尼西亚。

③ 普罗密尼（1599—1667），意大利建筑师、雕塑家。

④ 智慧宫在纳沃纳广场附近，圣伊沃教堂就在它的院子中，是罗马的巴罗克风格教堂的代表建筑之一，建于1642至1660年，设计者是弗兰切斯科·波罗米尼（1599—1667）。

女,能说什么？她的迷醉并不表达与上帝接触时形而上的欢乐,而表达在美丽的天使前转瞬即逝的激动,那一刻,天使正准备以他的标枪将她刺穿[①]。或者,对博盖塞别墅中的达佛涅[②],能说什么？这个化身为月桂树模样以摆脱阿波罗追求的年轻姑娘,世上第一尊成功地在大理石的纹路中再现了奥维德[③]寓言的雕像。直到那时为止,人们还一直认为,只有画家才能留住变形的瞬间,在这一刹那,少女的双脚变成了树根,她的躯体在树皮的包裹中僵硬了,她的手指延伸为叶片,她的头发分叉为枝条。

噢,多么令人留恋的弗留利！我真的在关心那个希腊仙女吗？看着她笼罩在光环中的面容,她呼唤救援而向前伸出的胳膊,她因恐惧而瞪圆了的眼睛,我想起了我童年时代的同伴小姑娘奥蕾丽娅,想起了她差点儿溺水身亡的那一天。同样,从矗立于密涅瓦广场上、背驮方尖碑的那头超现实的大象身上,我认出了卡塔尼亚地方大象雕塑的原型,在萤火虫闪烁纷飞的那个夜晚,在比萨附近行驶着的德国列车上,就是脖子上挂有这种大象图案圆牌的那位神秘同伴,帮助我成功地跳车逃亡。

衣褶的迎风起皱,青铜的旋涡,岩石的扭曲,螺纹的展开,贝壳纹的堆砌,吹号角的小天使,心醉神迷的女人,长鼻卷的牲畜:嗨,所有这些夸张做作的螺旋线、光芒、波浪、镀金,所有这些令人迷醉的荣华,都只不过——我很快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是为教皇们效劳的宣传工具;是以触动情感的造型艺术证据,来支持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手段;是通过让人民从迷醉走向迷醉,从而保证人民忠诚于教廷的狡猾伎俩。维腾贝格的僧侣[④]当然可以鼓吹以信仰获拯救的学说,可以宣扬回归于圣

---

① 指的是胜利广场马利亚教堂中的科尔纳罗礼拜堂贝尔尼尼的雕塑名作《圣特蕾莎的迷醉》。

② 博盖塞别墅指的是罗马国家博物馆,建于1613到1616年,该馆以收藏意大利巴罗克风格的绘画和古代雕塑品而著称,建在博盖塞公园中。达佛涅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神,为逃避阿波罗的求爱,化为月桂树。阿波罗无计可施,只得摘取其枝叶编成桂冠。收藏在博盖塞别墅中的雕塑《阿波罗与达佛涅》也是贝尔尼尼的作品。

③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其长诗《变形记》叙述了二百多个关于神与人变形的故事,其中包括达佛涅的故事。

④ 维腾贝格的僧侣,指路德,1517年,路德在德国维腾贝格万圣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浪潮。

经的纯洁：胜利将始终留给石膏中的童年耶稣，发愣的女圣徒，暧昧的天使，逼真的幻象，大理石的狂欢，极其过分的装饰品，在它们之中，心灵倾覆于一种激奋的无序。

在我舅舅的储藏室里生吞活剥地读过的书，再也没有给我留下丝毫疑问。一个边缘人，一个自由射手，贝尔尼尼？在传奇般的法国之旅中，他敢于冒犯路易十四，他的一尊国王骑马的雕像并没有足够威武地体现出君主灵巧的骑术[①]。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一到罗马，这位建筑家兼雕刻家就成了温顺的臣下，乖乖地听从他的主子。他为三个教皇工作过，忠实执行他们的命令。乌尔班八世坟墓上著名的蜜蜂，在我看来曾是自然对权势、瞬间对永恒的反动，从法令中偷得的幻象部分，实际上只是一个纹章学的象征，是这位王公出身的巴尔贝里尼家族的徽章。圣彼得大教堂中的华盖，建成于宗教裁判所惩罚伽利略的同一年[②]，尽管它青铜的旋柱十分怪诞，目的却还是加强天主教会独断的威望。

巴罗克风格装饰中奇特、魔幻、违反规则的一切，都呼应了政治目的，以丰富多彩和强有力的表现，来震惊、诱惑大众，恐怕这才是反对路德派苦修的必胜武器。这一风格，我因其逃学、打弹弓、充好汉等方面的原因而早已喜欢，现在反倒显得像是正统理念的卫士。那些额外的涂描，那些意外的惊奇，那种细节上预料不及的豪华，那种发明上前所未见的奢华，所有这一切，都进入了一个高级意愿的层面。

何等的失望！幸亏我还保留着我的选择之地，一个彻底抗拒任何教义阅读的地方。我来到西班牙广场，世界上最不对称、最难以料想、最疯狂的广场，它坐落于好多个层面，它的台阶仿佛摆出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有时放宽，有时收窄，有时又略略停顿，然后重又开始上升，不急不忙，漫无目的，这是一道自由散步的台阶，是一个有别于世界上所有台阶的目的本身，因为其他的那些台阶都要履行一种明确的功能，把人从某一点带往另一点。西班牙广场始终不断地被一大群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占据，成为一个夜以继日地永远开放的露天剧院。

---

① 这尊雕塑现藏于罗马的博盖塞别墅。

② 即 1642 年。该华盖是贝尔尼尼的杰作之一。

我坐在台阶上，位于卖束带者、卖花女郎、烤蚕豆人中间。鸟儿在树丛中唧唧喳喳地叫着，孩子们练着拳，呼呼作响地伸出手掌，酒吧侍者单手稳稳地托着盘子，大步攀登在阶梯上，饮料一滴都不会晃出。

一个褐色头发的年轻人，脸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想抢走我手中的那盒民族牌[①]香烟。“别碰我！”我对他说，给了他一支烟。他告诉我，他在电影《擦鞋童》中演过角色。那两个擦皮鞋小子中大的那一个，就是他。拉蒙，爹妈西班牙人。大白马一蹄子就踢在他的脸上，德·西卡[②]向他保证会给他赔偿的，他等待着，已经四年了，等着对方承诺过的一百万。

“你以为他们会付你钱吗？”

“既然他们起誓了！”他嚷嚷起来，黑黑的眼睛中亮起了一道野兽般的光，他捏紧了拳头，仿佛握着祖辈的一把那瓦夏[③]。

在诗人约翰·济慈[④]曾住过的那幢房子的挑檐下，我们抽完了那盒烟。一位教士大人[⑤]，长袍的纽扣一直扣到脖子，眼睛死盯着他的祈祷书，斜向地从台阶上走下来。哈斯勒旅馆[⑥]的行李工，蓝色的贝雷帽上饰着一个红色绒球，两个胳膊底下分别夹着一个帽盒子，蹦蹦跳跳地跟在一个女顾客身后。

“你说我应当打乌鸦还是打鹦鹉[⑦]？”

不等我把他拉住，他就一跃而起，冲入了人群中。我看他撞了教士一下，教士赶紧抓住要掉下来的眼镜，却没有发现，挂在他手腕上的金链条已经换了一个主人。

台阶脚下的那个喷泉，外号叫驳船[⑧]，因为它的形状像一艘半沉在水中的船，它仿佛真的要沉了，水都漫过了它边沿的低缘。这是对恒常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擦鞋童》是德·西卡拍摄的电影(1946)。

③ 那瓦夏是一种西班牙匕首，刀身微弯，刀口锋利。

④ 约翰·济慈(1795—1821)，英国诗人，1820年来意大利养病，次年即逝世。他在罗马的故居位于西班牙广场台阶的右侧，现已辟为济慈–雪莱博物馆。

⑤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⑥ 哈斯勒旅馆是罗马最昂贵的酒店之一，位于西班牙广场台阶的顶端，景色极佳。

⑦ 乌鸦喻黑衣的教士，鹦鹉喻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顾客。

⑧ 原文为意大利语。

与统治精神的鲜明挑战,与巴黎城的铭言"漂浮却不沉没"[1]恰成对位,是不确定与冒险的徽章。罗马,真正有一次,希望表达它对"你是彼得,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将建立我的教会"[2]的拒绝。"登上"一叶漂荡不定的小舟,随时随地都有消失的危险,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这个城市的所有居民,我们在罗马之城以及它霸权欲望的意外沉没中,发现了一个行为动机,以继续我们的行动自由。还有,要相信偶遇,相信即兴,相信机会。所以,被罗马算做扒手、娼妓、小贩、寄生虫的一切,全都自愿聚集在西班牙广场的阶梯台上;确实,对没有任何其他住址的拉蒙来说,这里是唯一的一个地方,可以期待魔法般的那一刻到来,等阿尔法电影公司将天赐馅饼砸在他头上;最终使他可以睡在一张床上,可以打电话给他在加泰洛尼亚的母亲,可以不负一种伊比利亚式的名誉和派头,把他曾经借过的成千支香烟,还给他的上百个朋友。他的发财梦仅仅局限于此,而且只靠小偷小摸来骗一骗这个黄粱美梦。

然而,我却不得不再一次灰心丧气。广场周围的一般建筑都服从于一种明确的代码,而这代码转达的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宇宙观,把历险和意外统统排斥在外。

罗马的喷泉,被人看做很"任性",似乎从纯粹的幻象中喷涌而出(乌龟喷泉,蜜蜂喷泉,四河喷泉,特莱维喷泉,摩尔人喷泉,特里同喷泉[3]),实际上,却只有名义上的传奇性。罗马以其源泉而为世界的女王。她沐浴在一个水波荡漾的地方。地下充溢着大片的水层,巨大的水库,羊膜包裹般的汁液,人类从中汲取无穷的营养。如果说驳

---

① 原文为拉丁语"Fluctuat nec mergitur",这是巴黎市市徽上的铭言,巴黎市徽的图案是一艘帆船。

② 在原文中,"彼得"(Pierre)和"磐石"(pierre)是同一个词。这句话是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的,语见《新约·马太福音》16;18。

③ 这些都是罗马城中喷泉,其中四河喷泉和特莱维喷泉最负盛名。乌龟喷泉在梅特广场;蜜蜂喷泉在巴贝里尼广场,是贝尔尼尼的作品;四河喷泉在纳沃纳广场,见上文中的描述;特莱维喷泉也译作三路喷泉(中国人喜欢称之为"还愿池");摩尔人喷泉也在纳沃纳广场,有贝尔尼尼塑造的一个与海豚搏斗的摩尔人形象;特里同喷泉在人民广场,也是贝尔尼尼的作品,特里同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之一,人身鱼尾,吹海螺,故特里同喷泉也称海神喷泉。

船[1]喷泉那坍塌的承水盘是四边溢水，那是因为，从平乔到帕拉蒂诺[2]流溢的众多喷泉中，这一个最雄辩地回顾了生命的水流之源，回顾了水在生育奥秘中的地位。

母亲之水从岩石的缝隙中涌流而出，从喇叭状贝壳那带凹槽的扇面上珍珠般地溅落，从号角的喇叭口中滋射出，或者从海豚尖尖的嘴巴里喷出，浇灌，哺育，哄养，包裹，麻痹着城市。每一个喷泉都以它有规则的咕嘟咕嘟声，以它平稳的喷射节奏，唤醒着一种诱人的回忆。从驳船[3]这一所有喷泉中最典型的喷泉，流淌出一种永恒的诉怨。对这一内心音乐的模糊追忆，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最珍贵的宝贝。

但是，人一旦在保护伞下待够了必要的时间，一旦他得到宠爱，抚养，照料，他就应该开始自己走向艰难的人生：一旦他的脚踏到了坚实的地上，台阶就会在他面前展开，请他从此认识人生。这一台阶，跟所有已经熟悉的台阶不同，它让漫步者在多种路线中自行选择：他可以向右拐，也可以向左拐，也可以迂回地从一侧转向另一侧，曲里拐弯地攀登。他会遇到许多小小的中间过道，中途还会看到一个又大又宽的平台，带有栏杆，在那里，他可以凭栏回顾已走过的路程，除非他更喜欢转身向着高处，估摸他还需付出多大努力。总之，作为人类生存的隐喻，这一台阶让他有可能按自己的想法制定自己的路线，选择他喜欢的行程，以及各阶段的地点和时间长度。但是，作为基督教生存的隐喻，它迫使人做一种持续的攀登，一种努力，努力地把有罪的躯体带向上帝，把心灵带向救世主。

在行程的顶点，高层平台上，他将看见矗立着什么？一个方尖碑。不是随便什么异想天开的念头把它搬到了这里。一个个方尖碑，跟一个个喷泉一样，都不是随随便便地散布在那里的。就跟其他在奥古斯都、卡里古拉的战争废墟中找到的、被反对宗教改革的教皇们树立在公共广场中央的埃及战利品一样，这个方尖碑也提示着天空的方向。天空，被圣三一山教堂形象化了，我们的游客走完最后一层的九级踏阶，就能触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平乔和帕拉蒂诺是罗马城中两座小山。

③ 原文为意大利语。

及到它[1]。这时，假如他抬起头，看着正前方，就能看到两个孪生石头兄弟般的巨大钟楼，把远景整个地收住，这便是他登高之路的终点。

罗马从摇篮时期起就把他握在手中，给予他一种表面上的自由，只是为了更好地把他引向目的地。经历了这一发现，西班牙广场在我眼中就不再像当初那样令我喜欢，就不再是一个美丽的、惬意的漫步场所。我始终侧耳聆听着喷泉的汩汩水声，但是，溅落的水滴却让我计算流逝的时间。多么逼人的拓扑学！母亲，我看见她在下面被吞没，落入一个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天父之外无拯救，他在台阶的高处伸出谴责的手指，督促爬上台阶的我进入他的殿堂。

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听从律令，攀爬上坡，或者等待着被掷入外界的黑暗。由此，在罗马的历史中，出现了数量众多、花样繁杂的隐喻：火刑给了乔尔达诺·布鲁诺，烧死在鲜花市场；二十七年监禁给了托马索·康帕内拉，宗教裁判所的审判给了伽利略；折磨给了马里奥·卡瓦拉多西，遭到警察总监斯卡尔皮亚的迫害；致命的囚禁给了安东尼奥·葛兰西；一把无名人的匕首，金银丝嵌花的铁器，给了通称卡拉瓦乔的米开朗琪罗·梅里西，他在声望如日中天之时，被杀死在拉齐奥的一个滩岸上[2]。

---

① 圣三一山教堂建在一座小丘上，俯瞰着西班牙广场，广场上著名的大台阶（建于18世纪）倚山而上，台阶顶上矗立的便是圣三一山教堂，建于16世纪，方尖碑就矗立在教堂前的最后一层平台上。

② 乔尔达诺·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科学家，因反对地心说而被教会视为异端，最后被判火刑。托马索·康帕内拉（1568—1639），意大利哲学家，宣扬乌托邦思想，著有《太阳城》，曾被宗教裁判所判处二十七年牢狱，后在教皇乌尔班八世的干预下获释。马里奥·卡瓦拉多西：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的画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见前注。卡拉瓦乔（即米开朗琪罗·梅里西，1573—1610），意大利画家，他最终死于一场斗殴。后文对他有许多影射。

23

各座教堂里，各家博物馆中，我一幅又一幅地认出了卡拉瓦乔的绘画作品，罗贝托·隆基老师在博洛尼亚曾对我们都说起过，老师迷恋这位画家，而对巴罗克艺术家有所保留，这一行为，跟他反官方艺术的立场，尤其反对以官方方式撰写艺术史的态度是吻合的。贝尔尼尼的辉煌生涯得到了国王们和教皇们的奉承，而且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各类教科书的头版头页，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位被诅咒画家的经历的磨难，对于他，生前的迫害，以及在河滩上丑闻般的暴死，并不能让他避免在死后很长时间里湮于默默，直到20世纪才被人重新发现，比起弗美尔或拉图尔来[1]，都还要晚得多。你还记得吧，一开始，我还曾依稀试图重续我那中断的高等教育学业，写出学位论文来，而写了几个章节后，我很快就明白到，当初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一研究，我又为什么如此难以重操旧业。我怎能钻入到这种学位论文技术性的、无人称的话语中去呢，而实际上，每一幅画作，都会以其风格，更以其主题，让我投入到一种强烈的激动之中？

我在一幅幅画作之间流连忘返，恋恋不舍地离开最后爱上的那一幅。一会儿是捧着满篮水果的巴克科斯[2]，白衬衣滑落到胳膊上，露出了肩膀；他脑袋微微后仰，这一邀请动作更由微微张开的嘴、含糊的目光和血液的流动来强调，血脉冲动给他的耳朵带来一小块红色，跟他黑黑的鬈发形成鲜明对照。一会儿又是蹲在水塘边上的那喀索斯，咧开嘴唇迎接自己的倒影；不是神话中枯燥无味的牧羊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壮小

① 弗美尔(1632—1675)，荷兰画家，以画风俗画为主。拉图尔(1593—1652)，法国画家。

② 巴克科斯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

伙,从一个城堡中逃亡的年轻侍从,这从他从锦缎紧身短上衣上剪下来的绸缎花中,从他衬衣质地考究的细麻布上,从他帽子上打的细结上,便可见一斑。他甘愿牺牲种种优越,也要投身于一种无赖一般自由、游荡的生活:他那漂亮的蓝色套裤,膝盖上已经破了一个洞。而现在,在多里尔-潘弗里美术馆天花板上装饰有壁画、地上铺着打蜡橡木地板的走廊上,则是全身赤裸的少年圣施洗者约翰。身子半躺,压在一条胳膊上,另一条胳膊则搂定了一头公羊。尤其令我吃惊的,是这一幅绘画与它旁边的那一幅的鲜明对照,一边是小孩子脸上洋溢着的狡黠的微笑,一边则是姿势瘫垮的抹大拉那深深的忧伤。

她[①]背靠着灰墙,坐在一把矮椅上,这椅子便是专制王朝监狱的牢房中的唯一一件家具,她向前弯着身躯,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两眼定定地望着虚空。孤独与绝望的形象,被她衣裙上奢华的刺绣映衬得越发悲怆动人,这件法兰绒长裙由一根红丝带系在她的腰身上。脚下的方砖地上,零星散落着她刚刚解下来的首饰。一条项链落在地上时破碎了,珍珠滚撒在砖地上,一直滚到一个盛白葡萄酒的水晶玻璃杯脚下。琼浆酿熟在弗拉斯卡蒂的山坡上,她却毫不在意它那漂亮的镀金色,而就在她附近反曲线上的那个淘气鬼,我心里偷笑着想,却不会这样冷傲。他恐怕会急急忙忙地一口气喝空酒瓶, 同时还不忘记随带着偷走那些被遗弃的首饰。

无疑,这是一种意外的比较,但它证实了我的一个观点,即一个年轻小伙子生来就是为了游戏,为了取乐的,而女人们出于本性,则注定要受苦,受折磨。受伤,并且悲伤,在我身边,我看到女人们总是这个样子,首先从我家里的女人开始。一张女人的脸要让我喜欢,就得让哭泣的习惯留下其痕迹。我很愿意,我对自己说,我将帮助别的抹大拉负担她们的重任,就如我曾经跟乔瓦娜·B.分享过她犹太人命运的忧伤,跟斯洛文尼亚移民薇玛·卡尔兹分享过流亡的痛苦与酸涩。薇玛·卡尔兹,卡拉瓦乔的另一幅作品令我联想起了她的苗条身材和优雅举止, 那是一个跟她一样满头金发的天使形象,同她一样也拉小提琴;不过有一点

---

① 这一段描绘的场景便是卡拉瓦乔的绘画《后悔的抹大拉》。

不同，这个天使显然是个男性，尽管画家努力把他描绘得有些雌雄同体般的暧昧，他恐怕会一直留在我的地址本里，夹在正当的位子中，而不是消失在卢布尔雅那的一个郊镇里，我曾经把那镇子的名字涂写在一个火柴盒的反面，只是我早已把它给弄丢了。

至于台伯河另一侧朗格拉路上科西尼宫[1]中的那个滑稽的年轻人，盔甲一般厚的黑头发遮住了他的额头，还有脸的上半部分，让嘴巴和下巴隐在一种不确定的阴影中，但肩膀和胸脯却沐浴着光明。我发现，继续在圣施洗者约翰的虚伪名称下将他伪装起来，将是很可笑的，他，显然是某个二流子形象的搬移，不怎么理想化的，这样的家伙，在盗贼出没无常的特拉斯特维尔区经常能遇上，被人以画画的借口拉进了画坊中；小偷或卖淫者，毫不犹豫地脱个精光，但又故作姿势，遮掩其特征，反正，骗子总能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本不留下丝毫明确的痕迹。

把我带回到我学业文凭的那些思想，如同一根额外的刺刺激了我，同时又让我意识到一个新的障碍。罗贝托·隆基禁止我们在品读一个画家的作品同时，把我们带入他的生平事件中。尤其是提到卡拉瓦乔时，他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警惕他那些传奇般的"黑色罗曼史"。赌场中的打打骂骂，跟陌生人血淋淋的斗殴，在一家小旅舍门口留下的脸上神秘的长长刀痕，直到他在停泊了斜桅小帆船的河滩上那一次暴烈而又肮脏的死亡：面对那些异常的曲折线索，历史学家恐怕也会惊得目瞪口呆。唯独只有"绘画价值"的分析，"追求光线效果"的研究，"明与暗对照"的考察，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现代批评和现代美学的怪癖，在绅士般谨小慎微的隆基那里是可以宽恕的，因为他擅长于，就如他自己所说的，"在脏内衣的篮筐中"挖掘，近二十年来，这种怪癖变得巨大异常，既然一些没有灵魂的工程师，打着符号学家和结构主义者（这些学究成了真正科学的死敌）的旗号，声称可以像拆卸一个飞机马达那样拆卸一部作品，而不必参照传记方面的任何资料。

跟在教授中盛行的、并彻底说服我放弃了大学生涯的这一方式背道而驰，我的方法所强调的，是要把卡拉瓦乔的画看成带有他生命代码

① 科西尼宫为15世纪时红衣主教利尔里奥所建，18世纪时由红衣主教科西尼重建，是一个国立美术馆。

的编年史。比如说,年轻的刽子手与年老的牺牲者这一对概念,就立马打击了我。拿《圣马太的殉道》来说吧,我将到法兰西人圣路易教堂尽头的墙上去欣赏它,那时,人们还不可以把一百里拉塞进盒子里,以求开亮一盏射灯照亮绘画让人欣赏。我并没有久久地纠缠于画家的技巧,他的对角线体系,他的对位科学,这些固然是不可忽略的话题,但只是作为真正评价之前的开场白而已,我尽可能地借助于教堂侧堂里的微光,以及画作的暗夜色彩,辨认出一个屈服和投降的奇怪场面。埃塞俄比亚的野蛮人冲进了庙宇,要把在当地传道的圣徒杀死;而后者,已经倒在祭坛脚下的台阶上,秃着脑袋,大把的胡子飘拂着,张开了两条胳膊,准备迎接由一个没穿衣服的少年郎带来的致命一击,这少年是进攻者中最凶猛的一个,也是其中最漂亮的俊郎。谋杀的证人们纷纷逃窜,恐惧把他们抛到一边,把他们赶得落荒而逃,惊恐扭曲了他们脸上的线条。只有马太对这一场景保持了彻底的无畏。面对朝他直刺而来的利剑,他甚至都不寻求保护一下自己的脸,他胳膊摊成十字,正视着那个年轻人,后者正朝他俯下身来,想在他身上找一个部位,好下手刺入利器,他那把闪闪发亮的长剑。“你乐意刺哪里就刺哪里吧,”牺牲者似乎在对他的凶手喃喃道,要不是凶手的腰身上还卷缠了一件内衣,他似乎就是全裸了,一根布条扎住了他的头发,但他叛逆的鬈发还是在额头上微微颤动。场景的其余部分没怎么照亮,显得很昏暗。整个的光线从高处落下,亮色照耀着年轻人的身体,我也跟马太定定的眼睛一样,观察着他。面对刽子手的青春与辉煌,使徒所显现出的这种目瞪口呆,不禁让我想入非非;尽管一种如此消极的温顺在我看来很不可取,我心里还是在说,真该有一种超人的力量,才会不希望死于一种如此的显灵。

同样的一对,在我心中激起同样的激情强度,我在博盖塞别墅的二层楼上又见到了,那是在面对背景一片昏黑的《大卫和歌利亚》[①]时,它很快就成了我最喜爱的绘画。大卫杀死巨人时,并无证人在场,在这幅画里,没有哑角:唯独只有这两个神秘的死敌留在沉沉的黑夜之中,其效果确实令人震惊。没有一个次要角色被认为有必要见证一下他们俩

① 《大卫和歌利亚》是卡拉瓦乔的一幅画。年轻的大卫在战场上杀死非利士勇士歌利亚的事,见《旧约·撒母耳记》第17章。

这神秘的个对个的最后厮杀。耶西的儿子[1]半裸着上身,任凭荒漠披风滑落到腰间。他的脸微微倾斜,瞧着被他拎在手上的非利士人的脑袋,而他的另一只手,肌肉紧缩着,握住一柄长剑,低低地横在他的腿上。胸像的神奇典范;胜利者的卓越气势,他决不卑躬屈膝地满足于捏在手中的毛发浓密的战利品;小小的嘴,线条明显,玫瑰色的唇在苍白而无光泽的肌肤映衬下越发鲜明;耳朵也是玫瑰色的,如巴克科斯的一样;画家的羞涩或谨慎显而易见,他把他模特儿火热的肉欲全都集中在了这一微不足道的软骨中。

黑暗的悲剧化背景也好,照在赤裸胸膛上的光线也好,藏在阴暗角落里闪闪放光的杀人之剑也好,全都无法阻止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死者不仅大睁着眼睛,而且卡拉瓦乔并没有把它们画成左右对称。就如在生活中那样,它们的线条和表情都不尽相同。左眼,我看到眼皮耷拉,眼珠黯淡,露出惊慌的微光;而右眼,则相反,在高抬的、绷紧的眼皮底下,闪亮的虹膜中有一道黄褐的亮光。微微开启的嘴里露出一排闪亮的牙齿,这嘴也一样,不太像是一张死人的嘴。还有什么话要从中泄出?一声诅咒?一声抱怨?不,那将是一曲感激之歌、一句对杀手的感恩话语,尽管在我看来,那会是奇异万分。我最惊讶的是,我在这张可鄙的、变锈的脸上,隐约看见了一种得到满足的欲望的影子。在这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透露出焦虑与垂死;也丝毫没有最终的痉挛悸动;在这栩栩如生的容貌中,没有一丁点反抗与畏惧的痕迹;只有一种默认和臣服的神态,几乎可说是安详。我相信,怀着一种我无法否认的慌乱心情,我可以从中猜出一种最好还是不要说出口的真相。总之,我觉得,这个满脸皱纹的大胡子巨人并非没有带着一种偷偷的快乐接受了年轻人的权威。

真是一种奇怪的歪曲,尽管这已是当时艺术中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在此这样地讨论,还是有些蔑视了《圣经》。奇怪得无法解释,除了……快点,赶紧回家,瞧一眼我那恭恭敬敬地放在一个抽屉中的笔记,它们就如博洛尼亚留在我心底的全部回忆一样。《大卫和歌利亚》画

---

① 据《旧约》,大卫是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于 1609 年，就在那不勒斯的切里利奥旅店这个水手和盗贼们的巢穴门前发生袭击的第二天。画家在那一天都遇见了谁？争执究竟因何而起？一把什么样的匕首刺中了他的面颊？他受了如此重创，人们简直难以辨认他的脸。总之，应该说没有太多的具体内容。啊！不，这里就有一个细节，决定性的细节：作为艺术家自画像的歌利亚的脑袋。于是，一切都将变得很清楚了。画家的工作方法是：通过一个圣经故事，来讲述他私生活中的一个事件。袭击者的身份。至于袭击的动机，根据某个一本正经的版本，则起源于一笔未还的赌债；就像六个月后那次谋杀的动机一样，那次命案发生在加埃塔附近的一片荒凉河滩上，位于那不勒斯和罗马的半途，是风儿把他的船吹到了这片滩岸，还是他的厄运之星让他的生命之舟搁浅在那里；对所有人来说始终是一个谜的谋杀。还需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找答案吗？卡拉瓦乔已经把他的秘密隐藏在了他的作品中。只要揭开他的头盔，露出里面的真面目就行了。画家的肖像虚构启迪了我关于人的自杀性梦幻的秘密。我发现了由十八岁的刽子手们对一个伟大的创造者施行的神迹。

听懂话的人自有他的好处。对于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我还会回想起这一教训，跟他互换角色。我将不会把自己等同于那个挥舞着割下来的牺牲者脑袋的年轻小伙子，那么冷淡，还略略有些恶心，我将扮演的是战败者的角色。作为一个杀人如麻的黄口小儿手中血淋淋的玩具，我将滚在他脚下的淤泥中。我将既不会短缺荒凉的河滩，也不会短缺冷漠的孤独，更不会短缺大海的波涛。我什么时候开始从这幅绘画中读出了我的命运？我常常前往博盖塞别墅。我并不停顿于博物馆的其他展厅，而往往直奔二层楼的那个大厅。在那里，窗户的角落处，得胜的少年郎正等着我。一道阳光落到他赤裸着的那一侧胸脯上，激越起肌肤的一片镀金色彩。与此同时，渐渐地，我滑入了歌利亚的皮肤底下。他对他自身失败的怀疑既让我充满恐惧，又让一丝温柔钻入我的心中。怎么能拒绝一种诱惑，把搏斗的优先权让给被青春与美饰以光轮的那一位呢？在我看来，假如致命的一击确实来自这样一只手，那么，被剥夺生命倒真是一种可羡慕的命运。

一开始，那只是一个转瞬而过的想法，几乎是一个玩笑；我盘算着

要让自己避免这一点，尤其因为年龄的差距并不会让我长期得到庇护。“等我到了歌利亚那个年龄时，” 我想到，“当我自己也开始长出满脸的皱纹，长出一大把胡子时……”对一个在绘画面前出神的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来说，一种未来依然还那么遥不可及。他可以用美梦来欺骗自己，梦见一个残忍的六翼天使带着一柄利剑猛扑到他身上。“像歌利亚那样毙命，像卡拉瓦乔那样……但是，等到岁月让我磨损、疲倦、厌倦了生活时！”

为了确保我能提防自己的厄运，让这一幻觉归于失败，我便求助于一种我认为够神奇的策略。我被死者那双不对称的眼睛所震撼，便决定，只要我大睁着我的双眼，我就没什么可害怕的。歌利亚的左眼皮耷拉下来时，警告了他的末日已到。同样，我的一个眼皮的垂落，也将是我同意走向死亡的致命信号。从此，我形成了一个习惯，在我夜间探险猎艳时，随身总是带着一面小镜子；另外，我在为一个过客打开车门之前，总要从后视镜中打量一下自己。我以一种特殊的细腻，确认我左眼皮的肌肉依然活跃如故。假如有某个新的大卫游荡着寻找一件功绩，他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找他的牺牲者。

我两只眼睛大睁着，脚踏实地地等着他。我的时刻还没有来到。这一预防措施有时也让我变得鲁莽。我在衣兜里紧握着小小的保护镜，仿佛握着一件护身符。

24

基诺·科鲁西，旧货商，单身汉，头发剪成小平头，一道浓密的小胡子老早就变得花白，而一把小小的山羊胡子却浓黑如旧。他独自一个人生活，愤世嫉俗，在罗马住了二十五年，还是没有适应环境。他仇视这个城市，而我却会喜欢上它，仅仅是因为要跟我舅舅过时的爱国主义分道

扬镳,继续当一个弗留利的分裂主义者。当他不推着小车出门,四处去寻摸旧书旧玩意儿时,他就在店铺后堂查阅登记册,而我则在各个柜台中翻来翻去。无所事事的我,阅读了罗马诗人的作品,怀着一种特殊的乐趣读了方言连篇的、满纸秽语的乔阿基诺·贝利[1]。有时,为了减轻一下给一对年轻夫妇做用人的妈妈的负担,我帮她推童车,带主人家的孩子出去散步,结果累得筋疲力尽。基诺一直陪我来到犹太教堂后面的台伯岛。柱廊街的尽头,离科斯塔古蒂广场这个他离开卡萨尔萨之后一直居住的地方五十米远,我们从一块镶嵌在墙头上的招牌底下走过,这块牌子专为纪念犹太人隔离区的八千死者而挂。大屠杀的纪念日:1943年10月16日。

"教皇难道没有干涉吗?他以前曾当过教廷驻柏林的大使,他本人跟那些纳粹头目都很熟。"

基诺耸了耸肩膀。

"我的小家伙,庇护十二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战争期间被遣送和屠杀的数百万犹太人。针对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他屁事都没做过。"

尽管我对这个教皇本来就很反感,我也不愿追随我舅舅对他的憎恶。

"至少,"我对他说,"写在这墙上的日期清清楚楚地说明了问题。1943年10月,德国人刚刚占领了罗马。他们来到后,迫害就开始了。而在此之前,在罗马,犹太人本没有什么性命之忧。"

"谁向德国人告发了犹太人?谁对德国人说:在这条街的几号几号,住着一家姓勒维的,一家姓拉泰斯的?不是别人,是意大利人,皮埃尔·保罗!是同一栋楼房中的居民。有时候,甚至还是他们的对门邻居。"

"意大利人吗?我不愿相信!反犹主义从来没在意大利得势过。我们本来就已经足够邪恶了……"

"在罗马之外,你说得兴许不错。但是,从我的窗户,我曾看见过有街坊在抄录门牌号码。我敢肯定,他们接着就会去德国人的司令部。有一天,德国人的卡车包围了犹太居住区。突击行动只持续了不到四小

---

[1] 朱塞佩·乔阿基诺·贝利(1791—1863),意大利诗人,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过渡阶段的重要代表人物。

时。每个住宅都早已做了记号,登录在案。只需揿一下门铃,带走居住者。”

我不相信地摇着头。

“小心提防罗马人。墨索里尼未遭抵抗就在罗马安了家。它是唯一一个像娘们一样迎接他的城市。他根本不需要杀死任何人,就能在此当家做主。数万大众自发地拥上大街,来到威尼斯广场的阳台下向他欢呼。他们还以为又回到了凯撒和奥古斯都的时代。”

从我在郊区一所学校中谋到一个助理教师职位的那一天起,我开始喜欢上了罗马,我跟我妈妈一起搬了家,她现在已经不在别人家里做用人了,我们搬到了郊区玛莫罗桥附近的一个公寓中,离最近的城市有轨电车终点站还有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路程。出于一些跟我舅舅毫无关系、但可追溯我童年情景的理由,我感到自己只能“在边缘中”获得幸福,因为我的童年被撕裂为两半,一半靠着一个有着意大利军官和拉文纳人双重“中心”身份的父亲,一半靠着“环城的”的母亲。这样的说法对于我不是一种简单的比喻,而是一种具体的苛求,应该从它们的字面意义上、地理意义上去理解。我偏离中心的命运为我指明了一种郊区的生活。我们当初居住在科斯塔古蒂广场是一个错误(但那可以由缺钱,不得不找个临时栖息地来解释)。在罗马的中心。而玛莫罗桥,则是向东北郊区延伸的最后赘生物,在蒂布尔提诺之后,在皮耶特拉拉塔之后,都市化的巨大增殖,贝督因人的营地,而不是文明化的城镇,在我的眼中立即就显得如同一个新被发现的史前生活的角落,那就是我逃离卡萨尔萨之后要盲目地奔向的目的地。

蒂布尔提诺,皮耶特拉拉塔,钱托切莱:在这些响亮的名称底下,是一个悲惨的现实。趴在我们从泰尔米尼火车站[1]搭乘的、前往蒂布尔提那的公共汽车的窗户上,我仔细观望着那些随地胡乱搭建的、杂乱无章的小房子:30年代的小地皮建筑,外表破旧不堪,尽管法西斯主义的野心是要为罗马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郊区,实在是荒诞的计划,因为在那个时代,罗马城墙之外既没有大大小小的工厂,也没有各色各样的货栈仓

① 即罗马的火车终点站。

库，这片几近荒芜的平原和丘陵地带上的唯一居民，是零星的牧羊人，没有工作的流浪者，作恶累累的惯犯，还有一些铁路工和旧货商，他们的棚屋至今还在，小小的木板房，瓦楞铁皮的屋顶，跟钢筋混凝土的廉租房彼此为邻；年轻共和国的那些居民楼，尽管外貌也已破破烂烂，仍集中在一起形成小区，围绕着一片片硬土的空地，被人们用做垃圾站、自行车车棚、游戏场和晾衣场；东一处或西一处，会有一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由于野心实在太大，以至于永远也无法完工；或者是某个崭新的商业中心，华丽得过分，优雅得出格，比如那家挂着德律风根[①]广告招牌的大商场，其依然带着铅白条纹的铺面已经在准备展示最新款式的33转电唱机了。

但那要等重新换上橱窗玻璃后，因为，我很欣赏其粗野胆量的那些足球队员，决定就在商店前的工地上打比赛，那个显然就是球队队长的人把球放在地上，久久地瞄准了好一会儿，以冠军般的一脚踢出球来，把玻璃窗砸了个粉碎。

暴力与其说是针对着财富与金钱，兴许还不如说是直冲它们的象征而去的，这一光滑的、闪亮的、清爽的、水晶般的表面，他们从中只能映照自己肮脏的脸，显而易见地跟他们的那个世界格格不入：明显不足的道路上还满是淤泥与灰尘；灰扑扑的水泥墙上只有涂鸦文字的装饰；墙面上马马虎虎涂上的灰泥层如鱼鳞一般开裂，一眼望去，只见从一层楼到另一层楼尽是锯齿般的裂缝，而在那之上，则是挂满了阳台的花花绿绿的内衣。这个无穷无尽的杂乱建筑的营地什么时候才是个完呢？我们，妈妈和我，站在喧闹不已的旅客中间，腿缝间夹定了我们的四个行李箱，公共汽车每颠簸一下，我们就跟着哆嗦一下。汽车冲进了长满了脏兮兮野草的斜坡，两边则是人口稠密的房屋，柴泥的陋屋，枝叶枯瘪的灌木，一堆堆秽物，罗马水渠的废墟，锈迹斑斑的煤气储气罐，这褐色的庞然大物堵塞了地平线，还有正在路堤中工作的红色推土机，位于乱石堆中的巨大的吊塔。

“到后面来吧！在平台上感觉会更好一些！”

① 德律风根是欧洲一家著名的电器公司。

说话的是一个年轻人,一段时间以来,我就感觉他的气息吹在我的脖颈上,我也冲他微微一笑,现在,他趁着一台正在铲挖一大堆乱石的铲土机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响声,向我尖声喊出了这一邀请。尽管我们周围没有任何人装作听见了这话的样子,我还是立即面红耳赤起来。

"就在这里?在公共汽车里?"我笨拙地说,不敢喊得太响。

他哈哈大笑起来,一根手指头压在脸上,做出贝利已经在其十四行诗里描绘过的这个优雅动作,想把我拉到后面去。妈妈已被身旁的人挤得够呛,紧紧地靠在扶杆上,焦虑的目光死盯着那几件行李。我不停地对那小伙子微笑着,而他那只灵敏的手也刚刚给了我他才华的一种预感,但我摇晃着脑袋表示不行。他回报我以微笑,心情不错地耸了耸肩膀,转过背去不再坚持,在人群中挤出一条通道,走向出口。一到站,他便一步跳下车,但他没能抵抗得了一种快感,攀爬上一堆高高的垃圾,在我眼皮底下大胆地摆出一种神气活现的姿势,这一高傲的身影更是加剧了我的后悔,机会已失,时不再来。

在我们面前,公路尽头的一个小山丘上,出现了一大片房屋,那是无人居住的拉丁姆[1]高原之前最后的一个岛状住房群。汽车开过一片还没有动工的光秃秃的空地,然后越过阿尼埃纳河上的一座桥,夹杂着泥沙的河水呈现一种栗子色。一侧河岸上,延伸开一些小小的果园,都由栅栏围着。而在河的另一侧,汽车把我们放在一处高高的斜坡上,一个小小的三角形广场,面对着在一道水泥披檐保护下的一排长椅。我们几乎都来不及跳下车,一大帮满头黑色鬈发的年轻家伙便一拥而上,占据了车尾门前的踏板。在那些急不可耐的乘客的大声斥责下,司机放弃了到土台子那发黄的草坪上去歇一歇,放松一下僵硬的腿脚的打算。他重新爬上驾驶座,发动汽车,回头朝罗马方向驶去。

玛莫罗桥——如果不是它那一大片荒地彻底孤零零的位置当年被选中,用来建造巨大的雷比比亚监狱的话,它兴许早就被地图给忘却了——一共有五十来栋楼房,由人们随心所欲地胡乱建在阿尼埃纳河水浇灌的一片荆棘丛生的肥沃土地上。人们甚至都顾不上把它

① 现通称拉齐奥。

好好清理一下。我在那里住了四年，在朝东的三个房间里。这里，教堂始终还没有建起来，尽管对居民们做了承诺，但一直停留在建筑师的图纸上。一家电影院，巨大无比，跟人们的需要不成比例，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公共建筑，在一长排水泥柱子后面，显现出它墙面上的石膏裂缝。

少有的几场电影都安排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下午，观众也是寥寥无几。拉卡尔穆托和皮耶特拉内拉出生的人——当地绝大多数的人口往往来自西西里的这两个地方——不愿意看西部牛仔电影和美国喜剧片。放映大厅只是在冬天的某几个晚上才会爆满，那是在市政供暖突然出现故障时，一家家人蜂拥而来，扶老携幼，挈妇将雏，孕妇挺着大肚子，老人穿着睡衣，戴着睡帽。他们带来了摊鸡蛋、比萨饼、茄子酱、油炸苹果圈、葡萄酒，试图以他们那种直率而又真诚的大吃大喝的嘈杂声，盖住银幕上的对话声和荒漠上的马蹄声，因为，在他们听来，那些声音实在太乏味了。他们出于乡下人的常情常理，拒绝那些跟他们的世界如此陌生的荒谬言行，以一种坚固的农民传统来顽强对抗媒体的第一波进攻，两个小时的珍馐美味之后，他们酒足饭饱，拍拍屁股走人，只留下满地的油纸和空瓶子，并非因为他们邋遢不洁，也不是由于粗心大意，而是因为，他们把这荒诞的建筑看成了自己的地盘，就像乡野或者森林的一隅角落那样。不过，它还算是不错了，它对面的那家意大利信贷银行分理处比它还要更水土不服，它那光滑的花岗岩墙壁，它那大理石的柜台，它那招贴画，全都体现出一种陌生感，招贴画上的那片蓝色湖水，在向一种储蓄计划的认购者们承诺着他们梦寐以求的山区别墅。

结了婚的年轻男女，则喜欢坐在电影院后排的尽头处。他们在那里做爱，静静地，毫不羞耻，同样是男女杂处，这里比他们居住的几代同堂的父母家房间里强多了。机会也远不那么令人失望，只要等着那一刻，约翰·韦恩在《边疆铁骑军》中把第一个亲吻贴到玛琳·奥哈拉的矫揉造作的嘴上[1]，或者詹妮弗·琼斯在《阳光下的决斗》中在约瑟夫·科顿和格

[1] 约翰·韦恩(1907—1979)，美国电影演员，西部牛仔明星。玛琳·奥哈拉(1920—)，爱尔兰女演员。《边疆铁骑军》，美国电影，1950年出品。

里高利·派克两个人之间做出取舍[①],其实,在广泛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意大利,这两部电影在别的地方都很有名。

村子完全以一种非洲部落的方式安营扎寨。男人们,到晚上为止一直在外,在沿着蒂布尔提那冒出来的那些汽车行或作坊中工作。女人们则留在厨房中,围着灶台打转转。她们只在上午出去一个钟头,去斯坦达商店采购,那里垄断了食物与日用品的供应。天气很热的日子里,她们便把椅子拉到阳台上,但是椅子背靠栏杆,脸冲里。按照她们从西西里带来的古老习惯,她们要面对窗户而坐,埋头于手中的女红,而绝不能朝大街上东张西望。

街道属于男孩子,十二到十八岁的小子[②],唯独只属于他们。体育场用来游戏,移民区用来竞争,竞技场用来斗殴,商店用来偷窃,仓库用来窝藏,他们恒常地生活在那里,而他们的司令部则是水泥披檐下面的石头长凳。公共活动的中心,永远活跃的唯一地方,村镇真正的中心广场,就在那个三角形草坪上,那些讨伐,那些武斗,那些复仇,全都是在这里决定的。只要付上几个里拉,每小时都要经过这里的公共汽车,便可以把他们带上它那摇晃不已的铁皮中,在危险发生、好动癖发作、想象力缺乏、关于新地盘的谣言骤起的情况下,带他们走向种种新机会,去从事有利可图的走私,冒冒失失的盗窃。

但是,大规模的轻举妄动,最大胆、最有收获的,则开始于太阳下山后,在他们的父兄回家后。年轻人出于火爆的脾气性格,受不了关在家里的四面墙壁中,就在家庭圈子重新焊牢在饭桌周围,母亲们为了盖住醉酒丈夫的嚷嚷声而拧动收音机(几年之后,则变成了电视机)旋钮的时候,他们就蠢蠢欲动,迫不及待地要往外溜。自行车,摩托车,黄蜂,朗布莱塔,有时候甚至是一辆杜卡迪125或者一辆电动控制车叉的蒙地奥[③],趁其主人下班后把它们放归于原处,便偷偷地把它们推出庇护所。

---

① 《阳光下的决斗》(又译《太阳浴血记》),美国西部片,1946年上演。詹妮弗·琼斯(1919—),约瑟夫·科顿(1905—1994),格里高利·派克(1916—2003),均为美国电影演员。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③ 黄蜂、朗布莱塔、杜卡迪、蒙地奥都是摩托车的牌子。

它们被静悄悄地推到通向小河的公路上，而一过小桥，便开始了噼里啪啦、汹涌澎湃的夜间行动。

我坐在桥栏杆上，观看这一大群猎犬的出发。他们如饿狼一般，争先恐后地冲向罗马街区，他们的探马早已告诉他们，那里将会有某种令人垂涎的意外收获，一家仅剩一个人看守的燃油库，一爿没有铁帘门的商店，一个无人守夜的五金仓库。他们成功地偷袭了据点，还重新修复了一辆德军的带拖斗摩托车，另外还有一辆战前的客货两用车[①]，这些车辆很笨重，容易被发现，开起来也比他们的摩托车慢多了，但用来装货却是必不可少的。

那些收获甚少或毫无收益的夜晚，当他们在博盖塞别墅的松林中无谓地喂养德国"小姐"[②]时，为了不至于空手而归，他们就去偷人家汽车油箱中的油，把路灯的灯泡拧下来，去撬下水道的井盖。返回路上，蒂布尔提那的售票员们会付上一把里拉，接受他们的货物。在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和打家劫舍之后，再一路开车回来也就是无关紧要的事了：去罗马流窜的根本收益是那种快感，夜间驱车，违法乱纪，冒险行动。安全部门已经盯上了他们。不止一个人已经住进了雷比比亚或圣米歇尔，少年犯监狱。

引领我见识这一风俗的塞尔乔，我是在桥上遇识的，他先跟我打的招呼。一记呼叫，几乎是一声辱骂，用一种我所不知的话语，一种粗野的方言，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他哈哈大笑，建议跟我来一局手指游戏。一个游戏者先伸出手来，食指和中指伸直。他的对手，同样用这两根手指，使劲打对方的手指。一攻一守，轮流击打。我们打得兴致勃勃，不到十分钟，我们俩手指头全都流血了。和约缔结。

"你的神色怎么那么愤怒？"我问他。

他耸了耸肩，低声咕哝道：

"你是教师，对吗？"

"你不喜欢学校吗，你？"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原文为德语，指德国摩托车。

“我十二岁就退学了。我不能再待下去。”

“明白了！”我笑道，“不过，教师可并不都像警察。比如说，我，就不归于这一类。”

他瞧着我，满腹狐疑。

“但那些小家伙，你不是强迫他们屁股坐在板凳上吗？”

“显然，塞尔乔！你想让我们怎么上课呢？”

“我讨厌坐着。我受不了那样。身体原因。来吧，你来瞧瞧我的鞋子。”

他伸出他的篮球鞋给我看。很大的脚指头从磨破的布面底下露了出来。鞋底中央有一个补车胎用的圆胶皮大小的洞。

“我得把它穿破。实在太为难我了！”他宣称。

我把握不准自己是不是应该抱怨他的囊空如洗，无法酬谢他人，便目随着一段被裹在泛着脏沫的旋涡中的木头沿河漂下。

他又咄咄逼人地开口说：

“从年底起，我已经穿坏了第五双鞋子！我就是这样的。我得不断地动。不那样动就不行。”

“什么牌子的？”我说，好让我有时间明白，他到底是在吹嘘自己非凡的毁鞋本领，还是在抱怨橡胶工业没能生产出更耐磨的材料。

“倍耐力这个牌子的橡胶更耐磨。我至少需要三星期才能让它变成一团血肠！”

他并不是一个叛乱者或闹事者。他性格温顺而又诙谐，很少参加夜间袭击，除非当人们宣布要抢劫一家鞋店，他可以得到一双新球鞋时。他粗粗地教了我几句波尔加特①方言：一种夹杂了罗马俚语和各种南方方言的混杂语。在骑上他叔叔的杜卡迪的后座之前，他做了一种画十字的手势。不是画十字的手势，而是画十字的一种手势：因为他并没有先指左肩，再指右肩，而是把次序弄反了。一种充满了“意味”的错误，它改变了手势的本质。通过这一与天主教参照相悖的神奇的保护动作，他跟一种前基督教和前资产阶级的文化，跟古老的异教巫术的礼仪联系在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指罗马郊区的一种方言。下文中的“波尔加特”也转指“罗马郊区人”。

了一起。

他对一种固定工作的反感,他的职业不稳定性,这些也一样,也是那般地具有异教色彩。他白天在一些建筑工地中晃悠,在石灰槽里拌一拌石膏,推一推小车,运一运石头,拉一拉垂直线,摇一摇绞车;无论是做泥瓦工还是土方工,他总是既违抗老板们提供的持续的招工要求,也反对工会分子的思想灌输。共产党人的错误之一,就是把千百万像塞尔乔这样既无职业、也常常定无居所的人,看成无产阶级中受剥削最重的不定形的阶层,有可能扩大到无产阶级有纪律的队伍中来。实际上,无论是阶级意识,还是赢得一种阶级意识的欲望,他们全不往心里去。资本主义、工资单、劳动法、社会保险:对他们如同天书。不需要别的,只要看一眼他们冲向城市之前在桥头上大张着鼻孔的样子,人们就能回想起,就在不久前,他们的祖先还住在岩洞中,靠狩猎为生。作为阳光与风的儿子,尽管移民他乡,水槽中有了自来水,天花板上挂了电灯泡,他们依然保留了游牧之人自豪的目光和轻快的步伐。他们迷惘于阿涅利[1]和总工会之间的意大利社会,既不能适应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又不能适应工人运动活动分子的身份。物理学上和形态学上的无所适从,就像我的那些学生,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达十分钟以上,为了不至于窒息,便一块接一块地打碎教室中的方砖地。

按照学校的使命,我千方百计地想把他们改造成普通的温顺公民,但我的努力恐怕不会成功。各种各样的、不同方式的试图,无论是来自共产党的,或是来自政府的,想把这帮子游荡部落改造成标准公民的梦想,全都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化为泡影。一种纯粹的种族灭绝,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屠杀,对一种文化的扼杀。但是,我现在走得太快了,太一般化了,我还没开始讲述塞尔乔还有格劳科的表兄弟桑蒂诺的故事呢,他十五岁时就魔鬼般地发狂斗争,要从年长的伙伴们那里夺得红得耀眼的杜卡迪上的一个后座位子。

---

① 乔万尼·阿涅利(1866—1945),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创始人。

25

格劳科，矮墩墩的，纸张涂面工，照塞尔乔的说法，“那一头蓬乱的头发，一只虱子绕不完一圈就得老死”；他撅起嘴唇来的赌气样，还有突然悄无声息地把自己关起来的行为，俨然还是个孩子；伙伴们都很喜欢他，他那腰圆背厚的小身躯总是动个不停，象征着他们的无忧无虑、勃勃生机、闹腾和欢乐。兴许，在这个小老弟身上，他们隐约品味到了正挥手与之告别的童年；他们中，桑蒂诺的感触尤为深切，他并不满足于受雇于阿尼埃纳河边靠玛莫罗桥上游一侧的漂白水厂，刚刚跟会计的女儿法乌丝妲订了婚。他已经投入到复杂的计算中，以月份号、日子数、月亮的圆缺为基础，以便在一个依然遥远的未来中确定结婚日期。

结婚，证明材料，市政登记，布置新居：从一个年轻的波尔加特嘴里蹦出来的奇怪话语，其中还有一连串名字，好似原始人种的称呼，用来指部落的大多数成员。他们的衣兜里没有任何身份证件。彼此截然有别的想法，成为某个人物的渴望，属于罗马市民的后代，而不属于丛林的儿子。

桑蒂诺以一丝微笑伴随着他的星相学运算，这一丝笑容可以被看做对他婚姻计划的嘲笑，也可看成一种男子汉风度的炫耀。当他带着某种厌恶的鬼脸，用那把总装在衣兜里的油腻腻的梳子梳着涂了发膏的油亮头发时，别人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怀恋他乱蓬蓬的肮脏发绺，还是在嘟哝着牢骚，看不到在理发店经过长时间修整后才获得的一种容光焕发的效果。

至于这帮人里的其他几位，我还能说什么呢？阿格诺罗，两个阿尔杜乔，四个阿梅里奥，七个弗兰科……他们穿着同样的上装，沿循同样的轨迹追逐猎物，全体一致地外出行动，过着小宗派的群居生活。我发

现他们偏爱水和水上游戏，当时竟然大吃一惊。一旦天气放晴，太阳从云层中探出脑袋，他们便一窝蜂地冲向阿尼埃纳河，脱去衣服，只穿着短裤，跃入沸腾的白浪中。并非所有人都会游泳。当最有运动才华的那些人来到河流中央，彼此较着劲，游起蛙泳或者某种最基本的自由泳时，其他人就寻找一个平静的小浅湾，去那里洗澡。这条河从亚平宁山流下来时，源头就带有泥浆，流经工厂时又遭污染，到了这里就黄得很浑很浊：然而，他们依然乐此不疲地在水里打打闹闹，泡个痛快，仿佛这里才是他们最自然的地盘。桑蒂诺，玛莫罗桥地方最棒的弄潮儿，拒绝跟他未婚妻一起游上一圈，不屑于到衣服扔成一堆的芦苇丛中跟我们会合，而是独自一人下了水。跟我挑战比赛游泳的欲望只持续了一小会儿。看到他钻入水中，又浮出来，插一根蜡烛，又蹿出水面，翻上千百个筋斗，我就明白，他为沉醉于在波浪中穿行，会不惜把全世界忘个干干净净。只是当他仰天漂浮在水上，毫无阻力，随波逐流的时候，水元素的神秘引力似乎才最完整地占有了他。他闭上眼睛，他在水里发愣。法乌丝妲只能在桥上焦急地呼叫他。他充耳不听，或许，在柠檬色的水里，有一个更强有力的女水妖用歌声吸引了他。

遇上黄道吉日，这帮人也会放纵自己去一趟齐里奥拉浴场。齐里奥拉浴场停泊在罗马市中心，在圣天使桥下漂荡着，有一条跨越了台伯河污脏水面的分叉跳板可以通达。那是一条旧驳船，铺有甲板，里面有酒吧、更衣室、淋浴室。一个旧木板扎成的木筏，搭在驳船边上，用做日光浴场和跳水台。由于门票要收五十里拉，另外，老板也不好通融，他撑在一条木头假腿上，守定了售票处，所以我们每一次只能进去三四个人。其他人只得留在杂草丛生的河岸上，有的在城墙底下玩足球，有的趴在桥的女儿墙上，观看赛艇比赛进程，或者瞧着太阳像一个巨大无比的摊鸡蛋那样，从圣彼得大教堂圆顶的后面慢慢下落。不会游泳的格劳科，在过道底下河岸边的泥水中扑腾，桑蒂诺，作为真正的游泳健将，让人从酒吧中抬来一张桌子，站在桌子上，以一种天使般的完美一跃，让我们屏息静气的一个飞旋，跳入河中央这一段已很湍急的水流。

下面，驳船的底舱中，他们在淋浴莲蓬头底下表现得无拘无束，高

傲地展现他们年轻的男子气,而且准备互相比试。但对他们来说,屁股还是一个神圣的领域,一个禁区。他们从来不谈论它,他们尽量遮掩它,避开他人的目光。他们会从坏的方面去理解有关这一话题的任何玩笑。浴场提供给顾客一条毛巾,大小如同一块手帕,而且破破烂烂。小得无法当做缠腰布,他们只是在从淋浴间返回更衣室的时候,用它来挡一挡羞处。

一条杂种小狐狗,毛色棕里夹白,浑身疥疮,耳朵耷拉,肚子上沾着泥巴,在跳板入口处等着桑蒂诺。一见到他,便摇起尾巴,跟着他走过木筏,但桑蒂诺一开始肯定会装出要赶走它的样子。"啊,不,别干蠢事,你这脏狗!"他粗着嗓子嚷嚷道。那狗却幸福得发狂,在他脚下连连打滚。"好了!看来,你是想跟我们一起跳水啦!当心点!"他一直跑到木筏边上,身后跟着那条活蹦乱跳的狗,但它一跑到木板的尽头,便猛然刹住爪子,疑心重重地探出嘴来,嗅着脏兮兮的水面,看着白色的浪沫一下又一下地打在木筏旁的橡胶轮胎上。

"你真想喝一杯吗?"桑蒂诺问道,一只手抚摩着小狗的背,另一只手试图抓住那条代替了项圈的烂糟糟的细绳,把它拉过来,那狗伸出前爪,身子发僵,它充满哀求的湿漉漉的眼睛死死盯着小伙子的眼睛。"怎么,你的腿软了?还是让我给你来一下吧,下水!你这肮脏的小杂种!"小畜生顽抗着,向后一跳,但它并没有趁此自由溜之大吉,而是摇摇晃晃地返回来,屈从于畏惧与爱的微妙游戏。"你这肮脏的小杂种,发臭的小香肠!"桑蒂诺不无疼爱地重复道,他又开始吓唬小狗,把它朝水边推。杜卡迪125坐垫底下隆隆作响的凸轮轴,根本就不能跟他从那个外号叫苏丹的人身上赢得友谊而产生的骄傲和满意相比。最后,他挺起身子,给短裤上过于松的松紧带又紧了一圈,只听得打雷一般的一个鲤鱼打挺,他便头冲下地扎进了台伯河中,把我们惊得半天合不拢嘴来。那条狗,因见证了它主人的荣耀而高兴万分,冲到木筏上又是跳,又是叫,又是打滚,竟吸引得那个目空一切的独腿老板也擅离了岗哨。

有一天,塞尔乔、桑蒂诺、格劳科和我在圣保罗教堂附近闲逛。风儿把贴在墙上的海报吹得脱了边,吊在那里悬空乱晃,海报上是斯福尔扎

部长[①]褪了色的肖像,在他举行葬礼的时刻,满城的墙上贴的都是他的照片。已故的旧世界正透过一个单片眼镜瞧着我们,仿佛那位风度优雅的外交家死去有一个世纪了。我们的注意力被一个乞丐口中念念有词的单调曲调所吸引。他衰老,失明,坐在大教堂门口,帽子放在身边的人行道上,他那白色的拐杖横放在大腿上。他那不停的诉怨已然见效,从一些女信徒那里讨来了不少十里拉和二十里拉的硬币,甚至还有几张钞票。听到我们走近,他的呻吟声便越发响亮起来。桑蒂诺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格劳科。格劳科一脸无奈的样子,耸了耸肩膀。桑蒂诺借口要倒一下鞋子里的沙子,让我们先在头里走,然后,他突然猛地一下,便一把抢走了那顶帽子,带着他的猎物一直跑到街道的拐角。老人叫骂起来,挥舞着拐杖。由于没人过来帮他,而使徒保罗本人对他的呼叫也充耳不闻,他便痛骂起"圣卢米诺"来,这是罗马人想象出来的替罪羊圣徒之一,他们可以痛痛快快地诅咒这些圣徒,而不必担心会因此渎圣。

小伙子们甚至都没理睬他的叫嚷。"差不多有五百里拉呢!"桑蒂诺惊呼道。他伸长了胳膊,毫不羞耻地拿走了他的那一份。格劳科也如法炮制。他们硬是把一张钞票塞到我的兜里。我们走上了台伯河的滨河道,我依然还沉浸在刚才那一幕带给我的震惊中,我暗暗问自己,在他们的法典中,究竟哪一条使他们对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乞丐表现得如此残忍,其实,他也跟他们一样,是罗马这一丛林中的牺牲品,而相反,一条患了疥疮的癞皮狗却能引起这帮人的同情心,赢得桑蒂诺特殊的温情。

下午,桑蒂诺又让我吃惊了一回,他出现在我们眼前时,穿了从复兴商店[②]买来的鲜艳夺目的崭新上衣,玛莫罗桥的人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一类新款服装呢,腰身上打了褶,肩膀上填了垫料,真正的一款时装,完全可以穿在威尼托街某家服装店橱窗中的模特儿身上。在齐里奥拉浴场,他并不满足于集体更衣室,而是要求有一个能上锁的壁柜,好把他的新衣服挂在一个衣架上。他还给我看了他跟新衣服一起买的领带,但

① 斯福尔扎是意大利的一个大家族。这里指卡尔罗·斯福尔扎伯爵(1873—1952),他曾任意大利外交部长。

② 复兴商店是意大利最大的连锁百货公司。

只是给我一个人看，生怕引来别人的嘲笑，他把领带叠起来，用一张绢纸包好，藏在衣兜深处。一条饰有磷光片的领带，色泽如此炫目，即便没有后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次事件，我还是能在记忆中回想起它来。

他用剩下的钱租了一条小船。在河中央，水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湍急——我们仅仅来得及看到水中漂浮着油腻的废纸和塑料瓶——飞速地把我们捎走。必须用力撑住桨，才能不像一根麦秸那样被激流卷走，被下一座桥的墩头撞得粉身碎骨。“看准了！都给我看得准一点！”格劳科说。他趴在船头上，为我们指点一团黑糊糊的东西，它就在维多里奥-伊曼纽尔桥中央桥拱底下的水面上打转转。“他妈的，原来是一只燕子！”塞尔乔叫将起来。燕子，大约有几十只，焦虑不安地从河的一岸到另一岸盘旋不已，从桥拱底下穿过来，又穿过去，灰色的肚皮紧贴着水面。再过一会儿，这一只就要完蛋了。它越来越艰难地从水里抽出它的翅膀，却又跌落下来，拼死做着最后的挣扎。

“你这是怎么啦？快停下！你没发呆吧？”格劳科冲桑蒂诺喊道，后者已经站在船尾上，双臂前举，准备跳水。他一跃窜入水中。水流把他卷得远离小船，而我们出于谨慎，早已把船儿往水边靠了。河水撞到桥墩的分水角上，白浪沸腾，轰然发出一种威胁声。燕子已经被一个旋涡缠住，无力地旋转着。桑蒂诺拼命划水，终于来到它跟前。尽管他是游泳冠军，我还是为他捏着一把汗。他的脑袋消失在一片泥水之浪底下，然后又憋着气钻出来。“别犯傻！算了吧！”他全然不顾我们的劝喊，成功地捉到了那只小动物，把它托出了水面。那鸟儿不停地挣扎，增加了他的拯救难度。“它居然还要啄我！”他只用一条胳膊划动，别别扭扭地游向了河边。“小婊子！”格劳科笑着回答他道。“你的未婚妻对你还不够吗？”而塞尔乔则说得更带劲：“不要舔圣安东尼的屁股！”

格劳科朝他伸出一只手，想帮他爬上船来，但桑蒂诺更愿意独自返回河岸，在那里等我们，他坐在肮脏的草地上，两手捧定了燕子，轻轻地抚摩着。

“你为什么要把它捞起来？”格劳科问他，“你完全可以随它去嘛！”

“你没见它都湿透了吗？”桑蒂诺只满足于这样一句话。

“我兴许还该把衬衣脱给你，为这位小姐把屁股擦干净？”塞尔乔突

然咄咄逼人地冒了一句。他捡起一颗生锈的螺丝钉,握在拳头中。

桑蒂诺放开了燕子。“脱靶!”格劳科嘲笑了塞尔乔一通,后者刚刚瞄准鸟儿,飞速地扔出了螺丝钉。这两个小伙子,一个扑到另一个身上,在地上乱滚。我坐到了桑蒂诺身边。死里逃生的燕子飞去与同伴们会合了。我们一言不发地待了好长一段时间,目随着它们在空中尽情嬉戏。

秋天,它们从卡萨尔萨飞往非洲。我最喜爱的季节,当葡萄压榨发酵后,扑鼻的醇香飘浮在农舍附近①,当不再毒辣的阳光映照得运河的水带放射淡紫的光晕②……这一回忆只是在一瞬间掠过我的脑际。我立即把它挥走,如同那一年代的所有其他记忆。怀恋之情配不上你,皮埃尔·保罗!我一下子站立起来,跑去投入打架,它早已变成了一场群殴。

如果说,今天我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在玛莫罗桥的那几年,我远离了妈妈。让我回想起弗留利的一切,都令我痛苦不已。国道另一侧的那个小车站,绿色护窗板的房子,阳台上的天竺葵,教堂前的上坡小街,我家窗户下的玉米田,院子里吱呀作响的水泵,我再也不愿去想它们。我被逐出了伊甸园:我将带着无望的懊悔把自己燃烧完?妈妈,则相反,她指望着我的情感。流亡之前的世界,她努力地想为我重建。她什么都没有说,跑到斯坦达商店,去买了一套盘子,很像我们以前用过的那套,还买了同一种颜色的桌布,同一商标的食油和面条。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奇迹,摩德纳的熟火腿,还有在亚平宁山以南很难买到的玉米粥,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饭桌上?

“你怎么不再喝奶了?”一天早上,当她看到我把她刚倒满奶的杯子推开后,她就问我。

“这里的奶不好喝。”

她叹了一口气。

“是的,真没什么沫。但是兴许……”

她话没说完就站了起来,用头巾把她刚来罗马三个月就变得灰白

---

① 这句中,作者用了三个以“f”开头的词,三个带“ou”的词。译文试用三个“p”音和三个“f”音。

② 这句中,作者用了三个以“m”开头的词,三个带“u”的词。译文试用三个“d”音和三个“y”音。

的头发系住，一把抓起塔里亚门托河的柳条篮，而不是平常用的布提包，直奔城里而去。她去了很久才回来。回来后，她就把自己关在厨房中，不知道在忙着什么神秘事，一直忙到很晚。我听到有锤子轻轻的敲打声。

“快来吃吧，早餐都已经好了！”第二天早上，她带着一种罕见的兴奋劲喊道，兴奋中带着一丝狡黠。

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陶瓷大碗，跟我生命中前二十八年在卡萨尔萨喝奶用的大碗一模一样；还有那么一只过了时的杯子，喇叭口太大，太宽，白底，细碎的红花，那是她从她兄弟基诺告诉她的旧货店里好不容易淘来的。本该让我热泪盈眶的细节，却让我万分激动地僵在了那里：妈妈还在器皿边沿上锯了一系列小小的槽口，使它在各方面更像是我小时候用的那只历尽千难万险而伤痕累累的碗。

“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她把白花花的液体从锅里倒到碗里后，问我道。

我的沉默让她有些慌神，她转身到洗碗槽的角落去拿海绵。有几滴液体滴落到了桌布上。一股小小的白色细流朝桌边流去。我很违心地喝了一大口。

“啊！”我说，“快到时间了！”

每天早上去学校前，我都要把她拉到我的膝盖上，亲吻她的额头。我向她伸出胳膊，开始我的习惯运动，但是没有把这动作完成。我的胳膊肘落在了桌子上。她假装什么都没有注意到。海绵被淋洗干净，拧干，甩干，放回原处。我跳起来，焦虑地瞧了一眼手表。

“妈妈，我要迟到了！”我嚷嚷起来。

“别忘了你的眼镜，”她喃喃道，眼睛死盯着没喝几口的那碗奶。

“噢！对了，我的这副新眼镜。我希望你会喜欢它的框。”

我从我的衣兜里掏出一副新墨镜，把它戴在鼻梁上。

“耶稣！是墨镜啊！什么时候买的？”

“这是大夫建议我戴的。为保护我的视力。”

“为保护你的视力？”

她摇了摇脑袋，惊恐不已。

“快把它摘了，我的儿。在家里戴墨镜，就像屋子里撑雨伞。白费什么工夫。”

人们从此就看到，这副墨镜将与我形影不离，成为宣扬我名声的徽章和军旗，在整个意大利几乎家喻户晓。一种彻底误会的代价。没有人明白我是选择了以一种新的光线来瞧世界。我已经在弗留利死去：我必须在另一片天空底下复活。它激起了公众的不信任，证实了我的敌人们的怀疑，在我的诉讼中成了原告的物证。摆架子，赶时髦，文过饰非，软弱心虚，隐姓埋名的可疑趣味：这些卑劣情感的帽子，人们是一顶接一顶地往我的头上扣……一个被人蹂躏了幸福、因忠于失去的天堂而毁了自己眼睛的人，难道没有权利改变一下他眼镜片的颜色吗？

26

沿着台伯河的溜达中，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遇到一帮职业贝带[①]，就在西斯托桥和加里波第桥之间，特拉斯特维尔区圣玛利亚教堂方形钟楼的对面，这钟楼在河对岸投下了它那位于红色房屋顶上的矮壮身影。这些人在战争期间开始其营生，以回答美国大兵的需求，从那时候起，他们就持续不断地成排坐在桥栏杆上，晃荡着两腿，假装观望这一段滨河道上络绎不绝的车流。

西斯托桥的拐角，红色环行线的车站总能给顾客们一个借口，也能给最胆小的人以勇气。他们站在车牌柱周围，装作等有轨电车，有很从容的时间来决出决定。经过长时间的偷偷交换眼色，并报以一丝赞同的短暂微笑之后，一个家伙便从桥栏杆上跳下，懒懒散散地走下通往河岸的台阶，身后隔着一段距离，跟着那个嫖客。桥拱底下，十分钟时间就够

① “贝带”，原文是“pédés”，指男子同性恋者，尤其是出卖男色的人、男妓。

了。假如事情做得更快，草草了事的话，人们就会在加里波第桥角上公共小便池的隔屏底下，看到四条腿在那里乱动一气。如同伟大的桑德罗·佩纳所写的那样。

从灵到肉我把自己抛弃
给微微闪光的白色瓷器

他住在离此有三座桥远，就在菲奥伦蒂尼的圣乔瓦尼教堂后面，但是，一个出卖色相的瓷器[①]，对一个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学大门、公共汽车站台或者电影院黑黝黝的放映厅的人来说，不会有丝毫吸引力。一切魅力不是来自于始料不及吗？宁肯爬上六层楼一无所获，也不愿满足于一种毫无惊喜的快乐。

"快看一下那个付裸翘[②]！"塞尔乔叫嚷道。人行道的角落里站着一个穿了黄色雨衣的家伙，手捏着毡帽的边檐，斜眼瞧着那一双双沿着墙壁摇晃的高帮皮鞋。

"他甚至都没有摘下他的结婚戒指！"格劳科补充道。

要成为一个他们所谓的付裸翘，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相信做那事是一种罪孽；2.掩藏自己；3.付钱。他们对所有事情全都出奇地感兴趣，仿佛是在跟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打交道。我仔细地记下这些细微差别，为了那部我已经动笔开始写的小说。报纸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已让我赢得了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费德里科·费里尼的赞扬。看来，在罗马还从来没有任何人想到过，要在内城墙的大门外漫步。我会给出猛烈的一击，揭露波尔加特人的世界。

"可是，"我问塞尔乔，"那些在桥栏杆上等候的人，你是怎么称呼他们的呢？"

他耸了耸肩膀。

"没有名称，"他说。

我一味坚持地问下去。

---

① 这里的"瓷器"喻同性恋男妓。

② 付裸翘，原文为"frocio"，在当地的俚语中指"嫖男妓的同性恋嫖客"。

“那么，就不是叫贝带了？”

“万达跟一个付裸翘？”格劳科很气愤地嚷嚷起来。

“他离开我们，去跟一个叫这外号的小白脸打招呼，还跟他亲热地握手。”

“你没病吧？”塞尔乔很夸张地说。

然而，玛莫罗桥的那些小子[1]中，没有一个会想象自己将跟他们的朋友万达一样挣钱，假如某天晚上，他干完活儿走在回家路上时不巧撞上他们，兴许就会被他们抢个精光，这个人民的儿子，总要在属于人民的街区特拉斯特维尔区昏暗的街道上走，返回自己的房间：他们抢劫他，就如他们曾抢走乞丐贝雷帽里的钱一样，其理由也完全一样。沿街乞讨或者出卖皮肉：其错误全在于将自己局限于唯一的一项活动中，并由此期待一份报酬。他们以那种尚未城市化的游牧民的本能，这样猜想，假如一个人进入了某个社会阶层，即便是最卑贱、最被人瞧不起的行当，例如行乞或拉客，那他就不要抱怨某些后果了：十四岁之前接受义务教育，定期做肺部透视，服兵役，缴税。警察的巡逻本身应被接受。

警察如一阵龙卷风似的突然出现在加里波第桥的一角。警车上跳下来六七条大汉，把万达和他那些被高跟鞋束缚住的同事们一下子卷走，只留下那些付裸翘待在比桥面更低的原地，帽子遮着脸，身体紧紧靠着环行线电车站的车牌，手里紧捏着车票，准备当做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那么，那些人呢？”我问道，我们当时站在火车站前，一边等着坐公共汽车返回玛莫罗桥，一边瞧着在五百人广场的绿栎树下熙来攘往的人群和匆匆结束的把戏。一个男孩假装在一棵树底下抽烟，见一个过客走近，便急忙走开，把他引入考古博物馆高墙前一丛黑糊糊的灌木中。“没法不那样做，”塞尔乔简洁地回答我说。他是想说，铁路上的卖淫指望的对象是转车的旅客、旅行推销商、休假的士兵、走在北迁路上的移民，以及所有那些作为外乡人路过城里，不得不靠付费获得种种服务的人，他们不像加里波第桥上的顾客那样有什么羞耻，有什么恐惧，他们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在两趟火车之间无所事事，便到大街上来寻欢作乐。

在波尔加特中间，我从来不缺好运气，这些人并不缺少时间，又不受圣保罗教义的束缚。我的朋友们总是诚心诚意、分文不取地准备着让我幸福。我们下到阿尼埃纳河的河岸，进入花果园的小树林中。皮耶特拉拉塔公路的一面斜坡，一段残破的引水渠，一块立在乡野中的石头，一棵柏树多结的树干，都能接纳我们到它们的阴影中。我们躲在它们的庇护中，不用担心被人发现。他们生活在一种灿烂的天真淳朴中。爱情对于他们只是肌肤相亲的快感膨胀，是罗马城里征战的自然补充，是避免每天夜里遭遇威胁的一道护身符，我们邂逅相识时的简陋条件，匆匆行事的必要性，他们对久久静止不动的厌恶，兴许还有我自身的需要，需要把他们的自由与他们的天真加以理想化，所有这一切，使我很少能实实在在地考验他们，想一想假如他们拒绝了我，让我失望之后，他们又该如何。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他们有时会问我。那是在他们冲着去发动夜袭的时刻。我坐在阿尼埃纳河的桥上，观看猎队的出发。"我们要去袭击拉泰拉诺的圣乔瓦尼教堂的壳牌加油站！"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不，尽管我特别想亲自掌握一手有关他们行为的文字资料，我仍然满足于第二天听他们讲述。在瓦尔瓦索纳的诉讼案之后，妈妈还能不能受得住再来一次警方调查？我可能会因同谋罪被追查，被推上法庭。冒险并不让我害怕：但是妈妈怎么办呢？"到时候你讲给我听吧，"我对塞尔乔说，他的心里只惦记着长长的民族路上那家邓禄普商店又进了一批新款网球鞋，而那条街上的值夜警察，只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当摩托车一溜烟地行驶上灰尘蓬蓬的公路上时，我便返回我的房间，为我的那本书添写上几页。

那将是一本生硬、艰涩的书，具有一种活泼而又粗野的直率，我在其中毫不讨好地描绘了我的年轻朋友们，但我本人并没有出场。这是我强加给自己的绝对法则，在我此后的每一篇文字中，在我的每一部电影中，都是如此。始终是因为妈妈。不要吓坏她，不要惊动这颗淳朴的心灵，她每天早上都来到她儿子的床边，在他脸上留下一个亲吻，就仿佛他依然睡在摇篮中。杰那里埃罗，我现在献给你的这篇文字，是我第一

本谈我自己的书。这样,我可以返回并重温那些波尔加特的生活的某些侧面,而对这些东西,我在我的小说中一直保持了沉默,避而不谈。

做爱之后,我们会去蒂布尔提诺那两家饭馆[1]中的一家,吃上一份比萨。总是我来付账,并不为求良心上的平衡,毕竟我问心无愧,而是因为我每月有两万七千里拉工资,而且我还为一些文学刊物写稿,有了第一批稿酬,我是唯一享有收入的人。为了让他们在记忆中能有固定的快乐一刻,我总是给他们手头施舍那么一点点,让他们能给自己买一个冰淇淋蛋卷或者一小包香烟。

事实上,他们中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人,没有得到比萨饼之外的小赏赐就离开了呢?这一怀疑突然让我伤透了心:当我忘记了那样做或者钱包瘪瘪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会提出要求?我不愿意去想,从我衣兜里掏出来作为一份友好礼物的东西,落在他们的兜中会像一份赋贡那样。

有一次,我很惊讶地听到格劳科对我说:

"我需要五百里拉!"

"一张五百的啊,格劳科?"

他已经扣上了他的皮带。

"一张五百的,皮埃尔·保罗。"

"可是……"

我很费劲地从他嘴里掏出了他的秘密。他想去逛一下有姑娘们的那地方,生平第一次。他渴望得要命。"啊!原来只是这个啊……"一种欲望,让我觉得比他当初在小小的竹林里对我表现出的狂热还更值得我同情。阿尔杜乔,我们称之为"基娜的兄弟"(为的是跟另一个阿尔杜乔区别开),把他带到了卡佩拉里街上布伦塔夫人开的店里,就在法尔内塞宫附近。走上一段只有一盏粘满了苍蝇屎的暗糊糊的灯泡照明的窄楼梯后,他们来到了一个过道,老板娘正在一个柜台后打瞌睡。他们以为能偷偷溜进等候厅,但是,老鸨猛一下惊醒过来,用她里帕的圣弗朗切斯科那一带的泼辣俚语,要查看他们的证件。格劳科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张有轨电车的月票卡。她顿时怒火冲天,面红耳赤,一把把它抢在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手里。

“拿出身份证来,你竟然瞒着老天爷偷梁换柱?”

格劳科不寒而栗。

“流鼻涕的小子!”她嚷嚷道,“还不会翘翘呢,就想来老娘我这里蒙事!”

接下来,便是一股痛骂的激流,然后又是义正词严的谴责,不过,她已经不再用特拉斯特维尔一带下等妓女的俚语,而突然改了词汇和语调。为了训斥格劳科,提醒他遵守法律,她使用了最精练的意大利语,以求在年龄问题上羞辱一通那个违章者之后,还让后者更深地陷入因语言学的欠缺而感到的羞愧中。受到双重贬值后,可怜的少年一声不吭地瑟瑟后退。阿尔杜乔不得不在楼梯上把他拉住,把忘在柜台上的月票卡还给他。

格劳科在为我提供关于自己不幸遭遇的有趣故事时,也把那五百里拉还给了我,只是其中已经少了五十里拉,他的表情颇有些哭笑不得。他再怎么鼓起脸颊,再怎么模仿鸨母滴溜溜乱转的眼神也都没有用,我看得很清楚,这一番耻辱还没让他消气。“还在赌气呢?”我问他,因他长久的沉默而生气(我这是错了,太轻易了,就如随后所显示的那样)。在我的要求下,阿尔杜乔把故事给我讲了十遍,每次都为它增添新的细节,还有妓院老板娘给他的同伴劈头盖脸上的那堂道德课。我觉得真是匪夷所思,一个如此刚强的悍妇竟选择了用学校里学的托斯卡纳方言来训斥毛头小子。经典的伦理道德,自然有约定俗成的话语来配合!同样不乏教育意义的是——供你参考了,年轻的格劳科——你要亲近女人,你就得拥有一个身份证件,这两者是不容置疑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玛莫罗桥,色情自由只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法则:没有任何固定的“朋友”,没有任何“私通”,假如可能的话,永远也不跟同一个人做爱两次。第二个法则:决不关闭在一个房间里,要留在室外,在露天。我应该说,这两个条件于我十分适合。自从我失去斯温后,我就再也不愿与任何人心心相通了。每天换伴侣的必要性,为我提供了反黏糊圈套的一种最好保证。至于说到拒绝封闭的房间,拒绝床,拒绝爱情的日常背景,

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有效保障，用来反对西方和基督教文明中最可恶的因素：在两个情人周围画定一个圈子的市民阶层的封闭，对促成快感之美的零散而又大量的欲念的奴仆般拥有。那些波尔加特小伙子，对裸体有着一种希腊的和悲怆的感觉，让肉体重新进入它的自然元素之中，乡野中的一轮夕阳，穿过爱情木的一阵喃喃风声，秋天里落在一棵树底下的一堆黄叶。或者，为什么不呢？花园尽头的一片沃土，遗落在工地上的一片垃圾。我总是宁愿触摸一层油腻的脏纸，而不是干净的床单，宁愿栖身一个喧闹的公共场所，而不是一个神秘的密室。

不留姓名，不露面貌地逃跑，甚至都不知道跟谁睡了觉：对古人而言的崇高自由。在他们的神话中，厄洛斯[1]以一个孩子的形象出现，胡乱地射箭。蒙住了他眼睛的布条妨碍了他看到箭都射中了谁。这个形象将帮你弄明白，50年代罗马郊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即兴邂逅，有上文没下文的临时接触。相处一起的甜美与快乐，分手的匆匆与幸福！

人们大概是想说服我，尽管我的外表像是从一曲田园交响诗中逃出来的野兽，我依然打上了我所接受的天主教教育的烙印，人们看到的这一切就已经够了，再也不用找更好的论据了，这种在当时被形容为“不正常”的不稳定，这种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跳跃，这种既无停顿也无完结的追踪。既不愿意，也不能够对自己说，哪怕只说一次：我找到了！一些被认为思想深刻的人认定，我们人类所偏爱的这种永恒的捕猎，更多的是一种犯罪感的消极反应，而不是一种积极趣味。他们认为，通过如此禁止我们自己依赖于一种持久的情感，我们就惩罚了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无法很快就能说清楚，无论在一个意义上，还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兴许，在后来，当我渐渐变老时，我童年时代的宗教在不知不觉之中又抓住了我？我们走着瞧吧。在玛莫罗桥生活的那个时代，我敢肯定，我并没有压抑自己任何一丝追求另一种生活的渴望。自由自在，生龙活虎，随心所欲，为什么我要克制自己，受哪怕一丝一毫的束缚呢？

---

① 厄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至于我们的那种习惯,要留在露天而不是关在四壁墙内,假如绝对必须“解释”它一下(哦,这种总要把一种完全自发的喜好跟某些“原因”联系到一起的怪癖!),那么,你得知道,我们中没有任何人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甚至连我都没有,自打我父亲前来跟我们团聚之后。为了避免妈妈跟他同住一个房间,我已经把自己的床搬到了餐厅中。

我父亲来到罗马,跟他七年前从非洲返回时的情景完全不同。我们看到,车站月台上出现了一个身穿军装的军官,又老又瘦,拱背弯腰,但又很自豪第一次在大都市拥有了一套住房,尤其是能在他的名片上印上罗马市的一个地址。可以说,是将军大人把他召唤到了首都,而不是为小姨子们减轻越来越重的负担的那种必要性。感到自己靠近了操纵杆,使这个一生追求权力而始终没能在肩章上添上第四条绶纹的男人增添了某种力量。但是,在参观过意大利广场、帝国大道和墨索里尼时代的其他建筑之后,他累得筋疲力尽,坐着颠簸不已的公共汽车返回。他把他的军装放回壁柜里,从此,他便睡衣不再离身,一身睡衣成为了一种反抗符号,反对一个对帝国老兵忘恩负义的祖国。

桑蒂诺确定的婚礼日期之前两星期,春末的一个下午,当阿尼埃纳河带着亚平宁山上最后的积雪融化后汹涌而下的泥水,滚滚流淌在桥下时,我们五六个人坐在桥栏杆上,正为游泳比赛做裁判,我们那一帮中有几个更年轻的,正要从上游出发呢。他们用一些木板和荆棘建造了一个跳台,打赌看谁最快横渡河流。这可不是简单的游泳,它要冒相当的风险,因为这一段水流简直就是飞腾直下。必须千方百计地避免被激流带到桥下,水一拍到桥墩上,就碎为细沫,形成一个个危险的旋涡。格劳科小心谨慎地从一个十分安全的湾头下了水,但湿了湿身子后,又返回了滩岸上。他躺在跳台的一个角落里,尽量避开众人的目光。

从皮耶特拉拉塔开来的五点钟的那趟公共汽车,在一阵旧铁皮的颤抖声中到了站。阿尔杜乔和他妹妹挥舞胳膊,从车窗中向我们招呼。五分钟之后,他们就在桑蒂诺的陪同下跟我们会合了。跟一个会计的女儿(这姑娘从不参与我们小团体的活动)的婚期的临近,在漂白水工厂图谋一种前途的希望,早已大大改变了桑蒂诺的外表。他穿着从复兴商店买的那件著名的格子上装,还戴了一条领带,这在我们那一带真可谓

罕见的奇迹。我认出了早先一直用绢纸包着塞在他衣兜里的那玩意刺目的颜色和磷光的闪亮片。

阿尔杜乔的妹妹，一个脸颊消瘦、营养不良的褐发姑娘，穿着一条从乌庇姆[1]买的值三千里拉的紫色裙子，赶紧跑到桥栏杆前，观看那些年轻选手的战绩。

"哎，你这卷毛，"她冲着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的格劳科嚷嚷道，"你怎么泄气啦？"

遭到羞辱的小伙子站了起来，把嘴里正咬着的一朵雏菊扔到河里。他不慌不忙地，就像一个不听任何人劝的人那样，走到了木板旁，两腿晃动在水面之上。

"你胆怯了，"姑娘继续道，"你的这头乱发，它会让你沉到水底去的！"

桥上有两三个人笑了起来。他们想起了塞尔乔关于虱子的笑话。阿格诺罗冲我们喊着，让我们闭嘴。为了给小马留乔的游进过程计时间，他正扳着手指头一秒一秒地数着呢。我们乖乖听从了，只有基娜，见我们中除了她根本就瞧不起的那个呆头呆脑的罗莫罗，再也没有一个人呼应她，便变本加厉地闹起来。那自以为是的傻女人也开始发觉，她完全是在白费口舌。这还不算把半瓶香水倒在了油腻腻的头发上。

"为了我你就来一下吧！"她突然撒娇作媚起来。

她给格劳科送去了飞吻，咯咯笑着扭动起身子来。

"你将得到亲吻，我的咪咪。基娜答应你啦！"

格劳科胳膊肘撑住跳台，身子慢慢滑入了水中。他的脚指头浸了一下水，赶紧就往回缩，像是冷得吃了一惊。

"咪咪！我的咪咪！"姑娘在继续搔首弄姿，"我的咪咪！咪咪！"

至此为止一直默默无声的桑蒂诺，这时候决定出面干涉了。

"快闭上你的嘴！他可不会游水，这个，一个近视眼不戴眼镜都看得出来呢！"

---

[1] 乌庇姆公司是意大利最大的非食品零售集团，成立于1928年。

姑娘受到如此斥责后，赶紧招呼她的哥哥，请他为一种如此的辱骂评评理。但是，阿尔杜乔非但没有听她的抱怨，还匆匆忙忙地跟阿格诺罗为计时问题争论起来，不知道究竟应该对在马留乔之后达到的那个竞争者扣多少秒。

“你们烦死我啦，那么多小屁孩，那么多软鸡鸡！”她使出吃奶的力气高喊道。她决意要用她的轻蔑把我们压垮，踮起脚尖转了一个圈，然后坐到桥栏杆上，双臂交叉，试图用她的表情迷惑在尘雾中经过桥上的不多的摩托车手。我们轻松地彼此对视，但是对格劳科来说，事情就不那么轻松了。

她，阿尔杜乔的妹妹，第一个公然嘲笑他在卡佩拉里街那一次失败的女人，竟然还怀疑他的运动才能，可怜的小伙子实在忍无可忍。实际上，基娜根本就不屑于知道他能不能成功地渡过河去。格劳科，在布伦塔夫人那里吃了闭门羹之后，神经依然保持着高度紧张，成为了一种荒诞蔑视的牺牲品。为了在基娜眼中恢复名誉，他选择了在她决定以不理睬来惩罚我们的那一时刻。随着一记嘶哑的、甚至都无法让那个辣妹子回首一顾的叫声，他两脚向前一伸，跃入了水中。

一开始，他尚还能像狗那样刨划几下，胳膊在身子底下乱扑腾。尽管不足以劈开波浪，毕竟还能把身体维持在水面上。但是，一旦水流把他推向第一串旋涡时，他就遇上了麻烦。他嘴唇闭得紧紧的，露在水面上，侧着脑袋以避免喝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扑腾到了河中央，从上游漂下来的白沫、锯末、废油，还有工业垃圾突然啄住了他，就像抓住一根麦秸那样。他开始斜漂开去，被带向桥墩，只见轰隆隆的惊涛不停地拍击着桥墩，并被它撞得粉身碎骨。

我跟桑蒂诺赶紧从河滩上滚下来，前去救援我们的同伴。但是罗莫罗，我们团伙中那个无谓地暗恋着基娜的新来者，一声不吭地出现在我身后，扑到我身上，一把抱住我的腰，给我来了一个嘴啃泥。我越是挣扎，就觉得他把我抱得越紧。我肚子贴地，伸长了脖子，好一个无能的动作，两眼恐惧地死盯着那个像陀螺似的在水面上打转的脑袋，我只能跟那些留在桥上的人一样，声嘶力竭地喊着，看着他们如热锅上的蚂蚁，朝桑蒂诺挥舞胳膊。

他一阵风似的冲上跳台。基娜终于明白到自己犯了傻,也放开喉咙从岸上呼唤格劳科。当她伤心地哭泣时,眼睫膏便从睫毛上脱落下来,但她现在什么也顾不上了。她根本就没想去擦眼泪,一旦她不再认为非得垄断众人的注意力,她就成了一个好姑娘,眼下,她正全力配合大伙儿一起救人。

桑蒂诺麻利地脱下了长裤,把它扔在木板上,就在他上衣旁边。但是领带今天系得太紧了,他无法同样快地把它摘下来。笨拙和紧张造成了一个致命的迟缓。他穿着短裤,为了节省时间甚至连袜子都还没脱,却在解领带上浪费了好几分钟时间。当他最终脱下了衬衣时,所有人都明白,为时已晚。格劳科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我们看到他舞动着胳膊,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一会儿被波浪吞没,一会儿又在远处露一下头,随后又沉没。他最后露了一次面,便沉入了桥底下水流卷出的漏斗中,连叫都没有叫一声,在那样一个地方,即便一个职业潜水员也无法把他捞出水面。他的头发像一块黑黑的烙饼,在水上漂浮了一小会儿。然后,阿尼埃纳河以其盲目的激流抹却了我们这位伙伴的一切痕迹。他们从中获得莫大乐趣的水,他们像爱一个摇篮那样喜爱的水,在他的身后像一座坟墓那样封闭了起来。

27

这一悲剧,再加上我父亲因我们让他住在“乡下佬”中间而没完没了地指责非难,让我终于痛下决心,寻找一处离罗马市中心不太远的公寓。由于我在罗贝托·隆基老师的杂志《比较》上发表的那些短篇小说,我跟米兰的一个大出版商签订了一份合同,它保证了我从此每月都会有一份津贴,比学校老师的那份薪水要强得多了。我们把住所搬到了新绿山,就在特拉斯特维尔后面,教皇国城墙附近:这个街区比较现代化,

空气很流通,是梵蒂冈雇员、政府部门官员、牙医新手、理工科教授,以及有钱有地位的移民的居住区。

由于纺织品短缺,五年来,流行的服式并没有太大变化,妈妈便把她从卡萨尔萨带来的依然还算优雅的裙子从箱子底翻出来。她恢复了换衣服出门的习惯,每次都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去多娜-奥林皮亚街,那是一条宽阔的大道,两旁都是高雅的住宅楼,还有各色各样的商店,远不是玛莫罗桥唯一那家斯坦达商店的单调光景。我们告别了悲惨与肮脏的日常景象。商人们见一个女人走在街上,一点儿都不大惊小怪,而是殷勤地跟她打招呼,费尽口舌要把她手中的布提包塞满货色。肉店老板免费送她五十克肺片,让她喂家里的猫,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养得起一张白吃饭的嘴,而不必担心邻居怀恨在心。

她给她丈夫买回了报纸,还折叠着就塞进了他房间的门缝底下:夫妇间最后的尊敬,上尉对此似乎也很满足。比利时的约瑟芬·夏洛特公主嫁给了卢森堡的约翰大公,婚礼当日,大雨骤降,让人对这一婚姻难卜凶吉。因为阿迦汗[①]不在场,贝姑姆[②]主持了戛纳的传统橙子节。泰隆·鲍华和林丹·克里斯蒂安[③]选择了罗马来度假。吉娜·劳洛勃丽吉达在《面包、爱情和幻想》[④]中大放光彩,但是,依专家看来,某个叫索菲娅·罗兰的,目前还以索菲娅·拉扎罗为艺名(这只是暂时现象,人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一点)的崭露头角的女演员[⑤],将成为明日之星。如果说,最重要的新闻消息大都来自贵族阶层或者电影城,那么,意大利还不算太糟糕。我父亲吃饭时在桌子那一头嘟嘟囔囔,在饮料的作用下整个晚上都骂骂咧咧的,但是,总的来说,他的表现还算有分寸,并没让我们过于难堪。

---

① 指阿迦汗三世(1877—1957),印度的穆斯林领袖,伊斯玛仪派的伊玛目。

② 贝姑姆(Begum)是印度人对公主或王妃的尊称,这里指阿迦汗的夫人。

③ 泰隆·鲍华(1914—1958),英国出生的美国电影演员。林丹·克里斯蒂安(Lindan Christian):不详,可能是泰隆·鲍华的同性男友。

④《面包、爱情和幻想》是意大利电影(1953),由路易吉·康曼西尼导演。吉娜·劳洛勃丽吉达(1927—),意大利电影女演员。

⑤ 索菲娅·罗兰(1934—),意大利女电影演员。

最后几次选举中基督教民主党的相对失败，使得这位军官对年轻共和国的第一号政党的恶感顿时打了对折。只有48.9%的选票，德·加斯贝利[1]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过不了简单多数，左派称他为“无耻之徒”，而前法西斯分子对他也满怀仇恨。萨瓦王国的玛丽娅·皮娅[2]，穿着苏格兰裙子和平底皮鞋，前往牛津完成她的学业；王室一家人占据了报刊的头版头条。安巴-阿拉吉的死里逃生者[3]，在他眼下居住的公寓的高高阳台上，能看到第一批菲亚特600汽车排列在人行道上。他本人满足于从这些汽车中证实自己国家的工业发展，但这种满足，远不如他坐在客厅里，面对着一个崭新奇迹时的快乐那么大：一台仿桃花心木外壳的电视机，这一图像奇迹从1954年1月起才进入意大利人的家庭；而我们家在当年4月份就把它领进了公寓，是我一时心血来潮，用我最初的津贴买的。迈克·本乔尔诺[4]也刻不容缓地推出了他的节目“还本或加倍”。你得是一个先知(或者依然做一个罗贝托·隆基老师在博洛尼亚的旧弟子)才会不痴迷于这一创举，要知道，它以五百万里拉的诱人钓饵，吸引了好几万个普通家庭对大众文化的注意。

这一年的两部最佳电影，当然，也确实算不上令人乐观。因为它们成就不大，所以去看的人也很少，但是，除了这一事实之外，无论是维托里奥·德·西卡，还是费德里科·费里尼(这一位还邀请我出席了他那部电影的首映式)，都在电影中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往日的意大利，一个我们认为已经大大改变了的意大利。人们会同情翁贝尔托·D[5]的命运，怜悯这个穷得实在付不起房租的退休公务员，他之所以没有钻到火车底下去自杀，只是为了不忍心丢下他的小

---

① 阿尔齐德·德·加斯贝利(1883—1954)，意大利政治家，1945年到1953年，八次连任意大利总理。

② 玛丽娅·皮娅(1934—)，意大利萨瓦王国的公主。

③ 这里的死里逃生者指主人公的父亲。参见上文。

④ 迈克·本乔尔诺(1924—)，出生在美国的意大利籍电视主持人。

⑤ 翁贝尔托·D是维托里奥·德·西卡导演的电影《翁贝尔托·D》(又译为《风烛泪》)中的主人公，一个贫困潦倒的退休小公务员。

狗，他那唯一的朋友。扮演忧伤的小女仆的玛丽娅·皮娅·卡西利奥[1]有一场戏，在破旧的炉台前准备早餐咖啡，让我们觉得美妙无比，尽管厨房中的水池锈迹斑斑，墙上满是裂缝，还爬着一串串蟑螂。但是，社会对曾为社会建设贡献力量的老人的抛弃、人们对弱者与残疾人的轻视、对青春的专一而又愚蠢的崇拜，都是从法西斯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毛病。新的意大利不应该一味地歌颂青春期[2]，不应该把因年岁已高无法工作的劳动者推向自杀之路。至于电影中揭露的卫生设备不足，战后在波代诺内郊区出现的极其现代化的扎努西公司[3]（我跟我一个做包装工的表妹去参观过），已经准备开始低价冰箱的流水线生产。尽管我带着批评的眼光，那都没有用，我毕竟目睹了家用电器的巨大胜利，我不得不承认，妈妈实在不必每天早上拖着她那两条老腿，爬下爬上四层楼去买牛奶，只为在早餐桌上，在那只带锯齿痕的著名大碗里，给我准备好新鲜奶。

更明显的是，被费里尼叫做“胖牛犊”的那些人[4]，从属于一个外省之地，我们根本就认不出那里居然就是我们国家：忧郁的小城镇，笼罩在漫长冬季的一片迷雾之中，夜幕一降临，街道上便阒无一人，星期日满街都是醉鬼的穷嚷嚷，而杂耍歌舞流动演出团的蹩脚演员，则占据了因禁欲而备受煎熬的单身汉的幻想。我心里说，身为知识分子的雷奥波尔多[5]，今天已经不再需要给一个在各度假中心巡回演出以求发挥艺术余热的老演员读他剧本的手稿了：他会把自己的剧本交给一个米兰的出版商，就像我把我的小说交给加尔赞蒂[6]那样。几年后，菲亚特600会堵塞道路，窒息城市，毒化社会关系，但它现在依然像是一些脆弱和奇怪的小玩具。手工制造的发动机以其欢快的噼里啪啦声，唤醒了外省昏

---

① 玛丽娅·皮娅·卡西利奥（1935—），意大利电影女演员。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③ 扎努西公司（又译“金章”公司）是意大利的一个家电用品公司，以洗衣机、冰箱生产为主。

④ 意思为“浪荡小子”。

⑤ 不详，有可能指 Leopoldo Savona（1922—），意大利电影工作者。

⑥ 加尔赞蒂是米兰的一家著名出版社。

昏沉沉的气氛,或者会出故障,放出一股蒸汽,给历险带来好一阵哆嗦。小牛犊们[1]将不再冻僵在海岸上,数着自己留在沙滩上的脚步,而会去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安科纳,看到发生在那里的事。在我斥责电视之前,我还会向它致以最后的敬意:如果我不承认它刺激起了他们的好奇,那我就有失公允了。他们不再死死地等待大型游乐场的秋天盛会,或者2月份的狂欢节的来到,作为他们一年中仅有的几大重要时刻,相反,他们会参与到我们这个行星的生活中,发现世界并不局限于罗马涅[2]。

我可以向你保证,当电影公映时,没有人会想到要赋予它一种先知般的价值,要从里米尼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的小小谎言、小小作弊、小小障碍中,看出不久后将在罗马爆发的种种丑闻的彩排。

是的,那时候,经济复兴已经开始,预示了一个健康、强大、繁荣的意大利。整个半岛,甚至也包括南方,似乎都走上了兴旺之路,政府的南方资助计划要把永恒的南方从祖祖辈辈的贫穷中艰难地拉出来。尽管1945年精神已经死亡,跟三党联合政府一起湮没,尽管右派独揽了种种大权和特权,人们还是想象,掌权的那些人总归充满了某种公民责任心,或者至少从个人来说是正直的人,共和国的机制并不受到怀疑。直到我们搬到多娜-奥林皮亚街之后不久,鬼知道是谁又想起来了那个薇尔玛·蒙特西[3],一年前死在罗马以南好几公里的托尔瓦亚尼卡河岸上的倒霉鬼,对她的死因又意外地展开了重新调查?一个很快就归了档的案件,尽管在预审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奇怪的疑点。

1953年4月11日星期六清早:一个骑自行车上班的工人发现了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海边。他便把自行车推到路边一个灌木丛里藏起来,自己下到滩岸上去看个究竟,就这样,他发现了那个姑娘的尸体,半裸,仰卧,一条胳膊弯曲着挡住了脸。没穿长袜,没穿鞋子,没穿裙子。福尔图纳托·贝蒂尼——这位直接出现在一部新现实主义电影中的早起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罗马涅为意大利的一个旧省名,相当于今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一带。

③ 1953年4月,一个叫薇尔玛·蒙特西的21岁姑娘的尸体,在奥斯蒂亚附近的河滩上被人发现。警方匆匆调查后认定是淹死,但后来,有人怀疑此案涉及某高官的儿子的不法行为。此案曾轰动一时。

的劳动者就叫这个名字，他以经历过抵抗运动的公民的率直反应，赶紧喊人求救，同时也没忘了采取措施以防自行车被偷——就这样，福尔图纳托·贝蒂尼这一名字成为了象征，他根本就没有把时间浪费在病态的思考中，便匆匆骑上他的自行车，赶往最近的警察局报警，之前，他还没有忘记留意一下出事地点的标记，一块高露洁牙膏的广告牌。

我之所以在此特别强调了一下这个做完陈述后很快就被人遗忘的哑角，那是因为，他证言的自发性、他反应的灵敏性、他外表的直率性，一开始就赋予了警方的调查以一种基调，使人更愿意假设那是一起十分简单的溺水事件，丝毫不会动摇赢得了对法西斯的胜利之后面貌焕然一新的社会给意大利人带来的信心。

一切都在为这一幻觉增光添彩。人们得知，就在两天前，薇尔玛·蒙特西离开了她跟父母以及两个弟弟一起居住的简陋公寓，公寓位于加里利亚诺街 76 号，在城乡结合部的萨拉里奥区，那是一个没什么新闻的手艺人和小市民的居住区。她父亲：细木匠。她本人，薇尔玛：女装店的学徒。二十刚出头。褐发，体态丰满，年轻漂亮，容光焕发，当她在波河街的橱窗前踯躅往返时，不会不引起别人的注意，然而，由于学徒工收入菲薄，她从这些店里往往只买一方花边或一根彩带。4 月 9 日那天早上，她穿了一条豆黄色的呢绒裙子，一件白衬衣，肉色长袜，绿黑相间的羚羊皮鞋。要去哪里？无疑要去海滩，因为她把饰有圣母肖像的金项链，以及未婚夫送她的手镯留在了家里，她的未婚夫安杰罗·久利亚尼是警察学校的士官生，在波坦察培训。

为什么去海边？哎！那都是因为这个可怜的女孩脚后跟有湿疹，以为泡一泡咸水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她常常坐火车去奥斯蒂亚。用不着猜想围绕着她死亡的是如何一个谜。她可能在海滩上溜达得过远了，一脚踩空，要不然就是突然感到了不适。海浪把她的尸体从奥斯蒂亚海滩带到了托尔瓦亚尼卡海滩，再没有比这更不神秘的了。人们难道还是第一次看到大海剥去了一具尸体的一部分衣服吗？

“总之，”蒙特西夫人向记者们宣称，她受着一种能被理解的痛苦的压迫，而记者们冒冒失失的问题倒是能使她从痛苦中稍稍摆脱出来一下，“你们还要我说些什么呢？薇尔玛是一个规规矩矩、文文静静的姑

娘。说到男孩子,她只认识她未婚夫一个人,那还是在皮盖蒂厅认识的,在一次星期六晚上的舞会上。我当时在场,陪她去的。她跟安杰罗只独自出去过两次:一次是去看电影,放映的是《幸福的穷人》,另一次是去参观博盖塞别墅。他们说好要在12月结婚的。她的情书里就是这么写的,你们要是不信,我可以找出信来读一读,证明一下。”

关于她的无辜的最后一点证明:她不会游泳。“我们难道已经足够富裕,能拿出钱来让孩子们去海边度假吗?”

奥斯蒂亚和托尔瓦亚尼卡之间相隔十七公里,这样的一段距离对4月份时相对平稳的海浪来说似乎太长了些(不过,谁又能探测到大自然的奥秘?),除了这一事实,还有一点也很可疑。人们解释说,波浪可以卷走她的鞋子、长袜和裙子,但是卷不走她的吊袜带,这玩意同样也没有出现在人们开列的单子上。然而,如果说,穿一双结实的长袜有利于人们对那姑娘的赞扬,证明她忠实于谦逊得体的传统,遵守姑娘家从不光着腿出门的规矩,而一件像吊袜带那样的隐私小物件的消失,则会引起一种很麻烦的疑虑。卫生学意义上的洗脚,或者就像人们为强调其医疗特点而不是享乐主义特色所说的“足浴”,是不是足以导致事故的发生?

这时,一直处在保留状态的证据终于见了天日,排斥了所有的怀疑。蒙特西夫人透露说,薇尔玛在她去做致命的海边远足那天,“身体不舒服”。该细节支持了关于木匠的女儿到了水里后感到“不适”的说法,尤其还一笔勾销了流传的那些恶意诽谤。今天,女人们不再把她们的月经看成为一种对爱情和工作的妨碍,所谓的“不适”,已经变得跟当年旧制度时伯爵夫人们的“气郁”一样过时,你实在很难明白,母亲的供认居然为预审画上了句号。那时,意大利依然生活在一种严厉的农民道德的法则下,按照这一法则,女人们有规律的身体不适被看成上天的意愿。上帝禁止她们在每个月那三天里发生任何形式的性行为。这是强加给被谴责为有罪和不洁的夏娃这类人的一种惩罚。我在玛莫罗桥见到过,拉卡尔穆托或者皮耶特拉内拉的一些姑娘,在那三天期间,会在自己脚踝上系上一条红带子:西西里人一个古老习惯的残存,就像中世纪时麻风病人摇的那种木铃,远远地就在提醒人们,请在这禁忌之人的周围留

出隔离空间。

1953 年年底:一份右派报纸发表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当家的父亲温柔地亲吻他的妻子和孩子,一家人痛哭流涕。“别了,我亲爱的,永别了,我要去洗一个脚浴。”更令人惊讶的,恐怕是不久后出现在一份周刊上的小插图,同样也是右派刊物:画的是一只鸟在空中飞翔时被人抓住,嘴里还叼着一副吊袜带。插图的解释文字,是这样一个让读者颇感为难的字谜:I piccioni viaggiatori sono ormai volati via[①].“信鸽从此已经起飞。”只有那些想到要把这种飞鸟跟也叫这一名字的阿蒂利奥·皮乔尼参议员[②]做一联想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影射,这位皮乔尼还是外交部长,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人物,最受人尊敬、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另外,我们还得知道,他的儿子皮埃罗,爵士乐作曲家,经常光顾罗马上流社会的风流场所。而且他还出席乌戈·蒙塔尼亚侯爵这位公益事业重要管理人举办的节庆聚会, 就在其离托尔瓦亚尼卡不远的卡波科塔领地上:此事确凿无疑,恰如一个因没能在电影城找到工作而愤怒不已的年轻的画报维纳斯女郎宣扬的那样,也正是这一次公开宣告,导致了案件的重新审理。

缺口一旦打开,很快地,一股泥石之流便一涌而入。人们得知,薇尔玛原来是死于一次放荡聚会中的吸毒过量, 而吊袜带还不是唯一一件多余的内衣;人们还了解到,政界、金融界、新闻界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也参加了那些荒淫晚会;而且,警察局长萨韦里奥·波利托,尽管没有像那些亲自出面作保的要人那样,却还是保护了那些罪人,让此案的调查草草收场。

当年的丑闻闹得规模之大,你根本就难以想象,因为,如今充塞着我们报刊专栏的已经完全是另一种声势浩大的重罪。卡尔塔吉罗内[③]的亿万富翁,或者洛克希德公司[④]的贿赂,早已经把一种更多地出于笨拙而不是邪恶的吸毒过量,打发回了腐败堕落的史前社会。1954 年,人们才

① 这一句意大利语的意思,见下文引号内的翻译。

② 在意大利语中,鸽子叫“piccioni”,跟皮乔尼的姓氏“Piccioni”是同一个词。

③ 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个城镇。

④ 洛克希德是一家航空公司。

刚刚从反墨索里尼斗争的严峻考验中走出来。人们突然发现，领导我们斗争的那个阶级、政府部长及其子女、银行家、报刊主编、高级官员、公共安全部门负责人，所有这些人全都与腐败有染，舆论顿时哗然。侯爵、省长、爵士乐作曲家锒铛入狱；几十个嫌疑人受到控告。皮乔尼老爸引咎辞职。

（如若你好奇地想知道案件到底如何收场，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诉讼于 1957 年 1 月开始，持续了三个月：最后，被告们全都被宣告无罪。人们还得等上好几年时间，才能知道，当年，接受尸检的内脏并不是薇尔玛的内脏，而是另一个人的，演的是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人们始终不知道，控告到底来自何方；无疑来自基督教民主党内部；阿蒂利奥·皮乔尼所代表的这一派——左翼——应该受到了打击，外交部长本人首当其冲，按照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不断完善、变得血淋淋的策略，他们付出的代价不仅是阿尔多·莫罗的政治生涯，还有他的生命[①]：他也是提倡“前哨”倾向的排头兵，积极推行了遭到党内保守派痛恨的“历史性妥协”。）

相比较于侵入国家机构中的放荡的坏疽，年轻的女装学徒的双重身份一下子给人的打击似乎要更大。如果说，意大利存在着一个社会阶层，依然还很脆弱的共和国要指望它来巩固其基础，那么它就是手工艺者的阶层，包括小型企业的工人、居家劳动者、靠坚信婚姻关系而焊接在一起的夫妻、尽管有了异端思想却仍在堂区电影院看情节剧以为消遣的未婚夫妻、无数有觉悟的小市民大众，而蒙特西一家，便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如此社会阶层的家庭的样板。带绿色小点子的黄裙子，拴在长长项链上的圣母肖像，让人感觉到如同一种侮辱。对国家健康如此必要的普通道德的这一托管者，比起任何别的什么来，都更不应该允许自身顾临卡波科塔的藏污纳垢之地。薇尔玛的错，早已远远超出了个案的范畴，变成了民族失误的象征。人们不仅仅为一具尸体哭泣，人们还葬送了十年的希望和幻想。人们一旦发现，木匠的女儿离开了她父母的家，离开了她父亲散发着锯末和刨花清香的作坊之后，到底去了哪里，怎么

① 阿尔多·莫罗（1916—1978），意大利政治家，天主教民主党领袖。1963 年到 1968 年以及 1974 年到 1976 年曾五次任总理，最后被“红色旅”恐怖分子暗杀。

还能够对葛兰西、斯图尔佐[1]、马泰奥蒂[2]、阿门多拉[3]的后人保留某种信任呢？一个因民主而获得再生的廉洁而又勤奋的意大利国家的神话朝不保夕，随时都将破灭。

喜出望外、得意洋洋的人是我父亲。一开始他还拿不准是不是应该抱怨风俗的"颓废"和祖国的"堕落"，以此来打击我们，后来他便改了脾气，决定采取嘲讽口吻。啊！自从意大利以为能够摆脱一个领袖，它就走向了繁荣！我可算见到他们的努力了，那些反法西斯分子！干得好，共和国！随后，他失望地发现，我们根本就不接他那讥讽的茬，他便隐蔽到了一种对往昔的理想化沉思中。"在墨索里尼那个时代……"变成了他开场的口头禅，很快又变成："在他那个时代……"请注意，必须要有一定的勇气，才敢于以罗马方式向藏身于街区中的几个忠贞不渝者打招呼，因为，几乎所有的法西斯分子全都在解放的第二天改换了门庭，不是加入了基督教民主党，就是进入了共产党。

这位旧军官，为使自己的特点更符合其坚定信念的高度，减少了葡萄酒的日常饮用量，还恢复了每天换衣服、刮胡子的习惯。他出门，去买《博盖塞》，在咖啡馆里会见另一些怀旧者，跟他们一起尽情地想象，假如领袖[4]当年不那么宠爱他女婿[5]的话，帝国将会有何等辉煌的命运，只可惜他实在太慷慨大方了，根本就不提防自己身边的人，"感谢上帝，"好女婿总算"枪毙"了。

对妈妈来说，这是何等的轻松啊：不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像在玛莫罗桥那样，以种种非难和指责来纠缠她，他现在生活在满脑子的奇思怪

---

① 路易吉·斯图尔佐(1871—1959)，意大利政治家，本是天主教神甫，后从政，建立意大利人民党。因拒绝法西斯主义而在20年代流亡。1946年回国后，把人民党改组为基督教民主党。

② 贾科莫·马泰奥蒂(1885—1924)，意大利政治家，社会党领袖。他最终被法西斯分子绑架并杀害。

③ 乔万尼·阿门多拉(1882—1926)，意大利政治家、新闻工作者，20年代，他是反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墨索里尼掌权后，他成为反对党领袖。

④ "领袖"是墨索里尼的称号。

⑤ 指齐亚诺(1903—1944)，意大利政治家，墨索里尼的女婿和"接班人"。见上文第一部分的前注。

想中。他根本不在乎她往我们的盘子里盛什么吃的，即便在月底那几天，她从肉店买一个肘子给我们三个人分，不惜让作为配菜的小扁豆大大地超量。他不再找她的麻烦，他很高兴吃罐头食品，回忆着埃塞俄比亚的战役。看到他重获了生存的趣味，妈妈的心头搬走了一块大石头。尽管她跟这个上尉没有什么话好说，她还是很开心地发现，他又找回了一种激情，还有朋友，这些，毕竟可以让他不至于彻底沉湎于郁闷和迟钝之中。

她实在是惊讶而又激动，有一天，她提醒我注意，我刚刚叫了那个三十三年前跟她一起孕育了我的人一声“爸爸”。我跟她一起从集市转回来。走到一家橱窗在阳光下闪闪放光的化妆品商店门口，我们俩不约而同地止步不前。心照不宣地，我们的选择同时落到了一把电动刮胡刀上，我们当即买下，让店员用带花朵图案的彩色纸包装好。是我从女售货员手中接过那个盒子；依然还是我，装出一副自然大方的神态，提着那根镀金的细彩带，把我们勤俭持家的这一共同成果一路拎回到家。

28

塞尔乔，我还继续跟他见面。他穿破篮球鞋的疯狂劲头，还有他破坏性的灵敏，始终让我惊诧万分。即便是倍耐力橡胶的球鞋，我们认识的时候在他脚下能维持三星期寿命，现在又以两倍的速度匆匆投降。“好好瞧一瞧！”他对我说，自豪地向我显示他的新破损，他知道，我前来找他虽然基本上是出于友情，但同时也有跟他学学俗话俚语的意思，对此，他根本就不生一点点气。我正在完成我的小说：每天早上都要在桌子前待上三四个钟头，既然我自己就有一个房间。我在小说中讲述自己在玛莫罗桥的经历。此外还有我并非亲自参加的几幕场景，偷汽车、溜门撬锁、武装袭击。我这么做实在有些太不谨慎，因为这些道听途说的

故事,很快就会被看成作者自己作案的证明。

这本书,我并不仅仅出于对文学功绩的渴望而写。它能证明,我对我的波尔加特朋友们是忠诚的。塞尔乔、阿尔杜乔、阿格诺罗,团伙中没有一个人敢于进入我目前逛街时随意欣赏其橱窗的那样一家商店。真正的羊毛衫,斜纹呢套装,绿色植物,红色金鱼,成套厨房用具,组装书房家具,女用手包,半导体收音机,唱机,一一展示在被霓虹灯照亮的多娜–奥林皮亚街的橱窗中。我对照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在泥水滚滚的河边的生活,我在这个有人行道、有阴沟的街区中的生活。我想念格劳科。他的尸体浮在清浊分明的河水中,漂向大海,没有坟墓。我也想念桑蒂诺,他没能救出他的伙伴。他已经结婚了,跟他的岳父一家一起住在工厂的附属建筑中。我在问自己:"你是不是有理由更自豪一些?"我跟利维奥·加尔赞蒂,我未来的出版商,一起坐在布科这家时髦餐馆中,面对着一盘"犹太式"的朝鲜蓟美味大菜。为了在跟一些著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见面时有个模样,我戴上了妈妈从贡多蒂街买来的人字形条纹领带。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和他的妻子艾尔莎·莫拉维亚吃完饭之后,就跟我交上了朋友。

不止一次,破旧的公共汽车把我捎到草坪被磨损了的三角形小广场:那里好像什么时候都有波尔加特,只要人类学大灾难还没有把他们给吞噬。阿尼埃纳河的突然涨水对小子们[1]的威胁,远不如消费社会持续而又疯狂的发展来得大。他们被周围景色的迅速变化所刺激,对我的离去也不那么抱怨了。在玛莫罗桥后面,大吊车林立、推土机横行的山坡上,他们十分骄傲地为我指点全国社会福利学院的工地。"就像你那样,我们的家里也将会有一个拉屎的圆墩子!"倒是我感到自己有罪,把他们给抛弃了,毫无防备地处在被经济学家以每千人占有的汽车数量当做幸福标准而称做的一种奇迹之中。

我从我们居住的新绿山的山顶,一直冲下山坡,来到台伯河河畔。靠近博提塞门的下游处,河流不再有堤坝挡拦。它从两片长满乱草的斜坡之间流过;乱草很脏,夏天灰尘蓬蓬,冬季带着泥浆。忧伤的河岸变成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了一个垃圾场，在我的回忆中，还有一辆被遗弃的破卡车作为润色，车子的储气罐后面有木楔垫牢——我只去看过一两次，不会再多了，因为这一段河畔实在太荒凉了，不怎么能吸引闲逛者的注意，我跑来的机会极少。

到底是什么本能在提醒我，不要到这样一个地方来游荡呢？有谁想到，多年后，幸福就在此地意外地猛扑到我头上？

我更喜欢穿过河流，在集市场里溜达[①]。卡车和马车乱七八糟地停放在一起，母鸡咯咯乱叫，搬运工大声吆喝，不远的圣保罗教堂传来管风琴低沉而又颤抖的音响，加尔巴泰拉方向飘来嘹亮的军号声，这一切更是平添了一番热闹。特拉斯特维尔和博提塞门的许多年轻人都混杂到了这一片嘈杂中，他们有的卖体力帮人做搬运，挣几个脚钱，有的则趁机朝货箱里下手偷上一把。而在一切算计之外，则是恩宠的一瞬间：就在我不再等待时，天上掉了馅饼下来。

“来吧！”

“去哪里啊？”

“在菜花后面更好！”

在蔬菜金字塔后面的简短追踪，直到附近的一个隐蔽处，尽管不太舒适，彼此还是帮对方寻找到了快感。分手时，他说：

“三百里拉，你看行吗？”

一开始，我稍稍有些惊讶，后来几次，我都在裤兜里准备好几张一百里拉的钞票。

我还带着更狂热的劲头，潜入到毗邻的屠宰场中。巨大的四边形场所，占据了古时候的博阿里奥广场：古罗马人已经到这牛市场为城里人提供肉类了。这地方从最初起就是一个牺牲和血祭的场所。最始几位罗马皇帝统治的时代，犹太移民就成百上千地来到这里，集聚在台伯河河畔，码头旁，他们通过驳船把各种货物从奥斯蒂亚运到这里。他们被看成是卑贱的人种，受人轻视，不得不驻扎在这片被遗弃，用做不洁营生的街区。屠宰场、鞣革场、肠衣加工场、破布浸渍池，这一切在他们手中

---

① 博提塞门边上有罗马最著名的跳蚤市场。

繁荣起来,多年中,警察们对他们投以容忍的目光,而基督教也没有在他们的营地中找到一个落脚点。因此,圣保罗以及使徒们那卑贱而又陌生的先锋概念,始终沉湎于这些最卑贱、最无名的行业中,在饲料包、在水手酒吧、在抬轿工之中,停留在这一个像是犹太人集聚区的近郊中。

对这一遥远时代的想象,使我感到一个地方于我更亲,最初皈依了耶稣的犹太人就在那里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我自己不也属于一个地下的少数派吗?当局不是总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我们,随时准备把法律的螺丝拧紧一圈吗?但是,今天,假如要说真心话,我兴许就得承认,我是在历史的顶峰上寻找一条道路,在尼禄的牺牲者中寻找一种支持,以掩饰我自己匆匆奔向这些下流之地的自发的内心冲动。我在问我自己,哪一种宗教没有在迷醉与死亡之间,在鲜血与复活之间建立起一种同样必需、同样神秘的联系?我真应该对自己承认一种慌乱而又不可抗拒的好奇,要在那样的条件中做爱,而若是换做别人,恐怕谁都会认为这些条件实在太可怕,除了市政环卫部门的雇员,因为,这一片风景,死亡的肌肤、摊开的腑脏、红色的血泊与污秽的沟渠,他们是早已习以为常了。

就像卡尔利诺,我的最爱,他灿烂的笑容以其二十岁花季的纯洁天真,飘拂在百牲大祭之上。他从屠宰场出来时,跟博盖塞别墅中那个决斗中杀死歌利亚的少年一样平静,一样安泰。跟我的不耐烦、我的神经质恰好相反,他体现出一种天使般的从容不迫。就在我紧张不安地等待他时,他不慌不忙地走向了喷水池。再没有比看到这个年轻的巨人喝上一杯清水以淋洗杀戮之气更让我感动的了。他下巴一抬,脑袋就以一种迅速而又持续的运动朝后仰去。他的嘴唇有一种清爽,他的蓝眼睛有一种液体般的清亮,他把残留在无毛的下巴上的最后几滴水擦去,然后摘下溅上了鲜红血污的围裙,去洗手,之后,迈着稳健而又平静的脚步,到马厩后面铺着的油布上来找我。

"你能给我三百里拉吗?"随后他对我说,稍稍提高了嗓门,不是因为,他非坚持要看着我提前被他的宁静战胜的手伸进兜里,而是因为,附近军营中的军号声或者桥上开过的火车的隆隆声使他不得不大声说话。

三百里拉,他也一样。所有人都是同一数额。他们都定了一个数吗?我发现,我第一次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谁定的价格?奉送来自于我

这方面吗？他们应该要求吗？我的难以回答证明了，我在寻求撒谎。我实在不太愿意意识到，波尔加特那无偿与自发的爱情的美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做得就像是在赠送一件礼物。我拒绝同意给钱要确定数目。我恐怕得问一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强加给我这一金钱上的屈服，而我又为什么要接受。

这里，我还发现了另一个矛盾。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房间。为什么还要游荡在台伯河河畔，满足于那些匆匆忙忙、马马虎虎的邂逅呢？我完全可以带一个小伙子上楼，比如说，这位其贞洁与谨慎同他跟其残忍的职业万万不可同日而语的卡尔利诺，反正有那么几个钟头，我父亲不会待在家里，他要去酒吧，跟他的朋友们一起估算法西斯复辟的一种可能性，他们越是认为那种可能性在增大，酒吧中闲聊的时间也就越长，因为费尔南多·坦布罗尼[1]进入了内务部，而红衣主教奥塔维亚尼[2]入主了教廷的圣职部。而妈妈，为一个举止如此得当的客人端上咖啡之后，肯定会抽身退回自己房间，把自由的空间留给我们。然而，我头脑中从来没有想到过一次，要把眼前这位喝清水的小伙子跟我家公寓的可爱与舒适联系到一起。即便在今天，杰那里埃罗，我还是不愿问我这个问题。眼下，就让我相信这一点吧，吸引我到博阿里奥广场去的唯一原因，是想在鲜血中愤怒地爆炸。

尽管如此，我还是越来越经常地——兴许是被不得不付出的三百里拉弄得恶心，它毕竟伤害了我对玛莫罗桥的怀恋，以及我希望在自己书中确立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的意愿——毫不停顿地穿越内墙，从后门出去，急急忙忙地进入非天主教徒的墓地。

延伸在门后的那个所谓非天主教徒墓地，是一块栽有柏树和黄杨木的围地，里面安息着死于罗马的新教徒，其中绝大多数是英国人，例如西班牙广场的那位诗人[3]，他活得并不比他所歌唱的夜莺时间更长；

① 费尔南多·坦布罗尼(1901—1962)，意大利政治家，基督教民主党人，曾任总理(1960)。

② 奥塔维亚尼红衣主教(1890—1979)，意大利人，教廷高级人士。

③ 指英国诗人济慈(1795—1821)，他死于罗马，只活了26岁，《夜莺颂》是他的著名诗篇。

又如他那位淹死在维亚雷焦之外第勒尼安海上的朋友雪莱（拜伦为他在海滩上竖立了一个柴火堆：哦，时光啊，只有那些配得上这一宇宙裹尸布的人，才在你的波涛中丧生：那不是一些乖乖屈从于一帮亿万富翁的洋娃娃，而是他们世纪的第一批诗人，最伟大的作家）；歌德的儿子也埋在那里；还有几个由东正教教会哺育成长的俄罗斯亲王；还有不少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高贵富有的外交家。这就跟罗马城中居住着最贫苦平民阶层的这一带形成了一种鲜明对立，不过，战争结束后，人们在该墓地的一个角落里同样还安葬了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些领袖人物；首先是葛兰西，孤零零的一棵爱神木为他的坟墓遮了荫。一块红布，如同系在游击队员脖子上的领巾那样，系在了装有意共领袖骨灰的小瓮的细脖上，葛兰西生命的最后十二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最后死在墨索里尼的大牢中。这个骨灰瓮就放在一块光溜溜的石板上。

我在竖立于草坪中的十字架和石头墓碑之间前行。来到石板前，我沉思了一阵，然后，在从泥土中升起的潮湿气味中，在常青藤、薄荷以及枯花的香味中，我仿佛被这一排排坟茔沉浸其中的宁静带到了世界之外，同时又被开过圣保罗门的有轨电车的哐当哐当声所妨碍，无法忘记与此仅仅一墙之隔的无产阶级街区那永无休止的活动，尽管这微微泛紫的暮色压住了种种声音，就这样，我开始了我与死者的对话。

我的小说的目的应该是什么？"你将重新界定人，"我的良师益友对我说，"让他处在他极端受压迫的形态中：成为无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牺牲品，被它赶到城市的众门之外，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生存，成为一种任人剥削、奴役、宰割的劳动力。"

"可是，"我腼腆地反驳道，"假如我在这些小子[①]的身上发现了纯洁而又清新的人类未被猜到的财富呢？"

"废话！你所谓纯洁而又清新的人类只是你美好梦想的幻觉而已，且不说你的恋童癖！把你的人物隔离在一种不现实的光芒中，让他们跳出历史时代，在他们脑袋周围点缀上神秘的光环，你就确实可以在他们面前痴狂了。褴褛的衣衫之下一颗金子般的心！你恐怕只是期望成为一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本章中以下均同此，不再一一注明。

个新的邓南遮吧？快让这些颓废的幻想见鬼去吧。你的小子们，你就别再观察他们了，让他们起来行动吧。把他们放到时代中，历史中。不要再欣赏他们本能的活力，让他们加入到进步与理性的大军中。表现他们，不是他们那种孩子气的毫无觉悟的开心，而是他们身为失业工人的斗争。不是作为从卡拉瓦乔的一幅画作中跳出来的心满意足的巴克科斯和那喀索斯，而是作为红色战线的一名战士。"

"父亲，"我说，焦虑地想再赢得他的看重，"我读过你在监狱中写的所有札记。我要成为你所说的那种民族-人民文学的艺匠，你说过，我们意大利总是缺少这样的文学，相比较，英国有狄更斯，俄国有屠格涅夫，法国有左拉。在玛莫罗桥，我发现人民处在他们的天然状态，而在任何别的地方，都已经不再是那样了：自然之人民，普遍的人，因原始而普遍，在他们最初的天真无辜中。"

葛兰西口气生硬地打断了我："而在后来的那些章节中，他变成了什么，你那个普遍的人？"

"是啊，"他接着说，面对我询问的目光，显得很不耐烦，"你那些人物，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我想，你总不至于固定不变地瞧着他们，就像那些在达科他一块保留地里的苏人[①]吧？他们得活动，他们得把鼻子伸到帐篷外，他们得去市政府和工会注册。你不回答我了吗？请注意，"他笑着补充道，"我并不强求他们参加党组织。但至少要有那些一点点政治意识。你的小子们，只有当你把他们的未来显示给我看时，我才会对他们感兴趣。"

眼看就要激起他的愤怒了，我赶紧尴尬地宣称道："其中有一人进了一家漂白水工厂，在复兴商店买了一件漂亮的格子上装，还跟会计师的女儿结了婚。星期天，他们去博盖塞别墅的跑马场看赛马，在草地上野餐，到玫瑰赌场给自己买个冰淇淋吃，然后坐上他们的600轿车，那是他们分四十个月分期按揭买的新车。这对夫妇及时地赶回家中，赶上看电视转播的足球赛。另外有一人……"我低下了脑袋，几乎不敢说下去。"另外有一人……被吸引参加了年轻人之间的一场游泳比赛，尽管他根本就不

① 苏人是印第安人的一种。达科他为美国的一州，早先，有不少苏人生活在那里。

会水。河流正好赶上涨水期,他还是一头跃入水中……结果……"

"我明白了……一个成了市民阶层,一个溺水而死。"

"总之……假如你想这样来总结事情,套式还是很容易发现的!"我说,面对着隐隐作响的雷声,试图以甜言蜜语来哄骗我那严厉的反驳者。

我没弄错。死者那深沉的嗓音突然鸣响,粗暴地打断了我。

"因此,除了把童年理想化,把它表现为如同一个天堂,世人只能以背叛或死亡从中走出,你就觉得没什么更好的事可做了吧?成年是一切,莎士比亚有力地说,这另一个英国人,我倒是很想让他成为我这墓地中的邻居。他,一个阳刚气、负责任的诗人,跟你那些颓废之类不一样,什么兰波、翁加雷蒂、洛尔卡,你从他们那里吮吸着无谓怀恋那害人的汁液……童年啊!我们需要的是成年男人,皮埃尔·保罗。自在的人民并不存在,人民只存在于他们争取经济解放的千年斗争中。我当然并不想逼迫你去读马克思的书,你是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活动家。但是你得一劳永逸地抛弃史前史的神话,投身于历史的现实,你选择的应该是理性而不是自然,是成年而不是童年,是觉悟而不是本能,是光明而不是黑暗。"

"而且,你得拿定主意,结婚成家,娶妻生子,"从一种如此的谴责中,可以期待这样合逻辑的结论。但是,兴许是因为,他不想以一种个人化的最后通牒来削弱他的政治论点,他知道,那样的通牒可能会让他的努力说服功亏一篑,兴许是出于一种别的动机,他放弃了从这方面胁迫我。我们面对面地停留在寂静中。夜色的阴影如一队人马向前拥来。怀疑与后悔向我袭来,尽管我还没有准备缴械投降。我生命的一部分证实了这个教训。我指责自己的基本活力论,大众主义的神秘化。假如我再在这条路上继续下去,我的书就将不会是一种历史证言,一种对丑闻的揭露,而是一曲同谋的哀歌。然后,我又埋怨自己让步太快。葛兰西有道理,同时又没道理。把小子们从悲惨中拉出来:行啊,在这一点上,我百分之百赞同他。但不能把他们交给大众的文明,因为,共产主义的官僚,跟基督教民主党的行政势力一样,都在努力加速这种文明的进展。

这并非仅仅涉及我们的风俗(尽管我们要看到,共产党目前的领袖们并不像我这位地下对话者那样体现出同一种谨慎:他们更多地在

重复天主教道德学家的话,就像在弗留利,圣乔万尼的党支部总是跟在瓦尔瓦索纳的主教脚后亦步亦趋)。我在问我自己——我真想从死者的阴魂中掏出一种暧昧的回答来——假如要建立一种意大利式民主,是否得把孩子们都送到学校里,让夫妻们待在电视机前,让整个国家窒息在一种官僚主义话语的千篇一律的斗篷底下。桑蒂诺在其当会计以及工会代表的岳父的保护下装进瓶子里的漂白水,是不是会在每一个家庭中散发出氯气刺鼻的气味?

"你想让人民一直留在无知与卑劣之中吗?"使用上这样的话语时,对话已经变得无用了。我根本不在乎一种如此不公正的非难,背朝坟墓一转身,在墓地那昏暗的小径中渐行渐远。我是共产党员——在格隆基和塞尼[1]的恶臭的意大利,我怎么会不是共产党呢?——然而,我又站在塞尔乔、格劳科他们这一边。我忠实地乘坐途经蒂布尔提那的快要散架的公共汽车,尽管,要进入历史的长河,我最好还是搭乘一种不那么老气的交通工具。

一只萤火虫在那里闪亮,在我的眼底,在墙脚下的野草丛中。十年前,我难道不是注意过了它吗,它们成千上万地闪耀在牧场上,融合在大自然的一片风景之中?还在人们为提高作物产量而往田里大肆施撒见鬼的杀虫药粉之前。我战战兢兢地停步于一个流着眼泪的葬礼天使身边,生怕再听到葛兰西那愤怒的嗓音。他催促我回答他,那些农民大众,昨天还面朝黄土背朝天,奴役于繁重的劳动,今天是不是能最早享受化学工业发展带来的好处。

沿着呈斜坡的花园,杂乱无章地竖立着一些墓碑。是谁把所有这些外国人赶到了罗马,死在了这里?何等的梦想?何等的抱负?我趁着最后一丝天光,漫步于坟墓之间。每一个生命都在诉说着它的命运,用俄语、希腊语、保加利亚语的文字,以土耳其语、瑞典语、德语的字母。我看到,有许多画家、建筑家、作曲家、作家安息在这里;多数人还是英年早逝;约翰·济慈只活了二十六岁。他的墓位于墓地中最老的那一部分,在

---

[1] 乔万尼·格隆基(1887—1978),意大利政治家,天主教民主党人,1955年到1962年任意大利总统。安东尼奥·塞尼(1891—1972),意大利政治家,两任总理(1955—1957,1959—1960),一任总统(1962—1964)。

草坪中央，就在那座金字塔的阴影中，而那金字塔本身，就是一个古罗马公民的坟。英国诗人的墓碑上雕刻有一把诗琴，还有他自己拟定的一段碑文。“此处安息着一个其名字写在水上的人。”他有没有时间活得比他同胞笔下的罗密欧更成熟？哦，这个罗密欧，得到了葛兰西如此赞扬和引用的罗密欧！蒙太古家族的儿子也会因为太年轻而遭摈弃吗？我想到所有那些世纪的灰烬，永恒之城就建立在这一灰烬之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总是缺少对人死之后种种情景的想象。但是，在这样一个话题上，不比任何其他话题，其实用不着指责人们不抱任何死后再生的希望。

于是，我来到街上，此时，几乎已空荡荡的有轨电车正在开往终点站。一阵暖风从海边带来了几团游散的云彩。在屠宰场后院，夜间被沉重的链条锁在栅栏门后面、次日一大早就将被宰杀的牲口，正狂乱地践踏着圈里的垫草。我穿过桥，脑子里滚过几行诗句，它们将确立我的诗人名声：

丑闻啊，自相矛盾，
既赞同你，又反对你；
在我光明的心中赞同你，
而在我腑脏的黑暗中又反对你

同时，我还思考着该为我的小说增补什么样的章节，才能敢于再次面临那个骨灰瓮。无论活着时，还是死去后，葛兰西永远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向导，我们的法官。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会不来到这棵爱神木底下，询问他的灰烬。

29

从屠宰场出来后要去英国人墓地，我就得绕过一个山岭：不然，我又该用什么来称呼耸立在那里并挡住我去路的这一高高的隆起呢？那

上面荒芜贫瘠，既没有房屋，没有人住，也没有树木，而且形状奇特，面目稀罕，看来既不属于自然，也不属于人类。山坡上长满了狗尾巴草，一开始斜坡很陡峭，接近山顶处便渐趋缓和，到顶上成了一个平台。这个似乎没有生命的小山丘之所以吸引我，恰恰是由于此地偏僻得如同一个谜。我看不到任何小径，也看不到任何可资攀登的手段。只有底部几个挖出来的洞，庇护了人类可能的活动。它们被马蹄铁匠、葡萄酒商、酒桶制造工用做马厩、工场，或者地窖，这些人断断续续的工作稍稍打破了闹市中被遗忘的这一绿色角落世外桃源般的宁静。

泰斯塔乔山，有谁熟悉它？没有人提到它，尽管它作为罗马的第八座山岭，其古老与神秘，皆可同其他的七大冈相媲美。城里的居民已习惯于到这里，到台伯河和阿文蒂诺山之间的这片沼泽地上，来扔他们用坏了的锅碗瓢盆，陶瓷器皿：双耳尖底瓮的碎片、水罐的残屑、酒杯和盘子的破片，成年累月地堆在这里。垃圾堆在扩大，从小堆变成了小丘，从小丘变成了小山。随后，世纪岁月为他们披上了青草与煤渣的外套，人们对它毫不感兴趣，它赤裸裸地遗弃在天空下，成为无人敢亵渎的古老圣殿。

我从盘旋路绕过那些岩洞，那是一条长满青草的土路，处处都是车辙和窟窿。泰斯塔乔山四面都如刀削斧凿一般陡峭：你根本就别想爬上去。它在山顶上保守着什么样的秘密啊？为什么那些在岩洞入口处的工匠只给了我支吾搪塞的回答？一个剪狗毛的人在皮件马具作坊前摆上了他的马扎。他的工具都摆放在一个鞋盒子里，他不会太长时间陷入在梦想中。瞧着他那顶凹凸不平的毡帽，他灰色的发绺，他掉光了牙齿的嘴，还有他理查德·贝斯哈特[①]（这是费里尼选中的一个演员，在其新影片中扮演疯子）般的微笑，我简直就把他当成一个活脱脱的精灵。他中规中矩地、郑重其事地招揽生意，却根本没希望挣到那些匆匆路过的顾客的哪怕一里拉钱。仿佛事先串通好了似的，那些彼此最不协调的犬类样品，在拜访了屠宰场，搜索了垃圾堆之后，便撒开碎步匆匆跑来此地。各种毛色、各种花纹的纯种狗和杂种狗，长耳鬈毛的短腿猎犬，长毛垂

---

① 理查德·贝斯哈特（1914—1984），美国电影演员。

耳的西班牙猎犬，长着獒狗嘴脸的狐狗。它们乖乖地坐在剪狗毛人面前，他从盒子里拿出工具，迫使顾客来一次细致的打扮。被狠狠梳刷了一番之后的狗慢悠悠地站起来，抖了抖身子，摇了摇尾巴，从容地离开。到了路口弯头，它们会扭转身来，最后汪地叫上一声，表示感谢。老头子则举一下帽子以示答礼。剪刀、刷子和梳子又放回盒子里，摆得整整齐齐。他又继续他那纹丝不动的站岗，直到有另一头畜生，对停在屠宰场另一侧的流浪动物扣押处的警车不屑一顾，前来这里向好心人的那只手送上它乱毛蓬蓬的脊背。跟他比起来，希腊人传说中的卡隆，对那些焦急地等在阿刻戎河的黑水边上，巴望早早渡到对岸去的人，恐怕也不会显得更奇怪吧[1]：假如泰斯塔乔山并不完全属于人类世界，那么，这位船夫兴许就会告诉我如何找到摆渡口。

"请原谅，"我问他道，"难道就没有一条路能通上山？"

他摇了摇头，用这样一句简明的话回答了我，让我的好奇心和恐惧感有增无减：

"在卖花人的棚屋后。但是不要去。那不是你该去的。"

"不是我该去的？"

"不是任何人该去的，"说着，他伸开了双膝，欢迎一个新顾客的来临。

在卖花人的棚屋后，我发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轨迹，马儿在砖头的粉末中留下了分岔蹄子的印痕。不一会儿，小径就把我带到了山顶。我本以为那是个平顶，但实际上顶上有一个凹谷，而在谷底，又冒出来一个圆圆的小丘，这从下面是看不见的。我一直走到陡坡的边上。罗马的喧嚣死在了我的脚下。在博阿里奥广场和台伯河之外，一大片景色伸展在绿山、雅尼库卢姆[2]，以及更远处的阿尔巴努山[3]的斜坡上。我孤身孑立，被这一陶瓷瓦砾堆与城市隔绝，我一展翅膀就飞跃了一个个世纪与帝国。罗马乡野的广袤全景，无边无际的辽阔江天，如世界诞生之日一般自由地吹拂在我脸上的风，把我带出了时间之外。我出神地想象着远

---

① 卡隆是希腊神话中的冥河(即阿刻戎河)渡夫，专渡亡灵去冥府。

② 雅尼库卢姆指罗马城台伯河右岸的所有山丘，也包括如今仍叫雅尼古卢姆的那座山，以及梵蒂冈山。

③ 阿尔巴努山是意大利一座山的古名称，如今叫卡沃山，在罗马城的东南。

方的群山关锁了地平线，恰如它们在罗马建成之时露面那样：满山覆盖着山毛榉林和橡树林，这些树种，在从希腊和西西里引入四季常绿的热带植物品种之前，是拉丁姆地区人们唯一熟悉的落叶乔木。长在英国人墓地中的植物也是一样，当我转身朝向另一边时，我发现它们墨绿的叶子黑油油的，十分茂盛。爱神木在装饰葛兰西的坟墓之前，就以它耐磨的光泽，为女神阿弗洛狄忒献上了它的崇拜；柏树、花楸树、欧洲夹竹桃之上，永远摇曳着一棵棕榈树那弯曲的羽饰。它，人们是在非洲发现的，在一个较晚的年代，与橙子树和柠檬树同时，而那两种树，人们相信是意大利本土的，尽管在母狼哺人和这两种树在我们的土地上出现之间，早已流逝了两千多年时间。

我不知道是什么把我这样再次带回到罗马的神秘起源：兴许是这荒凉寂静之地的奇特性，是笼罩在这里的一种非时间性的宁静。自从牧人和猎人在平原上建立起他们最初质朴的营地以来，这里的一切全都没有变。当我俯瞰台伯河时，我毫不费劲地为自己重现了每年春天都会带来的节庆。河流上漂满了点缀着水仙花的小舟。相爱的男女懒洋洋地坐在船里，醉饮着用弗拉斯卡蒂的葡萄榨酿的金色琼浆。深夜里，欢快的火焰尽情燃烧，敬农神的筵席依然热闹非凡。听从节气时令的部落，用献给神明的舞蹈和歌唱，迎接着温和晴朗日子的回归。他们将赐给土地以丰饶，赐给牲畜以兴旺。

离开谷地这个罗马城里唯一的高地时，我碰巧很有意思地注意到，就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从视野中消失的那一刻，我听到山丘后传来了一种响亮的自言自语。一个头发蓬乱的脑袋露了露，两只黑油油的眼睛盯了我一会儿后便消失了，紧接着，一阵银铃般的清亮笑声从那里爆发出来。

我得常常回到这里，才能适应那一帮生活在高地上的小孩。尽管细胳膊细腿的，他们的身材还真健美，他们放牧着五六匹小矮马，白天在山上放喂，一旦发现有人闯入，便赶到地沟里藏起来，晚上，则把它们关在岩洞里，一到星期天，他们就赶着这些马到博盖塞别墅的游乐场。

“你叫什么名字？”

没有回答。

“你呢？”

同样的拒绝。

没人愿意告诉我他叫什么。他们本来就不太饶舌，对我的问题更是报以一种固执的缄默。就连他们之间的交流，大都也是靠单音节的吆喝。一个人需要吸引同伴的注意了，便用外号来叫他：黑猫，鹰头，绿眼，羚羊。他们带着一种如此的嫉妒，对我小心隐瞒他们的身份，我只能把这种嫉妒心看做他们扮演印第安人的一种渴望。兴许，就像皮耶特拉内拉的那位西西里人拒绝让人拍照，唯恐照相机会偷走他的形象那样，他们也担心，一旦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就会丢失他们自身的一部分。

他们允许我跟他们一样席地而坐，但不允许我参观他们的茅屋。茅屋有茅草铺盖的尖顶，柳条木编织的板壁，很像是小小的圆形的维斯太神庙[①]，而后者用芦苇和干草盖成，从罗马建城以来，就有一帮处女专门守候着，维护着神圣的灶火。罗马人把它看做对他们乡村起源的回忆，即便在最辉煌的帝国时代，也从没想过要以一种耐久的建筑来替换这一原始的圣殿。

大约四月中旬，一些神秘的准备活动就开始了。一看到我走近，一个在小径中放哨的窥视者就把手指头含到嘴里，打了个呼哨。他们便从山岭中的四面八方跑到了谷地中央，阻止我去看摆在茅屋前草地上的某种东西。那玩意看来又重又脆，被小心翼翼地抬到了里面。棚屋外边挂了两个铁环，门两边各有一个。他们把一根长棍子穿在圆环中，以示禁入。

夜间的一场风暴为我提供了第一个干涉的机会，因为，风卷走了一部分柳条木。

“你们为什么不压一些石头，来加固墙壁呢？”

他们朝我投来愤怒的目光。我心想，毫无疑问，他们以为我是在嘲笑他们小小的建筑。在这平台上，他们去哪里找石头呢？因此，我便赶紧补了一句：

“我可以帮你们把它们运上来嘛。台伯河畔有的是石头。”

---

① 维斯太是罗马神话中的灶神和家室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斯提。

这一次,他们甚至都不屑于回答我了。我看到,他们用干草和烂泥做成了一种植物粘胶剂,用来填塞被暴风雨捅开的洞。

我的第二次尝试也成功不到哪里去。

渐渐地,他们也变得不那么粗野了,有一天,他们把珍藏的一个宝贝拿来给我看。我不得不抑制住冷笑。这是一个很旧的三足陶土鼎,四周尽是裂口,这样的一个盛器——像是用来装食油的带把的细颈长瓶,又像是来自一个蹩脚厨房的汤罐——即便一条腿都不缺,依然没有丝毫的文物价值。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在掘碎片层时从地里挖出来的。瞧他们一副自豪的样子,就仿佛这玩意是在庞贝城的灰烬底下找到的一个带有鲜红和白色条纹的亚宝石杯子,总之,他们爱不释手地端详、抚摩、监视着这个器皿的残骸。

为了让它站稳,他们往它粗粗加工的侧腰底下塞了一小块砖,那里,陶工留下的指纹依然清晰可见。这瓦罐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年代:是手工制作的,远在陶泥转车发明之前。

他们对我无声的临场渐渐习惯后,就告诉我说,每年同一时节,他们都要在这个陶罐中点燃一种炭火。他们在茅屋中堆放了不少干草、松树皮、碎木屑、柳条丝,还有木炭,作为储备,慢慢地一直使用到夏天。见到他们那个瘸腿的器具后,我当即叫嚷道,我家里有一只更适用的大盆。他们勉强听我描述了妈妈从卡萨尔萨带回来的小铜锅。之后,他们便朝我扭过背去,那神情分明是受了冒犯。直到很晚,我才明白了,他们点燃一个火种,让这火尽可能长时间地燃烧,其实并不是出于孩子气的趣味,要看红彤彤的炭火,而是想继承那些他们还不明白其神秘涵义的行动,跟罗马最古老、最神圣的崇拜挂上钩。在维斯太的时代,贡物是摆在黏土烧制的粗糙盘子中献上来的,甚至,当帝国时代的罗马城以奢华和炫耀代替了远古时代的质朴粗犷时,这一习惯依然不变。拉丁姆的保护女神应该满足于一种朴素的盛器来装她的食物,而奥古斯都和提比略[①]的臣民们早就在用水晶杯子喝酒,用黄金盘子庆享他们的盛宴了。

点火的那一天到了。娃娃帮中的老大从茅屋中出来,带着两块木

---

①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8),古罗马的第二代皇帝,是奥古斯都皇帝的养子。

头，其中一根是一头削得尖尖的棍子，另一块是钻了一个洞的木板。“羚羊。”我听他叫唤道。两条长腿，又细又光滑……一绺头发斜斜地耷拉在额头上……鼻子周围满是雀斑……不，我无法细细地描述他，无论是他，还是任何别的孩子。真是奇怪的现象，我根本就不敢正视他们的脸，也不敢把目光久久地留在他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上。我仿佛觉得，假如我把他们看成为小伙子，那么，一种魅力将会丧失。他们并不完全是尘世中的人，而我，全靠了他们，我也高尚地升华了，远远地超脱了我的习惯，我的激情。我变成了另一个。他们坚毅而又严肃的小脸禁止我朝他们微笑，寻求让他们开心。我回想起来的，更多的是他们的嗓音：清脆的、银铃似的、天使般的，这脆弱而又尖利的嗓音穿越了谷地，激起水晶般的回声。当一人唱起歌来时——那是某种牧歌，经历了多少个世纪而一点都不走样，就像在准备点火时唱的那种原生态的摇篮曲——那些透亮的音符中，总是有一个音与众不同，格外高，格外尖，然后，又有另一个嗓音冲天而起，仿佛要融化在天空中，要跟非凡的苍穹蓝天一起成为一种唯一的音乐。

我陶醉在这些纯粹之音的华彩乐章中，它们和谐地升而又降，降而又升，最终停栖在高音的巅峰，在美与惠的不稳定的一瞬间。当羚羊把他的木块放置好时，最后的音符消散成了一个清凛凛的颤音。这一因其古老而显得素朴而又高贵的钻木取火仪式的每一个细节，全都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他两脚踩定了木板，把棍子尖头插入小洞，飞快地转动着木棍。他的同伴们蹲成一个圆圈，紧紧围绕着他，挥舞着干草团和树皮。不等火星飞溅出来，他们便急不可耐地大口吹气，贪婪地监视着微光的闪现。但是，那一天，他们的尝试没有任何结果。没有一个人接替羚羊，没有一个人再来试验。大地的潮气毁了他们所有的努力。

幸亏我没有炫耀我的火柴盒。我让头两次尝试都归于失败，但是，就像在童话中那样，主人公的创举总是第三次才算数，我克制了自己，没有为他们提供工业磷火的平庸帮助，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他们准许我仔细观察这两块木头。我凭借跟斯温在一起时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林业知识，确凿无误地证实，扎有小洞的那一块木头是杨树的根，而另一块则来自更坚硬的花楸树。我对他们说，他们没有选两块

同一树种的木头，而是选了一块尽可能的坚硬，另一块则质地柔和得多，这样做很有道理，这就使棍子能更容易地钻入，使它在与另一块不太硬的木头的摩擦中能更快地起火。

他们第一次朝我露出了笑脸。他们的许可让我胆子大了不少：

"不过，"我继续道，"你们忘记了很简单的一小招，它会帮你们得到火焰。瞧仔细了：你们一开始要慢慢地在洞里转动棍子，要把所有的力量都压上去。一小堆的锯末会在旋转的尖头附近形成。只有在这一时刻，你们才该加快转速。木屑便会自行燃烧，并点燃干草。"

羚羊赶紧迈动细腿跑上来，阻止我把演示做完。他从我的手中一把抢过两块木头，生怕我要偷夺他的头功。但是，这一次依然如故，因为昨夜的雨一直下到清晨，火星一接触到潮湿的木屑，便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

"啊！我有主意了，"我继续道，神色有些腼腆，以便让他们更容易地接受我的建议，"你们要不要我拿一块火绒来？小小的一缕就足够了。"

我说话时不是没有害怕，我那嗓音在他们银铃般的金嗓子当中显得是那么粗俗，那么平庸。他们并不回答我，既不说是，也不说否。第二天，当我带着火绒来到时，他们静静地围住了我，准备用他们明亮的眼睛跟随我的每一个动作。

"等你，"我对那个已经站好位置准备打钻的老大说，"等你钻得越来越快时，得有另一个人跪在旁边，朝火星吹气，让它触到火绒。"

我倒是期待已久呢，不过，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让我履行这一项任务。他们生生地把我排挤在外，就仿佛在关键时刻，一个成年人的参与有违他们不成文的规矩。团伙中的另一个孩子，看来是二当家的，早已从圆圈中闪了出来，他五短身材，健壮的肌肉表明他兴许过早进入了青春发育期，但是众人却发出了表示不满的喃喃声。"不要你……不……公牛，你不能……"尽管他肺活量大，呼气惊人地充足，尽管他意志坚定得连脸上的横肉都在抽搐，事实是，"公牛"没有赢得任何结果。一道发蓝的微火一瞬间里给火绒镶了一道边，然后就冒出一股烟，熄灭了。这时，他的同伴们便用短笛般的嗓音，异口同声让他退下，派出所有人中最年幼的一个来接替他，一个柔弱的孩子，但目光纯洁，被人叫做"绿眼"，尽管他虹膜的颜色毫无疑问是栗色的。他鼓起圆圆的腮帮子，终于

从嘴唇底下吹出了一束娇艳的火星，最后，一朵相当警觉的火焰胜利地跳出来，流到干草上，再从那里传入了三脚鼎内部。他们马上把瓦罐带回到茅屋，关上房门，在门扇的两个圆环上插上横棍。

我还记得弗留利地方至今仍然保留着的那种习惯，假如一个姑娘把灯芯有些碳化的蜡烛成功地再行吹燃，那么，它则认定，那姑娘是个处女。假如情况正相反，则说明，她贞操的丧失已经剥夺了她的创造性精力能源，尤其是生火的能力。

一天早上，我来到那里时发现，这一天跟平日很不一样。孩子们扫干净了谷地，铲走了一堆堆马粪，用彩条点缀了茅屋，还把小矮马的毛刷得干干净净，它们灰色的皮肤上披了一层本色的长毛，如同衣裙上的流苏，像银铠甲那样闪闪发光。这些马膝弯紧绷，口鼻前伸，原地打转，不耐烦地直刨蹄。黎明的最后一片球状云彩飘向了阿尔巴努山那边。天空碧蓝如洗，干冷干冷的空气似乎在噼啪作响。三脚鼎被隆重地抬出了茅屋，在众人的护送下，一直抬到了谷地中央，底下垫了一块小砖头。绿眼走在头里，一抱喷香的枝条紧贴在胸前。从他的嘴里，升起一种仅仅只有两个音符的单调旋律，高高低低地变着调，众人则跟着他齐唱，这旋律突然来了一个高八度跳跃，然后消失在了九霄云外。木炭散发出一种浓浓的黑烟。他们往炭火上添加了一些青松和月桂的干枝。浓烟冒过之后，一团旺火活活地升腾起来。让马群穿越火焰的时刻来到了。小矮马们被人拉动缰绳，小跑着，一匹接一匹地从三脚鼎上方一跃而过。只有快马加鞭后冲锋般的奔跑声，还有当它们越过火焰之帘时惊恐的嘶鸣声，才偶尔打破一下谷地上本来的那一片安静。

然后，每个人都空手抓住鬃毛，一跃而上跨上马背。既无鞍辔，又无镫子，他们的平衡技术叫我拍案称绝；实在是一种与动物之间深切交流、心心相印的证明，也是一种长期训练的结果，要知道，每天清晨与黄昏，他们都要骑着光背马，在荒凉的高地上驰骋一番。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我在玛莫罗桥的那些朋友中，能有一个人以一种如此温柔的同谋关系，跟他的摩托车如此切实地融为一体。他们低声细语地夸奖着坐骑，亲吻它们的脖子。对那灌入耳朵的喃喃称赞，那融到鬃毛上的轻轻抚摩，那落在屁股上的友善拍打，小矮马则摇动尾巴，报以感谢。它们扬起

前蹄昂首挺立，面对太阳翩翩起舞，但动作做得不急不躁，生怕把背上的骑士掀落下来，只是以一种足够的力度，让骑士为自己的灵巧而骄傲，然后，它们便撒开四蹄，在劈啪作响的炭火之上腾越。

我到底位于什么地方？身处哪一个世纪？这些孩子，其生活经验仅仅局限于星期日在博盖塞别墅各个花园中的漫步，而且每天晚上都在泰斯塔乔山脚下的岩洞深处睡觉，他们到底是从什么奇迹中观察到两千年以来早已绝迹的古老仪式的呢？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意大利？那还是一个人类的星球吗？当我撩开还没有一个成年人的脚步留下过印痕的那丛荒草时，我的双脚是不是还踏在地球上？在这一串银器般清亮的歌声之后，在最后的音符拉长到唯一的急速经过音群之后，我是不是被带到了世界之外，就像一片过于细密的蓝天，只留下了一阵眩晕？

第二天，我有事得离开罗马。随后几天，我又杂事缠身无法上山。此后，我每一次想到要返回山岭上，便会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妨碍我成行：或者，一个好端端的响晴白日，一场大暴雨却愤怒地不期而至，或者，一个八杆子都打不着的朋友突然来访。当我开始扛起一架摄影机，准备拍电影时，我曾经发誓，要在泰斯塔乔山上拍摄一场戏。好不容易等到我有一天空时间，却不料汽车轮胎却放炮了。一开始，我还连连诅咒和叱骂这倒霉的运气，但是，随后我便看穿了其中的蹊跷，那是命运神的提醒。我乖乖地低下了脑袋，哀叹命运的无情。“不要再去那里了，”我对自己说，“你已经受到了警告。”“别去那里了，那不是任何人该去的。”替狗剃毛的那一位给我这样的建议。好吧，我就不再去那个山岭了。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这片悬于天与地之间的景色，更靠近云雾，更远离大地，将始终不为世人触及。不用泥车制造的瓦罐，不用石头砌垒的墙，只用自生之焰点燃的火，你是它们的王国。你是尚未变声的孩子们的天堂。每当春天来临，他们都一直用自己天真的仪式，庆贺美丽季节的复归，歌颂年岁时节的轮回；他们就是大都市看不见的守护天使，而城市却在一种谵妄的堕落中，慵懒地躺在他们的脚下，丝毫猜疑不到他们的在场。而我，任何的净化仪式都不会把我从我的命运中夺走，我只要回想起那些孩子在山谷中自豪而又野蛮的生活，就会感到自己在种种考验中变得无比坚强。

有多少次，我驾车沿着台伯河驶向圣保罗教堂和大海方向时，趴在

车窗上,瞧着那座山岭,它似乎又返回到了寂静和荒芜中。罗马每天都在滑向垃圾堆;金钱、成功、财富、享乐主义成了它仅有的神明。费里尼只需捡起这一片污泥就行,它自己就凝结在了《甜蜜的生活》的揭露性场景之中。很快,罗马人就得打发一只替罪羊去牺牲了。当我的脑袋搁在祭坛上,引颈就戮时,我还保存了力气抬眼望着那贞洁之山的方向。作为古老碎屑的一个大墓地,人们把它弃置一旁。它山顶上的狗尾巴草,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像一件神圣的外衣。有谁能知道,在这大堆碎屑中,会喷射出最后一股纯净的水源呢?

30

1955年7月:党的批评家们把我的书[1]拖到了泥潭中。"语言、情节、人物、背景,一切都表现出对人的一种轻蔑和无视,对现实的一种肤浅而又歪曲的认识,对多样化复杂真相的最混乱面貌的一种不健康的讨好。"(《团结》)"最近十年中,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是如何改变了成千上万年轻人的精神和心灵;那些在饥饿中成长起来的、处在社会生活边缘的人,是如何懂得反抗的,他们健康、自豪、坚强,充满了一种赎罪的意愿,同时,一切却在推动他们,从罪孽中寻找最简单易行的道路,跳出他们非人的生存状况:这才是必须讲述的东西。"(《复兴》)"我们否定方言的一切有效性,因为在今天,地方主义的经验已经让步了,在我们的历史中,它第一次让位给发展一种真正的民族意识。"(《当代人》)"P.表面上选择了罗马的下层无产阶级作为主题,但这种关注的实际内容,却是对肮脏、下流、腐朽和暧昧的病态趣味。"(《新生》)

7月21日:部长联席会议责成米兰的检察院出面起诉:"对良好道德的冒犯。"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把矛头对准了我。共产党人和基督教民主

① 指长篇小说《生命之子》(1955),写罗马郊区青少年的生活。

党人团结一致,向我发起了围剿。如同在卡萨尔萨,五年之前。换了另一个人,他兴许会因对抗法庭而自豪。我已经被埋葬了。我根本就不觉得自己生来是为扮演“遭诅咒”作家角色的。对我来说,“厄运”又激活了我对瓦尔瓦索纳的残酷记忆:千夫所指者实实在在的恐怖,有可能重新丢失谋生的饭碗,兴许还会被邻居们再一次扫地出门,让年老的母亲伤透了心。一个儿子被杀害后,另一个儿子又吃官司!无论如何,当着我的面,她把眼泪强咽下肚,只是眼圈依然红红的。我那些文学圈的朋友,你以为他们会明白我的焦虑吗?他们欢快地抓住机会,呐喊着反对愚蠢的书报检查法。

1956年7月4日,当我走进法庭大厅时,我感觉自己被推上了耻辱座。别指望从法官那里得到哪怕再平庸不过的辩护词。“当我将一条母狗拟人化的时候,我是想说,嗨,那些波尔加特年轻人常常活得如牲畜一般。如果说,我描绘了三个小伙子正在解决他们的身体需要,那只是为了联想一下,所有那些被撞见正在果园里偷果子的孩子都会寻找什么样的借口。”淫秽,咒骂,亵渎神圣?我宣称,我这样做已经考虑到了文献的精确性:我本来应该保卫一下玛莫罗桥地方流行的生动语言,同时猛烈攻击通过电影、广播和电视等手段在意大利举国上下泛滥成灾的官腔官调:道德慵懒与因循守旧的做派,对消费社会的最初滥用。

诗人翁加雷蒂因病无法前来宣读他的证词,便把证词寄了来。“放在这些年轻人嘴里的词,正是他们习惯使用的词,假如要像侍从骑士那样故作媚态地使用它们,则不免有些对抗真相的味道了。”我不得不违心地以一个点头示意,感谢了这位不在场伟人的代言人。当我听到卡尔罗·波[1]的如下话语时,我使劲控制着自己,才没有如雷似的暴跳起来,这位颇有影响力的天主教作家,在栏杆前肯定道:“这部小说有一种很大的宗教价值,因为它激励起人们对文盲和贫穷之人的怜悯。”我们走出了法庭。利维奥·加尔赞蒂和我被宣告无罪。至于书,在查封了一年之后,终于开禁销售。报纸呢?还算正直,在那个时代。我的清白得到了法官的承认后,也在报刊上广泛公布;没有恶意的含沙射影,也没有间接的攻击,而这样的做法,在此后成了一条规则。表面看来,我毫发未损。

---

① 卡尔罗·波(1911—2001),意大利文学批评家。

只有妈妈发现了，我的脸颊稍稍凹陷了一点，颧骨稍稍突出了一点。心越是温柔，它就越是坚强。

费德里科·费里尼跟我约定在拉丁门见面。他开上一辆白颜色的、长长的、庞大的、柔软的汽车，马上就飞速驶上了满是地下骷髅场、高架引水渠、废墟的公路。他开车时三心二意，只用一只手，而且眼睛老是盯着体态丰腴的过路女人，有十来次奇迹般地侥幸避免了撞翻在道上骑自行车的男孩，或者把人家连车带人压扁在一根石柱子上。他的另一只手则老是乱捋自己的头发，在那顶凹凸不平的巴拿马草帽底下折磨着一绺头发。我们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一路冲去，寻找一个外景地。他嘴里嘟嘟囔囔，像一头海豹那样直喘粗气，谈到要在电影城重建一片比那些只值几个小钱的古遗迹更真实的乡野。沿着阿皮亚古道，一路上坟墓太多，婊子却不够。只有考古漫步道才勉强入得了他那爱搜索、好怀疑的法眼。他正着手拍一部新电影[1]，打算在罗马的底层社会中摄制。他需要诉讼的轰动，黑色的光环，而我的名字正好开始闪耀出这样的光，这使他决意借用一下我的才华。是我撰写了夜间斗殴的那段对话，让卡比丽娅跟她的竞争者大打出手。朝拜神圣之爱教堂的那段故事也有一大部分出于我的想象。我曾在蒂布尔提诺认识一个残疾人，别人总是让他期待一种神奇的痊愈。当圣母像被抱在人们的怀中出现在烛光溶溶的教堂中时，他把他的拐棍使劲一扔。但是，神迹并没有出现，他却重重摔到地上，昏迷在石板地上。

我增补了另一组镜头：两个小偷开车在郊区的一段游荡。费里尼剪辑时把它删了。甚至都没有屈尊跟我商量一下。我愤然抗议。他眨巴了一下眼睛，轻轻拍了我一下肩膀，那样子，比一个东方君王赶走自己鼻子上的苍蝇还更温厚。他就是这样理解他助手们的“合作”：要温顺地为他服务，不要提任何个人建议，陪同他坐在白色高级轿车中去玩命冒险，站在斯坦达商店的出口，挑选体重至少一百公斤的群众演员。

但是，你怎么能朝杰尔索米娜和赞巴诺[2]的创造者发火呢？两年后，

---

① 这部电影叫《卡比利亚之夜》(1957)。又译《花街春梦》。电影中，女主人公卡比利亚是一个妓女。

② 这两个人都是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电影《大路》中的人物，杰尔索米娜是一个有点弱智的小女孩，赞巴诺是流浪艺人“大力士”。

他又要求我为《甜蜜的生活》写几段对话。你一定还记得电影快结尾时的那场狂欢吧,两个贝带的对话就是我写的。

随后,他得知我自己也准备拍一部电影,便主动建议为它投资。靠着出版商里佐尼的钱,他刚刚建立了一个制片公司,叫费德里兹。对我以及我的朋友来说,伟大的电影探险开始了。一连三天三夜,我在特拉斯特维尔区几乎不停地拍摄,也几乎没有吃什么,跟年轻的贝托鲁奇[①]一起,他刚开始他的摄影生涯,而我则开始我的导演生涯。那是一些试镜头,在正式合同签订之前先给费里尼看。改天我对你讲讲,我是如何满怀热情地学着摆弄摄影镜头,尽管我们的摄影机是最原始的家伙,演员是临时凑集的,胶片的质量是糟糕的,狭窄街道上时时传来可怕的摩托车声,而对我们这样一个业余摄制组,警察也没有禁止街上的拍摄。

教堂的台阶上,通过摄影机的特写镜头看去,衣衫褴褛的乞丐似乎跟《墨西哥万岁》[②]中的一个印第安贫民一样器宇轩昂。卷烟厂的雇工们一动不动地等在大门前,被魔法般的镜头变了形,重复的铃声不会让《愤怒之日》的神秘氛围逊色[③]。随后,我们就前往博提塞门附近的街区,那里贫穷肮脏的环境更适合我那位主人公的身份。对我来说,这是向第三位伟大的电影家致敬的机会,而我也根本不问一下自己,接受了种种彼此如此矛盾的影响的一部电影,是不是还能有自己的特色。对跳蚤市场上那些游方郎中,那些吹大牛的行家里手,我几乎不需要让他们提高嗓门,让他们放慢动作,不需要赋予他们日本武士那种狂妄自大的浮夸和有板有眼的严肃,要知道,《山椒大夫》[④]中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就复活在台伯河畔。当然,我说的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而不是出现在剪辑台上的实际结果,那只是我们粗略、不连贯的尝试。

---

①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1941—),意大利电影工作者,《末代皇帝》的导演。

② 《墨西哥万岁》是苏联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拍摄的关于墨西哥历史与文化的纪录片。1934年即结束拍摄,却直到爱森斯坦死后三十多年(1979年)才由他的助手亚历山德洛夫剪辑完成。

③ 《愤怒之日》(Dies Irae)是丹麦电影导演卡尔·西奥多·德莱叶(1889—1968)导演的电影 Vredens Dag(1943)片名的一种叫法。

④ 《山椒大夫》是日本导演沟口健二(1898—1956)的电影作品。

贝纳尔多——那时候二十岁,圆圆的大脑袋,孩子般的天真纯洁,这种纯洁一直保持到后来《巴黎最后的探戈》[1]大获成功之时——以一种天真的虔诚把剪刀递给我。有句话说得好:弟子应该否定老师。但是,这条智慧的常理却并不能阻止我在十五年后感到,我视为亲生儿子的这个人的离去,仍然还是一种背叛。

费里尼该答应资助我们的那一天,我独自出了门,坐到我那辆汽车(那辆著名的朱丽叶!我们以后会谈到它的)的驾驶盘前时,我的心跳得厉害。费德里兹公司坐落在十字架街上。我记得我在西班牙广场和奔跑街之间那迷宫似的小街巷中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停车位。看来,我还得重新拐到人民广场去。最终,我在鹅街上发现了一个空位子。我是那么心急忙慌,以至于好几次都没对准位子。就在这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回家来了,他就住在这条街的27号。他蹒跚着靠近了我的车门。尽管他只是下了一趟楼,去卡诺瓦咖啡馆喝了一杯咖啡,还是打扮得跟平时一样风度翩翩,漂亮的头发整整齐齐地向后梳去,中间只夹杂了几根银丝,领带夹从背心中显现出来。

"皮埃尔·保罗,你这是怎么啦?为什么这么紧张?"

"快坐到我的方向盘前,替我倒倒车!"

"什么?你在说什么?"

他把一只手搭在耳朵后。没错,他的耳朵已经很背了。但是,通常他听人说一半话就能明白一切。他的善良和智慧弥补了耳膜的功能。

"快坐到我的方向盘前,然后……"

我一下子就闭上了嘴,我想起来了,他有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只能驾驶一种经过特殊改装的汽车。

"什么?关掉发动机。说话声音再响一点。"

"费德里科在等我!要不,他就付钱给我,要不,我就只有去跳台伯河了。"

"行了,行了,"他说着,挠了挠他那偏长的脑门,"后天你来跟我们一起吃个饭吧。艾尔莎很想见你一面。她非常非常喜欢你,你知道……几乎

---

[1]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完成于1972年。

就跟喜欢她的那些猫一样！去卡帕尼那餐馆，母猪街。说定了？”

“后天吗？”

“因为，星期四我要飞往土耳其。你知道，是土耳其人请我去的！”他笑着补充道，“他们想问问我对穆斯林后宫的想法！到时候，我得写一篇关于《奇遇》[1]的文章……呜！……安东尼奥尼，你喜欢他吗，你？为一个月后要出版的《愁闷》[2]，给蓬皮亚尼寄一份媒体联系名单，再去一趟……（他凑在我的耳边，说了一个女人的名字）的家，还不能让艾尔莎知道了，没有的事！[3]去理个发，准备出席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那么，星期三见吧！”

我目瞪口呆地瞧着他，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卡帕尼那餐馆，是艾尔莎的新发现。别指望她答应过你的圣诞节火鸡！俗话说，老婆动笔写作，炉灶无精打采……太好了，”他匆匆地接上了话头，并不想装出把一种烹调才华跟两本天才小说作比较的样子，“就这样，她到处跑餐馆，总能发现一些新开张的。你来判断吧……那里只做块菰沙拉[4]……比布科餐馆做得还好！”

“块菰吗？”我说，郁闷的口气仿佛出自一个再也没有胃口、多吃一口就得反胃的人。

“白块菰，是只有在皮埃蒙特才找得到的那种！”

他惊讶地看到，我对这一令人垂涎的消息竟然无动于衷，他兴许还以为，我在抱怨他把我创作者的痛苦跟他美食家的愉悦摆到了同一层次上。

“你错了，你实在不应该轻视块菰，皮埃尔·保罗。你知不知道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在专门为他俩举办的宴会上说过什么吗？他们彼此交换的唯一的话就是：‘你喜欢块菰吗？’‘块菰？那么你呢？’他们若是知道有白块菰，那么他们的谈话就不会局限于这一问一答了，世界文学就将因一段更有实质性的对话而丰富得多了。”

---

① 《奇遇》是安东尼奥尼的一部电影(1960)。

② 《愁闷》是莫拉维亚的一部小说(1960)，由米兰的出版商蓬皮亚尼出版。

③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④ 块菰(truffes)又叫“松露”，是一种珍贵的蘑菇，据说，在皮埃蒙特地方发现的白块菰是美食家的最爱，每公斤价格都在一千欧元以上。

文学也好，烹调也好，都无法让我轻松愉快，他挺起身，皱起一道眉头，这熟悉的面部抽搐，表明他要表达一种不安的责难。走出疗养院三十四年以来，他就拖着他那条残腿，却没有一天允许它的折磨破坏他的胃口。真是战胜自我和礼貌待人的光辉榜样。"随你的便吧，"说完，就向我致了一个礼。

这样一个人，在他的书房里，有很多事正等着他去做呢，一篇电影评论文章要为《快报》杂志写，一份名单要为他的下一本书的发行补充齐全，一个秘密约会要跟一个年轻姑娘安排，一个招待会要去罗马最热闹的大使馆参加，一张飞机票要他拿着去伊斯坦布尔做讲座，而他居然还能有时间来问自己，被一只猪从阿尔巴橡树底下拱出土之后烧成的一盘海绵状的块根，是不是还能抹除一个忧心忡忡的年轻同行额头上那焦虑的皱纹，这样的一个人，文人墨客中的独一无二者，我尊重他，我欣赏他，尽管我不怎么喜欢他的小说。

他一瘸一拐地走远了，来到 27 号的门前，一下子就把钥匙插入锁眼中，头也不回地就钻进了门厅。

我没走几步，就到了人民广场。我首先经过玫瑰红咖啡馆的露台前，右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他们懒洋洋地坐在秋天太阳那温暖的金色光芒下。看到我从鹅街那边拐过来，他们马上就明白，我是来自何方，便冷笑着互相碰了碰胳膊肘。对这些没有读者的作家来说，任何其他理由都不能激起莫拉维亚对我在米兰的诉讼事件的关心，并为我辩护，只有一条理由还能刺激他，即希望通过跟一个丑闻作者的友谊，继续吸引大众的眼球。广场另一端，就在应该把我引入费德里兹制片公司所在的十字架街的街口，我发现，左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卡诺瓦酒吧的露台上，坐着的那群人正像往常那样，哇啦哇啦地大声聊天。他们也一样，面对着一杯焦糖色的尼克罗尼[1]，享受着罗马秋末季节醉人的魅力。他们以为我会在玫瑰红咖啡馆前面停步，便彼此打量了一眼，好像要问我一个理由，随后，看到我一面脚不停地走着，一面频频点头跟他们打招呼时，又不免有些惊诧，结果认定，我刚刚在我们的敌人面前冲开了一条路，行

① 尼克罗尼(Negroni)：一种鸡尾酒，以金酒、金巴利酒、甜味苦艾酒等配成，通常加冰块和橙片。

色之匆匆对他们来说是可疑的,动作之潇洒对他们来说是骑士风度的。

西班牙广场,我放眼望去,只见两侧对称的台阶上挤满了袒胸露背的游客,一群群奴颜婢膝的摄影师以及明信片小贩在忙着兜售生意,若是在十年前,他们可不敢如此抛头露面,那时,广场上的台阶还被来自南方的年轻移民流浪者用做宿营地。我这样说话可是问心无愧的,因为,拉蒙这样的小偷[①],他脸上的刀伤,他成为百万富翁的奇幻梦想,还有他末等贵族般的放肆无礼,这一切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殆尽了。哦,我真是怀恋那个时代啊,当时,我们在隔壁的烟杂铺论支地买香烟,把一支香烟撕成两半,每人吸一头,要知道,那时候,烟杂店的掌柜们居然还同意可以不必整盒地卖香烟呢!

31

费里尼站在一个钢琴吧边上,伸开双臂迎接我。"来点什么?日本的清酒?丹麦的阿夸维特[②]?还是莫斯科的伏特加?"要诋毁我的工作,再没有什么比他这间接的玩笑话更细腻的批评了,瞧他话中有话,分明就是在讥讽我对我所汲取的种种流派,以及对他为标志的风格的混乱认识。饮酒者如若无法在德莱叶[③]、爱森斯坦、沟口健二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还会显现出更多的决定吗?那些标签,分别饰有一个宝塔、一座枞木屋、一条熏咸鲱的图案,每一个都代表了我心中那些大师之一的祖国。"谢谢,我不喝酒。"我说,这引来了他一丝嘲讽般的微笑,而在我,则是一阵格外的尴尬。对我的那些尝试,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影射,只有玩笑般地嘲讽这么多胡乱接受的影响,这么一种不妥当的大杂烩。三瓶酒

① 见上文,这个人说他曾在电影《擦鞋童》中扮演过角色。

② 阿夸维特是北欧特有的一种烈酒,在丹麦尤受欢迎。

③ 卡尔·西奥多·德莱叶(1889—1968),丹麦电影导演。

又回到了钢琴吧原先的位置上。钢琴盖落下时发出的清脆声音，为我的种种希望敲响了警钟。费里尼既没有支付一里拉违约金，也没有给一句解释话，就给这件事画上了句号，他的脸上也没有丝毫难堪的神情，又去挖掘一盒异常巨大的瑞士巧克力。他几乎没费什么时间，就拆下了盒子上的彩色包装纸，抽出很宽的一条，饿虎一样扑上去就两块两块地咬，然后，他放下了糖果。

他带着我参观费德里兹公司，一间接着一间，为我展示那些崭新的设施，挂在墙上的法兰绒布料，装饰性家具，蓬泰科沃[1]的灯。“你欣赏我们这暴发户般的豪华吗？”我便开口跟他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停止吧！”这时候他叫了一声：“禁止嘲笑！假如你坚持要拍一部电影（听到这句话，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你就得迎合当下的趣味。我刚刚聘用了阿努克·艾梅和克劳迪娅·卡汀娜[2]。你认为她们会同意坐赞巴诺的那辆破得快散架的三轮车吗？说到底，你自己，你究竟有什么样的车子啊？”我的回答似乎令他满意。他对我谈起了意大利人的“新的敏感性”。观众希望看到更昂贵和更奢华的电影，新现实主义电影已经过时了，我知不知道，从现在起，罗马市的电话比巴黎还要多了呢？

“快瞧一眼这个图表，”他从一个有机玻璃的矮几上拿起一本杂志，塞到我的鼻子前，对我说，“六年前，当我拍摄《大路》时，人们在意大利消费二十七万吨液化气。而今年，消费量上升到了七十万吨！这几百万个额外的煤气罐，为意大利妇女节省了几亿个小时点火生炉子的时间！”

他被这无以计数的大腹便便、铮光瓦亮的瓶瓶罐罐的伟大幻象抓住，从衣兜里拿出一支铅笔，在杂志背面画出了好几排密集的阿吉普煤气的盛器。

“这几百万意大利妇女，拿她们在厨房中节省下来的好几亿小时的时间来做什么呢？米兰市已经想到了她们的这一问题。市政府提前三个月预订了两百六十万个灯泡，为圣诞节的照明之用！你知道还有什么吗？我们要砍伐芬兰和挪威的森林，为所有家庭提供圣诞节松树！圣诞马槽早已经过时了，我亲爱的。过节不再是围绕各家的炉灶转悠了。人

---

[1] 吉罗·蓬泰科沃(1919—2006)，意大利电影导演。
[2] 阿努克·艾梅(1932—)，法国女演员。克劳迪娅·卡汀娜(1938—)，意大利女演员。

们现在得走出家门，去消费，消费，再消费！沉醉于购买毛皮大衣和珠宝戒指！大瓶大瓶的威士忌，大勺大勺的鱼子酱！以公斤计算的肥鹅肝！这足以让那些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针叶林木令人目瞪口呆轰然倒地，谁叫它们离开冰天雪地的静悄悄的北极圈，而到这香槟酒、汽车喇叭和鞭炮声中来过圣西尔韦斯特日[1]呢！”

面对这一番滔滔不绝的话语，目瞪口呆的，是我。

“啊！啊！钢琴吧是不会让我爷爷高兴的，他喜欢把他的啤酒瓶搁在阴凉的窗台上。星期天，他套上小破车，把我们带到凹凸不平的路上，在英国山楂树的树篱之间……真见鬼！”他拍着大腿叫嚷起来，“我可正在变得柔情绵绵！不要再回忆童年了，皮埃尔·保罗！你该不会让我背诵古时代的那些哀歌吧！只有未来才让我们感兴趣！”

“当然，”我结结巴巴地说，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我并不否认……但是，那些穷人，那些可怜人，就像我电影中的那个主人公，他们还是既没有肥鹅肝，也没有鱼子酱！”

“在里米尼，我还记得那个乞丐，不完全是个乞丐，应该说是一个流浪汉，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总之，是这类人中的一种。法西斯当局很关心他的情况。‘这里，在我们的城市里，不应该有垃圾人！’他们给他提供一种社会福利，让他洗上一个热水澡，给他换上好衣服，他被指派去点燃狂欢节的灯火……什么？那是什么？”

一个女秘书在走廊尽头朝他做手势。

“不，我已经重复了一百遍。现在不接受采访。谁都不见。谁都不见，你听见了吗？他们执意不走？让他们根据我在戛纳说过的话去对付着编写吧！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他一边说，一边把我推进他的办公室。“啊，对了！‘不应该有垃圾人！’这个古怪人，他真是太可爱了。每年春天，人们都能看到，他手拿捕蝶网，跟在‘小手’[2]后面跑，那些植物雪花，像棉花一样又白又轻的絮片，它们三月份来临我们这里，在空中飘荡，一会儿上扬，一会儿下降，被一种神秘的引力吸引着，翩翩漫舞，却从不落地。那些法西斯分子，有多么愚蠢，你不觉得吗？”

---

① 圣西尔韦斯特日，12月31日，喻指“过年”。

② 这是一种假雪，原文意大利语“manines”，意思为“小手形状的东西”。

“没错,”我说,赶紧抓住这一机会。

“他们应该让他安静地生活,而不是让他伪装成市政环卫雇工。”

“费德里科……”

“请坐。我真该好好抽它一支帕塔嘉斯[1]。你愿不愿意在我的下一部电影里再帮我一个忙?你知道,贝带的那组镜头,人们都觉得非常成功。很棒的对话。来吧,来瞧瞧这些草图,不知道它是不是能吸引你。”

他把为《八部半》[2]而画的一系列画稿在我膝盖上展开。只见笔触洒脱,画面奇特,梦幻般的非现实色彩底下透出了淡淡的水粉影子。它把我们带到很远,远离了他那些亚德里亚回忆中乡野的和大众化的背景,也远离了我电影中的那些陋室和叫花子,而走向了一个富有而美好的世界,纯粹的魔幻境地,鲁道夫·瓦伦蒂诺[3]在其中是不会感到不自在的。温泉疗养者穿身白色衣服,漫步在一个梦幻般的泉水之城中;后宫的姬妾们在紧闭的大门底下挥动她们的面纱。

“我要向你透露一个秘密,”他阖上了小册子,把我拉到门口,对我说,“但是,你就不要再给我外传了,行吗?”

他以一个高级教士具有的润滑感,滑动在大理石方砖地上,他那东方人一般的茶褐色眼睛落到袒胸露背的女秘书们身上,一旦当我像是要打开写满了数字的笔记簿时,便以一连串新的数据打断我,实际上,那些数字只是我可怜兮兮的预算表。我那副样子,活像是一个乡村神甫,前来向他的主教汇报一个未婚母亲的可悲情况,并被彬彬有礼地打发走,临走时带走教廷的一句小小闲话,作为跑腿的奖赏。

“猜一猜是谁帮我的《甜蜜的生活》赢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让你猜一千次你也猜不着!西默农,评委会主席。一个比利时人!是他影响了最终的决定。一个就着炸土豆吃蛤蜊的人[4]。”

---

① 帕塔嘉斯是古巴的一种品牌雪茄。

② 《八部半》是费里尼的一部电影(1963)。

③ 鲁道夫·瓦伦蒂诺(1895—1926),又译“鲁道夫·范伦铁诺”,意大利裔的好莱坞电影演员。

④ 西默农(1903—1977),比利时著名作家,擅长侦探小说。而炸土豆配蛤蜊是比利时的一道名菜。

说着,他拍着我的背,把我推到了过道中。他手扶栏杆,一直送我到楼梯下,一阵笑声是那么响亮,清脆,幼稚,随着我的脚步滚下皮佩纳熔岩石台阶。"啊!啊!炸土豆配蛤蜊!炸土豆配蛤蜊!"意大利兴许跟比利时开了一个大玩笑,因为这一次它毕竟在民族虚荣心上赢了对方一头,这比经常雇佣它的移民来做矿工要强得多,但是我自己,在1960年10月4日这一天,当我的脚重新踏上十字架街的路面时,我实在是身无分文,连一米胶卷都没有。我始终无法赢取一个制片人发善心,为我那些人物家里安装电话,要知道,他们连自来水、厕所、盥洗池都还没有呢!

我的头脑很清醒,没有把费里尼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再加到烦恼(其实何止是烦恼呢)的卷宗中来,很不幸,米兰的案子了结之后,我又一次成为那些司法卷宗的对象。那年冬天,另有三场诉讼在等着我:分别涉及我的第二部小说、帕尼科街的事故,还有安齐奥案件。此外,我好不容易才刚刚摆脱了由卡拉布里亚区库特罗镇镇长提出的对我诽谤罪的起诉。

1959年夏天,米兰的周刊《成功》派我当记者,沿着意大利沿海地带做报道。我的同胞们开始发现大众度假的真相。我描绘了我的所见所闻:被污染了的海滩,声如雷鸣的投币自动电唱机,阳光与游泳衣共同结果之下的家庭伦理的风化,为其英语名称teddy-boy[①]而自豪的阿飞帮,尽管外穿电子颜色的上装,内中却依然是一颗小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的心。在卡拉布里亚区,让我震撼的是村庄的匮乏、海滨的荒凉、年轻人的忧伤、禁令的分量。这一下,整个的南方报刊给了我一顿乱棍("走私的记者"、"蜕化的意大利人"、"夸夸其谈的吹牛家"),而旅游国务秘书则给了我一番告诫("误入歧途的头脑"开玩笑地想"诋毁祖国唯一的和不可分裂的整体")。毫无疑问,一种强烈的同情心启迪我写出了有关一个外省的荒芜与悲惨的那几行文字,这个省份在公元前5世纪时还是那么欣欣向荣,后来却像阿拉伯人治下的西西里或诺曼人治下的普利亚一样,再也得不到令人强壮的历史之风的光顾。

① 有人把它翻译成"古惑仔"。

11 月 12 日，共产党人执政的卡拉布里亚地区克罗托纳镇奖励了我的第二部小说。从塔兰托到科森扎，引起了公愤。跟克罗托纳相邻、却由基督教民主党人执政的库特罗镇的镇长，选择了这一时刻向司法机关提出了起诉。很有必要回头审视一下他的动机。雷焦[1]在我看来实在贫穷得不能再贫穷了。“人们简直以为还是在描述波希米亚人的一个宿营地，而实际上，那是意大利最甜美的城市之一。就像所有的其他城市那样，它也在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繁荣，但是，在它高高临于海峡的奇妙海岸上，在它明亮街道的光芒中，是不是透露出了让 P.感到痛心的忧伤之感？”“一个非洲部落的女人：对 P.来说，在我们民风如此细腻的塔兰托地方，在我们海军舰队的这一港口，在我们造船业的这一著名基地，精明能干的女公民们竟然是这样一副形象。”“库特罗具有崇高价值的居民的声望、名誉、高贵和尊严，都遭到了明显的和严重的践踏。在一个个黄色的沙丘——这是该记者使用的另一个非洲意象——上，冒出了成百座干净整洁、色彩鲜艳、充满快乐的小房屋，残废军人办事处的房子。南方勤劳的人们，卡拉布里亚区、库特罗镇的人们，忠诚于圣经的严格规定，靠着抛洒额头上的汗珠来挣自己的面包，而不是靠着耍笔杆，写一些诽谤自己兄弟的文章来混饭。”

教会（“忠诚于圣经的严格规定”）和军队（“我们海军舰队的港口”）也对我露出了尖利的牙齿：但同时还有旅游部门（“奇妙的海岸”），这股比前两者更可疑的新势力，靠着“旋转木马”这个电视广告节目，开始每天都向半岛从南到北发出十五分钟有教育意义的建议。有关如何洗牙齿、如何设宴待客、如何选择吸尘器和洗碗机的牌子、如何向一个女人说恭维话：而这最后一个建议，尤其是针对南方的男人们的，他们至今仍听命于一种无声而又野兽般的贪婪，足以让外国女人望而却步，闻风而逃。人们同样也没有忘记他们那肥胖得身材走了样的配偶：那些美食烹饪的方子，那些衣着打扮的技巧，首先都是说给谁听的，难道不是这样一些女人吗，贪吃肉末和执意穿一身黑衣的习惯，使她们在维纳斯诞生的海岸上成了滑稽可笑的丑婆娘？

---

① 雷焦是卡拉布里亚区的一个地方。

总之，我们民族的新征兆向每个人指明了如何自我打扮，自我准备，努力在卫生、潇洒、礼貌和风流方面下功夫，以迎接一个跟雷焦的街道一样“光明”的未来。当然，用不着在此指出，这些各有不同变形的目的，并不是为当地人带来更多的幸福，而是，很简单，在他们的领土上增加防晒霜、墨镜、碳酸型饮料的销售量。产品制造在北方，那里的人们希望，一旦好几百公里长的南部海岸“文明化”，并归入欧洲风俗的行列，那么，来自米兰、巴黎、苏黎世、法兰克福的旅游者们便会成千上万地拥来，为海滨工业提供一个前景远大的消费群。

库特罗镇镇长通过对我的某句话断章取义，毫不犹豫地歪曲了我的意思。完全是那些只会贬责，不懂争论的人的典型做派。你一定能想到，我是决然不会随意使用“非洲的”这个形容词的，除非带有一种赞扬的意图，我这样一个人，随时准备在第三世界这一边为我那些失去的波尔加特寻找一片代替的土地。“爱奥尼亚海不是一个我们自家的海，”我这样写道，“它的波涛翻腾于希腊和埃及之间，拍打到我们的海滩上，让我们听见了东方之地充满旋律的喧嚣。”兴许，这是牵强附会、矫揉造作的赞美，但毕竟是赞扬，所有人都能明白的。而在镇长的讲话中，人们却只能读到我的句子的第一截：“爱奥尼亚海不是一个我们自家的海，”紧接着就是这一嘲讽的解释：“那就把它给俄罗斯吧，对报道的作者来说那么宝贵的国家！”由于这一卑鄙勾当，我恐怕会失去某些渔民的尊重，因为他们天真地把自己跟他们的海岸、他们的船只、他们对加里波第[1]在阿斯普罗山[2]的回忆捆绑在一起，但是，人们无法否定，这毕竟是雪上加霜，好比一副正在收拢的镣铐上又扭紧了一圈螺丝。

至于党的那些代言人，根本不可能指望我在克罗托纳获得的文学奖会让他们变得温和一些。我的第二本书，讲述皮耶特拉拉塔一个轻罪犯人的历险，以及他千方百计地重新投入政治生活的努力经过，遭到了跟第一本书一样狂暴的攻击。在《复兴》上，他们指责我轻视我的主人公，罪恶和淫荡的渊薮。“这就是一个成了共产党员的年轻罪人。因为没有钱，他进入了一个声名狼藉的电影院，靠近一个他认出是贝带者的家

① 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著名领袖。
② 阿斯普罗山是卡拉布里亚区雷焦地方的一座山。

伙,让他为自己手淫。他要对方付五百里拉,还没忘了使用暴力强迫那家伙吐出钱来。这一切还不足以激怒你们吗?"

需要强调的是,文章的作者是共和国的参议员,每月一笔丰厚的收入确保了他衣食无忧,不必"下贱地"去强行勒索一个"可怜虫"要一口饭吃,然而,这位马里奥·蒙塔尼亚纳接受的良好教育和大学文凭,并不能阻止他就"贝带者"一词的意义犯下大错。

被"激怒"的,按照党的机关刊物的说法,还有天主教行动会。强烈谴责我的小说。预审法官只是在听取了天主教人士、罗马大学历史学教授库托罗博士[①]细致的报告之后,才放弃了调查追踪。一个月的工作,三十天用来检查书本,谨慎的顾忌让人们为他付出了七万六千里拉——比进一次火车站附近电影院的价钱要贵上一百五十二倍——最终得出结论,书中描绘的风俗冒犯了读者的趣味,不过并没有使他们产生模仿的欲望。"我们现在已经通过新现实主义的电影和小说,习惯于接受一些卑贱下流的东西,而我们的前辈却会惊慌失措地将它们推开。"

这一回总算不予起诉了,但是,通过对媒体进行筛选(为什么要把我的时间浪费在报纸上?你会这样对我说),我发现,我的公众形象已经遭受了轻微的却又含义深刻的歪曲。我不再仅仅是一个丑闻书作者了,我还是一个兴许本人就充满丑闻的人。"P.熟悉这个内部世界。"独立派杂志《快报》的文学批评家肯定道。怀疑之心到处在渗透:人们能够通过那么多的细节讲述一个底层者的生活,而不自己也参与到盗贼的罪恶活动中去吗?而当人们借口要把鲜花献给作家,欣赏他以如此精确的笔调,栩栩如生地描绘发生在克利斯多夫-哥伦布街上的一次对壳牌公司加油站的夜间袭击时,人们实际上是在偷偷地诱导读者问自己,一种如此恰到好处的精确度并不仅仅出于他的想象力。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32

1960年6月29日到30日的那天夜间。圣彼得日和圣保罗日交界之时。维多里奥-伊曼纽尔林荫大道。漂亮的谷地圣安德烈亚教堂,就在那地方,托斯卡曾来看望正在画作前辛勤工作的情人[①]。“马里奥!马里奥!”我对我自己吟唱着这两个音符,但是,现在,在我被漫长的晚会折腾得混乱无比的脑袋中,我自己名字的音节代替了画家的名字。“保罗!保罗!”这是有人在招呼我吗?“嗨!保罗!”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德国人”,特拉斯特维尔的一个朋友。他正带着一个同伴在游荡。两人在我的朱丽叶新车前欢欣鼓舞,要求上来坐一坐。“别超过五分钟,我都困了。”“好的,五分钟,就五分钟。”我们绕着纳沃纳广场开了一圈,驶过了科罗纳里街。在这条街尽头,帕尼科街的拐角,爆发了一起斗殴。在我车灯的光芒中,一群青年男女正大打出手。“这个人,是男爵,我认识他!”德国人嚷道。“那你快下车,把他拉上来,跟我们走,”我对他说,“快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拉开,万万不能让他们拔出刀来。我继续开车,像一阵龙卷风似的溜走了。清早七点钟,当我还熟睡在床上时,突然有手电照到我脸上,“起来,跟我们走,别犯混。”是在做梦,还是真事?我还一直在我的歌剧中吗?斯卡皮亚男爵当真要把我叫走吗?两个警察把我带到了局子里。很遗憾,那不是法尔内塞宫,而是圣卡米罗老医院附近一栋脏兮兮的房子。

我被指控为帮一个小偷逃脱警方追捕,“明目张胆,明火执仗”。有罪。媒体攻势。人们就我的私生活颇带倾向性地公布了一大堆细节。我

① 谷地圣安德烈亚教堂在罗马,它也是普契尼的著名歌剧《托斯卡》第一幕的一个场景。参见上文前注。下文中,马里奥即剧中的主人公画家卡瓦拉多西的名字。斯卡皮亚男爵则是该剧头号反面主角。

拥有一辆朱丽叶轿车,“白色的”,有的甚至说是“鲜奶油色的”,在这车里,我“展示肉体”。在场的有一些“最暧昧的年轻朋友”,我在“声名狼藉”的街上委身于一帮“夜游神”。帕尼科街恰好位于“小偷出没之地”的中心(桑德罗·佩纳,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就住在两百米远的地方:我刚刚在他家参加了一个晚会后出来)。人们注意到,我的生活开始跟我的小说相像起来。“小子[①]干得过了头”,一家杂志还以这句话作为文章题目。我为什么要参与打群架?我只需管好我自己的事就行了!而首先的问题是:一个正人君子会在午夜到凌晨一点之间开车行驶在罗马旧城的迷宫中吗?

一连好几天,文章铺天盖地;随后,诉讼连续三次宣告推迟,每次都预定了新的开庭日期。流言飞语,含沙射影,恶意诽谤。以至于,对法庭主审官向我提出的这样的问题,人们也根本用不着惊讶:“那天夜里,那么晚的一个时辰,你怎么还没回自己的住所呢?”当然,也不用对我那谎言连篇的回答大惊小怪:“我出来随便走走,我正在创作一部文学作品,要收集一下我对将作为我故事背景的地点的印象。”证据不足,免于起诉。我想窝藏的那个小偷,两个警察把他抓住时,正在自己家里稳稳当当地睡大觉呢,而与此同时,另一些警察在我家里将我抓捕!但是,早已连篇累牍地掺和其中的报刊,最终只用几行简单的判词草草了结了这一事件。用词甚至还那么模棱两可,就像向来以严肃而出名的《新闻报》上这段加有边框的短文:“法官们并不坚信该作家有罪。”

1960年7月10日。安齐奥,罗马南边的一个渔港。一些孩子蹲在防波堤上,朝礁石中投下他们的钓线。我走上前,跟他们搭讪开玩笑。我们观望着一条返港的船。然后,我离开他们去了餐馆。翌日,针对我的攻击就开始了。我得知,就在我走开后,有两个记者来到堤坝上询问孩子们,一个是《时代》(法西斯派)的,一个是《信使报》(罗马的最大日报,中间偏右)的。“刚才那位先生对你们都说了什么?”“他向我们指着船上的男孩,他问我们,他们有多大岁数了?”“然后呢?”“我们说,十二岁。”“就这些?”“这时候,他说:怪不得,他们应该有很漂亮的大鸡巴。”两位记者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觉得有必要马上报警。于是,对孩子们展开了调查、询问,准备以企图腐蚀未成年人罪对我提出起诉。后来,安齐奥的大法官也询问了孩子们。孩子们承认那两个记者曾这样对他们说:“我们会给你们一百里拉,但你们得把一切都告诉我们。”

法官哈哈大笑,狠狠叱责了那些写报告的警察,并结了案。但是报刊却变本加厉,再次跳将出来,絮絮叨叨得没完,肆意侮辱,大泼脏水。我的墨镜吗?我说我必须保护我脆弱的眼睛,却没有人认同这一点,反而说:“孤独的旅行者”很注意“在两片烟色玻璃后面”“遮掩”他的目光。餐馆吗?我并不是因为肚子饿了才进去的,如同所有人那样,而是因为我明白,我必须从防波堤那里“消失”,我得及时地“逃之夭夭”。人们一再强调这一“节外生枝”,离帕尼科街的“打闹”事件仅仅十天工夫。人们大声疾呼“困惑”,“不安”,“震撼”,人们劝我谨慎处事,小心为妙,并指名道姓地称我为罪人,配不上人们的尊敬:“不要滥用现实主义!”已经有一些怀疑滋生,说我本来已经从“语言上教唆”了孩子,现在又有了另一些非纯文学的目的。

正是在那年秋天,《博盖塞》(法西斯派)的一个记者抛出了一个新词,叫“皮埃尔保里得斯”[①]。按照“阿特里得斯”一词的模式构成,这长长的一连串骗子、杀人凶手和精神错乱者,从埃癸斯托斯到阿伽门农,从克吕泰涅斯特拉到俄瑞斯忒斯,的确是阴险而又凶残的阿特柔斯的忠诚后代[②]。自从费里尼逃避之后,我的电影停顿下来;我将需要一年时间完成摄制;但是,报刊社会新闻栏目的编辑们风闻了事件,他们似乎全都看到了一系列的冲刺。“皮埃尔保里得斯”将首先用来指任何一个在

---

① 原文为“Pierpaolides”。

② 希腊神话中,“阿特里得斯”(Atrides)专指阿特柔斯的后代,即阿伽门农(兄)和墨涅拉俄斯(弟)。阿特柔斯的一个兄弟堤厄斯忒斯勾引了他的妻子,事败后逃亡。阿特柔斯则杀了堤厄斯忒斯的两个儿子,并把他们的肉做成菜肴招待堤厄斯忒斯,表示和解。堤厄斯忒斯发现自己吃了儿子的肉之后,便诅咒阿特柔斯,称其后代必得报应。后来,堤厄斯忒斯的另一个儿子埃癸斯托斯果然勾引了阿伽门农(阿特柔斯之子)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两人还合伙杀死了阿伽门农。再后来,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又杀死了埃癸斯托斯和克吕泰涅斯特拉。而俄瑞斯忒斯弑母报父仇的行为又遭到了神的惩罚。

货摊上偷拿一个苹果的人，后来又有了一种违禁的意义，乱闯红灯，午夜后还在火车站前溜达：比传说中迈锡尼家族[1]的罪恶轻得多的罪，但是，在这些罪孽中，虎视眈眈的豺狼已经闻到了血腥味。

对此，只需耸一耸肩膀了事，当然啦。直到有一天，经过菜市场时，你知道我听见了什么吗？一个男孩帮他父亲从车上卸下成箱的茴香。若不是突然间，一个奇怪的、可怕的词打击了我的耳膜，我恐怕还不会那么早就知道，这种蔬菜在罗马城小老百姓中会引起何等的传统笑话。这个小男孩不小心把一箱茴香摔在了脚下后，便冲着那些 pierpaoli 发怒[2]。原话如此。暴力上升的一个新阶段。人们骂人时，常把我的名字挂在嘴边，代替了 finocchio[3]，这一新发现，你还记得吧，跟圣多明我最初的柴堆是同时代的。人们为安慰死于烈火中的我们，往柴束中扔一种喷香的燃料，它的名称应该跟我们始终十分贴切。

我越是把这种菜蔬方面的隐喻看得微不足道，就越是觉得这个新绰号卑贱下流。从菜市场开始，它渐渐地流传到了集市。它在台伯河畔冒头之后的第三天，就从花市[4]某角落的货摊后一个长舌妇沙哑的喉咙中喷射了出来。“快来买我漂亮的 pierpaoli！”她冲着一群不知什么人喊道；她没什么恶意，我愿相信她；她甚至都不知道还存在着我这样一个人；凭空抓住了这个词，从她儿子或丈夫嘴里听来的，现在，就放开嗓门把它嚷嚷出去，毕竟它是那么清脆悦耳，那么饱满，那么肉感，想一想，叫 pierpaoli 的货物卖得会更快，四个音节总比三个音节强得多。一开始，我听了还直想笑；但是，笑声收紧在了我的喉咙中，我感到浑身上下的神经都在颤抖，就像在射击场上放飞的鸽子，发现射手正在场地的另一端瞄准着呢。

秋天，卡尔罗·利扎尼[5]的电影《驼背人》公映了，讲的是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年轻盗贼的故事。利扎尼让我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电影被认为

---

① 阿特柔斯及其后代，一向就是迈锡尼的王。

② 指用皮埃尔·保罗这个名字(pierpaoli)来代替茴香。

③ 在意大利语中，“finocchio”指茴香。

④ 花市在罗马，又叫费奥里广场。

⑤ 卡尔罗·利扎尼(1922—)，意大利电影导演。

是在“替罪行唱赞歌”。似乎要为这一指控作证似的,一幅剧照表现了我正抱着一把冲锋枪左右乱晃。不予起诉。电影重又出现在银幕上,但那张照片却留在了报纸的档案室中,时刻准备重新派用场。如同对我罪名的一种证明,我的名字随时都会回到报纸的头版头条。十五年期间,他们在读者眼皮底下塞进了一个挥舞枪支的不法恶徒的形象,代替了一个写书的人的形象。

从此,无论我干什么,也无论我说什么,我的行为和言论均是寡廉鲜耻的代表。1960年11月5日:在我通常为共产党周刊《新生》主持的栏目中,我对仅仅赋予每家中父亲一人的所谓“父权”[1]的合法权利的行使提出了异议。假如他是一个酒鬼,一个傻子,一个暴徒,为什么不剥夺他的权力,转让给家人指定的最有领导才能的那一位?母亲,或者长子?精彩!威尼斯的天主教报纸《新闻故事报》的社论作者高呼道。家庭民主万岁!人们可以确信,那个拍桌子拍得最响的人,知道怎么让自己被选上!假如他在家里是一件“黑色皮上衣”[2],或者更强,是我们的作家如此看重的那些生命之子[3]中的一个,那该多么幸福啊!让我们把家庭的领导权马上交给他们吧!

1961年10月30日。罗马的《时代》在第一版用以下通栏标题发表文章:“皮埃尔·保罗·P.被指控企图武装抢劫一个加油站”。《驼背人》的剧照,带冲锋枪的,配在文章上。我刚在圣费利切–西尔切奥的朋友那里过了一星期,那地方在罗马以南大约一百公里。在塞尔齐的陪同下,为我的第二部电影写剧本。一天下午,没错,我出门上路,沿着一座座沙丘,行驶在大海与萨博蒂亚湖之间。在阿吉普加油站小憩。“你能挣多少?”我问年轻人。还有其他问题,按照我的习惯。“那辆摩托车,停在外面的,是你的吗?你订婚了吗?”简洁的回答。小伙子把加油枪匆匆插入油箱,又埋头读他那本五十里拉的电影小说。他很不开心地为我拿来一杯可口可乐,我就趴在柜台前喝,一边喝一边问他,钥匙链和圆珠笔要多少钱。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转指“穿黑色皮夹克的阿飞”。

③ 原文为意大利语,这也是作者的一部小说的题目。

几天后，警察突然闯入我家，满屋子搜查，翻箱倒柜，把妈妈吓得半死。他们在找什么？一支手枪！十九岁的贝尔纳迪诺·德·桑狄斯前往宪兵队，跟他们讲了这样一个天方夜谭般的故事。凭着那辆朱丽叶轿车，他认出了他的“袭击者”。这个人，留下了一份小费后，迈着稳稳当当的步子走向出口；在门口，他停下来，慢慢地戴上了一副黑手套；然后突然转过身子，手握一支手枪；他当着贝尔纳迪诺的面，往枪里上了子弹，一颗金色的子弹。“不许动，一动我就开枪！”我当时是这样说的，说着，反锁上了门，靠到柜台前；我试图打开钱柜门，要拿里面装的两千里拉。这时候，贝尔纳迪诺抢过一把尖刀；而我，连连倒退，像一个懦夫那样逃跑，马上就跳上了汽车，直到最后一刻始终没忘记拿枪瞄准对手。

然后，就是《时代》的文章，报刊透露的内容，丑闻。《博盖塞》把我描绘成面无血色的木偶，“脑门隆起得过于突凸”，“滑稽的长裤”，“干瘦的小身板”。“颂扬污秽和恶臭的抒情诗人”，该不该让我继续留在自由中？我再三争辩说我从来不戴黑色礼帽，也从来不戴什么手套，无论是什么颜色的，但都无用，这些道具自动地就显现了出来，如同那把想象中的手枪，还有那金色的子弹，完全是时髦的美国连载小说的那些套路，我就这样被带到了法官面前。诉讼于第二年 7 月在拉蒂纳开场。我在我的书中描写暴力了吗？由此我是一个暴力者。我笔下的人物不是袭击了壳牌公司的加油站了吗？我自己袭击了这个阿吉普加油站，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天衣无缝。我还要冲他们劈脸叫嚷，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一个礼让的人吗？我要对他们说，在童年时代，我连捉住一只苍蝇后，都会仁慈地放生吗？我要说，我在福尔采拉[1]玩纸牌，在巴勒莫海湾溜达时，衣兜里连一把小刀都不带的吗？

毫无用处，因为诉讼已经启动了另一种进程。菜农们的叫嚷，从中央菜市场出发，传播到了罗马的各个集市上，并从那里传播到了罗马的乡野，它现在像一阵愤怒的声讨，已经飘荡在了整个意大利的上空。没人胆敢提一下法律上并不算轻罪的东西，但所有人都在想着它，所有人都希望以此罪名来惩罚我。加油工的律师们，谈到了要把因“腐蚀未成

① 福尔采拉是那不勒斯的一个街区，治安较乱，黑社会猖獗。

年人”之罪名的卡萨尔萨的那次诉讼,跟因“企图腐蚀未成年人”之罪名的安齐奥的那次诉讼并入卷宗(要求并未被采纳,两桩案件的归类并无关联)。法庭主审法官问贝尔纳迪诺(他早就是成年人了):“P.兴许还提出了让你觉得难为情的建议?”小伙子却立即反驳道:“不!他没有提出性方面的任何建议,任何形式的都没有。”对这一回答,无论是谁都会明白,法官事先就作了策划,以便让法庭辩论走向对我不利的局面。不然,这个糊涂虫又怎么会一下子明白法官委婉的影射呢?然而,他还不至于愚蠢到会不知道,一种肯定的回答会让他的男子汉气概永远处于令人怀疑的境地。从中,你可以看出漫画和照片小说的影响。曼德拉克[①]和超人启迪了贝尔纳迪诺的这一声“不!”,正是这一声强有力的否定,保住了他的名誉完好无损。

“这两者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老抵抗者昂里科·玛泰[②]的报纸《日子》的报道这样认为。拉蒂纳城——《意大利世纪报》继续以它的法西斯主义名称称呼它:利托里亚——当初由墨索里尼创建,以期成为正趋于干涸的蓬廷斯沼泽区的行政中心,它现在会不会启发法官们一种不自觉的严厉性呢?尽管对我的罪行很有怀疑,他们觉得还是应该好好惩罚我一下。因“武装威胁”,十五天监禁,缓期执行。这么说,他们没有听信贝尔纳迪诺,他指控我是“企图武装盗窃”。我因滥用枪支罪遭到五天追加监禁,另外还因隐瞒不报拥有枪支而罚款一万里拉。这把神奇的手枪,是照《驼背人》中的冲锋枪推理出来的,纯粹无中生有。要等上整整六年半时间,才能有另一个法庭宣布因证据不足而定我无罪。六年半期间,报刊始终兜售着一个能发射金子弹的武器的神话。人们将建议阿吉普的母狼,以一种跟哺育罗马创造者雷穆斯和罗穆卢斯[③]同样的细心(反正右派们的肚子里有的是墨水,还有隐喻的趣味),好好地看护企业中的那些加油工,他们可是摩托化和高速公路化的新意大利社会的支柱。

---

① 曼德拉克是一个漫画人物,是个神通广大的魔术师。

② 昂里科·玛泰(1906—1962),意大利商人和政治家。

③ 雷穆斯和罗穆卢斯兄弟被认为是罗马古城的创建者,相传他们是由一头母狼哺乳养育大的。

1961年11月15日。瓦韦利诺的一个教师来到罗马的司法警察部门。他向他们叙述说,我曾在某天夜里跟他搭讪,他上了我的朱丽叶轿车,走在旷野上,受到一支手枪的威胁,被打得半死,还被抢走了他的小说《罪孽的孩子》的手稿。两天后,这位安东尼奥·维切又缩了回去,承认他当初撒了谎,为的是能在报刊上亮个相,满足一下他的文学虚荣心。确实,报刊又谈论了我。安东尼奥二十三岁,"理想的年纪",不是吗?正好能为"诗人强盗"提供一个"新的猎物"。两天的大标题、文章、照片、讽刺嘲笑和无情辱骂。

1961年11月23日。我的第一部电影公映,在巴尔贝里尼电影院。一通吵闹,银幕上被泼了墨水,大厅里扔了不少臭气弹。示威者聚集在剧场的楼厅上,朝正厅中的应邀来宾扔了好几柳条筐茴香。塞尔乔和他的兄弟弗兰科,受欢迎的主角,把我拉到电影院对面的加利福尼亚,劝慰我。这是罗马最棒的冷饮店。站在那里,绷着紧张的神经,吃下一份又滑又腻的冻栗羹,栗子羹[1]。那帮混蛋,他们甚至毁了我的这一愉悦!

1962年2月24日。律师萨尔瓦多雷·帕琉卡,卢卡尼亚的基督教民主党前议员,在罗马的法庭上,向我宣读了控告书。他在我的电影中发现了一个当小偷和拉皮条的人物,用的是他的名字。我不仅坏了他的名誉,而且还毁了他的政治生涯。我为什么要寻求诋毁他呢?因为他代表了一个邪恶和叛乱的灵魂所憎恨的一切。让法庭的那些先生来审判吧:塞尼、莱奥内、坦布罗尼、谢尔巴[2]的私人朋友(他在卷宗中附上了他们热情洋溢的信件);《卢卡尼亚之家》、《卢卡尼亚劳动者》、《卢卡尼亚进步报》上吹捧文章的对象;1915到1918年战争的老战士;鳏夫,十一个孩子的父亲;《罗马观察家》的订户。至于诽谤他的那个人,沮丧消沉,疲竭倦乏,神经衰弱,受阻碍而无法入选参议院,居然胆敢把一个六十七年来一直受人尊敬的姓名加在一个卑鄙下流的淫媒者头上,"我们将不会,"他宣称(请注意,这里的口气突然转为了庄严的复数),"过分暴露他的私密生活,本着基督教的仁慈精神。"(强调"私密"一词就已经相当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乔万尼·莱奥内(1908—2001),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总理。马里奥·谢尔巴(1901—1991),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总理。另两位参见上文的注解。

有基督教精神了。)

法官们查阅了电话黄页簿,在南方各省找到了几百个姓帕琉卡的人。姓帕琉卡并且名字也叫萨尔瓦多雷的人也有不少:罗马有25人,那不勒斯有21人,波坦察有10人,玛泰拉有4人。法庭认为,在一个年龄二十岁的托雷-安农齐亚塔的杈杆,跟一个身为狩猎联谊会和贵族联谊会成员的老年先生之间,是不可能有任何混淆的,但它仍判定我得在电影中改个名字,并罚我支付诉讼费用。

1962年8月31日。法比中校,威尼斯宪兵队的指挥官,就我的第二部电影[1]向共和国检察官提出了起诉,他是威尼斯电影节期间在电影宫看的电影。"我当即认为,这是对国家刑法的某种违反,而不是一种艺术上的表现。"中校的证据?安娜·玛尼亚尼[2]说"撒尿",而不是"小便",说"屎"而不是"粪便"。法官拒绝了审理:让人们按其环境说话,算不上是对良好习俗的冒犯。《新闻故事报》的解释:"生动鲜活的语言万岁!我们不必惊讶,假如我们的小学教师对上课时腼腆地举手示意的学生直率地说:去撒……吧,我的孩子,不要在意我这话语的平庸。我支持威尼斯的那位共和国检察官。"

9月22日,电影首映式,罗马,四泉电影院。法西斯大学生突击队。放映刚结束,一个小伙子就跳出来,声若洪钟地嚷嚷:"皮埃尔·保罗,我以民族青年的名义向你宣布,你实在太让我们恶心了。"那一次,我失去了耐心,当场给了这家伙两耳光,把他打翻在地。但是在这里,杰那里埃罗,我必须改换一种语调,从这个辩论台上走下来,我已经对你讲过我这一系列的诉讼过程了。因为,就在四泉电影院打架事件的第二天,发生了某种很奇怪的事,它迫使我摆脱我的习惯形象,这一形象,我活着时,我的战友们就一直把我封闭在其中,我死后,对我留有记忆的人们继续将我囚禁在其中。

报纸报道这一事件时,仿佛倒是我被别人打破了脸:"给P.的耳光:对这部电影,人们在导演的脸上拍响了巴掌。"我这样向你宣布一件"奇

---

① 指《罗马妈妈》(1962)。

② 安娜·玛尼亚尼(1908—1973),意大利女演员。她在《罗马妈妈》中扮演外号为"罗马妈妈"的妓女。

怪的"事时,并没有想到报纸早已不知是第几次掺假了:不,一个像我这类的茴香[1]缺乏健壮的肌肉,在打击之下立即泄了气,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吗?都是一些娘娘腔!即便是电影院里坐在我身边的劳拉·B.,这位现场目击者和命中注定的忠诚朋友,也在几天后这样对我提到,像是要保护我不受敌人的暴力侵犯,"这个居然动手打了你的法西斯分子"。

为什么我没有提到劳拉?也没有向报纸辟谣呢?是什么样的暗中力量迫使我低下了头,默默忍受了一种无中生有的侮辱?

兴许,应该在我的电影中寻找一个回答。在电影最后的监狱和垂死那几场戏中,年轻的主人公被绑在一张水泥床上,躺在四面秃墙之中。他因小偷小摸罪关进了这个教养所,后来又因反抗狱卒而进了这个禁闭室。他被皮带紧紧捆住,手腕和脚踝全都动弹不得。另一条宽带子缚住了他的胸脯。他再挣扎都没有用。他快死了,胳膊伸开,胳膊横成十字。他母亲回了家,打开窗户,开始对着罗马城哭泣。

它们有两千年了,这些眼泪:我知道,它们现在是在为我而流。男人啊,接受你的命运吧!我的命运就是被诽谤,被诋毁,被钉上十字架。我不该打那个法西斯分子。基督有没有反抗过他的任何一个刽子手?他对彼得说:把你的刀插回鞘中。我认识那些把我团团围住的马勒古,他们正等待一个新的机会啐我的脸[2]。不久后,他们还将动手抓住我的身体。但是,我还得提防我的朋友,跟提防我的敌人一样。提防所有那些想为我效劳的彼得。提防党内的那些同志,那些祝贺我揭露了意大利各监狱实行的野蛮制度(玛切罗·艾利赛,我电影中最后一组镜头故事的人物原型,真的在天国女王[3]中受折磨,他就死在我的主人公被绑的同一张束缚床上)的同伴们。提防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他祝贺我在民族诗歌始终崇武好战、吹牛夸张的国家中成为一个绝对新颖的左翼公民诗人。提防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他在维斯康蒂和费里尼已经背离新现实主义的时候,准备追随我这个"介入"电影家的榜样。提防我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马勒古是"福音书"中大祭司的一个奴仆。事见《新约·约翰福音》18:10—11。在另三大福音中,也有类似记载。

③ 天国女王是罗马的一所监狱。

那无数的读者，他们写信给我，鼓励我继续为意大利的一种道德与政治革新而“斗争”。

不！不！还是好好瞧一瞧这个遭人遗弃而走向死亡的小伙子，还有这个静静地哭泣的母亲。我无法对你们说得更多了。我狠揍那个法西斯分子，为的是不让我的好友、我的忠实读者、那些“盯”着我的人失望：但你要知道，我扮演这一角色并非那么轻松自在，我很开心地接受这一事件的假版本，那些比真相还更真的谎言。

1963年3月7日。罗马的法庭（你不要担心，我马上就要结束这一份清单，尽管它实际上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我死去，直到我死后：一共有三十三场诉讼，其中有两场针对我的遗作），罗马的法庭检查了我的第三部电影，一部四十分钟的幽默短片。一班演员——平庸之人，出身下层——在众人的哄笑中，重复了耶稣蒙难的最后场景。“侮辱国家的宗教”：四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妈妈一听到这个消息，当场昏死在我的怀抱中。我真想跑去掐断共和国检察官的喉咙，那个朱塞佩·迪·杰那罗，指控发起人。妈妈总算又睁开了眼睛，朝我微笑：任何的复仇念头立即离我而去。

母亲，如果没有这一敌对圈子在我周围渐渐收紧，我们的爱的奥秘又如何能完成？我们需要那些该亚法和那些彼拉多[①]，才能让四十年前在弗留利绿色牧场开始的家庭田园诗中，喷溅出神圣的正剧来。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在告诉我你超人的预感之前就知道得清清楚楚了：从你来到我的摇篮前俯看我的那个时代起。你用你那只世俗的手，掀开被子，拉走被单；但你的另一只手，那只由上帝引导的手，你把它放到我的脑门上、我的脸颊上，来回轻轻抚摩，像是要在我光滑的脸上预先擦去只有你一人能看见的东西，诽谤的污泥，还有垂死的汗水。

我们不再行走在拿撒勒[②]明媚秀丽的高地上。自从我们被驱逐出弗留利，来到巴勒斯坦的荒原后，对我们而言，加利利的清泉已经干涸。请看：各个人物已经各就各位，准备圣母悲悯的场景。在众法官之后，你得

---

① 该亚法是“福音书”中迫害耶稣的犹太大祭司。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是他判决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② 拿撒勒是耶稣的家乡，在巴勒斯坦。下文中的加利利也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地方。

接受那些刽子手。那个命中注定要戴荆冠的人,还会去驳斥一个极不公正的判决吗?

33

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在意大利历史的这一时期，而不是别的时期,迫害表现得那么残忍;为什么,短短几年中,它竟然在残暴性和卑劣性上达到了这样一个顶点；以至于我此后的诉讼跟前期相比就只是拷贝而已,从此跟我形影不离的那些辱骂全都浸透了这一阶段中孕育的仇恨。这个阶段,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从 1956 年到 1963 年:我们国家发生深刻变化的阶段,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刚刚诞生,却还没有真正形成的阶段,这一意识形态的责任就是说出谁是有罪的,就是努力争取消灭他。

只要好好琢磨一下标志这八年政治历史的重大日期，我们就很容易以一种现象来解释一切,那就是苏联神话的崩溃,还有反动势力(在抵抗时期的短暂离开之后)的侵略性回归。1956 年春天: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罪行的报告。1956 年 10 月:匈牙利起义,以及俄国坦克的镇压。1958 年春:阿尔及利亚的军人把戴高乐抬上了权力宝座。1960 年夏:意大利的极右派酝酿了一次政变,坦布罗尼政府绝对需要他们的支持。6 月 30 日——请注意,这一日期正好在帕尼科街事件(6 月 29 日)和安齐奥事件(7 月 10 日)之间——6 月 30 日,意大利社会运动[①]在热那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那座城市是在该运动的狂热分子经过激战后攻打下来的。民众起义很快爆发,但被警察镇压。在热那亚和雷焦艾米利亚,一共死了二十来人。坦布罗尼不得不辞职,很快,阿尔多·莫罗的“中间偏左派”上了台,但是,民主毕竟遭受了践踏,它从这一危机中走出来时

① 简称“MSI”,这是一个新法西斯组织。

已经贬值。七头蛇[1],人们都以为它已被打垮,却又抬起了头。法西斯分子利用克里姆林宫高墙后犯下的滔天大罪,趁着共产党人的一片惊慌,重又起来高谈阔论,制造威胁。活该我成为倒霉蛋,被他们揪住了辫子,没什么奇怪的。他们把我当做众矢之的,当做最理想的牺牲品来消灭。等我死后的第二天,革命的贞洁女神们将会高呼,他们已经得到了我的皮。

但是,我对你说过了,必须避免事实的这一版本。它要把两个意大利对立起来,一边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狂热的、复仇心切的意大利,它的头领的屈辱性下场也不能让它泄气,另一边是一个明智的、健康的、自由主义的、节制的意大利。它要相信,坦布罗尼已经被推翻,阿尔米兰特的党[2]也被打垮,人们再也用不着害怕老魔鬼了。没错:像一口猪那样被绑着两脚在罗雷托广场吊起来的尸体[3]没有再站起来,他将不会再复活了。然而,只有那些傻瓜才会欢欣鼓舞。历史法西斯主义没有成功地在我们中间重新生根,因为说到根,意大利人民有别的根,埋藏在它的脾性和它的传统中,一种不名誉的、不可抵御的因循守旧,一种顺大流的天性,它可以追溯到1922年[4]之前,而在1945年时也没有熄灭。一遇到有利时机,它就会立即死灰复燃。

导致这事的缘由既不是布达佩斯的悲剧,也不是热那亚的暴动,而是一个独立于这些变迁的现象,尽管它发生在同一个阶段中,并因此让大多数人心中糊涂。从1956年到1963年,意大利的经济奇迹,史无前例的工业和商业大发展,是对我迫害的真正和唯一的原因。这种歇斯底里,这种狂热,这种杀人的召唤,目标对准的是所有的弱小群体、所有的边缘人,我本人只是他们的一个象征,我真想把这一错误的责任推到意大利社会运动的那些魔鬼附体者身上,那些挥舞大棒的人,那些扔炸弹

---

① 希腊神话中的怪物,有七个头,砍下后仍会长出,后被英雄赫拉克勒斯杀死。比喻难以根绝的祸患。

② 指意大利社会运动(MSI)。乔治·阿尔米兰特(1914—1988),意大利政治家,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创立者。

③ 指墨索里尼。他最终在米兰的罗雷托广场被暴尸示众。

④ 指墨索里尼进军罗马,掌握政权,为建立法西斯国家做好了准备。

者，那些丧尽天良的暴徒：如果一切罪恶都是一小撮绝对的罪人做下的，那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只要把他们从这个国家中清除干净就行了。但是，迫害我的不仅是他们，还有别的人：在红灯亮起时跳下来绕车转一圈以证实车身在堵车时有没有剐破的平静的资产阶级；把星期天时间用来洗自己汽车的勤劳工人；签下二十五年按揭贷款合同在一栋新住宅楼中买下一套三居室公寓的年轻夫妇；靠卖血供自己孩子上大学的一家之主；组织罢工跟狠心的老板作斗争的工会骨干：恰恰是这些男人和女人，从60年代起，组织了对我的私刑处死，他们可都是正直的人，在各自的行业中熟练能干，血脉中没有一滴野蛮人的血，其中大多数还投左派的票，根本就不会使棍子打人，行为处世全凭着自己的良心以及对"他们自己权利"的确信。

他们的权利：是这样一个民族的公民权利，它在五年之内，即从1958年到1963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它每年的投资增加15%；工业生产指数如以1958年为100来计算，1963年就达到了170，假如你把这个数字跟欧洲共同体其他国家做一下比较，就会更惊讶于它的神奇：荷兰为139，数第二位，德国为136，法国为129；它持有驾驶执照的人从35万上升到125万，人均肉类消费量从15公斤上升到了31公斤，电视订户从36万上升到400万，拥有游艇数从2000上升到60000；它的北方大城市，米兰和都灵，人口都达到了近一百万；它到处都在耸立起摩天大楼，各类工厂；它的乡野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加油站，往日里随处可见的毛驴和套车却越来越少见了；它有一百多万农民离开了耕田当了工人；它的失业率和往外国移民数达到了意大利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它的出口尖端行业再也不是由女人们装箱的西西里柑橘，也不是手工缝制的丝绸领带，而是流水线生产的冰箱，以及石油化工产品。

闻所未闻的奇迹，异乎寻常的成功，我真想以费里尼的抒情主义为你来描绘，但是，挪威的森林砍伐，大量的松树进口①，比起以吨来计算的钢铁、水泥、天然气的数字统计来，要更能带来巴罗克式的情感抒发。

---

① 指意大利人从挪威进口松树，做圣诞树之用。

这是一种随时随地的热情爆发，一种集体性的欢欣鼓舞，一种每个人都沉湎其中的狂欢狂喜。人们对如今的许多现象实在是见怪不怪了，对被抛弃给无耻的房地产投机的城市突然的和不可逆转的变丑；对千百万南方移民在北方都市中措手不及的匆匆转变；对千百万农民突然面临的乱糟糟的城市化；对农村地区的人口锐减；对千百年传统的土崩瓦解；对社会装备相对于人口革命的明显滞后；对医院的破旧，学校的缺乏，教师的缺少；对邮政局、铁路局、海岛间航运体系的过时。必须热情洋溢地积极参与，大声疾呼反对怀疑论，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工作中，毫不犹豫地生产和消费，为建设一个发展得比黄金时代的美国还快的奇迹般的意大利做出贡献。

这一惊人成功的象征便是1960年春末阳光高速公路的竣工（稍稍早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但是，恰好跟帕尼科街和安齐奥的两个案件是在同时，请注意这一巧合），以及它大张旗鼓的开通。这个杰作把往昔的梦想和现实的抱负都融合在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隐喻中。它证明了现代工程师们的才华，他们跟曾经辉煌一时的祖先一样，钻破山脉，穿越峡谷，对民族自豪感而言，这可是不可缺少的极具雄辩意义的小小满足；高速公路连接了米兰这个商务之都和罗马这个政府驻地；它有助于菲亚特这一尖端工业每年生产35万辆新车；它像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宣告要与外省主义以及钟楼精神作斗争；它协同电视，一起吹响了整个国家重大而又完整的焊接的前奏曲，不仅是地理上的焊接，而且还是语言上的焊接，社会的和人文的统一。总之，一百年以来连连受挫的美梦和破产的希望，现在由这五百七十三公里的水泥道路获得了实现。

在一片凯歌声中，要当心那种不和谐的音符。在普利亚，塔兰托的城门外，意钢公司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四十公里公路，三十五公里铁路。每天动用一千三百辆卡车，每年将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和钢管。开幕仪式上，一个工人以一连串高声叫骂打断了开幕词，他把上述那些数字跟两万棵橄榄树做了一个比较，为了让这家钢铁厂开工，人们在世界上最美丽的这个乡村砍伐了两万棵橄榄树。他们想迫使他闭嘴，但是他拼命挣扎。安全部门的两个人把他捆了起来，塞进了一辆吉普车，送到了医院。医务部门的报告宣称：此人神经质发作，反社会性的

精神错乱。最后结果:在精神病院中住院两年。

尽管没有戏剧性动作,我的行为依然显得具有煽动性。那个并不成文的新法令,那个进步宗教的结果,我以我写的一切,以我所做的一切,以我所是的一切,触犯了它。我的呼吁无人理睬,因为我曾提请人们注意,圣诞节是基督的因而也是贫穷人和受辱者的节日,但那一年,不说别的,仅仅在米兰,就有四亿里拉耗费在了节日礼物、公共照明、鲜花装饰上。我的怀疑很不合时宜,因为我曾说过,从玛里奥山播音棚里传播出去的"民族"语言,只是一种行话大杂烩,根本无法表达意大利男女公民活生生的现实。我的固执有些倒行逆施,因为我一意孤行地让我的人物用自己的乡土方言说话。我的夜晚活动习惯很是可疑,因为我出门溜达的时刻,别人正熟睡在梦乡中恢复体力,为了第二天上班时能有精神头。我旷日持久的单身状态该遭责备,因为它妨碍着我履行我的公民职责。人们还不敢让我承担的罪名很是凶残,但它已经飞翔在了所有其他指责后面:重大而又无法补偿的错误,为愉悦而愉悦,没有任何社会目的性,没有实用目标,毫无结果地白白浪费上帝赋予我的力气,把本该产出结果的种种努力偏移到无谓的游戏中,还有,让那些在我影响下的年轻人学我的样子,把自己的精力作一种纯粹的挥霍。但是,我选择一辆白色的朱丽叶轿车行驶在罗马街上,这就已经太该受指责了,在汽车本身就是奢侈品、阿尔法-罗密欧比菲亚特更有名的时代,这真是一个令人愤怒的回忆,那是在挑战那些青年夫妇和普通家庭,他们省吃俭用才能咬牙买一辆最便宜的车,那是给所有那些心里有些小小辛酸的人制造了心理障碍,他们把自己的六百立方厘米汽缸跟我的两点五升大容量一作比较,就觉得有一口恶气憋在胸中。

只不过,要从形式上惩罚我,就得有一部适合新时代的义务与戒律的道德法典。十五年以来,信奉肌肉发达、颌骨凸出的阳刚气宗教就不再大行其道了。但是,古老的价值体系同样也不作兴了,当年,在被使徒王子[1]选中建立其统治的城邦中,它可是不可动摇的。人们开始嘲笑意大利广播电视严格规定的那些禁令:永远也不要说"婚床"、"奶罩"、"发

① 所谓的"使徒王子"专指圣彼得。

身期"这样的词,它们都属于一个正在迅速走向工业化时代的农业社会的性禁忌;不让观众看见一个女舞蹈演员裸露的大腿,就等于让有足够收入买得起一台电视机的那个人,继续继承他耕种者祖辈的价值偏见。

天主教教义的不足及其不可避免的衰退，在普拉托爆发的丑闻事件中显露无遗。普拉托是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纺织工业中心。主教登上布道席,揭露教区中两个年轻人犯了罪过,因为他们只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而没有经过宗教仪式。他以文字形式重申了他的弃绝,把这对夫妇看成"罪人","公开姘居者"。年轻夫妇以诽谤与诬陷罪把主教告上了法庭。佛罗伦萨的法庭自认能够处理此案,对高级教士罚以轻款。这在梵蒂冈掀起了轩然大波:拉特朗协定[1]签署以来第一次,教会的一个使者遭受了一个意大利法庭的审判。庇护十二世取消了原定庆祝他加冕十九周年的节庆活动，以示沉痛的心情。但有相当一部分舆论并不明白,悲剧应该来自这个狂热的老人,正是在主教的命令下,普拉托的顾客都不再光顾那两个年轻人开的肉店，面临破产威胁的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廉价盘卖自己的店铺,离开家乡。

不久后,秋天,庇护十二世去世。我发表了我的短诗"致一位教皇",我在诗中批评他白白在宫中住了二十年,却不知道有许多家庭,离他的卧室仅只五百米远,就麇集在蜗居陋室中。

罪人并不是那个作恶的人:
不干好事,这才是真正的罪。

在一个信仰严格的时代,这就可以把我烧死了。1958 年,这个经济"大飞跃"开始的年份,保卫圣父已经不再引起任何人兴趣了。除了罗马狩猎联谊会的那些贵人,他们把发表我诗歌的那家杂志的经理,出版商瓦伦提诺·蓬皮亚尼,驱逐出了他们的行业同会。

一个破灭了的伟大神话的可怜终结。最后的打击是由约翰二十三世[2]

---

① 拉特朗协定于 1929 年 2 月在梵蒂冈教皇国与意大利之间签订。双方通过彼此承认,解决了所谓的"罗马问题"。见上文第一部分中的前注。

② 约翰二十三世(1881—1963),教皇(1858—1963 年在位),曾对天主教会进行了重大改革。

不自觉地带来的,他从教会年历中删除了一些被宣布为可疑者的圣徒的名字:杰那罗(请你原谅他吧!)、费罗梅娜、乔治、卡特琳娜[1]。你以为,堂区的教职人员和虔诚的信徒们会反叛吗?我在博提塞门的货摊上看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稀罕商品:一些骨头残片,一些碎布头,一些发绺,装在带玻璃盖子的木头盒子里,根据商品的价值,盒子分别用松树、橡树或桃花心木做成。神甫们前所未有地匆匆赶往跳蚤市场,以几千里拉的价钱出售被除名的圣徒的遗物。

我买了费罗梅娜的一片指甲,作为对天主教是主导意识形态的幸福时代的回忆;我把它镶嵌在一个小圆盒子中,每当她的继任者派出警察追捕我时,我就温柔地瞧着它。

圣彼得的宗教绊在了什么障碍上?不管人们认为很滑稽,还是很可恶,普拉托地方主教的举措,还有教皇受辱之灾,都使天主教会信誉扫地。人们不能容忍它干预年轻人的私生活,要知道,在冬季,每星期五晚上,都有十四列加开的列车离开罗马,前往滑雪场。在最近写入被物质丰富的社会所默认的宪法的那些权利中,最神圣、最显然、最令人垂涎、最不可让与的,难道不是爱的权利吗?新的意识形态将不会再让人的欲望屈从于千年的习俗,不会再让人停留在纺车与犁耙的时代,而是将保全和激发人的性欲。

当然,不是随便哪一种性。只是有利于工业和商业的性,它要能"带回",能"还回"什么。它能推动购买一辆汽车、一套公寓、一台冰箱、一台电视机,为冬季活动添置一套滑雪装备,为夏天度假增加一套海滩用品。拥有一套临街房屋的性,它是正式的,公认的,房地产商对它表示信任,银行家愿意为它贷款;夫妇间的,那自然用不着说了,但未必非得如此;总的来说,新型的结婚根本就不像古老的联姻:因为,如果说,一两个孩子能增加家务的垫款,孩子太多了则会减慢消费。男人(无论是丈夫或情人)不应再是唯一为衣着和烟草而消费的人。女人将摆脱厨房的纠缠和锅台的守候,她们将走出家门,穿衣打扮,化妆,吸烟。理想的年轻夫妇要去旅行,去看电影,上餐馆吃饭,要积蓄一些钱财,买珍珠项

① 杰那罗,又译雅努阿留斯,公元5世纪的天主教殉道者,那不勒斯的保护神。其他三人也都是圣徒。

链，计划购置毛皮大衣。一种双胞胎般的、笑盈盈的幸福形象，通过在人行道旁和公路斜坡上成千上万则广告而深入大众之心。成盒的奶粉，成块的浓缩菜汤料，成筒的洗涤剂，成箱的面条，则树立起了成双成对的、神采奕奕的幸福之人的肖像，这不可或缺的智力同盟，通过意外的科学特色表现出来，而迄今为止，这一科学在一个充满阳光、欢笑和蓝天的国家中还始终遭到轻视。

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和性学家确实已经接过了神甫们的班。很容易，因为他们带来了人们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它要把“好的”性充实到教义中，而把那些“坏的”性驱逐出去。所谓坏，并不是从道德观点上来看(它从“奇迹”以来就被人忘记了)，而是从经济观点上来看。性，作为长期习惯于秘密状态的那些奥秘的朋友，久久迟疑着不肯走出阴影。它是那样一些类型的爱，适应于一种边缘的、充满冒险的生存，不能引导两个人一起公开亮相。也不能激发他们投入任何一种推动商业繁荣的活动中。既不能买房子，也不能购置家用器具，既没有家庭大餐，也没有共同度假。这样的激情无助于人类的繁衍，无用于贸易的繁荣，凌辱着绝大多数辛勤劳作的劳动者，让他们向贷款福利的暴君负债，一直负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请你再一次认真注意那些日期，并欣赏它们的巧合：约翰二十三世把那些擅自占据神圣位置者赶出了基督教的万神殿，徒然地希望能以此激起一种宗教醒悟；与此同时，精神病学显示了它刚刚获得的可怕权力。我的拉蒂纳的法官们在众多物证中收到了由瑟梅拉里教授应民事部门要求而写的一份事实陈述书。这位犯罪学家(他从未见过我)，认为我这样一个人企图用武器威逼抢劫两千里拉是很自然的事。作为一个“进展中的病态过程”的症状，这一表面谵妄的行为，实际上完全符合我个性的发展逻辑。“P.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让我们认识了他的为人：对他产品的精神病理学分析能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结论，即他有一种秽语狂倾向。”对英明的专家来说，这是简单的游戏：所谓的“秽语狂”(用一种不那么优雅的意大利语：在这一话语中，人们直接把屎叫做屎)暴露了一种“神经官能症的行为”，而后者源自一种“残疾”。诊断鉴别很干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性欲，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性欲倒错。P.是

如此不正常,以至于他会完全有意识地接受这种不正常,而显得根本就不能如实评价它。”“一种暴露狂似的、怀疑狂似的邪恶”,“一个本能衰竭、充满了深深的不安全感的家伙”。总之,一个“不幸者”,注定要走向不稳定和失败,如同所有的“类似者”那样。你认为,他们会把他们不可避免的“痛苦”,还有他们的“忧虑”,全都归于他们身处其中的历史环境,归于对警察烦扰的合法畏惧,归于对威逼利诱的恐惧,归于在火车站里和大桥底下的危险遭遇,归于想保住饭碗、房子、一家老小的性命就得保守秘密的义务吗?根本不是:这是一个“对社会有危险的”个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将始终如此,因为他对女人“根深蒂固”的畏惧排除了任何的“治愈”可能性。

精神分析学,难道就缩小成了这些漫画形象,掉价到了这些骂人话?为了弄它个心中明白,我追溯到了源头。啊!杰那里埃罗,再来读我曾读过的弗洛伊德,是何等惊诧,何等厌恶!我在博洛尼亚跟乔瓦娜讨论过的关于他对列奥纳多[1]的研究,也没有给我留下过这一印象。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善良的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一个友谊的标志。不让我们当众出丑,就足以成为一种感激的理由了。我以另一种眼光继续拿起他的著作。当然,“罪孽”这个词也好,甚至连“邪恶”这个词也好,都没有让他的文字逊色。他成长在多瑙河畔资产阶级严格的实用主义精神中,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不会不意识到,一种如此的话语,恐怕会让他的同胞(1900年代的奥地利人)耸耸肩膀,他不会不嘲笑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读者,在德国、在英国、在美国,在那些国家中,实证科学的崇拜代替了对宗教的信仰。他还知道,一种严格的判决和一种强制的执行,会造成人们的叛逆精神,而一种温和的观点和宽容的话语,却会使它们的受益者气馁,使他们在判决书前更自愿地低下头来。

弗洛伊德说,那么,就让我们求助于一个中性的词汇吧。让我们说“阶段”或“时期”吧:这是普遍的,他宽宏大量地同意了;对所有人而言,从摇篮期起就能观察到。小男孩、小姑娘都要经过这一过渡性阶段;任

---

[1] 指列奥纳多·达·芬奇。弗洛伊德在其著作《列奥纳多·达·芬奇孩提时代的一段记忆》中,曾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作了深入的心理分析,尤其是关于“秃鹫”的记忆。参见上文。

何人都是另一性别的一个组成部分，无人能逃避；只要它局限于童年期和少年期的范围，它就是合法的；假如它一直持续到十八岁，那就是危险的；假如过了这个年龄还继续，并在成年期还稳定不变，那就是悲剧了。换句话说，在一个成人身上，它代表了过渡阶段中的一种固定，进展时期中的一种抛锚，个性发展中的一种停顿；正是根据发展中的停顿这一症状，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自己有充分理由进行干预。

你很快就会注意到这一隐喻的经济特点，它表现得很显然，很辉煌，很恬不知耻：人类被比喻成一个工厂，其产量不能满足自身需要。一开始，它尽管生产得少，还算过得去；那是少年期，一个暂时的阶段，未来正在做着准备；但是随后，它必须不断增加它的生产量，因为，一个工厂的年产量如果总是跟上一年持平，那它就是一个衰退的工厂，要完蛋的工厂。现在，应用一下发展中的停顿这个定义，这一在经济上、在跟我们有关的范围内致命的停顿，你就会不无惊讶地发现，弗洛伊德，这个呢绒批发商的儿子，是从哪里汲取来他的思想的。这些思想，从20世纪初起，就在推动那些感激涕零地接受了它们的西方主要大国(德国和英国接受得更快，更情愿，而在拉丁国家中则稍微迟疑一些，因为它们发展得稍慢一些)中的商业和工业的跃进，而对60年代的意大利，依然带来着很多好处。除了这一差别，如果我们正视一下在我们国家发生的这一突然的“奇迹”爆炸，我们就得承认，我们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落后于他人，我们必须走得比这一学说还要快。瑟梅拉里教授荒唐的极端态度便是这样产生的，他不像弗洛伊德那样有时间十年磨一剑，精雕细刻，带着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1]朝代一个臣属那样过了时的彬彬有礼，在自己的凸蒙怀表上看钟点，坐着四轮马车去访客。

一个新的词汇在报刊中流传：带有奇怪的同韵，相当精确，从而显得很博学，又相当含糊，从而能被大众理解。需要从“homosexuel”[2]开始，这个野蛮的词，有一个希腊语的前缀，一个拉丁语的词干，代替了那个陈旧的、过于文学味的“inverti”[3]，并立即具有了一种辉煌的命运。

① 弗兰西斯·约瑟夫(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年在位)。

② 即“同性恋”。

③ 直译为“转化”、“倒错”，指性欲倒错，特指同性恋。

"Skeptophile"[1]这个词确实也太专业了一些,没能成功;但是,人们留住了别的那些表达法, 给我的社会公民身份卡带来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我惹是生非的需要是"偏执狂";我对一辆宝贝汽车的选择是"寻求心安理得";我架在鼻子上的墨镜是"展露癖";我对方言的探究是"秽语狂";我对我母亲的爱是"童年固恋";我的远离女人是"恐惧症";我对我的狗的感情是"无奈的替代";我的性欲是"欲望压抑";我的心理阶段是"肛门期";我对年轻人的兴趣是"自恋倾向";我对郊区的趣味是"幽闭"。我穿牛仔裤出门吗? 那是"侵犯性"。我穿篮球鞋吗? 那是"物恋"。我玩足球吗?那是"精力超级过剩"。我更喜欢吃水煮的蔬菜吗?这是"自我惩罚"。我在上文中列举的所有对经济法则的违反,现在都反过来,在这种跟定我终身的话语的科学保证下,落到了我自己头上,这就好比一个人在严格的医疗控制下竟还是得了一种传染病。

媒体下达了命令:"生产! "而我却固执地处在一种无孕无育的单身状态中。它们嘱咐:"花费!"而我的生活方式,昼伏夜出,秘密地下,迫使我只有一些贫困的、暂时的、转瞬即逝的爱。它们强调:"旅行! "而我只满足于步行走到台伯河畔,除非我到非洲去挥霍我的版权收入。对旅馆业是干巴巴的损失, 对任何一类商人而言都没有赚钱机会。我损害了国家利益。我推迟了它宏大的扩展。这是一个清晰、明了、用不着上诉的案子。在一个如此纯粹的样本面前,心理学家们还以为是在做梦。未成熟! 幼稚症! 倒错! 社会危险! 原因很明白:我被指定为公众之敌。赶紧跟踪和围捕吧,只要等到号角吹响,就可以分食猎物了。

---

① 此词为作者所造,大概可以翻译成"喜好怀疑"、"怀疑狂"。

34

我缓缓地靠近了平恰那门，拿不准究竟是要从威尼托街走，去给几天后要过生日的妈妈买一份礼物，还是下车，去博盖塞别墅那边的小径中溜达一会儿，正在这时，一件突发小事替我做出了决定。一个年轻人，一只手把鸭舌帽压到眼睛上，另一只手把短上衣紧紧捂在胸前，正快步转过哈里斯酒吧的拐角。他发现了我，就径直朝我的汽车走来。

“快点，皮埃尔·保罗。帮我一个忙。那些婊子养的雷子正在追我呢。”

我敢肯定我并不认识来人。无论如何，他都不是我那圈子里的人。就在我犹豫要不要给他打开车门的这一秒钟里，他那张脸并没引起我丝毫的好感。他那凸出的眼睛在躲避我的目光，根本不敢拿正眼瞧我，他的双手在颤抖，紧紧地握着藏在上衣里的什么东西，反正这么说吧，我倒是更希望，一个如此随意走近我的家伙，应该在他的动作和表情中，显现出更多的勇敢来。此外，我从来就不喜欢拿小梳子梳得整整齐齐的小胡子，也不喜欢似乎拼命伸长了东探西望的尖鼻子。他流着豆大的汗珠，并继续以一种呻吟般的嗓音哀求我。

“快点，皮埃尔·保罗，快点……”

他身后紧跟着跑来了一个更年轻的小伙子，几乎还是一个少年，一头鬈发，因惧怕而眼睛睁得滚圆。此人不像第一个那样让我感到不舒服，而是立即赢得了我的好感。他脸上的每一种奇特表情都展示出一种十分自然的开心，比种种恐怖还更强烈，在任何情景下都能随时准备自得其乐。他双手合在一起，连连画着十字，指天为证，伸出手腕像是去戴手铐，接着又在胸口上画十字，做这一切时，表情那么带有喜剧性，尽管处在危险中，却依然有一种小丑般惊人的开心，看得我不禁哈哈大笑起

来。我打开了车门,准备翻转座椅,谁知这小丑动作比我更快。他玩杂技似的从前排座椅背上窜了过去,在后排座椅上蜷缩成一团。

另一位也赶紧坐到了我旁边,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

“往左,快点,从弯墙那边走。”

他摘下鸭舌帽,用手背去擦额头上的汗珠。我还没有克服心中的疑虑,我的疑心在一些细节上有增无减:比如说,他长长的头发,那可是新颖的外国式样,在一个年轻的波尔加特身上还是无法想象的选择;又比如他的双手,白皙的手指头和精心修剪过的指甲应该从来没有在市政公司的废品堆积场里扒拉过,寻找旧衣服。

等到他认定没有人追赶我们,他便掀开了短上衣,把一个手包放到膝盖上,翻看起里面的内容来,这手包闪闪发亮,显然不是真鳄鱼皮做的。

“你叫什么?”我问道,尽管我对他还是有成见。某种荣誉感促使着我表现得更友善一些。这样,他才不至于会说,P. P. P. 被报刊的围攻吓唬住了,连对一个小偷都没给笑脸看。陌生人在我的汽车里寻找庇护,无疑是对我,对我这样一个因野心而不是因发行量而出名的作家,表示出了一种与其说意外的倒不如说奉承性的信任。

“佩皮诺。”他嘟囔道,两只手一直忙着在手包里面翻腾,那样子很是兴奋。

“你的同伴呢?”

后排的小伙子已经昏昏入睡:兴许,是恐惧的反冲。半睡半醒中,畏惧依然拱上了他的眉头。他的脑袋倒在坐垫上,随着车子的颠簸而摇晃不已。真是一个毛孩子,他那厚嘟嘟的嘴唇依然保留了童年不确定的隆起。

佩皮诺并没有回答我,却把我刚才为观察他的同伴而挪了一下的后视镜又挪开了。

“还是好好监视车辆吧,”他简洁地说,“我们快到那个老是堵车的臭婊子人民广场了。”

“你在威尼托街来了一手吗?”

“在多内咖啡馆门前。真他妈的一片混乱!”他突然嚷嚷起来,把包里的东西全倒在了两脚之间,“我可真不走运,我!屁都没有,这个破钱包。她怎么就只有这么一点点钱,那娘们?”

“你住得远吗？”我说，想让他平静下来，“你要不要我送你回家？”

他把那顶帽子在手里揉着，然后开始用握紧的拳头敲自己的脑门。

“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真他妈的见鬼！”

“你没有父母亲供养你吗？”我一边问道，一边暗暗责备自己没能体现出更多的怜悯心。

他抬起头来，很轻蔑地瞧着我。

“谁跟你提我的老爹老娘来的？我才不在乎他们呢，我的老爹老娘！我来罗马可不是为了照顾我的老爹老娘的！他们每个月都给我钱，我问他们要的也就是这些。”

“他们住在哪里？”

“在老家，佩鲁贾附近。请注意，”他继续道，口气缓和了下来，“我很爱他们。他们开了一个锯木场，经营得不错。雇了三个工人，在水边有一栋三层楼的房子……”

“这么说来，你可不是一个穷光蛋了！”我欢呼道。

“穷光蛋？你把我当什么人啦？我有一个单间公寓，在托尔-米利那街，就在纳沃纳广场后面。安置得很漂亮，尽管我的老爹老娘，对立体音响什么的，实在是狗屁不通。”

我抑制着我的厌恶，迫使自己做出最后一次好心的努力。

“那么，这个手包，你为啥还要顺过来呢？”

“还有我的家庭舞会呢，真他妈的乱了套？”

下个星期的星期六，他要在位于托尔-米利那街的单间公寓中，跟他学农学的大学同学一起聚会。他的旧电唱机让他难为情。“放密纹唱片的一种单声道的简单机器！”他打算以一台“真正的组合音响”，让他的来宾以及他们的女友大开眼界，“高保真”的名牌，带两个喇叭，放在房间的两端。

“瞧，”当我们走在奔跑街的头里时，他补充说，“来看一看这台松下牌带转盘的 XZ3000 型。实在棒极了！刚从德国来的最新式样。”

他为我指点在我们右侧的里科蒂商行的橱窗，橱窗里，一些带金属摁钮的闪闪发亮的复杂机器，早已把依旧赖在那里的几本乐谱和音乐书挤到了一个阴暗角落，这一切，让人依稀还能回想起，当年，这个商行

曾经荣幸地出版过威尔第和普契尼的作品。

芥末味冲上了我的鼻子。我的小偷跟我那些波尔加特朋友毫无共同之处。这只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市民，他说他母亲的坏话，他从一个“女人”那里偷钱，谁知道那女人是何许人也？兴许是一个商店女营业员，这从她那个仿皮手包可见一斑，一个女学徒，一个打字员，这时正为丢失了证件而心慌意乱。为什么在多内咖啡馆门前发生这起抢包[1]事件？不是出自叛逆，就像玛莫罗桥和蒂布尔提诺的那些小子[2]那样，而是出于追时尚，随大流。为了做得跟他其他的同伴一样，购买时髦物品，拥有由画报推荐的“最新式样”。“家庭舞会”、女朋友、“真正的组合音响”、地毯上随处扔的摇滚乐唱片、硬纸杯子里滋滋起泡的碳酸饮料：我带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厌恶，瞧着他们这一聚会的每一细节。

“新浪潮在德律风根上跳舞！”我说，故意笨拙地模仿着德国人的口音。

佩皮诺并未注意到这一讽刺意味，搓了搓双手，很满足地发现我处于这一如此不错的状态中。

“你订婚了吗？”我问道。

他又开始在座位上如坐针毡，骂骂咧咧起来，而且特意用了一种俚语，不会不让我怀疑到，他是在以这样一种办法打动我，就像他听说在我小说中有过的情况那样，当然，那些小说，他肯定是没有读过了。

“真他妈的见鬼！我曾经跟阿尔图罗打了个赌，星期六一定要找一件开司米的套头衫来穿穿。开司米，今年最兴穿这个了。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这脑袋大得哟，当玛丽莎进门时这样问我：‘我说，佩皮诺，那件开司米呢？我们说起来可是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啊？’真是他妈的！我受够了，活见鬼！受够了！够了！”

“那是当然啦，”我心里想，“他可是不会用这拾荒人的话语来写他的农学论文。”但是，他若是想以这种方式来让我上当，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越是觉得那些嘴里除了粗口和脏话之外就说不出别的什么来的人让我喜欢，也就越是觉得一个大学生矫揉造作的放肆言谈卑鄙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无耻。佩皮诺根本就猜不透我脑子里在想什么，又以一个很不适宜的举动加剧了他的差错。他一撅嘴，带着厌恶的表情，从毛衣下摆中抽出一块十分漂亮的白色马海呢来，为了这么一块料子，格劳科恐怕会不惜冒险甚至冒死抢劫一家店铺，而不是软弱卑劣地袭击女行人。

我一下子火冒三丈，连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要干什么，就冲他说：

“现在，你给我弯下腰，把你翻出来的所有东西统统放回包里去。快点！少啰嗦！赶紧地！”

张皇失措的佩皮诺赶紧弯下腰，去捡撒在地上的东西。一管口红，一个发夹，一包纸巾，斯坦达商店的优惠购物券，一张发黄的父母亲照片，一张有雪景中的白云石地区图案的明信片。另外，还有一串钥匙，各种证件，整整齐齐地夹在一个透明塑料护套中。我们早已来到了纪念柱广场。我朝左猛一打方向盘，汽车重又全速驶出。他一头碰在了桃花心木的车窗沿上。

“有警察追踪吗？”他惊恐万状地问，揉了揉太阳穴，“呜呼！可你这是要去哪里啊？往那里走！你有没有疯了，怎么又从这里走？我们又得转回到巴尔贝里尼广场！”

“我这是故意的，”我冷冷地说。

“出了什么事，皮埃尔·保罗？你傻了吗？”

“我只要你把东西还给那姑娘。”

“你有没有毛病啊？停车，快停车！”

在特里同小广场等红灯时，他企图打开车门。我抓住了他的手腕。

“不许动，不然我就打断你的骨头。你知道，我是练过空手道的。”

他还想挣扎，但我把他拽得更紧了，就像一把老虎钳。

“从这里绕吧，”他哀求道，“走那条路。我们从奎里纳莱山出去。要是从巴尔贝里尼广场走，兴许会碰上警察。”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蛮不错的想法。碰上警察才好呢，你根本不配得到更好的。我要把你送到泰尔米尼火车站的派出所。”

他强作一副笑脸，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呢。

“你别再寻开心让我害怕了，皮埃尔·保罗！”

但是，他一看到我根本就不是在开玩笑，脸就一下子变得煞白。他

立即改变策略,奉承起我来。

“我认为,你一定站在那些小偷小摸、小打小闹的人一边,站在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一边。我在报纸上读到过……”

“那又怎样?”

“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辩护。你说过,假如社会把我们逼到铤而走险这份上,那可不是我们的错。另外,你不是还说过,教皇没有做出好榜样吗?难道他不是在窃国窃城吗,那教皇?”

听到这里,我禁不住直想笑,这只臭虫竟然引用起我接受报刊采访时的回答来,为自己对斯坦达商店一个女顾客的抢包[1]行为作辩护。但是,这个佩皮诺实在太猖狂了,他说话时,我的牙关咬得更紧了。

“大学里,我有些同学偷偷读你的书,你知道,因为,假如被教授发现,他们就该倒霉了,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一些同学把你比做……他们是怎么说来的呢?尼才[2],是那一位吗?某种先知,他们说的,他想火烧整个社会。皮埃尔·保罗,你可是太赶时髦了。神甫那派人(说到这些词的时候,他低下了嗓音,仿佛我们俩应该团结一致,对付隐藏在我们周围的看不见的窃听器的危险)把你形容为一个魔鬼,一个没有道德的家伙。就如一个新的尼禄,他们是这样说的。”

“你知道尼禄是何许人吗?”

他睁大了眼睛,用他空闲的那只手挠了挠后脖颈,搜索枯肠,想在中学时代的记忆中找出一个含糊的答案,生怕惹我不高兴。

“是一个可怕的家伙,应该相信……”

然后,又开始呻吟起来: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皮埃尔·保罗……你,挥舞左轮手枪(说到这里,他朝我使了一个眼色,想看看我对这精妙的暗示是不是报以微笑),握有金色子弹的人!你有没有想象一下他们的脸,想象一下所有那些被你鼓舞起来造反,反对一个不公正社会的人?一个小偷向你敞开了心扉,而你却要送他去见警察?”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应指“尼采”。

“小偷……小偷……我恨他们，小偷，假如现在他们都跟你一样！”我嚷嚷道，把他的手腕都快碾碎了，“你将是我送见警察的第一个小偷，活该你倒霉。”

实际上，我感到我的衬衣已被冷汗湿透。佩皮诺若是不那么愚钝，恐怕就会猜出，他的话已经将我置于一种强烈的不安中。他吐出一阵嘟囔，又一次试图挣脱，然后，又一声不吭地缩了回去。圣苏珊娜小广场，我朝右一拐，进入了奥尔兰多街。艾塞德拉广场的喷泉在我们面前展现它的色彩。

“那就快点去好了，去警察局！”他突然嚷嚷道，自命不凡的语气让我大吃一惊。

我扭转脑袋。

“可他们会把你也关起来的，你也跑不了。”

“那就好极了！”我喊了起来，决心向他表示，他的威胁打错了算盘，即便在我内心，看到他又一次耍起了滑头，我也不是没有丝毫担忧的。

“你没有考虑到我的兄弟吧。”

“你的兄弟？”

他的大拇指朝后座一翘，给我指了指另一位乘客，那个在我们斗嘴期间被彻底遗忘的小伙子。

“我会说，你把他劫持了，准备对他施暴。”

“对你的兄弟？”我重复了一下，简直不敢相信。

“他还是个未成年人，假如你想知道的话。当我们面对警察时，”他轻蔑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得避免掉入某种情景。”

“猪猡！”我高喊起来，“你撒谎！”

“那得由你来向警长先生证明。”

他又眨巴了一下眼睛，这一次是朝他的“兄弟”，后者已经全醒了，像一只猫那样伸着懒腰。然后，他开口说(我是第一次有机会听到他的嗓音)：

“你别担心，佩皮诺！我们就在这里下车(他指着火车站前五百人广场的那片树林)，然后就撒丫子跑吧。他的面相不善，但他的嗓音很温柔，很温柔！我在梦里听着他呢，我简直以为是从天上飘下来的呢。”

对这一意外的评价，佩皮诺和我，我们一起爆发出一阵大笑。我绕

着广场开了一圈,把汽车停在了戴克里先城墙前,很自然地避免了一次可能会彻底毁了妈妈的新丑闻。

“快滚,赶紧!”我说着,松开了我邻座的手腕。

他打开车门,出溜下去。他的同伴,一边翻倒前排的座椅背,一边在我耳边悄悄地说:

“错了,我不是他的小弟!”

我感到了他的嘴唇——哦不,我可不是在做梦——他的嘴唇轻轻地贴到了我的脖子上。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喉咙一下子发紧,无法对这一抚摩做出我应有的反应。尽管那么匆忙,那么快速,这毕竟是一次实实在在的亲吻。

但他早已经溜出了车外,灵敏得就如水银泻地。他跟在佩皮诺身后跑,那双网球鞋紧勒着脚指头,跑了几米后又突然停住,转过身来,给我送来一丝微笑,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摇晃着他那头蓬乱的鬈发,挥舞着胳膊,这一迫不得已的动作很可能就是在说:“这一次实在是倒霉!”又像是在说:“让我们把这个想法从脑子里赶走吧!”然后,他又在绿色的橡树林中跑了起来,不慌不忙,像孩子一样一蹦三跳,一边跑,还一边响亮地拍着巴掌。

好一个天生的演员,当我回过神来之后,我心里想。我正在写剧本的下一部电影中,信使这一角色就是他啦。我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和智慧的年轻小伙子。“怎么?”你恐怕会对我说,“在让我相信你的内心受到震撼之后仅仅一分钟,你就打算拿你的奇遇充当一个实用的结尾吗?”哎!杰那里埃罗,那是因为,当你写作或者你拍电影时,你是在无意识地安排自己,以便让整个激情都能有利于你的作品,并使作品受到它激动的力量支配。为什么激情会丢失在其中呢?为什么创造者们会抱怨呢?

我当时的行为比我现在说出来的样子要缺很多思量。我匆匆跳下车。他却早已消失在了公共浴池的角落后。我跟在他后面跑,确信凭着弹性十足的脚步在人群中认出了他。他双手还在高高举过头顶,继续拍着巴掌吗?我在我的电影中该如何称呼他呢?当然会是“安杰罗”[1]啦!根

---

① “安杰罗”(Angelo)在意大利语中又有“天使”的意思。

据词源学:“指那个宣告并带来消息的人,还得是好消息”。还有,根据他的举止,他几乎贴地而飞的走路方式。那是一种优美,一种雅致,一种开心,我还从未在别人身上见识过,除了画在教堂外墙上正敲着铙钹的“天使”身上。他们不需要把古琴[①]放在自己膝盖上,也不需要求助于象牙拨子:他们用自己的指甲夹拨弦线,一边弹奏,一边不停地跳舞。

35

我真想呼叫他,把他喊回来。但怎么喊呢?他连名字都没有告诉我就溜之大吉了。我在广场上前后左右地溜达了一圈,东西南北地四下里转身,只要见一个鬈发的,就赶紧跑去看是不是他。“安杰罗,安杰罗,”我喃喃道,仿佛一个名字本身就具有如此诱人的魔力,能拉住他的后腿,把他拖回到我身边。

电影评论家们指责我的作品庄严呆板。他们对我下一部作品会说什么呢?这部电影的背景是古希腊,而至今,我还没能为它找到一个跟我以往的主人公大不一样的人物。这一点是那么必要,尤其因为,他将被用来与那位神话般的国王死气沉沉的宫廷相抗衡,要知道,那些在宫门前站岗的士兵裹在他们笨重的盔甲下,几乎连动都不能动。

“安杰罗,”我重复道,思绪早已飘荡得离我的电影有千里之远。我的嘴唇构成了这三个如此温柔的音节,并以一种痛苦的惊讶,停留在最后那个毫无回应的 o 音的张开中。我蓦然回首,隐约希望他会从一棵树后闪出,抓住我的肩膀。

愚蠢的幻觉。即便发现他的踪迹又能怎样?他难道不会以一种尖刻的轻蔑,掉转身去不理我,就像我当初对待朋友们时那样?

我不得不忍住不光彩的眼泪,重新回到车上。满腔激情在我心中沸

① 原文为“psaltérion”,是一种类似于古琴或竖琴那样的弦乐乐器。

腾。我感到五内俱焚。什么！我竟然差一点就把一个年轻人送去警察局？无论是《团结》，还是《时代》，都会用大号字体刊登这样的标题："P. P. P. 与罗马盗贼反目成仇"。我怎么会落到这一地步？我，做下这等卑鄙龌龊的勾当？兴许，让他为了根本值不了一万里拉的赃物，遭受六个月监禁？否定我自己，让我永远名誉扫地？塞尔乔会说什么呢？艾尔莎会说什么呢？我该往哪里躲？该往哪里逃？

我竟会想到把一个小偷送去见官，一定是我心中的一根发条断了。快点，让我努力看得更清楚些。问一问自己，为什么会对佩皮诺有这种突然、盲目的敌意？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跟其他人一样。他有的是跟他同龄年轻人一样的趣味和抱负：完全就像玛莫罗桥的那些小青年，追随着符合他们时代特点的那些趣味和抱负。自从玛莫罗桥以来，十五年岁月流逝了。谁能向我担保，要是格劳科还活着，不会同样也巴望得到一件开司米毛衣？十五年时间中，违法内容已经变了：对象也变了，今天最好的东西已经不再是一辆杜卡迪 250，凸轮轴，车叉上带伸缩天线，而是高保真的组合音响。手段也变了：已经不再作兴西部片式的骑行奔袭、夜间的攻打店铺、浪漫主义的抢劫。时兴的是一系列偷偷摸摸的抢夺[①]，精心计算如同算储蓄账户上的利息。

发展得再自然不过了。对此，既用不着吃惊，也用不着愤怒。或者还不如说，那是因为，我早已在仇视我的国家了。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意大利已经赶上了欧洲的生活水平；而作为第一个后果的，就是人们欲望、幻想和目标的转移。最后一批穷人已经消失或差不多就要消失；而随着这最后一批穷人一起消失的，是骑在摩托车上夜袭罗马的亡命之徒一族。我难道不应该想到出走，离开罗马，前往南方，远远地移居到那样的一个城市中去吗？在那里，总体的进步会让年轻人的收入提高，并在他们心中唤醒一种更为保守的趣味。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东方的召唤，非洲的召唤。但是，为什么荒蛮大地的幻象蜃影会再次抓住我的心？

"来吧，皮埃尔·保罗，你说过你想把自己的事说清楚。让你光火的，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是想象在托尔-米利那街单间公寓中的那次家庭舞会,姑娘们趴在小伙子肩膀上。他们的唱片,他们的笑声,他们的玩笑,他们的好脾气,开心场面的一种无足轻重的展示,但是你仇视它,因为你会是这一晚会中的多余人。你在想着你往昔的弗留利,想着当年的那些舞会,曼利奥兴致勃勃地拉起了手风琴的时候。少有的几对男女,总是结了婚的夫妇或订了婚的新人,在葡萄架前硬土圆形场地中央,合着华尔兹的节拍起劲地旋转。那时,轮到你出场了,你冲上前去,搂住艾尔米罗的腰,你们跳得气喘吁吁,直到你那位爱咳嗽的朋友连连咳呛,苦不堪言。他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倒在长椅上喘气,在他表姐妹的照料下渐渐恢复元气,而那些表姐妹,他是用一匹花斑白马套着有边栏的大车从法埃蒂斯带来的。她们始终待在角落里,睁大了眼睛,既腼腆不安,又兴奋难忍,整晚上目不转睛地瞧着那些小伙子在舞场中转圈。

“一旦夜幕降落,你们就作为主人占领它。即便是努托,风月场中最老鬼的,也满足于在他的红围巾和他贴在牛仔裤屁股上的探长星经过的路上,接受一下躲在阴影中的小姐们的喃喃夸奖。斗牛舞和探戈舞的才子,只要我们中有谁给他一个激励,他就会毫不顾忌地把一个女骑士的分量全都放在他胳膊上,对此,我们乡村的习惯要求有一种僵硬和固定的维持。直到结婚为止,女人们无论如何都应保持贞洁。哪个姑娘如果丢了自己的贞操,则会遭受母亲的责备,神甫的指摘,还有情郎的蔑视。假如努托不时重操一下他那诱惑者的旧业,邀请了一个姑娘,那么,他在整个舞会中会始终不放松叼在他牙齿间的英国山楂小枝条。你今天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把它始终含在嘴里:不是作为夸海口吹大牛的符号,就像你很聪明地以为的那样,而是作为一纸封条,在整场舞会中死死地封住他的嘴唇。风俗严如关、障碍万千重的这段时光,甚至连一个亲吻都是严禁的,都会成为一件大事,这你得承认吧!你该不会不为它已经永远地成为了往昔而后悔吧。你还记得,还有什么样的幸福比把你们四个人聚在一起的那种幸福更大吗?尽情的欢乐之后,小油灯熄灭,最后,只有你们自己留在静静的夜晚中,你们彼此用自行车送对方回去,直到凌晨时分。月亮在田野上撒播下它神奇的清光,在塔里亚门托河的水面上倒映出无数银波,一褶一褶的,荡漾开去。”

古老的意大利已不再存在，它当年曾满怀嫉妒地守卫着姑娘们的贞洁，严禁两性之间的关系，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意大利，现代的，宽容的，美国式的，每星期六晚上人们都要彼此走动，上别人家串串门，胳膊底下夹上一沓子莽姆波和麦迪松[1]。资产阶级化的约定俗成，想象力枯竭。但是，说句心里话，时代变化的这一面貌，对我没什么要紧的。我不无恐惧地猜想到一种更严重的后果，它是一定会发生的。它关涉某种东西，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并使它变得不可能。我迟疑着，不愿意用粗暴的词语来指谓这一危险，因为我心中充满迷信一般的恐惧，不敢促成它的实现。但是，话又说回来，如何否定这种显然性呢？在这个被解放了的意大利，小伙子们不会再是一个那么容易接近的圈子了。他们将摆脱我。我将越来越难找到能听我摆布的人了。在消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年轻人身上，至今为止能保证我赢得年轻人殷勤的那些束缚、那些剥夺，都不怎么有分量了，不再能成为他们跟随我的理由了。如果说，姑娘们开始外出更自由了，如果说，就像我每天都能证实的，未婚男女待在一起不用再畏惧舆论了，如果说，随着家庭与宗教的种种禁忌风化瓦解，异性不再藏在高墙之后深院之中而无法接触了，我却能确定无误地说，竞争的规则却变得越来越不利于我的行为，而我的狩猎领地，本来无边无际，现在却缩小在了一些戏剧性的范围内。食物的诱饵，我以往的最佳道具，如今将变得无用。以往，他们是那么缺吃少食，你拿一块比萨饼给他们，他们就会乖乖就范，而并不怎么考虑你要他们提供什么服务，而现在，如此的时代已经彻底消失了。对我而言，这却是一场灾难。我作为家庭补贴的牺牲品，看到所有人都能吃饱肚子，恐怕是不会傻乎乎地高兴个没完的。

啊！确确实实地，我要出走，离开，旅行，要远远地逃离被梵蒂冈二世[2]、中间偏左派、女权主义，以及民主运动的其他成果摧毁的这个国家；我并不声称整个第三世界都像是白色的盖尔达耶[3]，被隔离在撒哈

---

① 莽姆波是一种类似伦巴的舞蹈，这里可能指唱片。麦迪松可能指一种音乐杂志。

② 指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也称天主教第21次普世会议，1962年在梵蒂冈举行，就教会的改革问题通过了多项决议。

③ 这是阿尔及利亚的一地名。

拉沙漠的沙丘中，那里的莫扎比特人[1]帮会严格规定，穆斯林女人出门时必须严严实实地从头裹到脚，只允许在一只眼睛的位置上留出一个很窄的三角形缝隙；我要匆匆地跑过全由男人经营的集市；我要感受到自己身上男人们的目光，不管是懒洋洋的，还是热辣辣的；我要走进那些村庄，在那里，女人们如果被允许坐在自家门槛上，则应该背朝街道，鼻子尖冲自己的家，就像那些移居到了玛莫罗桥的皮耶特拉内拉的西西里女人，始终带着她们故乡的传统。

另一个忧虑的话题，我在变老。四十三岁。比奥斯卡·王尔德接受审判时年龄大四岁。比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遭到杀害时还要大六岁。我那些伟大的担保人。我放低了后视镜，想在镜子中察看自己。嘴角边添了那么多皱纹！脸颊凹陷，如一个死人。还有这张嘴：窄窄的，紧抿的，固定在一道苦涩的皱褶中。目光也一样，显得很坚硬。我想微笑一下。结果只引出一个鬼脸，在我颧骨底下造成了一个S形的凹洞，大小如小提琴上的音孔。我把我自己吓坏了。不过，我至少还能说，我对自己的头发很满意：头顶上头发很齐全，又浓又黑，太阳穴上也不见稀朗，没有一丝白发。然而，往近里仔细一看，我发现，靠耳朵的鬓角处，有两三根头发成了银灰色。我马上就动手，万分小心地把它们一根一根揪了下来。

"唉！你想来吗？"

这样叫我的人，是一个总在五百人广场的绿栎树底下站街的小白脸，他把满头鬈发的脑袋探进了我的车门框框中。他无精打采地用一只手撑着一侧的胯，等着我完成我的那套程序，准备进来，为我提供服务。我的脸红了，递给他我的那盒香烟，好让我有时间缓一缓劲。

"那么，我能上车吗？"

回答之前，我往镜子里最后瞥了一眼，想证实我的眼皮并没有耷拉下来，尤其是左眼皮，这一预防不测的措施，还是博盖塞别墅中卡拉瓦乔的那幅画教给我的一大法宝。检查让我定下心来：我两只眼睛紧紧盯着前面，如果说，我已经到了歌利亚倒在年轻对手打击下的那个年龄，那么，眼下准备打开车门的小伙子，却不会是命运之我派到我身边来的大卫。

---

① 莫扎比特人是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的一个种族。

36

没等我说行还是不行，他就一屁股坐到了我身旁，伸出食指，静静地指给我要去的方向。我们无需走多少路。他让我停在加富尔街的一条横街上，一栋破破烂烂的大楼门前。我像一个木偶人，跟在他身后，爬上不带电梯的楼梯，一直爬到最高一层。在他家，我便完全听任他的意愿。我怎么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我在不断问我自己。他脱下了我的上衣，从里面掏出皮夹子递给我，让我付他应得的钱。他的双手在我看来纤细得惊人。很显然，区别于年轻的无产者们，他根本不必把自己小手指头的指甲养得特别长，就像大众阶层的所有小伙子那样，迫切地想让人知道，自己用不着再干体力活了。

他的室内——这是一间仆人房，门铃上方用粗体字母写着房客"普罗蒂·阿尔多"的名字——在我看来混杂了一种自命不凡和一种漫不经心。在一个角落，摆满了玻璃瓶、喷雾器、小药管的小梳妆台旁，有一个盆放在地上的亚麻油毡上，接着从小小盥洗池中不断滴落下来的水，盥洗池上方，有一个赤裸裸的灯泡。我和衣倒在床上，床头上方的墙上，用图钉钉着一些明星照片，满墙都是。每个明星的嘴上，都被涂上了一层血红的颜色，显得生猛异常。玛丽莲·梦露，简·曼斯费尔德[1]，还有最终变成了索菲娅·罗兰的索菲娅·西科罗那……一个玫瑰色的丝绸折皱灯罩保护着一盏带吊式开关的灯，早先白色的陶瓷开关上积攒了一层油腻，真不知道有多少手指头在上面摁过。其他的家具都已从我的记忆中抹除了，因为我当时无法平心静气地察看周围的情景，我心中实在很惊讶，自己居然接受了这一猎奇，而我本来只喜欢自由的、两厢情愿的爱。

生命中第一次，我嫖了一个男妓：我是说，一个以卖淫为业，为了钱

---

① 简·曼斯费尔德(1933—1967)，美国电影女演员。

而干这一行的小伙子。路上,我们已经敲定了价钱。想虚构一个"礼物",跟他,那是行不通的。这是我生命中一件绝对的新事,它是那么巨大,跟我迄今为止的行为准则是那么背道而驰，简直就可以跟我对佩皮诺的厌恶反应相提并论了。

他验看了一下我递给他的钞票,然后开始干活。对这第一次体验,我只保留了一个模糊的回忆,除了尖刻的结论,与其说我是愿意,还不如说我是在忍受。是他在引导我,无论是方法,还是姿势。我根本无法放松下来,不由自主地集中精力思考那一系列原因,它们似乎一个比一个更令人沮丧,带着我乖乖接受了五百人广场上一个小白脸的提议,并不比一个等火车的旅客多一点或少一点自由的选择。

我只需要问一下自己:"P. P. P. 绕道溜进这个众人皆能进的嫖房会惹谁不高兴?"就能估量出我的堕落。或者问一声:"什么人会最早证实,那些拉客的人白天黑夜站在考古博物馆的围墙底下,忠诚地为他提供方便?"答案不会让人有丝毫疑问:十来年以来一直在公开揭露我就是腐败与丑闻之根源的所有那些人。新闻记者、警察、法官、主教、医生、心理学家、各政党的党员,分别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都在那里以保卫"社会"为己任,而萨拉盖特、阿尔多·莫罗和路易吉·隆哥的意大利[1],也正是建立在这一道德秩序之上的。每当有一个波尔加特或菜市场的小青年跟我稍稍交换一下爱情，他们的价值就受到一次挑战。而在这个房间,事情正好相反,它们找到了一种堂而皇之的认可仪式。

通过支付一个职业男妓的服务费,我避免了我永恒的教唆罪,那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生活规则。从我住到罗马以来,我还没有一次出门时忘记去猎艳。任何一个模样不算太糟的十五到二十五岁之间的小伙子,在街上跟我邂逅相遇,都会对我的微笑报以回答。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那都无所谓。即便他们拒绝我的邀请,反正十有八九是这样的情况,他们也不会不带着一种秘密的内心慌乱而离开。这正是人们不能原谅我的地方,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宣传不安情绪、唤醒内心中依然沉

[1] 朱塞佩·萨拉盖特(1898—1988),意大利政治家,社会党人,1964—1971年任意大利总统。路易吉·隆哥(1900—1980),意大利共产党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意大利青年运动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睡的欲望。但现在呢？这个跟我勾搭上的家伙，他的情况肯定被普通情报部门记录在案。警察局，派出所，全盯上他了。我跟他一起所做的，仅仅局限于警察部门规定的容忍限度之内。更彻底的归顺，恐怕也不会招来我的敌人们的追逼。

我进入了某种隔离居住区，进入了明码标价、公开承认、划分地盘（在泰尔米尼火车站附近）的享乐实践中；那是得到了警察局长本人同意的小小违法；故意维护的恶习，就像一种固定不移的脓肿，靠了它，得以让城市的其他地区维持健康状态。因此，当我的客人竭尽全力想做得对得起他那份工钱时，我则玩弄着权威的游戏。不是没有悔恨与焦虑，他的努力惨遭失败便是证明。

"等一会儿吧，"我说，"这恐怕只是一时间的疲劳。"

疲劳？根本不是。应该说，那是一种投降的意识，在受了司法机关与报刊媒体长达十年的迫害后，面对法律，摩西之法，圣保罗之法，共产党之法，举手投降。

而且，它还以一种苦涩的洞察力，看到了我失败的其他原因：一是罗马的变化，通过消化波尔加特，通过把那些原本无所事事、没有工作的移民大众送进工厂、机关或者建筑工地，剥夺了我的小子们[①]的存货；二是女性的解放，它指责了我"另类"的生存状态，并让所有那些跟我一样无法把这一胜利看成他们自己的胜利、并感到自己遭受了第二次放逐的人全集中到了火车站附近；三是对安逸生活的宽容许可，它顺便也创造出了"不正常"，而这迄今为止依然陌生的种种变种，只配停留在阴影中，秘密中，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只配留给小白脸，而那些闹个通宵的"家庭舞会"，则以光线、声音和刺激，大声宣告做爱的权利，只要那是好的爱、合格的爱；四是人文科学的迅速传播，尤其是精神分析学的惊人成就，它为我那种状态起了一个名称，为我那种行为贴了一个标签，为我那种情况竖了一根牌子；最后，第五，是我自己对衰老的害怕，面对鬓角长出的第一根白发的恐惧忧虑，早已把我推到一种付钱尝鲜的庇护中，一种人们不能拒绝的、由我的金钱做保障的愉悦中。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很不幸,假如根据电灯旁那个大闹钟残酷无情的滴答滴答声,这事情其实也并不是那么有保障的,闹钟的指针已经在圆圆的钟盘上走了半圈,它下面的那个小铃随时随地都会响起,在我来访结束的同时,同时也宣告我那生涯的第一次失败。尽管他调动起一切精力,施展开十八般武艺,还是无法达到有利的结果。最终,他只得抬起头,擦了擦嘴,到盥洗池那边去吐痰了。

"你病了吗?"他很不客气地问我。他的虚荣心被触动,但是,他尤其有些担忧,生怕我把这次情况说出去,会影响他在五百人广场的露天市场中的行情。

该怎么向他解释呢,这一小小的挫折只不过是正在洗劫意大利的人类学灾难一个微不足道的后果?别了,我在弗留利度过的青春岁月中那一份天真,我还以为能在罗马的赤贫无产者身上重新找到相应的情感呢。别了,自然以及自然之爱的神话。眼下,这个小伙子所做的每个动作——对着镜子仔细察看自己,仿佛我会把病传染给他,喝下一杯粉红色液体,无疑是预防黏膜发炎的某种药水,把一个镯链重又戴在手腕上,只见那上面的一个黄金小圆牌上,镶嵌着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同样,还有我自己为自我整理而做的每一个动作,抻一抻领带,拢一拢头发,总之,重新拾掇一下一个出门在外的资产者的适当外表,随后,还有我们以握手来彼此告别的方式,就像了结了一桩什么生意之后那样,所有这一切,全都说明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买主之于卖主,顾客之于货商。

对于他,这只是日常营生,家常便饭,今天因我表现的欠缺而变得略略轻松了一些,但是对于我,如果说,这第一次遭遇应该为一种习惯揭幕的话,那么,它就将是对我今后生命内容的可怕肯定。罗马的变化把我们两个人固定在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残忍的角色中:他落在了卖淫者的经济范畴中,我则落在了同性恋者的心理学范畴中——同性恋者,是的,既然最终得把这个词说出来,医生与警察的这一发明,我面对权力而放弃的这一语言学象征,我在走进他房间时就换上了身的这一件从号衣,这个新词,就跟它所指的那类人一样唬人。

我回到街上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赶紧跑到五百人广场,戴克里先

城墙的脚下,就在佩皮诺的那个同伴为追他而把我甩下的地方。由于无法抓住他,我想再一次等在我让他跑丢的那个地方。我爬上一条长椅,闭上眼睛,一直数到一百。这一物恋般的仪式,神奇的念咒,为的是把这个其形象已越来越朦胧的人留在我心中。“他的嘴是什么样的呢?”我问我自己。“他的眉弓是不是沿着缓缓的斜坡伸向鼻根?”他容貌的细节不时来到我的脑海中,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又是那个,但我始终无法抓住他相貌的整体。我刚刚开始怀疑其中的一点,马上又对另一点更不确信了。到最后,我简直就不再说得出他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仅仅几秒钟前,我还坚信他脸上根本就没有一根胡子,而眼下却又怀疑他是不是拿刮胡刀刮了脸。

我想我最好还是到托尔-米利那街的一头去,去那里等待。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再去那里等,虽然我多少有些担心会碰上佩皮诺。纳沃纳广场附近的街区尽管还没有被赎买和改造,以便修复后租给富有的外国人以及电影界人士,却已丢失了相当一部分大众特色。在这整条街上,没有任何一家店铺,没有任何一个手艺人能告诉我,他们认识附近有一个长头发、小胡子、戴一顶鸭舌帽的房客。在酒吧,人们也无法给我提供情况。看来,我的那个小偷是把我给骗了,经过好几天白费工夫的监守后,我已经坚信了这一点。此外,我其实也不愿通过他的斡旋来达到我的目的。“错了,我不是他的小弟。”我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如果仔细回想一下,我就能听出话外之音,听出这个小伙子和我之间的某种契约。他跟他的朋友决裂了,兴许,那人根本就不是他的朋友。兴许,佩皮诺是通过某种威胁强迫他成了同伙。

接下来的几星期里,我继续东找西找。每天晚上,当我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我都会以一脸沮丧让妈妈提心吊胆。在那个阶段,我的一切都糟得很。我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出于谨慎,我把我的头发给染了,结果那种染料在某几绺头发上粘住了,在其他的头发上则粘不住;踢足球时,我撞掉了一颗门牙。简单的事故,若是在别的情景中我或许会一笑了之;但它们却让我情绪一落千丈,并给了我不合时宜的建议,一再返回到火车站广场,结果,短短一段时间后,我就对那附近的地带,以及那里的夜间常客了如指掌了。没有丝毫的快乐;相反,却万般忧伤地觉得

自己迷失于一条没有出路的路上。

能把我从这邪恶道路上拉回来的唯一那个人，却根本不关注我的命运。他为什么要进入我的生命中，假如他不得不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那种雀跃一般的优雅举止，一下子就迷住了我，但它现在对我又显得那么残忍。那一记亲吻，我该不是在梦里接受的吧？一次又一次地，我用手指慢慢抚摩着后脖颈上被他嘴唇轻触过的地方。“安杰罗，安杰罗。”我企图把他叫回来，但始终无用。一会儿用一种呼喊，若我是独自一人，一会儿用一丝喃喃低语，若我是在人群中，我要脱离众人，来单独召唤他，用这三个优美但又虚构的音节。他走了，他远远地逃走了。踏着他那双橡胶底球鞋，蹦蹦跳跳地远离了我；双手举过头顶，鼓着掌，就像福拉·安吉利科[①]笔下的音乐天使那样；就在他的连蹦带跳之中，我最后的希望，我最后的运气被他一齐带走，连同他那苗条的、转瞬即逝的身影，而对他，我却连个名字都说不上来。

① 福拉·安吉利科(约 1400—1455)，文艺复兴前期佛罗伦萨画派的著名画家。

第三部

37

你有没有注意过，日历上最长寿的那些圣徒的本名日都是些什么日子？尼古拉日12月6日，西尔维斯特日12月31日，安东尼修道院长日1月17日，卡泰罗日1月19日，费利采日1月25日，齐罗日1月31日，比亚乔日2月3日。所有这些人的老年特征都很明显，例如长长的白头发，乱蓬蓬的胡子，拖及地面的长大衣，头顶上的风帽。已经完结的太阳运行周、走向末期的年岁的形象。为了打败潜伏在卡匹托尔山深底的恶龙，西尔维斯特得走下三百六十五级台阶，才能见到那怪兽，这一数字，我们的传说可不是随便选择的。

12月底和1月份除了为我们带来天文学更新的最初收获，同时还带来了那些年纪最轻的圣徒的本名日：耶稣日12月25日，无辜众圣徒日12月28日，塞巴斯蒂安日1月20日，士兵约翰日1月31日。新的一年接替了死去的一年，子女排斥了父辈：基督教礼仪只是繁衍了太阳运行周和大自然的奥秘，后者自我耗竭，为的是重新繁殖。那些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尽管比意大利更缺少异教色彩，却把基督的摇篮跟圣诞老人的大胡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你们其他人,在坎帕尼亚,你们对你们圣徒象征性的结对子特别敏感。在格拉尼亚诺,你们刚刚把拄着拐棍弯着腰的卡泰罗抬起来游行了之后,第二天接着就纪念嘴上无毛的塞巴斯蒂安。维科–艾冈斯的水手们同时走出教堂，把戴风帽的齐罗的偶像和少年郎士兵约翰的半裸体雕像一起展放在大海边,以求得到他们的保佑。

在那不勒斯,12 月 31 日夜间，你们把无法再用的破旧物件从窗口中扔出去。在家庭生活中也一样,老的要给年轻的让位。裂了缝的盘子,椅面凹陷了的椅子,弯了腿的柜子:全都从屋子里扔出来,纷纷落在街上。成百的箱子、椅子就这样从高高的楼层上飞坠直下,过路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躲避,唯恐那些物件砸到自己身上。这种习俗,人们常常描绘:但人们当真明白其中的意义吗？曾用来制作家具的木头,又回到了它以往扎下根系的土壤中。缺了口的陶瓷碟子,又回到了陶土匠取料揉泥的泥土中。

同一时刻,子夜钟声敲响之时,你们在 12 月份准备了整整一个月的成百上千枚爆竹噼里啪啦地爆响,争先恐后地飞向天空。每一道门槛上,每一个阳台上,都飞射出一束束五彩缤纷的烟火,灿烂辉煌的光簇,在空中撒开星星点点。椅子落地,爆竹上天。作为跟前者相反的运动,也作为前者的补充,这可不是由人们对花炮某种幼稚的狂热所导致的,就如那些过于心急的观察家所以为的,而是出于地壳下热土的原本天性。请想一想燃火的材料,想一想暂时沉默的火山熔岩,对那不勒斯来说,它的觉醒始终是一件可怕的事。不久前,一盏酒精灯落到一家细木工场的碎木屑当中,点燃了做店铺后堂用的岩洞。一眨眼间,火焰就延伸到法尔科内峰[1]山坡上自然形成的所有店面。等消防队员赶到,大火早已烧过。大火在山岭底下,在千百条沟壑之间蔓延,它还在流窜,它如再不熄灭,就将跟另一股火汇合了,那股永远燃烧的野火,既无始又无终,从干燥而又僻静的福雷格林田野，一直到庞贝石灰质的荒野。在那不勒斯,你们所有人都跟看不见的火有一种密切的亲近关系,这火始终静静地潜伏在你们城市满是细孔的凝灰岩之中。通过圣西尔维斯特日的那

① 法尔科内峰是那不勒斯的一座山名。

些爆炸,你们除了把它解救出来一晚上,还要干什么别的吗?每个窗户都在模仿维苏威,变成了一个火山口。星火灿烂的幻景,它跟你们从外国人那里借来的对美丽画面的狂爱没有任何关系。

彻底改变一下地势,高的变低,低的变高:这是一种需要,它在别处全都默默无闻,却以一种周期性的暴力,夺走了你这一城人民的心。高高位于头顶之上的应该落下,而藏在地底下的应该喷发出地面,同样,深深钻入大地内部的西尔维斯特,逢遇了耶稣冉冉升起的运星[①]。

你,你骄傲地告诉我说,你要结婚了。你要结婚了,刚刚租下了位于沃梅罗[②]岭顶上圣弗朗切斯科坡道的这套公寓。你的父母也搬出了圣葛雷高里奥-阿尔梅诺街的一个矮房[③],搬进了你曾带我去过的卡普亚那门的四居室公寓。那次拜访,你以为我都不记得每一个细节了吗?那客厅,窗帘老是拉拢着,家具上都盖着罩布,每年只用上两三次;那卧室,你跟你三个兄弟曾一起在那里睡觉;那餐厅,也跟客厅一样不怎么常用;那屋顶花园,你父亲就坐在上面的一把长椅上打瞌睡,你母亲则围着她的那几盆罗勒和薄荷打转转,而在藤萝架下,你现在正读着我的故事。他们的儿子,继续着这一由下向上的运动,将居住到城市之巅,这是任何一个那不勒斯人梦寐以求的事。当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赞同你。你的祖辈所缺少的明媚光芒和新鲜空气,你将获得它们。你的朱塞皮娜会在差强人意的条件下养育你的孩子们。潮湿,阴暗,缺少氧气,注定了斯帕卡那波利街的洞穴有害健康。但愿它是明亮的,一劳永逸的明亮,我并不责怪物质条件逐步的改善,但愿它能给千千万万家庭带来必要的舒适。一个带浴缸的卫生间,一个抽水马桶,一扇朝向蓝天的窗户……难道是我在鼓吹,饭桌上有面包,床头上有一本《圣经》就足矣?悲惨的浪漫主义可不是我的强项。每一座矮房[④]在我眼中都显得既神圣又卑贱:神圣,因为它就是连通地下通道的走廊,卑贱,因为它是由自私自

① 所谓运星,指占星术中某人诞生之时恰好升起来的命运之星。

② 这里的沃梅罗岭,以及后文中的圣弗朗切斯科坡道、圣葛雷高里奥-阿尔梅诺街、卡普亚那门、斯帕卡那波利街等都是那不勒斯的地名。

③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④ 原文为意大利语。

利的富人们指定给穷人的住所。只要你愿意,你就爬上沃梅罗岭吧。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些阴暗的岩洞,你的家人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我要对你说的,并不是你要为你的小山冈带去一种情感上含糊的忠诚。我要对你说的,是那种在那不勒斯把上与下、高与低联系到一起的神秘关联。

杰那里埃罗,我的爱,当将来有一天,你在你的屋顶平台上眺望海湾时,我还会爱你吗?

你梦见一连串持续的向上:地理上的,它把你从斯帕卡那波利的洞穴提升到住宅区的观全景平台;职业上的,它把你的威尼斯灯笼安装工的临时岗位换成了公共领域中的一个固定职位;最后,社会地位上的,它把你从单身汉的可疑状态带到了一个有妇之夫受人尊敬的状态。

愿"向上伸腾"成为你的公民抱负,我永远也不会因此抱怨你的。只不过,我恳求你了,你要尽可能跟你城市的下层,跟那不勒斯建于其上的地下世界保持接触。当世界上其他所有大都市都以它们的地下为耻,纷纷把它留给下水道和耗子,那不勒斯却把它地下通道的迷宫改变为充满神话和虔敬的地方。阿拉姆的圣彼特罗地下墓穴,炼狱之灵地下墓穴,圣杰那罗骷髅场:你就置身于那静悄悄的地下万花筒之中吧,它就在这些变成了墓穴的拱门底下点燃蜡烛。你也一样,你将屏住呼吸,踮起脚尖向前走去。面对这样一种崇拜,它不仅触及某些死者的灵魂,而且还碰撞到世界的根系。

那不勒斯和意大利的历史难道不是从库梅斯[①]开始的吗?任何别的地方都不能再给我一种神圣的概念,只有从山岭中开辟出的这条长长走廊,而据说就在它的尽头,女预言者向埃涅阿斯[②]预示了罗马的命运。挖得很深的埃维亚岩石侧堤中隐藏了一个洞穴,那位神秘的女占卜者就在那里预卜未来。将决定你未来生活的那些话语,难道你以为可以乞求她免于从口中吐出,就在烟雾腾腾地冒着硫磺蒸汽的三脚鼎旁边?

总之,你再好好想一想吧。不必太着急。先掂量一下利弊得失,然后

---

① 库梅斯在意大利南部,是最早的希腊城邦之一,公元前8世纪时由来自希腊埃维亚岛的移民建立。

② 埃涅阿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特洛伊被攻陷后,他背着父亲冒着大火逃走。他的事迹可见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

再搬家。你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向市政厅申请一个职位。“结婚了还是单身？”办事员这样问你。回答自然而然地就流淌出来。你在问卷上写下了你的年龄：二十五岁。他从他那窗口的另一侧看到的强壮身影，会让他消除最后的一丝怀疑。他惊讶于你的坦诚供认，把你的表格塞在最底下，你就等到最后吧。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结婚，谁会最高兴？当然是米盖雷先生了，你说你很痛恨他。还有圣葛雷高里奥－阿尔梅诺的修女们，她们将为培养出了一个优良的基督教徒而欢欣鼓舞。还有你那位在阿尔法罗密欧工厂当工头的兄弟，当他支部的同志们带着一种可疑的执著向他打探你的消息时，他就再也用不着脸红了。“你兄弟还没结婚吗？”没有，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置身于顶峰！你得有勇气顶住那些压力！女预言者在她的洞穴中发问！快快钻到地下，去见那个握有最终秘密的女人吧！

但是你，我清楚地知道，你读着我的这些文字时，脑子里在反思什么。“通过库梅斯、维吉尔和占卜女，他到底要对我说什么？为什么要以这诗意的表达？以如此颤巍巍的嗓音提到一个比死神还老的古老年代？而我心急如焚地只等待着他的回答，只有它与我的利益密切相关：公证人要求我提供的这一银行担保，他会不会给我，会，还是不会？要是没有这份担保，圣弗朗切斯科坡道那套公寓的租约就会从我眼皮底下悄悄溜走。”

疑心重重？嫉妒满满？你想要我向你承认实情，它会让我难为情吗？你根本就不可能猜不出它来。你求我给你的担保，我是决不会给的，因为……不！我实在做不到把这些词语写到纸上，一旦黑字落到了白纸上，它们可就变成了一种耻辱！

看来得为你描绘一幅什么叫幸福的完整绘画，我从泰拉齐那门那道标志着旧波旁王国边界的庄严辉煌的大门一走出拉丁姆，前进在满是水牛、夹竹桃、柠檬树的地方起，就始终沉浸于这一幸福中。一切都在促进我的心境愉悦：海上吹来的轻柔微风，随着毛驴一跳一跳的步子而持续颠簸的大车，坐在公路边上的西瓜堆旁、见口渴的路人过来便献上一片红艳艳的熟西瓜的妇人，躺在一棵山毛榉树下一道芦苇篱笆后的牧人沙哑的歌声，河口上一艘在混黄水面上撒开了渔网的帆船……然

后，当我开始走下城市，当我进入晾满衣服的铁丝底下的街道中……但是，每当我局限于赞美那些宫殿、那些教堂、那些巴罗克式的金字塔、那些漆得色彩鲜艳的隐修院、那些无可比拟的那不勒斯背景时，你的嘴便会噘起来，露出怀疑的表情。“真的吗？他的眼睛只是死盯着这些美景和奇观吗？他什么时候才会决定做个真诚的人？”

好吧，就让我们坦率直言吧。我不愿意失去你，杰那里埃罗。你不要躲在我够不到的地方……放弃你的婚礼吧……留给我一丝希望……一旦高高地栖居到沃梅罗岭上，就不会有什么再来阻止你结婚。迄今为止，我还能势均力敌地对抗你在修女们那里接受的教育，对抗共产党员们的讹诈。假如是独自一人，你还会订婚吗？你的朱塞皮娜，她怎么就令你无法抗拒？你听从的是一种自发的趣味吗？换做我的话，我是不会那么轻易上当受骗的。堂·米盖雷，你的兄弟，电视节目中的口号，媒体的回声，什么事情都要掺和一下。啊！杰那里埃罗，我不求你做出任何确切的回答。好好思考一下……不要轻易冲动……你担心我会影响你吗？不。我只是向你重复：留给我一丝希望……只要一点点微光……尽管，你怀疑我是通过金钱来把持你的，这一点对我来说真是可怕极了！你以为，你的推理能逃过我的眼睛？

“P. P. P.，说到底，他是哪里来的？从弗留利！几乎是半个奥地利人！北方人！这支繁衍绵长的贪得无厌的种族的最后一人，他们靠他们的外汇储备树立了自信心，利用我们的贫穷在地中海边站稳了脚跟，以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在他之前，克虏伯[1]选择了卡普里[2]，格劳艾登[3]选择了陶尔米那[4]，劳伦斯在叙利亚居住，纪德在比斯克拉[5]逗留。而他呢？他是不是因为觉得印度或肯尼亚过于遥远，就把自己的大本营安扎在了那不勒斯？他恳求我跟‘城市的底层’保持接触，到底是想要对我说什么

---

① 克虏伯为德国工业家世家。

② 卡普里，意大利小岛，在第勒尼安海的那波利湾。

③ 威廉·冯·格劳艾登男爵(1856—1931)，德国摄影家，同性恋者，主要在意大利工作。他拍摄的一些照片常常被明信片选用，让陶尔米那这地方名声大噪。

④ 陶尔米那是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个小山城，其美丽的风光曾得到歌德的赞美。

⑤ 比斯克拉在阿尔及利亚。劳伦斯和纪德也都是同性恋作家。

呢？留在他欲望的范围内，是的！我是不是应该充分信任所有这些关于地下烈火的无稽之谈，地下骷髅场的奥秘，以及我还不知道的那些东西？呣！我担心我对所有这一切的意义猜得太透。但是，假如他指望靠着我们的贫穷把我们永远控制在他的掌握中……”

停住，杰那里埃罗！别走得太远了！假如你想得到半数预付款，好吧，我马上就把担保书寄给公证人。你将看到，我不会寄希望于你资金上对我的依赖，以确保你对我的服从。假如你不爱我了，你就结婚吧！但愿对一种物质帮助的需要不至于使你陷入一种懦弱中。你是自由的。那不勒斯并不仅仅只是我的“活鱼舱”，就像我以为听到你说过的那样。假如你说过这个词，那就把它收回去吧，我恳求你了。多么残暴的词！我有一千个其他理由欣赏这个城市。

可惜啊，当我机会来临，回到那里去拍我最后那些电影中的一部时，你对我将只是一个漫不经心的朋友，你全身心都扑在你的小家庭上。你表现得依旧同样殷勤，同样热情，但我在你心中已经处于次等地位。那就算了吧！兴许是你抽身而退的时候了，杰那里埃罗。让我们彼此告别吧。再见了。万一我会来召唤你，那也是为了让你在古老首都的街巷中为我当导游。别担心我会用种种哀求来强迫你，会来拆散你们这一对。我已经输掉了跟你打的赌。朱塞皮娜赢了。我承认我失败了。在斯温的那次永远难以接受、永远难以忘却的消失之后，这是我的第二次溃败。你觉得我心境十分平静，不是吗？我太快地承认了自己的败绩？你是不是认为，那个穿橡胶鞋、头发蓬乱的小伙子取代了你的地位？我在等待他什么？我寄希望于他什么？他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回到我身边吗？兴许吧。

假如有一天，爱情又一次前来抓住我的手，然后又不履行承诺，把我丢弃，那么，我将第三次渡过失败的难关吗？

38

说到印度和肯尼亚，在被你说成是我的盘算的推动下，我兴许已经着手安排这些旅行了。假如你能知道，在我向自我贬低的欲望让步的那些日子里，我曾以什么名义把自己拖进了淤泥中！意大利越是走向富裕，我就越是远远地藏身于南方。同时，在衰老过程中，我也就越是看到，我自己取悦他人的机会在不断减少。我把我的狩猎场从维苏威火山的丰饶坡地，搬迁到乞力马扎罗山的荒芜山腰。第三世界将永远是那样一些人的天堂，他们衣兜深底的几个小钱总能让他们成为大阔佬。地中海彼岸的男人喜欢在自己耳朵上夹一朵茉莉花，但我们遗憾地闻到，在茉莉花香中，已经混入了金钱的铜臭，玷污了这一习惯的诗意。我们对非洲和亚洲的诱惑力的永恒暧昧，摇晃不已的棕榈树树梢向四方荒野喃喃道出的永恒谎言……在惩罚我之前，请先听一听我在那里出了什么事，看一看我是不是第一个挨罚的人。大海之外的国度无疑给我带来了跟一个无耻的旅游者同样多的机会；但是，在表面的轻而易举底下，你将发现我真正的目的，那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目的。

在印度，在一个既没有公民身份也没有身份证件的国家中，我很好奇地想看到，人们会对他们自己形成什么概念。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接受了这个相当不确定且又明显不足的概念，尽管一个对博洛尼亚恋恋不舍的公民心中希望的正好相反，在博洛尼亚，连拱廊的建筑结构把居民们那么长久地融合在一种无疆界的团体中。

孟买泰姬陵酒店，世界上最大的旅馆之一，我把行李箱放在大厅的一个角落，空出手来，去跟一个前来欢迎我的朋友握手，这是一个外表英俊、头脑聪明的男子。同时，他的心底充满了忧伤，因为他所属的婆罗门种姓，印度教中最高等级的种姓，禁止他从事公立学校教师之外的另

一种职业,不然,就是自甘堕落,纡尊降贵。

我们倚着大厅中的一根柱子聊起天来,这时,我注意到一个神情可疑的家伙,一边绕着我的行李箱打转转,一边朝四下里瞥去一道不怀好意的目光。我的行李中,除了准备换洗的几件衬衣和一条长裤之外,还有我最近一首诗的手稿。如果这些文字稿丢了,我是会十分伤心的。我吃不准该采取什么行动,便悄悄尝试着把我对话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怪异的行径上来。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去,口气高傲地来了一句:"哦!那只是一个首陀罗[①]。"说着,便将他那高贵的黑红的脸转向了另一方向。

令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那个首陀罗,印度教中最低级的种姓者,其行为当然也最无羁绊,突然一把拎起我的行李箱,当着高贵者的面,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而种姓更高贵的人却呆在原地,不知所措。我立即把那个婆罗门还有他的尊严甩在原地,赶紧跑向一个正穿越大厅的门童。他为我指了指前台,柜台后站着一个看门人,后者把我打发给一个侍者,侍者前去寻找酒店中唯一一个善于跟小偷打交道的人,因为,这件事涉及基督教徒。

用不着在此费口舌,等我彻底弄明白其中的奥妙,我的行李箱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种极其严密的法则,按照泰姬陵酒店中每个工作人员的不同种姓,仔细区别了他们各自的不同职责和不同权利。门童们身为锡克教徒[②],既没有欲望也没有可能插手前台的事务,前台人员全都是祆教徒[③],至于侍者,则是从耆那教徒[④]中挑选的,他们不能参与那些只属于佛教徒或穆斯林的事务。

---

① 首陀罗是印度教中的一种低等种姓。种姓制度在理论上把人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婆罗门(Brahmin,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刹帝利(Kshatriya,武士和国家管理者)、吠舍(Vaishya,工商业者)和首陀罗(Shudra 或 Sudra,工匠和奴隶)。四个等级外还有一个"贱民"阶层,称做"不可接触者",实际上是第五个等级。

② 锡克教(sikhs)兴起于16世纪初,由印度教分化发展而来。

③ 祆教徒(parsis),又称"帕西人",是琐罗亚斯德教徒,是波斯移民,主要从事工商业,操古吉拉特语。

④ 耆那教(jainism)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与印度教和佛教并称印度的三大宗教,"耆那"意为胜利者。

至少我认为，我已经从我主人口里掏出来的简明解释中得出了这一教训。他邀请我喝一杯茶。“请给我讲一讲你们的神明,”我请求他,这时，一个服务生在我们中间的洋苏木桌子上放下了两个十分精巧的细瓷茶杯，还有一把装饰有大象图案的茶壶。“毗湿奴[1]是谁？湿婆[2]是谁？”作为回答,他只是提起茶壶,先在我的杯子里倒满茶,然后,杯子满了之后还继续倒。液体流到了托盘中。“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说,“你通过这一动作,向我显示了,我人来到了印度,脑袋里却充满了西方的思想概念。我应该把它清空,然后才能灌输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他蠕动嘴唇,像是在撅嘴表示同意,但始终没有真正开口认可我已经证实要放弃我的更新意愿。对一个超脱红尘、前来入门领悟印度教智慧、摆脱凡世烦恼诸事的旅行者，难道就该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行李被人偷走吗？

泰姬陵酒店只是印度大世界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国家中,人们处处都会碰壁,撞在一些狂热的专门化措施上,它们把人们维持在密不透风的隔离状态中。由于没有登记簿写有他们的姓名以及他们的身份状态,他们便总是在问自己,他们在社会上占据了一个什么地位。每个人都感到需要把自己固定在一些十分有限度的使命上,并且重复一些动作,直到强迫的程度，而这些少量的动作则会给他带来不可或缺的微小的自我保证。

自豪的婆罗门并不是唯一被禁忌缚住手脚的人。最悲惨的平民也畏头缩脑地生活在对种种繁琐礼仪和荒诞戒律的细微遵守之中。在一个最低下的阶层经常光临的大众餐馆中,我发现,所有人都只使用左手吃饭。一点儿都不轻而易举,因为这需要用左手仅有的手指头(按照他们的饮食规矩,刀叉和筷子同样禁止使用),抓住一点点米饭,把它们捏成小团,再拿这个饭团沾一沾一种咖喱调味油,然后送进嘴里,中途还不能让它散了。我一开始还以为,这帮独臂运用者是在他们的饭碗之上进行着一番暗中较量呢,他们事先肯定是打了什么奇怪的赌,但是,我现在对印度已经了解得相当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机械地重复一

① 毗湿奴,印度教三神组合之一,掌管世界的繁荣并维护世界。

② 湿婆是印度教的另一大神。

个表面毫无理由的动作，实际上保护了那些只使用这一可笑方法的人避免分崩离析和蜕变解体，保护他们不被非存在搞得头晕眼花。

一下子，对我的一部分批评落了下来，落到了我在旅行之前称为流行欧洲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头上。总之，一旦姓名、身份、固定住所（而不是在此地受到高度评价的巡回住宿），以及所有那些被我轻蔑地冠以“封闭家居”之名的东西得到了确保，那么，留给内心自由的地盘就会远远大得多，就不必在每一天，每一时刻，都以一成不变、永恒的老一套动作来证实自身的存在，就像那些可怜的吠舍，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把右手放在膝盖上不动，却任凭咖喱汁从自己的下巴上流下来。

这也是引导我离开绿山的一大理由，我离开那里，搬入欧弗拉特街一个更舒适、更宽敞的公寓，我终于找到了足够的墙面，来放置我那几千册藏书。当然，促成了这一选择的还有另一些动机，你以后会知道的。但是，我从孟买回来后，对以下这样一种信念便不再陌生：通过拥有一个足够大的私人空间，保证头脑能随时随地应付该应付的事，人们便能节省数量大得难以想象的精力。真是智者的唯物主义。在印度，最具强制性的那些礼仪中，几乎包含了所有涉及食物与烹调的礼仪。在挑选和制作菜肴的繁重杂役中，人们真不知道要浪费多少时间啊！而我，只要打开我的美诺冰箱，这一资本主义的著名品牌[①]，我随手就能抓到一片火腿肉，或者一个煮鸡蛋，而且我还不会中断吟诵我刚写下的诗句，并在心中默默修改。

不过，当我对你说我在海外遭到了“惩罚”时，我指的则是另外几次逗留，不是在亚洲，而是在非洲。首先，还是让我给你讲完我的第一次旅行，种种事件发生时，对我的意识还是那么晦涩莫名，但它们已经以自己的方式准备了未来。

我前去拍摄一部关于印度的纪录片，也就是说，关于印度的饥荒，我问自己：“如何避免一些悲惨主义的镜头呢？”我的婆罗门朋友，那个又严厉、又严肃的男子，因为如此严格遵守着他的法则，似乎不会降低身份来为意大利文学保留一首诗，便为我提供了必要的迂回法。他告诉

① 美诺公司是德国著名的家用电器和商用电器制造商家。

我说,从前,还在英国人统治时期,一天,斋浦尔的一个土邦主走出了宫殿,去视察他的领地。大雪为田野覆盖上一层白袍。一些小虎崽把一片荒野当做了它们的临时兽穴。它们藏在稀疏的灌木丛中,早已饿得不行了,轻声地呻吟不已。仁慈的大老爷对这些小生命十分同情。他开始做祈祷。念完长长的经文后,他打发走了随从,脱掉了身上的衣服,以身饲虎,就在他继续不停地祈祷时,那些小老虎用它们年幼的牙齿把他撕裂了。

王子的牺牲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如此奇特的效果,我并没有止步于弄明白自己心中慌乱的原因,当即决定在我的电影中采用这一传说,尽管在电影剧本中这样处理不合历史事实。我和摄制组一起,转移到了圣城贝拿勒斯,那里,人们在恒河边上拾级而下的阶岸上焚烧死尸。葬礼仪式在一种平静的氛围中进行:杂糅了有节制的优雅和安详的形式主义,这使葬仪摆脱了对死亡的忧虑。每个人都在心底里想着死者的真福,他的魂灵将会很快体现在另一个肉体中,过上一种更幸福的生活。因此,在我看来,似乎再也没有其他地方比这里更有利于我孕育希望。

我把摄影机架在一个庙宇的台阶上,叫来一个小男孩,站在跟前,让他黑亮黑亮的大眼睛盯着镜头。我早已准备好了我的问题,他那些团团围住我们的小伙伴纷纷安静下来之后,我便问起他来。"如果有一只老虎,就在那里,在你面前,已经快要饿死了,你会献出自己的身体来喂它吗?"他的面容舒展开来,嘴唇一咧,微笑中露出了两排紧密而尖利的牙齿。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的,我会这样做的。"

我本该满足于这一直率,它十分符合我的内心意图。然而,追根寻源地分析这一声如此响亮、如此光明的"是的",我似乎觉得,他取悦外国人的欲望,可能要稍稍多于对深究问题意义的考虑。对我提出的任何问题,这男孩可能都会给予肯定性的回答:他并不期望得到一份小费——他从来都不伸出那只褐色的手——而是为了给我一个证明,证明他性情随和,乐于助人。不过,从我这方面——我始终被那只老虎的幽灵所折磨——我绝对需要找到一个这样的对话者,他能够接受做出牺牲,不仅明白事情的因果关系,而且完全出自内心自愿。

在一个寺院大门前,我问一位僧侣:"假如有一只老虎,就在你面

前,快要饿死了,你会献出自己的身体来喂它吗?"这位嘴里只剩下一颗残牙的隐修士摇了摇头,对我说:"斋浦尔的土邦主对生灵万物体现出一种无比的爱。他牺牲了自己去救别的生灵。""但是,"我继续道,丝毫没发现我的固执有什么不妥,"假如,就在你们寺院的大门旁,还有一些快要饿死的老虎,你们中是不是有人准备以自身之躯来饲喂它们?""你不应该,"那僧侣回答道,"太看重独立前那些传说的字面意义。斋浦尔土邦主的故事教导我们要有同情心。"

我在功德箱里留下了数量不少的卢比[1]。那位高僧,破破烂烂的呢料袈裟几乎难以遮盖他瘦骨嶙峋的身体,无疑还以为他的劝告对我起了作用,我的此番捐献是我衷心感激的标志。他可能永远也猜不到,其实我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同时也意识到我在苛求一个荒唐的回答,我以这一化缘行为乞求遇到一只不那么执拗的耳朵。

我心想,若是碰到一个尚还健在的土邦主,说不定能在他身上找到严格意义上的自我牺牲精神?我跟米尔扎布尔的王子定了一个约会。他身穿一袭麻布长袍,腰身紧裹其中,包头布中插着一根美洲鸵鸟的冠毛。"按照各种可能性,"他对我说,"一个土邦主会把老虎引到他的宫中,喂它们东西吃。""但是,假如他十分虔信宗教,想用自己的身体来喂它们……""是的,出于宗教上的理由,这样的情况也曾可能发生。""但是,在今天,"我坚持道,根本就没注意,我的主人只是因为需要表现得极其礼貌,才没让一腔怒气发作出来,"今天,这样一种行为还有可能吗?""今天是不可能了,反正我不认为,"他回答我说,那口气听来分明有一种决然,他跟我一开始询问的那个小男孩可大不一样,没有任何理由对人之常情还死扭着脖子对抗到底。

我们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但我的忧伤并没有结束,很显然,在这个广袤的国度中,没有任何人会把被一头猛兽吞噬的神秘快乐感看得高于自己的自卫本能。

晚上,我告别了摄制组,远离市中心,到处乱逛,如同往常一样,我总是被最偏僻、最荒凉的郊区所吸引。那里池塘的水实在太浑浊,无法

---

① 卢比是印度的货币单位。

倒映出枝杈低矮的小树,在那些若明若暗的地方溜达时,我到底在寻找什么?我在梦想什么?假如我对你说,我在贝拿勒斯城那些桥之外的夜间漫步没有明确目的,至少不像我在博盖塞别墅的松树底下或在卡匹托尔山长满灌木的小山坡上寻摸时,人们能在我脸上看到明显的目的性,你恐怕不会相信我的这番话。必须承认这一点吗?我倒更愿意弥补当代印度人的谨小慎微,向老虎赔礼道歉,投身于它们的利爪中,把自己奉献给它们的獠牙……疯狂的想象力……最奇怪的是,在我的思想中,既没有暴力也没有痛苦跟这一牺牲联系在一起,有的只是一种无以名状的肉欲。同时,我试图回想起,这一饥饿之虎以及以人为食的形象,当初曾在哪里如此强烈地撼动了我的心。

我还在遥远的模糊记忆中苦苦搜寻,这时,一帮印度水手开着一辆快要散架的菲亚特一千一百型旧车从阴影中钻了出来。汽车径直朝我冲来,喇叭揿得震天响。这动作,我从那些埋伏在米兰圣巴比拉广场的年轻法西斯分子身上早就见识过了,当时我觉得它既愚蠢又庸俗,而现在,它似乎倒让我感到有一种从天而降的优雅。我一下子就明白到,我为什么只身探险在这个有众多可疑角落的古老公园,这个流浪汉与小偷的巢穴。他们会从我温和的举动中证实,我既不打算逃跑,也不准备自卫。我站在车灯的光芒中,以一种屈从的冲动张开胳膊,纹丝不动,我把自己交到了他们手中。

他们在我身边坐下来,围成一个圆圈,一言不发。最后加入到他们队列中的,是那个开车的人,他从汽车后箱中拿来一个包在破布中的又长又圆的物件,放在身边的草地上。我数了数,他们一共七个人,全都剃了光头,阴暗的瘦脸上,一双双红宝石一般的大眼睛闪耀着光芒,直瞪瞪地盯住我的眼睛。他们露出一种微笑,开始时笑得还有些腼腆,随后就直率地咧开了嘴唇。他们用指甲尖尖的手,慌乱地整理膝盖上的衣袍。他们中有两人脖子上戴着一串红花项链。我以微笑回答他们的微笑,点点头表示赞同。他们要把东方式礼貌的奥秘推向何等的精细程度,然后才肯猛扑到他们牺牲品的身上,狠狠地揍他,把他抢劫一空?

我们彼此静静地相对而视,任一种没有答案的好奇感渐渐成熟,就这样,过去了至少有十分钟。几只夜鸟展开白色的翅膀,飞翔在灌木丛

之上,从河边传来野猫那一阵紧似一阵的嘶哑的嗥叫。在这一片毫无证人的寂静中,我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地任他们宰割,不禁在心中连连问自己,什么动作会是他们进犯的信号。兴许是眼睛的简单一眨巴?或者是脚指头在皮凉鞋中的一动弹?最终,那个带来了器具的人,把他的包裹打开了:是一支笛子,据我的辨别,是一管箫,用一根象牙做的,上面镶有一些浅浮雕。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传递着,仿佛在下决心之前有所疑虑。他们中胸脯上横戴着鲜花的一个,把它留在手中的时间最长,还捏在手指头里翻来翻去。他的同伴们在旁边一致鼓励他。他把这长箫的口子对准嘴巴,开始吹奏起来。一段本土的旧旋律,一个细碎的、断断续续的、凄惨优美的乐段,以一串哀求似的颤音而告结束。简直可以说,印度的整个历史,它世世代代的历史苦难和自然灾难,都在这一曲圣歌中道出了其深深的哀叹。然而,在这没完没了的、并被这音乐家手指头的迅速捏动以及他不竭的气息所延长的喘息中,体现出了一个民族古老的自豪感,无论是永恒的自然灾害,洪水干旱,还是饥荒,任何惨剧都无法剥夺这一民族的温和与尊严。

年轻人站了起来,想赋予这首乐曲更大的力度。他的同伴们,始终团团围坐在他周围,随着每一个旋律变化,频频摆动他们剃得光光的脑袋。有一两个人闭上了眼睛,但是其他人依然寻找着我的目光,想看看我是不是接收到了信息。而我,我从迷惘中返回,并为自己如此错怪了他们而羞耻不已,我差不多是这样翻译这一信息的:“哦,外国人,我们粗野地接近了你,因为我们不知道,一支可怜的笛子的声音,我们为你献出的这唯一的礼物,是不是足以吸引你的注意力。你很快就将回到你的国家,那里的村庄用砖石建造,而不是用牛粪,那里孩子们的数量不是稻谷捧数的十倍,那里的鼠疫和霍乱并不在人们的家门口中溜达。不要太严格地评判我们,我们这些只会演奏笛子的人,只知道用音乐表达我们对世界的谦卑柔情和衷心热爱的人……”

悠扬的旋律久久回荡在温热的夜空中。它轻轻抚摩着茂盛的野草,向着星空升腾而上,又呈圆弧线下降,挂在树木的枝杈上,飘荡在为每一个音符而痴迷沉醉的年轻印度人那大睁着的眼睛前。最后,他们全都站起来,腼腆地低下脑袋,回到他们的车上,继续行驶在淤泥风干后形

成的一道深深的车辙中。这次邂逅,我保留了一个无法忘怀的回忆,同时又十分遗憾,一份如此珍贵的馈赠竟然给了一个我这样的男人,他为过多的激情所烦扰,无法在一种音乐的和谐中找到平静。

39

我有没有对你说过,我父亲是什么时候死的吗?1958年12月19日,庇护十二世死后两个半月。一个我本该尽早提及的事件。我的脑子都到哪里去了呢?他呻吟,他吼叫,他垂死时的发作很像他平日的作为。他扭曲在一种恐惧的痉挛中,眼睛睁得老大,竭尽最后的努力抬起秃顶的脑袋,仿佛要咒骂我们,然后一下子僵僵地倒下了。妈妈想起了在卡萨尔萨流传了很久的老习惯,指责自己没用剪刀把床垫的几个缝点铰开。人们若是不为死者的灵魂打开通道,它要飞上天去会更艰难。

我始终就没有想念过我父亲,直到那一天,那已经是我印度之行之后的三四年了——在此期间,我游历了苏丹、加纳、尼日利亚、几内亚、以色列、约旦,又重游了苏丹和扎伊尔,长长的航线,那都是由我要做的讲座和我为拍电影而选的外景地决定的——直到那一天,我着陆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

我在行李中带上了一套比平常穿的衣服更像样些的上装和长裤。我是受国家元首的邀请,去内罗毕作正式访问的。人们要在第一届泛非电影节期间,上演我那部关于福音书的电影,它刚刚在威尼斯获了奖。

那是在一场司空见惯的诽谤和斥骂战之后,因为,我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逃脱不了厄运。电影节宫前的臭鸡蛋、茴香、侮辱;大厅中的喝倒彩、吹口哨、下流的威胁;电影公映时的西红柿、又一轮茴香、老拳痛击。《意大利世纪报》在一张表现犹大之吻的照片底下,刊登了如下的评说:"请注意特拉斯特维尔的卡车司机这个叛徒化身的伤感表达。我们相

信，这实在太过分了，法官们将会出面干涉。让 P. P. P. 和他的门徒去彼此拥抱吧，只要他们愿意，但他们决不能让创造世界历史的主角承担他们的道德习俗。"在这一事件中，媒体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因为，假如人们能在我的电影中找到一点错误，那恐怕会是正相反，是一种极端的腼腆。我根据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画家们的传统，拍摄了一个无性欲的、冷漠的基督。通过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而更得到升华，音乐那天堂般的和谐飘荡得离地面足有一百英尺之高。使徒中，约翰并不占有一个特别位子。人们甚至从未看到过他把脑袋投入耶稣的怀中！我没有机会就一个始终模糊不清并扰乱人心的问题好好查一下福音书。

羞怯的作品，是的，没什么可自我炫耀的。经典的图像，很难证明出自这样一个电影工作者之手，泽菲雷利[①]所展示的宏大的甜蜜画卷恐怕都会让他在坟墓中不得安生。然而，我却大胆地求助于一个可减轻罪行的情节。虎视眈眈地窥视着丑闻的记者们甚至都没猜疑到它。在电影的最后一部分，究竟是谁扮演了马利亚呢？我根本就没聘用一个女演员，而是选择了……妈妈本人！是她借给了流泪的圣母她那张美丽而温柔的脸，那张饱经生活的风霜、满是千百道皱纹的脸。我为她拍摄了这部电影，我是准备把它献给她的。此外，除了在福音书中，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借口，来写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之间爱的故事？未来将会显示，在我们自身的戏剧中插入耶稣受难的故事本身，绝对不是滥用圣经文字。

我不能通过让基督和他的某些门徒表现出暧昧的言行来冒险惊吓我母亲，无论是她作为弗留利农妇的天真信仰，还是她肉体激情在生活中的过早牺牲，或是她所看到的她儿子的习惯，都使她无法接受如此的行为。他那么晚才回家，且总是独自回来，熟睡在一张床上，经过一夜贞洁无邪的睡眠，每天早上，她发现他的被子几乎都没怎么挪动。我的电影应该是有耻辱心的，从第一个形象直到最后一个形象，都是有耻辱心的。假如有些人期待这个"可咒"的作者对福音书有一种更大胆的阅读，而这部作品让他们失望了，那就活该他们倒霉。国际天主教电影协会为

① 佛朗哥·泽菲雷利(1923—)，意大利电影导演。

我颁发了大奖。这样一种荣誉,我自己倒并不怎么激动,却让妈妈感到如此骄傲,以至于我简直可以在其他方面犯一些小小的懦弱之罪,谅她也不至于归罪我。

她帮我整理了去肯尼亚旅行的手提箱。没什么奇怪的,我装备了满满一箱子衣服,因为按计划要出席好几个招待会。看来,妈妈也一样,格外仔细地选择了衬衫和领带,让它们在不同场合都能最好地衬托她儿子的风采。然而,我自己很少关心形象潇不潇洒的问题,至于对社交生活的喜好,我是一点儿瘾都没有,对这一点,妈妈知道得跟我一样清楚。我已经在世界各地参加过多次正式活动,出席了不止一次电影盛会,却没有不惜代价地注重衣着仪表。这一次,我们为什么非要去享受这一孩童般的快乐,她,想象着我不久的将来在已经独立了两年时间的原英国殖民地的成功,而我,则要把我们在西班牙广场脚下的华伦天奴专卖店特地买的那件象牙色羊驼毛衣折起来用衣套罩住?

我到达的当晚,答案就出来了,那是在意大利领事馆的草坪上。为开幕式而举办的鸡尾酒会,我穿上了白色燕尾服。一大群来宾挤在花园里,就在已经丧失了魅力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房子后。我有些腼腆,不自在,站在台阶上,手捏着酒杯,根本就没打算以这混杂了热带饮料的烈酒来濡湿我的嘴唇。我背靠一根支撑了优雅的三角楣的白色柱子,观望着非洲之夜潮湿的辉煌。领事先生从一大堆戴着花边宽檐软帽的年轻女郎中挤出来,邀请我走下台阶,跟他一起聊天。这是意大利王家军队的一个旧军官,整个军人生涯都在东非度过,并在战后进入了外交界。此人和蔼可亲,谨小慎微,说话时满嘴老生常谈,引用拉丁语录,一只手捋着他德·波诺[1]式的花白的山羊胡子,另一只手玩弄着他放在胖鼓鼓肚子前的背心口袋里的那块金表。

"皮埃尔·保罗,"他对我说,把胳膊伸到我的胳膊底下,"请允许我这样直呼你的名字,我的年岁准许我有这一自由……而且,还有……但是,我随便问一句,你爸爸还健在吗?"

"他已经死了,领事先生。"

---

① 艾米里奥·德·波诺(1866—1944),意大利将军,后升至陆军元帅,最后因反对墨索里尼而被处决。

“岁月如斯而逝！[1]我们曾一起被俘，就在这里，在内罗毕。我可以说，我已经报复了！”他欢呼道，两条粗壮的短腿牢牢站定在草地中央。“可你自己呢，嗨？你听到英国佬离开的消息，一定不会愤怒吧？”

他举起酒杯，冲我使了一个眼色，然后满足地小口饮着酒。

“喝吧！让我们为怀念你可怜的爸爸而干杯！”

“请原谅，”我说，“我对烈酒……”

“好吧！很好，我年轻的朋友！对味道和颜色[2]……给我讲一讲你的生活吧……你知道，我在远远关注着你……哦！我并不自诩读过你的全部作品……当我退休之后，我会抽时间去读的……静下脑子来读……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你十分了解。我知道，你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听到最后这句话，我情不自禁感到脸皮发烧。玫瑰色的饮料在我的手中颤动，为掩饰我的慌乱，我不得不假装喝了一大口。

“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重复道，“只要瞧你一眼就行了，瞧你穿戴得这样体面……出自全罗马最贵的裁缝之手，嗬？请允许我向你祝贺……你是我在内罗毕所接待的意大利文化最佳使者。有句话不妨在我们之间说说，那些知识分子，你的同事们……往往以衣冠不整而闻名遐迩。”

我倒是真想确认一下，我的尴尬全是由于我那位对话者滔滔不绝的自来熟，以及他平淡无奇的信口开河。他还随口唤过来正巧从我们旁边经过的两三位宾客，请他们证明一下我“成功的风采”，就像他不停重复的那样。我如坐针毡，如临火炙，只得强挤出微笑，回答一位女士的夸奖，她翻开了手袋，想找一张纸什么的，让我留个签名。

“他可怜的爸爸应该为他感到骄傲！”东道主继续道，毫不动摇，根本没有猜想到，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赞扬会深深震撼我的心弦。因为，他以他的那份好心好意，刚刚揭示了一个事实，即我迄今为止一直在苦苦地养光韬晦，尽管我从心底里特别想出人头地。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原文“De gustibus et coloribus”为拉丁语。这句话没说完，整句应该是：“De gustibus et coloribus non est disputandum”，意思是：“对味道和颜色，没什么好争论的。”

“卡尔罗·阿尔贝多，他可没有这一机会，这话我是可以说的，是的。在铁丝网后面关押四年，然后回到祖国，而在那里，有一段像他那样往昔经历的男人们全都不再有什么地位了。我敢打赌说，今天，儿子会觉得已经为老子遭受的不公正复了仇。当年，谁又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呢，你能告诉我吗？”

听到这里，那个女士，还有陪同她的那位胖先生连连点头，毫不困难地表达了他们的同感。等到我们的争论泛泛地转向了一般性的政治话题时，我终于大松了一口气。我需要安静下来，冷静地重新考虑领事先生的那番小小演说。面对他那番言论，我为什么没有耸耸肩膀了事，反而感到落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中，就仿佛我是一个刚刚被人证实始终在说谎的人？

正当那位胖先生在一旁大讲特讲当年他跟巴多里奥将军[①]一起打仗的事，而那位女士也终于找到了一张纸，又开始翻着手袋找起一支活动铅笔来，我试图让自己恢复镇静。“瞧瞧，你从印度开始旅行，你只是最后才选择了肯尼亚，在此之前，你首先访问了其他非洲国家。”这话刚从我心底说出来，我就明白我又在撒谎了。“正相反，这样一种拖延恰恰证明了你目标的明确不变。有两次，从苏丹边境上，你差一点就要进来了。现在你来到了内罗毕，你肯定早已觉得自己准备就绪了。准备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你父亲遭受四年铁窗生涯的地方。”新的异议：“毕竟不是因为这一件白色燕尾服……” 令人震骇的反驳：“也不是因为国际天主教电影协会颁发给你的奖吧？”我咬住了自己的嘴唇。那个女士递给我一支小小的带格子饰纹的金笔。我得朝各个方向使劲摇晃它，才能让它出墨水。受欢迎的消遣，既然它确实让我出了一把汗，在这帮戴着透亮帽子的如此鲜艳动人的优雅女人当中。“不是一种在战士眼中始终那么可疑的简单的艺术回报。而是一种天主教的奖。这足以让一个上尉满心喜悦了。”

“你感觉有什么不适吗？”领事问我。

他看见我用麻布手帕擦脸，却没有注意到，这块蛛网一般轻薄的上

① 巴多里奥(1871—1956)，意大利将军、政治家。他曾任埃塞俄比亚总督。1943年，他通过与盟军达成停战协定，使意大利顺利地退出了战争。

等细麻布被一双充满母爱的手叠得整整齐齐，他只看见我从上衣口袋中掏出它来，并被我痉挛般地捏在拳心。

“你还没习惯我们这里的天气……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直接喝水龙头里的水……”

他陪我一直来到台阶上，然后，叫一个领班把我带到书房中，让我安坐在一把舒服的扶手椅中，面对一杯咖啡。一个舒适而安静的房间接待了我，房间只有一盏唯一的灯照明，让乌木制作的高架子沉浸在一片昏暗之中。一些黑人小雕像和象牙制品在木板上隐约闪耀微光。我双手捧住了脑袋。我的思考恐怕无法达到更苦涩的依赖证明了。

“你父亲，你还敢于否认他在你生活中的重要性吗？你希望他对你的行为没有施加任何压力，希望他没给你留下什么影响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你只喜爱你的母亲，你无法忍受一个想法，即有另外一个人也做出了贡献，把你塑造成了你目前的样子。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把这一点弄个清楚。你从来没有想念过的那个人，你不动感情地眼睁睁看他死去的那个人，他没有离开过你寸步，他一直在阴影中陪伴你。你的行动，他至少悄悄地支配了不止一个。比如说吧，你无视众人一致称颂的马格里布的种种温柔，而唯独对黑非洲产生的这一好奇心，它是从哪里来的？何等的轻蔑或忽视，使你远远地躲避马拉喀什的海枣树，还有突尼斯的沙漠绿洲？你为什么一开始跑过了苏丹和扎伊尔，而不敢进入肯尼亚？你曾等待着一种官方的承认，你的同胞们的一种桂冠，然后才在安巴-阿拉吉的战败者不得不忍辱受耻的国家中露面，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呢？谁又迫使你在一个依然不能出产一部电影的大陆的腹地庆贺你在威尼斯的胜利？睁开你的眼睛吧！你这个跳出了家庭的往昔，自诩身为自由人而行动的人，你并非偶然地选择了内罗毕。难道不是海军上将坎宁安[①]从前的战俘派你来的，就在他当年受辱之地，为他赢得这一死后的复仇？”

---

① 历史上，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名叫安德鲁·坎宁安(1883—196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与意大利海军在地中海作战，获得胜利。但这里的坎宁安可能指阿兰·戈登·坎宁安(1887—1983)，他是安德鲁的弟弟，不过是英国陆军将军，1941年曾在埃塞俄比亚作战，并在安巴-阿拉吉接受意大利军队主力的投降。

我抬起脑袋,不无羞耻。过了好一会儿,等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你知道我都看到了什么吗?离我的扶手椅只有两步远,独脚小圆桌上,紧靠着一个坡尔人[1]战士青铜小雕像旁边,摆着一张明信片,我一下子就认了出来:我敢伸手到火中起誓,跟我父亲给我们寄到卡萨尔萨的明信片一模一样,我记得,我当时还把那张明信片从我母亲的篮筐里偷偷捞出来,而我母亲总是每月一次把存在篮筐中的丈夫寄来的那些明信片毫不吝惜地扔掉。那形象,在所有细节上完全一致,画面上是冒险家和老虎。猛兽已经吞吃了口中猎物的好一部分,冒失的猎手只剩下脑袋和一半的上身还露在血盆大口之外,却显得视死如归,毫无畏惧,似乎对他忍受的酷刑品尝出很大的乐趣。[2]

我伸出一只哆哆嗦嗦的手,抓住明信片,细细察看。我又看到了那个场景的每一笔线条,原封不动地如在我的记忆中:年轻男子那甜蜜的微笑,似乎在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奉献给残忍的老虎;上半身那鲜活的古铜色肌肤,从撕烂的衬衣中露出;猛兽那斑斓的条纹,好像就支撑在它神经质的利爪上;荒原尽头的棕榈树,朝着黄色的天空伸出它柔韧的羽饰;一只脖子上羽毛色彩奇异瑰丽的热带鸟儿,栖息在一根竹枝上,正全力亮开它的歌喉,唱出一支两个音符的乐曲(音符标记在一个泡泡中),欢呼这一场人肉盛宴。往昔所曾体验的所有那些激情,如今又一次攫住了我的心。我又看到自己把这图像藏在衬衣底下带走,并钉在我的床头。它成为了我的物恋对象。每晚,睡觉之前,我都会为那猛兽献上我的祈祷。它在我的招呼下猛然跃起,奔向那个自觉自愿的牺牲品。畏惧与逃跑的乐趣……投降之举的更大的肉体快感……说实话,从那个遥远的年代起,我是不是连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无意识地寻找将把我撕裂在其獠牙中的美丽魔怪?

我真没有必要,在二十多年时间里经历一种如此丰富多彩的生存;两次注册加入共产党;写下十七本书,拍摄六部电影;成为一个方言诗歌的专家;为自己树立一个名声,作为锐意介入的作家和导演,无论是受到极力奉承,还是饱受羞辱;跑遍了半个世界;亲自前往印度,怀着一

---

① 坡尔人,又称 Foulbé, Foula, Fulani 人,是非洲的一种土著。

② 见上文第一部分第十二章中的描写。

种人种学家的好奇心，收集斋浦尔土邦主的传说；不，实在没有必要获得这样一种长久的智力上和政治上的教育，要知道，如果换做另一个人，这种教育可能会造就一个跟他的童年截然分开的成人，实在没有必要接受这样的教育，为了能在四十三岁时发现，当我父亲在那一天连想也不多想地把这封信投入到军营的邮箱中时，他的这一动作，在他儿子心中，已经把快乐与惩罚、把暴食的贪婪和有罪的屈服一劳永逸地结合在了一起。

至于我随后在内罗毕的那些日子……好吧！它们跟最开始的几天一点儿都不相像，你对此恐怕不会惊讶吧。如果说，对黑暗的父权法则的服从应该在残酷与鲜血中履行，那我就不会来到非洲，满足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历险。因此，我逃避了希尔顿酒店中不同男孩的多少有些暧昧的奉献。他们敲我的房门，从门缝中探进他们黑黝黝的小脸，然后不等我回答，就走进房间，借口检查一下蚊帐的密封性，或者端来放在一个黄檀木托盘中的冰镇菠萝片。

领事认为，让我下榻在这家豪华旅馆里做得很对。再令人满意的完备条件恐怕也无法接待那个不仅被他称为“第七艺术的王子”，而且使他回忆起一位老友的人。当年在这里，父亲在炎热的折磨下只能满足于一个草褥子，还有棚屋的一个角落，如今儿子只需要摁一下空调按钮，便可随心所欲地调节室温。一大堆各色各样的醉人饮料，储藏在墙上的小酒吧中，维持着五摄氏度的清凉，可以为他舒舒服服地解渴。

“豪华、安静和肉感，”如邓南遮所说的那样，“尽管这比不上丽都的艾克塞西奥[①]，不过，我相信你就没什么可挑剔的了。”

值得赞颂的体贴入微，它证明我的主人尽管缺少文学修养，却本性慷慨大方，不过它并没有在我身上产生预期效果。这个房间让我觉得压抑。实际上，在威尼斯也一样，只要有机会，我就逃出艾克塞西奥旅馆。我的趣味总在促使我走向更简陋的旅店。在内罗毕，我在这一奢华的背景中尤其感到别扭。兴许是由于那位领事一再坚持将父与子进行比较，

① 这是在威尼斯的一家豪华酒店。经常接待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贵宾。

并到处讲述 P. 达龙达家族[1]异乎寻常的命运转变。如果说我还缺少什么,那就是缺必要的内心自由,我无法利用要想成功就得掌握在手的那些优越性。我究竟属不属于这样的一类儿子,一想到要超越自己的父亲,就觉得是在犯下大逆不道的亵渎罪?

反正,我只是在必不可少的场合才保留我的华丽衣装,以履行我的社交义务。夜幕一降临,我就重新穿上短袖汗衫和牛仔裤,踏着旧篮球鞋,从旁门溜出旅馆。一些摇摇欲坠的棚屋,用木板和铁皮胡乱钉成,使城市一直延伸到牧场的近旁。绝大多数棚屋都建得很马虎,用铁丝和硬纸板凑合对付,但面前都有栅栏围住,仿佛都是一些私人别墅。一个洞当做窗户,另一个洞当做大门。这并不妨碍它们的主人在一些木头桩子上拉开一些带有刺眼图案的红布,像是在大门口展开了一片华盖。热带茅舍那别致而又典雅的模式都变成了什么?这恰好令人沮丧地证明了在欧洲文明影响下当地风俗的一种退化,是杂种趣味和可怜虚荣心的一种大杂烩,这一大堆简陋房把壮丽的非洲黄昏搅和得面目全非。然而,当我匆匆奔向我的目标时,我不知道我究竟发现了它的什么诱惑力;兴许,跟十年之后推动我选择了依德罗斯卡罗作为我夜间探险地的,是同一种诱惑力,那时,我根本用不着在离我罗马居所十多公里的地方寻找一个同样破旧的背景。

在最后的那些居民点之外,在稀树草原的边缘,我没费太长时间,就在一片灌木中的空地上找到了足球场。一些巨人,露着乌木色的皮肤,打着赤脚,追逐着一个比标准足球要小得多的球。汗水在他们的胸膛上闪光,顺着他们肌肉发达的大腿往下淌。他们以简单的哞哞声迎接了我。我立即换成跟他们一样的打扮,把脱下的衣服堆成一团,以更明显地标记那条用脚指头在沙土上划出的边线。

我们尽情地玩着——如果这也能叫做玩,这样一场把两队人马混成乱糟糟一团的无序的混乱——只要还有一道光线在昏暗中为我们指明插在场地尽头、用来作为球门框的两根非洲软木[2]的枝条。这之后……那就得去问希尔顿酒店值夜班的人了,我摁响酒店门铃的时候

① 当指意大利的贵族帕索里尼·达龙达家族。

② 原文为"avodiré",是一种生长在非洲的热带树木,木质较软。

已经几点了；有多少次，看门人看到我回来时脸上带有土色的伤痕，不禁吓得够呛，便把我带到医务室，为我做温敷。我成功地向他掩盖了裤子上的血迹。当血迹同样也在棉布汗衫上显现时，他就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一串钥匙，在耳边挥舞，像是在摇动一个护身符，然后，单脚跳着在房间里转了三大圈。

第一天晚上，球赛结束后，我向他们告过别，原路返回旅馆，他们就跟在我后头，然后一把抱住我的腰，把我摔在地上，让我在惊讶中服从了他们的意愿。但是随后，我也好，他们也好，足球只是用来作为调情的序曲和前戏。在妈妈为我包装那双锃亮的薄底浅口皮鞋的那个口袋中，我带上了我从旅馆房间小墙吧中搜罗来的所有瓶装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在酒精的作用下，我那些年轻的班图人[①]兴奋得近乎狂热。就在尘土蓬蓬的地上，每个人都来了一番，粗暴地，以其整个分量，以其全部力量。为了不让我叫喊，我得用嘴去啃泥土。然后，我气喘吁吁，鼻青脸肿，听到他们嘻嘻哈哈地逃进了荆棘丛林中。

每天早上，我还赖在床上时，那个侍者都会跟在清洁女工的身后走进我房间，我便把床单拉上，盖住我的脑袋，我那青肿的眼睛。清洁女工会喃喃地道歉说，她过一会儿再来，而那个侍者，则推着一张带轮子的桌子，直接走向房间里的酒吧，重新补齐饮料品种。在我遭遇洗劫的唯一那个夜晚，他的脑袋里到底在转着什么想法，这对我始终十分神秘。自然本性的麻木不仁，或者后天学会的懒惰，反正，人们在这城市中不会怎么大惊小怪。在接下来的那些招待会上，甚至在电影放映厅里，我都始终戴着那副墨镜，而没人会想到问一问我那是为什么。

① 所谓班图人，是对非洲苏丹以南说班图语系语言的各民族的统称。

40

一注意到他的举动,我马上就认出了他。他手舞足蹈地向前走去,仿佛踩着一双弹簧鞋,两只手彼此击掌,拍打着空气。我坐在朱丽亚街的一段墙沿上。维吉尔中学的最后一批学生正在回家,衣装笔挺,发型新潮,书本紧紧扎在一根皮带中。他们长长的头发波浪型地披散到肩膀上。我听到他们热烈地谈论越南问题,马尔库塞的名字[①]从一张嘴飞到另一张嘴,飘荡在这条早先曾居住着公子王孙和主教大人的街道上那巍峨庄严的宫殿之间。他穿了一件值五百里拉的洗旧了的汗衫,从我面前走过。头发剪得短短的,长长的脖子露在外面,背了一筐大面包。我一步跳下墙根,然后就停留在了原地,无法动弹,一只手搭在胸口上,似乎要压住心跳。他是不是也认出我来了呢?他有没有注意到我?很机械地,我开始跟随他而去。

"你就跟随向导吧,你会看到,他将把你引向什么地方。"他确实把我带走了。他把我领向了他要去的地方。在一大群刚从花市上回来、满载着水果和蔬菜的家庭主妇中稍稍停顿了一下后,我就拉下了距离。但我匆匆追了几步后,就又来到了他的背后,靠得是那么近,近得几乎可以在他后脖子黝黑的皮肤上,分辨出一粒小小的黑痣。我根本无法相信会有一种如此的巧遇,尽管他一次都没有回头,也没有朝我的方向瞧过一眼。他蹦蹦跳跳地远去,穿着那双已被罗马的风雨冲洗得褪了色的蓝色篮球鞋,他又一次停下来,像是在等我,然后又立即出发,还不断拍着手,像是在敲一对钹。

我自己的行为让我觉得更奇怪。我这个原先勾引和诱惑男孩的行

---

①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

家里手,现在反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乖乖地,被动地,毫无脾气。在我长裤的一个兜里,我总揣着一面小镜子,那是专为预防不祥的邂逅而准备的。我的一条眼皮(尤其是左眼的眼皮)似乎要耷拉下来,看来我应该放弃这一艳遇。他拐过法尔内塞宫的角落,去了花市方向。我利用这一瞬间,赶紧掏出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行,检查结果良好。我也跟着拐过角落。他在等我,全身的重量都落在一个屁股上,而另一条腿则抬了起来,只有脚尖还搭住地面那么一点点,就像一个舞蹈家,停顿于两个动作姿势之间。

我长裤的第二个兜里装着一盒香烟和一个打火机。通常,当我看上一个小伙子时,我就点燃一支香烟,然后带着微笑把那盒烟递给他。我该为这样的把戏自豪吗?加快脚步,超越他,在我裤兜里寻摸民族牌香烟,说出场合上的那些暗语?"你想抽烟吗?"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觉得这么干很不合适。我已经提过几百次的那个问题卡在了喉咙口。让他先放肆,让他先主动。这对我是一个全新的情景。我感到自己缺乏意愿,昏头昏脑,茫然若失,心中充满一种莫名的恐惧,它刺激起了我的神经,而不是让我原路折回。

就在这广场上,拉丁姆种菜人的约会地点,他把背篓放在了一家餐馆门前,吹了一记口哨,唤来了那个正往桌子底下撒锯末的家伙,然后一头钻入喧闹的市场中,一直来到一个时新蔬菜女商贩那里。胖女人乳房肥大,已有六个月身孕,给他装了一纸口袋黄香李。他付了钱,拿了这一纸袋黄香李,在蔬菜摊之间穿梭而过,一直走到花市广场的雕像前。他一屁股坐在基座的阶梯上,一道目光扫过广场,确信我还一直跟着他,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地吃起黄香李来。他品尝水果的方式在我看来颇为奇特。一只黄香李刚进入口中,他便吐出果核到两腿之间,然后则相反,不慌不忙地细细品味起留在舌头上的果肉,一直不肯嚼碎,而是等它慢慢地彻底融化。他现在直勾勾地盯着我,眼光中带有一丝狡黠的微笑。另一个李子入了口,"噗!"的一声,果核吐出,刚落到石板地上,就跳起来,而又柔又软的香甜的黄色果肉则在他的嘴里慢慢地分解着,只见他厚厚的嘴唇鼓动着,完全是一本正经的贪吃样。

我本希望他会送我一个李子尝尝,这个动作会为我的搭讪提供一

种实实在在的入门。谁知道,他把它们吃了个精光,到末了也没给我留一个。直到此时,我的记忆中才出现了某一个方言诗人的那首十四行诗,我是当年在我舅舅的店铺后堂读到的。纸口袋的李子在罗马的小老百姓中是一种经典的交流方法。年轻人就是通过这一简单而天真的言语来互相表明自己的爱情的。当着你目不转睛地盯着的眼前那个人的面,把李子核吐在地上,就是在向他表示,你已把心中所有的艰辛与苦涩驱赶了出来。他将只得到甜美、温柔,相当于黄香李那多汁美味的果肉。然而,我从他几乎毫无反应的举止中根本看不出一种微妙的、出人意料的建议,更何况我们彼此一点儿都不了解,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我便始终不敢贸然行动,始终一动不动地留在原地。

"嗨!"他做了一个表示邀请的动作,"你没有看见,我把核都吐了吗?"

"看见了……但是……"

"来吧!别以为我没有注意到你是怎么拿眼睛瞟我的。"

"行啊,"我笑着说,"可是你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我坐到了他身边。

"原因?那是因为你在追我,没错。别把我当傻瓜,皮埃尔·保罗。"

我不禁浑身一哆嗦。我的名字挂在所有人的嘴上,众目睽睽之下,我已无处藏匿。

"幸亏,我很喜欢你。"他又说。

"那么,上一次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到处在找你。"

"李子还没有熟透。"

"我甚至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根本就没法找你。佩皮诺的单身公寓,那是个玩笑,不是吗?"

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我说:

"达尼罗。"

"达尼罗。"我说,不免有些心慌意乱,不能自持。我真想摸摸他,把我的手指头放在他后脖子的小黑痣上,叫他一声"尼罗,尼莱托"①。他穿

① "尼罗"(Nilo)和"尼莱托"(Niletto)都是"达尼罗"(Danilo)的昵称。

了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汗衫,整个上胸部,包括褐色的锁骨突起,全都露在外面。他本人显示出一种温柔和伤感的神情。他的一条小腿压在我的一条腿上。广场上枉然地回响着女商贩们嘶哑的叫喊声,我们在三级台阶的基座上,早已跟嘈杂之声隔离,超然于世界之外,独自守候着我们的秘密。“两个恋人。”这一想法顿生脑际。“你,恋人?”在我跟斯温约会的那棵苹果树下,我曾经起誓,不让人们把我当做这样的人了。我,恋人吗?我对我的髫毛小邻座所感受的,除了平日里对任何一个朝气蓬勃的肌肤都有的那种欲望冲动之外,就再没别的什么了。“再没别的什么了吗?”难道还会有别的什么吗?然而,在我重新开始沉湎于当下感觉的幸福之中的这一刻,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肯定的需要,让我高声说出了一句本来会等到以后,等到某次机会再来时才说出来的话。同时,我挪开了我的腿。

“理由,达尼罗,是因为我想让你在我的下一部电影中演一个角色。”

“我,演一个角色?给我一个角色?”

“完全正确。”

他嘟嘟哝哝,吞吞吐吐。他忍不住,一下子跳将起来,像一个陀螺那样迅速地转起圈来。

“给我一个角色?这么说,我要当一个演员啦?在一部真的电影里?人们当真会看到我露脸啦?”

他气喘吁吁地停下来。但他的惊奇、他的激动实在太强烈了。他不得不马上又站起来,像个疯子一样绕着雕塑跑起来,最后在我面前站定,满头大汗。

他一把搂住我的脖子,在我耳边喃喃道:

“我会爱您……一辈子!”

“为什么突然间称我为‘您’了?”

“您是一位先生,您。”

“达尼罗,你若是想我们成为朋友,就不该这样对我说话。”

他生怕自己的话已经惹我生气了,便脑袋一仰,把我的注意力引到雕塑上来。

“哦！”他嚷道，“瞧一瞧这位教士，他在风帽底下瞧着我们呢。他是谁，你说？”

“一个哲学家，后来被宗教裁判所逮捕，判了死刑，活活烧死，就在这里。”

“当众吗？”

“当众，当着所有人的面。”

“活活烧死！为什么？”

“一个异端分子，他思考得跟别人不一样。”

“在罗马，会烧死一个人，只因为他想得跟别人不一样吗？”

“要想与众不同，这总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我说着，并没有故意强调，我真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以对抗舆论的快感来引诱达尼罗。

他似乎太激动了，没听我的回答，只是傻乎乎地重复着：“我要当一个演员啦！人们会在电影中看到我！”他再也按捺不住，便猛地跳起来，一头冲进了拥挤的人群，在满地的果菜皮中快乐地抬脚乱踢。在一个推着童车的妇人的篮筐中，他瞄准了一只十分漂亮的茄子，那些西西里出产的茄子形状和大小都跟橄榄球差不多，他双手抱起这茄子，然后伸出一脚，啪的一记精彩射门，便把这圆球踢到了装满枪乌贼的篓筐里。“小流氓！”被溅了一脸脏水的鱼贩子大叫一声。女商贩们也紧跟着愤怒地嚷嚷起来。达尼罗一溜小跑地返回，怀中抱了一个不知从哪个货摊上偷来的西瓜。我已经站起身来，我们觉得眼下还是走为上计。一眨眼间，我们就到了花市广场的另一端，然后，从那里一拐，来到了法尔内塞宫周围那些迷宫般清爽幽静的小街巷中。

他那被汗水洇得紧贴皮肤的汗衫，凸显出他宽阔的胸脯。他躲到了一个门廊底下，像一只动物幼仔，心满意足地摊开四肢，这便给了我机会，让我发现了一开始并没展露在我眼前的东西。再也不会有什么恭维性的承诺更能震撼我的目光了。这是一个拥有令我愉悦的一切的男孩。多么冲动的生命，多么快乐的生活，即便一度沉湎于偷窃与赌博的刺激之中！这就足以给我欲望，继续我的历险，不必有“爱”一词在我的面前打上它讥讽的问号。跟我这几年里遇识的那些被消费社会弄得死气沉

沉、昏头昏脑的年轻人相比,这一位却保留了往昔小子们[1]的自由和滑稽。

“来一局吗?”他建议道,说着便把青绿色的泛着微光的西瓜往当街地上一扔。

我们传了几下球。我的皮底鞋比他的橡胶底球鞋要硬多了。对那个大甜瓜来说,实在也太硬了,第一脚劲射之下,它就开了花,在一个汽车轮胎上飞溅出了它的汁液和瓜子。

“现在,”达尼罗说,一点儿都没失望,相反,却急不可耐地再次跳起脚来,“我们该去你家了。”

“我家?”我结结巴巴地说,一下子没听明白。

“你知道,去我家,那是不可能的。我跟我的两个弟弟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我们恐怕连一分钟都不得清闲。”

我赶紧扭转脑袋,不让他看见我的脸红。

“去我家也不行。我母亲总是在公寓里来回转悠。”

妈妈一定会留给我们完全的自由。其实是我自己不愿意在她起居的那片屋檐底下做爱来的。但是,如果说,我实在不怎么想自我忏悔这一厌恶感,那么,我就更不会当着达尼罗的面解释这一点了。

“你难道就没有一个属于你个人的房间?”他惊呼道。

“听我说,达尼罗,我知道有一个特棒的地方,就在台伯河边。”

“行啊!我本来很高兴去看一看一个拍电影的家伙住的地方!”

“我很愿意带你去。不过,等以后再说吧,达尼罗。我们还是先去我跟说的那个地方,就在煤气罐后面。你会看到,那将更好,比在一个房间里还要好上一百倍。”

他停在了街中央,叉开双腿稳稳地站住,拳头拄在胯上。

“在台伯河边吗?就像我这年纪的那些小男人吗?原来如此!当我年老时,我,我确信我更喜欢一张床,还有干净的床单,而不是斜坡上的脏草丛!”

他没有抱怨我。在他闪耀着狡黠与开心之光的眼睛中,既没有指责,也没有沮丧。“台伯河边!台伯河边!”他无比开心地重复着这几个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词。但是我,却被他的反应刺痛了,只觉得,我细长而又神经质的身体,我平坦的肚腹,我因练空手道而变得宽阔的肩膀,正在给人以幻觉,我问他:

"你看我有多大岁数了?"

"这个,四张多一点吧,你肯定有四张了!"

我咬住了嘴唇。我的动作让他觉得惊讶。他马上又抗议起来:年轻人不讨他喜欢,跟他们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他倒是希望跟我在一起能有所裨益。他的父亲,在林戈托街马瑞利子公司的无线电元件厂当工人,晚上回家时早已筋疲力尽,根本没有精力教育儿子。

"我嘛,我只认不多的几个字。"他红着脸向我承认。

实行义务教育法的那一年,他刚过了十四岁。他的两个弟弟,正在读中等技术学校。"他们运气好!"这话说得很有热情,却不带一丝火气。我们沿着台伯河走去——好长的一段路,一直要走到煤气罐,老远就能看见它灰色的圆圆身影浮现在屠宰场后面。在公共汽车站牌附近,他想放慢脚步。我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加快了脚步,直到那笨重的汽车超过了我们。我倒要看一看,赶到那里时,我们俩当中谁的精神更饱满,是那个毛头小伙子,还是我这个已有四张的"小老头"。

"那你的弟弟,在学校里,他们开心吗?"我问道,决心向他显示,我的气还喘得足够均匀,要展开一场对话。

"一般般吧。反正成绩从来没有上过头几名。"

"我敢打赌,要是有出身职员家的同学的话,那些人会把头几名抢走的。"

"你怎么知道的?"

他早已掏出一块手帕,在那里擦脖子上的汗。

"三年级期末时乌戈考砸了。他得蹲班一年。不过,玛尔切罗及格了。很勉强,但总算及格了。不该抱怨了!而移民的后代,他们,他们可是全都考砸了。甚至补考都没有过。玛尔切罗的那个那不勒斯朋友,他也没过关。"

"这个吧,早该预料到,"我说,"以前,我当过老师。只要看一看学生的作业,我就能猜出来,他们在家里是不是两人、三人或者四人同住一

个房间，我就能猜出他们的父亲是什么职业，饭厅的书架上有多少本书，这一家来自哪个省。我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可说是了如指掌，但对他们真正的智力才能却几乎一无所知。”

“你以为我还会得到文凭吗，我？”他带着一丝遗憾问我。

“有两个弟弟跟你在一个房间里做功课？这样，你的运气早已一分为三了。你家里有人能给你解释但丁作品中的困难段落，让你背诵一下复兴运动[1]都有哪几次战斗吗？马瑞利是一个新兴工厂：你会毫无困难地赢过那里普通工人或消防队员的儿子。但是，在外语方面，那些家长们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外国去度假的同学将远远地超过你。你兴许会以你的个人素质而取胜。而学校体制却会惩罚你，让你失败。”

“我弟弟玛尔切罗真的是一个天才！”他天真地高声嚷道，语气中根本没有对命运的丝毫抱怨，抱怨他早生了两年，每天还得为餐馆送面包，以便多挣它几千里拉，把家庭的收支账弄得更圆满，更齐整。

我满意地注意到，在他静听我对学校的这番抨击时，他的腿脚开始有些拖拉了。再也不是一条腿换着一条腿地雀跃了，也不再像福拉·安吉利科笔下的天使那样双手击掌了。他的双臂耷拉了下来。

我们来到屠宰场的拐角时，他便举手，指给我看泰斯塔乔山的顶峰。

“煤气罐还远得很呢，皮埃尔·保罗。假如你愿意，我们爬到这山上去吧。这里没人住，除了几个小孩，他们的胆子小得可怜，一见到游客，就带着他们的小马跑了。”

一股强烈的怒火从我心头生起。

“绝不！绝不！你听见了吗？永远也不要为此上山去！”

他目瞪口呆地瞧着我，耸了耸肩膀。而我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了。泰斯塔乔山的山谷本是个理想之地，除非……不，不可能说出我为什么不能把达尼罗带到那里去。十多年来，我一直就住在附近，经常在台伯河两岸闲逛，企图寻找一些隐蔽的地方，但是我从未想过要利用一下这个安安静静的绿色小岛。什么！以我们大男人的气息来亵渎那些银铃般和谐的声音？玷污位于罗马中心的唯一一片始终未遭污染的净土？

---

① 复兴运动是19世纪时意大利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以统一意大利为目标。

"决不！"我握紧拳头重复道，"永远也不要为此上山去！"泰斯塔乔山属于那些孩子，属于他们的坐骑，属于大海之风和黑夜之星：严禁跟一个情人一起践踏那座山岭上的草地，对我来说，它是神圣的。

"多么可怕啊，"他说，此时，我们在牲口恐怖的叫声中走过屠宰场。"有一天，我跟我们班同学一起，去这里头参观了一下。他们为我们显示了一切。从此，我就怎么也吃不下那些动物的肉了。我再也不能了，你明白吧。那么你呢？"

我不得不再一次扭转了脑袋，我想起了那个卡尔利诺，有着明澈眼睛的巨人，屠宰之后，他在清水底下冲洗身子，我还想到了另一些屠夫学徒，我曾经在他们刀下牺牲的血泊中追逐过他们来的。

"那么，你现在吃素吗？"

"鱼，我还是吃的。那可不一样。但是，肉，我决不吃。"

再没有什么比这种直率，比这种对不喜欢的事物的拒斥，更能赢得我对达尼罗的好感。我为发现了一个如此纯洁、如此敏感的小伙子而激动万分，他还有宽阔的肩膀和健壮的体魄，一切都是那么平民化。

"可是，在你家里，你们不会天天都吃鱼吧？"

"那我就满足于蔬菜了。妈妈常常煮黄豆给我吃。"

"黄豆？他们将把屠宰场搬到别地方去，"我说，"这是一个老计划了，马上就要实现了。"

"拿什么来代替它呢？"

"一个公共花园。一块足球场。"

"一个足球场吗？太棒了！"

他瞄准了排水沟里的一个罐头盒，一脚踢去。我接过罐头，用脚尖一钩，把它传到空中，瞄准一棵栗子树的树干就是一脚。他冲上前，接着踢，我跟在他后面，他的体力又恢复了，我试图带球越过他，他开心地挤撞我。我们来到了煤气罐，又兴奋，又激动，满头大汗。他脱下了汗衫，扔在草地上，然后就跟他篮球鞋的鞋带较起劲来。这时，我来到一棵娇弱的榛子树底下，平整了一下地面，小树为我们投下一片阴影，比起我经常使用的卡车的人造革座椅面来，它要有诗意得多了。

真是一个妙人儿，这个少年郎。温柔，强壮，体贴人。还有一种非凡

的强劲。然而，比起我来，还在下风。他先顶不住了。

“哦！”当他看到——证据确凿——我在那里重整旗鼓打算再来时，他就高声叫了起来。“一连三次！好家伙！”

41

我住的房子倒并不怎么叫他惊愕。年时一久，它早就显示出一幅破烂相，我从他嫌恶的表情中就感觉到了。外墙上有些鱼鳞般的剥落，铁锈侵蚀了阳台的扶手栏，护窗板早该重漆一遍了。作为一个“拍电影的家伙”，我本该住得更好些。达尼罗很直率地向我承认了他的失望。“这跟我们家也差不了多少嘛！”我的汽车，一辆玛莎拉蒂 3500GT 跑车，停在街对面的人行道前。“那是我的车，”我说，语气尽量从容不迫。就在他绕着它贪婪地打转转的当儿，楼房中的另一个变化震惊了我。所有窗口中，还有平台上，全都晾着衣服，就像在贫民街区那样。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破败，还是社会意义上的贬低。我们刚搬来时，邻居们，无论是梵蒂冈的雇员，是见习的医生或律师，还是那些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份工资的移民，从来不会把他们洗好的衣物挂到室外来，以这一展示来暴露他们的南方人出身。最初的那些房客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这里。在“经济大复苏”中致富之后，他们搬到了市中心，代替他们居住在此的，则是第二批更为简朴的居民。这样一来，留在绿山区的，只剩下了一些经济收入不稳定的家庭，对公众舆论漠不关心，只满足于置身在一个人口稠密的郊镇的生活气氛中。

“瞧瞧！车灯上的雨刷！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玩意儿呢！它们真的管用吗？”达尼罗问我，对这一发现充满了稚童般的热心。

我又一次朝我们楼房的墙面上抬头一望，发现只有一家公寓的窗户上既没有晾内衣，也没有拉铁丝，那就是我家。从这沉默的抗议中，我

清楚地认出了妈妈的做人风格。留在那些穷苦人家中间，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她该受了多大的苦啊，她，身为一个富足家庭的后代，父亲曾拥有一家烧酒厂，丈夫袖章上有过三条绶带，尽管他们之间是那么不和！她向来习惯于服从，对我如同对那个上尉，在罗马如同在弗留利，在这里如同在玛莫罗桥，她总是避免指责和怪罪，即便要表达对邻居们的反感，也只满足于把她那几盆天竺葵放到阳台上去，而那些女邻居们在自家阳台上展挂开的，则是她们子女的尿布，还有她们丈夫的短裤。我便对自己承诺，要尽快修正自己的错误。我很高兴让达尼罗见识了我生命中一个如此重要的事件，便一手搭在他的后脖上，把他推进了楼梯间。

我从第一天起就对这个小伙子体现出的温柔，有相当大一部分——我还没有虚伪到那般地步，更没有忘记煤气罐那边的事，以至于会说：全部都——取决于他面对我那辆三升半汽缸新跑车矫揉造作的车灯时足足五分钟的极度惊讶。要是没有这五分钟，我难道还会注意到我们家窗口和邻居家窗口之间的区别吗？妈妈那腼腆的请愿书兴许永远也不会到达它的收件人那里。

他的软底鞋踏在走廊中，发出一种被吸附了的声响。她打开了门，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是摁响了门铃，而不是用钥匙去开门。她手上拿着一把鸡毛掸子，头发上包了一大块抹布，正在屋里掸尘。她该有多大岁数了？快到七十五岁了！我吓呆了。在我们的新家，我一定要雇佣一个清洁女工。她那张皱巴巴的老脸几乎消失在了层层堆积的皱纹中。我一把夺过了她的鸡毛掸子，那块抹布也接着跳起了华尔兹，我把她搂在怀里，对她说：

“妈妈，我们搬家吧，你会有一个女用人来帮你的。”

她捋了捋了头发，脸红了，有些尴尬：

“皮埃尔·保罗，你把我头发弄乱了。”

仅仅只是她激情的羞耻，以及掩饰这些激情的习惯，就妨碍了她表达自己的快乐。达尼罗目瞪口呆地待在走廊里，瞧着张贴在走廊墙上的那一大幅马萨乔[①]的《亚当与夏娃》。根据他的年龄、他的穿戴，还有他面

① 马萨乔(1401—1428)，意大利画家。

对我满是书籍的书架表现出的天真的惊愕，她很快就看出来了，来者进入不了我通常那些拜访者的任何范畴：他既不是为硕士论文来求教于我的学生，也不是电影城的使者，也不是还未出道的小说家，想让我把他们推荐给某个出版商，更不是饥饿的诗人，寻求能让自己的名字印在某家杂志的目录上。

"我去给你们准备咖啡，"话音未落，她就走向了厨房。

我让他进入起居室。他很腼腆地坐在一把扶手椅的边沿上，正好面对着一整套皮封面的、书脊上带有烫金细丝的蒙达多利出版社[①]的经典作品集。妈妈返了回来。她带来的托盘上不仅有两杯咖啡，还有两块水果馅饼，这样的优待，是我在达尼罗之前的任何一个客人身上都不曾见到过的，无论是老熟人，还是陌生客。

"吃吧，我的孩子们，"她说着，把那张小小的独脚圆桌往他不敢稳坐的扶手椅前推了推。

再精明的计策恐怕都不能引起母亲嫉妒的偏心。要是姑娘们，那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临时打字员，报刊的摄影师，在我电影中扮演一个角色的女影迷，竞争某个文学奖的女作家，她们一迈过我们家门槛，行为举止便全变得彬彬有礼了。在日常起居中对我明抢暗偷的女竞争对手是不会上门的。在四十五岁的年纪上，我的生活似乎还离不开母亲这一中心。走马灯一样在我们家进进出出的年轻人，大都是为工作而来的：演员、助理、党内同志、记者。塞尔乔、弗兰科同样也来摁响门铃，但仅仅局限于那些好伙伴。我们只谈论政治和电影。可是达尼罗呢？妈妈内行的目光瞧出了危险。一个如此粗野、如此天真的小伙子，会迷倒在最平庸的意大利壁画复制品面前，就像迷倒在一幅从没见过的新作品面前那样！而即便是她教课的那个小学的学生，也会在课本中，在"意大利文艺复兴"那一章里，看到由卡尔米纳圣马利亚教堂的那位画家所画的表现原罪的插图[②]。

---

① 阿诺尔多·蒙达多利(1889—1971)，意大利出版商，他的出版社是当今意大利最大的出版印刷企业。

② 指上文中提到的马萨乔的那幅《亚当与夏娃》，这幅壁画是马萨乔为佛罗伦萨的卡尔米纳圣马利亚教堂中的布朗奇卡礼拜堂而画的。

她是不是在我之前，就根据我的鲁莽行径、我的急不可耐，猜出了我处在爱恋中？钉在走廊中的招贴画——是她贴的，还是我贴的呢？——让我们每天都跟这一圈套打照面，第一个把自己的命运跟一个女人联系在一起的男人就不幸地落入这一圈套中：多么悲怆的结合，多么昂贵的代价，而马萨乔，尽管技艺精湛，笔端却无法再现一场如此的灾难，只不过让亚当把自己的脸挡在那双痉挛不已的手后面。啊！出于一种心照不宣，我们得知，我们内心深处的人间天堂，将永远不会受夏娃的威胁。这一重大危险被排除后，其他的就不能拿它怎么样了。她监视着，她从她策略的武器库中汲取一种对付任何陷阱的良计。我爱上了达尼罗？那么好吧！她也要爱上他，而且爱得比我更甚。她会预料他的小小渴望，她会宠爱他，她会让这个家变得对他不可或缺。他会从一个潜在的掠夺者，降格为小兄弟、干儿子中的一员。一种被糕点的兼并。一种被温柔的阉割。她把两个小盘子放到桌上，然后退到一个角落。十分自豪地，她瞧着那些杏子消失在了我们客人那贪婪而又灵敏的嘴里。就仿佛他牙齿的每一记动作都在证实圈套的坚固，她已经把他掠为囚徒了。一个被果酱弄脏了脸的孩子，会成为她的敌手吗？他没有诞生得那么早，也不会诞生得那么早，他不会成功地横隔在她和我之间。我们会永远停留在各自的地位上，彼此相对，在原始伊甸园纯洁无瑕的甜美中。

达尼罗表现得完美无缺。他那块馅饼吞下了肚子后，就来攻打我那块碰都没碰的馅饼。“这么多的书！”刚刚咽下一口后，他惊呼道，“你全都读了吗？”“小家伙饿了，”妈妈满意地解释道。她一直站在那里，双手交叉，放在肚子前。最后一口馅饼咽下肚子后，达尼罗便把嘴唇贴在咖啡上喝了起来。他忘记了放糖，做了个鬼脸。妈妈幸福无比地走上前，把糖罐递给他。“你瞧，”她似乎得意洋洋地说，“你的朋友，他还需要一个奶妈呢。”

“这都是什么点子？”她指着T恤上的斑点问，“莫不是李子汁吧。皮埃尔·保罗，你可不可以先借一件衬衣给他穿，等我把这一件先洗干净了再换回来？”

我一下子抓住了天赐良机。约会定在了第二天。他要来还我的衬衣，并换回他的干净汗衫。

“等我送完了我的那一圈货，我就来，”他明确道，然后，一阵风似的就扎进了楼梯中。

从此，他每天中午时分就来摁我家的门铃。妈妈在走廊里给他从头到脚好一通刷呀，把他衣服上沾着的面粉和碎屑打扫干净，然后再把他引入我的房间。他发现我坐在书桌前——从来就不在被我用做床的长椅子上——正在修改完善我那神话电影的剧本。达尼罗将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信使的角色。批评家们指责我这部作品的序幕和结论：那是后来添加的，特为达尼罗而写。我把序幕安排在 1925 年：一个三岁的孩子，正在他穿白长裙的母亲和他当意大利军官的父亲之间玩耍。背景：萨奇勒，我父亲的军营之一，这是我最初的回忆。为什么安排这一自传性的参照？老资格的记者们纷纷质疑。（其他人，总是窥伺着最低下的解释：为什么朝当今时代眨了这么一眼？）结论更惹怒他们：老国王，刺瞎了眼睛，流亡到了底比斯以外，被驱逐出希腊，突然在 1967 年（电影拍摄的那一年）再现于博洛尼亚的街道上，重新出现在萨奇勒广场，倚着达尼罗的肩膀，流放者的这个唯一依靠。

“真可以啊！在你童年时的故乡，我该做些什么呢？”他问我，被这奇特的结尾弄得困惑不已。（它跟我刚刚耐心讲述给他听的索福克勒斯的那出戏[1]没有了任何共同之处。）

“没什么特别的。你就稳稳地走——在这里，不要蹦跳，达尼罗——扶好了这位绝望的人，他现在只有你是唯一的依靠。”

说实话，这最后一组镜头让我自己都吃惊。我写它时，正在经历我生命中一个幸福的阶段。再也没有了针对我的起诉。司法不来找我的麻烦。媒体也不再来骚扰我。迫害放松了。乔尔达诺·布鲁诺，那个曾在花市为我们牵线搭桥的人，在他的基座上保护着我。这位哥白尼派的僧侣，为我，为所有异端分子，付出了代价。我把我的剧本念给我钟爱的小伙子听，当他张大嘴巴静静聆听时，我感觉到他的腿紧贴着我的腿。何等毫无根据的恐惧，何等逃避命运的渴望刺激了我，让我自己体现在一个贱民的面容下，在血淋淋的眼眶中，被社会放逐，遭致命打击，在他年

① 索福克勒斯写过悲剧《俄狄浦斯王》。

轻同伴把他松手的那一天崩溃倒地？我是不是连这个都不知道，就已经向达尼罗发出了他将不会听见的求援呼叫？

大约一点钟，软底鞋窸窸窣窣的声音在瓷砖地上响起，妈妈在房门上轻轻敲了三下。

"孩子们，我可不可以把水做开了？"

这是信号。我们匆匆下楼。达尼罗骑在楼梯栏杆上，滑下最后一层。水要一刻钟才能做开，然后还要十分钟把面条煮熟，妈妈还需要五分钟来控干水，浇上作料，拌匀，盛到盘子中。这半个小时于我们已经足够，但是，我却不愿做得稍稍慢一些。一步跳进玛莎拉蒂，一直冲上桥头，在灌木丛后面选一个角落，匆匆整理一下衣服，全速急转弯原路返回：这样卡得紧紧的时间加剧了我们的激动。我们及时到达，饥肠辘辘，喜笑颜开，面对着那一份热气腾腾的面条。

下午，达尼罗前往圣西尔韦斯特罗-西斯提那街区第二次送新出炉的面包之前，我拉他去看一些公寓房。他跟他父母一起住在城北，诺门塔纳路上。我就选择城南的那些街区。就这样，有一天，我们进入到了罗马世博会区，由墨索里尼为当年的万国博览会而建的郊镇区。两旁种植橡树的宽阔大道一直通向白色的宫殿，始终紧闭的大门上贴着戏剧海报。国会宫，矗立在雄伟的阶梯高处，罗马文明博物馆，其柱廊伸展为一个圆拱形，劳动文明宫，带有六层高的门廊，立在协和方场的中央。那些街道的名称本身——英雄大道，艺术大道，社会互助大道——都是特地选好了，用以阐释领袖的抱负。长长的利剑，还有粗粗的旗杆，紧握在巨雕人像的拳头中，十字路口竖立的方尖碑激发起的理想的阳刚气，在整整二十年期间深入意大利人的心中。赤裸裸、空荡荡的广场，大理石的街面，荒芜的街廊，露天的楼梯。一个无用的、荒诞的水泵引起了达尼罗的兴趣，他当时已被阳光明媚的大广场和长排的列柱廊迷住了。我在他面前指摘着由萨拉盖特统政、由莫罗执政的意大利的"迷茫"，尽量避免跟他说，万国博览会作为法西斯建筑的昂贵成就，吞噬了亿万人的福利，使他们住不上工人新村。

欧弗拉特街上一个小巧玲珑的住宅楼，二楼上的那个公寓让我动心，只因花园的缘故。一株开了花的石榴树在微风中摇晃，一瓣瓣火红

的石榴花耀眼夺目。这条街只有一侧建了住宅楼。另一侧路边则是悬崖峭壁,山崖脚下,我发现有几块运动场,几个库房,几条停车道,专为停地铁的红蓝色车厢而用。山谷对面,依然荒凉的山岭上建造起了十层高的住宅楼,这是首都的新生长点。左边,空空的地平线上,我嗅到了大海的气息。

当我在那里跟看门人仔细查阅合同条款时,达尼罗跑来对我说,这一次,在我房间里,会毫无困难地放得下一张大床。我哪天是不是还得向他明明白白地交代清楚?只要妈妈还活在世上,我就决心一直睡我那个比儿童床宽不了多少的极不舒适的睡铺。如果说,我选择了一套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公寓,窗帘片能电动升降,炉灶能自动控制,每个房间里都有大方砖,楼梯镀了金,还有对讲机能跟门房通话,那都是为了妈妈:她最终该享受一下豪华了,她丈夫在娶她时,就承诺了这一点。为了回答我因搬到这如此资产阶级化的居所中来而在心中产生的顾忌,我对自己说,世博会街区只是我一系列选择中的又一郊区。离古竞技场有半小时车程,我不就成了一个环城路外的人,一个边缘人了吗?

俯瞰山谷中,只见有一些铁路工人穿着工装衣裤,在车厢周围忙碌,这一景观让楼房本身稍稍有些掉价。看门人不无迟疑地对我说,为这么一个满地都是大理石的庭园小楼[1],我只付小小的一笔钱,实在是太合算了。

"开窗就面对铁路钱,这毕竟算不得太遗憾吧?不过,这要看你怎么想了。"

我最后的那些异议就这样被一扫干净。由于这一提醒,他有权得到一万里拉小费。我掏出钢笔,准备签字。

"至少,"在签下姓名之前,我说,"钟声响得会很清脆吗?"

我趴在花园栏杆上,俯身朝右看,橡树的树梢上隐约闪现出一个十分光亮、十分洁白的教堂圆顶。

"先生,它们从来就不敲钟。简直让人以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

"那里没有钟吗?"我说,有些失望。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当我问妈妈，从她离开卡萨尔萨后，什么东西让她心中最怀念时，她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道：

“教堂的钟声。”

“比鸟儿的歌唱还更怀念吗？”

“比鸟儿的歌唱还更怀念。”

“那么，这个没有钟的教堂，”我接着问，“它叫什么名字？”

“它就是圣彼得与保罗教堂，先生。”

“圣彼得与保罗教堂！”我惊呼道，禁不住浑身一哆嗦。

“居然还有这种事！”达尼罗嚷嚷起来，“还真有走运的人呢！他们安顿到一个地方，发现门前就有一个教堂，叫的还是自己的名字。”[1]

世博会的教堂，巨大的立方体，似乎是从一整块大理石中雕出来的，带有一个糖面包那样的圆顶，给了我一种别样的惊奇。在青铜大门上方，有教皇国某位经典雕塑家的作品，我很惊讶地读到：O FELIX ROMA QUAE TANTORUM PRINCIPUM ES PURPURATA PRETIOSO SANGUINE。[2]

“这说的是什么？你的脸都变得刷白了，皮埃尔·保罗。”

“O FELIX ROMA，哦幸福的罗马，QUAE ES PURPURATA，你是一片鲜红，一片猩红，PRETIOSO SANGUINE，珍贵的血，TANTORUM PRINCIPUM，如此伟大的君王，说的是彼得与保罗，你知道，他们都是在尼禄统治期间殉道的。”

“PURPURATA PRETIOSO SANGUINE，拉丁语，好一种漂亮的语言，没什么说的，”达尼罗评论道，而一旁的我突然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在衣兜深处捏摸了一通我的钥匙串，这可是玛莫罗桥那些西西里人的习惯动作，每当看见一只黑猫穿过马路时，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这样做。

究竟出于一种怎样的巧合，我选择了颂扬我那两位主保圣人之牺牲的堂区？罗马是不是在等待我也以我的鲜血来向它致意？像一个基座那样支撑起了彼得和保罗的教堂的这些白色台阶，我是不是也该把它

---

① 圣彼得与保罗教堂的名字就是作者的名字：皮埃尔·保罗。

② 这段拉丁语的意思见下文。

们染得鲜红？彼得和保罗，我的名字又一次结合在一起……童年时代，当我读到保罗的历险故事时，我就在心中默默承诺，要完成他未竟的故事。上帝拒绝给他使徒中最热情的一位以跟彼得在十字架上之死同样著名、同样屈辱的一种牺牲，实在是一种很大的不公。该由我来弥补，我当时渐渐入睡之时，一个嗓音曾这样对我喃喃道。而在三十年之后，我立即就认出了这同一个喃喃细语。“别忘了履行你自己的诺言，”它对我说，“谁知道那一时刻有没有来到呢？”我的膝盖颤抖起来，我不得不在一级台阶上坐下。达尼罗走来依偎着我的肩膀，默默无语。我相信那些符号，还有它们神秘的话语。我无谓地回顾着我感觉幸福的各种理由：对报刊上针对我的口诛笔伐的充耳不闻，得到舒适安顿的妈妈的内心安乐，达尼罗的多情在场，然而，这一巨型字母的铭文，离我将居住的公寓只有一百米远，足以损害我的信心。尽管今天的生活显得宽和多了，即便它还谈不上像我那白色庭园小楼[1]的大理石那样漂亮而又平滑，鲜血的黑暗力量还是让我回想起了它们的范畴。

大理石与鲜血。在欧弗拉特街，达尼罗保留了他在绿山养成的习惯。我们不再下到台伯河畔，而是去离世博会只有五分钟路程的田野，那些灌木丛和荆棘丛。天气不太炎热时，妈妈就在花园中支起餐桌。就像你母亲一样，她开始在盆盆罐罐中种起了罗勒和薄荷。我把达尼罗带到摩洛哥去拍电影了；然后又到博洛尼亚和萨奇勒。公众的温和欢迎。至少，检察机关没提出什么怨诉。达尼罗很好地完成了他的角色扮演。作为真正的演员，报纸都注意到了他的才华。对他，欢乐和自信；对我，同样也是一种轻松。我得以邀请我的朋友来一起吃午餐，一些文人，或是某些对我工作有用的名人，批评家、报刊经理、专业电影人士，而丝毫不必疑心他们讽喻的目光、他们偷偷地微笑，当我们在那里谈事务时，这个小伙子更喜欢去厨房帮妈妈干活，然后，带着一双被洋葱辣红的眼睛，回到餐桌上来。她让他剥了整整一大堆洋葱，用来做福尔拉那风情舞[2]面条，这是她从卡萨尔萨带来的一道风味菜，她在绿山流亡时赌气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做过,现在又应欧弗拉特街客人的请求再显身手,除了这家乡味的面条,她还做了分葱馅饼,这是奥地利边境地区另一种味道偏涩的风味点心。

他们恭贺我乔迁新居。功成名就的作家,小有名气的导演,西尔瓦娜·曼加诺、阿丽达·瓦莉、朱利安·贝克、托托、奥逊·威尔斯①,全都在我的导演下拍过电影。出版商、制片人都来跟我签约。我什么时候才会动手再写一部小说?加尔赞蒂问我,他很遗憾只能在书店中投放我的一些诗歌集和随笔集,而那些东西在我们充满了文盲的国家中是没什么太大市场的,不过,它们在同类作品中已经卖得很不错了。

总之,没什么能阻止我感到自己拥有了一种彻底而又和谐的成熟,那是经过众多考验后才得到的,即便我还不能说是已经彻底地告别了不安,害怕脱离惧怕,担忧停留于无忧。大理石与鲜血。大理石,我的墙壁上,我的脚底下,我的楼梯中就有;它令达尼罗惊愕;它为我带来(俗话说得好:借钱只肯借给富人)更多的付款,为我的书;更高的价目,为我的电影;它让妈妈的腿脚轻松下来,当她坐在窗前凝望石榴树时,她把双脚从旧拖鞋里伸出来,把她患风湿病的发青的关节搁在黄褐色的清凉石板上。

但是鲜血呢?我该为谁付出这一代价呢?这鲜血两个字可就镌刻在妈妈每礼拜都要去望弥撒的这座教堂门楣上!我得以什么样的形式献出这鲜红的贡赋?达尼罗只表现为一个错误。他太善良,太殷勤,太体贴了,无法追随我走在我命运的黑夜斜坡上。

在三个月绝对的忠诚之后,一天夜里,我在火车站附近游荡。达尼罗什么都没猜到,正跟他两个弟弟稳稳熟睡在自己的房间里。人们看到我沿着考古博物馆,在马道上的绿栎树底下闲逛。对我来说,这一毫不意外的狩猎实在是淡而无味。在高大的城墙底下,在相对安全的树丛中,跟偶然邂逅的一个散步者做一种简单的交换,这于我已经不够。观察了一阵子那些制服与雨衣的静悄悄的来回之后,我明白了,我该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广场另一头,意大利酒吧的列柱廊,男妓们的巢穴,正以

① 西尔瓦娜·曼加诺,见前注。阿丽达·瓦莉(1921—2006),意大利女演员。朱利安·贝克(1925—),美国演员。托托(1898—1967)意大利剧本作家。奥逊·威尔斯(1915—1985),美国导演、演员。

其黑黝黝的诱惑吸引着我。在那里,人们说,只有准备遭人抢劫的顾客在冒险,根本不考虑那危险的一击。我竖起了上衣领子,穿越了几乎空无一人的大广场,像一个熟客那样,胳膊肘撑在柜台上,勇敢地点了金色啤酒,这声暗号刚一发出,就有一个身影从墙上的阴影中闪了出来。

42

星期四,4号:一个跟别的白天一般无二的白天,只不过比起其他日子来,它为我带来了更大量的恳请者和央求者,当然,那样的人每天都有,这便是"有名"作家的家常便饭。欧弗拉特街吸引他们如同引来苍蝇一般:从此,我的房子就临街了;一个公开承认的、讨人喜欢的地址,仿佛我选择了把自己摆在橱窗中,为了更容易被他们触及。他们似乎也互相传递了消息,并且毫不为难地跑了来,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带来了自己特别的祝愿、特殊的怨言。头一天,清晨两点钟,当我驾驶汽车回家时,我在车库门前发现了一个叫恩佐的人,早年间,在多那奥林匹亚足球队里,我们曾经一起踢过球。他来是为跟我讨要几千里拉,好付钱给他的裁缝,他跟我起誓说,这是我以前答应过他的。他执意坚持,却丝毫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不愿意注意到,我那青肿的眼睛早已让我难受得如一条丧家犬。可是,如何拒绝一个在我漂亮的庭园小楼[1]前等候了整整五个小时的小伙子呢?他正眼巴巴地指望我帮他取回裁缝店里的那件新衣服呢。

妈妈十点钟时叫醒了我。"妈妈,什么事都没有,那是我摸黑撞在了车库门上。"她一言不发,走出去,又返回,拿来一块药纱,敷在我的眼睛上。然后,一一列举白天要做的事。已经来过电话的有:钱托切莱的一个年轻人,受房东威胁,如果今天还付不出五千里拉房租,就要被赶到大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街上;《全景》的一个记者,要对我做一次采访;热那亚汽车俱乐部的秘书,要请我做一个讲座;玛丽娅·贝隆齐[1],要请我出席一个鸡尾酒会。至于信件,则有:一个一心想圆演员梦的人的请求,还寄来了照片;一个撒丁岛女诗人的手稿;一个共产党参议员的介绍信,推荐一个小说家竞争一项文学奖,因为我在上个月成了该奖的评委;我们以前在卡萨尔萨的一个邻居写来的信,一手漂亮的美术字,略显幼稚的圆体字母,要把他家的葡萄园转卖给我;一个对我的小说十分不满的读者的三页辱骂;一个女才子的支票,半个月之前我出席了她的文学沙龙晚会。罗马的风俗:是莫拉维亚教会了我玩弄这样的把戏,让人出钱请我出席城里的和其他烦人场合的饭局。我的出场费已经是他的一半了。

"十一点时,别忘了你有乔尔乔·巴萨尼[2]的拜访。"

乔尔乔·巴萨尼?我惊了一下。"我们"最有名、最受人尊敬的小说家之一,如同电台文化节目的播音员们反复唠叨的那样。他的出场费应该高出我一半多。他写过一部很漂亮的书,但乔瓦娜·B.,我以前的女伴,会比我更崇拜他。对那些犹太大资产阶级的温柔回忆,对一个身在远方的钟爱的姑娘那哀歌般的回顾,于我还有什么重要性吗?

"还有,中午,"妈妈继续道,"已经坚持了一个礼拜的那两位要来,一个叫瓦尔特·图齐,他的朋友叫阿尔曼多。"

"你知不知道他们想要我做什么吗?"

"他们只对我说,重要的交流。重要的,紧迫的,这是他们的原话。我把咖啡端到你书房里去吧?"

为节省时间,每当我起床晚了时,我就不吃早餐,立即开始工作。面前这一沓子信件和文件,从何开始呢?妈妈端着一杯咖啡进来了。她的另一只手捏着一块抹布。(尽管我一再劝告,她还是拒绝请一个保姆。)

"妈妈,我求求你了,不要现在……"

她挪走了一排书,在剪报上吹了一口气,把熄灭了的烟蒂倒进字纸篓。我看出来,她有一个秘密要告诉我,她在寻找一个话头。她凑近,努了努嘴唇。我咬紧了牙关。她又撤退了,到了门口,低声说道:

---

① 玛丽娅·贝隆齐(1902—1986),意大利女作家。

② 乔尔乔·巴萨尼(1916—2000),意大利作家。

“皮埃尔·保罗……今天是基多的生日。他该有四十三岁了，你可知道？”

她又凑过来。我感到她就在我背后。我并没有转身，抓住了她的手，亲吻了她的指头。“哦，母亲，”我真想这样对她喃喃轻语道，“你要谢谢他牺牲了自己，让你把唯一的爱全都留给了我。”但是，那样说的话，她会带着足够的理由反驳我：“哦，儿子，你这个只有痛苦时才幸福的人，你要谢谢他让你心怀内疚在他死后苟活下来。”而我们俩，我们还等待什么呢？我们会异口同声地高声道：“瞧瞧，今年，3 月 5 日正好赶在复活节这个月。”[①]对我出生之日的影射，它几乎跟耶稣受难日[②]吻合。在奥秘的酝酿中，基多本是多余的。我们应该相依为命，面对着面，再现圣母怜悯的最后一幕。

但是，这些话在我们之间是从不会说出口的。我满足于轻轻拍着她的手，用我温柔的亲吻盖住她脸上的老年斑。她趁我一不注意，赶紧抽走手，心慌意乱，拿起字纸篓急忙去了厨房，继续她在公寓中的家务活。

有人摁门铃：谨慎，细腻，很有教养。跟达尼罗那种排钟齐鸣式的连发完全相反。乔尔乔·巴萨尼面带微笑地走进房间，马上就转身，把他的毡帽和骆驼毛中大衣挂在衣帽钩上。当他看到我紫青的眼睛时，吃了一惊，但他立即就遮掩了惊讶的表情。跟他在一起，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不会有什么尴尬的问题要忍受。这是一个绅士，待人接物礼貌周全到了手指尖上。夜里下了一场雨，他那擦得锃亮的皮鞋没能避免沾上几点脏泥。尤其，有一个泥点就落在鞋面中央。这让他很恼火，他时不时地弯腰去瞧它。“好一个漂亮的客厅啊，”他说，陷坐到安乐椅中，很满意地抚摩着扶手上的呢绒。我的家具都是传统风格的制作，没什么花哨的设计，这让他很喜欢。他用手心捋了捋他理得无可挑剔的头发，头发有些稀朗，前额上呈尖形，而太阳穴那里已经秃了。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说：

“皮埃尔·保罗，我是以‘我们的意大利’主席的身份前来看你的。我不会过于妨碍你的。让我们把我们之间的分歧搁置到一边，一块儿研究

---

① 复活节有时会赶在 3 月，但多半会在 4 月。按公历，每年过了春分(3 月 21 日左右)后见到第一个月满(望日)之后遇到的第一个星期天，即为复活节。

② 耶稣受难日即为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一下，保卫艺术遗产和自然风景，是不是真的该引起我们的兴趣。对不起！”他匆匆地补了一句，伸出一只戴了戒指的胖乎乎的手，“我预料你会提出异议。在你眼里，我们都是旧时岁月，明日黄花，让救世圣马利亚教堂挑檐上那些摇摇晃晃的小天使重新稳住平衡，是你很乐意丢弃给教堂租椅子人的一桩心事。然而，我这里有你一篇文章的剪报。你能允许我读一下吗？‘尽管我是反教会人士，我知道，在我心中，还是存在着两千年的基督教历史；我跟我的祖先一起，建造了罗曼式教堂，然后，是哥特式教堂，然后，是巴罗克式教堂；它们是我的作品，它们继续居住在我心中。假如我否认这一存在于内心中的强大力量，假如我将如此建筑的垄断权留给神甫们，那我就将是疯子。’”

“你是犹太人，”我说，“我是无神论者。然而，费拉拉大教堂的五个中殿是我们的共同作品，还有，博洛尼亚圣佩特罗尼奥教堂玫瑰与赭红的外墙，也是我们的共同作品。我在科斯梅·图拉[①]秃脑袋的圣母像中认出了我自己，就如你在基多·雷尼[②]矫饰主义的圣塞巴斯蒂安中认出了你那样……”

我很惊讶地听到我自己抓住了这一带有影射性和装饰性的话语。我的拜访者狂喜，不仅因为我提到了他的故乡之城，还有费拉拉的那位画家，费拉拉毕竟是他童年时期的居留地，是他笔下所有作品的背景地，这很微妙地触动了他的思乡之情。他根本不希望对我揭露房地产投机丑闻的那篇大动肝火的文章做一种肯定，只准备应付我对“我们的意大利”虔诚的远征运动的嘲笑。我们开始平静地讨论起来，比较博洛尼亚和费拉拉的美，这两座只相隔四十七公里的城市，却分别是两种如此不同文明的摇篮，不是吗？两个有如此差异的世界的都城。德·契里柯和卡拉[③]会在博洛尼亚找到他们梦想中的形而上背景吗？乔治·莫兰迪[④]会

① 科斯梅·图拉(1430—1495)，意大利费拉拉画派代表画家之一。

② 基多·雷尼(1575—1642)，意大利博洛尼亚画派画家。

③ 乔治·德·契里柯(1888—1978)，希腊裔意大利形而上画派画家。卡洛·卡拉(1881—1966)，意大利形而上画派画家。

④ 乔治·莫兰迪(1890—1964)，意大利画家，他的画作中有不少以酒瓶为对象的静物画。参见前注。

把费拉拉过分强烈的光线挂在他酒瓶柔滑的侧面吗？此外，意大利是何等的奇迹，不是吗？那里的每个钟楼周围，都鲜花般地绽放着（这是他的话）一种当地的建筑风格，盛开着（这是我的话）一个绘画流派，与当地的风俗习惯有着历史性的吻合（我的话），甜美的和谐（他的话）。比如说，当人们在锡耶纳看着市镇宫的那些壁画，看着洛伦泽蒂[1]在那里再现的农业生活的场景时，人们所赞赏的，更多的会是画家的才华，还是那些劳作的方法呢？要知道，那些农耕方法，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的任何其他地方全然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托斯卡纳的那些沙砾斜坡上才能发现。我们还是别让一种已遭到美国生活方式[2]（这四个字是他说的，很显然，我是不会把它们说错的）威胁的古老文明的那些不可代替的见证消失吧！而马利涅蒂[3]呢？一个疯子（他的话），一个白痴（我的话），他居然想出馊主意，要把大运河填死，在上面修建一条高速公路！

就这样，我们之间持续着这场亲切的、博学的闲聊，跟我所有的习惯，还有我所有的信念背道而驰。我越是觉得未来主义者无视传统观念的喧闹愚蠢透顶，就越是怀疑那些人的善良意愿，他们哀叹帕拉弟奥的别墅成了废墟[4]，他们为拯救威尼斯组织了募捐，却同时让他们时代的艺术家们忍饥挨饿。然而，我会很乐意地对《芬齐·康帝尼斯的花园》[5]的作者提出反驳，他的鹿皮鞋很优雅地摇晃着，尽管鞋面上沾有泥点。直到我的第十遍"不是吗？"以一种在我看来不再完全属于我的低沉的甜美嗓音，突然打断了我对蓬波萨本笃会修道院[6]三叶形窗户的赞美，显然，这个修道院的"修复很有必要"。我拒绝在这出喜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因为我刚刚明白让我进入其中的理由。达尼罗，是的，这事涉及达尼罗，涉及自从我们相爱以来我要跟他一起过的生活。达尼罗，不由

① 皮耶特罗·洛伦泽蒂(1280—1348)，意大利画家。

② 原文为英语。

③ 马利涅蒂(1876—1944)，意大利作家，未来主义的主要代表。

④ 帕拉弟奥(1508—1580)，意大利建筑家，位于维琴察的圆厅别墅(1550—1551)是他的杰作。

⑤《芬齐·康帝尼斯的花园》，也译《费尼兹花园》或《故园风雨后》，维托里奥·德·西卡导演的电影(1970年)。乔尔乔·巴萨尼是它的编剧之一。

⑥ 蓬波萨本笃会修道院在费拉拉附近。

自主地成为了我兴致勃勃参与这一谈话的责任人。假如他不那么粗野,假如他的阅读不局限在米尔顿·坎尼弗,切斯特·古德,Alcapp或克雷帕克斯[1],假如我可以跟他一起聊聊其他话题,而不仅仅只是足球、电影演员和演艺场歌手,我恐怕早就把这个拜访者打发走了。我这样一个不屑于交流美术方面平庸观点的人,是不是应该进行精神食粮的斋戒,以便到时候扑向人们递给我的第一根骨头!苦涩的验证:我发现,我那丰富饱满的爱情,使我身上总有一部分不得满足,我们之间年龄的差异,还不是妨碍我们在生活中并肩前进的唯一障碍。

我心中突然对这个闯入我家干扰我幸福的人生出一种反感,我一反刚才的彬彬有礼,带着一种高傲的神态问他:

"你是不是要我参加'我们的意大利'?"

皮鞋和泥点骤然停止了摇动。他窘迫地点了点头,不知道该把这一转折归于什么样的变幻无常。

"很遗憾,"我说,"你的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你想让保护意大利艺术遗产的问题变得大众化吗?那些从来没有参与过历史的人,或者只是作为被压迫阶级,乖乖顺从历史的人,是不会热情参加你们的运动的,因为这些运动表达的是压迫他们的那个阶级的趣味。"

如果说,我原以为给他念念通篇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老文章就能让他退而却步了,那我实在是低估了他的宽容的广度,同时也低估了他的外交资源。他在扶手椅上挪了一下身子,用手挡住嘴,轻轻咳了一声,仿佛刚从鼻子前赶走了一只苍蝇,然后,平静地继续道:

"对不起,对不起。随着时间推移,你谈到的不合适会渐渐淡化。我们不是刚刚就某些问题的普遍意义达成了一致……"

"假设,"我突然说,"有一个开发商,想以一栋低租金住房楼堵住赫丘利一世林荫大道[2]的远景,你又能做什么,来拯救埃斯特城堡,拯救水晶宫殿?"

---

① 米尔顿·坎尼弗(1907—1988),美国漫画家,《泰利与海盗》和《斯蒂夫·甘阳》的作者;切斯特·古德(1900—1985),美国漫画家,《狄克·崔西》的作者;Alcapp(不详);基多·克雷帕克斯(1933—2003),意大利成人漫画作家。

② 赫丘利林荫大道在费拉拉市,埃斯特城堡和水晶宫殿都位于这条街上。

我无法抵御他列数费拉拉的名胜古迹的愉悦，那悦耳的清亮嗓音对我来说太神奇了，于是，我便在充满了神话与历史之魅力的小径中漫步，而这样的远足，跟达尼罗在一起是不可能有的，你得首先向他解释，谁是赫丘利[①]，为什么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公爵要取这样一个奥林匹亚神明的名字。我很生自己的气，便以一种不容置辩的口气作结论道：

“兴许只有一个办法制止这一计划：把你的人文主义抗议变成政治斗争。你在你的宣传材料中说过，‘我们父辈的意大利’处在危险之中。你是不是确信，你要保卫其‘遗产’的这些‘父辈’配得上一种如此的结局？从弗洛伊德以来，我们就在怀疑，父辈的遗赠中，有着某种并非必然积极的东西。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分析，‘父辈’的定义经历了一种更基本的损害。在我看来，你所提到的作为历史上一般范畴的资产阶级‘父辈’，错误地并未包括我感兴趣的任何父辈：清洁工或厨师父亲，蔬菜商贩或公共汽车司机父亲，冶金工人或铣工父亲，甚至还有流浪汉父亲，以及杀人犯父亲。而我，我正是跟他们串通在一起，正是他们的意大利让我揪心。”

他显然很满意我又一次提到他小说中的城市，便微微点了点头，像一个过分拘于礼节而不敢冒犯对话者的人那样喃喃道：

“皮埃尔·保罗，我知道你的观点，我也尊重它们。然而，请允许我还不认输。从个人来说，你难道不能给我们一个关于你的看法的公开证明吗？我该怎么说呢……一篇文章足矣……你可以谈一谈某个你不忍心看其消失的名胜古迹……”

突然，我真的很想给他来一个迎头痛击。他的法兰绒套装，他那老在我眼前晃动的皮鞋，实在让我毛骨悚然。假如马瑞利公司的一个工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扩展他儿子的视野，看到那些漫画之外的更多东西，这难道不是他的错吗，不是他、他的“父辈”、他的阶级的错吗？当他在哈斯勒酒店[②]大摆一场“我们的意大利”宴席，他知不知道，达尼罗有三倍于此的货物要送呢？他难道就该背驮一个装货十五公斤的背篓，

---

① 赫丘利本来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15世纪时，费拉拉的一个公爵把赫丘利用做自己的封号。

② 这是罗马的一家高级酒店。

踏着西班牙广场的二百级台阶，而没有权利多得一个里拉的报酬吗？这一番艰辛，为的只是让那些忧心忡忡地希望圣马可广场的潮水退干净，心急如焚地想让佛罗伦萨的旧手稿摆脱被高涨的阿尔诺河[1]水浸泡危险的女士们，让她们把手中的小面包捻碎在桌布上，生怕吃多了会发胖；让她们维持关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种族主义话题，因为她们保护遗产的兴趣从不延伸到罗马的南城。

“好的，我要说的是一段满是污垢的旧墙，受到蓬皮利奥企业挖掘机的威胁。兴许只剩下了一个谷仓。腐烂，肮脏，但它让我回想起绵羊在路石的缝隙中吃草的时光。一段毫无意思的废墟。它的照片跟你杂志的研光纸实在是不相配啊。”

“对不起！对不起！”他嚷嚷起来，从他的衣袖上摘下一根线，在手指中捻成一小团，又放入自己衣兜中，“你对我说的这些，实在是太好了！列奥纳多·达·芬奇习惯于研究古墙上潮湿的斑点，唾沫的痕迹。好极了！我们的读者将会带着敬意缅怀这一位托斯卡纳的大师，我们正在拯救他的《最后的晚餐》，这是我们第一批计划中的一项。太好了！好极了！”

他走了，裹在那件有着鹿角纽扣的骆驼毛大衣中，对他的来访甚为满意。他屈尊俯就地笑看着马萨乔的绘画复制品：在他家中，有的是绘画真品，是他那些画家朋友送的，作为回报，他则为他们撰写作品展的序言。门在他背后关上后，我禁不住就想捧腹大笑。假如达尼罗在场的话，我们将会有何等好玩的一场游戏！“对不起！对不起！”“请允许我……”还有“列奥纳多·达·芬奇……”啊！啊！我在走廊里并脚跳将起来，我朝挂在衣帽架上的雨衣频频出拳。巴萨尼只比我年长六岁，我却感觉到他跟我之间已有一道明显的代沟。一本“欧洲年轻作家”的文选把我跟不少三十岁之下的作家列在一起。纯粹的公正。达尼罗为我感到万分骄傲。今天，他恐怕将不再把我看做“老人”！真遗憾，他没有看到这一场面。他真应该看到我是如何顶撞意大利资产阶级最钟爱的作家的，此人的每一部作品都要获得一项文学奖，而不是一次诉讼。

---

① 阿尔诺河流经佛罗伦萨。

回到了卫生间: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不禁惊诧万分。一脸的青灰色,惨淡无光,黑眼圈在扩大。我怀着一种赞赏的心情回顾起我那拜访者的分寸感来,同时纠正着我当时过于匆忙的评价。如果说,他那么死盯住鞋面上的泥点子看,那是为了集中注意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让自己的目光显出一种不慎重的好奇。跟达尼罗在一起,我将不会容易摆脱的。达尼罗,是的,我会对他说什么呢?他会怎么想呢?编造汽车库的谎言对他是行不通的。我得寻找别的借口。但是,说什么好呢?"你要不要再换一块敷料?"妈妈问我,她出现在门框中间。我尤其想让她告诉我,我该如何向我生命中的至爱宣布,当夜间街道上不见了最后一批步行者踪影时,我在一次毫不光彩的历险中毁伤了脸。

说到他,他就到。他的排钟齐鸣带来一阵欢快和混乱的气氛。

"皮埃尔·保罗!你这是怎么啦?"

他怔怔地呆在我面前,瞪大了眼睛。

"你该不会告诉我,是他们把你打了吧?快回答我!"

这一声"他们"突然让我找到了不在场的借口。

"正是这样,"我说,低下了脑袋,不让他看到我的脸红。

"是谁?那些法西斯分子吗?"

而我,则喘了一口气:

"是那些法西斯分子。"

"这帮混蛋!混蛋!"

他嚷嚷起来,揪自己的头发,一直跑到走廊尽头,朝过道挥舞拳头,又返回,伸出手指头指着我的眼睛,又抽走他的手,重又嚷嚷道:"混蛋!"然后说:

"给我讲讲。告诉我这事是怎样发生的。"

"他们等在我的汽车旁。'是你在教唆我们的孩子吧?你就是这堆臭垃圾吧?你是不是拿了莫斯科的津贴?'每问一句,就啪地给我来一拳。"

"他们一共多少人,皮埃尔·保罗?"

"唔……我都不记得了……大概三四个吧……在黑影里,我看得不很真切。"

"你还能认出他们来吗?"

“他们都戴着风帽。”

“这帮混蛋！全都是些胆小鬼。”

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他很惊讶：

“怎么？我就得嚷嚷。就得让所有人都知道，莫罗的意大利政府是一群脓包。”

“我求求你了，达尼罗。这是一次偶然，一次事故。”

我把他推进花园，石榴树的细枝在冬日惨淡的阳光下冒着水汽。

“一次事故？我希望你写他一篇文章。当街被人暴揍一顿，毕竟比在威尼斯挨鸡蛋要严重得多了，在威尼斯，大部分公众还是支持你的。”

“这只是小事一桩，只属于我的私生活。”

“只属于你的私生活吗，皮埃尔·保罗？你竟敢这么对我说？你不是曾对我唠叨过，我们身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有一种政治意义吗？警察一方面朝阿沃拉的农民开枪，因为这些人拒绝为每星期只挣一万里拉工钱而采收杏子，另一方面，却把罗马的大街拱手让给意大利社会运动的那些混蛋去占领，不是这样的吗？这个，也只是私生活吗？”

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劝慰他了。他想警告我的朋友们，纠集起整个街区的人来。就在这时，又有人摁响了门铃。既不是巴萨尼彬彬有礼的短促声，也不是达尼罗那种充满激情的暴风骤雨，而是同样长度的三记铃声，急切的，庄严的，听得我们不寒而栗。

43

“瓦尔特·图齐，”一个四肢长、躯干短的年轻人自我介绍道，向我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他食指直指我的眼睛，大声惊呼道：

“法西斯分子干的吧，嗯？好样的，皮埃尔·保罗。从体质水平来看，你完全正常。我对他们说了，你还没有彻底失败，我们可以尝试着为你

做点什么。不是吗,阿尔曼多?”

我有些狼狈,什么都没回答。他那男低音的嗓音,那扣子一直扣到脖子的上衣,那披散到肩膀上的头发,那种镇定自信,那些难懂的行话,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让我毛骨悚然。他身后走来一个小个子,一头金色的鬈发剪得短短的,模样很可爱,双手捧着一大摞资料,还用下巴抵着,不让它们弄散了。我倒是十分乐意跟他握手,跟他:他让我喜欢,他冲我微微一笑,胡乱地点了点头,根本就不像另一位用低沉的嗓音跟我打招呼,那又长又尖的翘下巴指了指我的那幅《亚当和夏娃》复制品。

“马萨乔!必定能猜想到。你知不知道有一些画家,叫布里、玛塔、封塔纳、塔皮埃斯[①]?你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地落后了。瞧你这青肿的眼睛,我就能判断那些无政府主义革命派的行为。必须紧急纳入到一种客观上可操作的实践中去。幸亏我们来了,不是吗,阿尔曼多?”

阿尔曼多——他的同伴似乎认为,向我介绍一下他纯属多此一举——把他那一沓资料放在低柜上,结果有不少掉到了地上。我一眼瞥去,无意中读到了几个标题。《63学社:批评与理论》[②]。《巴勒莫代表大会》。《实验诗歌》。《内心之作/迷宫之作》[③]。我也是其中一分子:63学社,二十几个盲目的狂热分子,自称是先锋派,想把话语搅得个天翻地覆。向那些被认为太明白、太容易读懂的作家派遣特遣队。那一年,在巴勒莫代表大会上,他们向我发出一个警告:“P. P. P.,对方言、对音素的新意群现象感兴趣,这很好,但你的书是文献性的,反映的是现实,它们属于镜子般的拟态,一种绝对陈旧的观点。”当时,我对这一莫名其妙的说法耸了耸肩膀,但是今天,我感觉,事情远不会那么简单:兴许是因为,这一信息不是来自遥远的非凡世的神谕,而是从两个二十五岁的罗马年轻人嘴里说出来;其中一个还长得很漂亮,其魅力早已剥夺了我的武

① 阿尔贝托·布里(1915—1995),意大利画家、雕塑家;罗贝尔托·玛塔(1911—2002),智利裔画家;鲁齐奥·封塔纳(1899—1968),出生在阿根廷的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塔皮埃斯(1923—?),西班牙画家。

② 63学社是意大利一个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运动,1963年在巴勒莫附近召开的代表大会宣告了其诞生,它代表了一些年轻作家对现成文学模式的反动。

③ 原文为“Laborintus/Labyrinthus”。

装，这将使事情变得更复杂，因为我很明白自己的弱点所在。我还看到了一种威胁，达尼罗被难以理解的字词所困惑，惊讶地发现我原来并不时髦。

"你可以带回你的小册子，"我语气镇定地说，"我已经读过它们了。在今天，还有谁不熟悉你的立场呢？"

"啊！"瓦尔特带讽刺地提醒我，"你在墙上还保留着一个早已过时的画家的作品吗？"

"这幅画，我是从原先的公寓中带过来的……你瞧，这是一件纪念品……来一支香烟吗？"我说，为了哄骗一下这位托尔克马达[①]。

"你明白，它是跟回忆联系在一起的，"瓦尔特转身朝阿尔曼多说，没等我邀请，就赶在他前面走进了走廊。"谢谢，我是从来不抽一口烟，不沾一滴酒的。不过，你在逃避我的问题。关于福音书的电影中，你那些罗马士兵，穿戴得都像在彼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②]的壁画中那样。跟奥逊·威尔斯合作的小喜剧的那些颜色，你是从蓬托莫那里借来的。跟玛尼亚尼[③]合作的那部影片的最后形象，你是从曼特尼亚[④]死去的基督那里复制来的。请问是不是呢？"

"你这可是在给我来一场审问啊！"我笑道，这时，达尼罗已随我们一起进入客厅，但瓦尔特也好，阿尔曼多也好，谁都没有注意到他，让我感到很伤心。他们没有跟他打招呼，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而面对阿尔曼多白色牛仔裤之上印有花枝图案的飘飘然的印度衬衫时，达尼罗也惊得目瞪口呆。

"说到音质问题，"瓦尔特慢腾腾地说，对于他，"音乐"一词似乎简单得有些可笑，"你为你的第一部电影选择了巴赫，为基督的故事选择了巴赫和莫扎特，而为婊子的经历选择了维瓦尔蒂。你难道不知道，瓦

---

① 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1420—1498)，西班牙第一任宗教总裁判官。

② 彼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1420—1497)，意大利画家。

③ 安娜·玛尼亚尼(1908—1973)，意大利女演员，她在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导演的《罗马妈妈》中担任主演。

④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1431—1506)，意大利画家。

雷兹、约翰·凯奇、施托克豪森、诺诺、布莱[1]为器乐行为规定了新的规则吗？”

他满腹狐疑地在房间里打量着，命令他的同伴在位于两个窗户之间的大架子上仔细察看我的那些书。我笨拙地试图为自己辩护。

“如果说，我把《马太福音》的合唱安排在那些廉租房的小伙子的公开打骂中，那是为了告诉观众，他们见到的并不是一场新现实主义的斗殴，而是一场斗争，它有着某种史诗的、神话的内涵……我不是一个新现实主义作者。”我更用力地说，想起了那些在巴勒莫使用过的反对我小说的论据。

这一刻，达尼罗给那个鬈毛小金发拉过一把椅子，后者正踮起脚尖去够我那书架最高层的左侧角落。

“找到了！”他那难听的假嗓子嚷了起来，从书架中抽出了阿多诺的《认识论的元批评》[2]。

“再瞧瞧字母 B 和 H 那两档，”瓦尔特赶紧问他。

阿尔曼多灵巧地一跳，从椅子上跳下来，他的印度绸衬衣在腰身周围优雅地舞动起来，他挪开椅子，在旁边的书架上取下了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3]，然后又埋头寻找起来，像钓鱼一样钓来了马克斯·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与话语》[4]。如果检测的结果是否定性的，那么，他们兴许会一走了之，把我抛弃在尚可一读的小说作者这一可怜的命运中。但是，既然我自己也常常读一些好书，我便被归类于“可以挽救的落后分子”之中，属于他们眼中傲慢的宗派分子。他们留了下来，而我，当我看到达尼罗又把椅子归置原位，而另一位却连一声谢谢都没说，我不免有

---

① 埃德加·瓦雷兹(1883—1965)，法国音乐家；约翰·凯奇(1912—1992)，美国作曲家；施托克豪森(1928—2007)，德国作曲家；路易齐·诺诺(1924—1990)，意大利音乐家；皮埃尔·布莱(1925—)，法国作曲家。

② 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发表于 1956 年的《认识论的元批判——关于胡塞尔和现象学二律背反的研究》一书，至今仍被视做关于现象学的经典文献之一。

③ 罗兰·巴特(1915—1980)，法国思想家、批评家。

④ 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创始人。

些忿忿然。

“去让妈妈给我们煮些咖啡来吧,”我语调干巴巴地说,“快去呀！怎么还傻站着,等什么呢？”

他低下脑袋,出了门,不明白我为何这样粗暴对待他。瓦尔特坐到了长沙发上，脖子缩在他的上衣领子里，如正义之神一般笔挺而又僵硬。阿尔曼多选择了安乐椅。他懒散地缩在坐垫中,肚子朝前鼓起,双臂耷拉在两旁。

“我依然还想知道,”我一字一顿地说,“二位光临寒舍,请问为何贵干？”

“我们想拯救你，皮埃尔·保罗。学社鉴于了解你一些有意思的产品,决定干涉一下。”

“这个……请问是我的哪些作品有幸得到你们的青睐？”

“他说:‘作品’,你听见了吗？皮埃尔·保罗,你是哪里出来的呢？作品,那是对作家们来说的,对那些依然为自觉而自豪、依然相信个人创造力的人,这是过时的生产方式。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作家,而是作为一个文本制造者。我们前来邀请你参与我们的小组工作,依靠一种跨学科的策略，从语言学上做做努力，把体系内的基本争议理论化。”

要是我跟前只有那个瓦尔特一人在场,我相信,我恐怕早已抓住他毛式上装的领子,把他揪起来,扔出门口去,让他那张木头脸和宝贝大少爷的长头发见鬼去吧，鬼才知道他每天要为这头长发花费几千里拉的发蜡呢。但是,阿尔曼多蜷缩在安乐椅中,双腿交叉,让我望而却步。如同我在公开辩论中遇到的、具体情景又不允许我亲近的所有漂亮小子一样,他让我温柔下来,让我意志薄弱。记得有一次,在博洛尼亚,一次关于维斯康蒂的讲座之后，我几乎都要收回前言，因为有一个青年人,打扮得如同卡尔帕乔[1]笔下的一个侍从,在那里责备我。他在最后一排站起来,指责我在为“一个富豪,一个贵族”辩护。为什么这一蠢举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呢,还是去问一问他那双杏眼,他嘴角上绽放的那丝微

[1] 卡尔帕乔(1469—1525/26),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

笑吧。我哑口无言,乖乖地任他在那里滔滔不绝,过分满足于看着他站立着,给我送来一个优雅标致的身影。为了让阿尔曼多开心,为了让他摆脱厌烦的畏缩,我已经准备好,他们想要什么,就答应他们什么。

"我觉得,"我说,却无法阻止我的脸发红,"我为我个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假如有人真正值得在先锋派行列中占有一个地位……"

瓦尔特耸了耸肩膀。而那个金发小伙子,他回报我一个冷笑,而不是期望中的微笑。

"先锋派!"瓦尔特说,"他仗着先锋派的名义!哦,是的,"停顿了一下后,为弥补一下惊讶的效果,他又补充道,"你属于先锋派,皮埃尔·保罗。你已经被打倒了。你的论战实在很值得一做。但是,你的反叛,就像历史上所有那些先锋派代表的反叛一样,从达达派,到美国垮掉的一代,都属于一种肉体与情感上的过时观点。你依然死死抱定内容的修辞学。内容是新的,修辞学却是旧的。你的语言学经验是喧闹的和肤浅的。(听到这最后几个词,我心中只有一种害怕:生怕达尼罗现在回到客厅中来,生怕让他听到对我的这一如此清晰的义正词严的判决,这样的词语不仅对他,而且对所有人都是那么明白易懂。哦,上帝啊,快让瓦尔特用隐语说话吧。)你的行为针对的是传统语言学至高权力的外部积累物。(呜呼!)我们学社否认语言有权建立一种跟现实的正面再现关系。(我吐了一口气。)学社揭露那些根本没有意识到系统的整体物化的历史先锋派。(呜呼!呜呼!呜呼!)"

瓦尔特使劲拍了一下大腿。而我,我并没有问他,他那个学社都拿出了什么样的证明,证明他们确实好斗地反对那样一个"制度",它对我提起了二十一次诉讼,没收了三次我的书,查封了四次我的电影,判处了我缓期执行的四个月监禁,我并没有质问他,而是卑贱地转向了阿尔曼多。

"阿尔曼多,你完全有道理拒绝先锋派过于方便的标签。你做得很勇敢。最可疑的商业行为……"

他一边沉湎于对自己衬衣的观赏中,一边听着我的奉承话,却连一个目光都没有回报我。这时,瓦尔特已经拉开了腔调:

"所以,我们学社仅仅只是自认为新先锋派。先锋派是对社会的否

定。新先锋派则是对否定的否定。通过尊重语言学的交流关系来对社会提出异议,那已经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了。我们的否定之否定纲领,体现在对交流的物化本质的揭示中。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阿尔曼多?"

尽管我也厌恶他们乱七八糟的话语,尽管我也知道,在所谓的革命抱负之下,他们早就不声不响地操纵了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畅销画报以及蓬皮亚尼文学年历的大权,学社在1967年就突破了蓬皮亚尼出版社的缺口,如同当年的法西斯分子在1932年,我父亲那么喜欢的"钢铁之书"的年代,就占领了这一领域那样,而且,他们还把持了大学,在大学里,他们专断的语调吓坏了教授们,根本就不敢揭露他们的专制,尽管如此,兰波的战斗呐喊"必须成为现代"同样也让我惧怕。对一个作家来说,被下一代人抛弃,总归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对于我,失去与年轻人的接触,就将是一场悲剧。由于今天的年轻人不再有任何严肃的文化素养,得以抵抗晦涩的大字眼的诱惑,我已经看到我自己,因我对智力光明的苛求,因我的公民责任意识,而受到隔绝与遗忘的威胁。

"我们特地来为你提供最后一个机会,"瓦尔特又说,"爱多阿尔多·桑吉内蒂[①]建议你为学社的杂志《维里》[②]写些文章。有两个话题可选,第一个:'阿兰·罗伯-格里耶在清除小说作品任何意识形态欺诈行为中的重要性。'第二个:'在新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异化主题中,莫拉维亚和安东尼奥尼如何在两个根本不同的水平上运作。'"

"很乐意,"我说,很高兴又处在了一个更熟悉的范围中,他们能让我整整齐齐地写上连续的四句话。现代人的孤独,这确实是莫拉维亚的《愁闷》和安东尼奥尼的《夜》的共同主题。但在电影中,涉及的是一种模糊的苦闷,非理性的,而且几乎是无法表达的。乔万尼和丽蒂娅[③]如同漂浮在一个梦幻中。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如此作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又要去哪里。两人都消耗在一种彻底无望的苦闷中。他们坐以待毙,彼此任凭对方来毁灭,而无任何赎救的可能。丽蒂娅漫无

① 爱多阿尔多·桑吉内蒂(1930—),意大利诗人。

② 《维里》杂志创办于1965年,这一名称来自于米兰的一家咖啡馆,位于米兰的维里大道。而维里本是一个贵族作家,生于1728年。

③ 乔万尼和丽蒂娅是《夜》的主人公,乔万尼是作家,丽蒂娅是他的妻子。

目的地散步,一个手指甲神经质地抠着墙皮。乔万尼拖着悠闲的步子,走过大街小巷,一家家客厅,留下他掘墓人的形象。他们游走于历史之外,在一个自身封闭、凝滞不动的世界中。安东尼奥尼局限于把人的忧虑描绘成一种自然状态,既无缘由,又无救药。莫拉维亚则相反,他在作品中引入了意识的维度。迪诺[①]苦于一种令人消沉的与他人沟通的不可能性;但是小说家本人的干涉却让我们明白到,他为什么始终禁闭在自己的囚牢中。《愁闷》的主人公是一个历史人物;迪诺的忧虑是一种可以被历史解释的忧虑。作为富裕资产者的儿子,因其阶级出身和童年生活而情感胆怯,他处在一种双重危机的交叉点,社会危机和心理危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你有结论了吗?"瓦尔特以一种干巴巴的嗓音打断了我,至此为止,他还一直没有眨眼呢。

"我的结论是,公众更多地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而不是在莫拉维亚的小说中认出了自己,这实在太令人遗憾了。不幸的是,《夜》所反映的,是观众们的精神懒惰,是他们对互相理解的任何理性努力的拒绝,是一种内心的满足,满足于互相说一句:'我们是我们的生存苦闷、我们精美的生存苦闷的囚徒。'"

瓦尔特拉了拉他上衣的下摆,然后做出了他的判断。

"莫拉维亚在现实层面上作为,而安东尼奥尼则在语言层面上作为。你如何对一种只叙述事件的陈旧的单语义性跟一种新先锋派的复调多义性进行比较呢?我们绝对拒绝跟随你的分析,只要你还在说,乔万尼游荡在一个个客厅中,说丽蒂娅抠着墙皮。不是吗,阿尔曼多?我们无法接受对安东尼奥尼作品文本的一种如此耸人听闻的遮蔽。"

但是,还没等阿尔曼多最终打起哈欠来,房门嘎巴一响就打开了。达尼罗刚刚一脚踹开了门。他笨手笨脚地走了进来,端来一个放了两杯咖啡的盘子。他身后,则是匆匆赶来的妈妈:她把拿糖罐的头等任务留给了自己,那个银制的糖罐,专门待客用的,她捏着糖罐美人鱼状的把手。瓦尔特也好,阿尔曼多也好,谁都没有站起来迎接她;瓦尔特只是以

---

① 迪诺是莫拉维亚小说《愁闷》中的主人公。

一种机械动作,很勉强地点了点他又长又尖的下巴。阿尔曼多认定他不必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换一个更得体的姿势。当我看到达尼罗把托有咖啡的盘子递向瓦尔特,而妈妈一手拿着匙子,卑贱地问那个年轻人放多少糖好,这时,我心中的怒火一下子点燃了。阿尔曼多让人侍候着,没有一句感谢话。我想,我在他嘴唇上发现了一丝轻微的咧嘴,他好像在这样想:"啊!老妈妈前来端咖啡,所缺的就只有这个啦!"我恼怒地抓住我的杯子,一口就喝干了咖啡,突然发作似的嚷嚷道:

"你们想要我对你们说心里话吗?你们宣称要与之斗争的新资本主义,再也没有比你们的安东尼奥尼更珍贵的盟友了。一个拒绝理性地解释世界、不愿意耽于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中的创造者,让权势沾了光。再没有什么比这一类苍白无力、矫揉造作的作品更能让老板们开心了,它们使他们腾出手来,进行金融投机,剥削工人,打击企业委员会,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

我被他们的哑默无声激怒,便又补充了一句,通过使用这样一个稍稍卑下的论据,让自己也略略理亏一下:

"用毫无意义的线条或斑点覆盖自己绘画作品的画家,你们认为他妨碍了随便什么人了吗?请给我找一个没有在他餐厅墙上挂抽象画的菲亚特公司领导人!"

"我们已经不再处在库尔贝和左拉的时代了,"瓦尔特带着一种轻蔑很冲动地说。

啊!我们已经不再是在左拉的时代了!我真想扑到他的脖子上,但是,我发现了妈妈,她以她熟悉的举止,站在房门口,双手交叉放在肚子前。那么专心,那么忘我,她几乎是在问这些缺教养的人,咖啡是不是还好喝。要讲述她的忧伤和苦难,要对她默默忍受的考验回报以公正,这个经历了两次残酷战争的女人,她失去了一个儿子,是被人杀死的,她看到自己的丈夫死去,默默无闻,她去别人家打扫卫生,洗碗洗盘子,她跟她侥幸活下来的儿子一起分享一种始终不稳定、时常还很悲惨的生活,法庭审判她儿子的那一天,她昏倒在他的怀抱中,要讲述这样一个女人的苦难和忧伤,就得有一种非凡的才华,一种异常的力量,一种出众的智力,跟那些江湖郎中的教条决不可同日而语。我给了他们最后的

狠狠一击，说道：

“要说你的那些书不仅一点儿革命内容都没有，反而大大助长了权势，最好的证明就是，它们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得到了翻译和自由销售。而我的书则相反，被那里的书报检查制度所禁。”

瓦尔特像个机械木偶那样挺身站起，朝门口走去，在门槛上转过身来，嗓音尖锐地说：

“卑下的凌辱对辨证进程的展开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桎梏。来吧，阿尔曼多。在否定反面的建设方面，很明显，我们已经尝试了一切。”

他们刚刚消失在了楼梯里，达尼罗就一把拉住我的袖子，哈哈大笑着，扑过来抱住我的脖子。

“他没有必要这样穿着它来，他的衬衣！你知道它是从哪里买的吗？”

“来自加德满都，就像他们所有的旧衣烂衫那样。”

“傻瓜！我早就告诉自己，这里头肯定有什么问题。他爬上椅子的那一刻，我注意了一下。在他衣服的下摆，衣料的一角，还贴着复兴商店的标签呢。我早就猜出来了，那不是真货！”

“但是，那双值两万里拉的鹿皮鞋可不是水货！”

“啊！你也注意到它了吗？”

他十分开心，又一次拥抱了我。我为什么不也显得开心呢？我为什么要自我折磨，对这一次来访、对我说的话、对我没有说过的话苦苦回忆呢？我根本就不需要推理：如果说，新先锋派可以简化为这一神秘莫测、莫名其妙的话语，那么，它最好还是被认为“是经典的”，甚至是“传统的”，这样要好一千倍，但是，我就得始终保持原样，继续以我的方式写我的书，在书中讲述让达尼罗感兴趣和开心的事。然而，兰波的句子顽固地前来折磨我。“必须成为现代。”今天，现代性是不是就在于蔑视没受教育、没有文凭的年轻人呢？在于耻于知道面包是如何在罗马配送的？马瑞利公司某个工人的儿子，当他把背篓中的面包在餐馆中倒空后，他会想什么呢？就在这个餐馆里，63 学社的几个参加者，兴许吧，将围绕一瓶纯净的矿泉水，互相念诵他们的字谜。

要是借口说，由于句号和逗号行使着一种压制功能，一部没有标点的小说就会被那些批评家看成“现代的”，那还真是有些狂妄，还是那些

批评家,假如我讲述一个跑腿送货的小伙子的经历,他们恐怕就会以一种轻蔑的口吻,谈论什么“新真实主义”了。

我瞧着达尼罗,他在帮妈妈撤杯子、盘子。一种可怕的想法穿过我的头脑:假如我应该写一些可读的诗歌,拍一些易懂的电影,从而被剥夺了任何希望,不再能回到仲裁者身边并得到他们的宠爱,那都是达尼罗的错,是他这个人、他的简单、他的缺乏素养的错。瓦尔特提到了布里:这对我是辛酸的回忆。这个艺术家在罗马最优雅的画廊中展览他的作品。达尼罗看了后放声大笑道:“一些口袋!一些面粉口袋,就像面包店里的口袋那样!”他一个手指头指着太阳穴,像是在说:“这一位,实在不算太逗!”而我,既不敢为这位我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和伟大的创造者辩护,也不敢跟常识结成同盟,从而在整个罗马的眼中信誉扫地……结果:五分钟之后,在大批应邀者拥来参观之前,我们就悄悄溜走了。

达尼罗越是紧密地跟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就越少摆脱这样的圈套。很快,就该反思一下我尴尬的情景,我现在已经跟一个送面包的小伙子打得火热,而跟他在一起,我面对一个全是卖得很贵的口袋的画展,就很难不笑,尽管那些口袋确实很像他在他老板的店铺中看到的堆在储藏室的黄麻布面口袋。

但是,我的坚信不是已经停止了吗?我还需要更长时间反思什么呢?什么!我还会衡量比较一下这两者吗,一方面,是对某些无法从自身出发来感觉的赶时髦者的默许,另一方面,则是达尼罗的直率、纯洁?如果说他让我开心,如果说我爱他,首先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率真吗?啊!我宁可找到一种力量,来忍受我在罗马文学圈中的孤独,而不去眼红一秒钟的空间,让他以一种如此自发的冲动,把他的青春、他的热情、他的爱给予我。我驱赶了一种如此羞耻的想法。但是它毕竟来到了我的头脑中,它将给我留下痕迹,它将让我变得更苦涩,这种精神上的孤独,它在我的周围变得稠厚。

“唉,”我说,拿起了我的支票簿,“你真的受够了吗,不想再骑你的那辆破车了?”

“可是,皮埃尔·保罗……”

他根本就没猜想到,是什么促使了我要在今天送他一辆黄蜂牌轻

骑，而那辆车，好一段时间以来，他就在欧罗巴林荫大道的二手车行中看上了，反而第十次跟我讲起了自从开辟了公共汽车专用道后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的危险。

“哦，不！”他嚷嚷起来，根本就不会作弊，“我喜欢的，是它该有一个抛光的保险杠！”

坦率得足以为他赢得一辆汽车，假如他问我要的话！我将为他签署支票，他将像一个疯子那样跑出去，而我，则竖起耳朵，倾听他奔跳在大厅大理石地面上的最后回声，我留在原地，趴在栏杆上，没有勇气马上转身返回书房，尽管那里还有校样等着我去改。新的忧虑的来源，集子出版时，批评家们的判决就会接踵而来，频频恭维任何一本难懂的天书：

“P. P. P.，你比你任意一部其他作品都更远离了年轻一代。”

44

1月7日，有人偷了我的汽车。两天后，我在《国家晚报》上读到了由第一批大学行动委员会在都灵组织的见面会的报道。米兰的天主教大学从11月18日起就被占领。运动蔓延到了热亚那、帕维亚、卡利亚里、萨莱诺、佛罗伦萨。在罗马，还什么动静都没有。(没什么可奇怪的，我的科鲁西舅舅恐怕会这样说。)米兰发生骚乱斗殴，警察索斯泰尼奥身负重伤。共和国总统发去电报，谴责这一“野蛮的谋杀”。一个“民主派”法官的反驳：是警察毫无理由地首先动武。要在这一段文字底下画红线，好让我过一会儿跟达尼罗一起发泄怒气。但是，还没等我找到铅笔，门铃就响了起来。妈妈惊惶失措地跑去开门。

“一个警察！”

我赶紧过去。一个警长，年纪已经不太轻了，矮矮的个头，很壮实，在我面前并了一下鞋后跟。

“先生,我们找到了你的汽车。我把车钥匙给你送来了。”

“啊！”我说,脸色好看多了,“请进。”

他请我允许他摘下帽子,挂在衣帽钩上。从他剪得短短的波浪型黑发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发蜡味。他大皮鞋的铁掌在砖地上发出的声响让他很难堪,便踮起脚尖,轻轻地走在走廊中。

“我该准备咖啡吗？”妈妈在我身后轻声嘀咕道。

“不用,”我用同样的嗓音回答道。

警长待在客厅中央,站得笔挺地等着我。我情不自禁地请他坐下。

“我们还抓到了那个小偷,”他对我说,“至少有一点明白无疑,即对那个小偷会加以严厉惩罚。”

“好一股雷厉风行的作风！”我想,瞧着他晒黑的脸上被一把过分谨慎的刮刀弄出的小小切口。然而,我不仅没有被他叙述中的官僚主义细节所激怒,反而对我的这位来客产生了某种宽容。他整个人表现出勃勃的野心,印证着一种明显的失败,似乎要通过某种极度的轻佻来让人忘记他的南方祖籍。他还以为,在自己脑袋上抹上一罐香气扑鼻的发膏,就能清除掉他祖辈遗传的不便的小矮个,因为,长年的营养不良让这家人的身高从来没有超出过一米六。

“现在,”他总结道,“请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意起诉他。”

“他是谁,那个嫌疑人？”我问道,“他多大岁数了？”

“十八岁。”

“他是哪里人？你们有什么信息没有？”

“这是一个工人的儿子。”

“十八岁,一个工人的儿子！”

“完全正确,”他说着,机械地举起手来,搭在脑门上,“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

“如果我提出起诉,我让人把这年轻人抓起来,你就会很高兴,是不是？”我说着,丝毫不掩饰我对他的仇视。

我抱怨接待了一个被迫跟罪恶妥协的人,尽管他本人是清白的,在那些众多的罪行中,他的同事们双手沾满了鲜血:阿尔契·德·加斯贝利执政期间对弗留利农业劳动力的镇压；坦布罗尼执政期间对工人运动

的打击；1960年在热那亚和雷焦造成二十人死亡；最近一段时间，在西西里的阿沃拉两人死亡；在萨丁岛驱逐牧羊人；在上阿迪杰挑起自治派的战争；今天，在米兰，又是手握大头棍，对付大学生。就在矮几上，在我们的两把扶手椅之间，警长就能看到《国家晚报》，它的头版大标题，便是那个"民主派"法官耸人听闻的声明。

他朝那篇声明瞥去一眼，但是，随后，令我很惊讶地，他面红耳赤地喃喃道：

"我也一样，我也是工人的儿子。"

见我将信将疑地盯着他看，他又说道：

"这下子，你该吃惊了吧，一个工人的儿子也干这个行当？先生，我读过你的那些文章，你肯定在想，我这么干可实在不太地道。"

我突然激动起来，不知该如何回答，便大声叫嚷道："妈妈，你能不能给我们煮些咖啡来？"

"警长，你想来一杯咖啡吗？"

他冲我忧伤地笑了笑，点燃了我递给他的那支民族牌[①]香烟，开始静静地抽起来。我很想知道得更多些。为了套他的话，我便对他说：

"听你的口音，是那不勒斯人吧？哦！"我匆匆补充道，生怕他有受辱的感觉，"如果说我还喜欢一种口音的话，那就是圣塔卢西亚和阿尔巴港的口音了。这个，我在文章中也提到了。你就是那不勒斯人吧？"

"我父亲在巴尼奥利的炼钢厂工作。他推小车做搬运。我们住在富奥里格罗塔。八个人住两间屋子。"

"我可以进来吗？"妈妈问道，她托着一个盘子，上面有两杯咖啡和一个糖罐。

警长站了起来，保持立正姿势，直到她把独脚圆桌拉过来，把一切放置到位后出了客厅，他才又坐下来。他开始喝起咖啡来，端杯子时翘着小指头。我被这个动作感动了，五分钟前，我从这动作中恐怕还只能看出卑屈的努力，是在重复那种资产阶级的方式，而正是资产阶级，命令他狠狠镇压圣安布罗乔广场上的罢工者。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八个人住两间屋子吗？”我重复道，发现他只等着一种鼓励，准备继续说下去。

“我们忍饥挨饿。我母亲让我住到圣菲丽采宫看门人的小房间里。每天早上，我都得扫干净宫殿中的四层楼梯和两个院子。到夜晚，我得为房客们打开廊门，可他们要到十点之后才回来。我就和衣躺在门铃底下的一个柜子上睡觉。铃铛一响，我就惊醒过来。我当时很小，只有八岁上下，我得踩在一个凳子上，才够得着门闩。身穿长裙、头戴花帽的女士们，衣冠楚楚的先生们，走在一阵阵扑鼻的香气中，用手杖轻轻敲我的肋骨，嘲笑我乱蓬蓬的头发。‘小鸡毛掸子！小猕猴！’看门人让我跟他的狗同时吃饭。我母亲星期六来看我，拿走我的几百里拉工钱。先生，你听我讲可真是耐心啊。我这是第一次对别人讲这些事。我不应该的。”

他噤声不语了，有些尴尬，做了个本能的动作，手指头掠过裤腿线，然后，看到黑色的滚边后不禁一哆嗦，整理一番警容警纪的需要重又攫住了他。

“几个星期后，他们发现我身上长了虱子。我就被我的一个兄弟替代了，他们把我打发到一家理发店，理发师给我剃了个光头，然后他就留下了我，给他做帮手。我手拿一把大刷子，把落到顾客衣服上的碎头发收拾干净。他们付给我的小费，老板只等顾客一出门就把它夺走，塞到自己兜里去了。任你再没有形状的蓬头乱发，经过他的打理，都会变成波纹起伏的漂亮发型！任你的胡须再怎么刺棱，他都能成功地修剪得漂漂亮亮的！‘要翁贝尔托式的！’保王党人这样叫嚷。‘要托斯卡尼尼式的！’音乐迷这样要求。有些人还要求洗头。这时，潮湿而又冰冷的店铺中便充满了一种异国情调的气味。但是，一切的顶峰则是发蜡。这是给我们的郊区棚铺的一点点奢侈。稠密而滑腻，锁在玻璃柜里，只有在重大时刻，我才能把那个瓶子拿出来。老板在某个律师[1]头顶上涂上核桃那么大的一摊后，那一位便撸起袖子，不加掩饰地看自己的金表几点了，还觉得把双手在我头发上擦一擦很是得体。我走出店铺时，头上便闪着发蜡的光亮。我散发出的强烈气味，让同伴们羡慕不已。就算头上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戴一顶王冠，恐怕都不会让我在街区小家伙们的眼中有更大的魅力。”

他以一个令我感动的天真动作，捋了一下头发。在富奥里格罗塔粗鲁的剃头匠那里当学徒之后三十年，他还希望以同样的证明给自己带来勇气。撞见我的目光后，他越发趾高气扬，整了整领带的结头，微微一笑。

“先生，我想我是明白了，你那么宽容地倾听我的叙述，并不仅仅因为我给你带回了车钥匙。你不像其他人那样，他们都敌视我们，蔑视我们。他们难道全都认为，我们是诚心诚意选择了吃警察这碗饭？先生，我可是被迫才干上这一行的。这是我摆脱悲惨生活的唯一办法。就在昨天，我还看到我妻子泪流满面呢。‘安娜，你怎么哭了？’当他去一家药品杂货店买洗涤剂时，他们拒绝为她服务。‘这是一家无产者的店铺。’她周围，是一张张阴沉而严肃的脸。‘我的天啊，安娜！’我对她说，‘你得回答他们，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是无产者，兴许比他们还更是无产者！’听了这话，她一下子嚎啕大哭起来，我再也无法让她平静。‘可是，帕斯夸雷，你真是瞎了眼啊！’她终于对我说，‘你不知道，我们的邻居见到我时根本就不打招呼，我没有一个朋友，他们看见我就躲，像是躲一个鼠疫病人，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也被孤立了。同学们隔绝他们，拒绝跟他们玩！’当她在一旁痛痛快快地发泄时，我想起了人们让我忍受的无数的小小凌辱，让我，在我们的住宅楼里，在外面，在城里，在我穿着警察制服露面的所有地方：当我走下楼梯时，一家家房门突然就关上了，邻居们从来都不跟我搭话，公共汽车不等我上去就开走了。我没有朋友，我也一样，先生。我跟其他人一样，有令人尊敬的姓名，埃斯坡西托·帕斯夸雷，这是我的姓名，先生，我跟其他人一样，是个一家之主，我有着跟其他人一样的问题，物价上涨对我跟对其他人同样是生活中的大问题，然而，他们却一脚把我踢开，他们驱逐了我。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雷子，局外人。雷子，雷子，只是个雷子！我没有别的选择，先生。”

他走得那么激动，连帽子都忘在了衣帽钩上。我不得不追出去，到楼梯上还他的帽子。返身上楼时，我还沉醉在他的忏悔中，听到钟声敲响了一点。达尼罗在干什么，这个向来那么准时的人？他已经迟到了半个钟头！我打开落地窗，穿越了花园，一直来到角落的玉兰树下，在那里张望起来。凛冽的冷风使街上和对面山坡上传来的每一个声音都变得

水晶般的玲珑透剔。

假如他不来,我上哪里找他去呢？怎样才能找到他呢？我甚至连他的地址都没有。除了他说过的那些内容,我对他的生活还知道些什么？啊！我笑着想道,我毕竟还不会把他监视起来吧！他难道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吗,他所做的一切？为什么要怀疑他？他不是从来就没有隐瞒过,他每星期六晚上都要跟他老板的侄女一起出去，带她去圣罗伦佐教区的舞厅跳舞吗？没错,昨天他向我借了一千里拉,买了花送给这位路易莎,因为今天是姑娘的生日。这一千里拉,我能在这笔钱上看出我自己的幸福,琢磨一种前所未有的被人爱的滋味,我四十六岁时还被一个小伙子爱着,而他根本就不厌恶女人,也不是不能跟一个年龄相仿的女伴调情。但是,假如有一天……不,不！我必须赶走这一想法,忘恩负义、小里小气、毫无根据的想法。我难道不是更喜欢听到他说姑娘们的坏话,不是只愿他跟我一个人相好吗？那样一来,他不是就显得不那么完整,不那么有人情味了吗？他向路易莎显示的小小弱点,让他的柔情对我变得多珍贵啊。路易莎,他老板的侄女！几乎就是他自己家的人……他应该经常在面包店里见到她……那么,我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假如我知道,他对她有那么一点点意思,我难道会生气不成……假如他对那个小姑娘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我难道会对自己说他是选中了我吗？重复这个词是多么美妙……

一点半了。地平线上还是没有马达的丝毫声响。他喜欢跳舞,他……是的,对,到时候我只需夸耀一下我自己,找到了一个如此朝气蓬勃的他,性格那么坚定,趣味那么阳刚。既不腼腆,也不抱成见,对女性之美十分敏感,真正自由自在。让我们承认一点吧,尽管那么多人对我们有好感,他们给予我们的却在别处毫无都派不上用场。我遇到过我的同类。跟带有心理情结和内心抑制的小伙子相反。感谢上帝,更是男人,而非女人！但是,要是就这样把我给甩了,只因为今天要为他的女朋友吹灭生日蛋糕上的十六根蜡烛……我第十次出门走进花园，玻璃门上反映出我一张沮丧透顶的脸。

大约两点钟时,他来了,显得十分激动。大学生的一次大游行把他堵在了威尼斯广场。

“有好几千人,皮埃尔·保罗！听到他们有节奏地高呼口号,你一定会很高兴:‘反对阶级学校!反对特权大学!’在他们对面,则是一排吉普车和卡车,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警察机动队[①],全都头戴钢盔,胸顶盾牌,手握警棍。我停了下来,对自己说:‘我跟大学生一起高喊几句口号,皮埃尔·保罗会很高兴的。他会看到,我已经学会了读《国家晚报》,他教的课已经进到了我的脑子里。’不是吗,皮埃尔·保罗？”

我从内心把自己看做可怜的傻瓜和白痴，在木兰树底下嫉妒心发作,无可救药。那个警长的形象,他童年的回忆,他孤独心态和慌乱心境的供认,立刻就在我的精神世界中抹却得干干净净。我全身心充满了幸福,感到跟达尼罗紧密团结一体。

“他们皮带上是不是还别着手榴弹？”我问,又拿起了桌子上的那篇控诉文章。

“当然有手榴弹啦!它们都已经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扔来了。砰!砰!耶稣啊,何等的喧闹！我都不知道我到了什么地方。只觉得眼睛烧得火辣辣的难受。运气不错,一个姑娘出现了。‘快拿着这个,’她对我说,递给我半个柠檬,还有一片阿司匹林。为感谢她,我建议她跟我一起逃走。我们像疯子一样逃跑，最后，我们找到了那辆轻骑，我们就开溜了。‘哎！’她对我说,‘我看过你演的电影！’”

“一个姑娘！”我惊呼起来,想开他一个玩笑,“好家伙,你都会盯姑娘的梢了！”

“你瞧瞧,她是不是很漂亮,阿娜玛利亚,”他接着说,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一张小照片,“她很熟悉你的电影,这让我很高兴！”

“她还给了你照片？”

我的脸不觉变得苍白。听到我的嗓音都变了,他便改变了态度,这却让我的疑心有增无减。

“这照片,我本来不想拿的,你相信吗？‘赶紧的,’她当时对我说,‘假如爸爸趴在窗口上看到你,家里就该有好一顿吵了。’”

“‘假如爸爸趴在窗口上看到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达尼罗？你难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道还把她一直送回了家吗？”

他弯起了脊背，伸手挥了一挥，仿佛要把我刚得知的那件事的重要性缩小到最小。

“另外，”我轻蔑地说，“我对这整个故事嗤之以鼻。真是每人都有自己的杜尔西内娅[1]！”

我把照片还给了他，希望他能当着我的面撕了它。但是，他并没有听出我的挖苦口吻，我的挖苦之箭落到了一个十二岁时就辍学的送面包小子的无知之盾上，他根本就没听说过塞万提斯这样一个人，他把照片放回到上衣内侧的暗兜中。

“我可不可以知道，”我又接着说，“这位美人儿，她住在哪里？”

很天真地，他落入了圈套。

“玛格丽特女王街 121 号。”

“啊！你还记住了地址。你们肯定还说定了要再见面的吧？一个陌生女郎，这样的……你就这样飞扑着，奔向一个陌生女郎！……”

他吓坏了，不敢回答。为了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走进了花园，寒风吹到了我脸上。“你，嫉妒了？你，惹靠色相吃饭的、娘娘腔的家伙是那么的讨厌你，而玛莫罗桥的小子们[2]却是那么喜欢你，因为他们带着从你这里偷来的几千里拉，无拘无束地前往布伦塔夫人那里，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后都结了婚，像桑蒂诺那样。他们跟你一起去，是出于对你的柔情，而不是对另一性别的嫌恶。他身上的那部分，你无法后天获得的部分，你难道不是更喜欢在达尼罗身上找到吗？更是男人，而非女人……”

我突然被一种想法抓住，忘记了我刚刚对自己说的话，便呆呆地站在石榴树底下，面对着大街。达尼罗进来时没有脱上衣。而平时，他会马上就把它脱了，挂在走廊中。今天，外面天是那么冷，他一脚走进公寓之后，本该比往常还更需要脱掉他开摩托时穿的皮衣。“不！不！”我对自己嚷道，“你不该又开始发脾气，又猜想，比如说，他固执地把那张照片带在身上。就放在心口上。此外，我要做一个测试。一直数到五十，尽可能慢地数。然后，猛地转过身来，从落地窗看进去。假如我看到他只穿了

---

[1] 杜尔西内娅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暗恋的一个乡村姑娘。

[2] 原文为意大利语。

汗衫,我就跑向他,我就拥抱他,我就给他一万里拉,让他给自己买一副渴望已久的牛仔坐垫。假如他一直还穿着上衣,那么……”

我不知道,卡紧的嗓子憋出来的这一记喃喃声“那么”中还会出来什么,说这话时,我的手抚摩着一片已变得干枯的石榴叶子。数到五十了,我对自己说:“再数十下。”到了六十了,我把叶子扔掉,转过了身子。达尼罗的上衣已经不在身上了。“拉齐奥万岁”的红色圆体字母印在他蓝色T恤的背上。他正把什么东西拿给妈妈看,跟她热烈地谈论着。我闭上了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画了一个十字,就像在中学里,我逃避了数学课上的提问那样。我轻轻推开玻璃门,看到他宽阔的肩膀正以一种运动员般的节奏,一会儿耸起,一会儿又落下,我不禁为我的愚蠢而微笑。

45

听到我的鞋跟踩在石板地上的声响,达尼罗转过身来。他拿给妈妈看的,原来是阿娜玛利亚的相片。看到我时,他有些害怕,赶紧合上了他的皮夹子,塞回他李维斯牛仔裤的后兜。妈妈鸣金收兵,返回厨房。我抓住了达尼罗的胳膊,直到把他掐出血痕来。

“现在,你成了拉齐奥的球迷吗?什么时候开始的?白痴!该支持的球队应该是罗马队。我对你说过一百遍了。”

“哪儿的话呢,皮埃尔·保罗!”达尼罗真诚地反驳道,“除了博洛尼亚队,我还从没见过你对任何一支球队感兴趣呢。”

“啊!兴许,这是因为,你已经知道我对什么感兴趣了吧?你知道是什么让我牵肠挂肚吗?在这种情况下,你完全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是不是喜欢在两点钟时坐到饭桌前,妈妈是不是会很高兴忙碌不停,一直忙到大下午,然后还得洗碗洗盘?”

“可是……”

“你去玛格丽特女王街溜溜地兜了一圈，在城市的另一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得在这里等你，我们在为你焦虑不安，你难道就没觉得有什么过意不去吗？”

“可是，皮埃尔·保罗，我敢肯定你会赞成我的！假如阿娜玛利亚晚一点回家，她一定会有一刻钟时间难以交差。她父亲管她可严了。他还以为她在大学里呢，这是一个对示威游行丝毫不理解的老顽固。”

为了感化我，他重复道：

“她真的很熟悉你所有的电影。”

我有些恼火，便给他胸口上来了一拳，他挨打之后，做了一个鬼脸。

“大白天的，她父亲怎么可能待在家里呢？要上班的父亲不到傍晚是不会回家的，”我断然宣称道。

“德·罗利斯先生是个糖果商，你知道。他发明了一种制作杏仁酥小烤点的特殊配方。今天，商店关门。他对自己的孩子看得很紧。如果阿娜玛利亚课后回家迟了一点，他就会趴到窗口上等她。他把她的课时表贴在墙上。一份很大的布告，每天精确的作息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她在建筑学院学书画刻印艺术，”他骄傲地总结道。

“一个糖果商，真是见鬼了！”我叫嚷起来，“一个可怕的小资产阶级，通过让公证人和企业主的妻子多多吃糖而发财致富。你难道忘了西西里的阿沃拉的两个死人了吗？他们就是因为厌倦了采摘杏子，厌倦了让德·罗利斯先生和小姐发财，才被杀死的。”

“可他并不是一个富人啊，”达尼罗还有力量争辩，“商店的老板可不是他。他在烤炉房工作，在后堂……”

热气腾腾的宽面条端上桌来，妨碍了我更长时间地纠缠他。第二天起，达尼罗又恢复了守时的习惯。我暗自发誓，再也不拿阿娜玛利亚的事折磨他了，尽管他始终对她殷勤相伴，这一点，我是根据他脸上不由自主显露出的自鸣得意的小小神态猜到的。他突然对政治上了瘾，埋头读我的那些报纸，假如我敢肯定只有我一个人在影响他，那么，这对我应该算是一种胜利。此外，他依然还是那么热情洋溢，并坚持，尽管天气寒冷，还是要在午饭前去万国博览会那边的空地上兜上一圈。我们以一

局拳击开始，然后就滚到了一个灌木丛后面。游行示威的那几天，吃饭时，他要求我让他听广播。我违心地打开了我的半导体收音机，但是，我得拿什么借口，才能禁止他跟大学生们搞在一起呢？

他们奋起反对达尼罗从我这里听到的批判意大利教育制度的一切：陈旧的纲领，过时的方法，精英化的教育，评判一个水泵工的儿子对但丁某段作品看法的荒诞性，以跟教授或律师的儿子同样标准对他作业打分的不公正，充满社会歧视的智力选拔的欺诈性。我曾跟他讲了我在弗留利的经验，讲了我那些蓬乱的头发上满是干草的学生。他们身上散发出粪便和马厩的气味，他们来学校之前刚刚帮父亲把牛群赶出了圈栏，而在学校里，我得教他们背诵拉丁语词尾变化的六个格，还有被动形主动义词汇的愈过去时变位。而他，时时要操心他那个总是落在全班最后的兄弟乌戈，总是不厌其烦地听我反复唠叨，说学习的失败常常更多地反映了家庭生存状态的贫困，而不是孩子个人能力的不足。

现在，自从与警察的摩擦和对抗开始后，他就很开心地跟我评论骚动的进程。

“你瞧好吧，”他带着一种天真，滑稽地模仿我的话语说，“复仇的一天就不远了。三兄弟共用一个房间用功温课的学生，将跟独自拥有一个房间的父母掌上明珠儿子享有同等的机会。”

但是，我为诱惑达尼罗曾经使用的那些论据，当它们帮他鼓足了勇气走在横幅后面游行时，在我看来却并非那么不可抗拒。我很想跟他一起同仇敌忾地反对美军在越南的暴行，但是，我并不想为他提供什么口号，让他跟阿娜玛利亚肩并肩地走在队伍中大声呼喊。几天来，建筑学院走在了学生运动的头里。我不无揪心地看到，达尼罗绷着那张严肃的脸，认真收听广播，竖起耳朵注意手榴弹低沉的爆炸声。

“毕竟，他们总不该那样情绪激动，”我对他说，“他们要求取消考试，而丝毫都不考虑后果。”

“但是，后果只会是良好的，是人们希望的，皮埃尔·保罗，假如考试就如你曾给我讲过的那样，只会认可(正是这个词，不是吗？)社会不平等的话。”

“一派胡言！取消考试只会有利于那些拥有人际关系丰富资源的

人,他们将得到更好的安顿,而不必出示什么文凭。”

他瞧着我,惊恐万状地听到,我在本该名正言顺地成为起义者先知的时候,竟然改变了主意。

“与其如此冒冒失失地扭转脑袋,”我继续道,“你本该好好地想一想,你们袭击的那些警察,都跟你父亲属于同一个社会阶级,而在大学生当中,却不会有百分之二以上是工人的儿子。”

达尼罗挠了挠自己的后脖,被这一异议弄得张皇失措,但是,他随后便跳将起来,他发现了我推理的不当之处。

“我们并没有袭击警察!”他嚷嚷起来,“反倒是他们在袭击我们。”

我迅速地寻找另一个领域,来发动攻势。

“占领各个中学,这又有什么用?让那些最富有的人来付钱,上特殊课程,或者,让他们来注册,上那些私人学校吗?谁将又一次遭受惩罚呢?是穷人们,是你的兄弟玛尔切罗,他将永远不能成为工程师,是你的兄弟乌戈,他的中学毕业考试考卷上被打上一个叉叉。”

达尼罗什么都没回答。但是,看到他随后急急忙忙地跑向他的轻骑,匆匆发动马达,一溜烟地开跑,我便有些担心他会投身于打架斗殴中去,会迫不及待地以自己的行动,来消除他在两个小时伤风败俗的吹毛求疵之后给人们带来的怀疑。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公寓被他们玷污和劫掠了,他给我打来电话,提醒我提防那些“鸟儿”,那是一帮身份不明的狂热家伙,他们随便摁响某个作家家的门铃,大摇大摆地走进去或强闯进去。他们二话不说,出于原则而拒绝讲一句话,只满足于像麻雀那样唧唧喳喳,他们闯进厨房,从冰箱中拿出鸡蛋,用这些投掷物在房间里开战。当他们把墙壁弄得乌七八糟,把桌子椅子推翻在地,把手稿散得满地都是,把油画弄得破破烂烂,他们便像一阵风似的离去,去别处继续他们飞鸟一样的抢劫。

妈妈得到了严词提醒——“先从猫眼中好好瞧一瞧,只要是陌生面孔,就决不开门,”——我开车去了平乔山。据广播说,一万多示威者占据了人民广场。这还是一个全新的、异乎寻常的场景——千万个高高地举过头顶的拳头,吉他声,叫喊声,革命歌曲,欢快的火焰,右派大本营

玫瑰红咖啡馆的塑料椅子在火中没怎么燃烧就碳化了，身穿游击队作战服的切·格瓦拉的大幅画像，警察们藏在卡车金属栅栏后面阴沉而又紧张的脸——但是你别担心，我不会再根据人们已描述过一百遍的句子去写，那些东西在你看来，就跟描写世界大战的战壕的书页一样新鲜。尽管那画面栩栩如生，非同寻常，我毕竟不打算把它写满我的笔记本。我所寻找的，谁又能告诉我是什么呢？既担心同时又渴望撞见达尼罗跟一个褐发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她的照片跟我早先想象的很不一样，显示出一副娇好的面容，这种担心和渴望推动我在人群中前进，就像一个瓶塞那样到处弹过去，又反弹过来。我头发蓬乱，目光呆滞，耳朵竖起，脑袋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模样应该很像一个疯子，像一个疯子，很容易被人当做一个行将走向灭亡的疯子。他那又短又鬈的头发，他后脖子上绵羊般的鬈毛，我有一百次以为认出了他，却一百次地向人道歉。只是当他再次工作的时刻来临，圣玛利亚教堂钟楼上的大钟敲响了很久之后，我才暂时感到了轻松，重新走开。

回到家后，我发现妈妈在哭，走廊墙上一片斑斓的污迹，书房也被弄得乱七八糟，地上满是书，马萨乔的画被撕得粉碎。“鸟儿们”在我家完成了一次袭击。

“妈妈，我告诉过你的，不要开门。”

“可是，那个人，我是见过的。你的一个朋友。基多生日那一天，两个来看你的年轻人当中的一个，你还记得吗？”

“啊！是那个留着褐色长头发的高个子吗？”

“不，是另外那个，金发的，穿一件印度绸衬衣。”

“阿尔曼多！”

“也许吧，他没有提自己的名字。他跟另一个人一起进来的，短短十分钟时间，他就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打了个落花流水。耶稣啊，饶恕他们吧。”

当我把图书归落到书架上，检查我书稿的页码时，我听到妈妈在厨房中一声声抽泣。今天早上，她煮了半打鸡蛋，准备晚上做俄罗斯沙拉吃。那些毁坏艺术的人，为了对墙壁进行轰炸，开始从冰箱中拿出了吃剩的食物，这时候，突然，阿尔曼多（“你敢肯定就是他吗，妈妈？”“是的，

就是那个穿印度绸衬衣的金发年轻人。""金发的吗？金发的小个子，你能肯定吗？""怎么啦！我又一次看到他，肚子疼得弯下了腰，像一只老鼠那样窜出了厨房！")两手捧住了肚子，匆匆奔向了厕所。计划的改变原来是这样产生的，他就这样顿生邪念，胆大包天地把臭屎抹在了走廊墙上。但是，尤其伤害到妈妈作为家庭主妇自豪感的，是她再也无法在盘子中区别哪些是生鸡蛋，哪些是熟鸡蛋了。

"再去买一些来吧，"我对她说，"反正我们付出的已经够贵了！"

她把它们一个个拿起来，轻轻掂量它们，放在耳边晃动着，仿佛那是一件应该拯救的宝贝。弗留利的农妇，对每一片面包都是精打细算，决不会忍受白白浪费一打鸡蛋。至于我，我则十分惊诧地发现，文学争论对那些恐怖分子只不过是一块跳板，用来走向神秘的计谋。

达尼罗事先没打招呼就过来了，我从来没有在下午等候他来。

"怎么回事？又是法西斯分子干的吧？"

他闻出了粪便的臭气，然后才看到手指抹在墙上的痕迹。

这一回，我不得不告诉他实情了。

"不，达尼罗。那些父母们的掌上明珠，保姆是教过他们的，拉完屎，擦完屁股后还要洗手。他们今天发泄了一通，同样，他们把打小从家里学到的戒律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旷了课去参加示威游行。"

他被妈妈正在干的活惊呆了，便没有提阿娜玛利亚什么的，而是直接打断了我的话：

"可是，夫人，"他笑着欢呼起来，"这也太简单了吧！你用大拇指和食指拿起它们，让它们转起来。如果转得像陀螺那么快，那就是煮熟的。如果转得很勉强，就说明它里面还都是液体。瞧瞧这个吧，转……这个呀！"他特地朝我补充道，不敢直接对妈妈说，"你还说你来自农村，可你连这么简单的一招都不知道！"

他站定了，叉开了双腿：

"要我说，你才是资产阶级呢！"

"你怎么有空还能大下午的跑来？"我干巴巴地问他，很气恼在这一俏皮话底下承认了一个事实真相。

"大多数餐厅都放下了铁帘门，宣告打烊了。看来今天夜里会有打

劫行动。”

我只能希望他在延长到晚上的这一幕间曲期间更温柔，更温存。只是在他走了后，一种可怕的疑心又攫住了我。“如果说，他给了我额外的两小时，那是因为他在寻求为某件事情原谅自己。”

一夜平静，但是，第二天，建筑学院的大学生支持了朱丽亚谷的一场战斗。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手榴弹爆炸声，还有齐声高唱的歌曲，我带着收音机站在玉兰树底下，等着达尼罗，但他一直没有回来，而且整整一天都没露面，“昨晚上我想得对，”我对自己说，“他赠送的两个小时可不是白送的。他已经知道了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是想给我留一点甜头先尝尝。”我甚至都没有想到，他可能会受伤，如我随后得知的那样：挨了一记警棍，但不太严重，尽管他跟另一些人被送进了医院。从播音员嘴里念出来的“建筑学院”这几个词，各种语调的，一下下地敲打着我的脑仁。达尼罗，再没有更确切的了，为了吸引糖果商的女儿，扮演了图帕马罗[1]游击队的角色，而那个女孩子，很长时间以来，这一点人们恐怕都无法怀疑，就从她父亲的客厅里撕下了那张时间表。她回想起他在电影中的角色，她把他当做一个演员，他不得不避免向她承认自己是给餐馆送面包的小伙计，而她父亲，恰好碰巧了，也为那些餐馆提供特制的杏仁酥小烤点，以一种西西里风味来为罗马餐馆的甜点菜单增添光彩。

凌晨三点钟，战斗结束后很久了，我还在熬夜。从竞技场到帕里奥利，从圣彼得大教堂到火车站，黑暗与寂静笼罩着整个熟睡的城市。只有清洁工还在忙着扫大街，在战场上清除一捆又一捆废旧报纸，那都是示威者用来垫屁股的。我被困意折腾得疲倦，被等待熬得沮丧，被嫉妒刺激得难受，写下了标志我命运转折点的那首诗。它会像一个自我毁灭的症候那样，令我的朋友们惊愕不已，它会在右派报刊中引起嘲讽，会让《国家晚报》和《团结》陷入困惑，会激起极左派的愤慨，会让我失去年轻人的好感，同时又不会让我赢得更多读者，而且，无论如何，还会加剧我的孤立状态。

从第一行起，我就蔑视雄辩术的规则，拒绝使用艰涩的委婉说法，

---

① 图帕马罗是乌拉圭的一个极左翼游击组织，经常在城市中活动。

而我二十年的职业生涯让我对这一套早已驾轻就熟了,就这样,我签署了对我自己的判决书。

昨天,当你们在朱丽亚谷跟警察
混战一场,
我的同情已给了警察!

根本用不着把我要说的话放在蒸馏器中扭绞,以求获得一种会有二百个读者明白的“实验性的”诗意。宁可使用事实本身的粗暴话语。

因为警察是穷人的儿子。

我忘记了,每一次,都是他们给我送来一份开庭通知书,每一次,都是他们在拂晓时分逮捕我,每一次,都是他们把我推上被告席。

他们诞生在环城马路旁,那里
公共汽车停下来便调头返回。

神奇的字词在我的眼皮底下宽恕了他们。

一到八岁,就去干活,被剥夺了
他们的童年……

这一节为埃斯坡西托·帕斯夸雷复仇的二行诗,似乎从我的笔端自行流出:这对那些人是一种凌辱,他们实在太不看重自己,不会把名字这样一个个人印记放在家族姓氏的集体印记的前头。警长的姓(埃斯坡西托:给一个捡来的孩子,“展放”在一个修道院塔楼中的孩子起的外号[1])把他的家谱连在了一个羞耻的起源上,对他来说,那应该是凌辱的另一个补充来源。

如果他缺少了这一可减罪的情节,那我就会以同样的不公正站在他的一边。一大清早便从床上被叫起来、并被打发回老家的移民,被送

① “埃斯坡西托”(Esposito)和“展放”(exposé)在原文中为同一词源。这位警察叫埃斯坡西托·帕斯夸雷,其中埃斯坡西托是家族的姓氏,帕斯夸雷是他的名字,而通常,意大利人是名在前,姓在后,他应该叫帕斯夸雷·埃斯坡西托。

上囚车的加里波第桥的小伙子，两年来一直未受惩罚的法西斯分子对保罗·罗西[1]的谋害，安设在工厂大门口对付罢工纠察队的水泵：我会把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所有过激行为，把他们对权势的所有讨好行为，全都转到警察头上，不为别的，只为把我的怒气全都撒向德·罗利斯先生和他的女儿。

然后，瞧瞧他们是怎么穿戴的：像个木偶，
那件散发出炖菜味的粗毛衣。

我会影射他们的工资吗？是的，既然阿尔曼多那双美洲野猪皮的皮鞋，手工缝制的，极其精美，就值一个二级工的半个月薪水。

每个月挣四万左右里拉。

我不寒而栗：公路上越来越近的这声音，它是不是来自罗马？我已经学会了凭耳朵分辨各种类型的马达：滚动声如被呢毡吸收的是黄蜂牌，撞击声丁零当啷很清脆的是朗布莱塔，噼里啪啦响的是吉莱拉，像爆炸一样的是古兹。很可惜，在我窗户底下震撼着谷地的怒吼声只能属于一辆早早去赶渔汛的卡车，它前往奥斯蒂亚港口，迎接渔船归航。在失望的打击下，我痛快地斥骂起来。

我在你无能野心的胡子中，
在你冒充高雅绝望的苍白脸色中，
在你性欲怯弱的不可捉摸的眼神中，
在你被迫的快乐中，读到了一个糖果商父亲的羞耻。

但我画掉了最后一句诗，它本来会让我在达尼罗面前处于一个太低下的地位。“从美学层面上说”，就像63学社的密使们会说的那样，以上的十一音节诗句就不是太好了。我的抨击很不合拍，我并不想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说我的诗歌还值得流传下去，那都是因为那些更真挚的段落，我在其中把警长的忏悔和我本人遭社会弃绝的经验杂糅在一起。

---

[1] 保罗·罗西(1923—)，意大利哲学家，大学教授。

没有权力有一种微笑，
被抛到世界的边缘，
分离
被逐（一种举世无双的驱逐），
被辱失去了做人的品质
只有做警察的品质（被人恨使人仇恨）。

地面上的一种摩擦声让我扭转了脑袋。一只黑甲壳的又胖又大的鞘翅目昆虫从落地窗上滑过。它停在了我的灯罩在瓷砖地上画出的圆弧尽头，翘向我书桌的那一对触角彼此摩擦着。尽管我拒绝为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偶遇赋予某种象征意义，尤其涉及常被小说家们拿来说事的昆虫，当我看到这位夜晚来访者时，我依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只见它朝我这方向舞动着大颚，并抬起了它角质的鞘翅，似乎要飞起来。就在我往后退去，为它让出自由空间的时刻，它突然转变了主意，兴许对我过于迅速的缴械产生了厌恶。来了最后一通噼里啪啦的挑战之后，它盘旋起来，朝房间尽头一路航行而去。它细长的爪子从瓷砖地上一滑而过，这不能阻止它笔直冲向墙上的一个洞，毫不打弯地消失在了那里头。

重读自己的诗歌时，我突然不寒而栗。那页纸被撕成碎片，飘舞着落到了字纸篓里。我又跑去捡它，手忙脚乱地用粘胶条把它们一一粘好，当年，在我维苏塔的小阁楼上，我曾经使用滚动在同一个小仪器上的粘胶条，让斯温觉得那么好玩。现在，我还会因此而嚎啕大哭吗？我咬紧牙关，把诗歌塞进一个信封中，寄给了那家发表我文章的杂志。如果说，我来不及细问我的任何一个朋友，询问他们的看法，那真是活该。再说，那都是一些什么朋友呢？我还有朋友吗？他们希望看到一次新的丑闻，觉得这份恶意的陈情表实在太好了，它肯定会发表在报刊的头条。我孤独，孤独，那么孤独。独自一人守候着拂晓时分肮脏的白色，窗玻璃映照着我满是皱纹的脸，而就在窗外，清晨的第一只鸟正在石榴树上抖动它的羽毛。我用自己的双手，把我送上了示众的耻辱柱。千千万万迄今为止还对我充满信心的读者，将轻蔑地把我抛弃。

46

一种暂缓:在米兰拍摄一部新电影。我带上了达尼罗。我的长片中最烂的一部,尽管它在意大利国内国外都获得了成功。太受条条框框的限制,抽象,勉强。跟资产阶级的一次算账。对资产阶级家长以及他们的资产阶级孩子的一次谴责行动,它还谴责了资产阶级思想,正是那种有罪的爱,把达尼罗引入歧途,让他满脑子以为应该爱上一个姑娘,骑上轻骑带她兜风,即便当那年轻人已经远离了罗马和阿娜玛利亚,熟睡在与我为邻的旅馆房间里,这一形象依然萦绕在我的脑际。假如没有媒体的压力,假如没有广播里和报纸上成日传播的关于恋人对象的广告,假如没有把意大利文化变成了异性恋宣传机关的这种毒化,他会不会想到,他给他老板娘的侄女带去的花束,并没有让他摆脱他的男子汉义务?这一大罪,让小伙子们偏离他们的自然目标,用不着什么别的,只须让上帝来惩罚它就行了。就这样,我动员了上帝,让他在那位漂亮而又充满疑谜的美国演员的容貌底下,进入到保罗的家中,一个接一个地诱惑了每一个家庭成员,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然后则是小女仆,她是唯一一个被这一经验引导到神秘道路中去的人,而儿子和女儿,成了我仇视年轻大学生们的牺牲品,落到一种老年性迟钝的阴影中。

电影于秋天在威尼斯参展,获得了国际天主教会电影奖,这已经是该奖第二次褒掖我的一部作品了。不过,这不仅不能使它避免涉罪于淫秽,也不能让它躲过查封,而在此之前还有电影展宫的声声谩骂,以及同样不那么客气的扔向银幕的一捆捆茴香。面对时尚,批评家们始终那么奴性十足,祝贺我实实在在地清除了最后那组镜头中的自然主义趣味。我最终找到了一种“现代的”话语,在他们看来,我这部电影冷冰冰的、无人称的背景体现出了新资本主义时代的悲伤。当然,保罗的别墅

更像是一所诊所，而不是一个富有工业家的豪华居所：平整的白色墙壁，空荡荡的走廊，简单到了极点的家具，既没有炉灶又没有食物的厨房，一个呈几何图形的铿光瓦亮的世界。但是，我并没有什么可以自吹自擂的，我毕竟知道，这一作品出于什么理由跟我习惯的风格断然决裂，总之，它们由小小的细节和具体的精确性构成：我怯弱地希望回归到取悦那些被戈达尔和安东尼奥尼咒骂的人；希望能通过在《电影手册》上摘下一篇赞扬性的文章，来向63学社复仇，这本在巴黎出版的先锋派杂志，总归比在外省人桑吉内蒂领导下的外省杂志《维里》威望超过十倍；为赢得罗兰·巴特和阿兰·罗伯-格里耶的读者们恩赐给我的国际认同，我要野心勃勃地进入艺术创造界的精英集团中。

而现在，杰那里埃罗，你要准备好迎接一个异乎寻常的、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人物，我要通过这一天真的开场白，来纪念她，而这种怀念，只有那些伟大的女英雄、那些女神和仙女才配享受：她就是玛丽娅·卡拉斯，是的，人们称她为歌剧女神，我跟她曾为另一部电影有过片约谈判，她则来到威尼斯机场，在换飞机途中签署合同。她退出舞台已有三年时间，却始终吸引着记者们的注意。边境警察根本不敢打开她的护照看，就把它还给她，她小腰一扭就把门顶开，径直朝我走来，向我伸出了胳膊。我以一种兄弟般情谊的冲动，回报以她的拥抱，但是，就在我们的面颊应该碰到一起时，她微微一侧身，突然扭转了脑袋，把嘴唇贴在了我的嘴唇上。同时，她那稍稍上挑的漂亮眼睛朝身边瞥去，确信摄影记者并没有错过这一场景。我对她来的这一手略感惊讶，因为我们只有两三次机会面对如此的大庭广众，我急忙将我的嘴向后退去。她对我的这番举动一点儿都没有显得不高兴，反而装出很开心的样子，始终把胳膊搭在我的胳膊上，有条不紊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总之，等待换机期间，她始终表现得兴致勃勃。

亲吻的照片第二天起就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刊上。"P. P. P.和卡拉斯之间的一曲田园牧歌？"一些美国画报迫不及待地用这句问话作为文章标题。三个星期后，人们得知，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娶了杰基·肯尼迪①，但是，

① 杰奎琳·肯尼迪(1929—1994)，昵称杰基，曾是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夫人。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1906—1975)，希腊船王，他于1968年10月迎娶了杰基。在此之前，奥纳西斯曾跟玛丽娅·卡拉斯保持了多年的爱情生活。

希腊船王却不敢把这事预先告诉九年期间曾跟他一起分享他的婚床、他的游艇、他的斯考皮奥小岛的那个女人。被遗弃的女主人在报上读到这一消息时,不禁昏了过去。我还能回忆起我们在威尼斯的简短会见的每一个细节:玛丽娅的极端快乐,她那只神经质的手忙于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又关上手包(单是这手包的拉链就值一百万),尤其还有她炫耀其挑衅性亲吻的动作。最后的努力(它的悲怆动人尤其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一个男人成了其工具),为的是激起背叛者的嫉妒,希望最后能把他拉回她身边。

我这个心中曾有同样盘算的人,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处在最好的处境中,不该受到一种如此怜悯心的抱怨?正当达尼罗坐在二星级旅馆阿尔贝戈充满阳光的平台上,因为我喜欢它超过喜欢过分豪华的达涅利酒店,正当他轻松活泼地吞下早餐的那份奶油圆球蛋糕时,我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放下了亲吻的照片,迫切希望他感到自己遭到了一个四十五岁女人的威胁。他匆匆吞下最后一口,把面包渣收在手心中,舔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喝一口卡普齐诺,并问我,克里斯蒂娜号游艇[①]上的船员,是不是真的有六十人之多,每顿饭,是不是真的有六个领班端上来十二种不同风味的鱼子酱。

12 月,在罗马,歌剧演出季节盛大开幕晚会前的几天,我又见到了玛丽娅,衰老的,被毁的。她答应说,要来聆听一个新的国际明星的演唱,表演她早先演过的一个角色,那是一个西班牙女郎,罗马的那些长舌妇摆弄出一些传言,说她曾经长时间在巴塞尔的一个咖啡馆端盘子,挣一份双工资。

玛丽娅款款落坐在艾克塞西奥酒店那蓝色与玫瑰色相间的小客厅中的软垫墩子上,房间里装饰着荷兰画派大师们的油画复制品,酒店经理让我们任意欣赏。她戴了一条很简单的珍珠项链,长裙的高领一直竖到了脖子上。

---

① 奥纳西斯为追求玛丽娅·卡拉斯,曾买下了一艘加拿大军舰,并改装成世上最大的游艇,是为举世闻名的“克里斯蒂娜”号。该船成了真正的海上宫殿:有青金石的栏杆,纯金的浴室饰物,名贵的油画珍品,古老的嵌宝石佛像,以及用克诺索斯彩石镶嵌画的放大复制品装饰的游泳池。

“完了，我算是完了，”她对我说，“我还剩下了什么？我的嗓子劈了，我的演出生涯碎成了小块，我的女人生活碎成了粉末。没有家庭，没有孩子，也没有任何情感生活。”

“玛丽娅……”我嘟嘟囔囔道，脑子乱成一团。这个辉煌时期中曾得到过千百万歌剧迷追求的女人，现在为吐露她的悲惨心境，选择了一个对她来说几乎跟陌生人相差无几的人。

“我是一根枯枝，”她又说，眼睛直盯着地毯上的花枝图案，“请原谅我这样对你说，皮埃尔·保罗，但是，我们的年纪差不多，而且……哦！如果我表现得有些冒失，请你别怪我……我似乎觉得，只有你才能理解我，因为……这种成了一根枯枝的感觉，你难道不也感受到了吗？哦！没有家庭，没有孩子，身后什么都没留下，而独自一人衰老下去，这可真可怕啊……”

她双手掩住了脸，一连叹了好几口气，然后，她突然站起身来。我本来期望看到她的脸上闪耀着泪花，但她却显现给了我一张坚毅断然的脸，她的两眼闪烁着愤怒的光芒。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但是，你该知道，他轻视我到了何等程度。我怀上了他的孩子，皮埃尔·保罗，可是……他却强迫我堕了胎！我屈从了，因为阿里总是对我说，他仇视结婚。我是多么傻啊！他不想要我的孩子，因为他早已决定娶杰基为妻！”

“太好了。”我想道，很高兴看到她那么迅速地恢复了那种举世闻名的精力，它曾经令她的托斯卡的欣赏者直起鸡皮疙瘩，而为了我们的美狄亚[①]，她还真的需要它。想到此，我不禁对自己说，对一个已经“完了”的女人来说，她还保留着相当的性格，去选择一个没有靠背的软垫墩子，而不是一把很舒适的软座圈椅，因为软垫墩子会迫使她挺直腰身，而软座圈椅却让她缩成一团。

“玛丽娅，”我大声说道，“你的状态好得恐怕不能再好了，我们电影开拍的前夜，你可能都不会有更好的状态。”

“真的吗，皮埃尔·保罗？”

---

① 托斯卡是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的女主人公，美狄亚是凯鲁比尼同名歌剧中的女主人公，卡拉斯曾出色地扮演过这两个角色。

“哦，对不起！”我惊呼道，生怕奥纳西斯的背信弃义和伊阿宋的背叛[①]之间这一不太微妙的比较会伤害她。此外，我还需要什么，才能向她揭示，为了进入到科尔喀斯公主[②]的骨子里去，她只需重新体验一下被辱、愤怒和复仇的情感就成呢？毕竟，好几个月以来，这些情感就早已搅得她心神不安了。美狄亚始终是她最喜爱的主人公之一，她就是依靠凯鲁比尼的这出歌剧，赢得了最初的巨大成功。但是，当我试图让她重温佛罗伦萨那一令人难以忘怀的夜晚时，我只能得到一个让人失望的回答。

“你知道市政剧院留给我的唯一回忆吗？泽菲雷利给我做了一条过长的裙子。是泽菲雷利，还是玛加丽塔·魏尔曼[③]？哦！瞧我这可怜的脑子……我还记得我做出的惊人努力，为的是在宫殿的台阶上，让分量很重很重的红色法兰绒褶缝笔直地垂落下来。”

她注意到了我将信将疑的神态，便又接着说：

“既然我们现在已到了开诚布公的份儿上，我最好还是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读过欧里庇得斯的悲剧[④]，也没有研究过希腊神话中美狄亚的故事，甚至都没有把凯鲁比尼的歌剧剧本从头到尾读上一遍。”

她摇了摇头，莞尔一笑，仿佛只有她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知道该怎么微笑，该如何运用她的魅力这一至高无上的武器，来为自己的无知道歉。

“你知道，我从来就没时间阅读。八岁时，在美国，我母亲替我报名参加歌唱比赛。十七岁时，在雅典，我以《茶花女》开始我的歌剧生涯……不，我说错了，应该是以《托斯卡》，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口误。”

“很显然！”我无法阻止我自己唯唯诺诺。

“从来没有一天假期，从来没有一刻喘息，”她好像迷失在自己的回忆之中，“练声，颤音，琶音，装饰音，低八度，高八度，低音，倚音。教授们

---

① 在希腊神话中，伊阿宋和美狄亚结婚，有三个儿子，后来伊阿宋抛弃了美狄亚，另娶格劳刻。于是，美狄亚为了报复，送了新娘一件有毒的婚衣，格劳刻穿上后立即死去。美狄亚还杀死了自己和伊阿宋生的儿子们，伊阿宋悲愤自杀。

② 美狄亚本来是科尔喀斯国王埃厄忒斯的女儿。

③ 玛加丽塔·魏尔曼(1904—1992)，奥地利歌剧导演。

④ 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写有悲剧《美狄亚》。

让我把同一个曲子重复十遍，二十遍，根本就不考虑我是不是明白词语的意义。在威尼斯，当我开始在《清教徒》[1]中扮演角色时，我对歌词理解得是那么糟糕，我居然会把 Son vergine vezzosa（'我是一个动人的处女'）唱成 Son vergine vizziosa（'我是一个邪恶的处女'）。只有一样东西引起了众人的兴趣，我的经纪人、我的辅导教师、剧院经理、音乐评论家、我的母亲、我的观众，只有一样东西：我的嗓音，我嗓音的技巧可能性。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始终如此。我的每一个新角色都跟我嗓音的技巧进展有关。当它开始衰退时，鲁道夫·冰[2]建议我在大都会歌剧院唱黑夜女王[3]。他向我保证说，我的还没动用的高音 F 将会产生奇迹。别人都是根据诞生日期来计算他们的生命岁月。而我，则是根据我能成功地达到的音符，或者说，取决于我的嗓音。"

我任她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她从往昔岁月的回忆中汲取的安慰是那么明显。但是，当我又一次看到她成为自己忧伤顽念的俘虏时，我便决定把我在脑子里转了多时的一个想法告诉她。

"我不能完全相信你，玛丽娅。你没有权力这样贬低自己。我对歌剧一无所知，我对音乐也是个睁眼瞎，但我知道，你为千百万观众和听众提供了何等难忘的形象。他们会因为一些简单的特技而如痴如醉吗，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因为缺少才能而无法胜任那些特技？你的冰先生建议你对高音 F 做一种运用：但是，这一种会很适合你嗓音可能性的运用，你却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因为黑夜女王这个人物引不起你兴趣，跟你没关系，跟你没缘分，并不比莫扎特的任何其他人物更甚。莫扎特的歌剧从来就不是为你而作的，玛丽娅。等一等，让我说完了。马里沃风格，风流倜傥，风俗戏剧，那都不是你的气候。哦！但是，这样一来，你会认为我在试图贬低莫扎特。我只不过想说，对莫扎特而言，需要一些在完美和终结意义上努力的歌唱家，就像对细密画而言，需要一些对每一种色调细节都十分上心的画家。而你的才华，玛丽娅，则是任凭自己被一些晦暗的巨大力量穿越，而修改和音调变化的技艺对那些力量则只

① 《清教徒》是贝利尼的歌剧(1835)。

② 鲁道夫·冰(1902—1997)，大都会歌剧院的经理。

③ 黑夜女王是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人物。

会有很少的控制。请你不要再坚持说,你是在按照自己歌喉的潜力选择你的角色,还不如承认,是大自然赋予了你喉舌,得以……哦!我该说什么呢,玛丽娅……得以表达你最深层的真理。"

"我的真理?什么真理?"她问我,一丝莫名的微笑露现在嘴边,她翻起她的手包来,找出一枚宝石别针,开始玩弄了一会儿,然后才插到发髻上去。

"我实在不怎么懂歌剧,我怕会闹出笑话来,但是,最终,假如我们以威尔第著名的三部曲为例,你又如何解释,《游吟诗人》也好,《弄臣》也好,都无法帮你发挥到极致,而只有《茶花女》才能够呢?"

"这都是因为卢基诺[①],"她说,把别针插到了头发中。

"不,玛丽娅,薇奥莱妲的命运跟你的命运是那么相像,你实在很希望能在十七岁时出演《茶花女》,我见证了你方才的口误。在遇识维斯康蒂之前很久,你就知道,小仲马笔下遭人背叛的女郎会给你机会,让你彻底成为你自己。而你其他的重要角色又是一些什么呢?那些永远带上了你的标志的角色?美狄亚,被伊阿宋抛弃,拉美摩尔的露契亚[②],被她的未婚夫遗弃,诺尔玛,被波里昂丢弃[③],安娜·博林,被亨利八世废弃[④]。总是一些遭背叛的情妇,一些被休的妻子。玛丽娅,在她们中,你能认出你自己来,在她们身上,你可以找到你的自我。她们的悲剧,早就是你自己的悲剧了,即便当你演唱这些歌剧时,你还远远没有猜到,个人的经验总有一天会跟戏剧模仿相吻合的。"

我被我的大胆无忌所吓坏,便想用一种比较来让她分一下心,挂在

---

① 卢基诺指维斯康蒂。

② 《拉美摩尔的露契亚》是意大利歌剧,萨尔瓦多·卡玛拉诺根据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拉美摩尔的新娘》的意大利译本改编,加埃塔尼·多尼采蒂作曲。露契亚遭到未婚夫艾德加的遗弃,变成了疯子。

③ 诺尔玛是贝利尼同名歌剧(1831)中的女主人公,她与罗马总督波里昂相爱,私生两子,后被波里昂抛弃,但诺尔玛仍背着高卢军救波里昂,结果被送上火刑堆。波里昂深受震撼,与她同死。

④ 安娜·博林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宫中的女官,和亨利八世相好,后者为了她,不惜废黜自己的西班牙王后,从而开罪欧洲的天主教势力;最后,他又找借口砍了安娜·博林的头。多尼采蒂以此故事创作了歌剧《安娜·博林》。

墙上的一幅荷兰绘画让我找到了借口。

“请看这座遭到火烧的城市，”我对她说，“作画的是丢勒的同时代人，叫路加斯·范·莱登[1]。他毕生都致力于描绘遭火焚的城市，被火焰吞噬的城堡。你知道他是怎样死去的吗？在一个火药桶的爆炸中。”

“谢谢了！你还真有不少好例子嘛！”她笑着嚷嚷起来，“这么说，为了适应我的命运，我还得像美狄亚一样纵身跳入火海，或者像诺尔玛一样走上火刑堆，或者像可怜的露契亚变成一个疯子，或者像安娜·博林那样把脑袋搁在木砧上？请注意，这总归要比茶花女得了肺结核要好得多。幸亏，圣天使城堡的平台对公众是关闭的[2]！这就减少了一种可能性！”

我们为我的这番蠢话一起哈哈大笑，然后，她怀着深情问我：

“你为什么声称对歌剧一无所知？从来没人像你这么对我说过它。皮埃尔·保罗，我求求你了，今天晚上陪我一起坐在我的包厢里吧。”

“不，玛丽娅，我讨厌歌剧。你一定还记得我们之间说定了的事：在我们的电影中，你决不会唱上一句。对我来说，”我补充说，企图抹除这一声明中的粗暴口吻，“歌曲永远是妈妈唱给我的摇篮曲，跟她在厨房中哼哼的民歌联系在一起。”

我差一点说出：“一个女人只应为她的儿子歌唱。”但我及时地闭上了嘴。

“我不喜欢歌剧还有另一个原因。你有没有看到过剧场中的情景？你可能根本就不在乎谁在向你鼓掌！一个歌剧院剧场中的观众大约有一多半是……这多少很难说得出口，玛丽娅，你帮帮我吧。”

“我想我猜到你要说什么了，皮埃尔·保罗。”

我久久犹豫着，不知道该选什么词，在所有那些来到我嘴边的词汇中，我还是因为它的讨厌色彩而把它给扣了。

“有一多半是贝带。”我低声说道，却没有忘记以一种轻蔑的语调强调了这个单词所包含的侮辱。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她的动作，我会把它保存在我记忆的宝库中，放

---

① 路加斯·范·莱登(1489/94？—1533)，北欧画家。

② 圣天使城堡是罗马的一处名胜，在台伯河畔。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的女主人公托斯卡就是在这城堡的露台上跳下去自杀的。

置在薇玛·卡尔兹遥远的启蒙课程旁，那位年轻的斯洛文尼亚女小提琴手，不顾卡萨尔萨种种充满恶意的流言，主动为我充当屏障。玛丽娅不再玩弄她的宝石别针，她把我的两只手抓住，捏在她手中。

"皮埃尔·保罗，该轮到我对你说了：'你没有权力这样贬低你自己。'永远也不要再用这样的词汇了。假如你知道在你脸上显现出的是痛苦表情的话！没必要折磨你自己，没必要为你自己的身份羞耻。真的不必。"她继续说道，想寻找一个论据来说服我。

她突然就找到了一个，便以一道忧伤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说道：

"我最好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是卢基诺·维斯康蒂和让-路易[①]。这么说来，你明白了吗？"

她低下了头，这就使我能细细欣赏她韶华已逝的美貌，自从她告别舞台演出之后，她发福了不少。她朝后梳去的头发让脑门和太阳穴显出一种令人惊讶的清晰，但是，在她更为圆鼓鼓的脸颊上，小小的酒窝几乎已经消失殆尽。我第一次欣赏到她眼睛的原样，摆脱了假睫毛后，这双眼睛便不再斜向地，而是显现出东方人那样的细长轮廓。这张以其高傲刻板而闻名遐迩的脸，仿佛闪耀出一种温柔的光。那不再是用青铜塑造的某个埃及雕像的面具，而是一张死气沉沉的脸，从中反映出一段激情与痛苦的漫长历史。当她重又开始说话时，我感觉到，她是在一场睡梦中独白。

"我们怎么可能当即就明白到，在我们整个的生命中我们机械地完成的某些行为的意义呢？皮埃尔·保罗，你影射的这部分观众，我能在剧场中把他们彻底区别出来，我能一下子就把他们辨认出来，无论是在米兰，在纽约，在墨西哥城，在伦敦，在柏林，在巴黎。那些最忠实的观众从一个城市到另一城市地跟随我。那些等在我旅馆中的没有署名者的玫瑰花，不是他们送的，又是谁送的呢？但是，在我眼下跟你说话之前，我还真的不知道，我是在何等程度上忍受着他们的支配，我还以为他们那么被动地听我演唱。是的，我现在意识到了，我是为了他们，才在舞台上摆出某一种姿势，为了他们，我以某一种方式调整我的嗓音，为了他们，

---

① 可能指让-路易·理夏尔（1927—），法国电影演员、导演。

我撕心裂肺地发出那一声叫喊，为了他们，我尝试在我的艺术中超越自我。哦！我现在又看到了他们全部。在他们中，有胆小者，一生中从来就没跟一个女人说过话，而在他床头用图钉钉满墙的照片中，在那几十个舞蹈家和时装模特儿中，他为我留出了一个特别的位子，看完演出回家后，他就把节目单上我的照片剪下来贴上。有说大话者，用小烙铁精心烫出一把弯曲的小胡子，显摆出一种傲慢自大的男子汉气概，却不惜在母亲面前低三下四，向她隐瞒自己的夜间活动。有孤独者，跟在红粉知己后面叹息不已，一直在休息室拖延到幕间休息的最后一分钟，那里还游荡着另一些受到相同希望刺激的腼腆的人。有羞愧者，不敢让人陪着前来，仿佛他出现在歌剧院这件事本身会给他带来影响。有成双成对的朋友，我最喜欢的，为其存在感到幸福的对子，听到我在舞台上咆哮和痛斥，他们就会想到他们所习惯的美好的深居简出。所有人，我又看到了他们全部，他们用惊疑的目光观望我，因为我是他们唯一准许进入他们生活的女人。全靠着将我隔离在一圈遥远的光晕中的照明灯，他们又重新成为正常的人，维系在一个女人的嘴唇上、历险上、任性上，为了一个女人而激扬起一种火热的感情，为了一个女人，时刻准备去体验一种激情，回溯到少年时代的一些隐晦事件，迫使他们当着其他人的面压抑自己的内心冲动。我不完全仅仅是个女人，我把他们从自身的抑制中解放出来。这样的一个女人，身穿女王或女祭司的服装，头戴火焰般的冠冕，笼罩在一种非现实的光辉中，被乐队的池座以及女明星的耀眼光芒跟他们隔绝开来，她让他们心潮澎湃，面对这样一个女人，他们会付出全身心的投入，而这种投入，他们连一点点都舍不得给予坐在他们旁边扶手椅上的跟他们一样的女人。”

我目瞪口呆地听着从她嘴里冒出来的这一番话，对从博洛尼亚时代起就让我困惑不已的问题的这一回答，那时候，我来到小小的雷克斯电影院的阴影中，在供奉好莱坞明星的焚香之上再加上我香烟的烟雾，让他们从神秘的九霄云外飘然而下，一直来到我身边，现在，我俯身倾向于玛丽娅，把一个亲吻印在她那双留在我手中的手上。

“那么我呢？”我腼腆地问她，“假如你看到我在剧院中，你会把我归于哪一类呢？”

"哦,你呀!"她毫不迟疑地说,"归于温柔者,那种跟自己母亲维系着一种密切的爱的人,跟其他女人始终保持着一大段距离。你在我身上只看到一个偶像,对于你,我会加倍小心。我会时时提防,保持一种冷漠的、有节制的态度,决不从我的台座上走下来,决不把我的权杖当做一根简单的棍子,而是永远作为一根权杖紧紧握住,永远不让你猜到,在卡拉斯荣耀无比的外套底下,跳动着玛丽娅那颗卑微的心。今天,我算是明白了我强迫自己做出的努力的意义。比方说,当我演唱美狄亚时,我得让我那身过于笨重的裙子的红色褶缝垂直落到王宫的台阶上,表面看来如此可笑的这一忧虑。我不应该让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舞台脚灯另一侧沉湎于迷醉中的任何一个人,看出我的服装出自一个女裁缝的凡人之手,并且发现,在这法兰绒的囚禁中,在这珠宝首饰的豪华排场底下,是一个女人的身体寻求着苟延残喘。而当我身为满腔怨愤的诺尔玛,或是渴望嗜血的图兰朵,或是决意以最残酷方式复仇的美狄亚,或是精神彻底崩溃的托斯卡,喷发出狂怒的诅咒时,那仍然是为了你们大家,皮埃尔·保罗,我才不惜粉身碎骨,现在,人们不是这样说的吗?哪怕用尽我的最后一点力气,碰得粉身碎骨,是的,为了你们大家,为了让你们能舒舒服服坐在扶手椅中,这样对自己说:'可怜的男高音啊,你得忍受这一场风暴;可怜的丈夫们啊,你们每天都得经受铭刻在女性身体中的暴力。而我是多么幸福啊,我及时摆脱了这样一个地狱!我受到了保护,永生永世不必经历戏剧的夸张,神经的发作,以及女性的歇斯底里!'皮埃尔·保罗,难道我弄错了吗?我是不是你内心情感的忠实阐释者?"

我露出一丝微笑,并不想打断她的冲动,就像埃涅阿斯不愿打断正在向他揭示他家族盛衰史的西比尔[①]。

"然而,"她慢腾腾地说,"我还没有欠你什么债。当我以这种所向披靡的精力,为了你而把自己牺牲在忘恩负义的疯子角色中时,我需要履行我最后一部分职责。兴许,在不知不觉中,通过音乐隐伏的魅力,通过声音的神奇背叛,我前来在你的流亡中激励了你,把你引向了禁入的大

① 在希腊神话中,女先知西比尔曾陪同埃涅阿斯到地府去见他的亡父,并向他揭示其祖辈和后代的命运。

陆。为了让你彻底平静下来,为了让我真正有一次处在你的控制之外,为了给我们互不干涉的协定盖上一个象征性的封印,我为你保留了我走向死亡的宏大场景,那是你愉悦的顶峰,因为那是你平安的保证。在消失于世的那一时刻,我拥有一系列无限不同的办法,它们一个比一个更精彩:对安娜·博林,是斩首;对诺尔玛,是火刑祭祀;对麦克白夫人,是谵妄;对依莫瑞娜是疯狂[①];对托斯卡,是自杀;对吉尔达,是刺客的一把匕首[②];对莱奥诺拉,是兄弟的一柄利剑[③];对阿尔米德,是火焰之云[④];对阿伊达,是砌死的地下墓穴[⑤];对乔孔达,是一把尖刀[⑥];对阿比加伊,是一包毒药[⑦];对波丽娜,是凶猛的野兽[⑧]。假如我在舞台上演唱《哈姆雷特》,我甚至都不会缺少一次溺水[⑨]! 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只有一个相同目的:在你心中祛除残存的对女人的依恋。四个小时中,你一直欣赏着我,我跟你相距很远,你无法接触我。现在,你可以抱怨我了,我受到惩罚和侮辱。整个演出过程中,你就一直在说:'一个女人,这是多么异常美妙啊,只要她不靠近我!'你回到家里时还在想:'总之,我更喜欢的,是能看到她们死去并被埋葬。'"

---

① 依莫瑞娜是贝利尼歌剧《海盗》(1827)中的女主人公。

② 吉尔达是威尔第的歌剧《弄臣》中弄臣利哥莱托的女儿,最后被刺客杀死。

③ 莱奥诺拉是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中的宫廷女官,服毒而死。

④ 在格鲁克的歌剧《阿尔米德》(1777)中,美丽的王后阿尔米德与林纳尔多互争胜负,林纳尔多旷日持久的敌意变为爱意。但阿尔米德独守宫室,最终焚烧宫殿后隐逸。

⑤ 在威尔第的歌剧《阿伊达》中,埃塞俄比亚公主阿伊达和埃及国王手下的勇士拉达梅斯相爱不成,拉达梅斯以叛国罪被判活埋,而阿伊达最后来到地牢,与他同死。

⑥ 在蓬基耶利的歌剧《歌女乔孔达》(1876)中,歌女乔孔达与贵族恩佐相爱,但对方却又爱上另一女子劳拉。乔孔达最后救了恩佐和劳拉,自己自杀。

⑦ 威尔第的歌剧《纳布科》(1842)中,巴比伦君王纳布科(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大女儿阿比加伊爱上了伊斯梅尔,却发现他原来爱着她的妹妹菲纳娜,阿比加伊十分嫉妒,不惜通过篡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最终服毒自杀,表示悔意。

⑧ 《波丽娜》是英国歌剧,由 Frederic H. Cowen 作曲,词作者是 Henry Hersee,根据戏剧《The Lady of Lyons》改编,1876 年首演。

⑨ 在《哈姆雷特》中,女主人公奥菲丽娅溺水而死。

“玛丽娅！”我抗议道，“你说话怎么这样不严肃啊！”

我们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我说道，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兴许应该相信，所有歌剧的谱写都是为那些……”

“嘘！”她把一只手放在了嘴唇上，“你答应过我，不再用那个词了。再说，我们这个话题也谈得够多了。你向我发誓，今天晚上陪我去剧院。不然，我就会认为，你觉得我很愚蠢地对你说了刚才所有那些话。”

我希望，那出歌剧的剧本会跟往常一样愚笨透顶、矫揉造作，会为我提供一个脱身之计。

“好吧，”我妥协地说，“演的是什么呢？”

“《茶花女》。是蒙塞拉·卡巴叶[①]的出道演出。我很好奇想听到，”她不带什么渴望地说，“她是如何拖长那些著名的极轻极轻的乐段[②]的，我总是无法把它唱好。她运气真好，一开始就在经典曲目中扮演最漂亮的角色！”

我陷入了圈套中，连自己都不相信地嘟囔道：

“我倒是更喜欢一出……不那么资产阶级化的戏。”

“皮埃尔·保罗！你刚才跟我解释了，我为什么是在《茶花女》中更到位地得到了自我实现，而不是在《游吟诗人》或《弄臣》中。现在，该轮到我对你说，为什么这出歌剧最能感动……感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了。我记得我跟卢基诺一起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到，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赢得异常成功，因为，实际上，它毕竟是那么老套，那么资产阶级化。一个富家子弟爱上了一个交际花，但他父亲要拆散这对有情人，因为这件事在上流社会中引起了丑闻，妨碍了他妹妹的婚姻。让我们稍稍来做一点搬动。把那个交际花改为一个男人，另一个年轻男子。你马上就能看到，为反对这两个人不合社会准则的爱，社会镇压的可怕机器竖立了起来：已经不再穿黑色燕尾服的父亲们，不再以剥夺遗产做威胁，而是以强行送精神病院作更厉害的要挟，切断生活资源，不让进入家门，注定

---

① 蒙塞拉·卡巴叶(1933—)，西班牙歌剧女演员，女高音。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要独身一辈子的姐妹的幽灵……总之,我敢肯定,当我在舞台上跟热尔蒙先生[1]一起吟唱时,我的崇拜者们将会重新体验一出戏剧,一出当他们的秘密被家人发现后在自己家就已遭遇过的戏剧。"

似乎是为了不让自己显得比本来的样子更聪明,她又补充道:

"哦!你知道,假如你认定,我当时没有说出一番蠢话,那么,该赞扬的是那位卢基诺。"

我承认,在这一从未见识的外表下,再见到当年随着葛丽泰·嘉宝的电影最初进入我梦乡的女主人公,这样的一个渴望,已经冲破了我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我一直就在指责巨大的歌剧文学,认为它能为我提供可与我在普鲁斯特或托马斯·曼、在魏尔伦或洛尔卡的作品中找到的东西相媲美的任何东西,就更不用上溯到米开朗琪罗和柏拉图那里了。在博洛尼亚黑黝黝的小电影院中,被玛格丽特·戈蒂埃[2]的死所震惊的中学生,把自己的命运混同于这个女人的遭遇了,这可不可能呢?一连三天,他一直泡在电影院里,沉醉于这苦涩的香气中,而在这充满了肉欲的芳香中,混杂有坟墓的咒语。因此,我现在很快就看到,那音乐是不是在我身上施加了同样的魔法,我首次遭遇受诅咒爱情时的震惊,是不是重又出现在了我的心中。

当我们晚上前往巴尔贝里尼街的时候,玛丽娅身穿一件白色水貂皮大衣,我则穿着威尼斯燕尾服,我们的出租车被一辆斜在路上的警车拦在了都灵街的入口。有人告诉我们说,大学生们用西红柿和臭鸡蛋袭击了在剧院门前走下汽车的穿戴风雅的人士。

"带我回旅馆吧,"玛丽娅微笑道。

她了解我的政治观点,出于微妙的考虑,她不愿意让我混进追求时髦的富有观众中,他们要花两万里拉买一张戏票,出席那天晚上的盛大晚会。我听从了她的意见,不过我没有向她承认,我觉得由罗马年轻人给出的随大流、排斥异己的这一新证明十分可恨。

---

① 热尔蒙先生是歌剧《茶花女》中男主人公阿尔弗莱多的父亲。

② 歌剧《茶花女》中,茶花女的名字是薇奥莱妲,但在小仲马的小说中,茶花女名叫玛格丽特·戈蒂埃。在 1935 年葛丽泰·嘉宝主演的电影《茶花女》中,女主人公也叫玛格丽特。

47

如果说，我的电影中只有一部要拯救，那就是这一部了[1]。没有丝毫疑点。奥纳西斯最近的背叛，生育欲望的被剥夺(这一点，让她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场景显得那么惊心动魄，若不是她已经起了誓决不再开发她嗓音的处女地，她肯定会在他们的灵床前唱上一首古老的伯罗奔尼撒摇篮曲)，但是还有，我敢相信，对我们在艾克塞西奥酒店中那次谈话的回忆，这些都向玛丽娅启迪了一种精彩的游戏。她明白，她不应该"表演"，当然，而应满足于以一种偶像般的纹丝不动，来对抗赤裸裸的手舞足蹈的阿耳戈英雄们。"你要求我成为女人，一个大写的女人，不是吗，皮埃尔·保罗？"穿着戏装，戴着首饰，置身于卡帕多西亚的荒漠中[2]，她用她那洪亮的嗓音向我提问题，在靠近她祖国的同时，她嗓音中的希腊口音似乎也被唤醒了。

我不仅决定惩罚达尼罗，而且还要向他显示，我不会无条件地把他留在我的演员名单中，我把他带了出来，但并没有在电影中为他安排任何角色。为了安慰他，玛丽娅在我们拍摄科尔喀斯那几场戏的戈雷梅[3]的岩石脚下，往他的嘴里塞拉哈罗库姆[4]。

"真滑稽，"一天晚上，她对我说，当时她斜眼观察着达尼罗，后者正专心致志地盯着一只脑袋尖尖、四脚有蹼的蛤蚧，"真滑稽，你是那么需要有耀眼夺目的女人围绕在你周围，而对小伙子，你却只满足于默默无闻的青年。想想你聘用的那些女演员：安娜·玛尼亚尼，劳拉·贝

---

① 指帕索里尼导演的、玛丽娅·卡拉斯主演的《美狄亚》(1969)。

② 卡帕多西亚位于当今的土耳其，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古国。它以穴居人而闻名于世。

③ 戈雷梅是土耳其一地，目前辟为国家公园，拥有一个包括了数十座中世纪洞穴教堂的露天博物馆。

④ 原文"rahat-lokoum"，是一种阿拉伯香甜糕点，又名"Turkish delight"。

蒂[1],西尔瓦娜·曼加诺,卡拉斯。(她专横地把下巴一伸,指向了那篇文章,它让我们回想起,她尽管坐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土耳其村庄中,依然还是歌剧女明星。)谁又能想起你的《马太福音》中扮演基督的那个褐发瘦个子少年的名字来呢?”

耀眼夺目的女人,默默无闻的小伙子:再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了,但是,也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四十七岁时,我在身后留下了长长的一段电影与文学生涯,发现自己处在玛丽娅和达尼罗之间,一边是玛丽娅,过分地捯饬打扮,被自己的光环笼罩,在飞机场受到欢迎,无论出现在哪里,都赢得人们的欢呼,一边是穿着李维斯牛仔裤的达尼罗,俯卧在地上,跟他的壁虎在一起,这情景,恰恰跟我二十年前的处境一样,当年,我在浑身散发着麦秸、大丽花、玉米味的斯温陪同下,坐在科德罗伊坡露天电影院的长椅子上,心醉神迷地欣赏浓妆艳抹、受到千百万观众赞赏的丽塔·海华丝。

弗留利生活的这段回忆让我神色黯然。灰心丧气之际,我不禁问自己,还有什么比达尼罗最终从我手指缝之间溜走更有可能呢,就像曾经有一天斯温悄悄消失掉那样?我在大地上的经历还会留下什么踪迹吗?一连串挫折、苦涩和失败。除了留下几部作品传播了我的名声。想到这里,我抬起了脑袋,擦去模糊了我目光的泪水,问玛丽娅是不是准备好了拍摄阿普西托斯[2]之死这个镜头。

这一次,既没有丑闻,也没有检查机关的查封,当电影于圣诞节之前不久上映时,得到了批评界一种冷淡的反应,他们很失望没能找到任何的淫秽细节,任何的政治挑衅,任何的亵渎宗教,反正,找不到任何东西能使他们大声赞美我的大胆,同时又寄希望于检查机关能为他们保留一种新的诉讼的美味享受。彬彬有礼的赞扬之后则是尴尬的沉默,这时候,人们得知,盛大的首映推广晚会将在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蓬皮杜的夫人主持下,在巴黎歌剧院举行,而那位总统先生,则在1968年的5月,曾经制服了拉丁区的学潮。

---

① 劳拉·贝蒂(1927—2004),意大利电影女明星。

② 阿普西托斯是美狄亚的兄弟。

我最漂亮最独特的作品落到一种迅速的遗忘中。玛丽娅重又闭门幽居在她位于乔治-蒙代尔大街的公寓中。她牵着她的宠犬,漫步在这个死气沉沉的特罗卡代洛街区空荡荡的大街上[1],又过起了孤独而忧伤的日子。她收藏了许多衣裙,全都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一件上还挂了标签,上面写明了收藏该衣服的日期,她在什么场合穿的它,而就在衣裙的这一宝库中,她兴许还会加上美狄亚的外套和长裙,因为她急切感觉到,这可是她表演生涯最后的服装了。并不是,像我很愿意想象的那样,为了纪念一种最后的、转瞬即逝的、跟她早先的胜利毫无关系的成功,而是为了回忆我们在罗马和土耳其的日子里结成的友谊,回忆在她告别舞台多年之后,对触动了她才华的那种神秘刺激的惊讶发现。

尽管电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电影本身还是不应该在一种最糟糕的时刻出品。圣诞节之前的几天,发生了将无休止地把意大利拖入悲哀中的那些戏剧性事件中的第一件。12 月 12 日,16 点 30 分,在米兰的喷泉广场,农业银行公共大厅中一枚炸弹爆炸。十六人死亡,八十八人受伤。这次阴谋的严重性史无前例,举国上下大为震惊。谁放的炸弹?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要连累无辜?三天之后,人们宣布,逮捕了无政府主义分子皮埃特罗·瓦尔普雷达。同天夜间,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朱塞佩·皮内利,铁路公司的职员,正在米兰警察局里接受警长加拉布雷西审问时,从五层楼落下,坠楼身亡。

阴谋诡计?警方失职?新的德雷福斯事件?好几个星期里,根本无法想别的事情。电话铃响个不停。妈妈已经不愿为我把关过滤,让我自己去接听。

“皮埃尔·保罗,那肯定不是一次自杀。警长加拉布雷西审问时,有四个警察围着皮内利。”“他们有不利于皮内利的嫌疑吗?”“没有丝毫迹象,除了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一事实。”“这么说,他们并没有不利于他的什么证据?”“没有,除了他从窗口中掉下来这一事实。皮埃尔·保罗,这事你得干预。”

“喂!加拉布雷西声称,皮内利从窗户中跳出来时,他手下的警察试

---

[1] 乔治-蒙代尔大街位于巴黎的特罗卡代洛街区,是著名的富人区。

图拉住他。其中一个小队长甚至还成功地抓住了他的脚,但是,最后只有鞋子留在他手中。""你为什么笑?""因为,警方为开拓自己的罪责,在报刊上公布了三只不同的鞋!"

"你要知道,铁路工人的合同要在这几天里续签。""这就是说,皮内利的自杀……""……是很有用的,以安抚今年秋天那些罢工之后的选民。工厂门前的警察骑兵队,大学生们的游行支持。""炸弹是法西斯分子放的吗?""12 月 12 日,爆炸那一天,当然是巧合,正好赶上欧洲议会在斯特拉斯堡准备开除希腊。"

"法官拒绝对皮内利做尸检,而尸体解剖本来有利于弄清死者后脖子上发现的褐色斑点的来源。皮埃尔·保罗,你必须干涉。这对你是一个恢复名誉的极好机会!"

"这一次,我似乎觉得我们有了正确的线索。法官讯问了特雷维索的一个出版商乔万尼·万图拉,以及他的一个合作者弗朗哥·弗雷达,众所周知的法西斯主义者,新秩序[1]的活动分子。""发现了什么踪迹吗?""在他们的书店中发现了一个炸弹库,跟喷泉广场爆炸的炸弹很相似,此外还有一份单子,单子上有今年春天以来发生过阴谋爆炸的各个地点的详细地图:米兰博览会,8 月份的各列火车上……""他们进了监狱吗?""法官认定他们有罪,但让他们自由活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皮埃尔·保罗,这该由你把问题公开提出来!"

"费尔特里内利[2]发表了声明,他正在外国旅行。他说,他拒绝返回意大利。当国会大厦焚烧时[3],最好还是待在大海中。""费尔特里内利,哼!你想想,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画家朱塞佩·芝盖纳。我眼下就有一封他最近的来信。是从他在弗留利的别墅给我写来的,就在南斯拉夫边境附近,向我讲述了他接受的钱贾科莫的拜访……后者甚至

① 这是意大利的一个极右翼组织,全称为"新秩序研究中心",跟葛兰西当年的"新秩序"组织没有关系。

② 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是意大利最有名的出版社之一,由钱贾科莫·费尔特里内利(1926—1972)1954 年在米兰创办。

③ 指 1937 年 2 月 27 日著名的"国会纵火案",希特勒手下的人放火焚烧柏林国会大厦,却诬陷是共产党干的。

还化了装,贴了假胡子,戴了墨镜!他想留他在一个房间里宿夜,但钱贾科莫却睡在了花园里的一个帐篷中。第二天一早,朱塞佩很吃惊地看到,他的客人换上了古巴军队的军服背带裤,正在练习朝树干投手榴弹。"

"还是我,皮埃尔·保罗。通过查询红十字会的登记表,人们发现,警察局的电话总机在皮内利坠楼之前十分钟要过救护车。""那个铁路工的不在场证明呢?""得到了确认,尽管他们倾向于认为,两个证人的证词不太可信,借口说,其中一个是退休工人,而另一个是同性恋灯光师。""照你看来,我该做些什么呢?""冲锋啊,皮埃尔·保罗。我们需要你的笔,你的勇气,你的慷慨。卡米娅·切戴尔那[1]已经彻底介入了。你不能把战斗的垄断权让给《快报》。"

"关于费尔特里内利又有了新发现。他在他那些书店里出售瓶装喷漆器,上面写有这样的口号:'把你的警察漆成黄色。'我们知道,他作为63学社以及巴勒莫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的出版者而惹你恼火,但你要知道,'把你的警察漆成黄色',这是对准屁股的漂亮一脚,嗯?钱贾科莫将被控告,这跟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凿无疑。"

"喂?你读报纸了吗,读了还是没读?那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保罗·法乔利,从4月份起就因米兰博览会爆炸案而被囚禁,给他的朋友们偷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描绘了警长加拉布雷西让他忍受的酷刑:连续七十二小时审讯,站着不许坐,打耳光,抓头发,往阴囊上扎别针。""好吧,我要看一看我能以什么形式来干涉。""皮埃尔·保罗,你不能再逃避了,不然,人们就会认为,你关于警察的那首诗不是一种俏皮话。""你建议我在哪家报纸上写文章呢?我在《新生》周刊上曾辟有一个长期的论坛……""啊,不!别在这家共产党报纸上。那样的话,你不会在年轻人中间恢复名誉的,皮埃尔·保罗。你有没有读过警长加拉布雷西刚刚对《团结》的一个记者发表的声明?""没有,请讲给我听听。""谈到皮内利事件时,他说:'我们并没有任何理由要反对他。这是一个正直的小伙子,一个模范雇员。我们想第二天就释放他。'不要在共产党的一家喉舌上,我求你了,皮埃尔·保罗。这对我们大家都会更好,尤其对你个人。你

[1] 卡米娅·切戴尔那(生年不详),著名女记者,曾深入报道皮内利事件。

有一个很严峻的障碍要克服。”“那么，在哪里好呢？”“试试去找议会外的左翼的一家新报刊。《继续斗争》、《工人力量》、《示威》，你只要选择就行了。”“他们全都攻击过我，而且很严厉。”“因为他们认为，你跟《新生》、跟党的报刊联系密切。他们实际上巴不得你为他们的专栏写文章呢。”

“喂？这一次，绝不可能后退了。乔万尼·万图拉，特雷维索的一个出版商，你知道吗？还有他的同谋，弗朗哥·弗雷达，两个法西斯分子……”“他们的书店中有一个军火库，还有一份标明了已经实施和即将实施爆炸阴谋的所有地点的地图……”“是的，而法官刚刚对他们宣布不予起诉，释放回家。”“什么？”“确实如此，不予起诉。”“可是，所有那些迹象……”“都不足以认定有必要继续调查。”“岂有此理！就像达尼罗会说的那样。”“当局放弃了黑色踪迹，而只对红色踪迹感兴趣。似乎只有极左派才该有罪。”“共产党是如何反应的？”“别耍小孩子脾气了，皮埃尔·保罗。共产党根本就不想把紧张关系策略的垄断权和优先权让给基督教民主党。它也一样，它要成为仲裁者，调解者。”“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他们感兴趣的是，在德·罗伦佐丑闻和法西斯主义政变①的未遂阴谋之后，左翼无政府主义的危险要上报刊的头版。更不用说要对秋天的野蛮罢工复仇，那些罢工让工会显得如同两个软肋。”“共产党永远都不会站在基督教民主党一边。它永远也不会参与可恶的阴谋，让人把法西斯分子犯下的罪转嫁到极左派头上。”“傻瓜，我们走着瞧好了！”

“说实话，皮埃尔·保罗，假如你再迟疑不决，你就将永远悄悄地溜之大吉。人们等待着你采取立场。你忘记了两年前的威尼斯电影节吗？很快，法西斯分子就不是唯一向你扔茴香的人了。所有的年轻人都将反对你。”

“活该，皮埃尔·保罗，眼下，预审瓦尔普雷达的丑闻正震撼着整个意大利，只有你表面上还无动于衷。出租车司机的声明是假的，假极了，他宣称，就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他开车把那个带着一个黑色大皮包的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无政府主义者送到了农业银行门前。纯粹的谎言,得到了警方的强行认可。至于另一些证人,警方是在一些可疑的地点把他们钓来的,那是被告——一个职业舞蹈家——工作的地方:他们中不少人是吸毒者、易装癖……""同性恋,我敢打赌!""我不敢这么说,皮埃尔·保罗,但是既然……""好的,我同意给《继续斗争》写点什么。""太好了!警长加拉布雷西起诉他们的诽谤罪一案,应该于今年秋天在米兰开庭。对你来说,这是一次意外的好机会,你需要重新镀亮你的徽章。你就主动要求写一篇报道吧,在《继续斗争》上,或者为别的报纸。"

如此这般的电话打扰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不算深更半夜的被吵醒,单是那些匿名咒骂就让我受不了,一连串的"猪猡!胆小鬼!窝囊废!"会随着假嗓音,从电话线的另一头排炮齐鸣地袭来。"我们要把你的屁股戳穿,你,还有那些宝贝蛋!"谁在侮辱我?法西斯分子?左翼分子?时刻遭受骚扰,被呼东喝西,被拉帮入伙,我感到自己的神经近乎崩溃,实在无所适从。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决定,是该为这家或那家报纸写文章,因为我一直还不知道,1968年诞生的所有那些学社和小团体中,哪一个赢得了阿娜玛利亚的同情,并由此得到了达尼罗的青睐?他依然忠诚于我们的午间约会,以及我们在灌木丛中的溜达,从此,他很自由地对我谈论建筑学院中发生的事:他不提那个姑娘,却并不向我隐瞒他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消息。由此,我知道"大学生运动"这一派已经趋向衰落:在达尼罗看来,他们只能组织一系列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讲座。《示威》则要严肃得多,他们公布了有罪教授的名单,因为这些教授给学生打了低分,并实施了令人无法接受的挑选。他们的课程从此将受到抵制。让所有人升级,这就是该做的事!在经济危机、失业、性、家庭中,人们还缺少热门话题来占满上课的时间吗?打倒文学和历史!争取离婚的斗争达到了高潮。要动员年轻人自己来探讨涉及他们自身未来的问题!我不敢再次向达尼罗说出我对那种幼稚的激进行为的担心,那些行为已变得对贫穷家庭的孩子很不利,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并不能填补他们文凭的缺乏或贬值,当他跟我讲起《示威》的那些创举时,我只是跟他一起笑了笑:比如说,假如教授固执地要在课堂上讲帕拉弟奥的建筑艺术,他们就在阶梯教室的后排站起来,举着一只喇叭筒,高声唱

起一首抵抗歌曲来。但是,《示威》显示出一种专横的趣味,这让达尼罗很不愉快,深受托洛茨基主义影响、并跟在建筑学院有很大势力的“自发主义”背道而驰的《先锋行动》也是同样。

相反,《继续斗争》则激发了游戏和狂热。我想我是明白了,这一次,是达尼罗影响了阿娜玛利亚:总之,他们归附(而我由此也一样)在了最符合那个走路一蹦三跳、还鼓掌雀跃的人气质的倾向中,尽管还有一点让我十分忧伤,自从电影评论家们对他在我一部电影中的表现做出批评后,他就越来越少地显现出热情洋溢的自然本性。当时,他在电影中扮演了一个蹦蹦跳跳的邮递员,评论认为他“很可爱,但很有限,今后会给人留下某些欢跳的原型”。

《继续斗争》周刊发表了关于皮内利事件的一系列漫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一辆挤得满满当当的公共汽车中,一个乘客很恼火地转身对加拉布雷西警长说:“你干吗呢,博士[1],你要推我下去吗?”还有一幅画的是,一个公民被传唤到警察局五层楼上的办公室,他采取了预防措施,在自己肩头挂了一个降落伞。“天使之跳”,给警长起的这个绰号,不胫而走地出现在了所有报刊中。我们急不可耐地等着每一期出刊,它总能让我们读后哈哈大笑,因此,当警长最终决定提出起诉时,我特地做了一下安排,前往法庭听取诉讼。这将是对意大利警察、对它的措施、对它的卑鄙无耻的诉讼,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消除一下朱丽亚谷事件那一夜写的诗歌的暧昧不明。

尤其是跟达尼罗的关系,眼下是我重申的时候了,我该以一个公开行动,好好地重申一下我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性,对这一点,他并没握有别的证明,只有时不时地刻印在我脸上的血淋淋的伤疤以及苍白的脸色:都是我那些秘密之夜,以及火车站附近遭受袭击的痕迹,但是,他却不带丝毫否认地把它们看成为某个极右派警官野蛮行为的结果,要知道,自从放弃对弗雷达和万图拉的追踪以来,警察们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进行了拉网式搜索。

多雾潮湿的10月初,米兰在我眼中显得万分忧伤。花花绿绿的传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也可译为“大夫”。

单，被雨水泡软，以海绵般的糨糊填塞了人行道，风儿掀动墙上被撕得只剩了角角的海报。白色的救护车、蓝色的警车、红色的救火车风驰电掣地冲出路口，满街鸣响着警笛的怪叫声。好几排全副武装的警察占据了十字路口。但是，关于这一话题，人们说得够多了，几年中它都已经变得那么枯燥乏味，以至于人们都在抱怨那些固执的作者一再重复自己对街垒的回忆。

我想返回圣安布罗乔，这个远离主干道的罗曼式大教堂，它位于一个平静街区的中央，是城里最古老的教堂。我记得那里有一幅很大的马赛克的基督图，在祭坛之上的阴影中闪闪放光，那便是我一次次漫步米兰的通常目的。由于从来就没去过拉文纳，我便来这里，在带有神秘的火焰图案的半圆形后殿中，在万能者基督瞪着大眼死死盯着我的那个圆穹底下，寻找妈妈在她新婚旅行中曾经体验过的恐惧与战栗。教堂关着门，整个街区乱哄哄的。天主教大学的阳台上挂着无政府主义者的黑色旗帜，警察包围了大楼。

在飘荡着呛人煤气味的那些街道中，我一直没能再见到的那只眼睛继续跟踪着我。现在，它成了我父亲的眼睛，那么严厉，因努力而膨胀，巨大而又无情，恰如当年倒在厨房桌子上漆布中的三岁男孩的眼中那样。我父亲一手把我摁定在桌子中央，另一只手把几滴眼药水挤在我的眼角上。哦！谁能把我从这张几乎贴着我脸的大脸前救走呢？我试图驱赶这些形象，我对自己说，若是没有刺得我眼睛和嗓子难受得要命的这股手榴弹怪味，我患砂眼的遥远时代恐怕就永远不会返回我的记忆中来。就在我匆匆赶往法庭的路上，圣安布罗乔教堂马赛克镶嵌画耀眼的小小立方体，还有上尉牙床正中央镶上去的那一颗金牙，这两个互不搭界的形象，在我头脑中多么荒诞地混淆在了一起？

法院大楼附近以及面前的院子里，依然守着众多的警察。六七辆随时待命的消防车，几百个荷枪实弹的警察。我好不容易挤进了早已人满为患的法庭，大厅外的走廊里团团围着众多年轻人，另一些警察正舞动警棍，试图把他们赶走。记者席上，一个比较空的地方，一个高个子的大胡子身边，坐着《示威》的特派记者，一只眼睛上蒙了一条黑布。他公然装作不认识我。《团结》的记者，一个多年的朋友，身宽体胖，朝我友好地

伸出一只肥实的手来,这让我的尴尬有增无减。

我们面前,坐着一些大报的代表,《邮报》、《新闻报》、《日报》、《信使报》。没有一个人回过头来跟我打招呼,甚至包括那位卡米娅·切戴尔那,最不遵守职业规矩的人,她会在《快报》上发表对这次审判最大胆的报道。律师们在自己的小桌前低声闲聊。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共产党员为我指了指那两个被告:《继续斗争》的经理,以及他的助手,我惊讶而又惧怕地认了出来,他原来就是瓦尔特·图齐。同样的长头发,同样的扣子一直扣到领口的毛式中装,同样傲慢自大、盛气凌人的神态,跟那天他来我家给我上文学课时一模一样。我不由自主地在座椅上缩成一团,试图让自己变得尽可能地微小。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面对面地相处,那我首先就想确认一点,即他没有把我认做关于警察那首诗的作者,而是认做决定为他的同行们增添一份愤怒的记者,前来这里同仇敌忾地反对谋杀一个无辜者。

等待的时间越是延续,我就越是觉得别扭。听众栏第一排中,坐着丽齐娅·皮内利,死者的遗孀,对听众们的大吵大闹无动于衷,任他们喊叫,嬉笑,顿脚,挥舞拳头,歌唱《国际歌》的片段,她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沉默地面对法官们一一入座的审判席。当那位著名的比扬卡·圭代蒂-塞拉,被告的律师,坐到她的小桌前时,所有人的脑袋全都低了一下,望着这位律师界的光荣女性。在接下来的短暂寂静中,一种打喷嚏的欲望如此强烈地抓住了我,我不得不拿出手帕,把脸埋在里头,这让我身边的《团结》特派记者十分惊讶,这位宽厚的不倒翁,在过于闷热的法庭中,早已是大汗淋漓了。

我并不怎么想跟共产党的代表交谈什么,却希望自己能恢复镇定,便竖起耳朵听《示威》特派记者说的话,他朝我转过肩膀,对我的另一个邻座说话,此君是一个浅褐头发的瘦子,他的小胡子以及染过的头发一开始没让我认出来,他原来就是阿尔曼多。他问他从哪里打听到那么多关于瓦尔特·图齐的事。“他是我的兄弟呀!”年轻人骄傲地回答道。“瞧他是多么瘦啊!”我的对话者注意到。“他的体质总是很脆弱。实际上,他生下来时就差点儿夭折。他是美国人带来的第一批抗菌素的一个产品。”“假如他们知道这事情的话!”那个长得很像海盗的大胡子笑着评

价道。阿尔曼多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从我的手帕后，悄悄地瞥了一眼《继续斗争》经理助理那张瘦削而苍白的脸。“他生下来时就差点儿夭折。”他没有夭折，却带着一种很丧气的苍白脸色和一种傲慢的神态到处漫游。大自然印刻在他基因中的、却被科学所挫败的死亡本能，从他漠然的脸上放射出一种冷冷的非人类的辉煌。如果说，被盘尼西林拯救了生命的新生儿应该全都跟他很像，那么，我自忖道，最好还是让美国人换一种做法，别让他们为我们带来高露洁和可口可乐这一附加礼物，而是让新生儿死亡率在创造计划中扮演一个理想角色。

随后，我又为这样一种想法而羞愧。瓦尔特·图齐就在这里，是所有那些为铁路工人呼吁公正的人的代言人：这证明，从文学转向政治时，他也把他闲懒的论战趣味改成了刚强的介入行为。当初，63学社的“鸟儿”用粪便弄脏我公寓的墙，而今天，他们却在为一个被谋杀的人复仇。妈妈只是损失了一袋清洁剂而已：可是，眼前这位寡妇却不会那么容易地洗净她丈夫的鲜血。

我决心已定，又抬起头来，观察起了瓦尔特，我觉得，他的长头发并不是屈从于时髦的一种证明，而是对那些基督教民主党的部长们以及警察官员们刮得干干净净的后脖颈的一种个人挑战行为；毛式制服也不能证明对民主价值的任何轻蔑，而是像一层盔甲那样，保护着他们的冠军，而对他来说，这一铠甲决非多余的装饰；他以一种漠然辽远的神态投在人群头顶上的目光，并不表示对隐藏于自身中的狂热劲头的高傲满足，而是表示在跟皮内利的谋杀者交锋之前一种必不可少的集中精力的意愿。

就在这一刻，我刚刚在内心中称赞了一番的这双眼睛，遇到了我的眼睛。瓦尔特拉了拉他律师的衣袖。后者则在加拉布雷西警长的律师耳边嘟囔了一句什么，这一位叫米盖雷·雷奈尔先生，其特长是为逃亡的可疑工业家辩护，自从那些被怀疑在雷焦-艾米利亚区谋杀了七个工人的警察最终被宣布无罪以来，他的名气就与日俱增。雷奈尔先生转身朝向我。就在他旋转的一刹那，他的法袍掀开了一条缝。刊载我诗歌的那一期杂志出现在了裙袍的褶缝中。《团结》的特派记者也看见了。他轻轻

地咳嗽了一下,向我表明他的善意。我的目光模糊了。我似乎觉得,大厅里的另一些人也都注意到了我的出席。人们互相捅着胳膊肘,伸出手来指点我。他们想对我做什么?他们为什么重复我的名字,一开始是喃喃自语,然后渐渐地响亮起来,并成为了一种喧哗?“皮埃尔·保罗!皮埃尔·保罗!皮埃尔·猪猡!皮埃尔·猪猡!”①他们现在有节奏地高喊,始终那么强有力;除了丽齐娅·皮内利,她一直就无动于衷,目光紧紧盯着法官席上的空座,除了她,所有人都扭转了脑袋,身体扭曲成各种形状,看着我在坐席上蜷缩成一团,羞愧难当。

《示威》的那个大胡子选择了这一时刻,在我身边扭转了身子。他不慌不忙地揭下了盖在眼睛上的布条,面对面地死盯着我看,两只大眼珠子,一个看得跟另一个同样明亮。我倒是更喜欢听到一通咒骂,而不是这一无声的、尖锐的直视,伴随这一察看而来的,是他嘴角上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咧咧。阿尔曼多的漠然似乎比其他一切都更让我难受:他倒在长椅上,两腿大开着,不论褐发还是金发,都显得那么粗鲁,但同时也那么有魅力,他从嘴里掏出一团已经嚼得黏糊糊的口香糖,在那里玩着,兴致勃勃地把它拉长,然后又送回嘴里,继续咀嚼,仿佛从来就没有看见我,从来就不认识我。

当审判团在一个摇着小铃的执达吏的引导下进入法庭时,我逃跑的机会终于出现了。所有人都站起来,除了阿尔曼多,他依然陷卧在长椅上。审判长和另两个法官伸出手来,示意众人安静。这时,我已经溜到了门边,喧闹声、鸣笛声继续响彻在我身后。它们的回声继续在走廊中跟随我,而那些在短棍面前躲避不及的示威者根本就没时间认出我来。当我离开法院后很久,游荡在米兰的大街上,为我自己没能挨上一闷棍而深感遗憾时,那些声音依然回响在我的耳畔。一次受伤,一道伤疤,恐怕会回报我的信念,慰藉我的朋友们,向达尼罗证明,糖果商的女儿并没有垄断勇气、青春、冒险、威风。但是,鲜血的角色并不局限于此,我心里很清楚,它同样应该为我弥补何等隐秘的错误。

---

① 在原文中,“保罗”(Paolo)与“猪猡”(Porco)谐音。

48

“皮埃尔·保罗！皮埃尔·保罗！”

我听到他满街叫我。他全力呼喊我的名字。他一步三级地奔上楼梯,根本想不到摁门铃,就迫不及待地擂响了房门。

“皮埃尔·保罗！”他一边喊,一边冲到我跟前,“成了！我们有了离婚权！昨天夜里通过了法律！”

像习惯的那样,他给我带来了报纸。这天早上,他把各种各样的报纸全都摔在桌子上。除了天主教会的哀伤,这是不可避免的,整个舆论都是一派狂喜。“进步与民主的胜利。”“意大利的第二次解放。”“拉特朗协定[①]之耻终被洗刷。”“意大利进入了现时代。”

“进入了现时代,是的,”我嘲笑道,“但是,要从中相信,离婚法是进步与民主的一种胜利……”

看到他惊愕不已的表情,我实在忍不住要笑。然而,我的怒气始终未消,我继续道:

“一帮蠢货！他们把应该归功于大众文化和消费意识形态的东西,记在了进步与民主的账上。中产阶级愿意并得到了离婚权,但是,除了最傻的傻瓜,还有谁会支持他们通过一个政治成熟的行为从教会的监护下解放出来？”

“这正是所有报纸上都写着的东西,皮埃尔·保罗。”

“你可真会开玩笑,不是吗,尼莱托[②]？”我说,并没有直接地回答他。

“……是的……”他迟疑了一秒钟之后说,一方面担心我的话里是不是有新的陷阱,一方面又很高兴听到我用这充满感情色彩的昵称来

① 见前文的注解。

② 尼莱托是达尼罗的昵称,见前文的注解。

称呼他。

“但是，假如有一条法律在你的国家颁布，规定你得开玩笑，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那样一条法律，迫使你永远显得高兴，它以意大利人民的名义，宣布任何对他人的欢乐熟视无睹的人有罪，并惩罚他，对此，你该会怎么说？”

“我对这样的一条法律说什么吗？”

“是的。开始时，你会很开心，很显然，但是，很快，你会感受到一种厌腻，用不了多久，你会强烈不满于一种苛求，它显得是那么的……这话该怎么说呢？”

“啊？我不知道，我。你的推理实在是不好理解，不好理解。”

“新的权势会奴役他们全体，”我嚷嚷道，“根本就不让他们有时间意识到！”

“什么新权势，皮埃尔·保罗？”

“从此，统帅意大利的那个人，会命令年轻人说：‘做爱吧，结婚吧，把你们父母的陈腐思想抛弃吧，成为时髦的一对吧，结婚并且离婚，自由地运用你们的肉体……’”

“那将是一种恶，不是吗，皮埃尔·保罗？说实话，我听不懂你的话。”

听到这一声合情合理、真诚直率、出自内心的抗议，我差点儿就要镇定下来。但这时，我发现了他头天晚上遗忘在我沙发上的皮夹子。

“你也一样，我可怜的达尼罗，”我继续道，嗓音中带着嘘声，“新的权势操纵了你。我已经想不起来你的生日确切是哪天。我瞧了瞧你的皮夹子，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你在你的身份证上刮去了‘送货员’的字样，而替代以‘大学生’这几个字。而以前，你对自己的无知却不感到羞耻，达尼罗。你十分幸福地当你的送货员。今天，新的权势迫使你把自己看成一个‘大学生’。一个无知的大学生，也就是说，一个不幸的、羞耻的、神经官能症的家伙。但同时又是一个时髦的年轻人，一个年轻人，加入到其他意大利青年的巨大安乐之中，加入到他们感觉自身‘很现代’的虚假幸福之中。你明白吗，一个送货员，在当今这个‘现代的’和‘解放的’意大利，就跟一对永不解体的夫妇同样不合时宜吗？你就是‘现代的’。却又是神经官能症的：就像无数即将落入离婚陷阱中的年轻夫妇

那样。”

我看到，他已经不再听我说话，而是满怀恐惧地盯着我继续在他眼前挥动那个皮夹子。

“瞧瞧，”我大声道，早已不顾及任何分寸，“你还敢问我：‘什么权势？’你不仅跟阿娜玛利亚一起去了奥斯蒂亚，而且，你还跟她一起拍了那些照片，摆出最……最令人恶心的姿势！”

说着，我从皮夹子里掏出三张我早就发现的照片：达尼罗和阿娜玛利亚裸着身子在海滩上，达尼罗和阿娜玛利亚在一个小棚屋后嘴对嘴地亲吻，达尼罗和阿娜玛利亚在奥斯蒂亚的月亮公园[①]中跳舞。

“这就是它——新的权势——让你变成的样子：一个小伙子，认为不投身于一系列的行动中就很没面子，而那些行为的样板，则是由一种每时每刻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的宣传所提供的。他得跟一个姑娘出去，他得赤裸裸地亮相，跟同样赤裸裸的她在一起，他得紧紧地搂着她跳舞，并以那种恶心的方式吻她。可怜的白痴，快把这一点好好地放进你的脑子里：在其他种种便利之后赐予大众的离婚权利，是一种虚假的宽容，一种比天主教意大利的种种古老禁忌更坏的压迫。现在，你有了义务在男女之间寻开心，就像姑娘们有了义务在婚前失去贞操。今天的错误，可笑而不可饶恕的错误，将是独身、贞洁、对传统价值的忠诚……而且，”我补充道，把话抢先说在准备再次抗拒的达尼罗之前，“最糟糕的是，离婚在便利了夫妇之间性自由的同时，根本就没做什么，它只是便利了这种自由。权势，只在这方面表现得自由激进，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反对……其他的一切！你走着瞧好了……少数派将遭到围捕和惩罚，而且要以赐予多数人自由的名义。对那些不看重繁荣社会种种好处的人，落到他们脊背上的世俗的轻蔑目光就像鞭子在抽打，就像当年摩西的鞭子那样抽打……”

我就这样发泄着我的怨恨和嫉妒。若是换了一个人，恐怕谁都会顶撞我，但是达尼罗，他实在太慷慨大方了，竟不会生气，当我结束了我那番抨击后，他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请求：

---

① 世界各地的不少海滩，都有叫这一名字的游乐场。

“你说得兴许有道理,皮埃尔·保罗。我不知道。但是,我求求你了,留着这些想法给你自己吧。不要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那会给你带来伤害的,请相信我。”

我没有听他的,而是着手为《晚邮报》写一篇政论文,反对宽容社会,我指责它比基督教民主党还更专制,甚至比法西斯制度还更专制,更野蛮。“在一个充满了各种禁令的社会中,所有的可能性是公开的;而在一个准许人们做这做那的社会中,所有的可能性都关闭了,除了由这一准许所打开的可能性。”这一说法的最初样品,一下子就变得很有名,五年之后,我把它放在了我最后一部电影中一个人物的嘴里。

无论从左派那里,还是从右派那里,诅咒声如雨而降;而当我开始就堕胎问题发表预言时,这些诅咒便变本加厉地狂妄起来,变得又阴郁,又疯狂。“让中止妊娠合法化”,这就是舆论和报刊派别战争的新呐喊,这就是要从梵蒂冈以及法西斯残余势力那里夺取的新胜利。而我:“说什么堕胎的合法化将使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变得更容易,那是一种欺诈。必须振臂高呼,这样的一种措施将使男女之间的爱变成一种义务。没有一个小伙子,没有一个姑娘能避免这一义务,它将不是进步与民主的一种赢得,而是我们新主子的一种横蛮无礼的催促。意大利青年们,做爱吧,这是一道命令。体现出你们新的自由的高度来。爱的容易将创造出爱的顽念。没有人有权躲在一旁,对节庆生气。谁若是拒绝接受夫妇间安乐的、胜利的模式,谁就将不幸了。谁若是心中感到一种不可战胜的障碍,不能以这一方法达到幸福,谁就将不幸了。他将遭到公众的谴责,被逐出社会。”

随后,我强迫自己进入到实践的细节中,从而彻底离开了我那篇文章中的神谕语气,文章写的是关于正在扫荡意大利的人类学灾难,这个端庄与谦逊的古国,现在却成了最平庸的享乐主义的月亮公园。我宣称,假如对生育的控制已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成了一种人类继续生存的疑问,那么,它在我们国家却碰上了一个严重的障碍,而这障碍,很久以来就已在邻居的民主国家被排除,在那里,十八世纪时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十九世纪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已走在前头,迎接了媒体的第三次革命,并准备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彻底震撼。而在我们意大

利，强大的农民激情的土地上，人们还保留着对天主教圣母怜悯的完美回忆，要从母亲的肚子中刮掉儿子，依然只能是一桩罪孽。我继续说，要想在对母亲们的神圣敬意和对人口过剩的合理担忧之间取得和解，明智的做法，不是在分娩阶段，而是在交媾阶段作斗争。要对小资产阶级家庭和广大人民进行教育，让他们认识到，交媾可以是不为生育的；或者，假如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则要帮助他们，帮他们克服自己对把性快感与生育任务区分开的性技巧的道德厌恶感。

这一次，则是对我私生活的一种卑鄙攻击，一番惊人的轰炸，什么样的玩意都有，下流的玩笑，污蔑，诽谤，粗话，诅咒。“步步被动的教皇。”“陷入困境的范范尼[1]。”我很要好的一个女友（那一天却不再是朋友了），小说家纳塔丽娅·金兹伯格[2]，在《新闻报》上撰文说，我倡导有悖自然的爱，把它作为普遍的避孕法。莫拉维亚公开指责我是一个圣保罗式的性恐惧者。共产党人则狠狠嘲笑我：假如人类的继续存在要取决于同性恋者的良好意愿，那就该请求神甫们恢复所多玛[3]。而右派，也削尖了脑袋，毫不难堪地掺和进来。“P. P. P.希望姑娘们保住贞洁，以避免竞争，为他一个人保留着他那些小子[4]。”一份匿名传单夜里从一辆汽车上落到罗马的大街上：

P. P. P.始终渴望语言学的
民间文化让我们
回忆起罗马谚语
鸡巴进屁股
不再是小子[5]

法西斯分子甚至公然印出了这样的文字：“P. P. P.承认对他母亲有

① 指阿明托雷·范范尼（1908—1999），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意大利总理、议长。

② 纳塔丽娅·金兹伯格（1916—1991），意大利女作家。

③ 所多玛是《圣经·旧约》中描写的一个城市，因市民们沉溺于同性恋，罪孽深重，便被上帝用硫黄毁灭。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曾拍摄电影《萨罗或所多玛的一百二十天》。

④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⑤ 最后两行谚语的原文为意大利语“Cazzo in culo / Non fa fanciullo”。

排他的爱,要求以虔诚的孝心而得到玫瑰星[1]。弗洛伊德本人恐怕都难以想到指定俄狄浦斯进纳粹集中营。"

直接判决私刑处死。对我病诊的确切认可。你以为我会同意做自我辩解,从而减弱种种打击吗?情况正好相反。我只是以假设的方式,通过程度上微妙的千变万化,提出了我的建议。当我发现,这建议被打发回来时,早已被各种各样的猜疑、恶意、讥讽、垃圾般的言下之意弄得面目全非,变了形状,成了漫画,我感到自己不得不通过夸大我的观点,突破实际程度,来作为回答。假如我已没有了任何别的办法,那我就决意惹怒我再也无法诱惑的年轻人,用丑闻把自己维持在现实关注的焦点上,尤其是,不无苦涩地在我周围造成空白。我荒诞的论战使我陷入了一条没有出口的隧道:达尼罗猜到,这一动机从此战胜了合理的推论。"不,皮埃尔·保罗,不,"一开始,当我把写好的文章寄报社之前让他阅读一下时,他恳求我道,"你将把整个意大利弃在背后。"但是,他马上就闭嘴不语了,因为他注意到,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这让我更愤怒了。整个意大利都与我作对,而我,独自一人与我的国家为敌,就像但丁,从一个又一个城市中被逐,就像萨伏那洛拉[2],从他的教席上被强行拉下,直到被推上火刑堆……我还该发明些什么,好让罗马觉得我实在是这个城市中多余的人?直到那一天,我自己都对那些怂恿挑唆感到厌倦为止。为走向我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我需要一条更直接、更迅速的道路——不然,我心中的恶魔就会替我选择。

我早就发现,离欧弗拉特街有半小时车程的大海边,台伯河出海口附近,有一处低矮荒凉的海岸,它在我眼中显得神秘莫测,尽管每次达尼罗都很不愿意去那荒芜的景点,是我连拉带拽才把他拖去的。沿着奥斯蒂亚海滩的右侧延伸的居民住宅,一下子截断在了某种荒野的入口处,荒野的远处,耸立着一个高大的八角形古塔的遗址,那是古罗马时

---

① 所谓的玫瑰星,是一种玫瑰色的三角形,纳粹当局要求同性恋者在衣服上佩戴该标志,在二战期间,同性恋者跟犹太人、共产党人、茨冈人一起,都得被送往集中营。本书作者曾写有一部名为《玫瑰星》的小说。

② 萨伏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基督教改革家、殉道士。最后被天主教会判处绞刑与火刑。

的一个碉堡,现在孤零零地被遗忘在一个巨大的垃圾废品堆的边缘。一些被灰尘染得发黄的岩石在卵石堆中探出它们狡猾的脑袋。一种单调的暗淡色彩覆盖了世界的这一尽头,海水的边缘并没给它带来一种色泽之花边,而只为它增添了一道肮脏泡沫和浑浊浪花之穗,上面还漂浮着一些塑料瓶和油污纸。

我立即把它跟泰斯塔乔山作了类同比较。我心说,这就是这个腐败衰落的城市中仅有的两个神圣地点。一个——泰斯塔乔山以及它那群神秘的孩子——受人祝福;而另一个——依德罗斯卡罗,其不合时宜的这一名称令人回想起如今早已消逝的葡萄牙舰船和商队[①]——遭人诅咒:但两者都那么神圣,超然于世界之外,罕有人类足迹的光顾,专为某些秘密仪式而留。在泰斯塔乔山上,是火的礼仪,以及生命复苏的庆典,而在这里,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礼仪和庆典呢?我一边问自己,一边把桀骜不驯的达尼罗推在我前头。我禁止我们爬上小马溜达的山岭,但眼下,我仿佛被一种巫术媚惑,我搂紧达尼罗的脖子,带领他走向这一悲惨与遗弃之王国的中心。

出于蹦蹦跳跳的天性,他本来就不能待在原地不动,更何况这一天他是双倍地急不可耐,要显出生命的活力,于是,在那些散落于乍一看来一片荒野之地的棚屋间,他开始奔跑起来。小小的车库比岗亭也大不了多少,滥竽充数的小船既无营业执照,又无帆具,更没有电力,用木条和铁皮再加汽车零件钉成的破棚棚,用帘布马马虎虎地盖一下,还拿报纸嵌塞了缝隙,但是,却以某一细节——大门上的一个挑棚,门槛边的一个陶瓷侏儒,一杆真假难辨的电视天线——证实了,它们的主人实在是想仿建一个远远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永久性海滨别墅。我们第一次前往游历的那天,那里连个人影子都没有。依德罗斯卡罗只是在星期天才有人气,到了那一天,他们会带来一块方石,一根小梁,加固一下房顶,在没有框棂的窗户上挂一块花布,期待能像他们那些住在台伯河对面富累杰纳的富有邻居那样,在晴好的季节,到海边度过一整天。他们的第一个考虑,便是在自家周围插上一排木桩,或者竖起一道栅栏,以

① 原文"Idroscalo"在意大利语中有"水上飞机场"的意思,故有"不合时宜"一说。

圈定一个围地。有时,人们可以看到,沙土上立着一个告示牌,上面书写着那一家的姓氏,甚至还有一个号码。“岂有此理!怎么想出来的,这里连街道都还没有呢!”在我们看来,更疯狂的当数像四条大象腿那样立在泥土中的那种浴缸了,由于屋顶底下的地方不够,便直接安在了“花园中”,而因为没有上下水系统,洗澡水只能从天而降。

我本来会被这些试图把一个暂时的贫民窟变为海滨疗养院的努力所感动;或者相反,以更严厉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对私有财产的固执眷恋,这毕竟导致了趣味不正的竞相抬价。然而,此类想法根本就没在我脑子里转过。我满怀忧虑和震惊前进,仿佛我不仅没有落脚于罗马郊区中可能最肮脏的地方,反而随着魔棒一挥,被带回到了宇宙的起源,或者,突然匆匆奔向了它的终结。“非洲,”我对自己说,回想起了我曾在内罗毕郊区看到过的东西,当时我奔跑在两排棚屋之间,赶去稀树草原赴约。但是,这个本身就着了魔的词,“非洲”,并没有为我在此的感受提供答案:这是一种混杂了刺激与恐惧的感觉,跟我在肯尼亚的感受并无共同之处。在肯尼亚,那是世界的黎明。这里,则是世界的衰落、腐败,最终的解体。罗马以及它的宫殿,它的教堂,它那些层层叠叠的世纪、宗教、政府,都在这些瓦砾堆中,在这些漫画般的居所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这个当年的港口,曾有那么多人在此下船,迫不及待地想成为母狼的子孙,如今在我们眼前只剩下一片荒芜的港湾,早已被渔民遗弃。盘旋在入海口上方的海鸥振翅逃亡,寻找一处不那么忧伤的地盘。这一灰尘与烂泥的背景,就是永恒之城——所有民族的女王和向导——留存下来的一切;万城之城的遗产以此为界;长久以来人们所说的罗马废墟,终于消耗尽了。

一种无可挽回的倾覆,对我而言,这是理想之地,配得上我要表演大场面的剧院。在一座破房子的窗户上,我看到摊开着一张近期的《信使报》,用以替代缺损的窗玻璃。“对年轻人的调查”,头版大标题这样写道。标题下,用粗体字印着这几行充满信心的话:“朱塞皮娜微笑着向我们宣告:假如我光着胳膊走进一座教堂,人们将不再把我赶出门外。”朱塞皮娜容光焕发的脸;与之相应的应该就是记者毫无保留的满足,这一必然结果很容易猜到。啊!他们全都以为,一个自由与幸福的时代将降

临意大利。在罗马即将吹响它对未来文明信仰的号角时，我还会是唯一一个要求朱塞皮娜穿上长袖上衣的人吗？人们说，庞贝城的居民，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前夜，还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呢。他们死的时候，还手举酒杯，被埋在热灰雨底下。今天，不必再有什么火山了。死神已在依德罗斯卡罗荒滩上占据了地盘。

达尼罗放弃了奔跑和跳跃，走在我身边，步子跟我协调一致，并且恰到好处地碰触到我的胳膊，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需要跟大人保持接触。我前后左右地勘察着留在沙土上的脚印踪迹，此时，他则朝我投来一瞥焦虑的目光，像是在询问我要把他带往何处。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他彻底忍受了这一地点的魔法，对这地方，人类劳作的痕迹只不过额外地补充了一丝忧伤和嘲讽。

“不，别在这里，皮埃尔·保罗，别在这里！”当他明白了我寻找的目的时，他恳求我道。

我们刚刚发现了一个简陋的足球场，其界限是一条卵石线。在达尼罗恐惧的目光之下，我开始让我的衣服脱落下来，他则违心地模仿我的动作。除了选择这一背景，这一令人忧虑的孤独，恐怕就没有别的更确切的办法能让他违抗我。他在对比掂量着，一方面是依德罗斯卡罗的匮乏，另一方面则是附近的奥斯蒂亚海滩具有的那些魅力，一方面是他跟阿娜玛利亚一起自由而又欢快地完成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我现在强迫他做的行为。

“啊！你没有想到，想到这一准许！”

我一边从牙缝中喃喃嗫嚅道，一边解开了长裤的皮带，把它抡得呼呼作响，这是一条带有巨大铜扣的粗皮带。

“如果你以为今天做什么都是允许的，你就该尽可能一直走到头！”

我把皮带塞到他手中，并且亮出我赤裸裸的胸膛。

“打吧！”我高声命令道。

他一脸狐疑地瞧着我，睁大了眼睛，扬起了眉毛，强装出一种大笑来，然后，屈从于他以为的一种新游戏，毫不用力地打了我一下，几乎就像挠痒痒一样。

“不要这样，达尼罗。打得狠一点！用铜扣来打！一直打出血来！”

为了给他做个榜样,我在他的腿上打了一下。他禁不住喊了一声,然后,惊讶而又惧怕地呆住了,一言不发,我发现,他大腿上出现了一条斑纹,有些肿起,很快地就变成了红色。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结结巴巴地说,眼眶中满是泪水。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达尼罗?”

若是在一秒钟前,我恐怕会这样回答:“因为鞭打和挨鞭打的权利在繁荣社会中并没有写明。因为这种准许,这个社会是永远也会给的。因为假如你爱我,你就应该接受我的一切。因为,就在离你接受最初那些宽容的好处的地方几百米远,我将教导你说,已经开始的是世界末日。”但是,我心中的那股怒火突然熄灭了。我对自己的粗暴顿感厌恶。我傻乎乎地瞧着依然握在手中的那根皮带。

“这里只有一个有罪之人,一个唯一的有罪之人!”我喃喃道,把皮带抡向了我自己。我开始用铜扣头打起自己来;一开始很柔和,仿佛心不在焉似的;随后,越来越猛烈。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什么时候伤口开始破裂了。我继续抽打我的全身,肩膀上,脊背上,肚子上。“打得好!打得好!”我机械地重复这些词,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该自惩自罚,接受这血淋淋的凌辱。“肉体的自由,这就是其价值所在!”假如我还能有条有理地说出一句话来,我本来是会这样对达尼罗说的。

他走了开去,瞧着被一阵阵风儿吹得直往海上飘的云团,还用两只手捂住了耳朵,为的是既不看到这一场景,也不听到皮条打在我皮肤上噼里啪啦的声音。

我一叫他,他马上就跑,一开始还没忘了做出一个动作,让我在好几年之后,在几乎类似的场合中仍然记忆犹新。赤裸裸的他,从附近的一道栅栏上抽出一根木条,把它放在我们之间的地上。

“你想干什么?”我很惊讶地问他。

他脸红了,把那条木板捡了起来,扔得远远的。这一时刻,我根本就不在乎弄清楚他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尼莱托,”我说,受到鲜血、痛楚以及我们周围景致悲壮的美的深深刺激。

“我去为我们准备一个地方,你等着。”他说,从眼前显现的一切中,

他已经明白到,要想赢得喘息,并把我拉到附近我们习惯之地的任何努力,都将是无用的。

"不,达尼罗。就在这里,像这样。来吧。"

"就这样站着?但这是不可能的!"他惊呼道。

尽管他也承认,接触那些乱石堆,还有那些把足球场边上的每一根野草都染得污脏的灰尘,都无益于我的伤口,但我看得很清楚,他明显觉得,我迫使他接受的那个侮辱性姿势实在有些过分,他之所以忍受这一切,只是为了避免我心中怒火的一种新爆发。

49

许多事件,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种消遣,它有助于我在依德罗斯卡的那场戏之后重修脸面,重温感觉,那一天,达尼罗差点儿就要捡起丢在地上的衣服,溜之大吉,把我一个人甩在海滩上。

离婚法颁布之后,堕胎法通过之前,政府一定向右派作了一些保证;因此激怒了一种红色恐怖主义,政府指责恐怖来自极左派,并决心与之斗争。这种解释得到了相应的证实。反正,第二次谋杀浪潮接上了第一次。意大利社会运动的众流氓犯下的暴力之外,又加上了针对工厂管理骨干的侵犯。几百枚炸弹扔向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各地支部;各个学校里,破坏性爆炸也成了家常便饭;法西斯分子还在卡拉布里亚制造了对阳光列车的袭击,造成了六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但是,两个月后——确切地说,是在9月17日——米兰的西特-西门子公司的一个领导发现,他的汽车在自家的地下车库中被烧:要不是纵火者在车库墙上留下了署名,这件事兴许就湮没在了默默无闻的千百桩类似事件之中。一个很花哨的怪异签名,由一个五角星和两个神秘的缩写字母组成:一个B

和一个R,用胭脂红的油漆涂的。

我在种种象征话语的引导下,试图弄清楚这一缩写符号的意思,但做不到；直到有一天——那已经下一年的1月份了——同一恐怖集团在倍耐力工厂橡胶实验场上引爆了八颗炸弹;这一次,他们撒在被毁卡车旁的传单上,留下了组织的全称:"Brigades Rouges"[1]。报纸并没有给这一事件一个独特地位,它已经进入了寻常的政治犯罪范畴。兴许,我自己并没有做一种过于严格的区分,把这些红色武装分子和其他的类似组织清清楚楚地区别开,尽管它们并不那么形象化,比起颜色标记来,它们倒是更喜欢抽象理由的标记——10月22日运动,无产阶级武装集团(以费尔特里内利为首,彻底转入了地下斗争),新抵抗运动,工人自治会——它们没想用标志,用一颗五角星来显示它们的罪行。一个诱人的字画谜,它既令我联想到大卫盾,又让我想到美国的五角大楼,但这两把钥匙都开不了那道锁。我没想到,红色旅的头领雷纳托·库乔[2],他既不受列宁的影响,也不受毛泽东的影响,却是一个活跃的天主教分子,来自于特伦托大学社会学系,自从特伦托主教会议[3]以来,那里一直就是天主教信仰与学说的大本营,耶稣会教士的苗圃,反宗教改革的策源地,很自然,他从那里汲取了对民主制度的蔑视,但是,他对玩火的喜爱、对摆弄炸药的兴趣却并不来源于此。

另一个消遣——但是,我可不可以就这样来称呼我生命中最后的幸福?——的表现形式,是一部要拍的电影,以公里来计,离罗马不远,但若以思想和心灵来计,则远在光年:在那不勒斯,从此,杰那里埃罗,它就成了我最喜欢的意大利城市。我在那里找到了你。民事身份改变了,但是保留了资产阶级化,而且是整个的,而且是纯粹的。

你还记得那时候吗,你把折叠梯架在了窗台上?有机会跨越几百个阳台,突然闯入别人家中。你满可以从大门进入,然后走楼梯上去的嘛。

---

① 即"红色旅"。

② 雷纳托·库乔(1941—),1970年时跟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共同创建"红色旅",1974年被捕。

③ 特伦托主教会议是天主教会的第十九次普世会议,1545年到1563年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特伦托举行,讨论反宗教改革的事宜。

你却更喜欢把梯子架在墙面上，令人惊讶地爬上去，强行闯入，你坚信，这一浪漫的方式将让姑娘们晕头转向。因为，你只喜欢她们，杰那里埃罗，所以，我，我立即就爱上了你。只有她们才讨你的喜欢。一种天生的倾向，对我来说真是美妙的场景，因为，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小伙子，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在种种影响下，从感官上被女人吸引。在其他人身上，这一点是违背自然的归顺，为环境、家庭、学校、连环画、电视、神甫、医生的强力所迫，而在你身上，它却闪耀着一种动物本能的力量。

哦，那不勒斯人！你们的部落兴许将绝灭，但是永远也不会任人腐蚀。你现在住在沃梅罗岭上，你在圣弗朗切斯科坡道的高处租了这套公寓，你娶了你的朱塞皮娜，不久，她就将为你生下你的第一个孩子：然而，你并没有改变，你并没有让步，我要收回我可能对你说过的一切坏话。是的，我最初的印象是错的。无论是你那个教区的神甫，我怀疑对你施加了影响的堂·米盖雷，还是你那个在阿尔法罗密欧工厂当工头并入了党的兄弟，谁都没有干涉过你。今天，这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例子，一个年轻人，始终保持本色，并在其志向的直线上完善自身，你做到了完好无损地——尽管这损害了我，但活该我倒霉——保持原样这一精彩的天赋。作为一套明亮的两居室的房客，为你的平台和你眼前整个海湾一览无余的景色而自豪，丈夫，一家之主，人口普查的雇员，但首先是个那不勒斯人，就是说，以不可摧毁的根系，扎定于人类的史前史中，恰如那不勒斯的房屋，由地下的运河跟硫黄之火、跟西比尔的洞府、跟宇宙的秘密联为一体。

我从罗马带去拍电影的那个小组中，有一些人——很少数——惊喜地发现，在意大利，并不是一切都已丢失，那里还有美妙的东西存在，而另一些人则违心地在大街上冒险游荡，宣称街道太肮脏、阴暗、吵闹、潮湿，缺少基本的卫生条件。我给他们讲述了帕斯夸雷·埃斯坡西托[①]的故事，就是那个来我家还我汽车钥匙的警长。他们抱怨我对这样一个城市居然还存留好感，它把他们刚满八岁的孩子打发去干活，因生了虱子而剃光他们的脑袋，迫使他们为了不饿死而加入警察队伍。我的理性认

① 上文为埃斯坡西托·帕斯夸雷，这里颠倒回了姓名的次序。

可了这一评判。但是,理性是不是帮我们理解那不勒斯的最值得珍视的工具呢？我承认,我实在是带着不多的快乐漫步在这一迷宫中,一个民主派人士会很有道理地捏起鼻子，那股与文明国家根本不相配的气味也实在太让人讨厌了。我在其面前俯首称臣的唯一权威——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别处——便是我感受到的幸福,而我的罗马朋友们的高明判决,并不足以把我拉回到常理中。

我的种种感受,我一点儿都没对达尼罗说。他从自己身上,又找回了他生活的欢乐、他的热情和他的雀跃。那不勒斯的力量是如此之大,把他交还给了真理。阿娜玛利亚呢？他没有给她寄过一张明信片,他甚至都没有从旅馆给她打电话。抹除了,遗忘了,糖果商的女儿。我们就像在绿山时期那样幸福,就像在煤气罐后面的第一次那样。我把我的电影做成了一首赞歌,赞美青春、人体、肉体之爱、女人的性器官,但同时,也赞美男人的性器官,而在我之前,还从未有过人像我那样敢于展示它们。

夜幕降临时,我走上了小路,沿着卡拉瓦乔的踪迹:这是他喜欢的时刻,充满了转瞬即逝的神秘阴影。他也一样,当他放下手中的画笔时,他就出发去有千万条小巷的城里历险。切里利奥旅店,水手、走私者和惯犯的巢穴,早已消失多时,但是,你指引我走在狭窄而曲折的小街中,那里早先矗立着那不勒斯声名狼藉的旅馆。正是在那里,离门槛的台阶不远,画家迎面挨了利剑那血淋淋的一击。在今天几乎被遗弃的这一街区,我们只看见房子脚下木板上点燃的火。几个半大小子,稳稳地叉腿站定,伸出自己的手,放在火焰上面。见我们走近,便朝我们转过头来,我们的目光彼此交叉,我冒险做了一个劝诱的手势,于是,你加快了脚步,一直来到下一个街角。“不,别在这里,”你对我说,“这地方依然很危险。”你是不是认为,他们的衣袖中隐藏了一柄凶器？卡拉瓦乔处在何等的冒失中啊！可怜的人,总是悄悄等着一个铜板,好去买绘画的颜料,他根本不可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堆积起金币。

为了亲历这一场景,我究竟还有什么不肯给出啊！光线应该还是同一种:微光的这一黑洞洞的横穿,对画家如此宝贵的这一明暗对比。依然同样的还有,火堆旁人们围成的圆圈,凶神恶煞似的神情,胳膊上卷着的外套,疑心重重的沉默。瞧这个旅行者,他走出了旅馆,被一小队纹

丝不动的人,被那些逆光的身影,被面部的阴影与手指头(它被火焰从下面照亮)那透明的玫瑰色之间的色彩对比所吸引。绘画中还缺什么?一个穿了紧身上衣的滑稽的年轻人……紧贴大腿的匕首闪着微光……一句话在耳边喃喃响起,兴许还有一个支撑的动作……另一个人握着他的武器,用它砍伤大胆者的脸。最后,还有他的惊讶,面对着牺牲者的受辱:卡拉瓦乔只满足于用手摸一摸自己的伤口。血流了下来:他朝着那个一靴子踩在他脸上的人微笑了一下。然后,他慢慢地远去,脑门垂下,以示屈服。他又走到门槛上,上楼到他的小房间,把一幅画布固定在画架上,既然他的屠宰幻觉只得到了一半的满足,他就给自己画上了歌利亚的容貌,自己割下了自己的脑袋,并把它吊在他那个刽子手胜利的拳头上。

你把我从梦幻中拉出来,为我指了指一个妹子[1],他正趴在一个窗户上,往一根穿越了小街巷的铁丝上晾晒内衣,你嘲笑了我的惊诧:怎么?一个男人忙于干这样一种女人干的活?你对我说,我还能见到他,在白天的其他时辰,挎上一个篮筐出门,前往市场,择菜洗菜,熨衣服,缝衣服,当着所有人的面,赢得人们普遍的好意和赞赏——你还声称,他甚至会穿上一条裙子,一件紧腰女衫,一双高跟鞋,在街区中做他的晚间散步。最好奇的是,在如此触犯了地中海世界一项最严厉法令的同时,他并没有激起任何敌意,没有招致任何抱怨。只有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并无恶意地落到他头上。某种默默的崇敬之情保护了你的朋友,并使他得以平静地过着他的女人生活。

"你这样对我说过吗?每一个街区,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有它的妹子[2],并被所有人接受?"

"是的,被所有人接受,皮埃尔·保罗。你为什么大惊小怪的?"

确实,我为什么要对易性癖在你心中赢得的好感大惊小怪呢?当他戴着插花的帽子大摇大摆地溜达时,他的邻居们根本用不着去逗弄他,他们只需感到他就在他们当中。对那个有勇气代替了他们成为女人的人,他们心中难道不是充满了如此隐晦的感激吗?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femmeniello",指女人样的男人。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轮到你来惊讶了,不是吗,杰那里埃罗?你恐怕从来都不会想到,你那个朋友的奇装异服,他的洗洗涮涮,他熬夜做的女红,会扮演另一种角色,而不是让街坊们高兴。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明白,那些受到社会的禁止,不敢表现出自身天性中女性色彩的男人,实际上都很崇敬那个敢于冒犯禁忌的小伙子?他解放了他们,让他们平静下来。一个驱魔者,而不仅仅是一个逗乐者。你相信那样一种绚丽如画的发明,那不勒斯人民试图通过它来忘却自己的悲惨生活。他们创造了波离奇耐尔[1],他们的想象力永不干涸,他们的嘲讽也永不缺少对象。他们用色彩缤纷的灯泡美化十字街头的礼拜堂,用香芹做成花环穿在死牛犊的鼻子上,给斯帕卡那波利街那些门廊底下摊放的金枪鱼插上石竹花,像是为它们挂上横幅。好一个露天剧场,好一场永恒的庆典。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给一个年轻店员的脚上配一双金光闪闪的凉鞋呢?

妹子[2]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种神奇的说法,跟街头那些场景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跟圣徒杰那罗[3]有关,而你的名字也正来自他,那不勒斯城的这位保护神,他在波佐利被砍头,每年两次在大教堂中让奇迹重现,当着跪拜的人群的面,让细颈瓶中的干血重新流动。

假如说,人们从巨大水泵一样的圣体龛中汲取到小玻璃瓶中的红色液体,很久以来就不再是一个老妇人在酷刑之地收集的贝内文托地方主教的鲜血了,那活该如此。同样不要紧的是,一年两次的准时液化,在他被捕和被害的纪念日,5 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以及 9 月 19 日,都来自人类之手的干涉,而不是一种神圣的恩宠。难道我们还需要说,那都是祭司的双手悄悄地捂热了小瓶子,然后才把它展示给公众的,我们还需要以此为借口,耸一耸肩膀了事吗?你把一个在固定日子中流血的人,认做了自己的主保圣人:我想保留住的只是这一象征性的选择,它赋予了你的迷信一种希腊神话的力量和美。

杰那罗不畏戴克里先的迫害。他奋不顾身地救援他的两个基督教

---

① 波离奇耐尔本是意大利假面喜剧中的一个丑角,引入法国木偶戏后,成了一个鸡胸驼背、嗓音尖利的滑稽形象。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③ 见前文注解,又叫雅努阿留斯。

徒朋友，在坎帕尼亚的罗马总督提摩太的命令下，他们已被投入监狱。无论是竞技场中遭遇的猛兽，还是刽子手的利斧，都不能动摇他的勇气。以最初那些使徒为榜样的基督的勇猛斗士，给你留下了一个战士和一个头领的回忆。他身上没有丝毫优雅，没有丝毫娇弱。你将永远不会见到他的画像挂在一家博物馆的葱形饰当中，在一个圣约翰和一个圣塞巴斯蒂安之间。然而，即便是你们，对自己的男性荣誉最不肯妥协的知名人士，你们会对一个绝对大丈夫气概的英雄做什么呢？为了让你们充分信任你们的保护人，为了让你们给予他一种神圣性，你们必须承认他拥有通常为女人保留的特权，这种每到一定时候便要流的血，在最没有怀疑的杰出人物身上表明了另一性别的存在与神秘。

别了，杰那里埃罗。你不愿意我爱你。一点点失去的爱让世界变得更忧伤，更可怜。在那不勒斯，雕像本身就是温柔照顾的对象，一个被他百分之九十五的同胞抛弃的男人，是不能使你屈服的！一天夜里，我辗转难眠——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便走上了罗马街。在我面前，耸立着国立博物馆黑黝黝的庞大影子，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它的窗户被灯火照得通亮。大楼内部，一切都显得那么荒凉，那么寂静。我远远跟踪着一个小伙子，他已经来到了楼前的一个窗户前，突然，他停下了脚步，趴在突出来的基座上，一直爬到了窗栅栏上。我也停下了脚步。“一个小偷，”我想，“他怎样才能爬去呢？”但他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满足于用目光扫视屋内。观望了好几分钟之后，他跳下地，离开了。

我再也不想跟踪他了。等我确信大街上已经空无一人时，我也走近了窗户，爬上了基座。一道带网眼的排列紧密的隔栅让人看不太清楚里面，除非从一个拳头大的洞洞中看去，那里已被人挖开了一个豁口。我发现，乱糟糟的地面上，随便摆放着一些皇帝的半身像，一些浮雕的残片，一些多少有些破碎的双耳尖底瓮，那是一个考古博物馆堆放在库房中的一切。但是，突然，从这灰尘蓬蓬的杂乱堆中，闪现出一个美妙的视象：一个栩栩如生的雕像，被探灯照得雪亮，从墙壁的灰色背景中突显出来。这一雕像完好无损，半侧着朝向大街，仿佛要跟我说话，或朝我伸出胳膊。惊魂甫定之后，我认了出来，它就是著名的杰作，大理石的安提

诺乌斯[①],我在公开展厅中寻找它一直就没找到。

我返回。每天夜里,荒凉的城里再也没有人溜达时,某个晚归的过路人会沿着墙溜过去,爬上基座,把眼睛凑到洞洞前偷看。巡夜者,工人,火车司机,我很快就跟他们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他们轮番来到窗前,静悄悄地观看他,这个在始终不熄一直点亮到黎明的探灯照耀下的少年郎,这个沉思者的躯体轻轻地倚在一条腿上,似乎在招呼他们走向他。

"你为什么不在白天来看他?"我问《早报》的一个印刷工,他因为一再旷工已被报纸辞退。"大白天吗?"他回答我说,仿佛我对他说到的是天空中的一颗星星,"白天,灯火就熄灭了。"这话不错:在自然照明的苍白光线下,安提诺乌斯在灰蒙蒙的小房间里几乎难以辨别。只是对那些热心得准备放弃自己的睡眠或者不怕被剥夺工资收入的欣赏者,他才显现出他浑身的灿烂辉煌来。

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少年郎曾是哈德良的宠幸?他们是不是甚至还听说过把他叫做希腊?为什么灯火在空荡荡的博物馆中照亮?这是何等难解的疑谜啊,想到一个躺在众多世纪尘埃中的年轻人,每夜从黑暗中浮现显身,为数量极少的一些地下欣赏者,为他们热情的崇敬之心而奉献自己!

他们丢弃了自己的家,他们放弃了睡眠,忠诚地前来赴约。难得一见的过晚时分,我们周围遍洒的寂静与黑暗,一小撮彼此有暗号联系的同道人的狂热,他们对自己的休息和职业的牺牲,这样一种安静的自我牺牲,还有他们偶像的神秘闪耀:我可曾发现了这些只有那不勒斯才保留了其秘密的秘传崇拜?我加入到他们当中,却什么话都没说。既然你不愿让我爱你,那我就只好跟一个雕像重新建立起我效忠于青春与美的古老誓言了。

---

① 据说,安提诺乌斯是古罗马时代的一个美少年,后来被皇帝哈德良爱上。安提诺乌斯在与哈德良一同乘船沿尼罗河旅行时溺水而亡,悲痛的皇帝追奉他为神。后来,哈德良还广建庙宇,遍立雕像,传播对安提诺乌斯的崇拜。

50

他们一共三人,在卡诺瓦咖啡馆的平台上热情地呼唤我。拉夫(前往美国居住之前叫拉斐雷),我是通过玛里奥山的那些工作室认识他的,他曾经终年在那里制作一个关于歌剧的节目。直到那时,他还始终是一个默默无闻、腼腆羞涩(其中原由我立即就猜出来了)的小伙子,但今天,在我看来他彻底变了形,不过,也许这是春天的某种幻觉,因为,今春第一个晴朗天气带来了一阵和煦的微风,吹拂在人民广场上闲逛者的脸上。首先,他消瘦,肤色发褐,不但习惯于去游泳池,而且还去体操馆锻炼,在那里,即便冬天里,人们也能把皮肤晒黑;其次,他显得有些滑稽可笑,跟他两个同伴一样,也是一把细巧的小胡子,一头浓密的短发;最后,他浑身散发出一种幸福的满足,这与他以往的谦虚形成了鲜明对照。

毫无疑问,自从我最后一次见他以来,他是"解放"了;兴许是在他的两个朋友影响下,布鲁诺和让-雅克,后者是一个法国人,我一坐到他们的桌子前,他就给我做了介绍:他们俩都跟他一样,留一把颇显傲慢的小胡子,剃了短短的运动员发型,展现了一种勃勃的阳刚之气。一类全新的人,一段时间以来,在平乔山和竞技场之间,总能看到几百个如此模样的人。与众不同的明显符号:人工照光留下的深褐肤色,手提公文箱,时髦的服装,古奇牌围巾;还带有那样一种人自命不凡的微笑,他们长期生活在掩饰与谎言中,以至于很难找到勇气,在光天化日之下显出自身的本色。

他们分散在罗马城各处,并声称,他们之所以选择了卡诺瓦咖啡馆作为大本营,都是因为在那里有一个观看拉美西斯二世方尖碑的好视角,"全罗马所有方尖碑中最具男性生殖崇拜的"。

当然,我本来可以跟拉夫一起,享受到他从美国回来后声称能如此辉煌实现的“外出”[1],他不仅没有成为只会贴着墙溜边走的苍白懦弱的家伙,反而成了那个自信满满的运动员。他多么美好地利用了他在纽约的培训啊!这个城市,今天已经代替了1920年代的柏林,1900年代的卡普里,作为朝圣和取经的目的地;很多年轻的欧洲人,冲破了家庭樊篱的桎梏,带着轻松的神态从那里返回,带着一套秘传的词汇,还有崭新的习惯:穿皮衣皮裤,住舒适的单身公寓,嘲笑一切,精心打扮自身,去马拉喀什和突尼斯度假,去阿姆斯特丹过周末(一册小小行星版的导游书在手),讲述在莱德斯普林广场的二号温泉[2],或者在第74街的大陆浴[3]的非凡历险,大量而又毫无例外的使用gay一词[4]来彼此指称,吹嘘他们自己好玩的经历。

此外,让-雅克是个歌剧迷。流行于全世界的这一时尚同样也抓住了他。但那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时尚吗?如同他的许多同胞一样,这个年轻的法国人也彻头彻尾地迷上了它,一种如此的激情甚至使他废寝忘食,他们选择这一艺术形式,跟他们国家的智力传统决裂,以表明他们同样也抛弃了它清教徒的道德标准。他显示自己的“抒情性”,是装饰音和“巴罗克”情感极点的爱好者,他驳斥民族的古典主义,准备投身于一种既无规律又无约束的生活。只不过,他被他的热情所裹挟,无法阻止自己动不动就对欧洲各处听到的女歌手进行比较,而且总爱把话题扯到这方面来。拉夫出于职业需要,布鲁诺则出于赶时髦,在这方面很直觉地追随他。我听着他们在那里不厌其烦地细说各自崇拜的演员的优点,对某一大明星的迷恋让他们一有机会就做出断然不可忽视的评价,看来,再没有比这更具喜剧味的东西了。全靠了这些女士的歌喉,他们构成为简得不可再简的小圈子,分享他们的趣味,至于其他方面的共同点,他们也不缺少,话语、习癖、服装、蒸汽浴、精彩而又容易的滑稽言行。

---

① 原文为英语。

② 莱德斯普林广场是阿姆斯特丹最大的娱乐中心之一。

③ 这是纽约的一家著名夜总会,在第74街。

④ 英语俗语,指“男子同性恋者”。

我违心地坐在拉夫为我拉过来的椅子上。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点一杯尼克罗尼[1],而我本来是从不喝酒精饮料的。而他们,则决定开始喝矿泉水,并且每人都用一根吸管嘬四分之一升圣培露矿泉水。理性而又带卖弄的选择:人在自由时,不再抑制自己时,还需要用刺激性饮料来自我安慰吗?他们以一种欢快而又轻松的神态接待了我,我真后悔以那么糟的脾气来回报。我用痉挛的手指头抓住我那杯酒,根本无法把我自己抛给这个温和的春天早晨。我越是赞成他们摆脱任何负罪感,赞成他们跟摩西的审判告别,他们的无拘无束和自信就越是让我感到不快。他们似乎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尽可能愉快地生活。他们的悠闲自在引起了我一种自觉上的反感,但我自己就先责备起我的反感情绪来了。

让-雅克向我们显摆了一瓶伊夫-圣-罗兰牌香水,大瓶型,他在巴黎戴高乐新机场的免税店买的。他在椅子上不停地扭动,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很自豪能从欧洲最现代化的飞机场坐飞机起飞,很高兴能展示一款那么引人入胜的商品,很满意以折扣价买到了它,很开心能及时赶到歌剧院看科索托演唱的卡门[2]。当第一个召唤我的拉夫试图把我引入他们的争论中去时,布鲁诺故意说了一些很凶的话,可能深深地伤害了他天真的沙文主义。

"我们很想知道你的看法,哦,伟大的人啊,"他对我说。(自从克里斯朵夫街[3]的那些酒吧豁免了他之后,他就决定再也不把任何东西太当认真,他就只能以打趣的口气来说话了。)"莫罗认为,我们应该去订阅发表毫无价值的文章的烂菜叶报纸《圈外》[4]。你以为如何?我嘛,说到政治,我是更多地反对的。"

"他们的纸张质量实在太糟,呸!"布鲁诺说,他上衣左上小口袋中插的手帕跟他的领带十分相配。"假如他们想让人来读它,那就得使用

---

① 这是一种用金酒、金巴利酒、甜味美思等调成的鸡尾酒。

② 菲奥伦莎·科索托(1935—),意大利歌剧女演员。

③ 克里斯朵夫街在纽约,同性恋活动比较集中。1969年6月27日,警察曾对这条街的同性恋者进行了一次粗暴干涉。同性恋者为此跟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见后文的注解"石墙事件"。

④ 《圈外》是一份由同性恋者办的文艺刊物。

一种不会沾手的油墨。"

"而且,"让-雅克补充说,噗嗤一下笑出了声,连忙用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一只小手来挡住嘴,"他们在威尼斯的阿尔米达找到了迪乌特科姆![1]"

"头等的蠢事!"布鲁诺笑道。

"他们从未跟你有过接触吗?"拉夫问我。

"有过。"

"那么……人们很快将会读到你的一篇文章了?"

"决不,"我说道,咬紧了牙关。

"我知道你的异议,"拉夫接着说,"一个作家并不非得就是个活动家,他的岗位并不是在街垒上,如此,谁都明白。"

"然而,"布鲁诺打断他的话,"他们在保卫我们的权利。"

"我们的权利":这是他们的老调之一,它又一次让我别扭。因为,在拉夫、布鲁诺、《圈外》的编辑、四百万意大利人和我之间,有一个东西是共同的,由此,对其他方面各有不同的这四百万人中的每一个,从中不是应该产生出一种团结而又统一的我们的意识吗?另外,"权利"的定义让我毛骨悚然。要让我爱上某个人,就得让他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权利"。或者,假如他已经意识到有"权利",那就该放弃它们。我读了好几期《圈外》:一种莫名其妙的话语,咄咄逼人,自命不凡。我已经被十年来早就僵化却一直在继续吓唬作家们的先锋派抛弃,因那部关于那不勒斯的所谓淫秽裸体电影被一再传讯,遭遇大学生的嘘声,被女权主义者喝倒彩,受右派威胁,遭左派指责,被所有的党派否定,我还能鼓足勇气跟我唯一确切的盟友们闹别扭吗?

我喝了一口我的尼克罗尼,竭力装出一种可爱的口气,说:

"我早就声明,永远都不跟《圈外》合作,因为我并不认为,我的角色会是在一份年轻人的杂志中大摆权威架子。"

"真遗憾,"让-雅克回答道,"因为我们真该好好考虑一下,两三年来,专门写到我们的书竟然多得令人惊讶。一次真正的爆炸,一个史无

[1] 克丽丝蒂娜·迪乌特科姆(1932—),荷兰歌剧演员,花腔女高音。

前例的文化事件！"

"正是，"我接着说，嗓音显得比我希望的要干涩得多，"我生怕显露出我跟这类文学的不协调。"

"可是，为什么呢？居然会有这一想法！"

三个人全都一起抗议。

"在它还是精神分析学家们的专利时，"布鲁诺说，那是一种听起来很不舒服的假嗓子，"我明白，你满心不痛快地听说，奥斯卡·王尔德的爸爸洗盘子碟子，而他的妈妈则把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

"闹剧演员！"拉夫说道，放声大笑起来，"但是，他说得有道理：我们就算知道了，当我们还在摇篮里嘬手指头时，家里是谁在洗菜，谁在削土豆皮，这也没什么要紧的……说真的，西格蒙德大叔[①]证明了对蔬菜的一种好奇的敏感……"

等哄堂大笑停下来后，我说：

"是的，是的，"同时，我做了一个懒洋洋的动作，"今天，人们不再哭丧个脸了，人们彼此相斗。但是，所有这些书……"

"什么，所有这些书吗？"让-雅克接着说，抬起了下巴，想让人忘记他个子的矮小，"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公共争论的一个话题，而不是始终停留在禁忌中，这难道还不令人惊叹吗？人们不是到处都在谈论吗，报刊上，广播中，电视上？意大利甚至还稍稍地赶在了巴黎之前，"他继续道，似乎他带来了一个不可抗拒的论据。

带着为其同胞所习惯的那种自命不凡，他认为，我自然会很高兴看到，他承认了我的国家终于在一个范畴中略胜了法国人一筹，罗马终于有一回不必被法国人牵着鼻子走了。

恭维却让我冷漠。见此情景，拉夫便过来声援让-雅克：

"你知不知道，费尔特里内利书店，就在我们后面，要在下个月组织一个星期的讨论会？我特别希望你能去参加！"

我依然答道："是的，是的，"鼻子埋在饮料杯中，心中问着自己，我的波尔加特朋友会怎么想，塞尔乔、弗兰科、阿尔杜乔俩兄弟，还有屠宰

① 指弗洛伊德。西格蒙德是他的名字。

场的那些朋友，卡尔罗、罗莫罗，还有最早时期的朋友，努托、曼利奥、艾尔米罗，我那些遥远夏季的同伴，他们对这一纷扰的动员会怎么想。这远不是一个“进步”的符号，如此大量的小册子、辩解书、圆桌会议和广播电视节目，在我看来有一种不祥之兆。什么！人们从此还得在自己上装胸前别上一个徽章？我们将前进在一面旗帜下？我还得吹嘘我自己的某种专业性吗？我将进入某种范畴吗？那些并不比头发是什么颜色，或者鼻子是什么形状更取决于我自己意愿的东西，还将变成一个需要保卫的事业吗？承担，呼吁，对抗，他们嘴里只有这些词汇……悲剧性地后退到我那弗留利和玛莫罗桥的意大利，那时，我们就是本来的样子，而并不有所意识，那时，想待在一起的愿望的物理扩张把我们拉进爱之中。但是，面对着这三个潇洒活泼的年轻人，如何承认一种如此不妥的悲观主义呢？他们甚至以他们自身的集结，把他们属于一个自由世纪的自豪感贴到了谢里登广场[1]的同性恋习惯法上。

让-雅克对拉夫的斥责声把我从梦幻中拉了出来。

“你都在说什么呢？是说扮演麦克白夫人，苏里奥提斯要优于里萨内克[2]吗？高大的疯女人，去吧！不要假装没听见过她在博莱罗中唱坏了她的高音 D！”

“博莱罗？他把第二幕中的祝酒歌叫做了博莱罗？你跟《西西里晚祷》[3]弄混淆了。呜！呜！谁还能比这更黏黏糊糊滴滴答答[4]的呢，啊？”

他们争吵了好一阵，然后，拉夫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跟我聊了起来。

“除非你还没有完全清楚你自己的情景，皮埃尔·保罗。你宣称一个作家不应在一个党派中积极活动，但你却把你的文章发给共产党的周刊。我真不愿意想象，你居然还停在岸边暗渡陈仓[5]……”

---

① 谢里登广场位于纽约曼哈顿区克里斯朵夫街与第七南大道的交界处，当年，同性恋者与警察之间那次著名的暴力冲突“石墙酒吧（Stonewall）暴动”就发生在那里。

② 爱莱娜·苏里奥提斯（1943—2004），意大利女高音歌剧演员。莱奥妮·里萨内克（1926—1998），奥地利女高音歌剧演员。

③ 这是威尔第的一出歌剧。

④ 原文为英语“Gloopy-gloop”。

⑤ 原文为英语俚语“closet queen”，指“暗地里搞同性关系的男子”。

“不是这样的，”布鲁诺插了进来，嗓音尖尖的，显然是三个人里头最让人讨厌的。“《圈外》不喜欢那些拙劣效仿夫妻日常生活的对子。对了，”他又带着一种阴险的忽略口气补充说，“你的小朋友今天怎么没跟你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

“达尼罗并不是我的小朋友，”我冷冷地答道。

“哦！不过，你根本用不着生气的，”拉夫说，“你的运气就算不错了，始终有一帮年轻人围着你打转转。”

“这很昂贵，但是有钱就能留得住。”

布鲁诺破败的肚皮中，刚刚又蹦跶出了一个爆豆屁[1]。我差点儿把手中的酒杯朝他劈脸扔去，但是拉夫及时阻止了我。他伸手摁住了我的手腕。

“别听他瞎咧咧，皮埃尔·保罗！他这人是满口跑火车。有一天，谈到你的时候，他对我肯定地说，你跟达尼罗的关系可以由一种犯罪感的旧基础来解释。他认为，你选择了一个贫穷的、没受过教育的小伙子，为的是有机会以你的真心善意来慢慢充实他。你带给他的东西，金钱、文化、聚会、各种各样的便利，都是你为求得良心上的平静而付出的代价。当然，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只是耸了耸肩膀，回答说他想错了。其实，你跟达尼罗之间的社会与文化差别，表达得正相反……”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布鲁诺嚷嚷道，“打破阶级间的障碍，绝对自由地选择，爱情的颠覆性力量，吧吧吧，吧吧吧，还有俾斯麦的语录为依托。但是，无论你根据他的哪一本书，他的哪一部电影，你都无法确信无疑地推断出他是一个同性恋。从来没有一种明显而又直率的公开声明。它的披露[2]，人们还在等待中。实际上，你刚才说得很有道理，拉夫。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有比这更鲜的果汁[3]了，我倒要问问你。”

他的模样在我看来很可恨，上衣兜里插着带点子花纹的小手绢，满

---

① 这句话的原文中有四个单词，全含“p”和“t”的发音。译文中，处理为九个带“p”“b”“d”爆破音的汉字。

② 原文为英语。

③ 原文为英语。

脸皮肤鲜亮得像是刚从美容店里出来,尽管如此,他的正确判断还是把我吓坏了。我常常思考我对那些不仅比我年轻、而且社会地位比我低下的小伙子的吸引力——是的,这种诱惑力是独特的。如果说,有些时候,当我心中充满乐观主义和信心时, 我能给我自己颁发一份革命者的证书, 能做到以情欲来推翻竖立在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历史疆界,那么,另一些时刻,我就得承认,我只是通过满足于一种虔诚的华丽辞藻来窃取这一荣耀,尽管我有普鲁斯特的支持,有他辉煌的担保。斯温就不用说了,我曾帮他成了一个画家,达尼罗也不用说了,这个送面包的小伙子变成了电影演员, 我还能不能就我的那些小子[①]举出一个例子,说明我对他并不是一个积德行善者,一个保护者? 从来没有,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有多少工人、农民的儿子,利用了跟我邂逅所产生的好处。隐约地希望能促进一下我的偿还……

拉夫回想起了他不久前的过去,以为应该修正一下布鲁诺的判词。

"我们中谁能不受一丝丝后悔的折磨? 我敢打赌说,你也不能,你没有把你壁橱的钥匙扔进台伯河,它就挂在你床头边的一枚铁钉上,以免万一……一百年前,罗马还属于教皇!"他总结道,仿佛成了我思想的应声虫。

对话变得过于严肃,让-雅克试图让它轻松活泼一些。

"你们可知道,这个星期六,蓝天使要开张了。"

"在特拉斯特维尔区吗?"

"在特里鲁萨广场,西斯托桥的另一边。"

"你这故弄玄虚的家伙,你可什么都没有对我们说呀!"

"我们的第一个夜总会,只为我们自己!"

"一件大事,皮埃尔·保罗! 到时候你来吗?"

"一个彻头彻尾的同性恋夜总会吗?"布鲁诺问。

"不要装出这种样子嘛!"拉夫对我说,"在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论堕胎问题的时代, 你却以启示录的方式预见了一种愈加严厉的迫害。好了!现在,你也看到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蓝天使将是一个公共迪斯科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舞厅,对所有人开放。当然,我们只在我们之间约会,我们只在我们之间跳舞。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圣彼得的城市,这还是第一次!无论是谁都可以摁铃,进去……"

"只要他付钱,"我以一种嘲讽的语气说道。

"他说得有道理,"让-雅克说,"作为一个好法国人,这点看法在他的钱包面前就丧失了。"

"啊,不,让-雅克!"拉夫反驳道,"你该不会又开始大谈特谈性的商业化,还有资产阶级的弥补。据我所知,其他夜总会也一样是付费入场的!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地方,可以在那里见面聚会。安安静静地。石墙酒吧的暴动①之后,才只短短的几年,我们足以为如此的结果感到自豪。"

我很高兴他们彼此争论起来,让我有时间恢复平静。真是可怕的消息!人们要开一家同性恋酒吧(但是,我是不是真的想变得忧伤呢?),一家彻底"属于我们"(哦!这个主有代词让我变得跟那些人团结一致,而要是没有这一被迫的参与,我恐怕都不会去跟他们握手!)的迪斯科舞厅,在什么地方?真让人要命!在特里鲁萨广场,在古老的大众街区,我曾在那里拍摄了我的第一部电影!我感觉这一小小的事件——活该他们招供了——就像一个巨大的侮辱,一种真正的亵渎。侮辱了谁,侮辱了什么?假如罗马终于决意成为一个现代大都市,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对最后禁令的废除看成是渎圣之罪?我双手举起酒杯,想看一看杯底。我心里说,尤其要紧的,是不要向他们泄露我的厌恶,我的恐惧。他们将给我扣上什么罪名的帽子呢?在宽容成为了决定性标志的时候,我还会是唯一一个不去享受它的人吗?我还在为了什么遗憾呢?怀念那样的一个时代吗,那时,你得躲起来,像贱民一样生活,心中带着一种羞耻感四处流浪?

"一个种族隔离区,"我想道,"这就是我们所赢得的。一个金光闪闪

---

① 1969年6月27日夜,纽约市的警察进入"石墙"酒吧进行临时检查,逮捕了几名未带身份证的同性恋者,并驱离顾客,但酒吧外几百个同性恋者向警方投掷石块和瓶子以示抗议。警方增派支援力量,但没能成功分散人群。同性恋者的抗议示威持续了五个夜晚。史称"石墙事件"。

的隔离区,但,总归还是一个隔离区。"然后,不:那根本就不是我厌恶的缘由,至少不是关于令人不敢问津的高价("威士忌要三千里拉!"在这方面寸步不让的让-雅克尖叫道),或者是对平民区特拉斯特维尔的选择(很长时间以来,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平民区了)。借口,所有这一切只是一个借口。就算这家夜总会模样可怜,而且免费进入,它还是会引起我一种同样强烈的反感。啊!但是,我会找到一种办法让他们知道我的想法,我一边心里这么想着,一边瞧着他们在那里抬手看表,并唤侍者来结账;还有那种说服他们的方式,说服他们永远别再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喝酒了。

我的思考就局限在此了,因为我并不想丢失正在表演的那出小喜剧。让-雅克被再次谈论他那些歌剧女演员的欲望折腾得心中直痒痒,因为他已经有整整一刻钟没有谈到她们了,一看到卡诺瓦咖啡馆的领班手托一个银盘送来账单时,便急不可待地扑向他的手提公文箱。这一巧合并没有逃出我们三人中的任何一双眼睛。我们互相交换了一个微笑。从那手提箱里,他拿出来的不仅有一瓶香水,而且还有一张年轻女郎的照片。利用意大利人好客习惯而节省下了一千里拉的这份幸运,再加上为我们展现了卡提娅·里恰雷利[1]签名照片的这份自豪,使这个法国佬脸上显出一丝清新、鲜红的血色。他快乐得面若桃花,一个劲地向我们夸耀那位歌剧女歌星的才华风采,那是一个还不太出名的金发女郎,不过,兴许正是这一原因,其他人还都应声赞美她的天才。

布鲁诺赶在我之前,第一个打开钱包。他往账单底下塞了一张钞票,并把托盘推给侍者。

① 卡提娅·里恰雷利(1946—),意大利女高音歌剧演员。

51

“不,不,不!”自从我们在卡诺瓦咖啡馆邂逅以来,我的内心每时每刻都处在骚乱中。“不!”我试图以这声呐喊,从一个令人窒息的重压中挣脱出来。“不!这不可能!”我一边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一边对自己重复着,除了这几个毫不连贯的词,根本就不能说出什么来,也无法明白,我以这样一种荒诞的疯狂死死对抗着的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我感觉自己是在跟整个世界作对。罗马的春天炫耀着它的灿烂辉煌。我没有在博盖塞别墅清香芬芳的松树林里久留,我逃避这一阵阵清新的芳香,这一片绚丽的阳光。罗马的美让我难受。若是艾尔莎·莫兰特[①]不那么以其母性本能的细腻宽容待人的话,她恐怕就会跟那个死赖上她的人争吵起来,此君非让她按照他们之间几十年以来养成的一种习惯,请他在一家新餐馆里吃饭。不要友谊,不要一大帮人一起吃饭,不要自然本性的大爆发,不要鸟儿在我窗外的歌唱。甚至连我那棵石榴树鲜花的花苞也在不合时宜地刺激我。我把这种对生活的普遍排斥推向了极致,甚至都不理睬大街上小伙子们的微笑。

某种平静,我只有在依德罗斯卡罗才能找到。我一头钻进汽车,无论是在白天的什么时辰,沿海滨大道一路奔驰,一直来到那个以其高大的圆柱体俯瞰田野边缘的八角形古堡。从那里,我再步行,经由见不到半个鬼影的空荡荡的小径,进入板屋和窝棚。由于没有任何树木、任何植物扎根在这一荒野的贫瘠尘土中,人们也就无从发现季节更替的任何踪迹。长久以来,瘦瘠的土地无法依靠植物汁液的功能得到改良,也无法呈现植物和谐生长的茂盛景象。没有一丝绿色打破单调的巉岩碎石。这一派绝对的荒凉风景,倒是很符合我绝望的心境。日光本身也无

① 艾尔莎·莫兰特(1912—1985),意大利女诗人、小说家。

力地拖拖拉拉，懒洋洋，脏兮兮。一种苍白的光线流淌在砾石堆成的花坛上、木板的屋顶上、硬纸板的墙壁上。海上刮来的微风，吹在用铁丝缠在一起用做窗板的接缝不严的白铁皮上，发出忧伤的哐啷哐啷声。每一座小房子，在其围地中央，在一排胡乱钉下的桩子后，在活动的泥土中颤动不已的栅栏后，似乎都紧紧蜷缩起来，仿佛一个漫长无边的冬季始终盘踞在这一地带。一切都凝固了，丢弃了，死亡了，荒废了。春天可以让罗马的各个花园散发清香，在我窗前的谷地中挥洒下万紫千红，但在这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铺展了一种永恒惩罚的蒙蒙阴沉。

那部关于那不勒斯的裸体电影，以及后来的另两部电影，歌颂的同样是生活的欢乐，一部拍的是中世纪的英格兰，另一部则是在辉煌东方的也门，但现在，它们几乎让我感到羞耻。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颁给了这个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后来得的是金熊奖，第三部得的是戛纳电影节的特别大奖。穿礼服、打蝴蝶结的皮埃尔寻求了他应得的报偿，而保罗则期盼着孤独和黑暗。我颇有些后悔自己助长了性与性器官的荣耀，这一商品在今天已是所有人都够得着的东西，而且被权力本身所分发。为争取通过身体来自我表达的权利的进步主义斗争，早已可怜地熄灭在了一种色情的准许中，而蓝天使酒吧的开张仅仅只是其最可悲的结果。

达尼罗被我态度的改变弄得有些灰心丧气，试图向我证明相反的看法。

“人们刚刚又一次查封了你的金熊奖作品！”他很自豪地向我报告，以为这一消息会让我振奋。

他曾猜想，我最后几部电影的成功会有利于缓和我的沮丧情绪。如果说我重又激起了司法的雷电，那是因为我的作品又处在了斗争的焦点上。确实，一段时间里，我得以用这一幻象哺育我自己。对我所谓“淫秽”和“色情”的揭露，不但没有让我像以往那样受到暴力打击的侮辱，反而暂时地赋予了我勇气。我的电影曾反抗了资产阶级意识，并唤醒了正统思想者的恐惧，它们继续拥有一种意义。

“对你银熊奖的第十五次起诉！”达尼罗打开我的邮件时嚷嚷起来，

“特别大奖作品则在锡拉库萨被查禁！”

或者，他会挥舞着报纸，吹响胜利的号角：

“在塔兰托，在普利亚区，有捣乱分子小队！在安科纳，有人扔茴香！在佩鲁贾，放映被中止！特雷维索的主教登上布道台抨击你违背道德。你看清楚了，皮埃尔·保罗。”

但我不能长久地受骗。

“瞧一瞧报纸上的文艺演出版，”我回答道，有些自欺欺人地希望重新成为一个遭诅咒的作者，说实话，那几分钟时间实在有些多余。

“什么，文艺演出那一版？”他说，似乎并没有真正明白。

“好好瞧一瞧，然后给我念一念最佳票房排行榜。”

随着我那三部电影逐渐在电影院中公开放映，他不得不向我承认，这“幸福三部曲”始终占据了电影上座率排行榜的前列。

“这算什么由头！”我嘟囔道，冲我自己生气。

然而，达尼罗毫不松懈。

“对你银熊奖的第十八次起诉。听着，在巴里，便衣警察桑托罗夫人愤怒地指出，你的电影表现出‘最讨厌和最可恶的淫秽’。在米兰，第十九次起诉。一个‘年轻的妈妈’‘呆滞地’离开了放映厅。好几天期间，她始终处在‘震惊的状态’中。哦！可是这一次情况严重了，皮埃尔·保罗。在贝内文托，共和国检察官根据一位退休上校的起诉，下令对你的金熊奖作品实行新的一次查禁。‘从第一次镜头开始，直到最后一组，通篇都是一种腐烂货，一种腻人的肮脏货。’罗莎·扎诺蒂修女，圣心会传教士，走出电影院时都呕吐了。‘男人间的肛交……配偶间虐待性的交媾……’她以这样的词汇向接待她的法官形容道，一边说，一边气得浑身发抖。”

“瞧，”我回答道，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卑鄙，我的名字上之所以还笼罩着那么一点点地狱般的光环，都是由于一个女便衣、一个退休上校、一个仁慈修女的斡旋，“你若是想让这三部电影的卷宗更加齐全，就应该再补充一点，外加生产社会刚刚递给我的账单。你知道，光是第一部电影，就在三年里带来了多少利润吗？”

他扬起了眉毛。睁大了眼睛，这副目瞪口呆的小无赖样子，曾经多

次引得我哈哈大笑。

“四十亿，”我嗓音很低沉，“在十四年时间里，我最后一部小说的销售只给我带来一千八百万。那些记者若是知道了这一数字，准保会冷笑不已，我对他们宣称，我只放弃小说，是因为我讨厌先锋派满口行话的恐怖主义。”

“四十亿！”他重复道，眼睛瞪得像两个茶碟。

然后，他便闭口无语了，不知道他是应该为这例外的成功而欢欣鼓舞呢，还是应该承认我已经成了大众心目中的宠儿。放映我电影的那些电影院吸引了那样一些家庭，他们在星期天寻找一场娱乐演出，以消化肚子中的饱食。

“不！不！”我嚷嚷道，“这是不会的！我发誓放弃我的三部曲。我将公开登报声明，我要放弃它们。”

几天后，我便这样做了。但是，只要我的电影遗作，以及它卑鄙的收藏，还没有让观众以一种争先恐后的惊恐溃逃撤空放映厅，只要我的作品还没有遭遇火与硫黄的洗劫，我就得听到钱柜一开一合不断发出的丁当声，从意大利的四面八方传来，越过千山万水，越过茫茫大海，回响在我耳边，像是一曲耻辱的军乐。只有达尼罗的微妙心曲，只有他的好心好意在阻止他问我，我为什么不在周围施舍一下我所积累的财产——比如说，对被红色旅杀害的警长帕斯夸雷·埃斯坡西托的遗孀和孤儿。

为了从这一新的矛盾中抽出身来，我在罗马的北部，在维泰博地区，购买了一处昂贵的废墟：一个庞大的孤零零的古塔，处于极糟的状态，这一处曾属文艺复兴时期一位公爵所拥有的历史名胜，其基本维修费用，会比已经支付的购款至少还要高一百倍。“你为什么要陷入这里头去？”莫拉维亚问我，很担心我是不是丧失了理智。没错，那个地方几乎是进不去的。人们只能走一条坑坑洼洼的路到达，而且路还断在了森林中。要想走到由两个形如槽檐怪兽的奇异魔鬼把持着的大门口，必须披荆斩棘地辟出一条通道。没有人能指责我选择一处别墅的闲情逸致。得到了阿尔贝托的明理点拨后，我便放弃了开辟，让那道路和荆棘依然如旧。谁若想来拜访我，谁就得豁出去，不怕被

刺扎得满手血淋淋。我已经变了,即便不能说是完全变成了一个钦契[1]或一个博尔吉亚[2](这个古老要塞当初兴许只是被他用做了巢穴),至少也成为了一个无法接触的家伙,一个必须让他留在悲惨生活中的野蛮人。我每一次跑来把自己关进这古塔,就如同把脊背转向了整个世界。比起藏身于用几千万资财建起的围墙中的我来,一个隐修于荒漠之中柱子顶上的柱头隐士,恐怕也不会保持一个更绝望的姿势。

在那里,兴许因为满眼所见尽是屋顶的尖拱、低矮的拱门、辘轳上依然吊着锈迹斑斑的铁链的井台,我被刺激得去阅读那些作品,重新翻开关于爱情与死亡的重大传说,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唐璜与司令官、费得尔与希波里特、圣保罗与尼禄[3]。我据此构思着另一些电影的大纲,它们将会显得如此暴烈,如此凶残,恰如那些受薄伽丘和乔叟启迪的电影[4]曾是如此好笑,如此轻松。

"谢谢了！"达尼罗大笑着欢呼道,"你都已经用那些也门女人把我给阉了。你还想要什么?但是,请告诉我:你毕竟还不会忘乎所以地干起通奸来吧?"

我被唬住了,一言不发地瞧着他。

"也不会说什么,由于整个一生从未在一张床上睡过觉,就得进地狱,上刀山,下油锅吧?"

"你想说什么呢?"我问道。

"你关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电影将归于失败。今天,没有人会理解,人们应该以死来为夫妻间一个小小的不忠赎罪。而你关于唐璜的电影也将不受欢迎。相信我的话,考虑别的主题吧。"

他以他坚实的常理知识,指出了一个我没想到过的障碍。我们时代的宽容接纳使得所有体现拒绝的神话英雄都有些过时。一个是因为选择了通奸,另一个则是因为背弃了自己最神圣的承诺,而第三个依然还

---

① 这是罗马的一个贵族家族,历史悠久。

② 意大利的一个著名家族,历史悠久。

③ 这些都是欧洲古老神话、传说和历史中的人物,而且每个故事都有不同的传说版本。

④ 指根据这两位文学先辈的短篇小说集改编的电影《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

在乱伦:用什么方法都不要紧,只要他们的否定铿锵有力就行。他们各自体现的并不是一种罪孽,而是一种对其时代、对其环境、对其游戏规则说“不”的方式。在我们今天,谁能履行这一使命?在梵蒂冈第二次会议[①]和蓝天使的意大利,在既没有了上帝,又没有了禁忌的意大利,谁会显得那么骇人听闻,那么不可饶恕,从而将自己排除在这一普遍的好意之外?谁会以他的个人抗议,把社会从因循守旧和千篇一律中拯救出来?谁将见证,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有能力提出反对意见?

“比如说,”达尼罗搭腔道,他的坚决在我眼中开始显得有些可疑,“你可以……我不知道,我……特里斯当与漪瑟,无论如何,这样一个故事实在有些令人消沉。因为人们处在边缘上,人们只有等死的份!说真的,我实在理解不了你,皮埃尔·保罗!你一辈子都在为赢得更多的自由而奋斗……”

“当我们受压迫,被掐住了喉咙的时候,我为自由而奋斗。”

“而现在呢,既然我们都赢了?不,但是,这不免变得有些滑稽!一旦有人当着你的面说出 gay 这个词,你脸上顿时就是一片愤怒。然而,你有多少次对我解释说,这个古老的词有着医学味、警察味,令人恶心……说实在的,皮埃尔·保罗,你该知道!没必要买下这个城堡(他就是这样称呼我的废墟的),让你沉湎在对中世纪的怀恋中!还是想办法讲述一个结局完美的爱情故事吧。要成为现代!不要那些春药,也不要那些在命运之锅中慢慢煎熬的诅咒……”

“为什么,”我突然说,“难道我关注特里斯当就让你那么难堪吗?”

他在我目光的逼视下有些慌张,这更证实了我的怀疑。

“它并不让我难堪,”他红着脸说,“它让我惊讶……”

“啊,真的!你无疑更愿意我只是想开个玩笑……这些充满恐怖的重大戏剧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哎,看到我无忧无虑、欢天喜地、自由自在的样子,你不也会很开心吗……你说我五音不全,但你却很愿意看到我能像在那不勒斯那样重新唱歌……你还是承认吧,这让你很开心!”

他脸色顿时变得刷白,被我暴烈的失礼话弄得无所措手足。

① 指在梵蒂冈召开的天主教第二十二次普世会议(1963—1965)。会议以罗马教廷向现代化社会的大量开放而闻名。

“滚,”我对他嚷道,“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

没有让我再请,他就把落地窗打开到最大,一步跃到外面的硬土地上,那是我们在高塔前整理出的一片空地。不一会儿,我听到他正用斧子砍山坡上的那片树林。

如此说来，我通过一个朋友的无意泄露而发现的这一点原来是真的！达尼罗想娶阿娜玛利亚,但又害怕向我宣布他的婚姻。他相当细腻地猜想到，在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对年轻的阿齐兹实施的阉割惩罚,已经构成一种警告方式,便想方设法要避免当面告诉我这一消息。他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的热忱上，他希望我能利用已被罗马人所接受的那些新的娱乐便利。让我早先的学生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巴黎最后的探戈》[①]大获全胜,并且为各类趣味的顾客开放了各色夜总会的这一城市,这个曾第二次杀死了圣保罗的罗马城,缓缓地把我们引向了一种两厢情愿的分手。失去一个,找回十个！那个时代结束了,风俗的严厉、障碍的难以推翻、生怕被发现和惩罚的永恒担忧,赋予了爱情以一种例外的力量,并刺激它成为一种激情。他将摆脱我,把我打发到蓝天使去,这样就会省略一次决裂的尴尬。自从他看到我浑身散发出中世纪古老传说的魅力,被它们过时的严格所诱惑而不是被激怒,他那精明的算计就受挫了,化为了乌有。我不仅没有让自己像我所有那些因拍电影而致富的同事那样,在罗马南面的萨博蒂亚湖畔建造一个别墅,反而躲藏在那个无法居住的古堡中；当整个意大利在受压迫二十个世纪之后无拘无束地醒来，尽情地放纵它那享乐的胃口时，我却在那里鼓吹绝对、荒漠、孤独、死亡！

啊！但是,现在,我在一道崭新的日光下拥抱我整个的生活。当社会窒息在摩西的枷锁之下时,我为自由而斗争;以寡敌众;被指指点点,当众羞辱,诽谤诋毁;在报纸上遭谴责,成了人渣。今天,事情彻底变了模样,但是我依然愿意,依然应该保持原样:像以往那样,以寡敌众;揭露风俗的随意，恰如我当年打击风俗的暴政那样；在消费社会中成为丑闻,就像我以前在天主教的意大利曾总是丑闻那样。被我曾推动着去造

① 拍摄于1972年。

反而现在又对我的大转变惊讶万分的那些人指指点点,当众羞辱,诽谤诋毁;在我本该被尊为先知的时候,我却让人轻蔑地当做了人渣。这就是我在大地上的使命:提出反对,说一声“不”。当我所有的同时代人全都迷醉于光明中时,我却选择了沉湎于黑夜。如果上帝或命运不惜屈尊让我在性的问题上成了一个边缘者,那么我在敲开蓝天使的大门时,也决不会背叛对它们的信仰。如果这一个选择标志就烙在我的肌肤上,人们也不会看到我走入人群中,要求得到我的那部分享乐。我生来就与众不同,我将在我的轨道中一直走到头,我将一直攀登上激昂之顶峰;把脊背朝向平原,那里,像偶像那样被树立起来的幸福吸引了千百万虔诚的崇拜者;我从狭窄的谷地上升,一直到达陡峭的顶峰,而在那里,人们只能遇到心醉神迷或罪该万死。当我站在巅峰之上回顾身后之时,我眼中没有丝毫的轻蔑在闪耀。要让大众感到幸福,就得让一小撮人受惩罚。即便是达尼罗,我对他也不再感到有什么愤怒,有什么仇恨。如果说,他想建立一个家庭、让他的心得到温暖的合法抱负赢得了我的一点怜悯,那也仅只是一点点。我想,我们已经来到了永别的十字路口。我这样说,心中并非没有痛苦,因为那个一头扎入陌生方向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原路返回的人,只有在撞得头破血流、晕头转向时,才会回想起他所抛弃的一切。我听着从荆棘林里传来的清脆斧头声,止不住热泪盈眶。太晚了,实在是太晚了,在静悄悄的森林中梦想一种伊甸园的宁静。很快,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很快,我就将被卷入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人带着一个同伴进入过的世界。但是,在我生命的这一崇高时刻,我不会让自己被一分钟的激情剥夺我生来就应享受的伟大而又可怖的特权。

时不时地,我们前往依德罗斯卡罗。从他那方面来说,是违心的,而从我这方面来说,则没有丝毫快乐可言。我解下我的皮带,把它递给达尼罗。他默默屈从,先把皮带在空中抽得啪啪响,然后鞭打我的背。“使劲!”我说,“再使劲!”渐渐地,他来了劲,直抽得我皮绽血流。看到第一滴血流出,他就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双手捂住脑袋,喃喃道:“够了!够了!”浑身颤抖不已。我便选定这一时刻,一把将他仰天推倒,或者让他肚子贴地趴在地上,强迫他做出那一天我很开心地让他受辱的姿势。他

乖乖听从我的苛求,因不必再扮演刽子手而放松下来。在混乱中,在热情中,在我们意外的狂妄中,我们又找到了某种恰当的无辜,尽管我们唯一的卧铺是一张污泥之床,我们的爱情兴奋剂是这肮脏的景色,那些盘旋在我们头顶上的海鸥监视着灰色的海水,似乎向我们喊出了它们一声声的责难。

我还需要什么,好把他推向极端,迫使他断裂?达尼罗的一个意外动作给了我等待已久的机会。他已经走远了,一直走到了足球场边缘。我看到他靠在球门柱上,叉开了两腿。突然,我连想都没想我是在干什么,就用胳膊肘撑起身体,叫唤他。

"达尼罗,到这里来。"

这专横的语气吓了他一跳。他转过脑袋,没有放开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的性器官,紧皱着眉头朝我走来。

"到我身上,达尼罗,到我身上。"

他一下子没明白我要他做什么。我让自己仰卧着,胳膊交叉成十字,眼睛紧闭。我蠕动着嘴唇,喃喃道:

"为了对我的爱,达尼罗,做吧。"

在我的威胁和恳求之下,他终于做了起来,但是,随后却热泪滚滚,并恳求我再也不要强迫他干一种让他感到如此屈辱的脏事。

"我们总归不是狗!"他呻吟道,还不停地打着呃逆。

我把他拉向我,带着一种野性的狂喜,凑在他耳边说:

"正因为我们不是狗,我们才要试一试……两条狗从来都不敢随便做的某种事!"

他往后退了一步,目瞪口呆。

"不!不!"他叫嚷道,"这不行,皮埃尔·保罗!"

由于他看到我蹲成了那个姿势,向他证实他已经明白了我的意图,而且我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于是,他继续后退,一直退到了球场边的栅栏上。

"你疯了,皮埃尔·保罗,你完全疯了!"

他一边大惊失色地朝我重复道:"你疯了!你昏头了!"一边抄起了一块从围栏上脱落下来的木板。

"到这里来,"我命令他道。

我再一次仰面倒下。

"达尼罗！"我还在叫他。

一阵喘息中,声音更轻地:

"尼莱托！"

他踮起脚尖走近我。我斜睨着观察他的动作。他把木板拿在身前,死死地挡住了他的裸体,这使他每走一步都不得不矫正自己的姿势。我更惊讶地看到他临时弯下身子,捡起他那堆衣服,躲到栅栏后去穿衣,带着一种突然醒悟的羞涩,在我看来,这一羞涩比他的结结巴巴和热泪滚滚还更能说明问题。

还有时间稳住他吗？一种巨大的力量把我死死地盯在地上，背贴地,仰天而躺。我大张的胳膊紧紧沾着烂泥,像一截毫无生气的枯枝。我瞧着一群海鸥盘旋在台伯河的上空,然后又无声无息地振翅翱翔。一层层雨积云沉沉地压在河岸线上,似乎就要坠落。"尼莱托！尼莱托！"我的叹息拉长在一种绝望的喃喃声中。如果说，想把达尼罗紧紧抱在怀里、并重新幸福地跟他相处的欲望在不间断地折磨我,那么,一种我应该服从的神秘意愿却在妨碍我站起身来，奔向他消失的方向去找他回来。我完全支配不了我的身体。一具躺在淤泥中的遗骸。最后,从圆堡方向——这么说，他已经到了我停汽车的地方——传来了他那被湿润空气冲淡了的嗓音。"你会愿意的！"他冲我叫嚷道。我猜想他聚集了浑身力量,向我掷出这一挑战——他稳稳地叉腿而立,兴许,拳头杵在腰上,就像正在彼此虚张声势的罗马小伙子。只不过,最后那个音节暗咽在了他的喉咙中,死在了一声抽泣中。

52

在被拘留的涉嫌杀害警长帕斯夸雷·埃斯坡西托的嫌疑人中，我很惊诧地读到了瓦尔特·图齐的名字。尽管一大把胡子遮盖了他又尖又窄的下巴，我还是在报纸的照片上认出了这张坚毅而又高傲的脸，他在63学社中活跃了一阵子后，摇身一变，成为了红色旅罗马纵队的首领。当费尔特里内利在一个高压电线的铁架上安放定时炸弹时，炸弹提前爆炸了，把他炸得粉身碎骨，然而他惨烈的死亡在我眼中倒显得不那么可怕，反正比不上这个年轻人冷峻的固执，他的破坏性趣味一直就没能在文学论战中得到满足。

兴许，就像我一样，他也厌恶罗马年轻人在那些场所的所作所为，从此，他们在当局软弱的认可下，夜以继日地占据那些地方：在特莱维水池周围，在西班牙广场台阶上，在纳沃纳广场，在万神殿广场，在法尔内塞广场(一大早满地铺满了空的喷水器)，在鲜花集市，在特拉斯特维尔区圣塞西丽亚和圣玛利亚教堂以往如此美丽的广场。衣衫褴褛，吵吵闹闹，肮脏，吸毒。小伙子和姑娘都蜷缩在被子里，头顶着美丽的星空睡觉，但是，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无法表现出温柔，尽管他们时刻处在男女混杂的状态。他们彼此都不认识，全都目不斜视，不给邻人一丝微笑。他们并非保持着静默，而是患了失语症，他们走出麻木状态，只为了嘟嘟囔囔、含含混混地要求得到一块口香糖或者轮到自己来吸一口。无论男女，他们全都显而易见地一水长头发，尽管这一毛发标记，以往作为男性叛逆者的徽章，现在只是被小伙子们用来宣布他们的粗枝大叶，他们的懒于理发。

世上最美丽的城市落到了他们手中！但是要把一种归于战神的隐喻赋予他们，那实在是太抬举了他们。因为，假如凭借他们漂亮的奇装

异服、花花绿绿的短裤,他们完全可以令人回想起查理五世[①]的雇佣军,以及一举扫荡了罗马的那些外国兵,在他们黯淡目光的深处,不存在做任何事的任何意愿,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

纳沃纳广场,傍晚六点。一个漂亮得如同基督的家伙,白亮的脑门,清瘦的脸颊,满脸胡子有一个星期没刮了,试图跟那些随着柔和的人流在广场上游逛的、并聚集在卖东方小玩意和印度纱丽的货摊前的闲人搭讪,不想错过他们期待的一种历史性诱惑。"一百里拉,你能给我一百里拉吗?"他用一种失声的嗓音重复道。地上还撒着一些饰画有五角星的传单,传单上,红色旅揭露着工资奴隶制,号召人们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有酬劳动。"一百里拉,一百里拉,你能给我一百里拉吗?"我很恼火地看到,革命的雄辩学竟然跟一个无赖的辩解竞争了起来,便等着他经过我面前,好在他耳边吹上一句:"假如你来做爱,我会多给你一百倍。"你以为会有一丝欲望的火星在他的眸子里飞舞吗?他吓得连连后退,躲在了他麻木的大脑提供的唯一一句咒骂后面。"法西斯脏鬼!"我听了本来会哈哈大笑,但那天,在接到达尼罗的电话——"我们已经确定了日期,你知道,不能再等很长时间了,阿娜玛利亚已经怀孕四个月……"——之后,我的反应却是扑上去抓那家伙的喉咙,并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实在太胆怯,竟然没有自卫,而是满足于嘟囔出一阵疯狂的嚷嚷,顿时将众人好奇的目光引到了我们头上。有一个女市民,前来在一个个睡袋之间闲逛,尽情欣赏眼前的这番景象,以一饱眼福,到晚上,在家庭的餐桌上,她是断然不会赞美这一场景的,她认出了我来。"P. P. P.!"她尖叫一声。"小心你的孩子们!"一群人聚集在了圣阿涅丝教堂的大门前。没人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但每个人又都想发表自己的意见。"抓住他!别让他跑了!这一回,总算抓住了一个!"他们将把我私刑处死吗?"孩子们,小心孩子们!"有人突然以一种更荒诞的方式高喊起来:"别围成一团!他们要开枪了!"对恐怖主义枪弹毫无理由的害怕,顿时让广场上的人群作鸟兽散。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教堂的栅栏前,正是那群人方才把我逼入的绝境之处,我擦了一把脑门上的冷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年在位)。

汗。这一次，我算是死里逃生了。他们逃散时连头都没有回一下，相当愚蠢，使人不禁怀疑，这帮乌合之众中还会出现一个凶手。

要么是迟钝，要么是有罪：对我国青年来说，就只有这样一种抉择吗？新的阴谋，新的屠杀。在布雷西亚，大广场的一个垃圾筒里，一枚炸弹爆炸，八人死亡，九十四人受伤。意大利人号这列去往罗马的火车在博洛尼亚火车站附近被地雷炸毁，十二人死亡，一百零五人受伤。随着春季选举的临近，短短几天时间里，六名共产党活动分子在大街上被人开枪打死，子弹射在后脖颈上。极右派武装了杀手。而我，我在《晚邮报》上发表文章，谴责整个社会是杀戮的委托人。

一对男女走在我前面。小伙子胳膊搂住女伴的腰。一个迷人的造型，使我们想起了古老意大利简单而又淳朴的风俗。只不过，他们俩都穿着"耶稣牌"牛仔裤，这还是一个最新流行的品牌。"谁爱我就请跟我走"，我看到裤子上醒目地写着这样的话。我不太相信地揉了揉眼睛，这句话依然在那里。它堆积在他们圆臌臌的屁股上。"谁爱我就请跟我走"，火焰一般鲜艳的字母。这一渎圣的口号出现后，《罗马观察家》就高声叫好；但这叫好声很快就变成了悲苦的哀叹，最终化为同谋般的寂静。"你不会有跟我不一样的牛仔裤"：这一广告频繁出现在报纸上。无能为力的梵蒂冈教廷甚至都不再抗议了。当然了，你会对我说，假如人们可以把"耶稣牌"蓝色牛仔裤的成功归结为世俗精神的一种胜利，那么，值得庆贺的是，教会已经不再有一个相当长的世俗臂膀，能够够得着并惩罚那些亵渎神明的人。实际上，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宗教作为权威、作为权力形式正在消失，只是被消费工业当做可利用的广告而苟延残喘着；在这样一个时代，宗教的价值已经死亡，而又没有新的价值观能代替它。这就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因此，当我们看到，紧挨着装饰有耶稣甜美名字的屁股，一把史密斯-威森38口径手枪正翘着枪口，等着从中吐出火来，我们也根本用不着惊讶。

假如我能预料到从中爆发的丑闻，那我对最后的这句套话恐怕就

不会那么骄傲了,从日常观察中抽取出这一小小寓言的时刻,丑闻的动静闹得更大,远比我以前投入反对电视、义务教育、基督教民主党和堕胎的战斗中时要闹得更大。上帝才知道,为什么屁股–耶稣–38 口径手枪的这种三结合(这一结合是事实上的,而不仅仅存在于我的幻想中)会引起公愤。左派一路急先锋杀来。按照《团结》的说法,我侵害了宪法。《国家晚报》则把我当做了新贵族和回归的方济各会修士。《日报》,“游荡的小行星”,《前进》,“成了自己镜子囚徒的那喀索斯”,《选择》,“病理学上的近视眼”。低级的辱骂有:“恋物癖,如果在永恒之城中散步时鼻子能闻得比腰带再高一点,同胞们倒也不至于会那么失望”,与辱骂相辅相成的还有诡谲的讥讽:“生错了时代的萨伏那洛拉[1],还想让人在我们的商店里卖棕色粗呢[2]的宗教狂”。至于右派,则更简单,指定我为一个该打倒的人。人们又重提起安齐奥、帕尼科街、黄金子弹左轮手枪那些案件。人们一直追溯到瓦尔瓦索纳,我已经听到了纳沃纳广场上的呐喊:“小心你们的孩子们!”这声叫喊从半岛的一端传到了另一端。每天早上,都有邮件给我带来死亡威胁,署名是一对交叉的胫骨。我不得不换了一个电话,秘密的电话号谁都不告诉。10 月的一天,我出现在妈妈面前时抽泣不已。那不是我某一次从火车站附近的秘密征服回来时,而是在大下午,我跟我新影片的制片商一起吃完午饭走出哈斯勒酒店时。大白天,三点钟,一群年轻的暴徒在西班牙广场底下袭击了我,而就在广场台阶上,躺着几十个麻木不仁的少年郎,非暴力哲学被他们用来作为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的借口。我在他们上衣的里子中看到了卐字。他们用铁链打我,然后骑上日本产的大摩托,逃之夭夭。而一个月之后……

啊!要是把发生在 11 月 1 日夜间到 2 日凌晨的事件,看成长期来暗中策划的阴谋的大暴露,那将会十分诱人!一辆汽车在意大利酒吧附近等我,并在我的汽车开走后轻轻地发动……三四个刺客一直跟随我们来到依德罗斯卡罗,一下子猛扑上来……跟他们同谋的有一个未成

---

① 萨伏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基督教殉教士,最后被判处绞刑和火刑,见前注。

② 古代时天主教修士一般都用棕色粗呢来做道袍。

年人，由于年纪轻，只要他同意把谋害罪揽在自己身上，就只会有短短几年的监禁……好一个电影剧本，能洗刷掉我的夜行习惯，能让我位列于温克尔曼[①]和洛尔卡之间！一次说得过去的伏击，一种符合情理的概率，它从11月2日起，将变成一种绝对的确切，对我的那些朋友，对我的共产党员同志，对意大利国内和国外的左派，对所有那些人，爱、同情、政治趣味或精神偏见向他们显示，P. P. P.在一片空地上的被杀，是二十年前就开始的诋毁与仇视活动的逻辑结果。在二十年期间，报刊杂志、司法部门和公众舆论已经颁发了追杀的准令。只需要有一天，人们直接来执行这一判决就行了。而，用来为那尸体做裹布的，还有什么背景比这片满是岩石和淤泥的荒漠更合适呢？

说到我自己，我完全有权去追问阴谋的证据。我会错过这一机会吗？会在一种法西斯主义谋杀的荣耀下，掩饰一桩风化罪的卑鄙行径吗？重又开始整整二十六年前在瓦尔瓦索纳发生的事，曾那么成功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那时，受到一种猥亵儿童罪的侮辱性控告之后，我做了巧妙安排，当着众多社会名流的面，借着做纪念胜利日演讲的机会，公开揭露政府以重建大战死难者纪念碑的名义挥霍浪费了几百万资财。丑闻，不过是政治丑闻，它加速了我的撤职，但同时又为我披上了一轮殉道者的小小光环。而今天，我已经不再是二十七岁了，而是五十三岁了。时时处处粘上性丑闻的耻辱刺激了我，而不是让我害怕。让革命的女灶神们见鬼去吧，她们将失去一把为她们的虔诚加热的火。在临终之际，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时，我无法出于好心扮演美丽的心灵，哪怕是对我最亲密的朋友们。真实情况是，我一发现他，我那个如此辉煌、如此傲慢的刽子手，紧靠在一段连柱廊上，叉着胳膊，嘴角露出笑容，我马上就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屈辱地投降了。根本就别想高昂着脑袋出去，在一片掌声中离开世界的舞台。那既不是个人虚伪的时刻，也不是出于对某一事业忠诚而撒谎的时刻。这一辉煌的时刻，我用来在我卑鄙的命运中承受我自身！

11月1日这个星期六，工作了整整一天后——邮递员在万圣节休

---

① 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

息,既没有给我带来要求采访的信笺,有没有带来交叉胫骨的符号——我大约在九点钟出门。我把额头伸给妈妈,她拥抱我之前端详了我一番。

“别太晚回来,皮埃尔·保罗,你太累了。”

“不会的,妈妈,你怎么知道我累了?”

她伸出手,摸了一下我的右眼皮。

“你的眼皮垂了下来,”她对我说,“这是一个信号。”

我不寒而栗。她怎么知道,二十五年以来,卡拉瓦乔的那幅画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

“没错,”我从卫生间里返回时附和道,“稍微缺觉的结果吧。我去跟尼莱托吃晚饭,然后我就回家。”

“他为什么不来我们家了?”她问我,“我怎么老也听不到他摁我们家的门铃了?”

“但是你要知道,他已经结婚了,妈妈!”

“啊!一个女人从你这里夺走了他,是这样的吧?”她喃喃道,没有瞧我,仿佛根本用不着去跟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争论似的。

“我将是他们孩子的教父!”我宣称道,想安慰她,“他们已经求过我了,我答应了。而你,你就准备礼物吧!”

她又一次抬起眼睛,以一种很不习惯的执意死死盯着我。

“你又开始抽太多的烟,我的孩子。你每天的烟头都能塞满两个烟灰缸。”

一种灵感突如其来地把我攫住。

“不要悲伤,妈妈,”我在她耳边说,“明天,在墓地,你将不会孤独一人。”

这一次,轮到她不寒而栗了。她后退一步,嘴唇颤抖地问我:

“不会孤独一人在墓地?你想要说什么?”

“是的,我将和你在一起,妈妈。”

“你决定陪我去墓地了,这还是第一次呢!”她惊呼道,尽管在她的嗓音中没有丝毫指责的味道。

每年,亡灵节[1]总是在我们之间引起一阵小小的争吵。我拒绝跟随

① 在西方,11月1日为万圣节,第二天即为亡灵节。

她前去韦拉诺的公墓，而她总是去那里漫步，以示对基多的怀念，因为她无法前往卡萨尔萨，给他的坟墓献花。

“再见，”她在门口喃喃道。她画了一个十字为我祝福。

“再见，妈妈！”

我一步就迈下了头三级台阶。她在关注些什么呢？只要我始终还是我左眼皮的主人，我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根本无须特别注意点什么，就像我当初在博盖塞别墅的二楼上对自己发的誓那样；假如现在由于年龄关系，我可以把自己等同于歌利亚，命运神却还没有指出，谁将是我的那个大卫；这一夜如同所有其他夜晚一样，没什么东西能阻止我，跟达尼罗一起吃完晚餐后，前往火车站广场一试我的运气。

53

我在圣罗伦佐教堂一侧的人行道上遇上了他，他跟他妻子正等着我。每个月一次，我们在那里下饭馆，吃一份面条菜和一份油炸茄子。从不吃肉：达尼罗拉我加入了反屠宰同盟军。餐馆老板，一个朋友——我们亲切地称呼他“甜瓜”[①]，因为他长得一身肥肉——那天晚上破例为我们开了店门。构成餐馆主要顾客的阿布鲁佐地区的民工，周末时都回山区老家了。无论是关门还是不关门，甜瓜从不拒绝为我们服务。这是罗马城里罕见的一个地方，你若是认识老板，你就可以让他为你打开铁帘门。一盘新鲜的牛至热气腾腾地放上了桌子，放在了盐瓶和胡椒瓶之间，这里是从来没有西红柿酱的。

阿娜玛利亚也一样，很喜欢这家风格简单淳朴的餐馆，不过达尼罗倒是更喜欢去一家真正的大菜馆。结婚后，她真是变了好多，自从她变形之后，我觉得她真是很可爱！再没有了建筑学院的课程，再没有了学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习，再没有了智力抱负。临产导致了让她重返童年时代的迷信这一奇迹。她出生在阿沃拉附近的帕基诺,那是一个盛产杏子的地方,她父亲就是从家乡带来了制作甜食小烤点的秘方，而她自己也毫无保留地听信西西里民间最荒唐、最有趣的传统。在她身上,繁衍着充满诗意的南方精神,要知道,那里的母亲们会在自己孩子的柳条小摇篮上方悬挂一把剪刀,让它把胆敢前来折磨孩子的恶魔一剪两断。阿娜玛利亚若是看见一条黑狗走过,便会踮起脚尖转一个圈;她散步时若是遇到一个戴圆锥形女帽的修女,回家后就会捏一把盐,从肩膀上向后撒去;她在餐室中总是保留着一套餐具,以备某位老祖宗从另一个世界返回,当一回不速之客。她遵守一系列礼仪,这些礼仪以它们表面的天真和内含的智慧让我欢欣。我责备达尼罗把它们当做孩子气来嘲笑。妈妈曾在我父亲死去的那张床上拆了一个口子,好让死者的灵魂从口子里飞出去,升上天空。这样的一些习惯,尽管在弗留利地区还有上了年纪的农家老婆婆在实践,而在整个意大利却将很快消亡。等到那不勒斯也一样被这无孔不入的传染病感染时，我最终还能躲避的庇护所，兴许就将只剩下西西里,还有最南端的地区。

那天晚上,阿娜玛利亚以她那卷在软帽中沉甸甸的黑亮发辫,她那从不敢轻易露在阳光下的白如积雪的胳膊、脖子和脸蛋,活像一个以其安详的侧面像装饰了从锡拉库萨废墟中挖出来的奖牌的古罗马妇人。她从一个年轻姑娘淡而无味的好动爱闹，毫无过渡地转向了一个母亲的稳重妥帖。关于这一点,我无疑并不那么痛苦,我看到,她待达尼罗更像是待一个儿子,而不是待一个情人。他们并不构成我感觉自己被从中排斥的一对。在他们身边,我总觉得自己融入了万物的永恒秩序之中,获得了我在宇宙和谐之中的地位。是的,阿娜玛利亚宁静的美丽、平和的稳重、更带动物性而非人性的自信,使我得以砍断把我跟往昔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缆绳。靠着她,我得以避免嫉妒、非难、良心的拷问、贫瘠的反思、盲目的绝望、愤怒的发作,从而清醒而又坚定地前进,走向我命运的最后那一段坎坷道路。(但愿没有人会想到,要在前后两个时刻之间确立起一种因果关系，前者是我跟这一对男女共同度过的甜中带苦的时刻，后者是夜里稍晚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任凭它们发生在我

身上。但愿人们别去寻求以心理学的理由来解释我一开始的热烈急切，以及随后的屈从温顺，这两者宣告了我的人性历史的结束。）

阿娜玛利亚请老板娘在水烧开时叫她一声。未来的产妇坚持要亲自下面条。根据面条会躺到锅底还是站立在水中，便可预知孩子的性别。这个神奇的古老方法是由帕基诺地方的老奶奶传下来的，一定要用葡萄蔓枝来烧火。

达尼罗瞧着她走向厨房，她的步伐已失去了优雅，却不乏高贵，每星期六的大扫除使地砖变得很滑溜，她不得不小心谨慎地慢步缓行。达尼罗微笑着耸了耸肩膀，然后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低下嗓音跟我说话，这时，身材魁梧的甜瓜胖胳膊轻轻一抖，就让铁帘门重新落了下来。

“我今天见到了贝纳尔多。”

我没有立即做出什么反应，被这一哗啦啦的金属声一下子带回到了少年时代的博洛尼亚。乔瓦娜、亨里科、玛提亚斯、达尼艾尔，长年来一直悄悄隐藏在我记忆中的这些人物，现在突然浮现了出来，而且一个个全那么鲜活，仿佛我昨天才刚刚离开他们，深夜里，我们一家酒吧一家酒吧地溜达，直到凌晨时分，最后被老板用挠钩的木柄顶着脊背，赶出门来。轰隆隆的帘门声在我们背后传来，将我们掷入黑夜的寂静中。街道两边，全是一排排黑黝黝的店门。我们等待一家家酒吧关门的回声沿着列柱廊传来，一直滚动到大街尽头，然后才继续迈步，从那里走开。一丝丝雾气飘浮在圆拱门下面。送牛奶的孩童，一边稳稳地蹬着自行车，一边吹着口哨，从一条近道中钻出，把一瓶牛奶放到搁在窗台上的篮筐里。我的那些书兴许什么都不会留下，欧弗拉特街的公寓也会转到另一个主人手里，他会换掉门牌上我的姓名，一切都将说出：但是，这些概括了我生命中最美好时刻的形象，这些转瞬即逝的印象，开向一个城堡院落的一道大门，两座房屋间一根绳子上摇曳不已的一盏灯笼，我们的气息碰到冷空气中形成的一缕哈气，我们眼前一根根柱子的逃逸，微微颤抖的黑洞洞小街中玫瑰色的反光，一对男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隐约可见的身影，那些声响，最终归于湮灭的脚步声、嗓音声、嘈杂声，一个晚归的漫步者嘴边戛然而止的一支歌，这些我本以为已经死去的瞬间，突然又复活了，带着那种不变的激情力量，所有这一切，足以证明

我在大地上曾经生存过的这半个世纪。

达尼罗不得不重复了他的句子。

“贝纳尔多……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你在做梦吧？”

“啊！”我说，依然很气恼我被自己早先的学生如此放肆无礼地对待，而我在开始从事电影事业的英勇时代，对他始终充满了信心。

事情要追溯到上一年夏天。那时候我在曼托瓦拍摄将成为我遗作的电影，而他则在帕尔马执导他的《1900》：一部巨片，《巴黎最后的探戈》赢得意外成功后，他得到了美国人的投资。九个月以来，他就一直在他的那些布景上趾高气扬，他想要的金钱和时间全都到了手，而我的制片人只给了我一笔很小气的预算，而且只有两个月期限。贝纳尔多是不是忘记了他在特拉斯特维尔区的那些课了？当初他默默无闻，籍籍无名，我不是选择了他作为助手，帮我拍第一部电影吗？忘恩负义，高傲自大！他根本就没有屈尊一下，连一次都没有，来曼托瓦看望我一下，要知道，他离我们那里只有短短的六十公里路！还有那场足球赛的苦涩回忆。我向他的摄制组发起了挑战。我们兴许是更穷，不得不自己想办法筹措资金，但是从体质上和男性精力上来说，我们都将给他们，给这些城里人狠狠地来一下子，他们像是空降兵，坐着豪华大轿车从罗马空投到那里，还说是要去了解艾米利亚平原上的农家生活，要去探索乡村的灵魂。我带上十几个强壮的小伙子，租了一辆大轿车，来到了帕尔马，他们都是我摄制组里的电工和布景工。作为护身符，我们穿上了带有博洛尼亚足球队徽标的球衣。好家伙！结果竟然是一场溃败，零比四：对我来说，我对钟楼的爱国感情和我的体育自豪感受到了双重重创，一次真正的屈辱。随后，我还得在贝纳尔多略带高傲的笑脸相陪下，参观了一片玉米田，他让人在玉米田里修了一段铁路线，准备在里头拍一个大约三十秒钟的美国背景的镜头；我根本就没觉得自己有权批评这一唯美主义的任意挥霍，因为足球赛带来的头脑混乱，早就让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具有自然优势的神话彻底破灭了。新的耻辱，只是由于贝纳尔多犯了一个大错误，才让我恰好避免了再次受辱。我寻思着如何向他说明，罗马的知识分子恐怕永远都不会成功地联想到，在一幅著名的壁画中，会有意大利农村的历史，而我竟然

亲眼看到他导演出了何等奇怪的场面啊？一个农民骑在了一头母牛上！只是为了以一个所谓的惊人形象，来显示1945年时村里人对被抓住的卖国贼的做法，让他们饱受众人的嘲笑。“可是，一头母牛的脊椎骨根本就受不了一个男人的重量！”我惊呼道，与此同时，贝纳尔多正无谓地催促着他的演员执行这样一道不切实际的命令。于是，我很高兴以一种突然袭击，一下子重新回顾了那场零比四的不幸球赛，总结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农民，会以任何一种政治理由，让一头母牛遭受一种如此的折磨。”

那天的事情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贝纳尔多的面。

“怎么呢？”我对达尼罗说，他在犹豫着要不要开口。

“你知道，他去看了你影片的一次私下放映。他向你表示了祝贺。只不过，他补充说，请告诉皮埃尔·保罗，那个女逃亡者被杀死在树底下的那棵开满了花的树，并不像解释者所说的是英国山楂树。请把我的话带给他，嗯？对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农民，会以任何一种政治理由，把一棵樱桃树叫做山楂树。”

“一棵樱桃树？”我嘟囔道。

“你当初把他损得够戗，惹得他反过来也拿你的话来对付你！”达尼罗高声嚷嚷道，哈哈大笑起来，一点儿都没有发觉我的尴尬。

“达尼罗，”我说，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

看到我脸色惨白，他这才闭了嘴。

“皮埃尔·保罗！你当然不能因为混淆了两种树木就这样遭人踩损吧！你离开弗留利已经太久太久了！”

好愚蠢的反应，对一个毫不重要的差错：但是，我感到自己受了轻视，这就好像当年我在卡萨尔萨写的最初那些诗歌中的方言，被人说成只不过是人造的民间文学，是毫无价值的赝品。这么说来，我所谓的农民之根，是一种幻象了？我童年时代的天堂，是一种海市蜃楼了？那个救赎性的伊甸园的神话，是一种欺瞒了？我跟我国的那些小资产阶级大众又有什么区别，假如我还跟他们一起分享他们对大自然基本知识的无知，还有他们对植物学基本原理的蔑视？

阿娜玛利亚出现在了厨房门口。

"怎么样？"达尼罗冲她嚷道。

"面条站住了，会是一个男孩子！"

她框定在了门中央，显现出一种丰满而又宁静的威严。

"这个男孩将叫什么？"我问他，"你已经在气泡中读到了他的名字吗？"

她的回答令我措手不及。

"我们决定叫他皮埃尔·保罗。"

"皮埃尔·保罗？"我结结巴巴地说。

达尼罗瞥了我一眼。

"是阿娜玛利亚想取这个名字的，"他说，突然担心这样一个选择在我看来会显得唐突。

"不，"我宣称，"不应该叫他这个名字！"

他们目瞪口呆地瞧着我。

"你可不能……你可不能……"

阿娜玛利亚走近桌子。

"这么说，你不想当他的教父了？"她很天真地问我道。

"不是因为这个，不……"

"皮埃尔·保罗！"达尼罗嚷了起来，带着他那慷慨天性中的全部冲动，"我可从来就没有想象过……"

但是，他顿时就住了嘴，脸红起来，面对正倾听着我们的阿娜玛利亚。当着她的面，我们还从未回顾过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达尼罗只满足于用一些含糊其辞的话语补充了几句，含糊中却又明显透着一种遗憾，后悔他在不经意中重又揭开了一道他以为我早已痊愈了的伤疤。

"当然，假如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他一字一顿地说，"这个名字让你觉得不开心，我们也是可以改的，不是吗，阿娜玛利亚？"

我摇了摇头。假如他认为，对只有一个皮埃尔·保罗存于他心中的那段时光的回忆还会继续折磨我，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这段往昔已不再能打击我了。

"不，不，"我强作微笑地说，"我答应过做他的教父，我一定说到做

到。但我并不曾想你们会叫他这个名字。一个愚蠢的想法穿过我的脑子……请原谅我……那实在太傻了！”

两个人谁都不敢问我。达尼罗为了不至于显得无所事事，便把邻桌上的佐料瓶拿了过来。他继续在那里瞎忙碌，一会儿把灰皮诺葡萄酒瓶的标签转向我这边，那是我们的主人对卡萨尔萨葡萄园的怀念，一会儿把椅子往餐具跟前推，一会儿又调整盘子的位置，一直到阿娜玛利亚叫他去厨房，为我倒一杯格拉巴烈酒[1]。

“他脸色苍白，”她说，“他应该很不舒服。”

“你，你会明白我的，”当我们只剩下两个人彼此相对时，我对她说，“我总是很迷信。你最近是不是梦见过我死了？”

她惊呼起来：

“皮埃尔·保罗，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在我童年时，我们那里的人为即将诞生的孩子起名，从来不会选一个活人的名字。弗留利的农民相信，大地上活人的数量都是严格有限的。一个新生儿要来到这世上，不仅要拥有一个名字，而且还要拥有他继承了这一名字的人的血肉之躯。因此，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在年历表的圣徒中选一个名字，而他们无论是在亲戚朋友中，还是在街坊邻居中，都不认识任何一个叫这名字的人。‘每个新生儿都是一个陌生的死者。’你喜欢这一条谚语吗？”

“但是，在西西里，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当我们想祝福某个人时，我们认为，他会通过他所继承的名字，来继承叫这名字的人身上让我们欢欣的所有品质。‘尊敬你的父亲和母亲，但是模仿你的教父。’这便是我们老家的谚语，我们的。”

“啊！我更喜欢这个！”我说着，笑了起来，“我的那种预感真叫荒唐！”

“并不奇怪，”她说着，从高高地鼓起在她肚子上的衣裙中，拿出了一块还折叠着的干净手绢，“明天就是亡灵节了，所有人都准备去墓地扫墓呢。你也一样吧，你也有什么人在一个坟墓中等着你吧？”

---

① 格拉巴是一种用葡萄酿成的烈酒。

“是的，”我说。

我回想起了我在一个钟头前对妈妈的承诺。只是在说了这一声“是的”之后，我才觉得，阿娜玛利亚的问题提得实在有些怪，而且含有某种隐约的影射，它不由得令我不寒而栗。但是，我不愿意让这个年轻女郎进一步担心，她那只善于抚慰的手，在我额头上敷了一块用瓶子里的凉水弄湿的敷料。我又抬起头来，以一丝微笑谢过了她。

“耶稣！”她替正拿来一杯格拉巴酒的达尼罗喊道，他还以为我们是在向他宣告他的死亡呢！

54

闪耀着金属光泽的阿尔法罗密欧 2000 GT，吸引了停留在列柱廊下的一小群人。没有一人让我喜欢。我让他们统统散去，并打算重新出发，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他，另一个，漫不经心地靠在柱子上，叉着胳膊，手指头捏着钥匙圈。他是唯一一个对我开车来到不屑一顾的人。一丝嘲讽的微笑飘浮在他的嘴唇上。他茫然凝望，一双凸出的眼睛更加重了神态的傲慢。我当时应该是趴在车门上召唤他来的。

“你想跟我一起兜上一圈吗？然后你会得到一件礼物。”

“何乐而不为呢？”他回答道，上了车。

往后视镜里瞥了一眼：一切都合规矩。我驶上了民族街。他继续玩着他的钥匙。他那条紧绷着胯部的长裤没有兜。

“你的裤子难道连一个兜都没有吗？”

“只有一个在后面。”

“你叫什么？”

“皮诺，人称大伙儿都管我叫青蛙[1]皮诺。”

---

① “青蛙”的原文为意大利语。以下同。

“青蛙？为什么叫这个？”

“跟我的眼珠有关，”他回答得很简洁。

青蛙皮诺！我父亲当年情绪好的时候就是这样叫我的。这天晚上，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父亲。我已经有许多年没那样了。青蛙！由于加尔瓦尼[①]。博洛尼亚，我上学的中学，“钢铁之书”的竞赛……为什么今晚上少年时代的记忆滚滚而来，滑稽与忧伤共存，可笑与悲痛同现，如同一部毫无整体风格的电影？托斯卡尼尼在剧院门口挨人耳光……齐亚诺在山岭上狼吞虎咽地吃黄绿色的猪头肉[②]……在玛格丽塔公园，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转告我们，苏联遭到了入侵……为什么这些形象飞也似的从我的脑海里一一闪过？现在出现的，是献给圣多明我的大教堂，祭坛两侧，分别有两个大理石雕的天使：一个是六翼天使，紧紧抱着大烛台，一脸纯洁的神情，严肃地沉思着，仿佛这一刻他正从天上下凡，躲避到一片阴暗之中；而另一位，矮矮壮壮，肌肉发达，从大地上诞生，准备一跃而起，要松开手中的烛架饰，想当年，我曾宣称过，我更喜欢他那粗糙的、咄咄逼人的鲁莽，因而背离了他那金发同行的恩宠，尽管后者更漂亮，但他太像那个少年斯温了，而整整三十五年[③]之后，兴许就在这天晚上，他松手扔下了他的烛台，跑到火车站来找我了，上了我的汽车，最终响应了我的召唤。他振翅一飞，就飞到了罗马，根本就没有让风吹乱他那墨一般黑的一小团卷卷的柔毛。

我伸出一只手，想碰一下他的大腿。这动作，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允许自己做过。但是，今天，一切不都是新的吗？我害怕正面去瞧我的邻座，我丢失了惯常的自信，腼腆得像个新手，我简直都不认识我自己了。还没等我们之间再交换几句对话，他就已经把我控制在了手心中。我很卑贱地伸出手去，活像一个奴隶想在主子面前表明自己的存在。

他却把这个屈从的动作看成一种试探性的抚摩，便以一种平庸的语调嘟囔了一声：

---

① 见前文，主人公在博洛尼亚的加尔瓦尼中学上学，而科学家加尔瓦尼曾有解剖青蛙的著名故事。

② 见前文第一部分第六章中的叙述。

③ 原文如此，应该是二十五年，见后文。

“放下你的爪子！”

这一分钟里，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沿着古竞技场行驶，在我脑子里，对那一个个隐蔽在黑暗中的大圆拱的回忆，跟这一启示性时刻结合在一起——我似乎又一次看到，卡拉瓦乔的那幅画在我眼前立起。我明白了我二十五年以来所犯的错误。那只失神的眼睛，那只眼皮耷拉的眼睛，只有在画布上才是左眼。我把歌利亚的右眼当做他的左眼了。二十五年期间，我始终注意着我的左眼，并通过这一预防措施，确信自己能从历险活动中平安归来，而丝毫不曾猜想，我带回的是一个失效了的护身符，还浑然不觉地把它当做免除处罚的保障。这时，我又想起了今天早上妈妈给我的警告：“你的眼皮垂落了，这是一个兆头”，还有她朝我的右眼做的那个动作。我挪动了一下后视镜，想再看我自己一眼。汽车突然朝一侧偏过去，皮诺又嘟囔了一句。“哎！你要是想把窗玻璃撞碎，还是另选个日子吧！”这句话从不怎么饶舌的嘴里出来，显然就已够丰满了，但我已经不再有心思微笑了。右眼，右眼松开了我！右眼的眼皮耷拉下来了！最奇怪的是，我不但没有掉头回城，把皮诺带回五百人广场，反而踩大了油门。车灯为我们在黑暗的中央劈开了道路。快点！再快点！我急不可耐地要把最后那些闪耀一丝光芒的房屋统统留在身后。我整个的生命不是已经趋向于这样一个时刻吗，一个带着谜一般残忍微笑的大卫随心所欲地掌控了我？

“我们去你家吗？”当我们经过金字塔的脚下准备拐上海滨路的时候，他问我。

“不。”

“可是，这一带已经没有旅馆了！”他惊呼道。

“我们也不是要去旅馆。”

“不对吧！我的老兄，你可别太来劲啊。坐你的车已经冷得够呛了，今天这日子，可不作兴在荒郊野外露天干呢。”

“别操心了，皮诺。我给你两万里拉就是了，行吗？”

他安静了，把他那串钥匙放在车子的小台上，开始玩弄起他的戒指来，那是一个很原始的黄铜戒指，点缀了一大块红宝石，我看到，在那块

宝石上，在圣保罗的徽章前，镌刻了这样几个字："美国军"[①]。

"是一个美国兵送的礼物吧？"我问他。

"不是，你莫不是把我当做了一个付裸翘？"

"我可没这么说，"我匆匆道，在我那份拼命讨好他的殷勤劲里，分明透着一种卑贱，相比之下，他那种雄浑刚强的抗议，却并不怎么软弱。我怕他会打开车门下去，把我一个人甩下，尽管他始终舒舒服服地粘在他的座位上，除了那几句话，也并没有向我发出任何试图证明其名誉的信号。

海滨大道伸展在我家窗前不远处。我能看到妈妈的身影映在窗帘上，她正守候着我的回归。就目前的季节来说，今天夜里并不算太冷。只是有些下雨，一种钻人骨缝的潮湿。但是，无论温和还是严寒，毕竟是一个万圣节之夜。温度计上的汞柱不会超过十二度，而我，我并没有走上我舒适整洁、暖暖和和的公寓，把皮诺和我一起关进那三个卧室中的一个，反而像一个歹徒那样，行驶在黑夜与寒风中。五十三岁了，性对我始终是一件秘密而又羞耻的事，我继续把它跟家庭、居家生活、母亲截然分开，我寻求快乐的卧睡之处不会是妈妈前来唤醒我的那张床。另外，当我回想起皮诺的那一声惊呼时，我在心中承认，无论是按钟点结账还是按月包租的房子，在罗马都不缺少。而皮诺，他现在用一个小小的煤气打火机点燃了一支万宝路香烟。假如我并不想去欧弗拉特街，为什么我就没有转弯去找一个旅馆，要一个房间？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想过，用我所挣的几百万里拉，去租或者买一个单套间？为什么要逃离罗马，去选择依德罗斯卡罗的硬土地面和烂泥？我难道就只能在跟社会底层的贫穷者和受凌辱者的某种理想的吻合中做爱吗，远离资产阶级居住区，远离我曾居住的宽敞公寓？

两个矛盾归并成了一个，我带着一种失败者的苦涩情感，在心中暗说。如果说，我在一个阴雨绵绵的 11 月 1 日之夜，需要把皮诺带到一片荒凉而又肮脏的空地，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成功地把我所有的那些生活都协调到一种唯一的饱满的生活之中。对我来说，爱始终是某件我必须

① 原文为英语。

到别处去做的事，到城乡结合处的垃圾场上，隐姓匿名，摆脱掉我既为人子又为文化人的双重身份。五十三岁了！这就让我很乐意把我的脑袋留在刽子手的手中，即便他还赶不上我这年轻旅伴的一半漂亮。

然而，为了掩饰我的难堪，同时也出于职业习惯，我试图让他开口说说他自己。他三言两语地回答了一个大概。我终于得知，他刚满十七岁，跟他父母一起住在塞泰维尔镇的蒂布尔提那街，他是从塞泰维尔坐半个小时的209路公共汽车来到火车站的。他父亲在阿雷努拉街的一家灯具店做推销商，姐姐在一家斯塔尔连锁肉食店当售货员，母亲做半工帮佣。（这一细节让我感动，让我回想起我来罗马后不久的事，那时，妈妈不得不去别人家打扫卫生、洗洗涮涮。）

"那你呢？"

他曾经试着在古竞技场附近的一家修车行里工作，然后又在加尔巴泰拉一个面包师叔叔那里当学徒。因一次偷窃汽车，在卡萨尔-布鲁齐亚托关了八天监牢。11月3日星期一，他将进入一家熟肉店当助手。晚上他总是看电视，没什么朋友来往。他在一个两用的柜床上睡觉，白天就把它叠起来靠在客厅墙上，当书柜用。

"在那个书柜中，都有一些什么书呢？"

金属狂啸[1]，苏基亚[2]，焦尼·罗康[3]，泰克[4]，米老鼠[5]，全套的《提拉莫拉》[6]和《小家伙的信使》[7]。

"假如我家老太婆忘了给我买杂志，那她就得给我当心了！"

在他断断续续、嘟嘟囔囔讲述的故事中，这是短暂而又唯一的激动时刻。我是不是瞎了眼，把这个根本就不会微笑的作弊者跟我以前的那些小子[8]混为一谈了？他在产生波尔加特的地方长大，离皮耶特拉拉塔

① 法国的一种科幻漫画杂志。
② 意大利的一种成人系列漫画，以"吸血鬼"为题。
③ 可能也是一种意大利漫画杂志。
④ 泰克是一个漫画牛仔人物，关于他的一系列历险故事的漫画都由意大利出版。
⑤ 这里用的是米老鼠的意大利名字 Topolino。
⑥ 《提拉莫拉》是意大利的一种儿童漫画杂志。
⑦ 《小家伙的信使》是意大利的一种少年漫画杂志。
⑧ 原文为意大利语。

和玛莫罗桥都不太远，但是枯燥无味，高傲自大，毫不欢乐，以他的柜子床为荣，以他未来的熟肉店老板为耻，既因为在学校里学了一些基本知识而虚荣，又因为自己在一种下等职业中的无知而恼怒，被他漫画书中和电视屏幕中那些主人公提供的不可企及的榜样所腐蚀，无可救药。

看到我从放手套用的盒子里拿出了一包纸巾准备擤鼻涕，他在黑暗中弄错了我的用意。

“别指望我会来个 bomba，嗯？”

“bomba？”

他不无犹疑地给我解释了这一大杂烩的秘密：嚼一种压缩成药片状并混杂了玻璃粉末的烟草。玻璃粉末会在舌头上和口腔中形成细小的创伤。

“你细细地嚼，细细地嚼，就这样，尼古丁便会进入你的血液，你的心脏就会激动起来。这么说吧，即便是一个枪膛里什么都没有的家伙，男人们也会跪倒在地，向他求饶。教给我这一招的阿纳尔多对我说过：‘嚼吧，你会觉得自己有雷霆万钧的威力。当我嚼的时候，’反正他是这样对我说的，‘卡萨诺瓦本人都不再是我的表兄弟了’。谢谢了！你知道他们留给那些付裸翘的最后发明是些什么吗？”

“跟我说说吧。”

“一个指环，好让自己胀起来。”

“真的吗！鸡鸡套环[①]。那可是从美国来的。”

“不管是从美国来的，还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反正对哥儿们挺管用。”

说到这里，他神态顿时一变，趾高气扬起来，这让他在我眼里显得颇有些可恨。我想再试探他一下。

“你常常去……我找到你的那家酒吧吗？”

“也就那么回事吧……我可不是一个常客。老爸每天只给我一千里拉。一天只开销一千里拉，这我可做不到。你可别把我当做我不是的那种人，这一点清楚了吗，嗯？”他以威胁的口吻补充了一句，“证明就是，

① 原文为英语。

我从来不会胳膊撑在柜台上,点半升金啤酒喝。"

"半升金啤酒吗?哦,对了!这是暗号。"

"我,对啤酒,我简直讨厌透了。"

"但是,你却跟上了我?你知道现在都几点钟了,还要上一个陌生人的车子走?"

"这有什么呢?这根本就说明不了什么!走这里,走那里,我可不说这话,但这根本就说明不了什么。你生来就是付裸翘,就像黑人或者犹太人,生来就不变,"他带着轻蔑总结道。

一个河湾处,一家渔家餐馆在黑暗中显出轮廓,窗户中依然还透着灯光,金色台伯,我曾经经常去那里吃比萨饼,有时跟尼莱托,有时跟艾尔莎和桑德罗。

"停车,"皮诺突然说,"我饿了。"

我把车子停在过了餐馆有一百米的地方,在路旁的黑暗中。皮诺一边蹒跚地走在鹅卵石地面上,一边嘴里还骂骂咧咧。店老板,一个老朋友,快乐地向我们宣告,他还剩下半只鸡,足以马马虎虎地招待我们了。

"你们实在走运,再过五分钟,我就要关门了。"

"你给我来一杯啤酒,"我对他说,"我已经吃过晚饭了。要喝啤酒!"我特意补充道,希望以此给我们的面对面谈话增添一点笑料。

但是,皮诺一脸阴沉,一门心思欣赏自己的戒指,然后,等他的菜一上桌,就把鼻子埋在盘子里,静悄悄地狼吞虎咽起来。

"菜怎么样,还好吃吗?"我问道。

"不是味道,"他回答道,耸了耸肩膀。

"你不喜欢鸡肉?"

他斜眼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一出来,就根本不喜欢吃别的东西。这里没有龙虾吗?"

"你吃过龙虾吗?"

"倒是并不那么好吃,但龙虾终究是龙虾,"他宣称道,这时,他已经吃完了一条皮焦里嫩、多汁美味的鸡腿。尽管他对金色台伯餐馆可怜的烹调手艺不以为然,却痛快淋漓地把盘中的菜打扫了一半。

老板端来了一大罐红葡萄酒,然后又回厨房去了。此后便没有人参

与我们的面对面谈话。皮诺向他剩余的半份菜发起了进攻,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吸引我关注的目光。当然,并不是以我平时挑群众演员时电影家的冷静眼光,那时,我的眼睛总是随便乱扫,因为,眼睛要是老不转的话,就会特别不舒服。

“你怎么老是这么斜眼瞅我？当心点,嗯！”

“没什么,皮诺。我在问自己,我能让你在我的下一部电影中扮演什么角色。”

他的表情顿时温和了许多,第一次冲我微微一笑。

“我认出你来了,你知道。你每天都来火车站的。”

“可是你,我想,你倒是很少去的！”

发现自己话里露了破绽,他便把半个鸡翅赶紧塞进嘴里,以免不得不马上回答。

“电影嘛,我是很喜欢的,”他接着说,口气尽量装得自然大方。

“好极了。你对我说了,你曾经偷过一辆车子？”

他惊叫了一声,手中的鸡骨头掉了下来。

“那是我兄弟逼着我干的。我可不是一个小偷。”

“哎！喝一口吧,”我对他说,“别生气！”

“不,我也不是一个酒鬼。”

他一把夺走了那个大罐,还有我替他倒满的那杯酒,站起来,打开大门,把酒一滴不漏地倒在门槛前的砾石地上。这一确切的行为,把各种曾经流传的传闻化为了乌有:要知道,人们后来根据餐馆老板的证言进行过计算,一升阿尔卑斯山区出产的十三度好酒,能在一个十七岁少年的血液中产生多大功能。

他返回桌子前,开始啃鸡腿,同时还没忘了用一满杯凉水不无炫耀地淋浇他的喉咙。

“你明白,我要求每个演员在我电影中做他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对小偷,我会让他扮演小偷角色……”

“原来如此！”他说,很遗憾没能太快回答我。

“对拉皮条的,我会要求他扮演拉皮条的角色……但是你,”我狡猾地补充说,“假如你没有什么特长的话……”

“我，实际上……”他结结巴巴地说，上了我的圈套。

但是，当他低下了眼睛，陷入沉思默想的状态时，他容貌中粗线条的美就平添了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温柔和神秘，就仿佛我在博洛尼亚见识的那两个天使[1]，粗犷的那个和阴柔的那个，平民化的那个和上品的那个，世俗的那个和天堂的那个，在他身上融为一体，一种可怕的启示直接击中了我的心。他想要一个角色吗？他拒绝扮演小偷或皮条客的角色吗？他期待一种更高贵、更显要的职业吗？好啊！我们还需要更长时间寻找什么呢？这角色分明就摆在眼前，跟他吻合得简直天衣无缝。他微微突出的下巴上，他贪婪的宽嘴巴上，他那如同盘算着计策的阴谋家的瞰凸眼睛上，他那胸脯依然瘦窄却已经显出强壮的外表上，他那生来就为抓握的厚实双手上，我读出了那些必然的安排。一切都明显地表示，这个小伙子要扮演我生命中依然还缺少的那个人物。驱使我走向五百人广场列柱廊底下的他的同一种本能悄悄告诉我，把他推上舞台的时刻已经来临。没有任何利剑闪耀在他的手腕上；他穿的不是荒漠修士的长袍，而是郊区少年的短上衣；但是，凭着他遥远的目光，他紧闭的嘴唇，他蔑视一切的表情，他小小的充血的玫瑰色耳朵，怎么可能认不出他来呢？

“我们走吧，”我喃喃道，急于进入戏剧的最后一幕，看一看两个演员是如何从结局中摆脱出来。当我们来到汽车旁时，餐馆的灯火也熄灭了，四周陷入了一片越发浓重的黑暗中，突如其来的灵感令我不得不屈从，让我们在路上延缓了好一会儿。我不由得跪倒在皮诺跟前，脸一直贴到地面，一连亲吻了好几下土地。一种强烈的怜悯感让我拜倒在那样一个人脚前，他因为一个并非故意的行为，将长年被剥夺自由，并被钉上耻辱之柱，直到世代之末。自从我童年时代的遥远日子起，我就再也没有祈求过上帝，但是这一次，一串串话语自动流淌到我的嘴边，恳求他同情一个无辜的人，一个即将不由自主地做出某个行为的人。“主啊，请宽恕他，帮助他承受诉讼与监牢的考验，让宽容的精神启迪他的法官们吧。假如你不能阻止司法的错误，那么，至少也请你减少他受惩的时

① 见上文第一部第十一章中的描写。

间吧。”我又抬起脑袋，深深喘上几口气，然后又低下头。我的额头连连磕着地面，但愿老天有眼，让主持正义的主从罪人的行为中认出他的面目。

这时，皮诺早已冷得不耐烦了。他根本就不明白我在他脚下做什么，便俯下身子，点燃了打火机。“原来在这里！”我叫嚷起来，假装从地上捡起了钥匙，而实际上，这串钥匙，我始终就握在手心中。兴许，他根本就没有相信我的话，而是在想，他算是遇上了一个有恶癖的或者精神错乱的顾客。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中，他对我表现出的不断增长的敌意，还有在关键时刻他的反应的强烈程度，都可以由这最初的误解来解释。我那由最纯洁的慈悲启迪的静默的哑剧动作，如同一个邪淫狂或恋物癖的标志吓住了他。

一路上，他不断地抽烟，神经质地使劲吸他的烟卷，但刚刚点燃不久，又从车窗中扔出去。奥斯蒂亚的最后几排房屋消失在了我背后。汽车开始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车轮让一束束泥水飞溅起来。我根据圣米盖雷塔又黑又方的高大影子辨别着方向。在车灯的微光中，依德罗斯卡罗显得越发凄凉荒芜了。那些细节，在黑夜中被突然照亮，像是电影特写镜头，从白天时混沌一团的灰暗中摆脱。一些塑料袋，像灯箱招牌那样挂在铁丝网上，在黑黝黝的拐弯处闪闪发亮。一些刺眼的颜色，我早先来时从未注意过，为眼前微不足道的景色增添了几丝亮色。在一些木牌子上，写着简陋房屋的名称，石灰涂出的字母字体十分粗犷。大牧场，憩园，小矮人别墅。一幅消失殆尽的波尔加特的漫画。皮诺僵僵地坐在车里，心不在焉，什么都不看。好奇心的这种缺乏，以前发生在一个小青年身上时总让我毛骨悚然，目前在我看来却是一个不错的信号，表明恩宠正在眷顾我的同伴。我差点儿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一棵人造的针叶松圣诞树上，它作为一处庭院中的装饰，留在那里已快一年了。“可是，为什么要嘲笑那些人呢？”我心里说，被皮诺的沉默打动。今天晚上，他比我更清楚地明白，我们已经离开了人类世界。我们眼前和周围的黑暗中展开的一片荒原，已经不再属于罗马郊区，也不再属于任何活人的群体。是什么样的维苏威火山用一场熔岩和灰烬之雨把它给一口吞噬？各各他是不是要更荒芜，更枯燥？假如这片河滩得到开发和建设，居民们恐怕也会被一种天外灾祸驱赶着逃走。荒凉重新笼罩了它的领土。我

自己也随之被这一地方的荒芜、苍凉以及异乎寻常的威严所攫住。当不仅罗马从地球的表面消失，而且整个大地也陷入毁灭中时，那时候，依然存在的便只有大自然的彻底寂静和凝止了。在死亡的胜利以及虚无对万物的净化之后，恒星的最终寂静横亘于宇宙的四方。

我认出了我曾经跟达尼罗一起来过的足球场。我把汽车停在稍远处，紧靠着一排漆成了玫瑰色的木桩栏。我们周围，海风吹起了肮脏的纸片，飞扬一阵后又落到水坑中。

下车前，我半转过身子，一言不发地伸出了手指头。他微微点了点头，对我的恳求表示同意，稳稳坐在后排，听凭我的安排。我实际上并不希望他那么迅速、那么光荣地准备就绪。我以一个更多地体现了奴颜婢膝而不是放荡不羁的动作，俯身朝向他，夸奖了几句他的美貌，而他则以一种偶像般的无动于衷，接受了我的赞美。

“我们下去透透气，好吗？”

我还不知道我会要求他什么。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把鞋子踩到淤泥中去。

他清新如故，仿佛阿尔法罗密欧的车座并没有被我们用做密室，他发现了一个空的橘子水瓶子，便开始把它盘带到两道车辙之间。我跟在他后面跑，在足球场的入口赶上了他。我从背后贴紧了他，用我的身体把他裹住，我双手抓住他的皮带扣子，在他的耳边说：

“现在，你来当女人。”

他活泼得如同水银滚动，猛一转身，朝我的鼻子就给了狠狠的一击。我撩起我的衬衣，去擦血流如注的脸。就在这时，皮诺已经回到了汽车旁，因一拳就把我打成这副模样不免有点怯场。他没猜到，其实，我正相反，隐隐约约地感到一种内心的轻松，就仿佛他刚刚解除了我最后的一丝疑虑。任何服务都无法如此确实地为他带来他担心丢失的那两万里拉。“喏！”我一边大声嚷嚷，一边从我裤子兜里抽出两张钞票，远远地就在手里摇着，生怕他就此溜之大吉。我慢慢地走近过去，然后——礼仪应该得到遵守，尽管我想尽快彻底地屈从于他的法令——由于我正沿着栅栏走着，我便扑到一根木桩上，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一下子拔了出来。

“皮诺，”我说，“快，摘下你的戒指，放到汽车旁的地上去。”

他被我的要求惊呆，但勉强缓过了劲来，便不加争辩地服从了，一只眼睛始终盯住我手中的木桩。他从手指头上摘下戒指，同时咒骂着，然后蹲下身子，在公路的砾石中间，为这戒指找到了一个稳妥的地方，很显眼的一个地方，以便此后能毫无困难地找到它。几个小时后，当警察在一条禁止行驶的道路上把正驾着我汽车的他堵住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抱怨自己把那枚戒指弄丢了，而警察们的结论却是，他是故意把它扔掉的，把它跟那盒万宝路香烟以及煤气打火机一起扔掉，为的是消除犯罪证据。实际上，他是听了我的命令后才摘下的它。无论这戒指多么粗糙，它那闪耀着红色磷光的宝石，都不会不让我联想起镶嵌在那些巴罗克风格教堂大理石祭坛上的某颗昂贵的宝石。我需要在那里看到它，在我们之间，在昏暗中闪着微光，在潮湿的地面上更显生动，这一不可或缺的钻石，它见证了刚刚开始的牺牲的最后阶段。

“皮诺，”我又说，“如果你乖乖同意做我要你做的事，我会另外送你一枚戒指，上面要嵌一颗真正的红宝石。”

他并没有反驳我怪诞的承诺，而是转过身去思考。我连忙冲向他，手里还握着木桩。他害怕了，或者假装害怕，试图逃走，却滑进了淤泥中，摔了一个大马趴。我就势扑到他身上，他叫嚷道：“啊！付裸翘，你又来啦！”说着，猛一挺身，把我甩到了旁边，接着，他起身跪在地上，夺过我手中的木桩，把它高高举过了脑袋。

对我这个得过空手道锦标的人来说，要抱住他的腿，把他摁倒在地上，实在是小菜一碟，易如反掌。但我放弃了搏斗，仰面躺着，下腹上挨了第一下。他像握一根棍子似的捏着他的武器，用大头使劲打我。一种愤怒攫住了他。他的脸放射出一种可怕的美。他扔掉了木桩，捡起了一块木板，狠狠地砸在我的脑袋上，木板砸得粉碎。然后，他站起来，用脚使劲踩我的胸廓。本能地，我伸开了胳膊，形成一个十字状。我大睁着眼睛，瞧着他。这道哑默而又谄媚的目光让他的愤怒激增到极端。是的，我想他确实是猛扑上来，迫使我闭上眼睛，只有当他最终不再感觉我寂静的赞赏这一咄咄逼人的重负压在他身上时，他才肯放过我。他可能一再出手，打了又打：即便已经死去，我恐怕还在继续崇敬我的拯救者。

当我确确实实死去，在他眼中成了可怕的一具尸体，面目全非，污秽不堪，我那闪亮瞳人的光辉死死地凝定在了这一脏污的中央。从我半张半阖的嘴唇中，他有没有听见赞美之歌一直在飘向九重云霄？我最秘密的愿望刚刚得到了实现。我已经把我的生命交给了最不配接受它的那双手，我在彼得和保罗之间维持了一种耻辱结局的平衡，我成为一个嘴上无毛的半大小子杀人热情的血腥玩具，我不仅补赎了我的错，还补赎了人类的错。艺术家同样也可说是获得了拯救。在我的任何一本书中，任何一部电影中，我都没有在如此高度上表现出我的抱负。但是现在，我可以平静地走了，因为我已经从每一个细节上构建好了我的葬礼，我已经签署了我唯一一部能确保流芳百世不被遗忘的作品。

附录：

当代法国的同性恋文学

余中先

悠久的传统

在文学史中，写同性恋题材的作品从古到今有不少。纯意义上的同性恋文学，似乎可以界定为专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作品，以同性恋者为主要阅读对象，作者或多或少地带有同性恋倾向，而不仅仅只是作品中带一些同性恋情节的叙述，或者同性恋者思想、情感、行为的描写。如果这样，同性恋文学的面就相当窄，且只能包括专以同性恋性倾向、性经历的描述为内容的作品了。有鉴于此，我们在此不妨把同性恋文学的范围扩大一些，只要以同性恋现象为主题的，或者基本情节为同性恋行为的，都可包括在同性恋文学的范畴中。

法国的同性恋文学，其起源直接来自古希腊的同性恋传统（荷马史诗中“阿西勒和帕特洛克罗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作品），当然，在《圣经》中，也可以找到它的另一类起源（如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圣保罗）。在中世纪，则有一些修道院诗歌，歌颂同性间的友谊和情爱。十五世纪诗人弗·维庸留下的《同性恋诗歌》也是这方面的文献。

至于女子同性恋文学,从公元前七世纪的希腊女诗人萨福起,其源流就一直不断,法国十六世纪的路易丝·拉贝,十九世纪的乔治·桑,二十世纪的科莱特、尤瑟纳尔,都可包括在其中。

长期受歧视

由于长期受社会的鄙视,同性恋文学的命运坎坷不平。保尔·魏尔伦写给兰波的信,甚至被兰波的母亲所毁;马克·阿雷格莱给纪德的信,也被纪德的妻子所毁,纪德的作品《科里东》出版时(1924),曾引起轩然大波。亨利·德·蒙泰朗一生都有同性恋倾向,尽管他可以在街上追逐少年,但他不敢在自己作品中公开表露,只能把同性恋倾向写在笔记中。后来他功成名就,才在1969年发表了他早在1929年就开始构思的同性恋小说《少年郎》,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恋秘密。

在另一些作者的作品中,同性恋也都写得含糊、朦胧,甚至改头换面,只有那个多次进监狱的让·热内才敢在《鲜花圣母》有赤裸裸的描写。实际上,为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与其说是同性恋行为本身,还不如说是同性恋的宣告,不是"做",而是"说"。得罪社会价值观的,不仅仅是这种被多数人和普通规则看成伤风败俗的行为,而且尤其是跟同性恋连在一起的叛逆思想。《背德者》中,主人公妻子的死,是死于结核病,但在一般读者看来,更是死于米歇尔对她的精神折磨。而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普鲁斯特笔下的夏吕斯男爵竟在他妻子的葬礼上,向教堂唱诗班的一个男童询问起他的名字和地址,这种"精神罪",恐怕更为社会所不容。普鲁斯特曾经说过:同性恋是整个社会中"尽人皆知"的"秘密",这句大实话,也十分恰当地说明了同性恋文学在整个文学史中的地位,许多人都在写,但人们又有所顾忌。

直到1968年的"革命风暴"之后,同性恋描写的禁忌才算被彻底打破。雷诺·加缪(Reneau Camus)、伊夫·纳瓦尔(Yves Navarre)在自己的作品中讲述了某种性解放的经过。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在《玫瑰星》(1978)中展现了他痛苦的解放过程。然而,艾滋病的出现又引起人们对同性恋的新看法,甚至有人把同性恋排斥在文学之外,认为写同性恋

的文字根本就谈不上是文学。

至于女子同性恋,其命运则要好一些,因为长期以来,女子同性恋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本性的东西,隐藏在所有女性的性欲之中,而且它也不被认为是对社会的反抗。

当代作家作品

看看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同性恋作家真不少,我们可以列出一长列名单。他们的名字连同其作品,不会因为同性恋而失去价值,反而因其不易而更显价值: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向来被认为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大代表作。小说中,普鲁斯特自觉不自觉地描写了一些同性恋心理和情节。那个著名的"花花公子"夏吕斯男爵就是例子。另外,作者在女子阿尔贝蒂娜和安德蕾的感情经历中,故意以女子同性恋的描写,暗示了男子同性恋的一些心理反应。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背德者》是读者比较熟悉的例子,其实在纪德其他作品中,对同性恋也有不少描写或影射:自传《假如种子不死》中有真诚的坦白,游记和日记也有一定的叙述。就拿纪德的最后一部小说《忒修斯》,这部可看成其精神自传的作品来说,也有对同性恋的赞美。老年纪德通过神话人物忒修斯,表达了自己对爱情(包括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美好憧憬。美女阿里阿德涅要诱惑忒修斯,而忒修斯一边与她虚与委蛇,一边暗恋上她的妹妹,同时还忘不了向美少年格劳科斯频送秋波。

亨利·德·蒙泰朗(Henri de Montherlant)的许多作品都有同性恋描写的痕迹,例如《梦》、《斗兽者》、《给欲望之泉》、《沙玫瑰》,以及《少年郎》四部曲小说,同性恋描绘往往揉杂在异性恋之中,朦胧含蓄,这与他在公开场合对自己同性恋倾向的自觉抑制有很大关系。例如在《斗兽者》中,主人公本来与公爵之女相爱,受任性的她的鼓动,去跟一头凶猛的公牛搏斗,斗牛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他爱的不是女人,而是"公牛"。蒙泰朗只是到了晚年,已成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后,才发表了同性

恋方面的代表作《少年郎》。他认为这部花费他四十年心血的作品已言尽了心中之言,穷尽了他毕生可写的主题,便在三年后自尽。

让·热内(Jean Genet)的几乎所有小说都写到了同性恋,尤其是《鲜花圣母》、《小偷日记》、《玫瑰奇迹》、《布雷斯特的科雷尔》,他在同性恋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在于他对性犯罪(当然也包括其他类型的犯罪)作了大胆放荡的直接描写。

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本身是美国人,后来用法语写作,其一生都与肉欲作着搏斗,并在作品中写出了这种自觉斗争的痛苦。小说《莫伊拉》的主人公约瑟夫对浪荡女莫伊拉的关系只是一出闹剧而已,而他真正爱的人是清教徒大卫,只是大卫的完美使他不敢贸然示爱。小说《坏蛋》中,丑小伙子加斯东对女主人公的追求漠然无视,导致了她失望而自尽,而加斯东的怪癖,被人看成是一种恶习。格林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思想,使他在作品中坦白同性恋的同时,也把它看做一种洪水猛兽,拼命躲避。这种叶公好龙似的性趋向在他的《每个人在他的黑夜中》、《青年时代》中均能读到。

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Dominique Fernandez)在1978年的作品《玫瑰色的星》中,以某种"心理生物学"的方法,揭示了一些著名人物下意识的同性恋倾向。他的小说《在天使手中》(1982)以一个同性恋者的自传形式写成。而后来的《贱民的荣誉》则写一些同性恋者得了艾滋病后生活的困惑,以及他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再思考。

女作家方面,科莱特(Colette)本人有过同性恋经历,也难怪她三次婚姻都以不幸而告终,她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多次隐约地描述了自己"古怪"的情感。只有在《纯洁与污浊》(1932年初版时名为《欢愉……》)这部她自己认为最优秀的作品中,她对男子或女子同性恋以及其他"怪癖"者作了比较直露的描写。在这部作品中,她揭示了那些"不正常者"幽闭的生活,郁闷的欢愉,同时也反应了他们渴望幸福,希望理解的心境。

尤瑟纳尔(Yourcenar)的作品中,有着男子同性恋的主题,而且这一主题反复出现,例如在《哈德良回忆录》和《熔炼》中,有批评家认为,她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隐瞒她对女人的爱,还不如说是渴望成为一个男

人。尤瑟纳尔本人一直跟一个叫格蕾丝·弗利克的美国女子同居,后者是她作品的英译者。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某些作品,也涉及女子同性恋,例如她对自己与养女西尔薇娅“最强烈友谊”的关系的说法。

另外,大作家让·科克托(Jean Cocteau)、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eançois Mauriac),批评大师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都是同性恋,都有这方面的叙事作品或论著。

值得一提的同性恋文学,还有卡罗利·本克尔(Karoli Benkert)、米歇尔·拉里维耶尔(Michel Larivière)等人的作品,尤其是钱拉·弗尔什(Gérard Forche)的小说《明天是星期四》,让·阿鲁什(Jean Allouch)的论著《主人的性》。

居伊·霍康盖姆(Guy Hocquenghem)建立了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FHAR),使同性恋活动本身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借助于这一运动和某些明星的公开表态,同性恋文学又有了兴旺的标志:艾尔维·吉贝尔(Hervé Guibert)写的《致没有救我命的朋友》和《怜悯的礼仪》成为了畅销书。西里尔·科拉尔(Cyril Collard)的《野性之夜》(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双性恋的艾滋病患者)也是同样的命运。这两位作家都是艾滋病的牺牲者,而另一位叫马克西姆·蒙泰尔(Maxime Montel)的作家,则在《一种想象的苦难》(1994)中,为那些死去的朋友作了哀悼。

到了世纪之交,同性恋文学继续有不错的作品出来,弗雷德里克·马泰尔(Frédéric Martel)的《粉红与黑色》,勒内·德·切卡蒂(René de Ceccaty)的《爱》。而评论方面,则有迪迪埃·艾里本(Didier Eribon)的《对男子同性恋问题的思考》,乔治·肖恩塞(George Chauncer)的《纽约男子同性恋》。

《背德者》《鲜花圣母》《在天使手中》

谈到二十世纪的同性恋文学,就会谈到纪德,而谈到纪德,一般都要谈到《背德者》(1902)。《背德者》中的米歇尔,可以说就是纪德的影子。米歇尔曾患肺病,咯血不止,是妻子玛瑟琳无微不至的照料使他恢

复了健康,但米歇尔后来沉溺于声色犬马,而玛瑟琳却病倒了。米歇尔非但不照顾她,反而带她去北非,而且背着她与当地少年搞同性恋,尽情地享受着"乐趣"和"自由",最后,妻子恹恹病死,而这正中米歇尔的下怀。作品特别强调了,人应充分享受欲望的冲动,应拒绝一切肉体和精神的禁忌,但被认为"背德"的同性恋也给主人公带来一种惶惑感,而且多少带有忏悔的痕迹。

让·热内的小说《鲜花圣母》于1943年在监狱中写成,以同性恋生活为题材,穿插偷窃、卖淫、走私等犯罪活动。笔底透出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西方世界的客观环境,还有一颗真诚的心:他毫不忌讳地写了某种另类人物的下贱生活,把罪孽的心态揭示得淋漓尽致,然而文字中又可看出他不甘堕落于"淤泥"中,试图走向美丽的诗意世界的努力。创作手法颇具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些特色:非理性的主题;优美的文字(纯正的法语中,借用了不少同性恋社会的俚语,字里行间蕴涵着大量的文字游戏);幽默的文笔(引经据典中不乏种种的嘲笑、讥讽);开放的结构(虚构情节与自传性回忆交融一起,其间跳跃大胆);极其自由的时序(不按照编年史的方法,而是自由转换),等等。

多·费尔南德兹的小说《在天使手中》(1982)获得了龚古尔奖。它以意大利当代著名诗人和电影家皮耶尔·保罗·帕索里尼的生活为题材,以自传小说的形式,回顾了这位同性恋左派知识分子的生命经历。小说着重写了帕索里尼的童年、爱情与死亡,而且这三者都跟同性恋有密切关系。写童年,因为它是决定人一生性格、前途的培养时期,也是同性恋性倾向形成时期;写爱情,因为当异性恋和同性恋掺杂在一起时,种种的描述更是透出了"孰重孰轻"的比较,而两者对照中所隐藏着主人公的内心苦闷,则是社会道德结束的结果;写死亡,它一旦和同性恋纠缠在一起,则永远充满着神秘。帕索里尼之死发生在一次同性恋追逐之中,人物的生命和小说本身都在突如其来的死神面前戛然而至,令人扼腕叹息不已。

(原载文集《是禁果,才诱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译后记

《在天使手中》(*Dans la main de l'ange*) 是费尔南德兹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之一,1982 年发表后即获得龚古尔奖。小说以意大利当代著名诗人和电影家帕索里尼的生活为题材,以所谓"自传小说"的形式,回顾了这位以同性恋生活方式而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的生命经历。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 1922—1975)在意大利乃至世界的文学和电影史上都有名气,他不仅写诗,还写小说,写评论,导演电影,从事新闻活动和社会活动。费尔南德兹笔下的帕索里尼,是一个一生下来就命定要斗争一辈子的人物,他天性爱反叛,反社会不平等,反阶级压迫,反世俗偏见,他生来就喜欢闹事,一生参加过各种进步的社会运动,还经历过三十三次诉讼。

这位简称为 P. P. P.的共产党人,尤其还以同性恋者的身份闻名遐迩,这一点,跟小说的作者费尔南德兹一模一样。①

---

① 费尔南德兹也早已经公开承认和宣告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所写小说的主题大都跟同性恋有关。记得那一年他来中国访问时,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始终不离他左右,即是他的同性恋伙伴。法国大使设宴欢迎他时还邀请了他的这位同性恋伙伴。

小说《在天使手中》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主人公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与爱情，包括他的第一次同性恋经历以及它带给他刻骨铭心的留恋，还有他因同性恋行为而遭到开除出党的处分；第二部分写他去罗马之后发展小说、电影事业的奋斗经历，其间有不少在以贫穷和混乱而闻名的郊区跟“小子们”一起的游荡经历，还有成为作家、诗人后社会地位的改变，以及与小子们关系的微妙变化；最后的第三部分，写他在文学和艺术事业上的成功，以及伴随着成功而来的种种丑闻、种种诉讼，表面辉煌中的内心辛酸，行为潇洒中的心灵彷徨。当然，最后一章必然是他“命中注定”的暴死，恰如他始终萦绕在心的意大利经典画家大师卡拉瓦乔(米开朗杰罗·梅里西)的悲剧终结，恰如命运天使手中的小小玩偶。

小说既然已经译出，我作为译者，觉得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再在这里做一些作品内容概括、主题剖析之类的工作，我只想强调一下，主人公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除了性趋向上的矛盾，还有政治观点上的矛盾，首先是对共产党。当然，他一方面始终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读马克思，读葛兰西，对阶级斗争、对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等基本问题从来就毫不动摇。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弟弟是被铁托派的游击队弄死的，这让他对共产党内部的残酷斗争有了深刻的认识，后来，他自己又因为同性恋问题，遭到党支部的处分，被开除出党。他对党的矛盾认识，在小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表现在他在葛兰西坟墓前的那段想象对话中。

另外，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尽管在艺术界赫赫有名，却始终是社会永恒的边缘人，是双重人格的英雄，恰如其名字皮埃尔·保罗所影射的那样，既是教会的奠基者，又是精神的历险者。这里，最隐秘的一点，是他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痛苦坚持，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希腊之风、男子之爱有疑虑，有羞愧，但更多的是坚定，是排除万难的毅力。当然，在这篇后记中，我对法国文学中的同性恋问题不愿展开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当可关注我的有关文章。[1]

---

① 见拙文《当代法国的同性恋文学》，载文集《是禁果，才诱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说到费尔南德兹的小说的创作特色,人们往往用“巴罗克”风格一词来概括。说到“巴罗克”(barroco)一词,在葡萄牙语原文中,意思是“不规则的珍珠”。作为艺术创作手法的这一风格诞生于十七世纪初罗马,主要体现在建筑艺术中。在小说中,“巴罗克”风格更多地表现在分杈情节的无比蔓延,故事背景的尽情渲染,所谓“离题话”的自由自在、气势磅礴地展开……早年法国巴罗克小说的代表是奥诺雷·杜尔菲(1568—1625)的《阿丝特蕾》(1607—1627),它描写牧羊人塞拉东与牧羊女阿丝特蕾的爱情纠葛,小说把一种理想化的田园牧歌式生活当做主题爱情的背景,情节中滋生出无数的插曲和缠绵的对话,写成五大卷六十册。至于当代的法国巴罗克小说,费尔南德兹的作品则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之一。

这部《在天使手中》,便充分体现了寓情感、哲理于吸引人的故事、人物,寓观点、看法于大段的离题话,寓博学、才华于背景烘托的巴罗克小说的艺术特色。其形式结构,主要指故事的叙述、氛围的营造、文字的雕琢,都十分注重情绪上的感染力。

《在天使手中》写的主人公生平故事并不复杂,一个文学青年走上了艺术创作的道路,他的同性恋趣味、他的革命思想与社会的实践发生了碰撞,最后走向了命定的死亡……复杂的是他生活的这个社会的背景,而这个背景又具有其政治、社会、司法、艺术、文学、地理、历史、风俗等方面的要素。而这,为作者费尔南德兹的描写与铺展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使他在历史事件与文化背景之间游刃有余。费尔南德兹得以以主人公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名义,也以巴罗克小说的名义,在小说中大量谈及艺术、文学、革命、法律、历史、现实、实验、时尚、社会、世界……总之,谈及一切。

必须指出,为这部生活小说提供广阔背景、生动营养的,是从法西斯主义开始到红色旅时代的整个的当代意大利社会,尽管,小说中的绝大部分事件、地点、日期都跟现实生活中保持了一致,尽管,小说中诸多真名实姓的人物中,有不少为我们所熟悉,作者费尔南德兹依然并不是在为传奇人物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写作一种传记。应该说,小说以史实为基础,以虚构为辅助的手法写成的,在标志着主人公生活重要转折

点的几个确切的历史事件、时间和地点之间，作者从空白中想象，以创造性的、具有生成功能的文字，编织出了虚构人物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一生奋斗历程。这种写法，大致跟当今在欧美流行的所谓"autofiction"的假传记、假自传写法保持了一致。

可以说，翻译这样一部作品，并非一件易事。有那么几个难点。

其一，作为巴罗克风格小说的代表作，《在天使手中》并不只是叙述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生平，而是结合他生平中的几个重大事件，详细地描写他的内心活动，尤其是他与意大利文化的内在关系。年轻时，他如何受到种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颇具地方特色的建筑艺术、方言诗歌的影响，还有博洛尼亚城镇生活方式和弗留利乡村风俗对他的熏陶，来到罗马后，他又如何对种种现代文化的因素进行有思想的独立分析和识别，事业成功后，又对各种先锋思潮（包括文学的、电影的、艺术的、甚至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等等。由于这一切涉及文化的各个领域，便要求翻译者拥有比较全面和扎实的知识面，尤其是在文学、电影、绘画、建筑、音乐等方面要懂得多一些。

其二，由于主人公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是意大利人，小说写的是以罗马为主，以各地城镇和乡村（博洛尼亚和弗留利）为副的意大利生活。所以，也要求译者得了解意大利的社会现状、历史发展，当然，甚至还得熟悉一点点意大利语。好在我以前多少学过一些意大利语，还知道如何查词典。另外，我有问题还可以请教我的博士生赵丹霞女士，她的意大利语不错，能帮我解决一些问题。

其三，巴罗克小说的语言常常很花哨，有不少的长句子，还有些句子中隐藏着文字游戏，尽管理解起来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何把它们转变为恰当的汉语，倒也是一个难题。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第五十章中有个句子如下：

De cette petite peste de Bruno venait de partir ce nouveau pet.

我开始时译为：

从布鲁诺的这一小小瘟疫中，刚刚又出来了一个新鲜屁。

原文中有四个单词分别包含“p”和“t”的发音。译文中，这一点必须考虑进去。译文初稿中有了“小小”和“新鲜”这几个含有“x”音的字词，但听觉上还不够响亮。

想来想去，最后改成：

从布鲁诺破败的肚皮中，刚刚又蹦跶出了一个爆豆屁。

句子中，包含了有九个带“p”“b”“d”音的爆破音。在我看来（听来），这些音响，比较恰当地转达了原文中有的“爆屁”效果。

这一类值得细细琢磨的句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对我的翻译提出了挑战。我曾在给硕士生、博士生开的文学翻译课中，以自己的译文为例子做剖析，从学生们的反应中，我也学习了一些东西，对我修改这篇小说的译文有不少的帮助。

顺便说一句，当翻译中碰到实在太难的问题，在北京找不到解决办法时，我也直接发电传给作者费尔南德兹先生。他先后为我解决了十来个难题，在此，我特表谢意。

小说的翻译从2001年10月开始，中途到2002年4月停顿下来，主要是因为中译本的版权一度出现了问题。原定的出版社不能出版。我当时只得采取曲线迂回的办法，在《世界文学》上刊登了只有两万来字的选译，算是对得起当初对作者费尔南德兹的翻译承诺。

谁知，一停就是好几年。

后来，跟出版人胥弋谈起这一小说，他被我说服，同意推荐给出版社出版，并鼓励我“再鼓作气”，把小说全翻译出来，我便于2007年年底开始小说后半部分的翻译，到2008年10月才算翻译和校改完毕。在此，我要特别表示对胥弋先生的感谢。他对所喜爱的文学事业孜孜不倦做到底的精神，时时鞭策着我，让我在翻译与写作的工作中不敢怠慢。

是为跋。

余中先

写毕于2008年11月14日，

我正式参加工作38周年纪念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在天使手中
作者＝（法）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著
页数＝４８３
ＳＳ号＝１２４５１１７１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０１